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沙汀传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书

小引 通向大山的门

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这土地，丰饶而贫瘠，寥阔而仄小。在过去的年代里，它曾经以出产红苕、鸦片、黄金、棒客、袍哥闻名。当然，也世代代生息着无数质朴、强悍、极富机趣的乡民，为他们提供了偌大一个悲喜交集的人生舞台。

正是这块古老荒僻的四川西北部土壤，滋养了它的现代之子沙汀。沿着这里的每一条山沟垄脉走去，你都能探到他漫长的文学历程，他的文化性格形成的轨迹和整整一部心史。

不妨就从寻访睢水刘家酱园的陈迹开始。睢水，是连接沙汀故乡和西北崇山峻岭的一个关隘。背靠黑森森的大山，前有绵延不绝的丘陵。从场口曲尺形的正街径直走进去，左手转弯再行百十步，昔日街市的印痕依稀可见，酱园，已不复存在。如果一头钻入临街的一个铺面房子，穿过幽暗深长的夹道，顺势爬上坡去，眼前渐次明亮，便会见到一块菜地和地坎下的断头卧牛石。这块菜地占据了一个废弃已久的房址，在残垣颓壁之中，更显得碧绿生青，蓬蓬勃勃，仿佛便是这整个穷荒与丰腴交相错杂的缩影。

旧的房院余下一堵后墙，令人触目的是大墙左侧赫然开着的一扇门洞。

“这座院落很深，后院经常无人居住，而它最大的优点是，打开后门就上山了。”这扇门连接的小径，通往茂汶、北川、绵竹、松潘的大山区！

打开这扇门，就走进莽莽的山岭，把平直单调的丘壑留在身后。

有谁能知道这门的真实来历呢？不经人指点，又有谁知道这门前的房址便是写作并完成《淘金记》的那间供神堂屋呢？

据说这间堂屋曾有“狐仙作祟”，半夜更深，周围能听到那里传来一片碗盏叮咛作响和嘁嘁低语声，还夹杂几句脆生生的笑音。人说，鬼们在请客吃饭哩。沙汀并不特别胆大，他当时有不能不住进去的理由，而且他读过《聊斋》，知道狐鬼不足怕。

他最看中的是那扇门，看中堂屋所在的这条能以生命相托的逶迤岭脉。它叫玉洞山。现在，山岗上安葬着沙汀的爱妻，她曾伴随沙汀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十年，替他生儿育女，替他担惊受吓，……在这里，他以一个现代隐士的身份，在各式各样的农舍柴屋，于米柜、木墩和小学生用的作文本的格子间，奇迹般地写下了他的大部分代表作品，使得散布在苦竹庵、刘家沟、秀水镇、永兴乡、邹家抱房、板栗园的那些简陋荒凉的小房，个个如同得了魔力，支撑起他一生中最贫穷时刻的创作大厦！

这时，你站在刘家酱园的后山上不禁陷入沉思，恍惚踏上了一条历史的脊背，听断墙、柴门，和着山林发出飒飒声响，与你耳语：如果沙汀不是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或者不幸却是永远滞留在这块土地上，他能成为沙汀吗？假如他走出这里，东出夔门，而忘记重返这块土地，那么，他能够成为今日之沙汀吗？

我神往于一个三十年代作家的艰难跋涉，意识到他对川西北土地和人物的历史性的巨大描摹能力。他是现实地生活过，创造过，眷恋过了。人们惊异沙汀与艾芜这两个四川作家的不同，艾芜的文字明明白白，不像沙汀那样，满篇土语土情。除了家乡的偏远程度和乡居的时间多少不同外，恐怕还

是沙汀执拗的专注一点的本性所致吧。

他的深沉的“恋乡情结”，他的“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诚朴和易感的素质，他的对人的“性格”和乡土语言、风土人情的高度敏感及特殊才情，给他带来了成功，同时，也紧紧地束缚住他。这是一个真正的“原乡人”的文学选择，一个文学淘金者的艰辛劳动。

我十分相信，历史再也不可能由后人完整无缺地重述出来。历史的无限丰富性永远使我们眩目，并激发起后辈再创造的雄心。面对沙汀，我一部分是尽量地运用当时、当地人们耳闻目睹的材料，包括他自己的口述、手写、身感的各种回忆，一部分却无可奈何地要带着一个传记作者身处时代的观念、感受和心理，深深切入到历史的叙述中去。

传记是历史的造山运动的记录，是自然、社会对一个“人”的形成的诉说，也是传主本人外在行为与内在性格、心灵的生长，对自然、社会的“反抗”，或“顺从”，或又“反抗”又“顺从”的写照。这之间，传主和传记作者，不免会有心的交流和撞击。从这种意义上说，传记必然是以往的人与当今的人，彼此进行的一场关于“那个人”的历史性对话。只要你能够找到那扇门。

一扇门可以通向一个世界！

你对你的生命有最初的记忆么？

对我的记忆，首先是我对乡土的记忆。还有我对身边迅速筑起的“人造”乡镇社会的早期反应。

安昌古镇

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的12月19日，旧历甲辰年冬月十三日，一个男婴在四川安县城关安昌镇西街的杨家老宅，呱呱坠地。

这一天极平常。平常得留不下任何痕迹。只是城东的钟楼，照例执行它每日报时的使命，这天凌晨时分敲响了十五下，震荡着、加深着方圆二十里内外各乡场的呆板沉寂，给周围百里的山岭带来一种神奇莫测的气氛。据说，这钟声一直到七十年代才停止，持续时间之长，令外面进去的人咋舌。这个婴儿生下来就有“表现欲”。

杨二哥的母亲爱摆龙门阵。她说杨二哥还是奶娃的时候，吵夜吵得好凶。害她半夜一次又一次地起来跑到床上抱他、哄他，棉裤都跪烂了三条。爱哭的孩子行二，取名杨朝熙。他前面已有个哥哥叫杨朝绶（印如）。他家的祖籍原是湖广黄州（今湖北黄冈）。明末张献忠杀狠了蜀人，清代“湖广填四川”，他的太祖杨启梁千辛万苦携家迁到安县西南的河清乡龙湾子。传到祖父杨仁和，才搬进安昌镇城关居住，在河清留下了祖坟和田产，留下了杨家先辈的足迹。

悠悠江河载着千年的时光流逝。安县在先秦时，本是个牦牛出没的羌族部落国，名冉马龙夷（包括今之茂汶、理县、北川等地）。汉武帝统一后

设郡，自此汉人迁入，各民族逐渐融和，但仍是地广人稀。近代实行的移民，使外籍人氏陆续进入，给它带来了生气。仅小小的河清一处，镇上就汇聚五省的会馆：大西街的福建馆，小北街外的江西馆，十字口的广东馆，陕西街的陕西馆和大南街의湖广馆。由此可以想象当年这里五方杂处的情景。这是一片开发中的蛮荒之地。

安县得名于龙安山，即今大安山。正处在山地与川西平原交接的边缘。境内百分之八十二为山陵地带，与紧邻的成都地区的富庶恰成对比。

从成都到安县三百多里，杨朝熙青少年时代的传统走法，是先乘汽车到绵阳南三十里的新店子，下来再转乘马拉车或黄包车。共计三天的路程。路上的客栈，多半是鸡毛店，破旧得像用猪圈楼板装修的，檐口挂长方白纸号灯，上写“鸡鸣早看天”。像样点的有官店，比较的干净一些。从新店子到安县，途经界牌、花菱、黄土，都是一些有名的乡镇，一路上爬过一处山坡，便是一片平坝，再上一级高地，又是一片平坝，人不知不觉已进入高原山境。

直到远远地看到城南山上的一座塔身，才能为结束颠簸之苦长吁一口气。安昌镇自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作为安县县城建立，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安邑乘岷山之脉，环境皆山，县城尤居四山之中，东有金山，南有五云，西有圣灯，北有大安。杨朝熙从小看着县城周围的山长大。近处的绿山，蓝莹莹的远山，都充满了神秘。那里该有一个别样的世界，有数不尽的宝藏，讲不完的能人奇事，要不，怎么会有桐炭、柴胡、木通、山金这些东西源源运出来？他也对山充满敬畏。它平时静穆庄严，转眼间，在大风呼啸或山岚雾瘴升起的幻影中显身，就像看到盘旋飞舞的龙。整个绵长起伏的山岭不就是这样一条巨龙吗？那么，被这条龙隔断的山外的世界，是更大，还是更小？

山的中央立着这座四闭的小城。如果说四川盆地整个形成一个大的圆圈，安县这座山城自己又成为一个小的圆圈。

城下苏包河仿佛要冲破这个山的包围，迤邐而来，紧贴着城关的西门，到城南突然横折，与桑坪河汇合成汶江，为涪江的一条支流。除了夏天，河面并不宽广，但江水便是在枯水季节也足够让竹木筏子驶过。只见船夫跨着身子，用力拿篙竿向就近的岩嘴上镗地一戳，筏身阁咯阁咯快要擦着河滩底似地发出响动，竹筏已箭也似地穿过去了。

城镇南北稍长，只有一条正街。由城内十字口做为中心点，出西街便是西门，慢慢地踱步，由西门走到东门，大约用不上十分钟！

街面是石头铺的。中间是红花石板，两边是饭碗大小的鹅卵石。年岁久远，这些铺石被踩得通体油光发亮。雨后，小朝熙蹒跚地走在这街石上，看到阳光照射下满街的五色石子放出瑰丽的颜色。

（你喜欢这个小城？对自己的生命孕育之地，谈什么喜欢不喜欢，是不是过于轻率了。

至少，这个城的样子，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的一部分的样子）

西街中段的路南，正是杨朝熙祖父经手置办的房院。祖父杨仁和，一名清廷小吏，官至重庆都钦部（一说是粮房或户部典吏）。他在家乡小有名气，是因了他的书法。家里的神匾、楹联，都出自他的手笔。朝熙幼时见到他写的“册页”，是杜甫的名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据说他给李森林当

过代笔。李的儿子李岷琛是安县唯一的翰林，书法远近驰名，也给杨家老屋写过对子，记得上联是“闲中立品无人觉”，异常的潇洒。杨宅大门的对联很气派，“国泰家庆”、“人寿年丰”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也是爷爷的手书。配合着这套大房子，倒真是标志了杨家的一个显赫鼎盛时期。

大西街二十二号杨朝熙的出生地，现在紧缩为一个小小的中院，已经面目全非。原来的规模只能在他的几篇小说里找到一些影子：

我们住的是一座三进的院子，五开间阔。当街的一进，其中有四间是店铺形式，只是没有人居住；剩下的一间便是我们的八字龙门，门堂很深，夜里要是没有人伴送，我一个人是不敢进出的。我们的房子相当大，前后三进，座后还有一座荒废的庭园。

这个庭园实际是菜园、空地，其间挺着两棵硕大的皂角树，到了杨朝熙的童年，临街的房子经常被部队驻扎占用。这件事无疑在日后激发了《祖父的故事》的创作动机。原先还招过一个住客，是个土粮户，便是《老太婆》这篇小说里写的狗老爷。后来，一个哥老出身的著名旅长张凤梧的侄子张绍武，南充人，副官，带着新娶的姨太太来住了。本地有句口号，叫“宁肯让人停丧，不能让人成双”，意思是自己的房子叫别人夫妻在里面作爱，想想便是晦气、不吉利的。而那些带冲犯了这一条。朝熙家里自然忌讳，又不便得罪，他母亲便出面商量，供一个神位好不好？于是写了个“天地国亲师”的牌牌放上了。民国了，所以把“君”字改成“国”字。

这种避邪的方法没使有势力的房客生气，倒也稀奇。

这个细节从来没能写进他的小说里，而且实际上，杨朝熙根本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祖母。杨仁和是死在重庆任上的，由家人将灵柩运回河清杨家坟园，与妻子合墓。他身后把不多不少的遗产传给了五个儿子。这些儿子很快便面临家道中落的困境。

杨朝熙的父亲杨义质（模斋）居长，一介书生，笃信礼教，毫无生财、理财的能力。在他五六岁上便郁郁离世了。（你还能记起父亲？他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我家堂屋神龛上的那张画像：穿清代袍褂，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我觉得父亲迷迷蒙蒙的，离我既近又远）

这种纯粹由画工们制造的作品，总是匠气十足，是很难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的，仅剩下一堆服饰和满幅的肃杀之气。

杨义质生前从不理家政。自己的父亲一死，便将家业让给二弟经管。他是个廪生（清代凡经岁科两试在一等前列的，算是补了廪的秀才，其职责是保证本乡应试童生无身家不清或冒名顶替之弊），每月可从官府领到钱粮（廪米）。他一生读书，家里有许多藏书，等到朝熙有能力读这些书时，大部已经散失。

仿佛精明强干皆被祖父占尽，朝熙从小听家里人说，父亲生来便懦弱而懒散。他满身呆气，一尘不染。当地的风俗，东门灵官楼每逢唱庙会戏，任何一个戏班第一天开唱，都要“接灵官”镇台，撒红钱。所谓“红钱”是纸的，用硃砂染过，据说谁接到即可避邪。故此，每逢撒红钱的时节，台下一片争抢，很是热闹。遇到这种场合，父亲总是站在外围冷眼观看，木讷而引不起兴趣，即便是“红钱”自动落到了他的脚下，他也不会弯腰去拾。

这是不是中国近代最后一批以读书为生的人呢？同鲁迅的父亲一样，田产是前辈挣下的，到了他手里，功名求不得，唯一的事情是读书。家就在他们这一代败落下去。他们命定是要看到封建大厦之将倾的。

对于杨朝熙来说，父亲不是一个实体。他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一飘，便过去了。真正将性格、气质遗传给他，在他的四围筑起一个环境，耳濡目染，在精神上首先影响他的，只能是母亲。

他母亲

父亲逝世后，母亲独立支撑门户。母亲的天地构成小朝熙童年的天地。

母亲的身坯很大，他并不像她。从外表看，哥哥更像她，高高大大的。哥哥脑壳也大，诨名就叫“杨大头”。但是要论起独立开辟生活的能力，他跟母亲更相似。大约六、七岁起，他就能跟着舅父、亲友们一道去街上坐茶馆了。他哥哥便不敢。

（你的安县街坊说，杨二哥黑黑、深深的眉眼，宽大的鼻子，还是满像他母亲的）

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是安县花菱镇人，姓陈。他母亲姓郑，名妙贞。郑家原是本城一个旺族。母亲的叔祖父郑香园，是本县的名举人，曾在甘肃花马池做过官。安昌镇西街天后宫，是本县福建籍人的会馆，其中郑姓占着主要地位。当杨朝熙出世的时候，天后宫已经由族人做主卖给李翰林家，直到他的舅父郑慕周有了地位才又赎回。郑慕周解甲还乡，一位亲属转送他一张李东生书赠郑香园的横批，具体文字记不得，但从内容上可以推知郑家原是书香门第，也曾经风光过，只是清末以后凋零了。

母亲的生母去世很早。外祖父续弦没几年也谢世。萧氏外祖母无生育，母亲和舅父是在继母的严酷管束下长大的。后来几乎脱离关系，视同路人。朝熙还记得萧氏外祖母晚年沦为半贫民，寄住在市街萧氏宗祠里。身边仅止一个兄弟帮衬，这个兄弟一脸麻子，以打柴、帮短工为生。舅舅为了了却过去的恩怨，最后把她接到家里来同住，为她送终。萧氏外祖母善于操持家务，只是心胸狭窄。母亲在她的挟磨下生长，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等婚后主持一个家庭，渐渐显示能力，境遇才有所转变。比起后母，她有凄苦的童年打底，待人善良多了。

（这个外祖母锻炼了你的母、舅。苛刻的环境给他们姐弟注入巨大的韧性和在社会上独立闯荡的才干。母系亲属对你生活的直接影响，要比父亲的大得多。你似乎应该姓郑）

1909年，杨朝熙的父亲病逝，母亲落入守寡和被小叔子们挟持的命运。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二叔母也死了。这样，他们这房，父亲已有两个男孩，三叔、四叔都只有一个儿子，么叔又子女俱无，按照惯例，便由亲朋做主，把他过继给二叔，顶了一房人。

不料二叔不久也弃世而去。这个家面临分崩离析。印象景深的便是几个叔叔一年中要和母亲大吵大闹几回，逼着分家。平日的小吵闹更不用说了。每当这时，尽管开朗、能干如母亲这样的女人，也只能偷偷地痛哭一场，然后再赶忙张罗请客，找亲友来评理申诉。幸亏父亲生前喜欢助人，结交下几位在安县有点名望地位的朋友，一个詹夔（詹棠）詹举人，一个刘子良，一

个谢健卿。而他三叔、四叔、么叔因从小有哥哥操持家业，只顾吃喝游乐，在社会上交际不广。所以，尽管闹分家闹得凶，最后一次还闹了好几天，简直天翻地覆，可待詹、刘、谢几位一到，纠纷也便立时解决。就象鲁迅《离婚》里七大人的到来一般。

这样，大约在父亲死后一年多分了家，将祖父遗下的田产二百亩分成五份，每房四十亩。因为朝熙和哥哥算两房人，分得了近一百亩的田产，都在老家河清。三进的大院，他们分得两进正房，还有后面一块空地。

看起来，母亲领着他们占了便宜，实际上分家也分来了债务。这都是为了安葬父亲和二叔借下的，当然要由他们这两房来负担。记得单是一个焦家字号，就欠了二、三百两银子。

焦家是安县最大的士绅，田地、闲钱多，又开票号，雇陕西人经营，放帐生息最有一套。每年冬至一过，那些被安县人称为“老陕”的，就背起长长的褡裢，挨门逐户来收年息了。朝熙自小一见这些“老陕”来，赶忙躲到后面院子去，胆怯，心烦。家境的败落给他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

母亲用她的全部精力投入家业的重理，她甚至还想振兴一下。她从小铸成的男子气魄，现在有了施展的机会。她治家虽严，对待下面人却很和气。安县打零工的都愿意到“杨大老爷娘子”家来干活，因为她工钱公道，饭食又好。她识字不多，不会记帐，但擅长管理，事事要强。她把免受族人欺侮的希望得惊人。她出钱为弟弟造了两只木船，到绵阳一带往来贩运货物，或买木柴沿江运往三台、太和镇、遂宁销售。但才两三个月，朝熙的舅舅就空手回来。他失败了，初次经商亏了本，连船都赔了进去。后来他又去川甘边境的碧口做大烟生意，母亲还是为他掏了本钱。一直到舅父拖起队伍，为了购置枪支弹药，母亲忍痛变卖了一部分田产！（很明显，你母亲充分利用了分家得来的有限家产，来培植你舅父，这才扭转了杨家的颓败。你的性格可没有这么“强”，至少在外观上看不出）

这样一个能干的母亲，在那种环境下，她的内心究竟还是痛苦与不安的。她极有主见，做事麻利，干脆，但她又异常迷信。不仅吃长斋，请人念经，而且在家里常年摆经堂。逢到观音菩萨或谁的什么生日，便在家里供起佛像，招来一群婆婆大娘，抱点米来，抱点菜来，然后都在杨家吃住，一边做佛事。家里还供有“坛神”，每各都要“庆坛”，请十多个巫师，戴上各式各样的面具，焚香，敲打，起舞，一搞就是两三天。这时候，就等于给小朝熙添加了一个节日！

母亲对敬菩萨、逛庙会为什么兴趣浓厚？因为女人的苦楚不被男人社会所容纳。她青年守寡，没有到茶馆整日喝茶、摆谈的可能，更不能到社会上经商干事，随意抛头露面。吃斋念佛是母亲可以采用的一种心理平衡手段。当然，社会风气也允许这样做。童年时接触的这些婆婆大娘，便是日后《淘金记》何寡母这个形象在生活里的最初的形态了。（不光是婆婆大娘影响你写何寡母吧。这是综合来的，特别是何寡母对儿子的复杂感情，写得细致入微，是不是有你母亲的影子呢？呵，这倒是有一点点的）

能干的女人偏偏溺爱幼子，母亲也是这样。她在朝熙面前总是放下严厉的样子，露出过多的笑容和温情。她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她喜欢吃酒，吃甜酒，朝熙小时便被允许喝这种酒。所以他酒量不小，而且一生嗜酒。过去有一个时期，一天要喝一台，有时一天两台。这个爱好一直到他第二次胃溃疡发作动大手术后，才不得不戒绝。母亲还要他跟着吃

花花斋，就是每逢阴历三、六、九吃素，忌食牛肉。直到十五六岁，才在舅父的劝说下改了。结果是他一生喜吃牛肉。

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母亲对他就更放松了，成为他欢乐的日子。除夕祭祖，贴春联，点灯，放鞭，在斗秤上贴“黄金万两”。不许谈不吉利的话，不许打翻菜油。在给长辈叩头辞岁、吃团年饭之前，这里还有拜堂子年的风俗，便是先到亲戚、熟人家拜访。去一般商号、铺子，或有地位的人家拜年是朝熙最觉好玩的，不会有在大人面前叫不出那些复杂称呼的难堪，只需和哥哥拿着红纸写就的“恭贺新禧”的条子，拿着浆糊，在门上一贴就行了。

杨家这时的地位不很高，但收到的条子很多，因为母亲人缘好。这成了风俗性的“民意测验”。

到了初二、初三，一个木匣糖，一块肉，一把面，开始正式拜年了。家里要做些糖什么的好回礼。在母亲的指派下，他们家每年的过年糖食，一入冬便请糖坊师傅来做，什么米花糖、谷花糖，原料好，做工又细，远近有名。泡菜、腊肉也做得不错。母亲做为一个女流之辈，凭着她的社会交往，建立起她在全镇的威信，连袍哥中人都尊称她为“杨大姐”。母亲委实太强了。她敢把犯了刀案的袍哥，藏在家里，不动声色。替舅父买枪支，也是她搭上的线索。幸亏她对朝熙的惯宠也有限度，否则，在一顶过大的保护伞下，只易生长纤弱的幼苗。杨朝熙长期得到母亲“保护”，旷课逃学不好好读书，直到十一二岁，有一天早晨，他又赖在床上不起，母亲气了，掀开被盖，伸手便打，但才打了几下，自己倒哭了。她哭着诉说不幸，诉说丈夫的死，寡母孤子的无依靠和他的不争气。一个平时极为硬气的母亲的哭泣，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极深的印象。朝熙可怜起她来，也恨自己。他真正开始用功读书，便是从这以后的事了。

（你的多感，在这里找到了源头。表面看来，你不是那种充满浪漫气息的人。可就像你的母亲，在硬朗的性格外壳之中，包藏一个易受外来刺激的敏感的心。幼年的你，经母亲看到一个大家庭的兴衰荣枯，由家事的沉浮，引导你从小就关心人世）

茶馆——乡镇文化环境

杨朝熙是吃奶母的奶，在川西北的小城镇长大的。

有个朱大娘，永安乡人，带他的时间最久。断奶后仍然留在他家里。这个奶母是他童年的引路人。

（你不要把我的奶母写成高尔基的奶母，或者鲁迅的长妈妈。不是这么回事。她只是抱着我，牵着我的手，走遍我们镇的角角落落）朱奶母经常领他走出老屋，到十字口逛街。

十字口最多的便是茶馆。按照本地市民生活的不成文规矩，男人们一早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一路扣着钮扣，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趿着鞋先奔这个地方来了。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这点道理在四川的这个小镇尤其见得正

确。

十字口上旅店兼营茶馆的尚友社，店堂里低矮的茶桌擦抹得还算干净，俯仰坐靠都很舒适的矮竹椅上，已经上了茶客。这都是乡土社会固定的主顾，位置也很少变化，谁是坐在当街的桌边的，谁是坐在里面第三根柱头下的，一一对号，丝毫不差。

这时，人们悠闲地用茶船子托起茶碗，从半扣的茶盖缝隙间嘘嘘地吮啜品味。有人让堂倌送上热水、帕子，在苏苏气气地洗脸，用手指头刷牙齿。有的人已经浓浓地灌下了几碗茶，“开了咽喉”，在互相交换从昨晚离开这里以后得到的市井消息。世代住在这个城镇上的人挨得如此之近，打个喷嚏都能听到，以至于大到县政要事，小到床第间发生的隐私，都是刻板生活中极好的“调料”。等到卖豆芽的陕西籍小贩来了，就抓几个钱的豆芽摊在茶桌上，一根根细细擻着，也不耽搁交谈。

吃过早饭，又上原先的茶馆，照例地说：“换一碗！”或者：“茶钱这拿去！”茶堂渐渐坐满，茶桌边的各种交际、闲谈便更加热闹。茶馆营业繁忙，卖茶还带供应出堂开水、纸烟、水烟，利用吊堂炉火的空档代客煎药、煮饭、炖肉。提了茶壶的堂倌，吆喝着穿堂而过，熟练地“表演”续水入碗、点滴不溅的技巧。

茶客们开始赌牌。一般茶馆打两串底的小麻将，偶尔有人团足一场五分一角的赌局，就会传布开去，成为新闻：“××店里今天打银角子哩！”普通是打纸牌，有的“扯招”，有的“打点点红”，或者“挑麻雀”，各有各的玩法。大部分人站在牌客后面当“背光”，出起主意来比当事人还要热心。

十字口这样子的茶馆还有“唐摸王”开的唐家茶馆。本地语瞎子叫“摸人”。摸而成王，可见这个老板的精明厉害。萧清淼开的是萧家茶馆。萧很善于巴结有钱有势的人，所以，大家授他一个绰号“金眼鸽子”。一个二三百户人家的镇子，拥有这么二、三十个茶馆，在四川真是平平常常。

成年的杨朝熙后来用“尹光”的名字写过一篇散文，描写家乡人们喝茶的情景，其中说：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文章写于三十年代，由茶馆这个“窗口”看出故乡社会消蚀生命的封建性质。当然，这不可能是童年的他所能具有的眼光。不过，儿时的朝熙，也已经能够粗粗分辨县城内不同地位的人所上的茶馆是很不相同的了。

南门外的半边茶铺，是轿夫、挑案、游民们的天地。镇里的华泰店是个行业茶馆，天天聚在此地的是专做青山（木材）生意的行商。他们在这里交流行情，会友应酬，拉客成交。

商人们管到这儿来喝茶，叫“上市”。

最讲究的茶馆是大南街益园的，是本地哥老会的“码头”。以后又是安县西南乡自治局所在地。杨家的河清便属于西南乡。益园堂口大，坐场好，一色红油漆的茶桌茶椅，成都的新型式样。这是与朝熙家相熟的詹举人的儿子詹西白开的。詹在省府读过书，拉得一手好胡琴。袍哥茶馆汇集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可以谈公事，喝讲茶，设赌局（赌的输赢就比较大了），也可以进行金银、鸦片、枪支的交易。这是童年朝熙常来的一个地方。

（世界被什么力量分成了各个部分。你从小身处茶馆社会一定早早感到人间的等级森严了吧？我慢慢直觉到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东西在操纵。不过

无论欺侮人的与被欺侮的，都可在各自的茶馆登场表演）茶馆的门口围着各种吃食担子。卖抄手（馄饨）、醪糟蛋、担担面、凉粉，一招呼便殷勤送上。这些小贩往往几代人干这个营生，生于斯，长于斯，彼此十分熟识。朝熙自小看惯的小贩有陈麻子，是个卖糖饼的。他捏的糖人，戏里的人物、城隍庙的鸡脚神、关二爷，都活龙活现。孩子们总是把他的摊子围得满满的。四川每一地的小吃，都冠以某一手艺人的姓氏，成为本地特产，安县也不例外。朝熙小时候最爱吃的是“朱凉粉”，“陈油茶”，“尹汤元”。南街上一片刘家豆花店，小菜、豆腐都做得好。刘家的老大懂点文墨，还会在店堂挂上手画的灯笼。南门外的米粉店更有名，有人为了吃早上头一茬的细粉，往往在城门未开之前，就从门洞里将碗递出去托城外的熟人代买。

一入夜，满城的人仿佛都到十字口和大南街来闲逛。这是小城一天散漫生活的余兴，劳作完后的总休憩。大人小孩随走，随谈，随吃，悠哉游哉。杨朝熙也会央朱奶妈陪他上街，夹杂其中。这时的街道两旁，担子上燃着方形的油灯、蜡烛灯，点点光影照着烧腊摊子上各种卤味。孩子们吵着买一叶鸭翅或一串鸡肫，吃得喷香。大人则进酒铺吃喝，还可站在柜台边从小贩手里买点花生米下酒，俗称“吃木脑壳酒”，便是《红石滩》开头写的刘家烧房门前的吃法。（我一生都嗜吃。爱喝酒，下酒菜最好是黄鳝、鲢鱼。安县有一种无鳞的沙勾鱼，味道奇美。我有个亲戚写文章，把“沙汀”的由来说成是我爱吃沙勾鱼，这当然是错的。但我爱吃这种鱼不假。我后来特别爱吃牛肉。成都的“邓牛肉”很有名气。我在省城读书，曾经把绵竹的酒带一笼去上学，你信不信？——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在沉闷单调的山城生活里，仅有的一点文化娱乐也离不开茶馆。益园晚间的“摆围鼓”（川戏清唱），那高亢的音调使朝熙入迷。后来，他学过“围鼓”，会哼几句黑头，唱的是《夜奔》、《杨文昭》之类。母亲怕他小小年纪把身子唱坏，才叫他放下了。但从此种下他对川戏的终生喜爱。

他还常常溜到半边茶铺那里去听打金钱板、竹琴，听《七侠五义》、《济公传》。在烟馆积垢厚腻的门帘外面，常有行脚和尚背了韦陀像，道士背了灵官像，在唱“善书”。还有讲“圣谕”的，入夜在茶馆搭个台子，又说又唱，都是一本一本的历史传奇。

“讲圣谕”的名称来于帝制时代。那时候说唱的人要在台上挂个牌子，上书“圣谕”两字。讲前先读“圣谕”十六条，挂上一个为皇帝教化下方的名义。实际讲起来异常生动。老婆婆拄个棍棍都要来听，一听就哭。因为讲的都是曲折的故事，人物只有对话、动作，没有多余的描述，一般老百姓都能听懂。这种民间叙述形式是朝熙从童年便谙熟了的。全城能讲“圣谕”的是其貌不扬的李裁缝，生得矮矮的，络腮胡子，鼻梁上架一副黑线做耳绊的老花眼镜。看人的时候，总爱从黑牛骨的镜框上沿投出视线。你想象不出他能发出如此圆润优美的音调，赚得许多心慈面软人的眼泪，也惹得有人笑骂道：“这鬼儿，要是不看模样倒麻人哩！”后来，城里一个当过女校稽查的矮胖油黑的孀妇，也讲“圣谕”。一讲，几个浮浪子弟就在台下说野话。半夜还去敲门请她陪酒。所以，不上三天就收了摊子，留下了一则趣闻。这种娱乐到清王朝崩溃后便渐渐衰微，与现代的说书合流了。

朝熙还时常缠住朱大娘去看戏。全城唱戏主要在离他家不远的灵官楼。这个楼在面向东门城楼的一座山梁上，两层，全部用上好的石条砌成，相当精巧。楼的下层有三间房子，一间住看守的老道士，另两间是做花炮的炮房。

除春节期间供应各色爆竹外，还可以自己拿材料定做各种竹筒大礼花，正月里耍龙灯狮子，好做配套的焰火。是朝熙很向往的一个地方。

本城人认为灵官可以镇邪，庙里香火于是不绝。同时，在灵官楼下面靠近城墙的坝子上搭起台子，终年唱戏。闲散的乡镇总有那么多热心看戏的市民，不是幻影戏，便是最吸引朝熙这些孩子们的木偶戏。木偶戏是福建人引进的文化，被称为“木脑壳戏”。有个姓蒋的班主便叫做“蒋木脑壳”，是个亲切的称呼。

到了每年正月初九的“上九会”，是安县的大节日。寺庙里念皇经，讲“圣谕”，善男信女带上供品进香，吃斋饭，求得菩萨保佑新的一年无病无灾。这是除夕和“大破五”（元宵节）之间最火红的一天，灵官庙的广场上必定有川戏班的大戏在喝。人头攒动中，总有那个闻名全城的妓女，译名“小把戏”的，浓妆艳抹地在看戏，惹得许多观众的视线都盯在她身上。她后来被大粮户陈天藻，外号“小霸王”的独占。这个心狠手辣的袍哥，为了有人还敢跑去与“小把戏”叙旧，便把这女人一枪打死。比起这个妓女来，西门外河滩草棚子里专门应酬苦力、船夫的下等流娼，境遇就更惨了。（你从小就知道男女之事？看得多了，就模模糊糊懂得。我很少写女性，但同情这些女人。没有童年的记忆，《一个秋天晚上》里的流娼，我写来笔端不会带有那么多的感情）

米市坝每年阴历五月初十城隍生日，也演大戏。这是从十字口径北街福音教堂，到达北门内，在城隍庙和黄州馆之间的一块空地。平日为交易粮食的集市，总能见一些老女人手执扫把，把撒落在地的米粒连同沙子一起扫进她们的撮箕里。城隍生日向例演连本的“目莲救母”。最后的高潮是飞叉，在人后面置木板，上下左右被飞来的叉子插满。这是朝熙最爱看，也最怕看的一幕，时常屏住呼吸，连气都不敢大喘。

这个小广场，平时还有外省逃荒的流民组成的杂耍班子献艺。蹬罽子，踩软索，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也有青年妇女，着紧身红褂，扎红头带。场子一打开，班主敲着锣便问：

“小把戏，你们哪里来的？”

“河南来的！”女娃脆声答道。

“河南来做什么？”

“来耍把戏的！”

这时，围观的人中，朝熙拉着朱奶母，看大家往圈子里扔钱，他急切地等待把戏上场。

乡镇的社会生活，差不多都有一种茶馆味，厚重，粗俗。坐茶馆，看野台戏，过节，吃东西，在吵吵闹闹中进行，仿佛是对更多日子的沉闷、呆滞的一个有意补充。但是，最能刺激起小朝熙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却是赶场！这种接近“日中为市”，“以物易物”古风的农村集市，才是更大的热闹，经久的热闹。南门外河坝上逢二、五、八场天，主要是个买卖竹器、木器，木料的地方。到了一年一度的“梓潼会”，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呢。

大约春节后，自绵阳以东的梓潼县开始的这个川北特有的大型流动庙会，汇集省内的生意人、手工业师傅形成“八大帮”，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沿途摆摊，巡回设会，加上本县、邻县为赶会集拢来的饮食摊头、娱乐摊头，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集镇！

朝熙从过年就盼着它。母亲盼“梓潼会”有各种实际的打算，想买一

把老牌的剪刀啦，一件刺绣啦，一段绸布啦。他盼这个场会是它集平时各种场会的新奇、闹热，富有诱惑和五彩斑斓！寄托了全城人等待它开场的各种农村式的幻想，大约在阴历二月中下旬，它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安县境内。南门外的茶馆顿时兴隆，整日坐满。坝子里摊头林立，人流涌动。这里出售农具、布匹、针线、首饰、竹编、玉器、玩具、书籍、药材，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卖膏药的摊上摆个狗熊脑壳，以示他的膏药是用货真价实的熊油熬成。“詹万有同林堂”或“同仁堂”，今年在药摊放了能点头的洋狗、洋婆子，能动弹的鸡公啄米、洋耗子翻翻车这些稀奇的机械玩具，惹得朝熙一看就是半天，眼睛都馋了。有一种竹制的“牌坊架子”，上挂成都卧龙桥木版印刷的各种唱本，五颜六色，十分好玩。加上打铁弹子的，抽“诗条子”的，转刀子的，丢圈圈的，转砂糖胖娃儿的，看相测字卖卜的，每一处都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叫他们留连忘返。任何乡镇集市都有一种离不开的娱乐：摇宝。一个土碗，一颗骰子，赌“红黑宝”或“单双宝”最简单，也最骗人。乡下人眼看黑罩扣下，骰子明明是红的或双的，等你下了注，宝盖子一揭开，却变成了黑的、单的了。“梓潼会”也是罪恶的渊藪，总留下多少人的怨恨和眼泪。一些小偷专门对四乡来的农民下手，人称“八大帮”外的“孽钻帮”，言其害人不浅。稀奇古怪的社会世态，显现在这个大型乡镇庙会上，给北川的荒寒萧索带来虚假的繁华梦。

（赶场，集土生土长的茶馆文化于一身。这种文化在农村经济的稀薄基础上高度发展，使得聪颖而闭塞的川西北人民安土重迁。所以，你后来每一次远离故乡，都会感到一种割断脐带般的痛楚）“梓潼会”一过，生活又恢复单调的平静。母猪依旧拖着臃肿发赤的肚皮从街市经过。狗仍然随处正大光明地交尾，或者四脚长伸地伏在街心打盹。朝熙们躲在街上到处晾晒的细麻布帐子后面，学唱灯影戏，温习着刚刚过去的繁闹。朱奶母照护他，并解答他的各种提问。

他常见有衣衫褴褛的人，头顶一张板凳跪在饭铺门前。朱奶母告诉他，这叫“吃胆大”。穷汉子饿疯了，进馆子诈吃一顿，然后自己拿起坐凳跪下去。假如一天之中，无人施舍，到关铺时便准备挨一顿拳头耳光。城里还有“卖风”的营生，更为别致。就是夏天里常见贫苦青年拿把蒲扇，在馆子里给一些美食家“*风。遇到好心的，给些钱便得一日温饱。如果碰上恶棍，还会遭到一顿臭骂：“不要把老子”*凉倒了，快滚！”

他们也不在乎。民风的强悍、泼辣，由此可见。此地也盛产土匪。“拉肥猪”（绑票）“叫梁子”（仇杀），相当普遍。桑枣的何鼎臣，袍哥出身，后来成为杨朝熙舅父最早的上司，评名何天王，就是远近闻名的一个。他赌钱不许赊欠，输的人不给现钱不能离开牌桌。如当场向他借个五十、一百，从中拿出一部分清帐，他会非常高兴。朝熙听别人讲，何鼎臣一次被官家用“猪屎练子”（大铁索）拴在县府大门示众，大太阳底下，他居然拿本《三国演义》看，神色自若。还有睢水的袍哥向奠高，外号向浑，也叫向饥荒（他天不亮就要起来吃饭），被仇人砍得血肉模糊，手臂吊起，脚也成重伤，却一声不哼，让人用门板抬他到茶馆，请秀水的一个大舵把子景大爷出来，说某人把我砍了，我要在你这里养好伤报仇。他的硬气得到安县哥老界的一致赞扬。向浑的弟弟后来与杨朝熙过从甚密。

这种性格在普通农民中也很常见。西山有一个朝熙家认识的农民吴麻

子，与镇上的梁温如合伙栽种果树。梁有一定文化，修理钟表为生，后来还想搞本县的水力发电，算是一个实业家。他与吴麻子事先讲好，他出树苗，吴出地出力，成林后因分配不均，打了官司。官家一看两人身份不同，把梁断赢了。退堂后，吴找到姓梁的一顿拳打脚踢，被抓入狱中关押。刑满释放，在十字路口堵住梁，二话不说，扭住便打。又被关。放出再打。梁只得找人调解讲和。农民懂得，强硬是他们保存自己的手段，而且强悍之外要有风趣，才能忍受得了繁劳、险恶的山地生活。

所说的“趣人”，实在是本乡特产。像龚老法团这种典型的乡镇人物，不拒绝任何酒宴，在席上还要用一方手巾包裹腊菜，口里说着“让我给孙娃子带点回去”，朝熙是从小熟识的。他的原型叫钟子吉，住在南街，为人和善幽默，从外貌到习性都是天生十足的小说人物。

十字口开酱园的刘久发，这个老头十分得趣：高大，留一部雪白胡子，像一头公牛一样倔强，说话硬得像石头。可他做的酱油、泡菜、豆瓣酱、泥豆腐（腐乳）却是上好的，全县第一，不由你不去买。

唐酥元也是个怪物。一辈子没有结婚，嗓子沙甜，会哼几句戏文。什么人愿意听，只要提出来，他没有不满足你的，高高兴兴就唱上几板。他连姓名都没改动，进入了小说《联保主任的消遣》，成为一个配角。而唐酥元的寡嫂“老腊肉”，更是安县名人录里不可或缺的一位。年轻时风骚漂亮，现在鲜肉成了腊肉，而且搁置久了。这种貌似粗俗的起绰号的习惯，也是民风有趣的一面。

酷爱海椒、胡椒、大蒜、浓茶的乡人，会有倔强、荒诞的喜剧性格，自然可以理解。杨朝熙一直就生活在这样的乡镇人群中，他们的性格也融入他的身内。

（乡情的陶冶，在你，可算得天独厚了。我理解的乡情主要是民情、民风，这比一般地方山水更重要。当然两者大有关系，所谓一方土地养一方人。这个“人”，包含地方文化形成的地方性格）故乡的自然风光要数圣灯山，“安县八景”之一。“圣灯一盏照安州，腊溪桥前水倒流”。山上有明代古刹普照寺和圣灯寺，周围古树参天。民国二年侯国志攻打县城，杨朝熙一家曾在此避难，住在吴麻子家里。

朱大娘多次领他到她乡下去玩，一定程度扩大了他的民间视景。这是永安乡场口上的一座烂草房，屋檐挂满一串串的草鞋，是她的两个女儿打的。去永安要经过金霞洞、白马堰，也是好玩的去处。金霞洞供千手观音，每到观音节，香火也很盛。庙后的石洞幽深，寒气逼人。朝熙曾跟随大人打了火把进去过一次，洞内多奇形怪状的石筍和钟乳石，终因火把准备不足，半途而废。这个洞永远给他一种神秘味。白马堰上的铁索桥，只要一个人走上去，全体便摇晃起来。朝熙喜欢在上面跑来跑去，便是枯水时节，也不愿去走临时搭的小木桥。

还有一处野景对他日后非常重要，叫金厂梁子。实际的地名应叫东山观。是从东门灵官楼延伸出去的一条黄砂丘陵。“安邑采金”，在四川久负盛名，都是山金风化为砂砾石从山上冲刚下来形成的矿床。早在上一世纪，就有农民在城区附近开矿淘金了。金厂梁子便是其中的一处。

朝熙愿意看这里山坡上一个接一个排列的帐棚，宛如搭子的商人站在棚子的桌后，装出一副笑脸。其他的棚子照例是茶馆、吃食店、赌场，一个完整的乡镇小社会。金子大部是露天开采，称为“明窝子”。先是挖砂，然

后是在河边围成一个塘子洗砂。傍晚时分，到了要用尖尖的木质“金盆”淘出砂金的时候，那些出钱采金的老板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紧张地等待他们的财运。朝熙把这一切都装进了他的小脑子里。“金案子”弄得像个鬼样，股东才干干净净。一般是几人合股挖一个洞。当然要有后台支持，否则争夺矿区的扯皮会成为没完没了的官司，直到把你拖垮为止。

在灵官楼与金厂梁子之间，有一座讲究的坟茔，是本城李翰林家的祖坟地。据说那一段金沙含量高，留下了老老年曾挖出金柱之类无从考查的传说。朝熙不会想到，他的幼时玩耍之地，将来会成为一部长篇小说虚构的起点。（这些乡土环境，已化入你的文化性格内。规定了你最初的眼界，一生爱好、习惯的基点，创作的活的源泉，最终成为你文学生命的基本原素）

四川是中国古代三大产金地之一。安县淘洗麸金也有千年的历史。盐井、蜀锦、栈道、索桥、采金，悠久的蜀文化熏陶了小小的杨朝熙。闭锁的故乡文化图景一旦有了现代思想、生活的参照与穿透，便会全盘激活的！

舅父的袍哥社会

朝熙的舅父郑慕周便是由川西北特殊环境造就的传奇性人物。

（母亲之外，舅父应算是你最近的亲人了吧？不错。说他向我展露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一点不过份。不过我和他的关系时间很长，有各种变化，你不要写简单了。叫我说他与他的世界是丑还是美，我会一下子绊住舌头。丑即美的感觉，是不是他的世界赋予我的？）

舅父学名世斌，慕周是他“反正”以后，县里的文人赠他的名号。

他长得高大，喜活动，从小爱打抱不平，有豪侠气质。人是很精干的。十六、七岁时不能忍受后母的苛刻管束，离家在社会上游荡。他本是败落的世家子弟，因父亲早逝辍学，身无一技之长，只剩下一股强烈的求生意志。流落市井后，最初当过卖吃食的小贩。白天顶一簸箕熬来的油糖饅子或油饼，沿街叫卖。夜里就在吃食店的灶边缩着身子混一宿，俗称“烤大火”。后来靠着唯一的姐姐周济，帮人放船、放木筏，兼做点小生意。就在他沉入社会底层的时候，加入了本县的袍哥帮会。

四川的袍哥源远流长。它本是清代民间的秘密结社，属“天地会”的一支。最初以“灭清复明”为宗旨。据说始于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金台山会盟。于是，首次的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名远堂”。入盟者悉照水泊梁山英雄互称兄弟，会堂首领称老大哥，遂名“哥老会”，又叫“洪帮”“汉留”。相传清道光年间四川永宁（叙永）人郭永泰开“荃忠山”，会盟者四千人，不久兄弟伙遍及全省。安县各乡镇就在那时始建立“堂口”，先后发展到十八个之多，鼎盛时期拥有三万余人。

辛亥前，安县袍哥的主要成员是城镇无业游民、摊贩、手工业工人。因为当时官绅勾结，连一个家奴小子都敢估吃霸欺，欺压百姓。百姓参加袍哥，是为了保护自己。也偶有破落子弟，或急公好义的小粮户侧身其间。朝熙从小熟悉的舅父好友萧维斌、范绍才、刘德胜，都是小商贩出身。与郑慕

周关系最深，后来结为儿女亲家的谢象仪（森隆），还在金厂梁子上用尖底背篋背过矿砂，当过所谓的“沙班”、“金案子”。他们在朝熙心目中都是“绿林英雄”，是专与官府作对的好汉。他还不了解“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的区别，对于他们偶尔采取的“浑水”袍哥的行动，贩烟，路劫（极少嫖、赌），都认作是面对为富不仁者的，没有什么不应该。达到的也是“清水”袍哥的目的：重仁取义，济困扶危。

袍哥的光棍精神，在故乡的社会舆论中一律涂上神奇色彩，使朝熙十分向往。睢水的向浑有一年去成都赶花会，在东大街青石桥路口“马裕隆”店里买东西。他穿着随便一点，看中了一套景德镇细瓷餐具，便伸手去摸。店员看他不起，问：“你想买呀？”语调带了轻蔑。他一听，沉着气问明价钱，叫兄弟伙付完款，当场把碗盏哗一声掷地摔碎，然后扬长而去。这个故事被添油加醋，流传久远。

哥老会的被压迫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保路运动中，能与同志会形成同志军共同举义。袍哥乘势发展。无路可走的农民大量拥入，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过去瞧不起袍哥的士绅，也纷纷参加。照安县城里说法，当了袍哥就算“掐了眼睛”，变成人了。绅士的加入，不必像郑慕周、谢象仪那样，从老么十排做起，不必按劳绩一级一级提到九排、七排、副六（六排）、管事（五排）、三爷（三排）、二爷、大爷。他们只需捐钱便可成为辈份最高的“一步登天的大爷”。这样，哥老的实权落在了绅士手里。这些人一变又当上团总、乡长之类角色。安县许多乡镇头面人物往往是“土匪”型的，而拥有武装力量的袍哥头目多被“招安”成军。

这种心理也许外省人不很了解。但仔细想想吧，我们省有半打以上的师旅长是招安出身的，而在县城里也就有着不少出色榜样。那个出名的胡子团长不必说了，十三年前，大头统领还在镇上饭店里当过堂倌哩！此外，还有不少干脆卖了田产买枪成军的绅士，简直把这看成科举一样。

这就使得四川形成了官府、乡绅、军阀、袍哥四位一体，互相联结又互相争斗的局面。

哥老会可以是执政的势力，也可以是在野的势力，无论是哪一种，它已变了质。

经由舅父，朝熙自幼年起便熟悉袍哥的内幕。安县有名的袍哥大爷，最早桑枣大同公民社的舵把子何鼎臣，永安乡永益公社的航把子陈红茗（绍），是川西有名的人物，都与郑慕周发生关系，并伸入到杨朝熙生活里来。安县城区的龙头李丰庭，大家族出身，有声望，郑慕周与谢象仪正是他的属下。杨朝熙的第一个妻子就是李丰庭的女儿。

（论起来，你这个共产党人是从袍哥世家里分裂出来的？“世家”谈不上，有渊源吧。

历史的蜕变是奇妙无情的。我的舅父、岳父都是本县的大袍哥不假。所以我后来与李劫人这个“四川通”谈起哥老的规矩、饥口，他也吃一惊，不能不让我三分）

朝熙跟着舅父从小上茶馆、串门，拜年、会客，对于大大小小的粮户、豪绅、军官、兵痞、流氓、普通光棍，都极为稔熟。实际上直到四十年代在安县刘家沟，他才真正了解到农民，而他小时所接触的亲朋，都是些乡镇的头面人物。他们是依靠农民为生的，有的甚至出身农民，但比农民聪明、狡猾，善于应付生活，有更多的社会关系。他们是最先从土地劳作中脱离出来

的“人尖子”。舅父给他带来的整整一个袍哥世界，多半便是这种人物。

袍哥世界为他展开了四川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人际关系的网络，展开一个十足的强力社会。而郑慕周本人便是其中一个没有沦为十恶不赦魔王的代表。这也算是一个奇迹。郑慕周在生活的搏斗中日益磨练得胆大心细，有决断，乐于助人，很快得到袍哥界的器重。按照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郑慕周不自主地要靠枪杆子打出来。郑先是依仗姐姐，后来便给予报答。

朝熙的哥哥杨印如似乎一生便在舅父荫庇下过活。他靠舅父任职，从部队到学校，收税理财，搞了钱只会消耗。娶了三次亲，两个女人都死了。他坐吃山空，弄到卖田地、家具、房子的地步，一辈子也没离开过安县。后来双目失明，1961年带着牢骚病故。

舅父对第二个外甥的生活道路，起初也实施了这种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朝熙与哥哥毕竟不同，他没有跟着舅父走下去，到反而最终影响了能干的舅父看清社会大势，成为一个开明绅士。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现在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满清王朝的气数已尽，中国千年的封建社会已经像一个烂熟的桃子。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都将要在这个摧垮帝制的舞台上一试身手，包括郑慕周。在幼年的朝熙身边，正酝酿着一场大的社会变动。

他出生后四年，慈禧、光绪“驾崩”了。1909年，清政府允许各省设谘议局。1910年谘议局代表汇集北京请将立宪预备期九年加以缩短。1911年6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天下未乱蜀先乱”，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发生武昌起义。而在安县，袍哥界的何鼎臣等卷入了辛亥革命，郑慕周发迹的时刻也即将到来，这一切对杨朝熙的少年生活，将投下巨大的光影。

许多作家称社会是“我的大学”。我看你从读私塾起，就在翻乡镇社会这本大书了。

结束基础教育我太晚，进入社会我太早，我是个没有纯真少年时代的早熟儿。

读不完的家塾

杨朝熙七岁发蒙读私塾。正逢辛亥之变，时读时辍，这种“土”的教育一直维持到他的青年时代。

（像你这样年纪的人，会在家塾混了整整十年，在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群里，大概很难找到第二个）

这个时候，安县不是没有新学。1901年清政府迫于大势，下诏废科举，兴学堂。当时的安县知事余慎便奉命集资开办了县高等小学堂。地址在北门外，即今安县中学的前身。

朝熙出生那年，县里又设了培英女子小学堂。但是川西北私塾的势力始终足以与“洋”学堂相抗衡。直到1950年秋天，在安县的南丰、桑枣、清泉、花菱等乡仍有私塾存在，其生命力和那个报时的钟一样古老、长久。

母亲既然一心要让杨氏兄弟续书香门第的香火，在她看来，读私塾才是“正途”，便不顾家庭财力已经不继，也学本地士绅、富商延聘塾师到家教书的通例，设了家塾。这比鲁迅幼年到三味书屋读“散馆”（塾师在自己家或租屋设馆），要“阔气”一些了。家塾先是为哥哥设的。塾师姓王，乐兴乡人，年近花甲，无功名，但很诚朴。家里担负他的膳宿和“修金”，也有本家和外族子弟前来附馆随读的。这位王先生懂得外科医术，教书之余也义务为人治病。朝熙这时没有上学，他经常站在塾房外面，听里面传来嗡嗡的读书声，瞅个缝隙好把大孩子引出来玩耍，或者扔个石子进去跟塾师捣乱。

1911年春季的一日，家里请来孙永宜先生为杨朝熙发蒙。这天母亲领着穿了新衣的他来到馆房，屋子里焚燃着香烛，显得烟气迷镑。按照大人的指点胡乱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向老师行跪拜礼。孙先生收下母亲红封的“贽敬”，把朝熙带着的《三字经》翻到后页，把最后的八句“幼儿学，壮子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用朱笔圈出，教他读了三遍。然后让他入座，把着他的手，填写了“幼学壮行”四个红模大字。读书生活便这样开始了。

（给我发蒙的是孙永宜老师。他在县里的小学教书，带便教哥哥与我。他是桑枣人，后因家里人手不够，回家教书，受到学历高的或社会关系多的教师的排挤，一气之下，改行种了庄稼。我曾经在街上看到他在卖菜。他的志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的所作所为已不像一般的读书人。——沙汀1986年11月21日讲）

孙永宜给他最早上人世不平的一课之后，母亲又聘了蒋品珊先生来坐馆。这时候，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蒋教的时间较长，他也是桑枣人，前清秀才，字写得很好。学生在下边读书，他便一人正襟危坐地在那里写字，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那么大。一天下来要在草纸上写许多的核桃字。蒋先生算得是一位书法家，安县公园原先有个“天星楼”，三个大字的匾就是他写的。朝熙后来喜爱练字，与他的启发也有关。

一次，朝熙把识字的课本用“烂”了，恰好少了几行注释。蒋先生本想找人替他补上，他突然提出要自己动手试试。这很出老师的意外。因为私塾最初的功课是读杂书（与经书相对而言，如《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增广》）及习字，在塾的时间早、午、晚共计八小时以上，是很苦的。朝熙得到母亲的娇惯——偏偏精明强干的人往往对幼子格外慈软——经常逃学，或者缠住母亲去朝山进香，读的是“耍耍书”。老师也没有办法。

现在听了朝熙的话，不大相信，便说：“你能补吗？好，如你能补上，我准放你半天假！”这书的破损程度，如果是别人来补，两三个小时也就完了。他当天没有补完。一个贪玩孩子身上蕴藏的独立的个性，不认输的意志，这时充分显露，他居然耐心地补下来，次日又补了一上午才完毕。蒋先生看他在桌面上整整趴了一天多，着实夸奖了一番，果然放了他半天假。

蒋先生之后，家里又团了一堂私塾，聘来的老师是本城的于瑞五。较年轻些，也是秀才，名士派头，很洒脱。于先生住在小北街冯官府小院（后来是国民党县党部），这个地方对童年的他充满了神奇。因为那里住了一位被人呼为“冯官府”的刽子手，北方汉子，鼓鼓眼，块头极大，站着像座铁塔，透着森森寒气。据说每逢他那把马刀半夜在刀鞘里发出响动，上下地跳，不出两天，准会有人犯人头落地。而且他砍头的本事十分高强，只要人犯的家属送他一笔“背手”（又叫“袖里财”，指暗地赠送），人头便不会与躯干

全部分离，能落个“全尸”。但是同样住在冯官府于瑞五却一点不使人害怕。他性情开朗，不像以前的先生那样严谨。兴致来了的时候，会放下正在教读的书，给学生们讲起《聊斋》里的狐鬼故事。这是朝熙第一次知道这本古典文学名著。于先生还选了《幼学琼林》来教。这本书用骈文写成，却夹杂了许多历史典故。老师一讲起这些典故，学生们就听迷了，老老实实坐着不动。这位老师去世很早。

（但他是你最早的文学启蒙人之一！《聊斋》自然有传奇性，笔记体小说讲究文字简约。对于女性，你学会尊重，可没学会描写她们）

与朝熙同塾读书的伙伴主要是谢氏兄弟与刘氏兄弟。谢家与郑慕周通好，谢的两个儿子谢荣华、谢荣贵与朝熙共读的时间最长。谢荣贵后来在投考“黄埔”的路上病死，谢荣华与他有更长久的交往。刘氏是在城里开“青云堂”药铺的，刘佑炳、刘佑昭两兄弟里，后来佑昭进了“黄埔”。这充满草药的异香味和排列着一格一格药柜的“青云堂”，是朝熙少年时很感神秘的地方。

到1915年为止，朝熙的家塾生活的前期，便平静度过。他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只是故乡的儿子。家乡的山水、民情和辛亥后在他舅父周围迅速形成的袍哥社会，比读书更深地吸引了他，更能满尽他的好奇心和乐于观察人事的天性。他是异常早地体验到世俗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无疑造成他特殊的知识结构与文化性格。1917年春发生的郑慕周刺杀陈红萼的事件，大大改变了他的家庭，使小小的杨朝熙如此深入地卷进故乡近代演进的历史漩涡中去。

念书的哥儿爱“跑滩”

辛亥革命造成四川哥老会的“中兴”。在安县，最早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就是袍哥何鼎臣。此人当时正年轻剽悍，以赌博为业，讲豪侠义气，爱接济穷文人。他曾送二十两银子给举人蒋雨霖，这钱一部分是赌博赢胡某的。胡某弄了一批打手向何寻衅讨钱，何因而去秀水投靠了袍哥大爷向浑，与秀水烧箕滩的土匪合了伙。一次胡某带十几人到秀水去看夜戏，被何及其兄弟伙强拉出场，用乱刀砍死。自此，何的名声大振。

辛亥年间，他带过一百多人开进县城游行，然后去绵阳，与别的民军会师，赴成都攻打赵尔丰的将军衙门。武昌起事，何已转了一大圈回县，名气更大。在城里“开山”，成立“公口”，成为全县哥老会的头目。在川西一带人称“何天王”。他的队伍主要是由农民与邻场镇的哥老们组成，配备梭标、叉刀、明火枪和火药枪。“光复”后，知道应舍弃满装，改革服饰，又不知如何改法。朝熙小时在街上看到这支身着“勇”字号褂，打起“靠腿”的奇怪队伍，象唱戏的一样，总觉得好玩。

袍哥、兵、匪会成一体，形成军队割据，进而发展为1919年以后四川的防区制。一切由枪杆子说了算，是一个“原始”的实力社会。何鼎臣以后追随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成为二十团团团长，驻防三台、什邡一带。郑

慕周成军后投奔的便是何鼎臣。

时代大潮冲刷一切，即便荒僻如安县，知识界里接受近代知识的人也多起来。城里的李复之、张著成、文练三，或毕业于官班法政学校，或出洋留过学，都是新派。辛亥年，李复之从成都剪发回县，十分轰动。他在十字口吃茶，围起很多人看，朝熙也混在其中。他的头发剪得最好，是当时少见的偏分头，即“拿破仑式”。这班人就在县里提倡男子剪发，女子放脚。市民中有的剪了，有的将辫子盘到头顶扎成髻，戴个道士帽子。农民多半不愿剪发。

于是逢赶场天，声门就站起团丁、警察，手操成衣匠用的大剪刀，抓住一个拖辫子农民咔嚓便剪。剪下的辫子要用箩筐来装。

那时男人的装束用黑绫子、黑纱帕包头，说是给崇祯帝戴孝。一个叫“萧大汉儿”的巡防军士兵，打赵尔丰时趁火打劫，弄了些钱财，带了一支五子快枪回安县。路上，枪就被袍哥大爷们打起“吃”了。他的打扮就象川戏里的武松，鬓边拖起水发，背口宝剑，成天在茶馆里吹嘘在成都的见闻，朝熙也是他的热心听众。半年光景，被赌棍耍手脚把他“烫了毛子”，银子搞光，只好提个篮子在街上卖凉拌猪头肉了。

文人在辛亥以后加入袍哥一时成为风气，入伙时往往穿员外或小生的戏装，认为是恢复汉制。这种读书人，通过郑慕周与杨家沾亲带故，对朝熙关照的人也不少。张著成住在朝熙家对门，留日学理工，相信学校不相信科举，这在当时的思想还算是比较新的。张的家境虽已衰败，靠着在李翰林家的票号“蔚生桓”当管帐先生的丈人的帮助，自己在高等小学堂代点课，收入不多，也混得过去。张喜欢川戏，爱摆围鼓，他常在夜间去茶馆凑一台。他唱胡子生，当鼓师。朝熙喜川剧即受他的影响，常借他的戏本看，学黑头也在这个时候。张也喜欢写字，朝熙因祖父是个书法家，一接触书法便天然动心，最先学黄庭坚（黄山谷）字，便是跟他借《松风阁》临帖。张告诉朝熙要学悬腕字，必须在沙盘上苦练。于是朝熙央母亲求人制了沙盘，找铁匠打了杆铁笔，十五岁时，清早一起来便在沙盘上写二、三十个悬笔字。

他的完全不用功的年代已经结束。

这时候，四川社会动荡不定。袁世凯当总统，安县除了大剪辫子，便是南门外桥头上吊起几个盛头颅的木笼子。据说都是伏法的“土匪”人头。延续到民国三年、四年（1914——1915），安县知事林崇道（靖），性嗜杀人，仍然大挂木笼，老百姓背地叫他“林贼娃子”。当时枪案多如牛毛，大都是“浑水袍哥”所为。但因袍哥与当地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捕遭大辟的多半是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二十几年后，他在故乡翻过县里的档案，看后大惊。因为有些人仅仅是为了一床烂棉絮，或一口破锅，就丢了性命。档案里没有记载有一个真正杀人越货的土匪头子被捕杀的。

（四川山民铤而走险的强悍，恰与军阀、官吏的肆无忌惮成正比）

但是，真正的土匪骚扰，在川西北日甚一日。民国二年（1913）阴历二月，绵竹有名的袍哥侯国志带领一千多人的队伍，明火执仗地来攻打安县。这一千人有土匪、游民，也有顺势而来的农民。攻城是在清晨。这天有雾，侯命人把晒席裹成筒子，涂黑挂红，伪装成大炮吓人。其实最好的武器只有火药枪。其时，驻安县的是冯玉祥军的一连人马，南门守兵急忙关上刚开的城门，去报告连长。连长开始不理睬，后见攻城甚急，才命令回击。一边是北洋军，人少枪新，训练有素；一边是人多势众，喊声震天的土队伍。

两边相持不下。

全城人此时大都没有起床。朝熙跟着大人被枪声召到街上去观望，他只觉得新奇。郑慕周怕侯国志队伍进城会乱抢乱杀，这天的深夜从西门城上用绳子套着箩筐，把朝熙母子一一缙下去，过河到西山卖柴的吴麻子家避难。这个晚上，他们在连绵的山峦，密密的草丛树林间，屏住气不断地爬坡绕行，朝熙一点也不觉得恐怖，只感到黑夜美丽，冒险有趣。

侯国志围城打到第三天，正在东门外灵官楼上指挥，突然叫北洋军一枪把手打伤，这样才撤了兵，解了围。一城人都说，这是灵官菩萨显了灵。朝熙全家也托了菩萨的福，从西山回城，结束了这次的逃难生活。

（你喜欢上“跑滩”，大约便是这时候吧？）

郑慕周这时早已同谢象仪结为好友。1912年郑、谢均已二十五岁左右，拜了安县的袍哥龙头李丰庭为大爷。郑、谢当时还很穷，两人常共用一套好衣服，会客时互相换着穿。

到了1914年春节，李丰庭见郑、谢两人敢作敢为，办事有板眼，将他们一块提升到“三排”，称三爷。郑慕周为“执法管师”。从此在袍界有了一点地位。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谢象仪得郑的协助，拦路劫了一个烟贩子的四十多两烟土。这件事被一个经常与袍哥滋事的差役头子王福发现，便来用话威胁。两人不得已，送了五两大烟希图抹平。过了两天，王福又来讹诈，郑慕周正待发作，忍住了，又送给他烟。可是，王福的胃口太大了，他的贪婪没有尽头。腊月二十三日的晚上，月黑风高，谢郑两人下了决心，持牛耳子刀，翻墙入王福家，将王用棕绳捆住，拖到南门外乌云山下桐子林，绑在树上，一阵乱刀戳下。满以为王已死去，便逃离了。实际上，王仅仅受了伤，官府于是发令捕捉，谢、郑两人分头躲藏。

朝熙记得快要过年的时候，一天，由朱奶妈的大女婿，当警察的陈炳正，利用守夜的机会，打起风雨灯，半夜把谢象仪引到家里来避难。谢在堂屋后一个搁菜罈、酒罈等杂物的屋子里躲了一个多月。他常去缠住这位叔叔摆龙门阵，听他讲生活趣闻。这可比读书有趣。母亲少有那么严厉地警告他，一定不能向塾中同学透露此事。一直到春节过后谢叔叔潜走前，每当他与小朋友在一起，想到自己心里能保住一个秘密，便感到自豪，仿佛参与了一件重大事件似的。两个月后，是李丰庭出面把事情捡顺，才算了结了这个案子。（你当时知道他们为什么避难吗？我懂得他们躲的是官府。袍哥与官厅的全部复杂关系不是一个小孩子所能理解，我只是把同情放在“跑滩”的舅父和谢叔叔的一边）

但是，李丰庭与陈红苕的冲突渐渐加剧了。永安乡的陈红苕，原名陈瑞明，干瘦矮小，因为吃鸦片，脸皮黄中带灰。1914年，陈收编了两连“垦殖军”，大大扩展了势力，便自封为五县联防司令，成为一股更大的土匪。冯玉祥曾回忆他到安县进剿陈红苕的事。他将陈红苕写成陈宏韶：1916年上半年，接令沿剑阁、昭化一条路，由陕南开赴川北，名为一旅，实际只开发一混成团。绵阳一年一度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入城求售的百姓挑黄、白两种茧子，连成四五里长，十分壮观。人民对封粮的踊跃，见所未见。与保定府敲锣催粮恰相反。人民淳朴使我流泪。被养的官、兵应知愧。

安县匪首陈宏韶，陈焕将军据报，命我进剿。我组一混成营。抵安县

境，匪已窜入山。

参谋本部地图极粗略，不正确，在安县找不到，后去圣公会英人安牧师处借，迟疑后借出，精确得使人吃惊！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心！我们的参谋部、省陆军测量局，敷衍鬼混！土匪散后，8月，四川划五太清乡区，我负责川北一区二十余县。何鼎臣（匪、赌），四五十岁，满脸刀疤，豪爽斯文，富有出身，被绑架弄光家产，愤而入伙自存。他报告民、匪情，向导道路，特别是到松潘找骡驮，搬运子弹，共五百匹，与全旅官兵相处得好。这是一段很珍贵的资料。不但讲了被打散，而实力仍存的陈红苕，也生动地刻画了何鼎臣其人。陈红苕骑着高头大马回到县城，仍然耀武扬威，更不把李丰庭看在眼里。一次陈在城里请客，李到席，按例应坐上位，但陈突然自己去坐了，并说：“你给我看酒，你老弟好生跟我操。”李脸上有几颗麻子，陈红苕几次当众在街上辱骂：“哪天老子把他的麻子炒起来下酒吃！”李武力敌不过陈，自觉颜面扫地，便闭门不出。郑慕周、谢象仪知道了，很气愤。郑问李：“你哥子敢不敢撑事？”李初一愣，反问道：“你说啥子？”后醒悟，断然点了点头。事情便在李家商议起来。李拍着郑、谢两人的肩膀，笑说：“你两个老弟愿意出力，等事情办成，我拿二十五亩地给老弟‘跑滩’！”“跑滩”，在袍哥黑话里指为了躲灾而浪迹江湖。

1917年旧历正月十三日清晨，陈红苕带着八个卫兵骑马来城关。郑慕周早几日已经从陈的粮房听差黎少农处得到情报，与谢象仪、自己的侄子郑志宽，贴心兄弟伙刘德胜、杨茂宣等人做了安排。

东门灵官楼方向传来一阵阵锣鼓声，初九以后的灵官会，天天在演大戏。陈一入城，便在南街被郑、谢迎入西南局（西南乡同乡会）所在的益园抽烟。郑慕周一向与陈的私交尚好，所以，陈毫不介意，直进里面一间客厅躺下。

这时，卫兵们已被准许去看戏。陈身边只有他一个长辈叫陈么长子的陪着，又上厕所去了。郑一看时机已到，便对正在烧烟的陈红苕说：“陈哥，我买了一支英国造，你给看看。”陈睁眼用右手正要接枪，郑扳动枪机突发三枪，陈只大喊了一声“你要造死了！”陈么长子听见枪响，急忙从厕所钻出，被谢象仪一枪打倒在门边。众人夺门而走，郑志宽在门外向天打枪，一边喊：“我们打死了陈红苕，对手是郑三哥、谢三哥，和老百姓无关，不要吓怕！”刘毒手（德胜）双枪开道，直扑南门。

（关于你舅父打杀陈红苕，在安县可有各种“版本”的故事流传呢。家乡人就是这个脾气，一切经过口头制作的故事都被加上各种想象，成为传奇。你只要不写成陈红苕是别人打死的就成了）

这时，作过典吏，又操袍哥的林伯琴，最先听到了这场血案，赶往灵官楼唱戏的平坝。

川戏《欢娱楼》正演到绑了奸臣魏忠贤的三个儿子，林跑上台去高喊“出事了”，场上大乱。林又去找朝熙母子。林是朝熙母亲的表叔，他喊他表爷爷。表爷爷气喘吁吁找到他们，悄声说：“你们郑慕周把陈红苕打死了！”母亲只怕两个孩子受连累，连忙把两兄弟送到“青云堂”药铺刘家躲起。

李丰庭一家预先已经转移到千家沟，等郑、谢一行经南塔梁子到达李的驻地后，李给两人挂红，然后一道去乐兴袍哥大爷高海楼处避祸。等到陈红苕的拜把兄弟、参谋兼便衣队长刘世荣带领一、二百人马进城，陈早已断气。刘洗劫并火烧李丰庭的家，到处寻衅复仇。母亲怕这种仇杀株连扩大，

便到“青云堂”带上两个孩子，头上包一笼帕子，挎个提篮放些糖果，装成一般老百姓，混过刘的岗哨，到南塔梁子后面林伯琴家藏身。林为人仗义，平时与陈红苕无任何私怨，他把怕受牵连的李丰庭家的同宗，也都藏在家里，白天照常上街与那批复仇者周旋。

一个多星期后，郑慕周拖起一、二十人到罗兴场住了一阵子，又托秀水的大爷向浑写信向何鼎臣救援。何与陈过去不和。何从绵阳开来队伍，又从西南乡秀水、桑枣等场上招来袍哥，共一千多人攻入县城，赶跑了刘世荣。

那天，何天王亲自在南河“滚钱坡”附近的一座油坊里指挥攻打。这里离林伯琴家很近，杨朝熙特意跑去观看。何鼎臣长得魁伟异常，只是已入老境，风采不如青年时代了。何得胜后，朝熙一家就又搬回城里。这次事件使得他的书更读不下去了。母亲担忧对方复仇，对于他跟着郑慕周也就不加阻挡。他开始了到处跑码头的近两年的“跑滩”生活。所谓“跑滩”，主要是跟着舅父在桑枣、秀水、何家沟一带游荡。有的时候，一天挪一个宿处。回城住些日子便又溜到乡下。很多次，城里一有动静，母亲半夜叫他摸出城去传递消息，好让舅舅紧急转移。不久，张凤梧旅长带兵进驻安县。张的侄子张绍武，借住在朝熙家，进出乘红豆木杆杆的轿子，生活比一个副官阔绰。原来他暗地在做军火生意。有一天，张妻主动问母亲，有没有人要买枪支的？郑慕周既要防刘世荣一伙报仇，防官府的追捕，也要防被驻军吃掉，几十人的队伍正急需枪支配备，便通过张绍武的妻子，出高价买过好几次武器。这送枪给舅父的任务，便落到少年杨朝熙身上。

总是母亲给他准备好个篾篋，把手枪放在最底下，蒙上帕子，上放挂面、猪肉、糖，象是一宗礼物。只要大着胆子骗过城门的卫兵，就能平安送到乡下舅舅手里。朝熙从小与他哥哥不同，他胖胖的（“我只有小孩时胖过，成人后就变节排骨了”），见生人脸不红，说话从容，调皮，敢闯，非常喜欢经历这种冒险生活。他给舅父送枪支、送消息。那时舅父住在下河坝那边，挨近何家沟，一个很背静的院子里。有时遇到郑已不在，去了石梯子、萧家堰等地，他也就跟着去找。

张绍武与郑的枪支生意越做越熟。张看他舅父精明能干，将女儿拜寄给他认做干爸，并送给郑一匹坐骑。有了枪，有了马，郑的情况便不那么紧张了。当时朝熙便敢学骑，很快能骑着马到乡下送东西。所以，后来他在解放区行军骑马，比何其芳骑得好，就是因为从小训练的。这种生活一次就是十天、半个月，他出没于安县四周各个乡镇之间，坐茶馆，看杀人，旁观舅父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了解一个地区特殊的社会形态，地方封建性割据的黑暗，社会上人与人搏斗的情景。他不知不觉成人一样进入社会生活，虽然不能全部懂得，想不到这会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准备。他人小胆大（当了文人后胆小起来），连绵竹、什邡各处有名的袍哥头目都知道。

他们见到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叫他“杨二”。（你由分家看到家业衰败，由母亲和舅父，看到“中兴”。这“中兴”愈不靠辛勤劳动，而是靠传奇般的闯荡，靠掌握实力。权势社会的变动内幕及其种种病态，很早就坦露在你面前）1918年，郑慕周招募了“垦殖军”残兵一百多人，便想正规地成军。他派黎少农去金堂拜见吕超，吕超委郑做预备营长。

郑让位给谢象仪，自己做了连长，属何鼎臣十八团部下，驻中江县。从此，“杨二”结束了跟随舅父流动的生活。

操袍哥？从军？

杨朝熙回到家里继续读书，情况却同过去有了变化。母亲振兴家业的理想，一部分已经在自己弟弟身上实现。随着舅父军阶的逐步升迁，他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显著好转。在这之前，他经历了母亲那场哭诉，说她如何苦，拖起他们读书不容易，而他们只会顽皮、睡懒觉。他原来从不惧怕母亲，这时突然感到一阵酸楚，羞惭之心油然而生。这也是因为他已到了稍稍更事的年龄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从朦胧到开始懂得考虑自身、审视自己的时刻，只是结局不同罢了。十五岁以后，他一天比一天地认真生活起来。

如果不是舅父的思想改变，杨朝熙这些袍哥子弟的第一个前途本应就是操袍哥。但是川西北的军阀们，尽管自己一个个是袍哥、土匪出身，偏偏特别地看重读书人。在他们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崇拜读书，“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作怪。这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反射。郑慕周有了队伍，马上表示不准他的弟男子侄加入袍哥。连朋友的子弟也劝阻。他与吕超的侄儿拜把，吕某也是连长，这个人读过书，对郑的影响很大。他后来帮助青年人出外求学，举办各种文化事业，都很舍得花钱。

1919年，何鼎臣病故，谢象仪升任十八团团长，郑慕周为第三营营长，驻茂县。舅父要求朝熙好好读书。他特意从中江县聘来贡生出身的有学问的游春舫老师来主持家塾。游的修金很贵，一年需一百银元，还要供给全部的食宿。他的脾气大，架子大，教书很严，朝熙吃了他不少戒尺，母亲也帮不上忙。但教了一年便走了。

接着，母亲请谢建卿先生来教他们两兄弟。谢是朝熙二婶母的兄弟，论起来应当叫舅舅，是个秀才。他在城关一个“师范讲习班”教国文，他们兄弟俩白天去讲习班所在的南门自治局寄读，晚上回家再读。谢教《古文观止》，也开始命题作文，但主要的还是背诵古文。他的国文基础主要是在这两个老师手里打下的。

（在我十六、七岁时，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进茶馆跟袍哥大爷混，读书相当用功了。

天明即起，晚上读到深夜。读《古文观止》、《饮冰室文集》。愈开始与本县高小学生或在成都、中坝（江油）上学的中学生接触。哥哥这时结了婚。——沙汀1986年11月25日讲）

十七岁那年，安县城关一批知识分子，这之中有小学教员，做文牒工作的，小学毕业后经商的，约二、三十人，成立了一个“会文社”。发起人是李心泉。大家合伙开了个文具店，朝熙跟哥哥都入了股。本来相邀每年春节时聚餐，但只举行了一次便散了。这是他最初的社会活动。

除了谢、刘两家的学友子弟外，其他塾外的朋友与他过从较密的是陈克玺（宝章）、杨承祺（寇斌）。这两人加上谢荣华（兆华），曾按照当时的社会习惯，与朝熙换了帖，结拜为兄弟。

陈、杨两位读书好，有学问，也能写字。他是因为学字才认识他们的。曾有一个时候，他受本县前清知县武生辉和蒋品珊老师的影响，一心学习黄

庭坚字，到处求教。他认识陈、杨以后，才知道读《史记》。就象他在青云堂避难时才读到《三国演义》一样。他与他们常在一起互阅课卷，谈古论今，收益不小。这两人又都立志要去从军，也怂恿他。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是上层子弟的一条主要出路。所以，杨朝熙也渴求能进军校。他做梦也没想将来要从文，当一个作家。倒是杨、陈两人都达到了目的，后来都成为军人。杨在邓锡侯部下做过团长、副旅长，解放时起义，后中风逝世。陈抗战时驻防广州，在日机轰炸时牺牲了。

1921年，在四川各军阀的混战、倾轧中，吕超和他的上司熊克武都被排挤出川。吕超是老同盟会会员，他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去了。谢象仪、郑慕周派黎少农做联络官去成都刘成勋（禹九）处请委，被收编为九军第八混成旅，任命谢象仪为旅长。谢当初是郑慕周让贤给他作营长、团长的，他最了解郑慕周，知道自己的才具远不及郑，这时便一定要把旅长的位置让出来。刘成勋加封郑慕周为少将旅长，改委谢象仪为汉军统领，管辖松、理、懋等川北少数民族地区。后因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变不善，解职回到郑的身边。郑慕周兼了这个汉军统领，他的防区扩大到七、八个县，防区内连县长都要由他保荐，加上征粮、征税，权力是很大的。他一直驻军在灌县。

就是那一年，郑慕周写信给朝熙，要他终止家塾的学习，与谢荣华一道去灌县商量进一步外出读书的事宜。朝熙这年十七岁，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的第三年，足未出过安县，他被封闭在故乡社会的小圈子内，视野甚至还没有郑慕周那样宽阔。他到了都江堰之边，着长衫，头戴博士帽，身条瘦瘦的。渐渐长成青年的杨朝熙，越显出一副文弱的样子。他原来一心一意想进刘成勋办的军校，但被舅父阻止了。郑慕周仿佛看准了少时活动型的外甥，并不适于跟着自己的脚步走。不许他操袍哥，又不准他参军。他给朝熙安排的出路是去成都考学校！

当杨朝熙步入青年时代正要开始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他的前程仿佛完全操纵在别人手里。这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如果舅父不替他“专断”一下，我们或许将永远见不到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诞生。一个全副戎装的杨朝熙将是一个怎样的军官，是现在很难想象的了。

在灌县，一个小姑娘轻盈地向他走拢来。她是黄玉颀。（这样写，我不赞成。我注意到她、喜欢她的时候比这晚得多。当然你有你说明的权利，我也有我分析的自由。我这里写的是你们最早的见面，你已经对她留有印象，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黄玉颀的母亲黄敬之其时在灌县女子学校当校长。学校的对面是郑慕周的私宅。郑的三姨太太在成都读书时认识黄敬之，这样便有了往来。黄敬之是一位近代新式职业妇女。她原籍江苏，年轻时随丈夫游幕进川，曾在贵州住过几年。辛亥以后在成都定居，置下的房产不久在川黔军阀战争中被付之一炬。丈夫去世后，她独立在外教书，教养三个子女成人。子女都从了母姓。她不吃素，不信鬼神，旧文学功底好，书琴棋画，样样精通，绣花、绘画、填词、烹饪，尤其擅长。她在成都把教职丢了，便应聘来灌县主持学政。黄敬之能打麻将，常常被请到郑府去凑牌局，她是极能干、极开朗的一个人，很快便在郑府上上下下混熟。

黄玉颀是她的小女儿，也是她的一颗掌上珠。黄敬之外貌利落，不过牙有点暴，爱吃瓜子，门牙总露在外面。黄玉颀则远胜其母，她长得特别的娇小，一支直直的希腊鼻子，一双圆圆的、对外部世界充满惊奇的眼睛，显

得十分可爱。

这么一个将近十岁的女孩子，当然还谈不到其他，但确实吸引了以后在省城读书，有时回灌县来度假的杨朝熙的注意。这母女二人注定要深深地进入他的生活之中。这是你的一个转折点。没有这次转折，你只能是故乡乡村的士绅，旧军队的幕僚，决不会是一个进步的文化战士。

时代的、个人的因素都在起作用。我的自在的人生阶段戛然而止，自为的阶段便开始，我受到了“五四”的恩惠。

盐道街省一师

1921年秋凉的一天，一个瘦削的浑身散发土气的青年人，穿着当年流行的灰市布长衫，外套着羽纱马褂，同另一个衣饰整齐的青年，同时跨进了曾做过前清盐茶道署衙门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这便是杨朝熙与谢荣华。现在我们尚能寻到的一份档案材料《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历届毕业生一览表》，是该校教务处1946年制订的。其中普通科第十班的名单从“张光银”到“周遂初”，共排列二十七名。在第十一处写明：

杨朝熙，籍贯四川安县，毕业年月民国十五年七月。从荒僻闭塞的安县来到辛亥、“五四”风云在四川汇集的中心成都，从断断续续读过十年方块汉字、不识得一个英文字母的文化环境，一下子踏入到本省风气纯朴、开明的著名学府，他整个被一种自卑的情绪包围住了。他几个月前，便按照舅父的旨意到省会来考一般学校，发现在这个新的陌生城市里，他变得什么学问都没有了。连考了几个学校，都未录取。特别是英语和数学，虽然请人补习过一番，毕竟底子太薄，一时赶不起来。最后是郑慕周委托他在成都的代表黎少农，通过私人关系，才把他送进了省一师的。

为此，大约有一年时间，朝熙站在这个学校绝大部分清寒好学的同学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

我不敢直面看任何人，似乎他们都知道我是靠了人情才进去的，因而随时都会向我发出鄙视的和讪笑的眼光。（你又一次被羞耻心攫住了？你说到了一点痛痒处。不要忘记，我是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地方的，这种由小到大引起的震动，在我以后的经历里还要发生多次。

每一次心理危机都逼迫我调动故乡给我的一切自信“储备”。这是我这个“土包子”最后战胜外界压迫的武器）省一师前身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优级选科师范，当时设在皇城内。宣统二年（1909）改名川中师范学堂。辛亥后，校址被成都军政府借用，迁至后学门糖业讲习所内。1914年改为一师，拨东马棚街官地建设新校舍（今成都一中）。设立附属小学后又感地方狭小，于1919年迁入盐道街原高等师范校址，而高师则迁进了皇城，等于转了一个大圈，换了个位置。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可笑。

盐道街几乎已面貌全非了，仿佛比记忆中的盐道窄了很多。学校看来改变也大，招牌则已换成“盐道街中学”。原早的校内旧有的浓沼、亭阁，显然也早已不存在了。出版局地址，我记得原是鲜特生的旧式公馆，现在也

换成新式楼房。

说“盐道窄了很多”，那是老年他的眼光。属于一种心理空间感觉。1921年的省一师校园，在他心目中永远是阔大的。

如果当年经大门两旁的石狮子走进这个学校，便可见右面一棵硕大的桂树。人穿行在一条竹丛夹道当中，一侧是附小，及附小操场北面的礼堂，一侧便是东院高年级学生宿舍。在东院与西院之间，是教室群落。向北穿过自修室、实验室，跨过池塘上的小桥，便来到北院低年级学生宿舍。学校的学制，预科是一年，正科是四年，杨朝熙在校五年，就从北院升级般地移到前面院落去。这种每年的移动，是学生们高兴的事：他成了老资格了。

出北院向东，整个学校的后半部分是足球操场。朝熙在班里爱踢脚球（足球），是个前锋。艾芜踢后卫。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新鲜的一种体育活动。整个校舍，除了实验室是砖房，其余都是泥墙房。几乎每一个院中之院，都有一眼水井。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所学校的学生是太少了：每一年只收一班，每班从二十几人到三十几人不等，满打满算，全校五期五个班的学生才不到二百人。校园在朝熙心中显得宽敞，也是可以理解的。

省一师是官费，这里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多，外地学生多。成都的富家子弟多半进的是联合中学（石室中学），他们看不起师范，称之为“稀饭学校”。但这里的教员很多是成都知识界的名人，师资水平是很高的。

上国文课，最使朝熙宽松。他第一个半年，便一头钻入经史百家的古文堆里。他喜欢明人归有光，爱读他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欣赏其不事雕饰、运用细节，刻绘生动的文字风格。但是其他的功课就陌生了。教历史、地理的先生，年纪都在六十上下，这种古老的学科勉强还能让他跟得上，但是像“周三角”的三角课，“王几何”的几何课，还有什么代数、物理、化学，简直使他望而生畏。特别是英语，从零一下子跳到中学程度，上课时用的是狄更斯《大卫·考波菲尔》的英文节本，拿在手里，简直像是一本天书。

当他能够冷静地观察十班这些同窗，就更不安了。这里的学生读书愈好的，衣履愈坏愈旧，也愈得到人们的敬重。好多人在冬季连件棉袄也没有，只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夹衣度日。

省一师的传统是简朴。学生要轮值帮厨、买菜，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不会遭人鄙视。到了假期，学生把行李送入当铺，得了盘缠才回家。等到开学返校时再赎回，视同平常。反过来，他从故乡袍哥社会带来的各种成人习惯，在同学间就显得很刺眼了。他连穿戴打扮都是“孤立无援”的。

杨朝熙这时还是个少爷式的人物。他开初时常吃馆子、看戏。成都试行公共汽车那阵，他就买张票从东城到西城逛一圈玩。听说督军杨森的小老婆有架飞机叫“洋马儿”，也会跟了人去看稀奇。当时成都人称去“开洋荤”。这个充满“五四”新思潮的学校的空气，对他无形中造成的精神压力，我们可以从他日后的回忆中鲜明地感觉到。朝熙内在的敏感特质，他吸收外在新东西的勇气，寻求新生活的欲望，显然是非常之大。他心理上甚至不惜夸大省一师同学的良好行为习惯对他构成的“威胁”，从而触发他要求改变过去、改变自我的内驱动力。

（为什么一样在你舅父的庇护下，你与你哥哥走的道路如此不同？同样，都在省一师的环境里，谢荣华改变自己的感觉为何不如你强烈？这是你早年生活转机中最值得玩味的问题）

谢荣华与他可说是总角之交，但论起性情来，这时的杨朝熙越来越觉得彼此有些“隔教”。谢荣华不是没有受到省一师的影响，他后来去上海读光华大学，参加过左翼的“艺术剧社”。只是被捕后走入歧途。重要的一点是谢在省一师时期，原封不动保持士绅子弟的生活习惯，以后回到家乡，很快与杨朝熙哥哥一样，烧烟、操袍哥，缩回到原来起步的生活圈子里去。但是朝熙反叛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一边深深地以过去的自己为羞，暗暗用功，想尽各种办法补习课程，有时急得半夜醒来在自己的床头偷偷哭泣，一边开始在谢荣华以外的同学中觅友。他看着自己脚踏的黑咩叽面的皮底平鞋，“开始默默观察那些穿着蒲鞋、草鞋，以及家造鞋子的级友”。并留意到省一师的各样师长。

这个学校的教师不乏名人、怪人。讲历史的朱起怀先生，父亲朱颜和也是个历史学家。

朱穿得寒碜，破破烂烂，学生给他起个绰号叫“朱讨口”（讨口，即要饭花子）。他讲起历代的官职，如数家珍。讲地理的彭昌南先生，一本地图全装在肚子里，提哪说哪，不费思索。他的教科书是自己编印的，整个四川的中级学校都用他的地理书。据说商务印书馆想买下他的版权，他没答应。还有个陈希禹先生，胖子，不修边幅，也不拘形迹，名士风度。他敞着个领口，拖起鞋子，就来上课了。还带着杯子、饭盒，放到讲桌上，里面有卤蛋什么的。他上哲学课，听课的人很多，暗地称他“陈棒客”。因为他说话语锋极健，把哲学道理说得活灵活现，高兴时会把腿搁到桌子上去。本来是瘦长瘦长的蔡松吾先生教伦理学，因他高师课重，后来辞了，才是陈希禹讲。蔡先生的儿子蔡瑜是朝熙同班同学，曾与盐道街口一家面食店的中年老板娘有了风流事，一时传为谈资。

那时师范学校的文科教员水平是很高的。教朝熙国文的，先是一位萧忠仁先生，译名“萧神仙”，因他喜爱撒古，嗜吃猪肉，又做气功，养得白白胖胖的。他讲《古文辞类纂》的选文，字也写得漂亮。还有唐笑时先生教心理学，是很新鲜的课程。教生物的姓温，学生叫他“温动物”。教手工的姓黄，在日本留过学，做事很细致。姓罗的教体育，人很随和，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因为可以在课上与他随便开玩笑。他也是留日学生，为什么回国教这种课，谁也不明白。杨朝熙爱踢足球，自然是他教导之故。

英文最使他头痛，而教英文的教师章琢如先生偏让他记得最清楚。当时朝熙课余还到他家去补课。章个子奇小，绵竹人，早年在北京读的外文，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后被捕自首，便消极了。1946年新省委在成都成立，吴老（玉章）主持工作，曾命他经绵竹去看与党有长期关系的省议员王干青，其时，章琢如便住在王干青公馆的一个厢房里。吴老与章是很熟的，还特别嘱咐他顺便告章，不要一天就念阿弥陀佛了。章琢如果然天天在念经，请他吃便饭，饭席上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行了！”

“这些人”，自然不能包括在省一师后期也教过杨朝熙国文的袁诗尧与张秀熟（秀蜀）先生。这两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授业、解惑的教师，他们还是四川最早的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教师中，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外表冷静、沉默，却强烈表现出愿意融入省一师整个进步校风里去的学生。张秀熟还做过省一师的教务长，与校长龚道耕关系也好，能影响龚办好这个学校。他教杨朝熙已经很晚，但两人保持六十多年的师生情谊，成为忘年之交。张先生操着极慢的、顿挫有力的语调，谈起这个学生来，充满

了感情，而且很能传达出中学生杨朝熙当年的风貌：沙汀当时并不十分“跳跃”。因他的性格不是那样的，虽是青年，已能考虑问题。他年轻而又老练，不是回到县里只会搞讲演、宣传之类的脚色。所以他才能坐而搞文学。搞文学也不一定是能在街上活跃分子。我教过他们国文，除了教科书，我还自选《新青年》这种刊物的文章，选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沙汀这些学生已经不爱只听古文了。

同学之间这种不爱读古文的风气，笼罩了省一师。认真说来，同学的互相影响更要胜过老师。入校半年之后，杨朝熙经过几个同学的引导，全身心地接受社会新思潮的冲击，才补上了几年前因关闭在家乡而被隔绝的“五四”一课，才开始了由一个落伍的士绅子弟向一个时代青年过渡的根本转向。

“播种者”

沙汀传

最早作为一个“五四”人物，对他施加时代影响的，是他的同班同学张君培。

二十年后，上海的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要编一本对真实人物作回忆的集子。书名就叫《良友》。经过巴金来约他写篇文章，他怀着思念写下一篇完全用真实细节构成的作品，算是“纪实小说”，那个主人公的原型便是张君培。他称他是“把我从茫无无际的挣扎里挽救出来”，“第一个用全力鼓舞我上进的人”，称他为“播种者”。

张君培的脸似乎永远没有洗净过。牙齿洁白，鼻子和眼眶周围有几颗隐约可见的麻子。

穿了不合身的又旧又破的斜纹制服，蓝布袜子和火麻草鞋。最引人注意的是张的独往独来、爱好争嘴、直言批评旁人的性格。他经常发出朝熙听来是那么令人吃惊的怪论。

“你们只觉得娼妓很无耻吗？当嫖客的也同样的不要脸哩！为什么呢？”浮上一个挑衅的和傲慢的微笑，他又教训的紧接着说，“因为卖淫并不是娼妓一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嫖客，这个可耻的行为才能成立。……”

他还说分娩是“某一器官的天然责任”，虽然没有亲眼看过生孩子，“可是哥白尼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走的，我们能说没有亲眼看过，就不相信它吗？！……”为了找一个同学温习自己几乎要得零分的英语，杨朝熙鼓起勇气向这个班里英语学得最好的同学请教。张君培认真地教其识字，解释文句，领着他读。但是自尊心使他隐瞒了自己真正的英文程度，教过三次仍不能懂得，于是遭到张君培的率直批评。朝熙对他是又想接近，又怕接近，两人的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程度。

这天，乘着礼拜日别的同学去少城公园喝茶，张君培去高等师范看老师，杨朝熙溜进自修室，偷看了张的一个抄本，发现里面摘录了《学灯》、《觉悟》和一些流行小册子里的文字，懂得了张那些新奇谈吐的来源。他热切地读下去：人生观是甚么意思？社会主义应该作何解释？圣西门又是怎样个人

呢？越读不懂，求知的欲望越强烈。最后索性将这个抄本偷出，想拿回寝室细细地看一遍。事也凑巧，他拿着窃物穿过天井，正跨上那条联接几间教室的甬道，却意外地撞见了张君培。张见他忸怩的样子，先发了话。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大约我那天把你得罪了吧？”“哪里呵，”我说，更为混乱的把头勾下。

“你要知道，我并不是想要侮辱你呢！”他接着说；并且两手插入制裤的岔包，两足微微张开，有如讲演一般的说下去了，“我这个人么，你不来找我算了，既然找到了我，我是决不肯敷衍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怕缺了席扣分数才来的，我也不是想拿点钟点费，只求混过完事！……”

张君培打着“为什么呢”的口头禅，接着嘲笑起班上混事的同学。朝熙为他们的国文根底辩白了几句，却遭到了“这些破铜烂铁再多装些，又有什么用”，只能“当秘书，拟通电，说些自己并不真心要说，别人也不真心要听的假话”的批评。凝想了一会儿，张接连向朝熙问起新文化运动中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的名字，可他却连一个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的呵！”他突异着，又叹息了，“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我告诉了他，忽然间兴奋极了。

“这个县名，你恐怕听都没有听说过吧？”我接着说，“四面是山，风气蔽塞得很。甚么新文化运动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上一年还在读私馆呢。从七八岁起，我母亲每一年就拖钱借债，都要接个老先生教我的，但她自己从未受过教育！……”

……“我的处境就是这样！”我悲愤的结束着；“又聋又瞎，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关系！一个人只要觉悟了就好办了。”他忽然同情的说。

他挨近我，在我肩上放上一只抚慰的手掌。

“我从前又懂得甚么呢？”他继续说，竭力想瞅牢我，“我小时候才读过四五年书！你没有听到说吧，我原先是在高等师范当小工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能求学呢。我起初只希望有事情做，不会饿死就万幸了。像我都能够奋斗出来，在你们更容易啦！……”当朝熙无意中暴露出他私自拿了个抄本，原以为会使他们刚刚建立的关系破裂时，张君培却非常高兴。以上便是两人最初交往的一幕。对于他，张君培的思想放出异彩，照耀了他，这实际就是“五四”的魅力。而张君培却显出一个寻找自己思想伙伴的成熟态度。

以后杨朝熙才知道，张君培是涪陵人，家境贫寒，流浪到成都，在高等师范当过校工。

因此，认得了比张秀熟还高一班的刘砚僧先生。刘是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很赏识张君培，有意培植他。接着，高师学监王右木先生又来帮助他进夜校学习，成绩斐然。这样，张终于考入了省一师。

王右木是四川建立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者，江油人，在日本留学时受河上肇等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归国后在高师任教，指导成都社会主义读书会，进而1921年在川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王右木生活简朴，经常吃几个锅魁当一顿饭，把大部分薪金都拿来资助贫苦学生，或者印刷革命宣传品，以至于夫人在家连菜金都发生了危机。这个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广州开会，经过贵州时不幸失踪的，估计是牺牲了。

张君培每次与杨朝熙谈起王右木的道德文章，总自然流露出敬意。他经常到王右木那里借书看，都是一些谈妇女、劳工、社会制度问题和宣传社

会主义的小册子。朝熙又看张借来的一些铅印、油印、手抄的禁书、刊物，两人互相切磋讨论。通过这些，朝熙感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思想变动。“五四”给予他的影响虽然迟了两年，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俱来，使他整个换了脑筋。他开始密切关注当代社会问题，以后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一生喜爱社会科学，都是与张君培的启发分不开的。

杨朝熙像海绵吸水一样急切地接受新思想。那些日子，连放假都不回灌县舅父那里，常与张君培一起留校读书。张对他的督促如同严师，一丝不苟。朝熙把舅父给他送来的呢制服、皮鞋、自行车，都搁置不用，学着张那样穿斜纹布的衣服，踏草鞋或者穿便鞋，不用洋袜用布袜。心里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青年。

（你穿着上的变化预示了你心灵上的变化。可以说，如果不到省一师，我是不会这么快否定安县的故乡社会、和背弃我刚刚尝到的少爷生活滋味的。不过，这个故乡社会是由你的亲朋组成，舅舅就像你父亲一样，这就使你很难产生厌恶到底的感情，嘲弄的心态是不是就种下了呢？）

张君培1925年不幸患肺病早逝，所以现在省一师十班的名册里没有他。他病后，走路摇摇晃晃，却非常馋，想吃东西。朝熙管束着他，有时两人往往争执得脸红。所以在《播种者》的最末，有一句充满懊悔和挚爱情感的话：“早知道如此，我该多让他吃几块杨麻子的花生糖呀！”所谓杨麻子的吃食，是开在省一师对面空坝子上的一个摊子，扯了个篷篷卖的。花生糖是自制的，卖光了，主人便坐在那里扯胡琴，极悠闲。这花生糖，连同每天清晨小贩送到校门口，装在瓶里，用棉被一类东西捂住保温，取出便可喝的豆浆，或者拿到夜自习课教室来卖的各式糕点，都是穷苦师范生的恩物。现在，每当杨麻子的胡琴声悠然飘进自修室，便会引起杨朝熙一阵思友的惆怅。

到了清明节，沙汀的生活条件好一些，便由他出钱买些菜，替张君培上坟，也邀请我们一起去。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嘛。在那个时代，沙汀能看得起一个校工出身的人，并这样吊念他，是许多人做不到的。（这里请停一下。你引入艾芜的时机虽然还算适合，但显得不郑重，连个出场的序曲都不奏。艾芜与我存在着一个“甲子”以上的友情，可能会让你注目，但你知道怎样来叙述它吗？我会注意你们各自对这份友谊所说过的话的，但我可不想只对你们两位老人礼赞一番。你们还需要这个么？）

艾芜在班里用的名字是汤道耕。杨朝熙以后一再说起，在省一师，张君培如何启发了他的社会科学的头脑，汤道耕则是影响他接受五四新文学的最好伙伴。

朝熙很快发现，汤道耕与张君培的性格正好是两极。张外向、爽直，说话毫不留情面。

汤老成持重，生活严肃，没有任何不良习惯，却很少批评别人。同样是对待他抽纸烟这件事，君培是再三地严厉指责，道耕却不管。他问过汤：“我吃烟，你为什么劝我戒掉呢？”

汤道耕反问道：“你知道吃烟不好，为什么还要别人劝？”

如果我的行为还不能影响你，再说也是空话。”这是杨朝熙另一个畏友自造的逻辑。

最初引起他注意汤道耕的，便是汤的读诗和写诗，而张君培对文学的兴趣不大。汤道耕接触五四新文化稍早，朝熙最早读到的白话诗，像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集，都是在汤那里借来的。等到经汤介绍读

了郭沫若《女神》里那些代表“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诗，才真正被新诗吸引住了，许多段落至今仍能背诵。星期天两人一起去成都的通俗教育馆、少城公园游逛。在望江楼俯视滔滔江水，两个青年常不自禁地诵出郭沫若的诗句：山在那儿燃烧，

银在波中舞蹈，

一只只的帆船，

好像是在镜中跑，

哦，白云也在镜中跑，这不是个呀，生命底写照！两年后，汤道耕与省一师的新繁同乡办了个文学刊物《繁星》，汤在那上面发表的诗，朝熙也是读过的。这是许多文学青年都有的诗的年龄、诗的时代。

最早读鲁迅的作品，已经不是《狂人日记》。记得很清楚，是与汤道耕一起到商业场旁边的昌福馆普益书报社，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读到的《故乡》。开始还读不懂，两人反复讨论，一遍又一遍地读，才感受到闰土那一声“老爷”称呼的震撼，被“我”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认识所感动。鲁迅、郭沫若，打开了两人的眼界，养成他们的文学兴趣。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创造社那些“思想大于艺术”的激进作品，在很长时间内，吸引着他们。沙汀与省一师其他同学一样用功。他不仅搞功课，还在课余找有新思想的文学书来读，这就与别的同学不同了。为此，我们接近起来。读创造社的书，读《小说月报》、《语丝》。我买不起，沙汀听说书到了，便跑去买来，他看，我也看。商业场上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专卖上海、北京的书。还有一家书店卖泰东书店出的创造社的书。

商务出的书，是在青石桥街上。我们经常一块跑去翻看新书。

（买书是在商业场里陈育庵开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专卖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刊。

陈为四川做了好事，可惜后来赶船淹死了。我每星期至少要跑那里两次，买书、看书。《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未名》、《莽原》及后来的《语丝》，往往一到便抢光。商务用“共学社”名义也出了些好书，如俄国戏剧集、小说集，都是名著，耿济之、耿世之译的——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华阳书报流通处，是五四时期四川新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个店只有一间门面，前面陈列，后面连着屋子。杨朝熙在这里买过《朝花旬刊》，读到挪威汉默生的《饿》。这篇小说写主人公一天傍晚散步，遇一披黑纱女子，调情后被引到女家，在黑暗中经一大厅到其内室，留了一宿。晨起，女人催他走。男人走过大厅，见停一尸体，大惊。跑到咖啡馆读到晨报，见一启事说某地（即他昨晚居地）某人瘫痪二、三十年，几天前逝世。才悟到原来此女二、三十年没得到性满足，丈夫刚死便……。这篇小说到结尾突然翻转出整个作品深意的写法，给他留下极深的记忆，所以六十年后他还能清晰地叙述出它的故事。这是他最早读到的翻译小说之一。

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是商务出版，徐炳旭译的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写的是圣经故事。它所体现的早期基督教的殉道献身精神，使年轻的杨朝熙久久不忘。他还喜欢读少年中国举会办的《少年中国》，记得上面有田汉的《诗人与劳动问题》、《吃了刺果以后的话》。旁征博引，体现出创造社的思想风貌。他读了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的《三叶集》，其中的通信讲述三人各自的身世，令他同情。鲁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中东欧弱小

民族的短篇小说，《乐人杨科》、《老仆人》等，他也相当欣赏。还有日本小说，也能读得津津有味。那种传奇性的讽刺，尤其使他神往。他对外国文学的爱好越来越浓了。

不过，他虽经汤道耕的引荐喜爱上了新文学，但在省一师期间，主要养成的还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喜好。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正处于形成、锻造的时期，在省一师这个环境里，被席卷着参加政治活动，使他的思想经受着时代激荡。他对高年级七班的叶道信、刘蓉潮（刘弄潮）颇为崇拜。这两人是全校有名的活动分子。后来都遭到“斥退”。1922年6月12日、13日，为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刘湘被迫答应划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未兑现），成都学生在王右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发起请愿。杨朝熙、汤道耕跟着叶、刘这些学生领袖都参加了这次斗争。

（争教育经费，当时闹得很大，我们到省议会请愿，责问副议长熊晓岩和议员曹叔实（西山会议派）。除了省师，还有“工专”一些学校。省议会不准。议员都有轿子，他们让轿夫来驱逐学生，我也在场。学生代表先去熊公馆谈判，熊诬告学生“擅入民宅”，让警察软禁代表，这就动了公愤。几千学生赶去抢走代表，发生了骚乱。学生打进熊晓岩公馆，我记得抱起他家的花瓶打穿衣镜。过后轿夫们又赶来，我们翻墙跑了。我跑进一个成衣铺。那时的成衣铺当门都放个案子，我钻入里面才得脱身。我记得那天艾芜也在。

——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阳翰笙在省立一中，加上省一师同学，有搞学生运动的传统，我和沙汀都参加过。像抗议减少教育经费，反帝，反四川军阀，参加游行请愿。四川当时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曾琦），也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过学校里建立组织是1926年以后的事。我们读书时，处于思想宣传阶段。全国知道有共产党，省师有没有就不清楚了。

不管是谁领导的，凡学校风行的活动都参与其中，这是大势。包括抵制日货或后来成都青年会提倡的“平民教育运动”，当时十班的学生，杨朝熙和汤道耕都起而响应。朝熙上街教过几次课，听课的人中有小贩、苦力，更有家庭妇女。教识字、看报，热心地干了一阵子。与平民的贴近，使他这样的热血青年，具体领会到“五四”人权平等、劳工神圣等等精神的含义。

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思索。1923年中国思想界有一件大事，便是著名的“科玄之战”。这正是他钟情于哲学的时期，被人生观、宇宙观问题闹得好苦，看《向导》，看改组后李大钊编的《新青年》，突然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展开在面前。

他不一定能立即读到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勱的《人生观》。此文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发表了《玄学与科学》一文，激烈地批评张“玄学鬼”附身。张再答辩。一时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唐钺、孙伏园等文化界名流纷纷著文表态，这就引起整个学界的注目。广大的进步知识青年立即站到了新文化健将一致推崇的科学派一边，对于杨朝熙，这不消说也是一次极好的“五四”补课机会。科学的理性的观念，认为一个人、一个社会，均可用当时理解的唯物论来彻底分析清楚，自然最符合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他就是经过这次论战而全心全意接受唯物论的。所以，他经常说，哲学史上这场争论，在传播唯物思想、宣传科学、破除迷信上面，值得大写一笔。那时，向浑的同父异母兄弟向履丰，正在联合中学读书，很用功，与他过从甚密。他还信仰过梁漱溟的学说，梁的《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向履丰介绍给他读的。他可能再也想不到六十年后他会与梁先生在北京一座大楼里面毗邻而居。但是到了这次论战来临，是以东方的文化为本位，还是用西方近代的科学主义来思考人生与宇宙，如此鲜明的问题需他抉择，杨朝熙便毫不迟疑地认定片面鼓吹“东方文明”，是只能倒退到“五四”以前的中国去了。他对于优秀外国文化的终生喜爱，从此更理性化了。

另外，他接受这场论战的角度，显然不是纯哲学的。所以，这些笔战的文章最能让他记住的居然是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这是他和道耕一起跑到青石桥商务印书馆的阅览室里读到的，发表在《太平洋》杂志上，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以后自命为蒋介石政权下的“刘姥姥”的吴稚晖，当日这篇文字写得可是洋洋洒洒、风趣泼辣。他挖苦玄学家，说他们虽然盛赞东方这好那好，一出门还是要坐轮船火车，绝不会坐鸡公车的。吴稚晖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讽刺文采，使他感到兴趣。吴还有一部《上下古今谈》，他和同学当时没能找到，一直等他第一次到了北京方寻来读。他对吴的文章的着迷，就同爱好搜罗尼采、泰戈尔、罗素的中译本一样，都是他思想急剧变动的外在表现。到了1925年，好友张君培逝世，在汤道耕临去云南流浪以前，杨朝熙与同学一天比一天多地谈起社会改革来。

道耕读社会科学书的兴趣也日甚一日。两人读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经常交换意见。汤道耕本来就很沉静，甚至有点孤僻，钻进哲学就更爱思索问题。两人都很佩服恽代英、王光祈一批人。恽任过川南的师范学校校长，人俭朴，思想又新，在四川青年中威望很高。杨、汤虽无缘见他，但他们都是《中国青年》这个发表早期共产党人理论文章的著名杂志的读者。

我们当时认为青年最有希望。所以沙汀在学校取名杨只青，即·只·有·青·年才有前途的意思。这是我们在省一师经常谈的话题。记得他很长时间给我写信还用“只青”的名字，后来才正式成了“杨子青”。

杨只（子）青、汤道耕曾经与另外两三个同学一起，散发过一次传单。完全是青年人自发的政治举动，没有任何人指点，就草拟一个内容，攻击一通社会的黑暗，油印了到处送，表示对社会的“宣战”。

他们还商量如何去进行社会调查，想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看看。受了勤工俭学潮流的影响，汤道耕和九班的苏玉成很早就酝酿步行去云南的计划，他也表示愿同行。因为改革社会依赖实践，已是他们谈论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两人在一起读《红楼梦》，好多次汤道耕都提到贾政书房里的那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包含了人的阅历经验比读书更为重要的思想。本来说好要几个人一起走的，可是这一年暑期，汤道耕对家里给他订下的一门亲事，越发不能接受。正好，九班一个姓黄的同学要回川南的家乡珙县，可以结伴走至川滇边界。于是，汤忽然抛下一切，走了。待他从家里赶回学校，却只见南行者给他留下的一封信，劈头第一句话他至今还记得，是：“我相信世界是唯物的！”（你说你真会与艾芜一起去流浪吗？实际上既然没能流浪，现在探讨一起走的可能性也没多大意思了。当然，艾芜的牵挂比我少，他可以自顾自。社会捆绑我的绳索要比较长一些）

新与旧——包含一个新人的旧式婚姻

（艾芜流浪去了，我实际仍旧以一个少爷的身份空谈新思想、新文化，一面沉溺在文学作品当中。——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呈现出新旧冲突的时代。杨子青的思想也在激荡之中。大约在1924年，他便认识了十一班的周尚明、冯棣、刘尔钰几人。他们既倾向革命，又喜欢进步的文艺作品，一有空就跑华阳书报流通处。他在书店里常常发现这几个低一班的同学和自己一样，买的都是北新书局等出版的书刊。后来又知道因为家境都不富裕，又渴望得到新知识，他们采用了一种“分买共读”的办法。周尚明负担购买《向导》、《中国青年》，总是星期天便赶早跑到昌福馆去，抢先买到新刊物，带到附近的一个茶楼上，热心地阅读起来。他们也买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周尚明在这几个人当中格外能引起他的注意。他的模样是：高高的身材，两颊经常泛着红色，向左边横梳过去的头发，总是拖一撮在额头上；发觉时便那么敏捷的把头往后一撂。

这个人注定要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成为继张君培之后的重要角色。特别是汤道耕走后，他与周尚明几人的关系由一般的相识，迅速发展至亲密的程度。实际上周尚明1925年已加入了共青团，不久任了团的成都市委书记。不过在杨子青眼里，他只是省一师最进步的学生而已。

周尚明很有正义感。当时学校里有旧生欺侮新生的陋习，一次，见到一个高年级学生又在侮辱新入学的同学，他挺身出去当众指责，得到杨子青他们的钦佩。周吸收新知识的欲望旺盛，少城公园图书馆成立不久，他在学校办了个“通学证”，每天晚饭后跑去阅读馆内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一读就是两三个钟头，然后积极介绍他们也去。周为人爽朗，说话锋利、机智，有组织才能。在校内他最先与几个同学办起一个文艺性的板报，起名《砧声》，声望很大，吸引杨子青每期都去看。很快地，全校各班都纷纷办起了这种板报。

周多才多能，话剧演得也不错。在校外组织了少年俱乐部，十一班好几个同学像陈昌村、石邦桀，被他带动去参加演戏。上演过《刀痕》、《一个漂泊者》（据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改编）、《假洋鬼子》（据《阿Q正传》改编）等剧目。周在一个戏里饰过哑巴，在成都演出了名，所以后来他在下莲池被枪杀，有的小孩子听说了，回家抱住母亲哭，说“哑巴也死了”！周尚明演戏，杨子青当过配角。周的精神、人格力量显然吸引了他。

这时候，在成都的青年学生中，“五四”以后思想的分化渐渐演变为政治斗争。按照不同的政治信仰，青年们分成了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派。杨子青周围比较接近的同学大都看不起国民党。因为省一师的学监罗锐伯曾经为国民党内部的一次选举，企图拉自己的学生冒充代表去投票，结果被他们拒绝，从此威信大降。加上他们周围没有左派国民党的多少活动，形成了自然的疏远。

可是国家主义派的风头在省一师却很足。特别是其首领四川人曾琦1924年由法国回来，办了《醒狮周报》，推波逐澜，发展了一些青年学生。他当时不知道，四川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这时已经初步建成。国立成都大学在声援“五卅”运动中由党团发起而组建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便坚决地同“醒狮派”斗争，被称为“社科社”。与社科社取一致立场的，有省

一中的石犀社，师大的导社，法专的共进社和省一师的赤锋社。周尚明便是赤锋社的领导人之一。十一班里“醒狮派”的学生不少，周尚明他们与不提反帝反军阀，又反对三民主义里面的“民权”、“民生”，主张所谓“救国”论的同学，时常展开唇枪舌战。杨子青也和周尚明一样，幽默地称他们为“狗儿派”，意思是他们根本不配和“醒狮”的形象连在一起。

杨子青对辩证唯物论的兴趣越来越浓，他的革命倾向已很明显，但是这时他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别人对他的军阀舅舅的背景是否有所“警惕”，或者也令他自己迟疑不前，这都是可能的。至少后来袁诗尧老师听说要把他派到安县去搞组织活动，便曾在内部表示过不以为然。袁不够了解他，也不知道周尚明在省一师高年级的学习阶段里已经完全信任他的这段经历。而这段经历正和二十年代中期一部分进步青年相仿，面前展开的是一条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道路，并不是文学。

1925年5月，杨子青被舅父和母亲催着回家结婚。女方即李丰庭之女李增峨。在郑慕周当上旅长之后，他与李丰庭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四川防区制时代，凡能占据到现在专区那么大地盘的军阀，不仅可以任意决定防区内各级行政官员，还可预征粮食，制造铜币，做稳土皇帝。郑慕周的防区也不算小了，松、理、茂、汶，又兼汉军统领。李丰庭就被他保荐去茂县当过县长。但没多久，茂县境内发生一次教案，几个基督教徒遭了抢劫，死了一个。责任追查下来，将李撤了。慢慢地，李和他从前的下级郑之间有了点隔阂。为了弥合这种缝隙，就由谢象仪力主保媒，让杨家娶进这个李家小姐。其时，杨子青二十一岁，李增峨十七岁。（一个接受了“五四”精神洗礼的青年，应当只有一条路：抗婚。但是你却屈服了。我替你惋惜。我不想反驳，不过我劝你还是去读读鲁迅的传记，仔细想想为什么我与艾芜的行为不同，把人生想得复杂一点，把人想得复杂一点）

杨子青平稳地接受了这桩包办婚姻。他没有立时反抗，这是他与汤道耕的相异之处。山区的童年生活，似乎给他以后带来冷峭和不动声色的文学个性。富庶的故乡平原使汤道耕的小说充满感情色彩。但在日常生活里恰恰相反，他是太懂得社会上的人情，他受人与人关系的牵掣太深，很少自管自地行事。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也经常要为自己溢于表面的热切人生态度，付出感情、时间的代价。

眼前的李增峨是母亲给他的“一件礼物”（鲁迅谈他的旧式妻子朱安语），是舅父政治生活中的一场平衡性交易。他对这两个人的感情，他对母亲的孝心，对舅父的从小敬爱，很难使他违逆。省一师的环境里没有女性，黄玉颀这时太小，当时还根本没有作为爱恋对象的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影子而已。这样，非自由的婚姻所能引起的反感，被亲情的层层绳索捆住，被对即将降临的两性神秘世界压倒，暂时潜伏深藏起来。

迎娶的场面很大，李增峨的陪嫁也不少。县城里这样体面的两亲结了亲，双方都想全力把婚事办好。杨子青挑开新娘的盖头，看到的是一张年轻而丰润的脸，额前的刘海黑得发亮。她不能算美艳，也绝不丑陋。穿了长到及地的裙子，上身是当时流行的那种袖子短而宽大的绸衫。直到1986年在绵阳沙汀大女儿杨刚俊家里人们看到这位老太太，还隐约可以推想她当年贤良的影子。

李增峨与他的夫妻生活过得也十分平静。他很快就回省继续追求他的新思潮去了，留下妻子在家里。李的脾气和善，少言寡语。她脑筋清楚，粗

识几个字，能看简单的书、唱本、皇历，但不会写。后来与他分居，但一直与婆母和睦相处。她总是埋怨说，为什么当年她父亲不让她读书呢？如果读了书，朝熙就不会不要她。

（这是谁告诉你的，有根据吗？你说呢？你不相信她会这样想？我看这是你感到这句话里你前妻的感情冲击了。她毕竟一生只跟了一个男人）

李增峨是小脚。现在所能找到的他对李不满意的最大根据，便在这双脚上。虽然他是用曲折幽默的语调来叙述的。（李增峨年轻时还是漂漂亮亮的，但是缠脚。我这个人有时爱开玩笑。汶江小学有个教师叫郑学元，河清乡人，这个人有学问，我当教育局长时，他是视学，后来当过小学校长。我在成都他曾跑去，说很快要结婚了，是父亲给他订的，女方人不错，就是一双小脚。我张口就说，你结婚我送你一件东西：放脚药水！那个时候女人已经有改造脚了，投机商人想出法子专卖这种药水，说是用来洗脚可慢慢把脚放大。这当然是骗钱的。郑一听我这样说当即不悦，以后终于没有同意这门亲事。——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这段话充满弦外之音。老年的他刚刚谈到年轻的李增峨的缠脚，便陡然地又过话去，大谈了一个同事的小脚待嫁女人是如何被他的一席趣语断送掉的。这里不就暗含了他最终会和鲁迅一样背叛已经承诺、执行下来的婚约了吗？

而对于李增峨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悲剧。他们平静地生活了四五年。他正在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思想处于不安定状态中，李对丈夫很体贴，两人很少争吵，至少要比他与黄玉颀的争吵少得多。到1928年两人基本分居后，她还为他生下第二个孩子，即长子刚锐。但是，不争吵的夫妻不一定是幸福的夫妻。到1950年四川解放，杨刚俊在罗江当县委宣传部长，父亲路过该县去看她，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母从其娘家接了出来赡养。那一次，他见到了李增峨。

刚俊说：“爸爸，现在是新社会了，你们分居这么些年也不办一个手续，我看不太好。”

父亲同意了，说：“那么，今后我来负责你母亲的生活费用吧。”

女儿没有同意。就这样，他在自己女儿的提议和帮助下，在整整二十多年过去后，与李增峨，正式离婚。这笔婚姻的旧帐和新帐的恩恩怨怨，是否就此了结了呢？也只有历史知道。

这时还是二十年代的中期，四川的新旧变动之快让老百姓摸不着头脑。全国是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走马灯一样上去下来。四川表面打的是五色旗，实际却是刘湘、杨森各据一方。归结为“保定”、“速成”两大军事系统的实力之争当然可以，但同系中并非完全一致。只见各自扩充自己的势力，招亡命之徒成军。有枪便有一切，队伍素质糟到不能再糟。1925年速成系杨森发动所谓“统一之战”，刘湘联合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和贵州军阀袁祖铭等组成“川黔联军”抵挡，反转来将杨逐出成都。刘湘占据了川东，成都被三个保定系的军阀刘、邓、田占领，仍然是勾心斗角、矛盾百出。

就在1925年那场混战中，郑慕周的上司刘禹久（成勋）岌岌可危，被迫下野。郑与其心腹们商量对策，大部分人都主张对刘倒戈，自谋生路。郑却坚决不从。因为他觉得刘禹久对他太好，他有今日不应忘恩负义。但是这支由他一手带起来的军队的命运，他也不能置之不理。最后，郑慕周毅然

决定与刘共进退，把军队转交给他的下属。他本人去职，放弃继续高升的前景，永远离开军旅。

郑慕周下野时已很富有。他回到安县，购置了五百亩田产，做起了士绅。川西北掌握武装的袍哥大爷几乎都是他的旧部与至交，与成都的旧军人也保持往还。他没有倒台。在安县，每一任新县长到任都要去拜会他，假如不想得到他的全力支持，至少也希望不要引起麻烦。郑慕周俨然是安县地方实力派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这样的人如果作恶，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但幸好他没有忘掉他是怎样从一个“烤大火”的流浪汉混出来的，对新潮流也不是全然无知。杨子青还太嫩，影响舅父还没到时候，但外甥的日益趋新，老有经验的郑慕周看在眼里，也不会不懂得时势是怎么回事。娶着好几房姨太太的下野军人热心地为家乡做些公益事情，和更恶的势力角逐，这里，既有封建士绅和袍哥的“传统”在起作用，也有他本人慷慨好义的性格在内。他的作为，与杨子青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仍然发生着密切的关联。

郑慕周下野是1926年。这一年的7月，杨子青完成省一师五年的学业，也毕业了。这时他二十二岁，与同学比是个老大哥。他读了不少新文化的书籍，哲学的、政治的、文学的，接近着四川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迟来的启蒙显示了出其不意的优势，由无条件接受“五四”民主主义思想跨越到社会主义边缘，两步似乎并成了一步来走，加上对新文学发生的向往，彻底改变了他旧日军阀子弟的生活态度。他结婚是在老宅。但随着哥哥跟着舅父积下一些钱财，母亲在振兴家业思想的驱使下，买下并建起了杨家碾房，同时，感到两个儿子都已成家，房子住得挤了，开始在碾房一侧兴建新房。规模搞大了，以至不惜大肆借款来盖新的院落，连郑慕周都感到不妥。这是母亲多年心里酿成的一个梦。

他已经变了。母亲治家的理想，在他心目中无形缩小，失去光彩。他利用次子的优越地位，向家里提出出川求学的计划。他想去的学校本来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上海大学。这后一个学校，因他读过它们的社会科学的讲义，觉得是把革命和读书两相结合的好处所。去北京大学，因想到有可能使自己成为鲁迅的学生，也十分向往。在政治上他热烈拥护国共合作的新潮，赞成在广东已于7月份宣言誓师的“北伐”。有机会能去看看全国沸腾的政治情势，也是他极愿意的。刚好，下野后的舅父在北京了解局势和拜会朋友，来信要他去考学校。这样，他便打点行装，准备第一次离别故乡远行。

外面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他不清楚。当他登上重庆朝天门江边的一艘火轮，站到船头看两江汇合的滔滔洪波，他只是确信，东出夔门，迎面而来的必是一个更大的天地。他的年龄使他对生活的憧憬、追求，大大高过于对人生现实的忧虑、失望。这时候，他还没有学会忧虑和失望。这是你第一次出川。每次离川和回川，构成你一个生命之圈。开放这圈，你受到外来的冲击；封闭这个圈，你又实现了你自己。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时我决然选择了一定的政治和爱情之圈，而且永远不悔。

外面的世界

广东的北伐轰轰烈烈。1926年7月，他又一次与谢荣华同路，出门求学。这次，他们可要走得远了。

他第一步的想法是，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或东南大学，看看那里的教育办得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行止。谢荣华准备到上海去投考。

去南京是因为向履丰的鼓动。这位向浑的弟弟，在成都有名的贵族学校“联合中学”读书时，两人常在安县旅省同学会的聚会上见面。此人老成朴素，与他很是投机。向履丰先他一年毕业，一个人跑到南京寄住，一边在大学听课，一边自学。在他给杨子青的信里，盛赞六朝古都的环境古雅、安静，如何适于读书，考学校或自学又如何方便。这样，凭着对向履丰的良好印象，他决意到南京，去试一试学习文科的前途。专心地学几年社会科学，是他心中朦胧的与革命相联结的一件事情。

从成都到重庆，杨子青初次踏上了这条“东大路”。当时成渝公路没有修好，不能直通长途汽车，但也有几段路，有那种破破烂烂、随时都会抛锚的老爷车，在尘土里颠簸。其余的路程便只能靠坐得你腰酸脚麻的滑竿了。沿着所谓“小川北”延伸的这条路，大约要走十一、二天的样子，这还要看运气好不好。他以后还有三、四次经过东大路的机会，它给他留下的记忆，到1934年写《赶路》这篇阴森可怕的小说时，便全部“复苏”了。

（《赶路》这个故事虽是听来的，但赶路情景、汽车抛锚、上车不易、在偏僻茶馆住宿等等，这都是我出校以后在成渝路上的实际经验。——沙汀1986年11月24日讲）

不仅是小川北一带的破败荒寒，旅栈里面的龌龊，叫人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就是旅店的堂倌们一夜罗唆人十多次，一会儿来问：“先生，叫一个么？”或者“女学生也有哩”，也够人受的。而且，正当你在轿竿里，被摇晃得迷迷糊糊，正要催眠的当儿，说不定在哪个山坳旁，会传来一声：“站住，检查一下！”那客人就会连一条半新的衬裤也保不住。这种狠心的抢劫，用当地土匪的术语，叫做“裤子过笼”，使每个路人不禁谈“路”色变。所幸他和谢荣华一路吃喝、休息、行走，尽管艰苦万分，终于还是平安到达了山城。

在这里，他们会合了早几年毕业、在省师附小教过书的罗晓云，登上赴武汉的江轮，一块东下了。罗是内江一带威远人，他要去北京寻找进修的机会。杨子青与罗相约，如到北京一定去找他。在船上，还新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陈序宾，本来在遂宁行医，这次要去协和医院学习，以后与他一直往来。一个叫巫次伦，是遂宁人，去上海求学。这群年轻学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四川，一路饱览三峡风光，谈论着求学前景。长江上的轮船多半是外籍的，这条航线和船上的生活，以后他多次经历过，并与他的小说发生关系。

船到了武汉，罗、陈两位转乘京汉路车赴京，其余人换船继续南下。在南京下关，他与谢、巫等道别，只身上岸了。

可是，南京没闪出多少新世界的光亮。向履丰安排他在城内鼓楼成贤街的高师寄宿舍一住下，便介绍了这里几个大学的情况。向的口气不像以前信中那么乐观，流露出对南京一派死气沉沉的不满，表示自己不久要到日本去。他本想考高师，看了高师的一些讲义，发现向的感觉是对的。这些讲义透出一股复古的气息，太陈腐了，与四川的一些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他便连

报名的想法都打消了。既然向都要离开此地，他更无心留恋这里的红墙绿瓦。住了十几天，逛了夫子庙、秦淮河、玄武湖、明孝陵，写信与舅父联系上后，便乘京浦路北上了。

这时是7月末，郑慕周带着几个从前的部下，住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太平湖饭店。饭店位于西单附近的市区，嘈杂热闹。他一去，便在旅馆房间里另加了铺，舅甥俩吃住在一起。郑身边围绕三、五个绵竹人。蔺简斋是云南陆军小学出身，对北京很熟。他的女婿和另一个青年，是中国大学学生，京戏迷，都是“读公爷书”，熬资格的。还有一个吴克仇。这些人在北京仍组成自己的四川世界。这是子青从小看惯了的生活，可以相安无事。

他安顿好后，便马上去寻自己的人。先到沙滩北京大学西斋找毛坤。毛坤与罗晓云同班，毕业后也在省师附小教书几年，有了积蓄后，才来住北大的。此人在省师同学中很有点名气，彼此不熟，但他很尊重他。杨子青向他打听罗的下落，才知罗已离京，而北大的考期也过了。毛坤为人很直爽，对这个一时表现出沮丧神情的小老弟说：“考什么大学啊！订一份《语丝》读好了。喜欢听北大的什么课，你就来听。这里好多人都是这样旁听的！”

这个主意正中下怀，他格外听得进去。南京的经历，使他相信再好的大学，课程也不会全如自己的意。它们怎么能抵得上《语丝》、《莽原》这些新的报刊书籍的力量呢。现在，他来到新文化的发源中心，来到华阳书报流通处那些长期吸引他灵魂的书报的产地，来到鲁迅等人的身边，为什么不可以痛痛快快地学一顿，反而非要套上一个学校的枷锁呢。对，太对了，道耕去当“游学先生”了，我就在北大旁听自学，真正掌握一些新知识吧！

后来，他又去会见了几位省师前几班的校友，像余必达、王光熹、李夏云等。见他们一个个只是埋头功课，对北京刚刚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以及思想文化界的斗争，都很漠然。而且他们不学文科，都是学理工农的，便更觉得没有必要像他们那样被关死在学校里。

于是，他便积极地筹备起舅父走后在北大附近租房自学的事情来。

杨子青暂时处于无人交往的境地，只是与郑慕周等人去游过几处名胜，听过高庆奎、梅兰芳、郝寿臣这些名角的戏，进“落子”（评戏）馆，逛天桥和前门外的夜市。他最喜欢的是听大鼓，听了一次，又听一次。北方的大鼓使他想起家乡的摆围鼓、唱善书，感到亲切。

他也喜欢城南天桥的游艺场，去这些地方像是赶场，赶梓潼会。

二十年代第一次到北京，曾随我舅父看过当时的杂技表演，印象深的是一位艺名“大饭桶”的小丑，个子很大，功夫也很到家。这自然使他想起那些河南流浪艺人来了。杨子青在娱乐中，只对北京的民间艺术感兴趣。此外，他便独守旅馆，一人看书。特别是“北新”、“未名”两家所出的新书。鲁迅的书，过去在成都没能得到的书，他都搜罗来看，包括吴稚晖的那本《上下古今谈》。这些书使他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北京世界，这是他熟悉的，向往的。晚上旅馆里吵闹，他便偷偷溜出去，进书场听书，享受一个平民社会的生活乐趣。

到了9月，他感到北京慢慢变成了一块沙漠。鲁迅于8月末南下后，他觉得《语丝》、《莽原》不如过去吸引人，整个北京不像“五四”、“三·一八”那时敏感，站在前列。鲁迅等大批文化先驱的离京，使北京好象抽空了它最精华的部分。只有南方革命传来的一些简略的新闻，使人振奋。

不久，毛坤去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他一去，住北大附近的计划

受挫。其时，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消息传来，郑慕周手边的钱花光了，便提出要与他一起回川。舅舅不放心他一人在这样战乱的气氛中留在北方，并且认为战局会拖延下去，汇兑必将发生问题，在京的生活将无法保障。他想想也就同意了。

（你知道吗？张天翼也是这年夏天从南方来京的，这时正在北大预科。你们当然无缘相识。但是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张天翼也对那时的大学课程不满，不久退学南返。是社会革命的热情促使我北上求学，北伐战争唤起了社会实践热情，又使我离开课堂，而向往行动，急于投入时代的潮流。这就是我与张天翼不谋而合的经历）10月下旬，郑慕周变卖了一些东西，筹了路费离京。杨子青之外，同行还有蔺简斋。在武汉一下车，他便被北伐军全部占领这座长江重镇后的胜利情景所激动（武昌为10月9日攻占）。他亲眼看到了宏大的游行及青年学生街头宣传的场面。汉口街上扎着大的彩牌楼，到处是旗帜的海、口号的海、飞扬着传单的海。各色人民团体的旗子，学校的旗子，白竹布或红布写着大的黑字、白字的横幅，写着口号的芦柴杆小纸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配着军乐声、歌声，和每面旗子下一个个通红激昂的脸孔，使他的身心受到震动。什么是革命？这不就是革命的真实显示吗？这不就是书中预告过的壮阔群众场面的具体体现吗？他的热血沸了，恨不得家乡立时也这样翻腾起来。他体会到，时代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

三天以后，他们搬上了一只开往宜昌的上水轮船，水陆兼程，年底前回到了安县。

江流回旋

第一次远行虽然给他打开眼界，但还谈不上广泛地了解中国。他基本上只生活在南京、北京两地的省师同学圈子里。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上，他永远不是个充分开放型的人。最宝贵的是看到武汉革命的实况，虽然只是一掠，使他回家后，再也按捺不住，旧历年前后曾几度折回到省城去探听形势。北伐的成功搅动了四川，各派军阀不断变换脸孔，调整自己的地位。他密切注视着时局。

每次去成都，都住在小福建巷郑慕周旧部萧维斌家中。每天逛书店，坐茶馆，与还没有毕业的省师同学来往。刘尔钰、冯棣很合他的脾胃。他们读恽代英译的《共产主义ABC》、郭沫若译的日本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读《人民周报》、《猛进》和《语丝》上关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周尚明尽管忙，也赶来与他见面，热烈地交谈对政局的看法。

这一次的会面，尚明同志给我的印象和以往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那些他原早具备的性格上的特征，更突出了：坚定、乐观和永不枯竭的革命朝气。那时候我刚从北京回来，但我从他那里才真正认清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实际斗争。周尚明告诉他，四川的军阀已纷纷易帜，倒向了北伐军。但内部的争斗愈演愈烈。二十八军邓锡侯的部下李家钰师长

出面调停，这一年，终于与二十四军的刘文辉、二十九军的田颂尧三家达成妥协。果然，成都成立了“统率办事处”（几个月后改称“三军联合办事处”）强化了他们的统治。周尚明又帮助他弄清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情况。11月，在重庆刚开过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即分成两个省党部：左派在莲花池，右派在总土地庙。支持国民党左派，成了他们经常的话题。

转眼到了1927年3月，发生了英美军舰炮轰南京的事件。3月31日，杨闇公^{e*} 刘湘下手弹压，当场打死打伤七百多人。4月4日，杨闇公^{e*} 刘湘 植伊摇U 饬褪恰八·一二”政变前夕，又一次天下未乱蜀先乱的“三·三一”惨案。

这时，他的家乡川西北一带，邓锡侯、田颂尧的防区，比刘湘的川东平稳。军阀们还在高唱“革命”，没有露出杀机。与周尚明在一起，他的眼光变得明亮，知道许多人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但对四伏的危机，毕竟没有很多警觉。他具体感受到的，还是高涨的革命形势。

初夏，在同乡萧维斌家里，他又与周尚明碰头。周突然问他：“你如果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可以介绍。”杨子青早已从这个亲密朋友身上，隐隐猜测到他的身份，对于这样的询问似乎早有准备。他从与张君培接触到认识周，逐渐抱定只有共产党才是最革命的这个信念，所以，没有迟疑，当即表示愿意加入。

几天后，周在少城公园与他约会，通知他上级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今后便由周直接与他联系。一切是水到渠成，他做出了决定性的政治抉择。

（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段叙述得过于平淡？不，我并不想听你在这里高奏凯歌。一个事后证明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当时可能发生得平平淡淡。影响是日后显示的）

过了些日子，周尚明通知他，到春熙路孙中山的铜像（现在仍矗立着）附近的一个茶馆来鹤楼会见刘愿庵，周也在场。刘是党的川西特委负责人之一。他在一个报馆写社论，报馆也在这条繁华马路上。

刘中等个子，胖胖乎乎的。听杨子青谈了安县社会情况后，告诉他当前的任务是，要积极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以抵制右派的力量。然后，便以国民党川西特派员的名义，委派他去故乡筹备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这是他最早接受的一次政治使命。

他后来还见过刘愿庵两面。刘在国民党背叛后，负责恢复党组织，不幸被捕，于重庆较场坝遭杀害。赴刑场时，用凉轿抬着，由一个手枪连押阵。下坡路滑，轿夫跌倒，把他甩下来。他爬起来忙把轿夫扶了，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该怪刘湘，不然我怎会要你们抬起走呢！”几分钟后便就义了。他对这个人牺牲的故事一直记得很牢，讲起来总会流露出敬佩之情。他不会忘记，当年他回安县所持的委任书，便是刘愿庵亲自交给他的。

安县这时上层的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军阀的勾结还没有完成，绅士阶层里的分化已很明显。县里的三个劣绅，人称“三个瞎子”的林华卿（县团防总局局长）、罗伯卿（城关团防局长）、萧北垣（县参议员），都是近视眼，争起权力来眼睛却睁得老大。他们与郑慕周有矛盾。1927年初，驻防安县，江油、彰明、北川一带的董长安旅部（属田颂尧之下孙德操师），任命安县知县 仁寿人夏正寅。此公社会关系独特，他的弟弟（留法学生夏仲寅）和几个子女都是共产党人，本人思想进步。他又是董长安的

异父同母兄弟，后台有利。夏到任后，便对几个劣绅的横行不法表露不满。林华卿去求见夏，碰过钉子，要他“堂见”。这就增加了安县形势的微妙性。

杨子青回县，抓住这个时机，利用夏正寅与舅父的良好关系，马上去拜会他。夏一口答应支持，经过县行政会议议决，立刻在城医拨了栋房子，给了一笔经费，又物色了一名姓李的办事员，一名姓胡的公务员，很快就推出了县党部筹备处的牌子。

这件事办得顺利。筹备处周围聚拢了县里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教员如史鸿仪、赵槐轩、李爽亭、曾学渊、王行之、刘际唐，还有去上海求学未成的谢荣华。一伙人在场集天上街宣传，向市民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揭露县里魏道三等人宣扬的国民党右派观点，及他们与外国教士的勾搭关系。不过仅仅是造些舆论。

斗争的焦点，暂时集中在县团务干部学校。这个学校本是为驻防军培养下级干部的，1927年初开办，校址在城北城隍庙。它不收学费，除绅士们保荐的袍哥子弟外，一百多学员中大部分是贫苦青年投奔来谋生路的。夏正寅推举了本地“工专”出身的刘炳（景星）筹备。杨子青与刘在1926年冬相识，还谈得来。刘一任校长，便来邀他作政治教官。他意识到这是发展组织、掌握武装的好机会，即写信给周尚明，请派得力干部参与。上级果然重视，刘愿庵便派了高凌来任专职的政治教官，他也在学校兼课。

高凌相当精干，凡事极有主张。他来时，杨子青觉得在安县有了依靠，大事情都与他商量。团务干校有了高凌，进步倾向很快显示出来。学员的帽徽本来是赤黄蓝白黑五色组成的五角星，被认为是军阀标志，换成了橙黄色的三角形。军训和理论课程也都步入正规。这个学校的变化立即遭到城里劣绅们的反对。只是由于有夏正寅在，斗争尚没有表面化。当时，川西北的军阀，没有立即跟上“三·三一”惨案、“四·一二”政变的步伐，通过夏正寅，还在要求左派人士去中坝（江油）帮助筹备董长安司令部的政治部。夏正寅找到他和高凌，后经请示，组织上派张秋高、姚自若等党员前去。这期间，郑慕周热心地扩充汶江小学，捐资创办县图书馆。他介绍省一师的同学来校任教，并委托省一师的老师张秀熟先生开出书单，买了不少新文化书籍，主要是商务出的“万友丛书”、共学社的翻译丛书，后来又购置了李调元的《函海》、一套汉文版的藏经及旧书，使图书馆初具了规模。由于有了这点政绩，1927年年中，当原来的县教育局被控告去职后，夏正寅提出让他接任。他起初不愿做，高凌却积极赞同。他在安县教育界的好友马之祥等也鼓动他。后来，组织上也批准了，才正式接受下来。走马上任前，马之祥开玩笑地说：“准备挨‘快邮代电’啊！”这是当时控告一个人的简捷、流行的方式，意思是说，当上了局长难免会遭到各方面的攻击。

他似乎成竹在胸，把县党部筹备处周围的青年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做事。让李爽亭当教育局文牒。李是个秀才，曾在地方部队干过笔墨差事。又让唐绍周管财务，自己不沾钱财的边，甚至还拿出局长的薪水补贴李爽亭等人。他着手把故乡教育界的老朽们换下去，干得大刀阔斧。全县设的三个督学中，曾学渊、王行之两人都是青年师范生，杨子青把他们从一般的小学教员提拔上来。各乡镇的小学校长，原先不少是乡长、镇长挂名，或被一些前清有功名的人把持，这时均遭免职，换上一批年轻有为者。县立高小的校长萧伯镛是个拔贡，换上了谢荣华。连他的一位老师蒋品珊，也这样被撤掉了。这些做法引得全县的旧绅士们大哗。

而他却被自己施行的新政弄热了头脑，依仗着舅父的力量，一味地推行下去。他在教育局长半年的任上，还力主把城关东面的武庙拆掉，平整了土地，规划了县立公园。这个公园一直存留至今。

正当杨子青的周围，逐渐形成了安县的进步势力，一切似乎可以大有可为的时候，本县的右派势力，发动了监关刘炳的事件。这年秋天，夏正寅外出不在县里，豪绅罗伯卿们设下圈套，唆使团务干校的“收支”（即会计）陈南轩（萧伯镛的舅子）卷了帐簿潜逃，然后买通一个姓沈的司法，逼刘炳清算学校的帐目。但是，在查帐的前一天，突然以刘炳胡乱开支经费做木船在城南汶江供游划为罪名，将他收监。

杨子青得信后，紧急找高凌商量，认为劣绅联名上告刘炳，意在搞垮干校。现在要使他们的想法落空，应防止校长位置受控。等夏正寅返县后，在夏与郑慕周的支持下，他提出推刘巨川为代理校长，夏正寅邀集县机关法团通过了这个提议。当天下午，他便赶往黄土乡请刘巨川出山。刘与刘炳是 본家，旧制成都华西中学毕业，在郑慕周手下也做过事。同城区的土劣是素不相容的。接着，他们又提出，团务干校帐目应待陈南轩归案后清查，设法保释了刘炳。

年轻的杨子青究竟缺乏对付恶势力的经验。这次危机虽然度过，但团务干校从此不振。

第一批学员并未结业便被迫解散。高凌离开安县。是年冬，军阀倒向国民党右翼的态度明朗起来，派往中坝的人受到排挤，夏正寅调离，县长换成张琳，形势日渐严峻。

此时，他已开始在自己周围选择可以发展的党员，打算在家乡建立共产党特支。他曾考虑过的人选，在他的“文革”交代材料《我所发展的党员和入党对象》中有所记述：马之祥，秀水人。小工商户出身，家有一座油坊，自己榨，零售，也帮别人榨。他在中坝省二中毕业，考入成都“工专”，中途辍学，回家榨油，直接参加劳动。他是有名的高材生，有人要接济他读完学校，他拒绝了。我在成都读书时就听同乡谈起他。1925年左右认识，他比我大十岁，但像平辈朋友一样谈得来。舅父要办汶江小学，要我帮他找教员，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他。我去秀水聘他出来，一直教到解放后，当县教育局科长去世。我与马之祥，时局、家事都谈。谈过量变、质变、渐变、突变的哲学问题。介绍他看的书，不限于一般人看的进步书刊，还有《通俗资本论》，恩格斯的《家族和财产的起源》、《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反帝、反封、反蒋，他态度一直好，也肯钻研问题。毕竟不是青年人，我与他谈入党，他反应比别人冷静。当然是同意的，但后来没有主动提这件事。

（马之祥是你在故乡最好的朋友。他在你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位置可不简单。从你这段客观叙述中，都隐约透露出你的感情。你是个能看到朋友优长之处，而少嫉妒心的人）

袁玉章，塔水人。父亲是旧文人，当地袍哥头子，那时已死。与我1925年在成都读书时认识。他于军阀赖心辉办的军事学校出来，做过团副。袁本人是旧军官，也是袍哥大爷，旧文学基础不错，写得一笔好字，偏偏思想开朗，正派，读进步书籍。塔水属安县、彰明两县共管，我到成都来回经塔水，就在他那里住。考虑他入党是想搞武装，但未来得及与他谈。成都组织上想搞农运，选定的地点也在塔水，曾派人下来，由袁掩护。（你对这个旧军官的看法，体现了你与各种人物打交道时，观察的善意和思路的开阔。

当然，我的小说可以证明，我从小就不是生活在“单纯”的人群中的)

1928年2月16日下午，他又一次到达成都，住在郑慕周新近安在省城的家里，就在鼓楼洞子附近的高脚店。稍事安顿后，便出门去找住在不远梵音寺街上的刘尔钰，想约时间见周尚明或高凌，谈谈这几个人的入党问题。但是刘不在家。

黄昏时分，突然刘尔钰闯进郑家来找他，说刚刚发生了大事情，袁诗尧老师等十几个人，在下莲池被三军警团的向育仁杀害了！其中有五名，是他俩熟识的师友，特别有周尚明！川东的白色恐怖终于蔓延到了川西，思想上像有准备，也像没有准备，他当时受到的震动，可以想见。

(你是不是感到极度愤怒？不，主要是难过，难以抑制的悲伤压倒了我，远远超过愤怒。无法想像周尚明、袁诗尧他们已经离我而去，而且，没有了他们，我就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无所依附了)

成都不能久留，必须马上隐蔽起来。他迅即离开同志们牺牲的地方，连“二·一六”惨案的详情也是以后才知道的。据说，敌人行动前，川西特委曾分头紧急通知袁诗尧、周尚明等撤离。可他们几人都以为不以为意。袁的性格与张秀熟老师完全不同，是火辣辣的。他说：“不要怕，他向二娃（向育仁小名）敢把我怎样？”周尚明也说：“他们敢！”15日有人见到周，他还邀大家第二天去吃他栽种的油菜。他本已不在学校，唯恐自己保管的党团文件遗失，这天早晨又冒险跑回去。于是落入网中。

(解放后我到三台县一个镇上，这个地方挨近盐亭，袁是盐亭人。我问起袁诗尧，他们还知道，说袁被杀后，尸体运回故乡，群众祭奠的很多。我问是怎样死的，人们说是成都省长、军阀请他去开会，他去了，白天点个马灯。问他白天提这做什么，他说黑暗得很！这是人民知道他敢说敢当的性子，编出来的故事。——沙汀1986年11月22日讲)

“二·一六”惨案的事由是这样的：1927年底，刘文辉撤换在全省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省一中的校长、进步人士唐效实，派自己的秘书杨廷铨接任，学生“拒杨”。杨带兵进驻，学生成立“拒杨大同盟”对抗。次年2月14日，省一中开门招生，百多名学生回校要求杨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发生了冲突。杨当场误殴致死。军阀利用“杨案”，在2月16日晨突袭了旧皇城内的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和五世同堂街的四川法政学校、脚板街的志试法政专科学校以及盐道街的省立第一师范。他们按照各校国民党和青年党反动分子平时密告的黑名单，逮捕了师生一百几十人。当天下午三时多，即将袁诗尧等十四人杀害。袁诗尧当时是师大附中教务主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省一师牺牲的四名同学均为赤锋社成员，即周尚明、石邦桀、陈选、白贞瑞。这次惨案使杨子青失掉了党的关系，突然终止了他最初的政治活动。

黄玉颀：革命低潮期的罗曼史

黄玉颀轻盈地向他走来。这次是真实的。他称这时与黄的相遇为：“我

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恋爱”。他经历了政治的风云聚散，同时跌进感情的漩涡。

去年春上，李增峨在杨家碾房的新屋，生下他的第一个孩子。头胎便遇上难产。产妇长时间的呻吟使他恐惧。母亲召人做驱鬼的法事，倒真安定了他的情绪。这个折磨人的女婴被取名刚俊，生长得很是健康，但这三个人组成的小家庭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政治事变造成的心灵创伤并不能在这个家庭抚平，与李增峨无话可谈，产生不了爱的感情。

从发生“二·一六”惨案的省城回县后，他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的。就是这个月，郑慕周决定捐田一百九十五亩作为基金，将1926年办起去年正式命名的“私立汶江小学校”由初级小学扩充为完全小学。有了这么一件事，可以寄托心情，他把全部的时间放在建校和延聘教师上面。十间教室、一间成绩室、礼堂、运动场、校内园艺地，很快都兴建起来。省一师的同学杨叔宜来任校长，教员中有郑和他极器重的马之祥。全校六个班，还设了幼儿班，学生达四百余人，教员多到二十五名。学校有了相当的规模。

他与杨叔宜、马之祥为学校制定了校训：“我们要养成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我们要养成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校园上空响起了他参与制作的校歌：好哥哥，好弟弟，一块儿同学习。趁一线光明，快些向前去。前途是无量，快些向前去。愿我们向前，愿我们努力。

好姐姐，好妹妹，一块儿同学习。趁一线光明，快些向前去。前途是无量，快些向前去。愿我们向前，愿我们努力。趁小小汶江，快些向前去。

杨子青眼前出现的这条故乡之河，依然充满了生机。他那颗空虚的心，似乎充实多了。

他们设计的校徽是个五角星，代表德、智、体、美、群，中间一个圆圈嵌着“汶江”二字。

他还为学校选编了补充教材，如《志未酬》、《你何必发愁》等。这两个题目，不能不使我们对沙汀当日的思想情绪发生某种联想。汶江小学永远使他亲切，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黄玉颀。

在汶小的教员中也有玉颀的母亲黄敬之。她们惹人注目地已从灌县来到安县。黄敬之兼做郑慕周儿子的家庭教师，所以，外籍的母女两人便住在舅父家中。学校与郑宅只一墙之隔，无论在郑家或汶江小学，他都能经常看到已经长成少女的黄玉颀。

我认识黄玉春时（以后才叫玉颀），她是在培英女子小学附设的师范班读书。这个学校在安县北街昭忠祠内。她们住在郑家。她妈喊郑慕周的儿子郑志超叫“宝宝”。

黄玉春爱吃苕菜，活泼，爱唱爱跳，也爱不高兴。她是漂漂亮亮的。

有点撒娇的黄玉颀在汶江小学进进出出。她只有十五岁，却在安县这样的内地环境里催成早熟。她见到杨子青，总是大大方方的，美丽的黑且圆的眼睛，这么一轮，显然对他已产生一种威慑力量。

他什么时候对她产生异样的感觉，这是个秘密，但已经知道她并不讨厌他。他开始寻找一切机会与她接近，在郑慕周家，在汶江小学，希图多见她几回。有时会无缘由地跑到黄敬之办公的房间外边，呆立许久。当他等到黄玉颀，把燃烧的目光送上去，黄玉颀居然能迎住它，甚至大胆地回视。（关于恋人的目光和发痴的举动，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种的描写。我只想，她的

目光回答了一切。不躲闪，或躲闪前那么温存的一笑，能从中读出许多含义。但“破译”权，只授与你一人）

黄玉颀在他心中很快占据的位置，部分填补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落。

这时候，所谓总土地庙省党部，派了魏道三回安县。他虽然早已不去理这件事，但他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曾反对过的魏道三，居然接受任命，大摇大摆来接替他，并正式在北街冯官府的院子成立县党部，这简直就像莲花池左派的省党部，被另一个省党部砸毁的事件在安县重演一遍。所不同的这里是和平接管。他有舅父掩护，人身安全倒有保障。魏到任后，立即着手清党，重新登记党员。他自然不会去填表，从此与国民党断绝了任何关系。

魏道三返县，标志着安县国民党右派正式掌权，并与地方劣绅形成联合。杨子青的政敌骤然增加。魏自认为是国民党的少壮派，清党时实行“党义”测验，其情景后来被写进了他的小说《龚老法团》。那里说，连善良、颀颀的老式官僚龚春官都难逃厄运，竟死于“1928年秋天那场奇异的考试”。魏道三在他头脑里聚化成一个横行乡里的恶少形象，凡是他的作品里出现豪绅、官僚、特务等人物，魏的样子便会在眼前浮现。魏在安县盘踞时间极久，三、四十年代一直任县党部书记长。此人与郑慕周不合，只要杨子青在安县，他便作怪，现在不过是初次交锋而已。

这增长了杨子青不少“合法斗争”的经验。他长期能与各种旧势力周旋，包括四十年代在故乡隐居多年，靠的正是这一手。

大约这年春、夏间，上面派邹璧成来检查工作，在杨子青家住了一夜。邹听完他汇报高凌走后安县的情况，对工作表示不满。邹指出，要发动农民，以待举义。见他有些迟疑，还讽刺了他几句。商讨的结果是，从成都派人去袁玉章的塔水做农村工作。

到了7月，一天，有人跑到汶江校来告诉他绵竹起义失败的消息。隔一天，袁玉章来信叫他立即去塔水，说有朋友在那里等着相见。杨子青连忙风尘仆仆地赶去。一看是个白净脸皮，黄胡子，农民打扮，像个乡下教书先生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王干青。王也不认识袁玉章，显然是经邹璧成介绍，知道了这一层关系，才在武装起义失利后跑来隐蔽的。会面是在袁的一个佃客家里。王的情绪并不十分低沉。这是个传奇式人物，杨子青早有耳闻。现在当面一见，透出刚直、爽快，果然是条硬汉子。王干青资格很老，清末在“四川通省师范”读书，参加辛亥革命，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谈起刚刚失败的武装暴动，还很激动。王是起义的副总指挥，利用民团的枪支，组织了武装人员三、四百人，群众数千，成功后准备成立川西北苏维埃政权。结果却被加入起义的一个旧军官谭尊五出卖，遭到伏击。其中北路军被瓦解，王不得不把南路军遣散，只身潜伏到这里。他很敬佩王干青，两人谈了许久。

在塔水住了两天，杨子青回安县，发现城里空气紧张，到处在谈论绵竹起义。他也成了别人注意的一个目标。王干青在塔水病了一场，不久悄然离去。他再没有什么人可以联络，感到与组织完全失去关系的孤独，便跑到成都找高凌，未果。邹璧成曾安排在成都智育电影院工作的程子健与他联系，这时也不知去向。秋天，董长安路司令部，突然借口教育局长要回避本籍人氏，命他与彰明姓唐的局长互调。他立刻借机辞职，把政界的事务推卸干净。

1928年冬天，又去成都，终于找到高凌。问起工作，高笑笑说：“我现在要读书呵！”声称已与党没有关系。原来他是从“忠诚法专”休学搞革

命的，这时已经复学，读了一学期。刘愿庵也早去重庆。他十分失望，只好回县。行前，听说同班同学蓝仁辅在四圣祠医院住院，便跑去探他。才知他的家乡宜宾，也爆发了起义，失败后他大哥牺牲，他一人跑出来的。现在蓝肺病严重，经济非常拮据。于是，杨子青动员他，一起到安县汶江校养病。

蓝仁辅的经历，使他更具体地了解到革命低潮的形势。安县这时候，凡1927年上半年活跃的知识分子，已不能公开活动。他成天泡在汶江小学，交往的是自己聘来的省师同学，加上马之祥，在私下发泄不满。在这样沉重的空气下，1929年开始，他与黄玉颀的恋爱，突然大大增进。

（与黄玉颀的婚姻，我是比较满意的。在灌县认识，那时黄很小，谈不到。后来。在汶江小学关系密切了。我在街上住的时间多，在“汶江”有间屋子，也在郑家住。黄玉颀读中学，母女二人也在郑家住。我们经常见面，产生感情。黄敬之知道，她不在乎。开始瞒住母亲、舅父，有点像地下活动。李增峨已经有所发现，但没说破。——沙汀1986年12月13日讲）

（你应当住在杨家碾房新屋，却以帮办汶江小学的理由“在街上住”。你面对李增峨心里没有歉疚？我难道没有受到“五四”影响？我已经服从了母亲一次。老实说我当时已来不及去细味李的心理。如果我一定要找个万全之策，那幸福就会从我身边溜走）

与黄玉颀见面和在汶江小学管教务，代一两节课，几乎变成了同一件事。黄玉颀每天要上学，他空余时间多，把县图书馆通过自己买来的文学书籍，差不多都读了一遍。像往常一样，读书入迷。《东方杂志》刊载新译的高尔基的短篇《书》、《为了单调的缘故》，共学社译的旧俄作品，成了他与黄玉颀常常谈起的话题。他甚至为了抒发恋爱的情怀，写过一些短小的散文。它们只有一个读者，也是黄玉颀。

见面太多，黄敬之也要替他们遮掩起来。她并不因为杨子青已婚而制止这件事。这个社会交往很宽的知识女性，在安县生活得也不易。关于她母女俩的流言就很多。单是黄玉颀的，一会说她要给一个团长做小，一会说郑慕周也看上了她，要不怎么会从灌县把她们接来，她哥哥黄章甫也能当上汶江小学的教员呢？！黄敬之觉得女儿如果能与这个青年结合，倒是一条好的出路。她大概暗中还在推动这件事。

女儿正与她母亲的性格相像，也是火辣辣的，对这件事看得相当爽快。她相信杨子青许下的与她结合的诺言，很自信，很有把握。

他把与黄玉颀的秘密，告诉了密友马之祥。1929年汶江小学成立校董事会，郑慕周是董事长，他与马都是董事，在一起的时间很多。马之祥脸很大，眼睛鼓鼓的，心直口快，透出聪明幽默。奇怪的是他教育学生主张打手板，学生背后呼之为“马阎王”，又怕他，又敬他。他是很有分析力的人。杨子青向他讨主意，他告他要慎重，因牵涉到李家、郑家、杨家的各种家庭关系。他也明白这等于是对舅父、母亲的一次“大背叛”。但他告诉马之祥，自己与黄的感情已不可改变。马便说：“你的恋爱，在安县是决不可能解决的，只有远走高飞才行，以免引起大的纠纷。”郑慕周后来看出，外甥与黄玉颀的形迹不对头。开始只是警告，让他注意。后来看阻挡不住，十分不满，便讲给姐姐听了。两人都表示不许他胡来，李丰庭一家是不能得罪的。他明里不吭声，暗里照常与黄来往。事情僵在那里。这时黄敬之让女儿到成都去读高中，住在浙籍亲友、有名的房地产经纪人梁均平家。他便又往成都跑。1929年阴历二月十一日，安县的清晨是静谧的。忽听南河对面

的山边传来惊呼：“包红帕子的来了！拿刀的来啦！快跑啊！”转眼间，数百名在附近杨镇起义的红灯教徒冲到了城下。红灯教组织遍及四川农村，成员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带有浓厚的“流寇”性质。他们来到安县，城门已被保安队匆匆关上。城内驻军与保安队合起来守城，有步枪、机关枪，火力远比“红灯教”的猛烈。交战中，城外一枪将驻军姓袁的团长打伤。“红灯教”攻了一阵，看攻不进去便撤退了。

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成都。回来后，县城里还在闹闹轰轰。听县长张琳和党部魏道三一帮人放出谣言：为什么不迟不早，杨某人刚一离开县里，红灯教就跑来攻城了呢？

他通“教匪”的莫须有流言惊动了亲友，大家都建议他出外避避风头。连郑慕周也感到这一次来势汹汹，弄得不好，对方会下手加害外甥的，便提出要他再到省外去考大学。杨子青已经被马之祥的计划说服，蓝仁辅去年年末临离开安县时，也狠狠批评过他，认为他不能在故乡混日子，要设法到外面去。无论是事业前程，白色恐怖的威胁，或是克服恋爱前面的重重障碍，都促使他决定远行。他提出去上海考“中国公学”，母亲和舅父暗地里认为，这是解决黄玉颀问题的一条出路，很表赞成，哪里知道这一切计划，儿子都是与未来的妻子商量过的。

这个计划在他离川经成都时，又一次得到确认。他与黄玉颀谈了又谈，说好他在上海几年内要争取独立谋生，然后来接黄玉颀出去读书。送别时，黄玉颀哭了，娇小的身子裹在旗袍里，抽动的两肩更显得娇弱无力。这次分别的时间要长了，将来的日子会怎样呢？他再三地让她放心，相信自己会在上海立住脚，她也一定要在成都等着他。两人信誓旦旦，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这一回，他再走东大路出川，心里装满的是黄玉颀娇美的纤细的身影。

上海的亭子间，是产生左翼作家的温床。一个人的潜在能力，遇到一种机会被发掘出来，真是幸运。你就是一个。

我怀念德恩里。它能够这样靠近景云里和横浜桥，更是一种偶然。牢牢把握住命运，选定属于自己的事业，我便是一个。

闸北小屋

1929年夏，他一身土气来到十里洋场。

从安县出发，结伴同行的还有刘、谢两家的子弟：刘佑炳、谢荣华。动身前亲友为他饯行，清末出过川的长辈在席间一再提示，到宜昌换湖北佬的船要当心，提防摸上条黑船，说得活龙活现的。他们路过重庆时，正值樱花怒放，煞是好看。搭上华商的平安轮，驶到万县，没有碰到江盗，却遇上了兵。船被抓了军差，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旅客全部赶上岸，要等到运兵折返后才能继续航行。

在万县候船竟候了一个多月。有机会见到省师同班的蒋世询。蒋在部队上做了一段事，染上了恶习，失业后异常颓唐。杨子青待人一向是极重情谊的，便力劝他摆脱旧的生活，答应出路费送他出门，投考外省免费的学校。

所以等再上船的时候，就多了个伙伴。

抵达上海，先住一夜旅馆。次日，便由宏县同乡萧崇素安排暂租了法租界菜市路天祥里的一间前楼。大家挤在—道，每个人忙着投考学校的事。他曾跑到吴淞探问“中国公学”招考的情况，也问过一些私立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都感觉缺乏兴趣，没有报名。

同行的人散了，他—人独住。常去看望萧崇素。萧家在安县原是大户，杨家老房子卖给萧伯庸，这个买主便是萧崇素的伯父。萧六岁便离开安昌镇，上海大夏大学毕业，这时刚从日本回国，在一些副刊上写东西，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他们初次见面，萧对上海的进步文化界自然较为熟悉，介绍了一些情况。萧住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 南国艺术学院的对面，本想介绍他到这个好客的田汉办的学校去读书，可学校因拖欠水、电、房钱，最近被贴上封条关闭了。对面还住着葛乔，是省师低两班的同学。在校并不熟，但彼此的政治面貌是知道的。葛乔跑来看“杨二哥”，接着就把任白戈、王义林都拖了来。任白戈，矮矮胖胖，大家喊他“任胖子”，非常健谈，见人特别亲热。任、王过去是重庆中法大学校长吴玉章、教务长杨伯凯的学生。这些人清—色是四川南充老乡，“三·三一”、“二·—六”惨案后，相继逃亡出来的。任在成都与周尚明—起，负责过团的工作。他是刘愿庵下级，刘到莫斯科开中共六大，任听他传达过。也认识袁诗尧。所以，—谈起这些共同的熟人，大家不仅在异地是同乡，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同志”感。

杨子青刚到陌生的上海，觉得这是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为什么—座学校可以“招顶”卖掉？为什么男女脱离姘头关系还在大报上堂而皇之地登载“启事”？为什么走在街上一碰见巡捕“抄靶子”，就得高高举起手来？从安县到上海，文化、风俗的落差之大，外乡人对大城市的陌生，使他的由山地养成的心自然缩拢。现在他找到了这样—个四川圈子，虽然谁也绝口不谈过去的组织关系，但心里觉得踏实不少。

任白戈对他尤其热情。任和他的老师杨伯凯—道，在招商公学教书，几次单独跑来看他，—谈就是半天。任说：“不要考什么学校了，就自学嘛！”他说葛乔、王义林就准备自学日文，研究哲学、经济学。杨子青—心想好好地研读社会科学，被任这么—鼓动，在北京下过的自学决心就又“复活”了。

其时，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青年，纷纷从第—线退下来，隐藏在上海。

—部分住在法租界，因这里不像英界巡捕房，动不动就搞“引渡”。更多的是聚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带地方。这里除了“两不管”，安全，容易找到厢房、亭子间等低廉住屋外，附近宝山路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借书方便，很吸引杨子青这样—类的自学青年。不久，他与萧崇素—块迁入的闸北德恩里十三号，正是属于这样—种地段。

过北四川路的横浜桥，向西北拐进窄小的荣桂路，踏着碎石铺的路面，走到与东横浜路、横浜路交界的三叉路口上，便是德恩里了。—些三排石库门改造的房子，十三号在中间—排。租给他们房的二房东，是个做西服的中国裁缝，老婆是个日本人。所以，常有日本和尚敲起羊皮鼓，到门前来化缘。

萧崇素住十二号的二楼前楼，杨子青住后楼。按照上海人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习惯，平时走的都是后门。与后门相邻的第—排房子，便住着周扬

(起应) 周立波(绍仪) 赵铭彝三位。萧崇素正从事左翼戏剧活动,认识赵铭彝,经赵认识了周扬、立波。周立波在上海劳动大学读书,自学英语。他们正在一块搞摩登社,比较熟了。杨子青在弄堂里碰到二周,周扬身着西服,长长的脸,漂漂亮亮的,与任白戈很相像的一点是,都喜欢主动与人接近。萧从中一介绍,彼此就认识了。不过起初,他觉得这几个文化人的谈吐很有优越感,未便主动接近。

沙汀给我的印象是面目严肃,不讲究穿戴。川北人都朴素,被人称为“苕哥儿”,意思是吃红苕的,土。川北人在中国人当中好比北欧人,苦寒、耐劳,做学问、做人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为人仁义,肯帮忙,但不主动交往人,深居简出,戴个博士帽,着灰色爱国布长衫。他那时关在屋子里读契诃夫,读迷了,一个人又拍桌子,又笑,被周扬看见,很有趣地告诉我。这“又拍桌子,又笑”,说的便是杨子青独自学习的情景。比起在省一师或汶江小学时期的读书,德恩里的自学,是他一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段集中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他仍然关心着“我们民族底悲苦的命数”。与任白戈他们商量着办书店、翻译革命理论书籍。

但白色恐怖使他与实际活动隔绝,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这大的苦闷使他一头栽到文学里面。这时,正是蒋光慈的革命文学时代。普罗作品不会不吸引他,但他主要还是读左翼提倡的俄国和欧洲经典作家的中译本。

他没日没夜地读,如他形容的,“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简直像耗子一样。这甚至养成我现在喜欢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习惯”。

(我总在捕捉你的文学才能。有许多作家是以浪漫的喷发力,和随时随地发挥自己的想象,使人感到他们的才华横溢。现在我从你这句“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自白里,一下子领悟到你的气质,你的内在的玄想能力)

在他想象中,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梅里美、莫泊桑、芥川龙之介、契诃夫等的人物就活在他的小屋里。他深爱普希金的《甲毕丹之女》(赵诚之译,即后来孙用译的《上尉的女儿》),能用简洁的笔触,突出普加乔夫的性格特色。梅里美的《嘉尔曼》、《西班牙通信》、芥川的《鼻子》、《罗森门》,用冷峻的笔调刻画富有传奇性的情节和独特的人物心理,使他读的时候,心都战栗起来。他为果戈理《外套》那种冷静的不动声色的讽谕所震惊。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则令他着了迷。《苦恼》、《凡卡》真不知读了多少遍。凡卡把向爷爷诉说自己当学徒之苦的信,未写清名址便投入信箱的细节,沉重得叫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房里站着《复活》里的涅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仿佛看见他俩在流放监狱里的最后一次见面。两人的矛盾心情,隐秘感情的动荡起伏,被老托尔斯泰表现得毛发毕现!这个章节他读得爱不释手,几乎都能复诵下来了。

(你总提《复活》的结尾。玛丝洛娃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不是使你想到张君培、周尚明,甚至想到自己与黄玉颀?隔离,使我对玉颀的爱恋更加狂热,更加充满想象。这对我投入感情的阅读或许有关,但你能把政治、婚恋全搅在一起)

当左翼文学三十年代初期不断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同路人作家皮涅克、伊万诺夫和巴伯尔的作品时,杨子青一篇一篇都找来读了。像巴伯尔的《信》、《盐》,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伊万诺夫的名著《铁甲列

车》，表现革命的传奇性质，采用冷峻的跳荡的印象式手法，突出宏大的场面，以及像雕塑一样刻写群像的新鲜表现方式，使他眩目。在中国文学中，他从未见过这种写法，它们这样牢牢地抓住了他，以至日后成了他最早一批小说的“模式”。

后来流行的才是高尔基、法捷耶夫。不管是哪一类，他觉得这些十九世纪到本世纪初的苏俄文学作品，最对他的脾味。他只注意他感兴趣的，符合他个性的。莫泊桑、福楼拜的小说他读得不少，但并不篇篇喜欢，印象也浅。而对于他钟情的篇章，他会一读再读。精神萎顿了，思想沉闷了，想象力滞涩了，他都会把《猎人笔记》、《复活》、《五月之夜》、《甲毕丹之女》，重新拿起来读它一章。

对于鲁迅、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对于沈从文初期的小说，他也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们客观的白描写法，为人生的严肃态度，对闭塞农村逼真的、传奇性的风俗描摹，心领神会。鲁迅的《故乡》、《孔乙己》、《离婚》，从省师到现在，真是百读不厌。他像一台只知深掘的钻探机，一生保持盯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笨重”山里人的习惯。

在这样狂热的阅读中，想要像这些文学大师们一样来表现社会、表现自身的愿望自然抬头了。他只是还有怀疑，不相信自己有创作的才能。他迟迟没有动笔，在等待着。在参加辛垦书店的筹备过程中，他还在想搞社会科学。一本辩证法小册子的写作，连提纲都已拟定好了，只是觉得自己外文程度不够，参考书看得少，才不情愿地放下。

经由葛乔他们的介绍，他还到北四川路羹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去旁听夏衍的“戏剧概论”课，听郑伯奇、陈望道、冯乃超的课。这个学校校长是陈望道，教务长是汪馥泉，实际上是党的学校。“左联”在这个学校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第七日，即这一年的3月9日，杨子青在这里听过鲁迅先生的讲演。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久久敬爱的导师，一位他的思想的引导者。鲁迅先生站在讲坛上，瘦小的，也是巨大的。清瘦的目光在他面前掠过。他在上海已经变得拘谨，他没有借这个机会和鲁迅接近，自动保持了对他敬重的距离。

这一年的5月，他被萧崇素和他的戏剧界朋友拉着去看了著名辛酉剧社演出的《文舅舅》（朱湘译本，即《万尼亚舅舅》）。这出戏的置景、服装、道具都极为讲究，剧场的气氛也很热烈，但场中的杨子青突然感到被契诃夫引到一个无人之境，周围却是沙漠，一切音响都被隔离，他被一种思想深深刺痛了！剧中对俄国当时窒息一切美好事物的环境的剖析，引起他的共鸣，使他清醒地估价自己的处境，和自己为改变处境所做的努力。这样目的不明的自学，应当结束了。应当拿起笔，像契诃夫那样地写作。中外作家在他心中播下的文学种子，在德恩里周围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急于要萌发出土了。

THINKING——辛垦

1929年冬，葛乔、王义林等几个人，搬到闸北大兴坊十一号，来

过自修生活。这里紧邻着与中国现代文学至关紧要的景云里——鲁迅、茅盾、叶圣陶、周建人等都在这里居住过。景云里离德恩里又只有一百米左右，走完横浜路便是了。彼此挨得这么近，年轻人便常来常往。任白戈差不多逢星期日就来探望大家，还是那么热热乎乎。看电影总是他请客，不过只能看二、三轮的“两毛电影”，比如卓别麟的老片子。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讨论起办书店的事来了。

在杨子青眼里，这几个同乡都是有组织关系的。在法界住的时候，他们安葬过白戈的堂弟任光俊，一位牺牲在提篮桥监狱的青年共产党人。每逢重大政治节日，葛、王的住处总有一叠叠的油印宣传品。不过他们的态度有些怪，常说：“有什么用哇！”“还是把书店搞起来，多出几本好书吧。”他们经常出门参加飞行集会，谈起话来不大避讳他。当着他的面，他们谈李初梨、彭康，谈“中华艺术大学”，谈与夏衍开会，考虑去苏北搞武装斗争的事，阅读一张张秘密发行的《上海报》，但从来没人与他谈党的关系问题。

葛乔人小办法多。他熟悉这时候在上海突然冒出的许多同人性质的书店，什么大江书铺、南强书局等等，他们都出青年读者喜读的社会科学书籍。杨子青读过林伯修（林国库）译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便是这样的书店出的，觉得收获不浅。其他如陈启修、李达，都各自在组织书店或成为一家书店的主要撰稿人。这是革命者在文化、理论战线上的重新聚合，所以，有人一提出办这种书店，大家自然赞成。

经过几次商议，书店的事大体确定。店名“辛垦”由葛乔提出，取 *Thinking* 英语“思想”一词的译者，兼有中文“辛勤开垦”的意义。杨子青对出马列理论译著，竭诚拥护。这一段时间与黄玉颀频繁的书信来往，恋情更浓，要违背家庭的意愿，毅然把心爱的人接出四川，必须做好家里随时切断经济来源的准备。所以，不能早一日谋生，便不能早一日实现爱情。他对办书店寄托了几重的希望。在考虑书店资本时，他主动提出认股一千元，答应先拿出五百元，其余以后凑齐，还表示愿意向亲友募集几千元的股份。五百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几乎是他携带出来的大部分生活费用。事情有了这样的眉目，几个人便一起去招商公学找杨伯凯最后议定了。

杨伯凯是这伙人的师辈。他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这时已是中年，显得老练成熟。

“三·三一”惨案后他流亡到武汉，“宁汉合流”又把他迫到上海。他不大参加飞行集合，对盲动主义很反感。杨子青与他熟识后，曾听他议论过大革命时的武汉：“好不容易组织起武装纠察队，说是准备起义，结果规规矩矩缴了枪。”他谈起成都大学一个姓王的职员，留法的，说：“才他妈几条枪也搞暴动，把腿杆搞跛了！”他给杨子青的印象不坏，只是有时觉得他未免神态严肃，不好一下子接近。

杨伯凯听了葛乔介绍筹办书店的情况后，立即表示赞同。杨伯凯约了也在“招商”教书的陈子中（共产党员）入股。他一再鼓励大家学日文，钻研理论。这也是当时一个风气，因苏联的东西从日本介绍比欧美快，可以转译。随后他又两次跑到横浜路来，与大家商定书店的资金、店址、出版计划。杨、任、陈教书稍有收入，各认了二、三百元，葛、王没有现金，只能用将来的版税入股。杨子青认股最多，被推为董事长。第一批书目里，杨伯凯准备由法文转译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后由刘初鸣译），任白戈提出由日文译《伊里奇的辩证法》，葛要从日文译苏联沃尔加编

著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杨子青英语水平一般，日语初学，自认是个半吊子，同意勉力与王助葛翻译。

杨伯凯也是个说干就干的脾气。葛乔更是活跃，他作经理，总揽一切，张罗租房，办家具，与印刷厂、纸商打交道。五个人又是发起人，又是伙计，便干起来了。

不久，为了方便、省钱，杨子青与萧崇素索性搬到大兴坊十一号去住。这是个二层楼，萧住一间不大规则的三角形偏楼，搞他的戏剧。摩登社发起学校剧运动及“南通公演”，在这里排过《皇帝与乞丐》、《到明天》等剧目。他与葛、王一群人住在前楼，每天学外语，写作，忙着编译要出版的书籍。萧崇素旁观过这个集体的生活常态：他们七个人轮流弄饭。这间房既是他们的寝室、书房，也是他们的厨房。一间房虽然挤了七个人，却随时都寂静无声，除弄饭的煤油炉的“呼、呼”声外，就只有低语声、翻书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飒飒”声了。

四川人办的辛垦书店，就设在北四川路北四川里，可能是个巧合。租的是楼下前后客堂。杨伯凯为了筹集股金，有利著述，年底赴成都大学任教。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张表方）是他南充中学时代的老师。杨子青写不成辩证法的小册子，他可能恍然明白，对社会科学的爱好，是自己由政治探索时代的一种表现，并不能成为终生事业。现在，允许搞社会科学了，反把自己并不适于做理论思维的这一点暴露。结果，他给辛垦编的唯一的一本书，竟然不是社会科学，而是文学。

这起源于《摩登》月刊上周扬译的一篇美国左翼作家的小说。他看到后，便去拉他搞了本《果尔德小说集》。周扬对于日常生活和金钱上的事随随便便，辛垦对文学并无兴趣，但草创时期的拮据，使它接受了不计稿酬的周扬译本。这是两人最初的文学合作。

到了1930年初，预定的第一批书都在大兴坊的小屋里编成出版。杨伯凯到暑假回沪接家眷，提出青锋来辛垦的问题。青锋是杨的同乡，在法国留学时相识，这个时候在成都大学，作张澜秘书，编《科学思想》杂志，用青锋的笔名发表文章。任白戈几人一听便不同意，杨子青这才知道青锋就是叛徒任卓宣，也表示反对。杨伯凯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几个年轻的发起人，才以青锋来辛垦，不作股东，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只能为书店翻译理论书籍为条件，勉强答应了。

青锋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这个人块头不大，面色苍白，说话流畅，带煽动性。那天大家留他用午饭，他对吃食问东问西，临走时硬要付钱，并找补零头。

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

看看书店走上了轨道，书源问题不大，杨子青决定接黄玉颀出来，并

回家筹集承诺的那一部分股款。这年夏天，他启程回川。在成都与黄玉颀见面后，商定了出川的计划。他又去见杨伯凯，知道这半年募股的情况不佳，只有叶青的总角之交南充人何伯庄，向车耀先募来五百元。杨带他去见过车耀先，车住在祠堂街，一面开“努力餐”，还同别人合伙办了个“我们的书店”。这是个很有趣的人。他曾经是基督教徒，在川军当兵，从丘八升到团长。

打伤了一只脚，人称“车口止拜子”。他开餐馆，夫妻俩都上灶，平民作风，一点没有架子，这时大约已经入党。

尽管募款不理想，杨伯凯并不悲观。他寄希望于四川将领中以亲共著名的陈静珊。陈的防区在离成都不远的广汉、新都一带，这时本人正好在成都。杨伯凯便与杨子青一起，到位于现在四川省广播电台的陈寓去拜望他。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使用辛垦书店董事长的身份从事活动。他向陈谈了书店的出版计划，已出的书，募集股金的主要对象等。当说出也要向自己的舅父郑慕周募股时，陈笑着说：“他能出多少股呢？”杨子青觉得不快，但总算没有随意发作。接下来，陈轻松地表示会全力支持书店，要他们给他一个书面计划，包括需要多少资金，大有倾囊相助的意思。会面结束后，杨伯凯兴奋不已，不住地对他说，“看来大有希望，大有希望。”

杨子青随后便回安县。没想到家里是一副冷面孔。郑慕周根本就反对他在外面办书店的想法，也猜出他要把李家婚姻永远“搁置”的用意。为了断他的生路，不仅自己不入股，还与所有的亲朋好友打了招呼，一致抵制。家里呆不下去了。母亲与李增峨装出的笑脸，也叫他心里很不好受。怀着失败的但也是义无反顾的心情，他很快又踏上了离乡的路。

陈静珊的话，客观上不幸言中。他十分懊丧。只是再到成都时见到夏正寅，却意外募到二、三百元的股金。夏的友谊在这时候的出现，使他欣慰。因为至少，他可以凑成第二个五百元，不会被朋友们笑话了。在成都与杨伯凯又见过两三次，杨对他的失败满不在乎。据说，陈静珊看了计划后已答应做股东了。

杨伯凯本来与他约好一起离开成都。杨去南充过年，杨子青去重庆，都要经过遂宁，这一段路可以同行。但是黄玉颀这时已经放了寒假，中断学业离校后没有相宜的地方可住，两人便提前两天动身，想在遂宁早几天搭上去合川的长途汽车。旅途仍然是那么艰难，但已不令人生畏。实际上，从两人在遂宁住进当地最好的旅馆起，他们的新生活便开始了。好像故意要多多留住那晕人的幸福似的，直到杨伯凯与一个成都大学职员也赶到了遂宁，开够了他俩的玩笑，并且前往南充以后，这一对“新人”还滞留在遂宁等车呢。

16 “沙汀”这样诞生与黄玉颀到了上海，他与大兴坊的“男宿舍”生活彻底告别。

先是住在菜市路天祥里。又和玉颀躲开人们，到杭州西湖度蜜月，住在“曲院风荷”隔壁的“汪社”。他们迷醉在湖光山色之中，每日在西湖上荡舟，小小游艇上的各色船女，都有乡村气味很浓的名字。其中一个叫乌花姐的，后来被他用在《一个绅士的快乐》的女主人公身上。一个月过得飞快，回沪后又一次搬进了德恩里十三号，不过这次住的是二楼的前楼。

（你想，你还能忘记德恩里吗？不必打趣，我怀念德恩里，应当包括黄玉颀、周扬、周立波、任白戈、艾芜……）

在德恩里建立的小家庭是很简单的。黄玉颀起初还想读书，进了“美

专”。他还是一边自学，一边参与辛垦书店事务。杨伯凯给葛乔汇来陈静珊的股金，有两千元，还说可陆续再汇。成都车耀先的“我们的书店”，合川的一家书店，都代销辛垦的书籍。只有南充一个姓廖的青年做葛乔的助手，有时包书、跑邮局，弄不过来，他便跑去帮忙。

辛垦的事业好像很有前途，不久，杨伯凯结束教务，携全家返回上海。他带来成都大学的学生刘元圃、谭辅之，并宣布了一个由书店提供生活费用，来培养一批青年理论翻译者的计划。说陈静珊支持这个办法，愿意出钱。从推荐叶青，到这次未经商议便引进新成员的做法，激起了杨与原来四个发起人之间的矛盾。后来叶青与杨伯凯又提出办理论杂志《二十世纪》，争论更为激烈。但最终还是办了，他还被说服着，用“杨朝熙”的名字，充当了刊物发行人。《二十世纪》的出版，引起了文化、思想界的注意，叶青批判胡适的文章的发表，影响更大。名教授邓初民来过“辛垦”，希望能在他们学校代售这本刊物。周扬转达以讲尼采的唯意志论闻名的李石岑想见叶青的意向。据周扬说，李已开始倾向唯物论，应当用叶青的一套去影响他。为此，他曾与叶青、周扬一起去过李宅。

可是书店立脚刚稳，杨伯凯便以葛乔应专事译述为名，将叶青的同窗、南充一中的教员张慕韩弄来当经理。这引起书店内部的轩然大波。葛、王退出书店。杨子青也感到杨把他们甩在一边，反正他的兴趣已从这个文化事业，渐渐转到文学上来，与书店的关系便一天天淡薄下去。

他在上海的朋友本来不多，葛乔去了北京，王义林离开大兴坊，新识的周扬又从德恩里搬走，时常与他们夫妇来往的只余下还在教书的任白戈。老年的杨子青现在谈起这个老朋友，也是充满了感情。

（任白戈死，周立波死，我哭得最伤心。记得黄玉颀第一次怀孕不愿要小孩，在老靶子路一个姓沈的医生处打胎，身体很虚弱。我天天看护她，几乎要拖垮了。白戈知道后，便在学校请假，把一切事情放下，帮我轮流看护。德恩里房东日本老太太都夸奖白戈。白戈为人随便，他在我家出入时间长了，有时叫他帮着去买东西，他起身就走。我们看他穿了出门的衣服，迟疑了，说买的是豆腐，他说，买就买，照样西装笔挺地捧着豆腐回来，豁达得很。白戈与我同时退出辛垦后，便去山东教书了。他后来也加入“左联”，做过许多工作。

——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但任白戈不大谈文学。正在理论和创作的交界线上徘徊的杨子青，在等待一个时机。条件成熟后一切在于一个触发的媒介。1931年4月，在上海的马路上于千万人中竟然与阔别六年汤道耕相遇，便成了这样一个燃点！

这是《文艺新闻》周刊刚刚披露“左联”五位成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秘密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惊人消息不久。这一天，子青陪着因病已经停学的妻子，从老靶子路宽仁医院回来。在北四川路的横浜桥上，一头撞上独行的老朋友。他觉得汤道耕简直是从天而降的。汤道耕看着杨子青和他身边的这个小女人，也呆住了。他连忙将汤拖到不远的德恩里家中。刚巧任白戈来访，互相介绍后，这才知道汤道耕是刚从南洋回国，住在宝山县泗塘桥一位农民家里，是一位在劳动大学农学院学习的云南青年王秉心介绍的。他热切地邀汤道耕搬来同住。他几乎立刻意识到，这对于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万分必要的。几个月后，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泰

晤士报》的英国记者在外滩竖起写着“日本人占领沈阳”的大牌子。入冬，汤道耕搬到德恩里十三号的亭子间，与他们夫妇为邻。安顿好后，老同学详细细谈起他从云南到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的飘泊生活。他的经历带着浪漫的热带气息，六年里做过杂役、店小二、家庭教员、仆人、编辑。在仰光病倒，为川籍和尚谢无量先生的三弟万慧法师收留，煮饭打杂，还搞社会活动。因与“马共”发生联系，被驱逐回国。在厦门逗留时，想进入苏区不成，这才来沪。这些以后被一一写进《南行记》美丽篇章里的故事，让杨子青夫妇听入迷了。那时，他（指杨子青——笔者）虽然尚未动笔创作，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艺。并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当我已经倦了，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一面伸出手来，摇动着我的膝头，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谈论下去。

半个世纪以来，这两个朋友回忆起共同的文学发端，一个说是那一个启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另一个说是这一个鼓励了他的写作决心。这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杨子青已经很长时间朝夕沉浸于文学。这年初，还偷着试笔。现在遇到这样的挚友，越是用劲地说服别人，便越是在催促自己的文学新生，两者是合而为一的。

汤道耕身边这时连一本书也没有。自修写作的生活开始以后，便借了他五、六本赵景深译的契诃夫小说看，借李青崖译的莫泊桑小说看。耿济之译的屠格涅夫《猎人日记》（即《猎人笔记》），省一师时期正在《小说月报》连载，是杨子青一本本买来撕下装订成书，两人一起读的，现在又来一起讨论。他们还谈《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夫人生孩子一节，气氛写得如何之好。汤道耕觉得中国小说似不必着急看，杨子青却比较宽广，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沈从文的《灯》，都找来读过。他在构思小说，对创造社的偏爱情绪已经消退。

这样，两人天天聚在一道，晚上读书，白天埋在屋里往纸上涂抹。汤的《太原船上》，他的《俄国煤油》、《风波》等小说，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差不多每个作家的第一篇小说都带有自叙的色彩。他一构思《俄国煤油》，在描写他“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的时候，便加进了自己困居上海的种种感受：租界和华界的区别，亭子间或几人合住一个前楼的狭窄，二房东的奇怪职业和脸色，晨起弄堂里马桶成列的臭气，打汽煤油炉子的麻烦，在繁华马路上容易迷路，或走路不看脚下，以至常常踩了别人，招来詈骂的窘态，都是他这一年多亲身体验到的。这一段生活给他带来的阴暗心理，与他读过的外国心理小说汇成了一片。

此外，还有整个“左联”初期普罗文学对他的影响，使他在一个琐屑的故事里企图渗入重大的政治意向：有意要反映群众在中苏建交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看法。他知道，对于这种知识青年的灰色情绪应抱批评的态度。可自己不也是这样的青年么？一种讽刺与自责混合的情绪在笔底自然流露出来。一个做着白日梦的罗模便在德恩里小屋，经过白日梦一样的冥思苦想产生了。

（多少年以后，有些很有特色的作家，批评你的文学是“客观主义”。

他们如果知道你的处女作是这个样子，该怎样说呢？从我的道路来看，直露地抒写，像发泄自己情绪一样地写小说，是我的幼稚期，然后进入咀嚼生活、咀嚼情绪，再写出的时期）

写好《俄国煤油》，与流行的小说一比，他感到迷惑。这样一个罗模能有积极意义吗？如果写下层，他想起了家乡的生活。这太熟悉了，一条新公路的建设，会带来老百姓各种各样的惊恐，特别是推鸡公车（独轮车）苦力的惊恐，这是个很好的普罗主题。他想起鲁迅的《风波》，一条辫子引起的故事。想起读过的外国小说，用一件事来展示各种人物反应的技巧。一些片断在脑中闪过，他急忙捉笔，写了“几段乡村生活纪实”，拟题目时干脆写上了《风波》两个字。

随着第一批小说的写出和反复讨论，他与他的伙伴的忧虑加深了。汤道耕写的虽然是下层劳动人民，但与这时“左联”提倡直接反映现时代大潮流的作品仍有距离。他们没有能力写都市的集会、罢工，也没有写农村的反抗、起义，这能有价值吗？他们要从事的是左翼的文学，但稍一实践便感到其中的矛盾性，起码在“写什么”这个问题上感觉无所适从。

讨论中，汤道耕问起了“五四”时代便景仰的鲁迅先生。他在缅甸时，鲁迅正同创造社笔战，南洋的进步文化刊物是上海地下党的人在那里开辟的，他们都赞成创造社，认为鲁迅“落伍”了。现在一问起来，他即告诉：鲁迅就住在附近的景云里，先生到上海后发表的杂文仍有巨大的影响。这样，两人决定共同向鲁迅先生请教他们心中的疑问。费了不少的踌躇，由汤道耕执笔起草了一封信。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现在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

对于人物刻画的方法，提出这样的疑问：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画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

信的内容和语气都耐人寻味。两人都还不是“左联”成员，还没有真正发表过作品，了解文艺主要是靠读出版物。他们不是没有看法，在文艺见解上，他们已经十分接近鲁迅，但仍需要通过别人来证实自己。他们不知道鲁迅所住景云里具体门牌号数，便把信寄到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他弟弟周建人先生处转。发了信心里很紧张，怕先生没有时间与陌生人打交道，在不断的盼望和各种推测想象中，谁知很快便收到先生12月8日的简信，说他正在生病，允诺病愈后再来详复。12月28日，鲁迅果然写来了一封相当长的信，这就是那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回答两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都还有存在的意义。……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复信内容的丰富，很难使两个当时的年轻人全部领会，但他们受到了回信这个事实本身的鼓舞。转过年来来的1月初，由杨子青执笔又写了一信，

并附上《太原船上》、《俄国煤油》的小说稿，向鲁迅再次请教。1月5日，鲁迅收到信，10日便写了复信。这次是先生与许广平一起把信与稿子送到德恩里十三号的。他恰好不在，由汤道耕出来收下。但是汤太粗心了，以为送信稿的必是周建人先生。鲁迅夫妇也不予说破，匆忙走了。汤道耕从此就再没有见到鲁迅先生的机会了。这封信据回忆，对《太原船上》颇为肯定，认为写得朴素、亲切，对《俄国煤油》则下了“顾影自怜，有废名气”的评语。（这够叫人灰心的。如果你不是选了《俄国煤油》，而是选了《风波》送去，情况会怎样？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可以做假设性的思考，但历史不可挽回。《俄国煤油》刻写人物的技巧稍好些，也更像是一篇小说，我只能选择它。另外，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批评，怎么会有《法律外的航线》这一组作品的产生呢？）

废名的乡村小说他是读过的。“顾影自怜”的毛病大概出在描写小资产阶级身上吧。他想得比较简单，把鲁迅信中说的主要看“作者所站的立场”，不是看写什么题材的重要思想忽略了。他决定不发表这篇稿子，并放弃一连串描写知识分子的计划。另一位显然比他受的鼓励大，把新写的《伙伴》勇敢地投到了玲主持的《北斗》杂志，并因此参加“北斗”读者座谈会，与“左联”先一步发生了关系。

艾芜的《伙伴》还未及发表，“一·二八”战事爆发。闸北正在交战地带，他们夫妇与艾芜在德恩里楼上蹲了大半夜，只听子弹、炮弹在头顶上乱飞。天放亮后，伸出头去一看，在横浜桥一带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虹口那面更不必说，每条巷道都有哨兵把守。他们等于是住在火线上，困住了。邻居四川老乡的女婿，即《我“做广告的”表兄的信》的原型（此人实际在福建某县做县党部宣传部长，却很幽默，说自己是“做广告的”），出去探路，反被日本兵抓去，更增加了四周的恐怖。这时，任白戈突然一人奇迹般出现了。

白戈是从法租界专门跑来接他们的。他满不在乎，朗朗地说：“既然我能进来，你们就能跟着我出去！”四个人，白戈走在最前面。亏得他那么熟悉，挑着各种大小的街巷兜来转去，有几次一直撞到了日本兵的刺刀尖下面，把黄玉颀吓坏，连叫：“蕘凡！我们不要走了，太危险了！”蕘凡是白戈的原名。他不灰心，也不说话，领着他们退回来，再找别的路去转。终于被他寻到日兵守卫的空隙，绕过两道岗哨，领出北四川路，逃到法租界吕班路杨伯凯为“辛垦”同事们专租的一间大房子里避难。

这房间是一个前楼，先前已有刘元圃、丁跃诗等逃来，加在一起有十八人挤在一块，办大伙食，吃大锅饭。晚上在地板上睡觉，各自形成自己的角落，还可以互相搭话。战事还在进行，民心也很沸腾，朋友成了难友，比起平时不知要亲热了多少。每天早晨照例抢报看，一张报传来传去。饭后，这些人会跑到北四川路桥的南畔，远眺苏州河北的连天烽火和日本兵的活动。每个人都想自己的心事，久久徘徊、观望。日本一个大将被刺的那个晚上，法租界各条马路都聚集了中国人。他们也像市民一样，去狂欢，去跳，去喊。《北斗》编辑部大概讨论了艾芜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引起一片赞扬。逃难期间，叶以群（那时叫华蒂）曾来吕班路约艾芜谈话，后来还经常约他去开会，大概艾芜不久便加入了“左联”。伙伴的进步给他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所以，“淞沪战争”一结束，杨伯凯好意地建议他们夫妇住在他那里，好就近商量书店的事，给他创造研究理论的条件，却被婉言谢绝了。他要搞

文学，不是搞理论。搬回战后的德恩里住了一阵，夫妇俩便又一次动身去杭州，仍然住在“汪社”。他一头埋下去创作。当秋天降临，果实熟了，他在杭州写下六、七篇短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二批产儿。他果然不写知识分子，而写起了革命的、下层的和抗日的题材。

1932年4月，写《恐怖》。

《恐怖》是写广汉兵变的。1930年10月25日，距成都四十公里的广汉县驻军陈静珊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之一部发生武装起义。军阀们大起恐慌，便进行“清共”大屠杀。

事件发生时，他刚为募款并接黄玉颀从四川回上海，消息传来，成都戒严，部队连夜包围学校，次晨集中学生点名，被叫出的站在一边，就地枪决，每个尸体贴上一张书有“共产党”字样的白纸条，……这些，他都真实地写进了这篇小说。小说没有单独的人物，只有隐约的事件和浓厚的气氛渲染。细节是省一师的，以一个普通青年学生的角度来感受白色“恐怖”。水车的声音也是真实的，这是成都老自来水厂设在百花潭外面的河道里的机械，它上面的巨大竹筒在倾倒水时发出的声响，夜里特别清晰，这是他学生时代非常熟悉的。外国小说教他学会利用它来烘托人们的心理，又有某种隐喻的作用。写大事件却不写大事件本身，而是写侧面，写影响所及，写影响到各阶层，也影响到“我”。所以写来笔法自由，情绪饱满。曹荻秋参加过广汉起义，这是解放后曹任重庆市长时谈起来才知道的。曹当时在广汉一所学校教书，到了兵变发动的预定时间，是他敲钟发出信号。所以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沙汀为了纪念他，在重版《祖父的故事》时，特意增补了这篇。

也是这年4月，写了《码头上》。

上海流浪儿童的生活是他亲眼看到的。他们在这个大都市显得人数众多，白天行乞，捡破烂，夜晚东赶西跑地找地方睡觉。苏区红军的新闻，常被小报童们叫卖时当作招引买主的口号，他在上海街上听惯了的，使他在这篇故事的末尾想出流浪儿童向往苏区的情节。对这些，他知道得太少，这个光明尾巴和全作品的概念化，是很明显的。也没有中心人物。

8月，写《法律外的航线》。

他几次出川、回川都乘船，经过贺龙活动的那一带苏区。船上过往客商，散兵游勇，多数乘统舱，大家摆龙门阵，东一句西一句，谈船舷两边地方上的情况。外轮“怡和”、“太古”都是英国人的，水兵架机枪防备红军，靠岸后尽速地离岸，所以称为“法律外的航线”。写这篇小说，有生活感觉，同其他几篇按报上材料加进体验的写法不同。当然有虚构，如查票后将买黄牛票的乘客抛进江中，他并没有见过。此篇像是一个个镜头对接而成，也没有中心人物和完整事件，学伊万诺夫写群众场面，《铁甲列长》的印痕很深。他对这篇的自我感觉稍好。

带着这么几篇小说，他回到上海。但信心仍不足，时时摩挲着这些投入了一部分生命的纸张，却连一篇也没有勇气拿出去发表。艾芜这时与“左联”小说家李辉英，还有一个姓雷的“左联”诗人住在德恩里。杨子青夫妇没能再租到德恩里的房子，便在杨伯凯住的虹口里虹桥一带三角地菜场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栖身。艾芜好几次拉他喝酒，给他打气。任白戈常来看他，也知道了他的创作情况。一次，在杨伯凯家里，当着杨与他的面，提出让他编个集子在辛垦出版。白戈知道，如果不提，杨子青即便有这个想法也只

会闷在肚里。杨伯凯一直强调理论书籍的重要，先前出周扬译的《果尔德小说集》，就表示过异议，这时听了白戈的建议，虽表示赞同，但口气、神色给他的印象似很勉强。而且又接着说，是否先发表一部分，使书的销路更好些。他一听便火了，拂袖而去，搞得杨伯凯十分狼狈。幸亏任白戈从中解说，杨伯凯过后主动催促，派刘元圃到家里取稿，他才将十二篇小说全部交出。稿子可能是刘元圃看的，后来也是刘通知说书稿已送印刷厂，并让他看过准备刊发在《二十世纪》上的出版广告。

集子付排，艾芜听了比朋友本人还要高兴。两人还把其中的《码头上》、《野火》两篇挑出，由艾芜交《北斗》去发表。后因《北斗》遭查禁，小说是在周扬主编的“左联”另一刊物《文学月报》上登出的。艾芜为这个集子的封面，还托了耶林请野风画社的主持人、“美联”成员郑邵虔搞了幅木刻，刻的也是《码头上》。选择这两篇的眼光，最能说明当年左翼文学的风气。

后来，他把集子定名为《法律外的航线》，而且按写作时序将篇目倒排，把这一篇置于最前面。轮到要给自己起笔名了，他想起了家乡淘金工人的称呼，金厂中的沙班，也称“金夫子”，便取了“沙丁”两字。艾芜说，这不太像一个姓名，建议将“丁”字改成“汀”，被欣然采纳了。（这个笔名取得实在好。农工有扭转历史的伟力，是你当时尊崇的，有历史价值。还有“开掘生活”的象征意味。连笔划、音调都是枯瘦、简约、滞重的，正合你的美学风格）

于是，在1932年年底的中国文坛上，“沙汀”这个崭新而略显古怪的名字，便和他的第一部集子、第一篇刊载小说，同时诞生。

这是你的“左联”时期。由包括你在内的一批艺术上有追求的作家，才构成左翼文学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

1936年才是我的年。我写出属于自己的道地的四川故事，我的文学算有了落脚点。

一九三三年的文学新人

他没有料到，左翼文学界会对他的小说迅速给予回响。最早做出反应的又是当时几个著名的作家。

《北斗》讨论《码头上》和《野火》的意见，通过艾芜转达过来。作品得到了肯定。丁玲还在编辑部对沙汀小说的四川方言做了解释。她是湖南人，有些土语这两省相通。

本来，周扬是沙汀介绍给艾芜的，但周离开德恩里时没有留下新住所的地址，两人暂时断了联系。这时，倒由艾芜领他到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对面的一个弄堂里，去看周扬。

那天穆木天也在，艾芜显得与穆很熟，拿他正在进行的恋爱开玩笑。

周扬告诉沙汀，给《北斗》的小说已经转到他手里，他很赞赏，答应把《码头上》在《文学月报》先行刊出。而且拿出茅盾看过这篇小说顺便在一方土纸上写下的简短评语，大意是说，东西写得可以，只是他不怎么喜欢

那种印象式的写法。周扬认为，沙汀能得到茅盾这样的评价已经难得。他真也是喜出望外。

茅盾是他在省一师读《小说月报》时期便敬仰的一个前辈，现在又是“左联”的重镇，所以，他高兴得只记住了他奖掖的话，却忽略了他的批评。而实际上，他对印象式写法的自我感觉，这时还很好，也不大能够引起深的思索。此后，周扬便主动介绍他加入了“左联”。这是1932年11月的事。周扬又将他刚出的短篇小说集送给茅盾看。到了12月，《文学月报》出版第一卷五、六号合刊，上面在登载沙汀小说《野火》的同时，便发表了茅盾的《“法律外的航线”》一文。沙汀真是生逢其时，左翼文学正急需摆脱“新写实主义”的模式，这使得茅盾毫不迟疑地愿为初出茅庐的作者呐喊一声，说沙汀的第一个集子“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

（你当时是否理解了茅盾这句话的份量？那可以去读读我写过的话：“他的评价使我有勇气把创作坚持下去”。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初学者最需要拥有的，是能不能继续干下去的自信力。我在这方面本不是一个富有者）

沙汀感到了茅盾的评价力量，却无法全部理解它的理论内涵。茅盾借了他，批评了“‘革命文学’的法规”。认为他的大部分作品未重蹈“公式化”覆辙。唯对别人竭力赞誉过的《码头上》，提出了严格的批评。茅盾欣赏的是《法律外的航线》、《恐怖》等篇显露出的“精细地描写出社会现象”的才能，运用活的语言的才能，看出他是“真正有生活经验的青年作家”。他的艺术感觉原是好的，这时被强烈时代使命感压住了，加上周围的人大都说他用散漫的场面描写来表现正在行进中的“革命”，是他的特殊之点，“如何的新，如何的新”，所以，在一、二年里他还没有从茅盾批评《码头上》醒悟到什么。

但是，对有人批评他的小说欧化、艰涩、拗曲，他似乎一直保持着从自修外国文学得来的看法。几年后，在一次讨论大众化的会上，他还辩解说，“文艺大众化”是要得的，可是，不能接受说他的作品不够通俗的意见。“他说文艺创作的形式是自由的，尽可利用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而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直辩得满脸通红，口沫四溅。他与周扬的交往逐渐加强。周扬在湖南读中学时便结了婚。搬出德恩里，周的家眷从家乡益阳到了上海。两家往来，黄玉颀和这个高大的女人相处得挺好。周扬孩子有病，沙汀帮着找医生。周扬是个遗腹子，家境每况愈下，他把湖南的家信给这个新朋友看过，信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家从窄路走宽路自然容易，现在要从宽路走窄路就深感困难了。这留给沙汀挺深的印象。生活上周扬是个书生，需要他提供经验。政治上沙汀是信任周扬的。与辛垦书店的关系闹僵后，一次沙汀在路上碰见周扬，迫不及待地说起来。周扬看他太动感情，一时又说不清楚，便拉他到家里详谈。

事情是这样的：辛垦出版了一批书籍，特别是发行了《二十世纪》，社会上有了一些名声。1932年8月，国民党政府唆使复兴社特务搜查、捣毁进步书店，以压迫出版界，北新、良友都先后蒙难。杨伯凯忧惧辛垦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点关系，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杨一看话不投机，便将话题带过。隔一段时间，任白戈从书店张慕韩处得悉《社会新闻》主编朱其华来找过叶青，叶又到南京找了周佛海，书店汉问题了。张老诚，说话的口气又很自然，任白戈确信不疑，便气急地来找沙汀。于是，过去积攒下的不满，这次来个总爆发，两人决定一起脱离辛垦！

沙汀把这个意向与周扬一说，得到了支持，周说：“你就专心一意地弄文学吧。”

过了几天，沙汀、任白戈正式找杨伯凯谈话。没有将南京的事情端出，只说要退出书店。杨听了十分惊怪，一再表示挽留，后来要大家去和叶青谈话。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这家伙越说越得意，冷不防沙汀蹦起来，说了句粗话，嚷道：“你可真会打算盘！”不管杨伯凯的阻拦，直冲下楼去了。叶的兄弟见势连呼：“哎，咋就走啦？”只看到沙汀一个气冲冲的背影。他从此脱离了“辛垦书店”。为了避免叶青的纠缠，索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路口的四达里。

沙汀与杨伯凯以后还有多次接触，到抗战时期在成都协进中学共事，知道他主持《华西日报》的笔政，开展“民盟”工作，直到他倒在十二桥畔的血泊之中。与叶青的联系只有一次，是路遇刘元圃，被拖去参加叶的婚礼。地点在八仙桥青年会。沙汀想起他的吹牛了，被好奇心驱使，躲在人群背后远远地看了叶青一会儿。他当然无法预测叶将来还有第二次叛变。只见大红喜幛前叶青身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身子不时地扭动，似乎对这套绅士服装不太习惯。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他脸色苍白，表情呆板。沙汀突然连了解新娘子是不是那个女学生的兴味也失去，中途偷偷溜走了。

用了与对待辛垦同样比较激进的态度，沙汀进入“左联”后。连续写了《战后》《老人》《土饼》《爱》《有才叔》《上等兵》《老太婆》这一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写苏区，材料都是间接从报纸上看来或从哪里听来的。不过除了场面，倒是注意了对人物的刻写了。

（写《老人》，我是从党内《上海报》看到有国民党“围剿”的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对老百姓骚扰的报导，以及公开的《社会新闻》、《文艺新闻》透露的这一类消息得到启发。而人的生活，各地的老年人，总有共同性。想到我对生活的选择，母亲与舅父还不是不理解？靠着推想，挪动了时间、环境，我心目中出现了一个长期不理解儿子参加土地革命的老人，直到反动军队“教育”了他。这篇东西酝酿很久。由于类似题材的作品在当时还很少见，我写时又融进了四川山区的描写，老农的描述，比起完全概念化的革命作品稍好一点，成为这种苏区小说的代表作。以后，才会被鲁迅、茅盾帮助美国人伊罗生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时候看中。鲁迅、胡风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当代小说时，也推荐了此篇，由胡风翻译，前面加了小传，登在日本《改造》杂志十九卷一号上面。——沙汀1986年11月24日讲）

同年4月，写《土饼》。

一个美的凄清的故事。母亲用黄土做成泥饼，来“欺骗”饥饿的孩子，也是从报上看到的。故事的地点、人物、体会，都是沙汀的。他想起故乡农村的雕蔽，税收从民国二十几年已经“预征”到民国五十几年，山区里不种大烟还要抽懒捐，军阀造出劣币、假纸币坑害百姓。但因为已经远离故乡，

他在揉进自己的生活体验时，是靠回忆来构思的，一种类似童年的体验，使揭露蒙上了一层诗意。这种格调一直到创作《祖父的故事》前后，仍然存在着。

（为什么你不把《上等兵》、《夫卒》这样直接写参加“围剿”苏区的兵士、民案的反叛故事，编入以后任何一个集子？因为内容太“红”。材料都是听来的，能加进我个人体验的东西太少。这些小说的艺术水平使我不能满意，我是个作家呀）

但是，这些小说的发表，在1933年里仍然十分显眼。人们看到，他的作品“从皮肤到心脏都是新的”，是独特而无法模仿的。有的说他代表一种新写实主义的路线，有的说他是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小说。他也受到一些批评，韩侍桁便说他的作品“切成了断片看，那仿佛是描绘得很真实而有趣，而用它们构成一个整个的东西，则像是堆在一起的不粘固的沙砾”。只有群像，没有“个性的人物”，“只能看见现象的描绘”。“《老人》是他全部的作品中最成功的作品”。沙汀后来认为，侍桁的意见“算是搔到了痒处”。他在紧张地思考如何改变自己，“觉得自己该重新来过”。

尽管如此，韩侍桁还是把他与臧克家、艾芜、黑婴等五个人并提，称他为“1933年的新人”。

“左联”内外

这“新人”一边写出使人耳目一新的小说，一边在“左联”领导下从事活动。他写作的政治热情与活动的政治热情，在他加入“左联”的头两年里几乎同时高涨。就在写《老人》的那月里，3月3日，艾芜在杨树浦工人区被捕。这个消息是周扬通知他的。

艾芜在“左联”内部入党后，被大众文艺委员会派到沪东去开展工人通讯员运动。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做法。他在涟文学校教书，白天教工人子弟，晚间教恒丰纱厂的工人，凌晨到申新六厂的厂门口看下夜班和上早班的工人活动，星期日走访工人家庭，忙得没有任何写作时间。见到沙汀主要是借饭费，每月六元就够维持了。他这次是在曹家渡一爿绸厂里被预先埋伏好的便衣抓去的，同时被抓的还有五个工人，一起关在南市的上海公安局拘留所里。本来是涟文学校的女教师周海涛在学校先行被捕，艾芜听说出了问题，跑到绸厂去通知做女工的周海涛的妹妹周玉冰及其他工人，结果自己也被捕了。

周扬估计艾芜身份不会暴露，便叫沙汀设法把人保出来。不久又交来五十元钱，说是鲁迅先生听说了，表示关切捐助的，可以用来延请律师。这时，艾芜他们被押到苏州高等法院拘留所第三监狱。沙汀与任白戈到公共租界史良及其舅父，著名法学家吴经熊一起开办的律师事务所，请求帮助。当时的史良已经以热心为政治犯辩护出名。她听说了艾芜的情况，认为可以设法。她住在法界辣斐德路辣斐坊，沙汀为了营救朋友，曾多次到她家里去打听事情的进展。

艾芜的被捕是当时左翼文化界受到高压的一个表现。这年5月，丁玲、

潘梓年在上海被捕，应修人拒捕坠楼遇难。7月，洪灵菲在北平被捕，很快遭秘密枪杀。9月，楼适夷被捕。10月，潘漠华在天津被捕，同时政府秘令查禁普罗文学作品，封闭进步刊物、书店。

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就在6月遭禁。在这样的形势下，沙汀跟着周扬，反而加强了在“左联”内部的活动。

他与周扬曾到窦乐安路附近一个小弄堂去过两次，见到关露、蒲风、任钧、张耀华这些“左联”成员。关露这个女性长得很漂亮，她与周立波、徐懋庸、司徒乔都熟识。后来司徒乔从美国回来，她约在一家广东茶室吃点心，周扬、沙汀也在座。司徒在席间给沙汀画过一幅很不错的画像，可惜“八·一三”逃难时丢失了。蒲风、任钧是诗人。任钧就是“卢森堡”，瘦瘦的，人很清秀。张耀华，是社联的，与沙汀同住在一个弄堂。

6月间，周扬向他提出做“左联”常委会秘书的事，他同意了。丁玲等被捕后，“左联”的工作主要落在周扬身上，是党团书记，又是“文委”成员。周随即给他送来一筐“文件”，让他保管，其中包括丁玲的一些手稿。不久，在四达里沙汀家里召开过一次“左联”常委会，参加者有鲁迅、茅盾、周扬和管组织的彭慧。那天茅盾到得最早，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他没想到这个“提携”过他的“五四”作家，瘦削，儒雅，喜欢很快地目夹着眼睛，操着浙江口音，是那么健谈。两人马上谈起创作问题，谈起《幻灭》中男女青年在大革命前后的种种思想变化，茅盾讲了不少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的见闻。

在我讲了讲自己的经历后，他鼓励我写个中篇。并且，他不是一般的鼓励我写中篇，还对作品的结构和总体艺术处理作了不少指教。从谈话中他知道我有些胆怯，怕写不好。他认为如果写一组人物相同，故事互相衔接的短篇，较为省力。而这样的中篇，在国外也较常见。接着，他还举了一个已经介绍到国内来的中篇作例，可惜书名已经遗忘。

两年后沙汀为良友图书公司写的一部以川北中小地主家庭生活为题材的自传体中篇《父亲》，其动因便可追溯到这一次会前的谈话。这部中篇本来良友在电话里答应预支稿费，沙汀写来也很顺手。《某镇纪事》这个独立的片断，很快完成了。但等到沙汀亲自去书店询问，才知道对方错把“沙汀”听成“巴金”了。当然巴金的名气要更大一点。沙汀处于经济紧迫之中，不能预支稿费，这部中篇便宣告流产。后来根据这个构思还草成《干渣——老C的自传断片》《一个人的出身》，都作为短篇“出售”。不过，到了四十年代，沙汀究竟实现了茅盾鼓励他创作长篇的期望。

4月刚迁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来住的鲁迅，从家里踱过来开会，是极近的。像这样面对面地看着瘦小而矍铄的先生，这也是第一次。等人到齐后，大家讨论起“左联”内部刊物和欢迎巴比塞调查团两个问题。鲁迅先生这天谈得不多，他讲话吸烟时那种简洁、从容的神态，使人在他身边感到一切都趋明朗。沙汀记住鲁迅抽的烟是“品海牌”的，这在当年是一种中等的纸烟。鲁迅抽得很凶，一支接着一支。后来沙汀也抽过一个时期的“品海牌”。

欢迎巴比塞调查团来华，是上海地下党周密组织的。因为“国际联盟”装样子派出李顿代表团来调查“九·一八”事件，第三国际反战委员会针锋相对，就成立了由法国进步作家昂利·巴比塞率领的“国际反战调查团”。原定3月份来华，现在延至6月。各个左翼团体连日来教唱欢迎歌曲，准备旗帜，组织几千人去外滩欢迎的队伍，也要开专门的欢迎会。

“左联”当然不能例外。

国民党政府方面非常紧张，在调查团抵沪前后，大肆搜捕左翼人士，进行压制。7月的一天下午，周扬突然跑到四达里，告诉沙汀，他的同一个弄堂的张耀华被捕了，要他快点转移。周扬走后，黄玉颀按照沙汀的主意，把一些文件，主要是《前哨》的稿子捆扎在身上。

正忙乱中，周扬连门都不敲，又闯了进来，说弄堂里里外外布满巡捕和形迹可疑的人，要他们马上动身，以防不测。沙汀一边紧张地取东西、穿衣服，一边埋怨周扬，怎么能冒这么大的险再跑来一次，反过来催周赶快离开。

（你是个重情义的人，周扬两次冒险来通知，对你们今后的关系可能是很重要的吧？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经历的角度来观察人，分析人，对待人，我知道后来有人称我和立波为周扬的左右手）

沙汀、黄玉颀先后匆匆离开四达里。沙汀走在前面。他在北站附近老靶子路北段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黄玉颀照旧回家去睡，约定次日一道去租界找房子。

第二天，黄玉颀到旅馆告诉沙汀，任白戈出事了。是经常去任家的严毅来报信儿的。严是四川合川人，青年革命者，“二·一六”时还是个少年，哭着喊“妈妈”。现在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任白戈从山东教书回来，也搬到沙汀这条弄堂来住，沙汀在第一支弄，任住得深些。事情发生在前天下午，本来也让沙汀去任家谈话的，因他在赶一篇小说，便没去成。严在任家中说着，巡捕突然闯入。但是从当场巡捕谈话的口气看，他们是把门牌号码搞错了，所以，在问明严是学生，看了身份证以后，便放了他。白戈因为房间里有不少日文、中文的马列书籍，本身又无职业，就被扣留带走。

真是祸不单行。沙汀身上自进入省一师读书渐渐消退的胆气，仿佛一夜之间恢复起来。

他马上找到过去住过的法租界天祥里，恰好租到了房子。夜里由黄玉颀回虹口，雇了两辆黄包车，悄悄便把所有的家当搬了去。

之后，他又到辣斐坊去找史良，请她设法营救白戈。史良正在办艾芜的事，这时听说又抓了个文化人，想一想说，如确实属于误会，又只有几本书，是可设法保释的。她说她有朋友在法租界工部局当翻译，与公安局有关系，最近贺龙的妻子被捕，因无证据，就是这个朋友设法奔走保释的。史良打听白戈下落，果然人没有交上去，还在局里，取保没问题，只是需要出点钱，大约一千元左右。沙汀虽然穷得可怜，对这个数目仍一口应承。他想，白戈退出“辛垦”，碍于师生情面，没有把五百元股款从书店提出去。杨伯凯一般不许任何人挪用公款，借钱希望虽不大，这五百元总可以取来吧。谁料找杨伯凯一谈，杨立即同意再借五百。钱能通神，一千元交去，三天后白戈便被释放了。

据白戈出来后绘声绘色用四川话讲给沙汀听，释放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位翻译朋友与公安局一个分局长一道去拘留所看白戈，一见面，翻译便责怪道：“你一天两天不落屋，学不上，把姑妈快急死啦！瞪我做什么？还不赶快跟着我走！”抓人的人假装说：“是亲戚吗？”“亲戚！姑妈的儿子嘛！”像演双簧一样。朋友们听了相对大笑。这个喜剧性的结尾，可能就在笑声中，潜入沙汀的心底，一直等到七年后构思《在其香居茶馆里》结尾的时候，才跑出来大显神通了。

没隔几天，史良告诉沙汀，已得苏州法院通知，两三日即开庭审理艾芜。只要找个殷实商家做铺保就行了。幸好任白戈有个相识的南充人李季高，此人喜欢做菜，饶有风趣，平时口袋里也会揣包味精。他舅父流寓苏州三十年经商。沙汀便让刚获自由的白戈陪同史良一起赴苏州，史良出庭，白戈找到姓李的亲戚做了铺保。9月27日，艾芜释放。当天晚上，白戈和他便坐沪宁车返沪。

在天祥里沙汀家里，三个朋友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又聚在一起。尝了六个月铁窗风味，形销骨瘦的艾芜，使朋友看了很伤心。白戈还是乐呵呵的，艾芜却心事重重。艾芜知道鲁迅捐钱的经过，受到感动，话才慢慢多起来。几天后，艾芜搬到了沙汀为他租好的迈尔西爱路的一个亭子间。沙汀为了安全，也搬了一次家，到迈尔西爱路附近的恒平路恒平里一个前楼住下。艾芜先是独居，不久与白戈同住，先在西艾威斯路一家豆腐店的楼上，后来搬到金神父路路底一家金龙洗染店的楼上。这两个楼上的常客，自然是沙汀。

艾芜的身体在监狱里拖坏了，出来后生了场病，加上坐疮，苦不堪言。可是最苦恼的问题，却是精神上的。原来，艾芜与那个女工周玉冰，在涟文学校已经有了感情。艾出狱后，她也出狱回到南京哥哥家去。艾去信让她来上海，她不肯，反要艾去南京。两人相持不下，陷于痛苦之中。沙汀听了艾芜的自白，便自告奋勇说：“你不要这样难过，我替你跑一趟，去和她谈一谈，看事情到底能不能挽回！”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沙汀只身乘车到了南京，就住在周玉冰哥哥家里。这个哥哥是中央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当夜开始了谈判，哥哥推到妹妹身上，说一切问她本人。妹妹谈吐诚恳，言语中对艾芜也有感情，给人的印象不错。她说是哥哥保她出狱，如果离开南京，哥哥要担干系、受拖累。听口气很难有商量余地。次晨，沙汀约女工到玄武湖单独再谈一次，这是他第二次走近这个著名的湖泊，却没有心思观赏景物。离开哥哥监督下的谈话仍然没有起色。看这个柔韧女人的态度这样坚决，沙汀留下自己恒平里的地址，早饭都没吃，便匆匆返沪了。

中午到家，与玉颀没顾上说几句话，便赶到洗染店楼上找艾芜，报告经过，说出自己的怀疑：周玉冰的释放可能是附带若干条件的，比如说不能参与政治活动，不能离开南京之类。艾一听，突然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埋怨大家平时不关心他，把他当做“圣人”看待。

这使沙汀受到震动。在这以前，在这以后，他再也没见到艾芜这样一种感情的大崩溃，大爆发了！

对于朋友们的婚姻，他作为一个“过来人”，本来也是颇为留意的。任白戈的恋爱便曲曲折折。1932年沙汀在杭州“汪社”写作，白戈曾带女友邬一先来看他。说起葛乔在北平与托派发生关系，破坏他与邬的恋爱，两人闹翻的事，沙汀是同情白戈的。但对邬的印象并不好。后来白戈与邬还是没能结合。白戈在日本结识了李柯，便是他后来的夫人。再说艾芜。“一·二八”事件前，住德恩里时期，与艾来往较多的有个何蕙兰。何也是女工，省师同学的妹子，一看便知不是为了谋生才去当工人的。何的容貌、人品都不坏，黄玉颀曾设想让她与艾芜好起来，便与沙汀商量，沙汀也表赞成。几次想向艾芜提示，但看他的样子，总像不会考虑个人私事似的，就压下了。这次他的痛哭才使沙汀悟到人的感情的复杂，开始为朋友的婚姻操心起来。沙汀叮咛白戈加意留心，最后是白戈搞“左联”组织工作期间，同杜谈一起，

介绍了写诗的蕾嘉（王显葵）给艾芜。蕾嘉是湖南人，中国诗歌会成员。等艾芜领了蕾嘉来沙汀家玩的时候，两人已快要结婚了。沙汀当时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搬出施高塔路以后，沙汀就没有再做“左联”的常委秘书，周扬通知他改做小说散文组的组长。“左联”的活动是半地下的，教工人夜校属于第一线，这个维持了三、四年之久的小说散文组是第二线。

第一个来沙汀天祥里家联系的是杨刚。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不久，是个文静而有文化修养的女性。开过两三次会。一次讨论小说《西奈山》，署名刘宇写的，登在《现代》杂志上，借“圣经”的故事来象征红军。另一次便是开茶会欢迎巴比塞代表团。

欢迎会的地点，在西藏路大西洋餐厅。巴比塞实际上没有来，委托了法国进步作家伐扬·古久烈代替他。团长是英国马莱爵士。这一天伐扬·古久烈由周扬陪同去参观晓庄师范，茶会由一位副团长、法国某市长出席，杨刚任翻译。沙汀刚与邻座的《现代》一伙人施蛰存、戴望舒、杜衡打过招呼，只见鼎鼎大名的田汉露了面。但因为餐厅的楼上楼下，多有巡捕与暗探，大家很快就把他劝走。杨刚陪着法国人进来，贵妇人一样盛装打扮，风度好极了。这次欢迎会之后，他与杨刚就不联系了。按照规矩，谁也不会去打听原委。接着叶紫，后来是欧阳山，便来参加这个组。

叶紫与陈企霞编《无名作家》，鲁迅看了他的小说很赞赏，周扬便让沙汀与他联系。欧阳山中等个子，满不在乎的神气。他穿大衣都是在吴淞路买的旧货，便宜，穿上也挺帅。三个人大约每星期在叶紫家里聚会一次，传达上级的精神，谈创作问题，也谈自己的写作计划。有一次叶紫谈他一篇农村小说的构思，沙汀哇啦哇啦提出剪裁的意见。欧阳山笑道：“啊喝！分明一件长衫，这一剪下来，就变成汗衫了。”沙汀穷开心地打趣说：“依我还得去掉两只袖子，改成背心！”赴这种会一路要防止盯梢，谈起来，气氛却是极愉快的。

尽管“左翼”文人一个比一个穷，但是叶紫一家的贫病交困，还是使人无法相信。他住在南市，弄堂狭窄、肮脏。三代同堂，母亲、有肺病的老婆、小娃儿就挤在后楼一间破屋里。叶紫本人经过大革命的逃亡，人瘦得正面看去就像是看侧面一样。据沙汀1940年在一篇文章里回忆：“第一次到他家里去，他就告诉我，他经常是拿马桶当椅凳，伏在床上写东西的。”“为了向朋友借一块钱、几毛钱，来往步行于菜市路和北四川路之间，或者菜市路和真茹等处，乃是他的一桩带着经常性质的旅行”。

欧阳山、沙汀都爱喝两杯。谈得高兴了，便拿出钱来打高粱酒。叶紫的母亲便弄点泡菜来，给大家下酒。湖南泡菜与四川泡菜很相似，这时成了佳肴。等到走的时候，两个客人往往会忘记什么似的，留下一点钱在凳子上。

那时候，作为“奴隶丛书”的《丰收》小说集还没有出来，叶紫还在申报副刊上写文章谈自己的身世。通过沙汀，叶要求与鲁迅见一次面，这件事是周扬从中联系的。鲁迅出于对青年作家的支持，当然答应。会见地点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家饭馆，在座的除周扬、沙汀外，还有两位青年记者。鲁迅那天没有说多少话，主要是静听叶紫的自述。环境很不安定，鲁迅先生只怕因为自己连累了青年作者，时间不长便先行离去了。

沙汀搬到恒平里前楼以后，1934年春，玉颀在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是他的第二个男孩。第一个男孩刚锐四年前生于安县，他是在上海

得知他降生的消息的。（刚锐的出生会使你十分难堪，因为那时你已经与黄玉颀热恋了。我承认。这不能完全推之于为了掩人耳目，才不得不过夫妻生活。我是人，而且是凡人，纯情的爱恋而外，我也需要“性”。玉颀虽然是新女性，听到后还是做为话柄嘲笑过我。我看她的忍受度算得不错了）

新婴儿的出生居然与大女儿刚俊一样，也是难产！结果动了剖腹术。这在当时还是怪吓人的。是由一个浑名叫“剪刀”的法国妇科医生做的。孩子的取名有意把表示辈份和宗族关系的“刚”字丢开，因为外祖母叫黄周礼（敬之），便取单名礼字，杨礼。有趣的是，以后生的二女一男刚齐、刚虹、刚宜，这个“刚”字又复了辟。

小说散文组这时与叶紫终止了联系，只余下欧阳山。起初，每星期只两人见面，不久增加了草明、杨骚、杨潮。开会大抵都在善钟路底的欧阳山住处。草明生得娇小，她与欧阳山在一起走路，只到他的肩部。杨骚写诗、搞翻译，他与《打出幽灵塔》的作者白薇的纠葛，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线团。杨骚曾有负于白薇，现在两人同住而不同居。外面对他俩的传说很多，沙汀却很同情他们，是他们的好朋友。白薇病了，沙汀去看她，只见她一人呆坐在桌边，面前放着一面镜子（据说老年的白薇房里，不许有一样东西：镜子）。多难的生活使白薇过早地失去了年轻时的秀美，却留给杨骚依然的清癯潇洒。朋友们只是希望他们能重归于好。杨潮（羊枣）搞理论批评，也翻译。他是杨刚的哥哥。他们家在湖北是个望族。在“左联”成员中，杨潮最“阔气”。他毕业于交通大学，外文好，在上海两个外国通讯社当翻译，收入较多。所以，大家口袋一空，往往找他。周扬也托沙汀向他借过钱救穷。他总是慷慨解囊相助的。杨潮也爱喝两杯，有时来开会，会在大衣袖筒里摸出一瓶泸州老窖，让大家畅饮一番。人多了，会就开得热闹，谈起文学创作，大家总是兴味盎然。这种聚会一直继续到两个口号之争起来以后，才被内部恶劣的空气破坏掉了。不过在私人交往方面，沙汀与他们仍是友好的。

因为《文学月报》遭封，“左联”由魏猛克交涉书店，预备再出一个刊物。周扬要沙汀参与其事。第一期想向鲁迅约稿，魏感到为难。魏曾画过一幅鲁迅与高尔基的画，别人在比较矮小的鲁迅旁边题了“俨然”两字，把画发表后，弄得鲁迅很不高兴。魏猛克这次只好听从沙汀劝告，在约稿信中老实道歉。谁料鲁迅回信，不但答应写稿，还说没有关系。魏、沙两人都觉释然。鲁迅送来的稿子便是《答杨邨人先生的公开信的公开信》。不过后来刊物未办成，稿子退还了鲁迅。胡风是1933年12月从日本回国的。翌年春天，沙汀到霞飞路（淮海路）霞飞大戏院对面的一条弄堂去看周扬，听周讲起了胡风。胡当时叫张谷非，在《现代》上发表的批评文章，沙汀是看过的。认识以后，胡风常来看他，对沙汀、艾芜的小说大加赞词。他的个子高大，脸上微微有几粒麻子，不太明显，说话犀利，语带讽刺。沙汀看他还穿着旧的洋服，便与玉颀陪他上街，买料子，找裁缝，帮他缝起了中式长袍。胡风与梅志结合，生了儿子，还请沙汀去吃过满月酒。梅志很漂亮，杨骚给她取了个朋友间打趣的诨名叫“冰激凌”。典出诗怪李金发，因为李说过，读一篇好作品，就像心灵坐沙发，眼睛吃了冰激凌一般。

还在胡风独身的时候，有一次，胡很神秘地告诉沙汀，要介绍一个人同他见面。这是沙汀第一次去胡风住地。他包了伙食，住在白俄集聚的区域里。这种洋房沙汀过去从未进去过，里面的布置也很考究。去了才知道，要见的是冯雪峰。冯诗人气质，说话容易激动。谈起文学，他说他喜欢高尔基

的作品，并热情洋溢地朗诵了《马尔戈》的开头：“海笑着！”比着手势讲得很生动。胡风在“左联”负责理论批评，与雪峰的关系显然很密切。沙汀回来与周扬一讲，周很惊奇，不快地说：“不是好久便说要去苏区，怎么还在上海？”沙汀感到了这之间的矛盾。

艾芜出狱后身体不好，沙汀、白戈为他买过“泊那托”的西药吃。胡风要艾芜出来工作，艾芜一心想恢复写作，没有听从他的分派。胡讽刺艾“吓怕了”。艾发了火，拍案大叫：“是怕，你以后不要来找我好了！”闹得不可开交。胡以后当着沙汀的面，说些含意深沉的话：“我只是担心有些人从左面上来，却要从右面下去啦。”他听了虽没有发作，心里已留下缝隙，关系慢慢淡化。

到了1934年下半年，周扬与胡风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周总是向沙汀诉苦，认为胡很难应付。周扬兼“左联”宣传部的工作，常要与胡发生磨擦，而且与鲁迅、雪峰、周文的意见不能一致，也怀疑是胡在起作用。沙汀的处境已十分尴尬，如果仅仅是胡风，他愿意断绝过去与他的一切关系。但是周扬同时在疏远鲁迅，他又力劝周要常去见鲁迅，以消释胡风在鲁迅面前造成的某些误解。这种观点似从三十年代一直延续下来。

周立波从苏州出狱，通过周扬，与沙汀的交往多起来。他们本来是在德恩里认识的。那时，立波因参与革命活动被劳动大学除名，自学一段时间后，进神州国光社当校对，一边试着用英文翻译东西。1932年春，因贴传单被拘留，从他的床下藤篮里搜出大量别人寄存的违禁书籍，结果关入了提篮桥西牢，判刑二十个月。

立波这个人一辈子有童心。他和何其芳、赵树理，是沙汀生平遇到的文学家中的“三个天真”。立波坐西牢，在里面养一些偶然飞入的鸟雀，养得极有感情。而艾芜住了牢出来，讲得就很沉重。说有一个教师每天清晨，都把一点点家私筐好，自言自语说，今天家里要来保他出去了。还有一个军官，半夜会一骨碌爬起来叫：“到光明之路！二十年徒刑！”他是为演《到光明之路》的话剧被捕的。立波进监狱，就像到哪里玩了一次，很轻松。他满刑后不愿“坦白”。又押到苏州反省院住了半年，也满不在乎。反省院规定犯人要写日记，他就天天写“臭虫”、“蚊子”如何如何叮他，弄得院方哭笑不得。他的感情似乎是不会“老”的。他一出来，听说周扬已与苏灵扬同居，就极表赞成，认为早该如此。他也有苦闷的时候，一个人把棉裤当了，买几瓶酒回来，可又不会喝。他也在恋爱，是个女工，后来与别人结了婚。那个女工当时得了白喉，立波为表示对她的真诚相爱，不嫌恶她，还特意去与她亲吻。沙汀、周扬听说了，都责备他。他就是这样没有世故，天真得要命。

沙汀刚听说周扬、苏灵扬的事，企图劝阻。特别是黄玉颀，她与周前妻很要好，仿佛忘了自己是怎样与沙汀结合的了，对娇小玲珑、也很倔强的苏灵扬，态度冷淡。那年冬天，上海很冷，苏只穿件薄大衣，沙汀让玉颀借钱给她，玉颀不肯。到以后才慢慢认可了。认可后与苏灵扬相处得也挺不错。周扬穷，有一次得痢疾，接近“赤痢”。沙汀去请“彭浪人”（当时还不叫这个外号）给他治病。这个四川医生自己贴车钱，治他的病没收费。还有个大夫叫李复石，曲阜人，儿子为革命牺牲了，看左翼人士的病，也不收钱。后来大家避难、印传单也找他。这两个医生，是白薇介绍给沙汀的，沙汀又介绍给周扬。

1934年暑假，我与周扬同居，住在上海霞飞路华龙路华龙里。楼

下是山东人开的食品店，专卖给白俄吃的酸黄瓜、大“列巴”。我这个家，沙汀是第一个知道的。

开始只有他来，以后立波从苏州反省院放出来，我才认识。沙汀穿长袍、西装裤，瘦瘦的，冬天围条围巾。他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能出主意，爱摆龙门阵。他们家与我家是患难之交。周扬对外讲是做编辑的。在上海，一个编辑家里，每天四角钱的菜金，再不能少了，少了，就要受街坊邻居的怀疑。所以没有菜钱便问沙汀借，还有杨潮。沙汀家一个月五十元就够了，日子过得还很好！他告诉我诀窍，我学不来，我不会用钱，不能做“经济专家”。

可是沙汀也常常没钱，有时，他会掏出仅有的一元钱，跑到弄堂口胭脂店去破开，分我四毛，这样可以开门买菜，别人看我们生活正常。这对地下工作最为重要。

1936年，我生第一个孩子米米，在霞飞医院。医院很小，我住在二楼大房间里，是自己走上去的。沙汀来看过我。黄玉颀送我她孩子杨礼穿不得的旧毛衣，可我不会打，是她帮我拆了，织成米米的第一套毛衣裤。我等于是他们的妹妹，生孩子、抚养孩子，都是向黄玉颀讨教的。他们还给我一本书，但书也解决不了问题。黄玉颀不高，长得很端正，性子急，爽快，是沙汀的娇妻。他俩的结合，据我知道是反封建的结合。结合得再好的家庭也会有矛盾。从1934年上半年沙汀写的小说《孕》来看，这可能与黄玉颀第一次流产前后的家庭生活有关。那种少年夫妻之间才有的爱恋气氛，因为出现了增添家庭新成员的前景而引起的经济上、事业上的恐慌；由于夫妻间性情不完全相同，而常有争执所产生的烦恼，统统呈现在这个自叙式的小说里。四川人的性格是不怕硬的，沙汀遇到黄玉颀发了脾气，他总是退却。他比她大，“礼让”是应该的，所以就跑出去，跑到大兴坊十一号辛垦同人群居的生活里去，但那里无休无止的争论也不美妙。

沙汀是不愿多说空话的人。有时他觉得周扬写那么多的理论文章，也是空话太多了，不如做些实事。在他心目中，写小说是做实事。但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危机”。他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老人》这类小说，虽然在“左联”内外受到赞扬，他写写也写不下去了。他内心的艺术之神召唤他，写自己最了解的人物，用融化在他笔下的外国短篇小说的结构与笔调来述说。可这与“左联”提倡的“大众化”又不相合。在1934年至1935年间，他创作的停滞也酝酿着创作的新生。《人物小记》、《一个绅士的快乐》都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人物小记》发表在1934年初。

一个故乡人物的生动速写。听觉、触觉特殊灵敏的瞎子，“尖刻”、“韧性”有余的性格，预示着他未来小说一连串“狠人”型的人物。这是他家乡记忆中最早跳出来的类型。用手指钳住银元吹口气，送到耳边去，用牙齿咬，把铜元摔到台子上去听声，以及爱钱如命造成儿子的被“撕票”，放印子钱和讨帐时的滚地撒泼，等等，都是他从小在安县街上看惯了的。各种人物跑来，用他们的性格细节组成一个新的人物，把一个人物立住了，随着变换时空补叙、夹叙有关他的“传记材料”：这种写法构成了他未来小说的“雏型”。为了一段山地的争执，被用铁绳子套了颈项看管一年，终于胜诉，这便是西山农民吴麻子故事的变形。

走遍城内所有屠架，挑来拣去才买四两肉，还要争执两次添搭。买一个小钱的胡椒，是没有磨过的整粒，用嘴嚼碎吐进肉汤里去，这简直是《儒

林外史》不动声色的讽刺笔法。此篇人物的可笑性远远压倒了阶级压迫的内容，或者说削弱到微而不计的程度。他内心还是不安的，于是——

1934年6月，发表了《一个绅士的快乐》。

勾勒肖像画的手法隐退，一个绅士奸占农妇、欺辱农民的故事，加重了阶级压迫主题，但在这个也属于初期的故乡小说里，显得很失调。男女人物都有安县原型。城外南塔有一个女人，在全县几十里内闻名。她的丈夫本是个叫化子，岁数大，长相也很难看，女人年轻风骚，与许多人明来暗去，包括与一个银楼的学徒相好。后来这个家“发”了，当然便有各种关于如何发家的传闻。杭州船女“乌花姐姐”的名字，使沙汀产生联想，压下这个女人风骚的一面，加重她的男人遭欺辱的一面。关于绅士的好色，使他想起故乡这句促狭的话：“看见石头缝也想插一下指头呀”，构成了“左联”小说要求的农民的愤怒。结尾是个愤怒的尾巴，故乡农民被他“美化”。与沙汀其他作品不同，他很少写“性”，这里却留下故事所需要的性描写。当时杜衡看了也觉得特别，拿去便在《现代》发表了。可从来没有被收入过集子，表明它对它的多方面的不满。

《巫山》、《好吃船》、《喝早茶的人》在《申报》发表，转入对四川社会风俗的描绘。但还没有想好，政治上的要求和小说艺术的美如何谐调。突然把童年印象与1931年秋出川船上所见，写成了小品散文。小幅的形式，较易调度，也显示了他创作上处于探索的过程。

创作上的苦恼解决不下，“左联”内部的宗派纠纷却日益严重。沙汀、艾芜都卷在其中，情景是相当难受的。这时，省一师高三班的同学萧寄语在济南教书，他想搞创作，却一直未得其门。这个人独身，租的房子有空余，多次来信邀艾芜去山东，并述说那里的环境安静，不会像上海这样干扰写作。艾芜天生不惧怕飘泊，他对上海已经厌烦，写不出东西的痛苦更深，便决定前往鲁地。

1934年12月，艾芜携新婚才五个月的妻子，摆脱了一切，经南京去济南。沙汀去送行时，艾芜还一再劝说他，无论如何，你也到山东来吧！

寻回那片乡土

艾芜到了济南，不断与沙汀有书信往还。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刚建立家庭，马上便被“家累”吓住。艾芜一次来信述说，在济南观览黄河，在一个小甸子上，见一条小小的毛驴，拖着重载，艰难爬坡的情景，说这便是自己。朋友的这些夸张的知心话，沙汀读了并没有太在意。家本来就是躲不开的温暖牢笼。男人以往的“自由”失去了，总不免发发牢骚，自己也是这样。倒是艾芜不断在来信中责备他不该留在上海，催促他北上的话，使他动心。

“左联”的组织工作越来越难搞了。创作上已把笔锋转向对川西北家乡的描述，但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潜心写作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比较稳定的情绪，上海的环境徒然使人气恼。到山东去，或许是一个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吧。

1935年3月，艾芜去了青岛。沙汀经过反复思量，也决定将全家迁往这个海滨城市。他把这个想法与周扬一说，周扬竭力反对，强调通过沙汀联络的作家数量很多，这样一走会影响工作。沙汀一下决心就比较固执，他向周扬陈述了离沪后专心创作的计划，仿佛青岛能为他铺排下新的文学路程。他答应了正在办一份新刊物的李辉英，到山东后立即给他寄篇小说，以此预支到一笔钱充当路费。他把恒平里家里那些半新不旧的家具全部托运搬走，以示长期在青岛居住的决心。动身是在6月。那天沙汀、黄玉颀带着刚会走路的礼儿，马上要去北站，周扬、立波又一同来劝阻。箭在弦上，这怎么能阻止得了？他抱着不无歉疚的心理，还是上路了。青岛诚然是美丽的。拍浪的海岸，金黄色的沙滩浴场，深碧的海和浅蓝的天空，都使在山地长大的他感觉新鲜。青岛的殖民地色彩也使他气闷。火车站的尖顶、“八大关”的花园洋房群，满街金发碧眼的欧洲人和趾高气扬的日本人，高贵和贫贱都露在街面上。

他当然住不进高贵的地段。在车站西边的距野路，艾芜帮他们夫妇住到自己房子的对面。这是一个二楼，楼下房东在邮政局做事。两个朋友离得如此之近，从沙汀的楼上便能一一见到艾芜家的情景。

安好了家，逛了几次海滩，到栈桥上去看看小青岛的灯塔，然后在桌边坐下来。他计划要写的是类似《乡约》、《凶手》这样一批小说。1936年他编《土饼》集，收入《乡约》时，改名《丁跛公》，又深思熟虑地添加了一个副题：“一个道地的四川故事”。是的，他要在这远离四川几千里的海边，找回他的故乡，找回他那个破烂不堪却又叫人昼思暮想的故乡。少年的记忆，经过成年沙汀的思想过滤，最早浮现上来的都是一些怪诞的事物，他又沉入到年初写《乡约》时的心境里了。《乡约》是标志沙汀创作转向的作品。安县就有这么个姓丁的乡约，实有其人。“乡约”名称自有了保甲制度以后便绝迹了，它相当于保甲长一类角色，但职务范围是专管收银钱的。包括征收粮款、烟捐等等。由于川北家乡特殊的世袭关系，当“乡约”的人，往往几代都干这个营生，父亲是乡约，儿子长大也当乡的。丁跛公本人其实并不跛，父亲是跛的，等他继承做了乡约后，人们还是照旧叫他丁跛公。乡土社会的人是不大流动的，彼此熟透，绝不会搞错。干这种差事，既要有逼小粮户上吊的本领，还要能应付上面的呵斥。逼债是不会受人欢迎的。挪揄、放赖、狗仗人势、苦苦哀求，经得多了，他也会挪揄、放赖、狗仗人势和苦苦哀求。加上性情，成了人人可以开玩笑的人物。所谓“有趣的恶人”、“可怜的恶人”，喜剧性很强的人物，第一次完完整整地被塑造出来。把这种“恶人”夹在团总周三扯皮和被硬派奖券的农民、寄居他家的内弟干黄鳝之间，让他表演，是经过沙汀运用他的政治意识分析过的。生活本身便是这样，自觉地设计人物和情境，更收到了形象活脱、针砭社会的效果。

写作中他非常注意叙述结构的层次：先是一个小圈，贱价从屠夫手里讹来的枪支转眼叫团总无偿收去；然后是一个大圈，如何费尽心力让农民每人白出半条奖券的钱款，让奖券都落在他的手中，如何为了打听开奖的消息受人捉弄，如何在知道中了一个尾奖后做开了发财之梦，最后被团总轻轻巧巧又讹了去。临了，土匪来抢这个精光的中奖者，竟发现无东西可抢，于是，砸坏他的右脚踝骨，成了货真价实的“跛公”。两个圈收束得密不透风。加上叙述语调的不动声色，充分发挥出家乡语言的机趣，和表现性格的魅力，奠定了他的乡土短篇小说的基础。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推行保甲制度，发卖奖券更是花样翻新。所以，《乡约》写出后，上海书报检查闻出了异味，没有通过，是寄沈从文在北方的《大公报》副刊发表的。

去青岛的前夕写了《凶手》。“断腿天兵”被挟持着，枪杀自己当逃兵的弟弟的故事，这是他好久以前从故乡听来的。地方军阀的内幕，抓案、抓壮丁，训练新兵以及枪毙逃兵，这些事他都熟知。写“断腿天兵”，因为人物是个地道的受害者，愤恨不平的感情压倒了一切，写事重于写人，以至于写到他的“傻”相，也风趣不起来，变成了纯粹的揭露。（你是最推崇含蓄蕴藉美的。对啊，我后来看萧红的《牛车上》，写格杀逃兵的故事，由死者的妻子，在一辆牛车的行进当中，断断续续追叙，景色也随时变换。萧红写得举重若轻，从容、哀伤，不像我这篇剑拔弩张，气氛、效果反而大不如）

现在他坐下来，构思另一篇小说。前不久，他收到一封家信，讲了所谓“剿赤”的队伍，在故乡周围的骚扰。自己家经过逃难、卖房、修屋的折腾，欠债累累，也已奄奄一息了。

这勾起了他对家乡连年兵灾的回忆。这种记忆几乎从民国以前，他的童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离得故乡越远，他回忆的线头也扯得越长。他想起了安昌镇西街的老屋，他的三进住宅的诞生地，想起了为避免军队总来驻扎，镇内殷实人家，包括自己家，纷纷改装大门门面的旧事。他总能联想到故乡生活那种特别可笑的情致：为了急于把门面改成铺面，急于把改好的铺面房子出租，弄得木匠和租主十分的倨傲，简直把事情颠倒过来，仿佛主人哀求他们来作活，来租住似的。这和刚离开的上海的受雇之难和顶租房子之昂贵、不易，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乡下财主以为装修一下房子，便能消灾，头脑也着实冬烘。把握住这种可笑之点，他觉得落笔叙述这个故事变得容易了。

就因为是在一个最陌生的地方叙述家乡自己老房的故事，这篇叫做《祖父的故事》的小说，会少有的钻出一个少年的“我”来。好像鲁迅住在北京写《孔乙己》，会钻出一个专司温酒的鲁镇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来充当叙述者一样。写到小说的结尾，祖父哀叹“这个日子真不好过”，作者有点按捺不住，要表示他对现实的感受：“可是祖父，要是你老人家能够从坟墓里走出来看看，你会觉得你的判断太下早了！”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他真想与故乡的老辈人这样摆谈摆谈，过过瘾。

7月，写定这篇答应给李辉英的小说，他不完全满意。比起《乡约》来，不够精炼，他失落在回忆当中，使笔放松放散了。但他事后总是想念起这篇东西。这是他的创作大的转机来临前的早产儿。后来成了他一本集子的名字，以表示纪念。

写完这一篇，青岛的生活环境使他再不能一篇篇写下去了。他是抱着满腔希望，想得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来专事写作的。但看起来，“清静”也可扼杀创作的灵感。这里除了艾芜一家，就没人来往了。而艾芜呢，妻子病了，几乎被灰色的日常家务生活埋住。从楼上看到朋友整日里侍候病人、烧饭、洗衣服，伏在桌上写作的时间都很少。他非常难过，又无能为力。两人已没有任何时间可以交谈切磋，更不要说有什么社会活动。青岛仿佛成了荒岛。

这时，突然接到哥哥的来信：母亲谢世！

母亲曾是他最亲近的人。随着他长大，接受了新知识和信仰，他与母亲渐渐远离，她的生活对于他已经成为一片陈迹。但是听到她逝去的噩耗，

他还是沉默了好久好久。平时闲下来愿意逗着礼儿玩玩的心情都提不起，时常一个人跑到海边徘徊。那个小小的安昌镇，跟着母亲的形象，装满了他的心胸，在感情上怎么能割舍得下呢。

母亲撒手而去，家事一败涂地。原来仅有的一点接济也断绝了。单靠写作，想在这陌生的青岛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开始与黄玉颀在灯下讨论下一步的打算。如果奔丧，玉颀不便回川，在青岛丢下玉颀母子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只有先回上海。

艾芜听到朋友仍要回沪的决定，也黯然神伤。他并不阻拦，他也是要走的，只是不便马上同行离开。两人的青岛写作计划以失败告终。沙汀变卖掉所有带去的家具，买了两张青岛到上海的海轮统舱船票。

艾芜送他们一家上船。一路上，惜别的话说得都提不起精神。只听艾芜低声叹息：“这叫啥子生活呵，现在就弄来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算着过日子！”生活担子压得他苦极了，好朋友远行，他连助他买一张三等、四等船票的财力也没有，满脸歉疚的颜色。沙汀照样安慰艾芜，劝他早一日也回沪。

船开行后，海上的风浪并不大。但沙汀夫妇都是第一次乘海船，那种整幅的大的簸动，就像一个人牢牢地与船体捆绑在一起，在海面上上下起伏，是从未经历过的。于是晕船、呕吐，吐得一塌糊涂。只有二岁的小杨礼照常玩耍，高兴地嚷着要带他上甲板走。船在黄海夜航，这天正是1935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船上的水手很喜欢小杨礼，送给他月饼、水果吃。海上生明月，那个晶莹剔透、苍苍凉凉的圆月，与它洒下的银辉，像故乡的梦一样，留在沙汀的心中。

回到上海，全家又住在恒平里。前楼住不起了，便挤在一个亭子间里。周扬、周立波听说他的窘困状况，通过“社联”的吴敏，在正风中学给他找了几点钟的“国文”课。正风中学校长曹亮，也是“社联”盟员，学校里延聘的教师很有些左翼的人士。这样才算解除了饥饿的威胁。除了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章太炎的文章，余下的时间，还是每星期与小说散文组的人一起开会，协助周扬搞联络。周扬向他介绍过沈起予，以后的熟识，是在编《光明》的时期。与魏金枝相处，也是周扬的主意。魏长期在麦伦中学教书，同时写小说，为人朴实、诚恳。还联系过刚从日本回国的欧阳凡海。至于接触徐懋庸、冯余声，都不是工作关系，是经过这时“左联”的秘书长任白戈相识的。冬天，周扬为帮助他度过年关，让他写过电影故事，经夏衍交给“联华”电影公司，预支了五十元钱。

我第一次见到沙汀，是1933年底或1934年初，在“左联”为《子夜》出版开的一次庆祝会上。同时也见到艾芜。开会的地点，在北四川路一个日本小学里面，这是郑伯奇办的日语学习会所用的教室。会议是叶以群主持的，茅盾也出席了，去的人很多。沙汀的样子与现在差不多，他变化不大，现在就是老一点，瘦一点。他与艾芜都穿长衫，不修边幅。

喜欢摆龙门阵。我这时在电影界工作，他告诉我文学界的情况。周扬器重沙汀、艾芜、张天翼这三个新进作家。沙汀写家乡，不熟悉的不写，上海他不写。是个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沙汀编电影故事给我，搞点稿费，才度过了1935年年底，这完全可能。故事内容记不得了。那时都穷，周扬、于伶都穷。这种故事绝不会拍，应付老板的一个名义而已。

接着，哥哥寄来了一笔汇款，说母亲谢世已经快半年了，早该归土，

要沙汀赶回家去，共同办理丧事。家里的情形信里虽然说得隐隐约约，看来是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安葬母亲的孝心他是有的，也想回去看看家事究竟如何，还可以乘这个机会，重新接触一下故乡的生活。这样，沙汀向周扬说明了情况，将正风中学的课让给了别人，把一部分钱给黄玉颀和孩子留下，让她们母子俩仍住在恒平里，托了杨骚替他照顾，这年的冬末，便只身启程返川了。

半个多月的赶路，远远看到城外南塔的塔尖，怦然心动，不是滋味。家乡还是那么古旧，只是格局显得更小，颜色觉得更加暗淡罢了。

一进杨家碾房的院门，阴阴惨惨，只见堂上停了两口棺材：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嫂子。

原来母亲死后，因家庭纠纷，这个大哥的后妻，听了些责备的话，心思一窄，便服毒自杀了。哥哥杨印如已经不行，成天烂酒烂烟，常醉不醒，靠变卖家产维持。母亲生前置下的家具，不少已经化成大哥烟榻上的锭子。他的社会信用丧失殆尽，连郑慕周对他也极为不满，赌气不管。李增峨带着刚俊、刚锐两个孩子，在母亲死后，只得回娘家寄食。由舅父的发达和母亲的经营，曾经造成的杨家小小的“中兴”，已成明日黄花。在整个家乡破败的背景上，只是增加了一笔灰色。

沙汀鼓起全部的心力，来处理丧事、债事。在他的心目中，母亲丧事的是否排场，是他对母亲所能表示的最后一次感情。母亲的棺材是上好阴沉木的，本来是别人送郑慕周的两副，郑给了姐姐一副。国民党部队征过这副寿材，母亲就躺在里面，死活不肯，这回算睡成了。他不理会舅父的态度，请了黄土乡一个经管他家田产的袁某人，承办一切。自己出面向亲友借贷，筹了一笔大的款子，来给母亲做道场，出殡。这件事的经过，在1937年他写的小说《一个人的出身》里，恐怕有些泄露。那里假托的是祖母死后的场景：她的丧事很风光，五天的道场不必说，家祭夜里还从城里买来烟火。是桌面大小的一盒，八角形，吊在临时搭成的木架上放。烟火燃放过一次，就有一台纸扎的戏文吊下来，四射出焰光。为要表示洒脱，便是送半吊钱纸的人家我们也全发孝布。以致“封斋”的一天，许多烂人都拖儿带女地跑来吃，有的连吃三次不下桌子。（这大约不全是虚构。有意味的是，一个“左联”作家回乡替母亲的亡灵超度，他心灵上居然不发生严重冲突。你太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乡土文化的力量，起码我是没来得及产生任何抗拒的想法，就已经照做了）

办完丧葬，沙汀还是让这位袁某做中人，设法把自家在黄土乡仅存的一股田产卖掉。他对这些已毫无留恋，母亲一生挣下攒下的，该还给母亲。哥哥将自己的一份早吃过了头。这点家业按照老托尔斯泰的观点，都已经是可以分光的了，他更从来没想过要来继承。

这个家早就经不起一点风浪。本城的杨茂轩强占南河畔地开铺子和茶馆。他怕涨水冲房，便乱修河堤，以致河水改道，使沙汀家的碾房受到影响。两边的纠纷闹了很久，可是怎能斗得赢呢。杨茂轩的叔父人称“杨泡水”，长得又大又胖，像泡水的豆付干。杨茂轩的二爸人称杨花猪。有个亲戚杨么大人，专能吹牛玩蛇。这一家子人还了得。再从沙汀自家看：么叔行五，人称杨五毒，烧烟、出坏主意，什么都干。更糟的是他二爷的儿子，《淘金记》里的一个主要人物的原型，译名就叫“白酱丹”。自称懂得阴阳八卦，为人寻找墓地屋基，兼及坑蒙拐骗。有个四叔，日常以养鸟为乐事。百灵死了，

还要大哭一场。大哥不必说了，大哥的儿子也不成器。这种中国偏僻内地中小财主家庭一代便腐烂下去的情景，使他触目惊心。这个家，就让它速朽了吧，他心里暗暗喊道。

在等待卖田消息的当儿，郑慕周家来了两个客人。原来是省赈会派下来去北川县查灾的官员。一个姓刘，中年的成都人，与舅父相当熟识。一个姓王，军人打扮，口操湘音，三十多岁，据说是国民党中央派往四川的所谓“参谋团”人员。这是沙汀从他俩的陪同人员中打听到的。郑慕周虽然没有任何公职，一向以热心社会公益自许，为北川请赈他说过话，与成都省赈会的尹仲锡相识。郑在北川也有几块山场，每年要派人去割来，北川的官绅他认识。

刘、王两位去北川查灾，先到郑这里来落脚，无非是希望郑能关照一下。郑这方面的经验太够用了，好好地款待了他们一番，派了刘俊逸、尹策三两人陪同作向导。沙汀与舅父说，自己反正这几天没有事，想跟着到那个县去看看，散散心。于是第二天一起上路。

四川的冬天阴湿多雨。往北川去的路一直伸入崇山峻岭之中，远处终年积雪的山顶发出黯澹的铅色光影。路七很难见到几个行人，十来个人步行着，像是通行在无人区里。他在了解了王某的背景后，曾经嘱咐刘、尹两位，如果他们问起，就说他在上海教书，因母丧回来暂住的。路上他与省赈会的人不多搭话。刘俊逸是知识分子出身，在郑慕周手下当过连长、营长，郑下野后，他一直做到团长、旅长。后来，却被别的军阀吃掉，回到安县靠郑照顾，又在县里包点税收支撑门面。比较起来，郑更喜欢尹策三。此人贩绸缎匹头，洋广杂货，是个商人，本钱是郑的部下萧维斌出的。尹为人机灵，周到，后来做过安县商会会长。因为郑的关系，大家自然是客客气气的，谁也不知道沙汀的真实身份。第一天，经永安、擂鼓到达曲山。这三处都有他的熟人，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单独行动，观察一番。当晚，便宿在离安县七十里华的曲山。次日晨继续出发。越是走近北川，战乱后的景象，便越发严重。

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经过这里所引起的事态，当时的《大公报》是这样报道的：朱毛窜金沙江，徐向前企图率主力由江油、彰明、平武，窜据松潘、理番、茂县，日来屡犯北川、安县，已与团防接触，且数度袭攻县城，蒋委员长调大军入川协剿。

5月初进入北川境内的红军共有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约十万之众。部队过了两个月，到7月初全部撤离。三十军八十九师未放一枪，进入北川县城，城已被县长李国祥毁坏。他于农历三月十三日晚星夜出逃，连同一帮富户，由县府八十多名武装人员护送，过了湔河便烧了南门外江上的篾索桥。全城火光冲天，居民四散。

这些天在家乡，沙汀听到不少北川的粮绅经安县，狼狈逃往州里、省里的故事。安县本身并未真正经受战争，它只是被大大搅动了一下。有几次消息吃紧，吓得镇内大户纷纷举家逃难。事变过去已经半年多了，各色各样所谓“剿赤”的部队来往的骚扰，土匪的蜂起，使得这一带仍然满目疮痍。这天上午，一行人抵达北川县城，只见湔江沿着山城脚下怒吼着，冲刷而去。进得城来，空空荡荡。偌大一个城池，只余下二十多户穷得舀水不上锅的人家。

市街是破烂而可怜，原来的屋基只剩有一片燃烧过的发赤的瓦砾，断墙和破灶，比沙漠还荒凉。在北川一总呆了两天。沙汀住在一座侥幸保存

下来的破院子里，这是县邮政局。

曾有两次，与省里的人一块去近郊的山区查灾。在他们找一些县府职员座谈的时候，他坐在一旁静听与观察。这些人的勘察，主要是了解受损失的地主。对于赤贫如洗、无家可归的农民并不注意。

沙汀单独上街，常能碰上三个四个一伙的流浪儿童。他们一般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满身破布片，腿子瘦得跟鸡脚一样。墙跟底下，会遇到路毙的老人尸体，他们往往一整天也没人掩埋。一个老太婆半裸着身子，僵卧在那里，显然是在死后又被人狠心地扒开衣服，探视过一番，看还有没有值得可取的东西。倒毙在河滩上的人，常常还没断气，便招来鸟雀们的啄食。看到这一切，他感到憋闷和痛楚。这里的县长面孔黝黑，是个多血质的家伙，退伍军官，谈起灾民来，总是吵吵嚷嚷的。他满身武装，好像总处在戒备状态。邮政局长呢，倒是个忧郁的知识分子，他夹在县长和几个新任的联保主任里面，实在滑稽。这些联保主任，大半是满脸鸦片烟相，单衣外面罩一件油腻发光的花缎马褂，衣着奇特。这就构成了这个灾县上层人物的面貌。沙汀还单独找过城内的居民摆谈。大部分都是小商贩。也就近同邮局的职工摆谈，甚至专门去探望了在安县久闻其名的李姓前清贡生，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到了晚上，他睡在阴冷的邮局大房子里，感到更加凄人：在夜里，一切都静寂了，死灭了，有的只是风声和水声，小儿的啼哭和饿犬们的嚎叫；它们同暗夜勾结着，使人急速地在痛楚的孤寂里衰老下去。沙汀在北川两日所得的感觉，便是如此可怕。他亲自看到、听到各种加重盘剥灾民的苛政弊端，包括让灾民掏钱买票候赈的丑闻。他同情那个良心没有泯灭的邮政局长，感受到他对“恢复”的绝望。同时，对故乡靠“吃”老百姓过活的卑微统治人物，加深了把他们做为地方政治、文化代表者来认识的印象。沙汀本来已经处在写作转折的关头，这次回乡，尤其是北川之行，创造了他的文学彻底转向乡土的绝好机会。

从北川回到安县，沙汀又去黄土乡住过几天。田产转卖成交后，他把家里的欠债统统还清。1936年2月，没有在安县过春节，便回到上海。

（你的北川之行，是一次成功的文学性社会调查。写四川故事，光靠青少年的故乡回忆已不够。实际的接触引发了一批重要的短篇。我人回上海，故乡好像跟了过来，附在身上，一刻不停地躁动着，要求表现）

恒平里亭子间的环境，太不利于写作。从四川带回的钱，尚能维持一小段日子。于是，他决心不教书了，把家搬到环龙路，租了一个楼上，让强烈的创作冲动控制住整个身心。

他首先要倾吐的是这次回川过程中，累积下来的感情重负。这是过去少有的对乡土的沉忧隐痛。他想起北川那对邮政局长夫妇，如何深深陷入精神困境。他们从异地来到北川这样惨遭破坏，又经过特大天灾之后的地带，他们的观感，对现实的震惊，茫然的情绪，在一堆以搜刮老百姓为“天职”的人群里感到的孤寂、失望，引起沙汀的共鸣。这是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可能有的。所以，当他开笔写四川故事里属于北川的系列小说时，邮政局长的形象，总在他面前晃动。以这对夫妇低沉的情绪为根柢，串连起在北川城里的各种见闻，他构思起《苦难》这篇小说。

面对这样一个特定的内容，冷静的暴露手法，降低了它原有的地位，沙汀气质上本来就有的抒情诗意的一面，大大升腾起来了。感情之流尽量泄出，人物的面貌淡化，人物的忧愤与作者的忧愤打成一片，占据了小说的前

台位置。1936年5月写出的《苦难》，就这样成了一篇出格的作品。艾芜后来读了曾表示欣赏，大概与投合他的小说口味有关。对于沙汀来说，此篇定下他叙述故乡的感情基调，虽然以后他还是愿意退到小说背后去。

同月，他还写了《兽道》。它与《苦难》这两篇小说，各自开拓的北川故事和安县故事模式，成了他抗战爆发以前，两条明显的创作线索。《兽道》原来题名为《人道》，送给《光明》半月刊发表时，夏衍看了说，哪里有什么人道啊，提议改为《兽道》。实际上，沙汀本有讽刺家的感觉，他却心悦诚服，同意了夏衍的改笔。

这个故事发生在安县城里，是这次回故乡的时候，好友马之祥讲给他听的。听了就再也忘不了。马之祥告诉他，开往北川“剿共”部队的军官，经过西街城边要强奸一家的产妇。

婆婆再三阻挡，都不答应，只得哀求：“我来可不可以？”沙汀眼前不断出现这个可怜的老太婆的形象，她没能保护住自己的儿媳，在儿子、亲家母面前，在社会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更加不幸。

他把这个遭遇，放到自己熟悉的一个贫苦、倔强的老婆子身上。是他房份上的四婶，早年守寡，守着一个女儿，长大配的女婿很差，自己疯了，手拿响篙，常赤身露体在街上吼骂，被她兄弟用铁练子拴起，一直到死。

他还联想起那祥林嫂失去儿子以后，频于破灭的精神状态，周围世界对她的冷酷无情。

在写作时，不知不觉把《祝福》里的某些场景，与这个《兽道》里的魏老婆子的境遇合而为一。“给你们说她身上不干净！——我跟你们来呀！”如同祥林嫂那一句“我真傻，真的”，最后成了人们耻笑的对象。沙汀的暴露心态，与家乡社会发生的奇特狰狞的事件结合，既合乎左翼文学揭露社会黑暗的主旨，又与他这个期间的审美情趣，偏于题材的传奇性，忽视对平凡题材的开掘相一致。这一类的小说源源而来。

这一年6月写《在祠堂里》，7月写《灾区一宿》，9月写《逃难》，11月写《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原名《查灾》），12月写《代理县长》。暴露，形成了一次高峰。

《在祠堂里》、《逃难》的材料，是在安县听来的，其余都是北川近似纪实的故事。它们统统构成了故乡“黑暗王国”的图式，其描写野蛮的现实，只《在祠堂里》一篇，就够动人心魄的。

每当沙汀的忧愤情绪，被酷烈的乡土生活所激发，往往产生悲剧性极强的小说。《在祠堂里》是为《文学界》创刊号赶写的。这个故事在安县听到的只是一个轮廓，没有多少细节。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十几年，居然在故乡还会存在将妇女活活钉入棺材的“人吃人”的现象，使他感到窒息。如果不把它写出来，简直会把他闷死。他设置了地方军阀统治的环境、人物的身份。洗衣婆的女儿嫁给军阀部队的连长，却要追求爱情的自由。虚构的地点“祠堂”，象征着封建礼法的支柱。他又一次运用最拿手的侧面描写，让祠堂周围邻人，来“感觉”事情的过程。环境、气氛的描写，成了作者感情发泄的外延，叙述的语气反而冷峻、平静。沙汀式不动声色地讲述惊心动魄内容的独特小说语调，已见端倪。

周立波当年推崇这篇小说：沙汀的《在祠堂里》，把夜间的各种幽凄的音响，注入了一个四川女性的悲剧里，在字里行间造成一种凄厉的氛围气，这是中国文学一种新的成就。到了年底，北川故事的创作进入高潮。沙汀

的讽刺性人物小说，继《丁跛公》之后再度出场。

《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是北川查灾时，别人提供的材料。他只把轻易杀人的对象，选定在地主身上罢了。这是他对红军长征过境后，北川毁灭的政治性解释，显示了左翼社会分析的特征。不过，历来仍为许多论者所不满，指责他的“自然主义”：把军阀战争、农民反抗与红军长征混杂在一起。可是战乱就是战乱，做为引起战乱的一个因素，和造成战乱的主要原因，沙汀在北川实地调查时，便分得清清楚楚。《代理县长》是成熟的小说，采自他的直接观察。在北川，是有这么个代理县长，沙汀曾见过的。代理县长与县长都是外地人，县长借口到上面请求赈款，将事情推给了这个旧军官，溜了。但真正触发他写这篇小说的，并不是他，却是另一人。

有一天，我在一个县城（指北川——笔者）的街道上看见一个县政府的秘书，此人头发蓬松，穿一件褪色的长袍，拖起一双布鞋，手提一副猪膘满街去借锅炒。这个人的形象立刻吸引了我，我觉得这位提着猪膘满街喊着借锅的国民党县政府秘书，的确充分而又尖锐地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官吏的流氓气和市侩气。跟着，我就依据我的生活经验分析了这位秘书的历史和身世，这个家伙可能是兵痞子出身，不但不学无术，而且欺骗拐诈无所不为。我就决定拿这个人物作为我的小说的主角。一个模特儿，点活了他以往的和在北川刚刚体会到的经验。秘书演化成了县长。又与沙汀从小熟悉的各式沾满“流氓气和市侩气”的“烂官僚分子”，比如安县的魏道三之流融和成一气。增删、充实、联想、发挥，一个沙汀式的人物，便呼之欲出了。

一个苦寒已极的荒凉可怕的灾县，“灵房”一样的县政府衙门，怨怒的科长们和乘机出头的联保主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突出了代理县长满身的“泼皮”劲儿。他精力过剩，惯过“烂帐日子”，乐呵呵的满不在乎的性情，只是在勒索出境灾民的办法失败后，有一刹那间失控，但随即又振作起来，想出叫灾民买票候赈的法子。“吓，你愁什么！——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哩！”生长在赤贫的中国内地的统治者的“蛮”和“蠢”，在一种不自知的境况下，充满自信地活着，且活得有滋有味，这是多么可笑、可怜的现实。经过精心选择的代理县长舒舒坦坦洗好一帕脸的细节，手提包米的手帕、穿腌肉的草绳，挨门挨户借锅做饭的细节，深湛的运用语言的功夫等等，使整个小说表现故乡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状态，对中国统治结构的愚昧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你一写这种人物，就来了神。丁跛公、代理县长都如此。大概这是我的偏爱。到《红石滩》里的胖爷，不绝如缕。这里包含我对乡土社会文化特质的某种理解吧）

《代理县长》原先交《文学》杂志，送审未得通过。小说刺痛了管书报检查的那些“蛮”而“蠢”的老爷们。后寄到北方，由沈从文转给《国闻周报》才得见天日。

这种地方人物色彩浓厚的小说，在沙汀手里越发变得纯熟。他的文学的时代使命感仍然很强，却再不仅仅为了某种政治主题，来铺陈敷衍小说。他的最有地方性的文学，就成为最富艺术个性的文学！

写作《兽道》、《在祠堂里》的时候，沙汀从四川回来怕已有三个多月了。不久从环龙路又搬到他在上海的最后一个住所，辣斐德路桃源邨的一间客堂。

他的房间的布置很简单，一张床，和一张写作的台子，以及几大箱子的书籍，其余便是被扔在床头或者台子底下的报章杂志以及一些龌龊的衣服而已。

他本人不修边幅，一年四季老是那一套洋装，但有时也喜欢穿长衫，因此，我们不时也能瞧见他穿着一件蓝布大褂，摇摇摆摆地出现在桃源邨中，这种寒碜而且带点稀有的打扮，是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周扬很高兴他回来协助工作。周立波其时一人也住在辣斐德路，两人的弄堂离得不远，来往方便，沙汀常跑去看他。除了讨论写作，正碰上筹建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口号这几件大事。

他在安县葬母期间，“左联”已经解散了。去安县前，即1935年12月中旬，在周扬家里曾开过一次“文委”的扩大会，非“文委”领导成员的沙汀、周立波、于伶等列席。

大家都已知道，巴黎《救国报》上党的《八一宣言》、《国际通讯》上的季米特洛夫报告，特别是萧三给“左联”的长信。萧三当时是“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他的信提出解散“左联”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需，信是经过内部的交通送到上海史沫特莱处，然后由鲁迅转到周扬手里的。沙汀读过。上海左翼文化界自1935年春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失去党的关系良久，现在得到这些文件，其兴奋状态可以想见。所以会上大家对于解散“文委”所属各联，都无意见。等到沙汀从故乡转回来，一切付诸实行。

鲁迅先生对解散“左联”和如何解散“左联”，有不同意见，他很久都不知道。待建的统一战线的新组织，开始定名为作家协会，后有人提议扩大范围，才改作中国文艺家协会。

沙汀是三四个发起人之一。艾芜携家返沪，他参加发起是沙汀邀的。他们散发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组织缘起》的材料，协会的筹备在积极进行。但鲁迅不同意加入这个组织，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并且随着两个口号问题的提出，内部的紧张关系日甚一日。

这年2月，周立波于《大晚报》发表《“国防文学”与民族性》一文，“国防文学”的口号得到许多响应。沙汀所在的小说散文组里产生分歧。他自然是赞成的，欧阳山他们不表态。周扬与胡风在报刊上公开展开的关于典型和现实主义的论争，并不能维持在理论讨论的范围内，双方的意气越来越盛。

沙汀也认为周扬同鲁迅的“误会”多半是胡风造成的。他与胡风的友谊跌到零度以下。

胡风在四处传布鲁迅对文艺家协会与“国防文学”的不同看法。周扬这一边1934年秋天以来，便在传布胡风在南京孙科的“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的事。沙汀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早就与他断绝来往。他们想利用此事来影响鲁迅与胡风的关系，结果反而引起鲁迅的反感。

4月初，沙汀将茅盾约来家里与周扬会面，希望茅盾从中调解。茅盾也是文艺家协会的发起人，他过去多次调解过，这次表示无法说服鲁迅先生，

拒绝了。

不久，听说中央特派员、大家的老朋友冯雪峰由陕北负使命来上海已多日，却一直不会见这边的人。周扬的不满“传染”了沙汀。等文艺家协会连章程、宣言（宣言是茅盾起草的）都已印好，会址租好，召开成立大会的通知已经发出，一切都已就绪，突然，6月1日新出版的《文学丛报》上发表了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第一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周扬他们都认为这是胡风用来对抗“国防文学”的，于是掀起轩然大波。沙汀已经在5月份，被安排参加《文学界》的编委工作。《文学界》、《光明》是周扬、夏衍努力搞起来的刊物，一创刊便卷入两个口号之争。沙汀不是爱动是非的人，他对两个口号在理论上没有多少兴趣。当时发生的这场带有宗派情绪的内部纷争，表现出新形势到来以后，革命内部不同的理解。沙汀考虑不深，主要还是在人的品格上考虑得多，认为周扬的人品比胡风的好，因而信任周扬，但鲁迅先生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鲁迅是他的前辈，文学启蒙导师，与鲁迅的某种“背离”使他困惑。不过沙汀是个只认定自己能看到事实的人，他除去埋头写作，主动的社会活动有限，所见所闻都与周扬有关，这就不能没有局限。

《文学界》6月5日创刊前，茅盾曾约集一批原“左联”成员，在《文学》杂志社座谈。沙汀、荒煤、艾芜、徐懋庸都参加了。茅盾企图说服大家放弃口号之争，但没有见效。

散会后，沙汀单独留下一会儿与茅盾谈话。沙汀请茅盾为《文学界》写一篇赞同“国防文学”的文章，一再说，这口号是党提出来的。沙汀把“这是党提出来的”说得极其认真。茅盾不住地摇头，显出一种似笑非笑的无可奈何的神情，始终连一个字都没讲。

（你当时没有从茅盾的苦笑中感到事情的复杂吗？你让茅盾单方面再发表拥护“国防文学”的文章，可见你不了解事实的全部。现在想来，我是冒冒失失用了“这是党提出的”这句话）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就发表在《文学界》创刊号上。6月10日《光明》创刊，徐懋庸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便出来公开批评胡风另立口号。这一期还有茅盾小说《儿子去开会去了》，夏衍的《包身工》。沙汀在这两本创刊号上，发表的都是小说，即《在祠堂里》和《兽道》。刊物造成了很大影响。《文学界》主编周渊不是周扬，这仅是个假名。直接领导者，是“左联”负责组织工作的党团成员戴平万，通过原创造社的邱韵铎，打通光华书店得以出版。稿费很低，书店能提供的编辑费也很少。编辑部就设在邱韵铎家里，编委还有杨骚、徐懋庸、沙汀。

在邱家，沙汀开过两次编委会，讨论刊物的内容。徐懋庸自告奋勇，愿为刊物写一篇抗日小说，便是《火焰》，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文学创作。徐早些日子，经任白戈认识沙汀。此人其貌不扬，人很聪明，名士派，也有浙东人的倔强。他一度追求过关露，给她留条子写得也怪：“女人！哪一天我来陪你看电影！”有一次，徐去找关露，恰不在，他就坐在楼梯的最下一级等着。上海普通房子楼梯都很黑，关露回来一脚踩在他身上。他这时与曹聚仁住在一道，沙汀一去，他就叫菜请吃饭。他杂文写得多且好，有鲁迅风，鲁迅为他的《打杂集》写了序。朋友们谈起来都感到徐懋庸是很有趣的人物。

戴平万很长时间领导沙汀。他是太阳社的成员，沙汀二十年代末在《太阳月刊》上读过他的作品。自加入“左联”以后，从来没听到过戴平万的消

息。周扬告他戴刚从东北义勇军折回上海，这时住在一家商号里。戴平万，广东人，中等个子，谈吐幽默。成立文艺家协会时，他见到欧阳予倩，便说：“看，潘金莲来了！”戴一直认为，沙汀是党员，很信任他。

正是编《文学界》一卷二期的那段日子，一天，戴爽朗地与他谈起来，才知他二十年代入过党，现在关系丢掉了。戴说：“关系没带来，设法证明是很麻烦的事。不如重新加入，我可以介绍。”沙汀当即表示，愿意再次申请。“左联”虽然解散，党团组织依然存在。没过几天，戴便告诉沙汀，他入党的申请被党团通过了。还说，讨论中他批评了党团书记周扬，认为这个人这么熟，为什么不早介绍进来？这样，沙汀便又一次入党。他的联系人便是戴平万和周扬。通过他先后联系的人是荒煤、林淡秋，直到“八·一三”战事发生为止。

（最近，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文，他的党龄恢复，从1927年第一次入党算起）

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会，在上海四马路大西洋菜社举行。到会的约有七、八十人。沙汀专约了艾芜、魏金枝、杜衡、欧阳山、草明。后两人不赞成“国防文学”，未来。杜衡口头上答应，开会那天也没到场。周扬、夏衍都有意回避了。会议公推夏丏尊为主席，傅东华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过了简章、宣言。宣言按照与鲁迅的约定，不写入“国防文学”的口号。讨论时又有争辩，但大部分人同意了。有人提议，给病中的鲁迅先生致慰问信，得到全场的热烈响应。会议选举了茅盾等九人为理事，沙汀等五人为候补理事，签字参加这个协会的共一百一十一人。

一星期后，鲁迅先生等六十三人，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分裂的形势使得文艺家协会成立后从未能真正开展活动。只有《文学界》算是协会的会刊，出版了四期。到第二期时，周扬通知沙汀，把他调到《光明》半月刊去。他在《文学界》的编辑位置由荒煤接替。荒煤这时刚发表《长江上》，主要搞戏剧活动。他脑筋反应快，人瘦瘦的，但反而没有后来精力旺盛。

《光明》开始是个“皮包公司”。编辑部就是沈起予的家。沙汀接替何家槐，每星期去一、两次，取稿、送稿，专看小说方面的。当时，“一二·九”救亡运动兴起，上海因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在华北事件后扩大，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前也自顾不暇，对左翼均放松。大家就想找个有实力的书店，办一种与“左联”过去关门办刊、一二期便被封掉不同的杂志。夏衍找生活书店胡愈之交涉，他们愿意承担，但怕出问题，只搞发行。讨论后找洪深公开出面。

洪老夫子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又敢说敢当，就请他挂名做主编兼发行人。沈起予色彩不浓，也出面主编。党的领导是夏衍，加上沈起予的妻子李兰，一个温和、细致、有教养的女性，和沙汀组成了编委。生活书店给的稿费、编辑费都较丰厚，到“七七”事变停刊前，沙汀有五篇重要的故乡小说发表在这里。与夏衍来往较多的也是这一段时间。

（我知道夏衍很早，他在上海艺大讲《戏剧概论》，我旁听过。左翼搞飞行集会，他参加时不与别人站在一道，看到有巡捕来，便在马路橱窗边东看西看欣赏。他很机警，思想敏锐，记忆力惊人，个性细密、周到，江浙人的特点。他有这个本事，你上面开会，他晓得内容是不要紧的时候，能在下面写文章。

《光明》实际是夏衍挂帅。每次编排，主要由他出主意。他作风深入

细致，排字、看清样，都很内行。我跟他跑过两三次印刷厂，亲眼见他如何调整版式，当场挥笔填写补白，文思敏捷异常。三十年代在中国倡导集体创作，他是第一个。《光明》发表五六个集体写的剧本，像《走私》、《汉奸的子孙》、《咸鱼主义》等，揭露了日寇的罪行，都是他邀集，在跑马厅附近的东方饭店开个房间，找洪深、章泯等人讨论，分幕，写提纲，然后推选执笔人，写出初稿的。于伶是他的得力助手，当时叫尤兢。我也参加过讨论。——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光明》很重视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5月由白薇转给周扬，介绍到《文学》发表后，反应很强烈，被推为“国防文学”的佳作。周扬于是叮嘱沙汀，主动与舒群联络。从此，舒便经常给《光明》写稿，并介绍来罗烽、白朗的作品。9月，《光明》一卷七号，还特地编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也是沙汀的劳绩。这“近作集”中，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曾被沈起予压了一些时间，由此引起不满。舒舒便引了罗找到沙汀，要找沈起予“算帐”。这样，沙汀才第一次见到罗烽。徐懋庸后来主编《希望》，在《申报》登广告，夹进一副戏联，有不敬鲁迅之处（沙汀现在还能记得，下联是“去年今日鲁迅徐懋庸笔战方酣”），舒、罗和沙汀都感气愤，一起去找徐。经过道歉，事情才算“和平解决”。至于见到白朗，已经到了“八·一三”后，是在离沪那天的车站上了。

这时，“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们，群起反对胡风的文章。《光明》第一期，徐懋庸率先发难。第二期周扬《现阶段的文学》更是一篇长文。7月，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涵义，及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此文同时在双方的刊物上登出，《文学界》的这篇是茅盾送来的。

胡风的口号正式成为鲁迅的口号，沙汀周围的人觉得事情棘手。出于对鲁迅的尊敬，争论的势头缓解下来。可是没想到，8月，鲁迅抱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作家》发表。事先谁也不知道徐写了信。

徐自己正回浙江天台老家省亲，看到鲁迅文章后，气急地赶回上海，找到沙汀，大诉其苦。说他感觉委屈，在浙江已哭过两场，随即从身上取出他的答辩信，要求在《光明》上发表。徐在沙汀家说这些话时，眼睛通红，十分激动，他显然既敬爱鲁迅，又想不通鲁迅何以会如此严苛指责他的缘由。沙汀严肃地对徐说，他坚决反对答辩，文章不能再登了。可是徐听不进去，说《光明》不发，他便找别的刊物。看看劝阻无效，沙汀建议他与周扬谈一次，这是在沙汀家见面的，结果仍然无效。夏衍听说，又主动约他在一家咖啡店里谈了两小时，批评他全然不顾大局。徐的固执是惊人的，他拒绝了所有的批评。正巧女子书店创办《今代文艺》，主编刚自日本回来，四处拉稿，便将徐的《还答鲁迅先生》一文拿去发表。为了这件事，周扬与夏衍分别经茅盾、雪峰想转告鲁迅，声明这是徐的“个人行动”，与他人无涉。徐自己也说：在鲁迅先生发表那篇驳斥我的文章以后，我同周扬他们的关系闹得很僵，任白戈从日本回来后，曾约沙汀、周立波等和我吃过一顿饭，想进行调解，但由于我的倔强，没有调解成。

可是，鲁迅怕是听不到这些人间的纷扰了，他已经病危。据夏衍回忆，他在听到消息时，感到惭愧，当天去找沙汀。“我想只有沙汀也许可能去探望鲁迅（前两天叶以群去探望，就遭到许广平的拒绝）”。这说明沙汀的

特殊地位。由于他本人的诚恳，还能被对方容纳。鲁迅生病前，计划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当代杰出小说十篇，其中便有沙汀的《老人》。便是这件有益的工作，鲁迅也做不完了。

10月19日，噩耗传来，鲁迅先生辞世！

沙汀是听沈起予和《作家》的孟十还告诉的。在周扬家，“文委”几个人商议了一下办法，因为茅盾恰好回浙江乌镇老家，不在上海，鲁迅所住的大陆新村又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夏衍都不便露面，便推举沙汀、艾芜为代表，去万国殡仪馆志哀。

20日，沙汀到了殡仪馆。胡风一见到他，顿时忘记前嫌，拉住沙汀的手便哭起来。通过胡风的手传来的一阵阵颤抖，可以感到胡风对失去鲁迅的沉痛。殡仪馆内外，自发来瞻仰遗容的人成千上万。守灵时，沙汀看着鲁迅枯瘦的遗体，长满刚硬胡髭的脸面，仿佛自己生命的时间也在这里停止了。他想起在省一师读鲁迅小说的情景，想起历历可数的几次与先生的会面，“左联”常委开会一次，叶紫提出见面一次，还有一次是叶浅予办《动向》，在“大三元”请吃饭，席间看到鲁迅与海婴，海婴张着小手说：“我也要吃酒。”惹得鲁迅大笑。对，还有最早在“艺大”听他讲话，那时自己还没参加“左联”，那才真正是第一次见到鲁迅。他讲话随便、冷静，有很深的趣味，口音是纯江浙的，但能听得懂。这似乎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像烟云一样散开来……过了两天，22日下午出殡，沙汀赶去参加。萧军、胡风在殡仪馆现场指挥。本来启灵抬棺的名单里是没有沙汀的，但临时发现少了一两人没来。缺了人不大整齐吧，七零八落的，巴金、靳以突然向人群里的沙汀招手，喊他：“你来，你来！”原先怎么敢自己去呢，觉得是个名誉的事情，他平时遇到出头露面的事多半是向后缩的，这时听见召唤，也来不及细想，就跑上去抬。他感到棺木很轻，仿佛能飘浮起来一般，飘呀飘的，飘上了灵车。后来各报刊登扶灵的照片，《文季月刊》上的那一幅，抬棺的十四个青年作家里，清清楚楚地留下了沙汀这个深具意义的镜头。

送殡的队伍绵延几里。张天翼手书的“鲁迅先生丧仪”的横幅，由欧阳山、蒋牧良等举在最前面。然后是挽联、花圈、遗像、灵车、家属及执绋者。花圈后面的挽歌队唱起《哀悼歌》，挽歌的悲壮情绪控制了沙汀，他在这个万人的送葬行列里面，跟着大家喊“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的口号。到了华界，正好阮玲玉也是同一天出丧，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鲁迅的出殡，成为自孙中山逝世以来，中国青年学生、老百姓自动走上街头送葬的最壮观的场面。

人流一直涌向万国公墓。

回到家里，沙汀忙着与洪深商量能够做的纪念举动。一卷十期的《光明》本来已截止稿件，待发排了，现在决定立即组织稿件，增辟“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改为10月25日出版。沙汀写下了这样的话：鲁迅先生的伟大处是在直面而坚持地对一切黑暗突击，从古久先生的帐簿一点到泊来品的卅字徽章。在五四运动后的十数年中，每逢一次新的巨大的激变，都能够勇敢地站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先生一人。而能够使一切丑恶畏懼的，也仅仅只有先生一人。（鲁迅之死，你有没有夏衍那种既悲痛又惭愧的感觉？当时没有冷静体验的可能。

因鲁迅的存在已经多少年习惯，突地消失，只觉得失了重心，前面陡然一片空白，一片空虚）

在葬礼上，召唤沙汀前去抬棺的巴金，沙汀早年在成都就知道他的大名。袁诗尧老师便和巴金一道搞过“安那其”主义。沙汀读过巴金译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被其中激动人心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初到上海住德里时，巴金曾来看望四川同乡，也知道有个姓杨的老乡在自学文学。经人指引，巴金马上诚恳地对他说：“要不要写点文章，翻译点东西？我来介绍。”沙汀说：“为报屁股做点事吧。”

巴金给他的初步印象是：矮矮的个子，操浓重的四川口音，下颚处的线条刚直、粗放，因此，下巴显得格外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正式接近巴金，是1935年。那年萧乾为《大公报》副刊来上海组稿，请客的名单是巴金帮萧乾拟的，便有沙汀。这样，关系渐渐多起来。前不久，“开明”为纪念建社十周年，要出个纪念集，又是巴金想起沙汀，约他写篇小说，便是《逃难》，一个可笑的安县人乘轿避难的故事。稿费标准是千字十元，是他在上海写作所得的最高稿酬。巴金就是这样乐于扶植人、帮助人。他能鼓舞起很多人，在左翼作家圈子外，以高贵的人格力量吸引住沙汀。后来更进一步成为沙汀难得的挚友。

就在鲁迅逝世前后，文学界对宗派情绪的厌倦，已经很普遍。9月下旬发表了有二十一人签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包括了争论双方的作家，甚至礼拜六作家。这是茅盾、雪峰有意组织的，事先与夏衍、周扬也商量过。这对降低争论的热度，无疑起到良好的镇静作用。也是在这种气氛下，欧阳山讲，我们不管他们批评家的纠纷，那是他们理论界的事，我们小说家自己搞个团体，来谈创作怎么样？欧阳山的想法与沙汀不谋而合。沙汀在一篇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里便说过：“我们今后应该从事于一种具体的批评和创作的建立”。张天翼从南京来沪，他与欧阳山熟，积极支持发起“小说家座谈会”。

第一次会是9月2日开的，沙汀没有参加，与会的都是主张那一个口号的人。后来他听说会上有人批评沈从文说的左翼作品都“差不多”的话，他不大以为然。沙汀对沈从文的印象不错，他当时不认识沈，只是看他写湘西的作品，总能联想到自己的川北，有一种亲切感。第二次会是10月30日开的，欧阳山又来约，沙汀与党团打了招呼，与艾芜、荒煤等几个人出席了。座谈会在北四川路一家广东馆子里召开。会上多半是青年作家。他第一次见到为鲁迅吊丧而来的张天翼，人瘦瘦长长的，爱说笑话。沙汀本来不准备发言，可是等到会开起来后，他被整个团结的气氛感染，竟前后起来讲了十次话。他环视会场一周，沉稳地开口：

“我有点意见要说：最近文坛上，有过一点使大家迷惑的事。这是理论家们和批评家们的宗派观念所造成的。”大家知道：在座谈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欧阳山曾经约我和荒煤、艾芜加入，我答应考虑。刚才所讲的，就是我加入小说家座谈会所以很迟疑的原因。现在我加入，正因为要打破这种本来没有的宗派观念，另外还想跟大家给新人一点帮助。

“这种宗派观念的造成，并不是在认识上有什么不同，不过是由于几个私人间的关系，看来似乎就形成了两大派或两个以上的派别。我当时因为别人那样的看法，也就不得不稍加考虑。现在看到《小说家》根本没有一点宗派意味，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地加入。”他侃侃而谈，直说得全身发热。在讨论到《小说家》发不发理论文章时，又站起来申诉意见：“我不否认理论斗争的重要，但为了尽快增进团结，一个时期内，不但胡风，凡是足以引起

外界误会的人的文章，暂时一概不登，也是必要的。现在，只要作家们先联合起来，打定一个基础再说。”（这是很坦率的“思想见面”的话。你身上非周扬的独立意识一下子流露出来，朋友是朋友，观点是观点。我实在想安心创作，鲁迅逝世，给我们大家一个反省的机会）

他实在太想多写出几篇好的小说来了。转过年来到了1937年2月，他的《航线》集出版。这是沙汀去年把《法律外的航线》集删去《酵》、《俄国煤油》后编成的。交给了巴金，编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在鲁迅先生逝世的第二日，他为这本书写下新的“前记”，其中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感激和纪念之情。

次年的3月，他发表了未完成的中篇《父亲》的三个片断：《某镇纪事》、《干渣》、《一个人的出身》。按照去年《文季月刊》广告介绍，这部小说“描写一个慈父对于儿子的希望和幻灭的故事。主人公是伶人，为了儿子他抛弃了半生来持以为生的职业。”这是他大规模地概括故乡的开始，运用的是半自传体，从一个家庭的变迁，看整个社会。4、5月，他又连续写出了《龚老法团》、《轮下》几篇重要的小说。作品的人物原型均采自故乡。《轮下》的主人公穆平，是根据他的青年时代朋友向履丰的经历虚构的。向履丰信仰过梁漱溟，也信仰过共产主义。妻子姓龚，近视到这种程度，一锅汤元汤，她当成洗脸水端了出来。这是他哥哥向浑生前给他订的婚。他要离，女家来人把他打了一顿。他气得去宝光寺当和尚，他老婆又把他抓回来。这是一个软弱到无以复加的人。红军过境，他也跟着别人逃难，既可怜，又可笑。

《龚老法团》的原型，是妙趣横生的钟子吉。钟子吉就住在安昌镇南街，沙汀十二、三岁时便认得。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在1936年7月，沙汀用“尹光”笔名发表在《申报·文艺专刊》的散文《贾汤罐》里，被真实地保留下来。除去姓名虚拟，这是篇纪实性作品。比如他纳妾，别人问他何以要娶，他便说：“小，补之哉。”他画得一手好画，除夕过年他家门上挂起方形纱灯，四周画着戏文故事，精致剔透，惹得远近许多人专门跑去观赏。

他的儿子钟成周，还是个维新派，留着法国式的八字胡须。儿媳苟么妹，丈夫死后回了娘家，淫荡异常，在家乡上层可是个响当当的女性，人们背后叫她“逢人配”。有个译名“小霸王”的绅粮袍哥，在安、绵一带胡作非为，名气很大，正欲娶她，却突被驻军捉去，拿铁杆烧红刺瞎了双眼，枪毙时是用箩筐抬起走的。这些女人、男人的性格气质，都渗透进他的小说世界里。

但是比较起来，他更偏爱钟子吉本人的性格，居然作为主角被他写了两次。《贾汤罐》是个静态的人物素描，能感到人物已从纸上凸起，但缺乏一个动态的事件，来造成形象的纵深度。他产生了“扩写”他的想法，于是，钟子吉成了贾汤罐，贾汤罐又成了龚春官，增多了虚构成分，把他安到1928年安县魏道三搞的那一场党义测验的闹剧里去，成为一篇新的作品《龚老法团》。

“党义测验”这一笔的改动，带来的是对整个人物的重新设计与调整。他想，在这场县城土劣与新派的权力较量中，龚春官只是一厢情愿地“调和”，糊糊涂涂保持好心情，他不应越出这个范围。原先写贾汤罐不看公文内容便盖章的细节，是“极随便地”在自己台衔下加印，这时改成“极仔细地”盖章。真诚地作古正经，不折不扣的“混沌”，“混沌”到善良，“混沌”到自始至终，才是龚老法团的本色。沙汀摸到了人物性格的内核，不再有偏差。

贾汤罐平时虽难得出一丝声气，可是“冷不防一字一板地说出句把话来时，第一分钟你会不禁红起脸来，觉得那些话里是生了骨头的，但当你下细一审视他那聪明而坦白的眼色，便又会自自然然地松一口气”。贾汤罐这种突然抛出一句惊世骇俗真话来情景，恐怕是生活里钟子吉的真性格，因为他并不缺乏聪明。到了《龚老法团》，作者要突出人物颠预、和善到不自知的境地，便需抹掉他身上一切大智若愚的表现。

耐人寻味的是，两部作品都有这样一段调侃的话，被置于显要的地位：“他的死给几个地位重要的人物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每当他为要解决各机关法团的人选而感到苦恼时，总会记起他来，于是生气道：“龟儿子！要是贾汤罐（在《龚老法团》便是龚春官——笔者注）不死也好哩！”只有乡镇社会代表的中国封建权力结构，才需要这种傀儡式的人物，以便在尊重民意的幌子下照旧执行他的独裁。中国式的权力斗争需要这样的“垫脚”官僚，反过来，描写了这种“垫脚”官僚，也才能表现“权力”本身，表现“权力”的性质、构成和功能。

他已懂得了开掘，由散文《贾汤罐》到小说《龚老法团》，他故乡人物所包容的政治、社会、文化内涵，被大加拓宽拓深，他的四川故事的深意显露出来。加上小说语言淘洗尽许多杂质，变得洗炼、精粹，讽刺的语调把握得恰到好处，让人物结局大胆地在小说中间出台，所以，连沙汀对这篇小说的自我感觉也相当不坏。此篇一出，他的表现故乡的短篇艺术成熟了！

两个口号之争，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只是占去了他的时间，却无法遏止他进入他的第一个小说创作的高潮。据当时人的回忆，人们已经感到他平时为人的憨直，热情重义，而作品却沉郁结实，如同那块神秘莫测的川西北土地。住在上海辣斐德路桃源邨，这个出身于最“土”的乡镇，生活在最“洋”的大都会的作家，仍然保持住自己独有的文化，独有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没有被大上海同化去一分一毫。

沙汀似乎不大愿意人常到他的家中去，很少有朋友被他招待在他的屋子里坐上二十分钟的，好像自己的屋子里藏着几许秘密似的。他说房间是休息与工作的地方，除了睡眠与写作外，就不能有其它。他说如果招待朋友闲谈或者讨论一些什么问题，那尽管到咖啡馆去，没有钱上咖啡馆，那末马路上也是很好的招待朋友的地方。因此每一个朋友到他家中去，刚踏进房门，还没有坐下来，便被他嚷住了。

“呵！××，我们好久不见了，去去去，我们到马路上走去！”

于是，他立刻穿上了外衣，领你到马路上去散步，一走便是好几个钟头，从来没有表现过一点不耐烦或者敷衍的态度，这种热情与精神却是没有第二人及得上的。

他大概就像领着客人拐进故乡茶馆一样，拐上了马路，或者出门几步，便迈上了山坳了吧。当时常去散步的地方，是杜美路与祁齐路之间的僻静街道，那里马路四周的景物，应当说是他很熟习的了，但是怪，他总像是第一次才看到的那样，反应强烈。

当他瞧见了普希金的铜像时，他便会高声朗诵起普希金的诗歌来。他瞧着黄昏的杜美路的那一头，有一两个白俄在踱着方步时，他就会一口咬定这是古老的莫斯科的黄昏的街景。

他看见一个流浪的老白俄时，就想起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常常提到的一些顽固而又悲惨的老年人的命运来，他遇着了携着一匹小狗或者握着一

根手杖的年轻淑女或绅士时，他就会一口咬定：“这些都是果戈理小说中的人物啊！”他生活在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的时代，但同时又生活在俄罗斯的小说世界里面。这是他重要的艺术源泉之一。他沉郁结实的文字与小说风格，是与这些有关的。他的丰富想象力，做“白日梦”的本领，把腿搁在凳子上，便能半天沉入胡思乱想的本领，正是他文学天才的表现。表面的不敏捷、土气，掩盖不住他内在的才华。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故乡人物组成的文学社会里，和他们哭着、笑着、爱着、恨着。这样，他才能从上海的马路边沿和弄堂房子，直抵他的独有的文学天地。

可是，抗日战争爆发了。

综观你抗战初期的感情历程，似乎就是由热变冷。

热的时候我写的报告散文。冷的时候我写小说。我的文学是有冷有热的文学。

文化救亡的热度

生活在1937年的中国人相信，日本大规模的侵华事件是迟早要发生的了。

经历过“西安事变”、“芦沟桥事变”，上海的民情像一锅沸水。沙汀起初还想用文字投入抗战。他仍在《光明》，很快参加了夏衍组织的一次集体创作。

他们听《大公报》记者陆诒做了平津事变的详尽报告，随后在艾思奇家聚拢了一批原“左联”的成员，商议写一部大众体长篇小说，初步定名为《芦沟桥演义》。救亡，要求文学大大发挥它的宣传功用。艾芜、张天翼、夏征农、舒群和他，都热心地愿意担负一个章节。他认写了第一部。

这第一部按照集体商定的提纲，写的是天津于“七七事变”前夕的局势。沙汀第一次赴京时曾路过天津，海河、八里台南开、津油子，这个城市对他还不完全陌生。上海“一·二八”时，商人劳军的爱国举动，他还记得。小说虚拟了一个原籍南方的商人袁晓初的家庭，赋予他们一股正气。陆诒讲的和报纸上披露的来历不明的海河浮尸，汉奸的暴动，日军诡秘的动向，被穿插进去。这样写完了。

小说后来登在广州版的《救亡日报》上，总题目改为《华北烽火》，可能觉得这些作者的文笔离“演义”太远吧。沙汀的一部名《前夜》，下面第二部是艾芜的《演习》等等。这远不是成功之作，小说不像小说，报告不像报告。战争改变了一切，沙汀的思想也转到一个新轨道上。

抗战引起我一种冒险的打算，我以为我应该暂时放下我的专业，不再斤斤计较一定的文学形式，而及时地反映种种震撼人心的战争。要用小说以外的形式写战争，当然就得上前线。7月27日，郭沫若弃下妻儿，穿着和服走出家门返国，使上海的文化界感受到一种同赴国难的冲力。郭沫若一下船，政府方面得了情报先去迎接。郭通过公开的《光明》杂志，找到沈起予。沈起予夫妇一面领郭沫若在南京路缝西服，一面通知了周扬，沙汀。大

家一批批去中山饭店看这个五四时期就崇拜的诗人。沙汀几人与郭沫若操起乡音，谈杰克·伦敦的《阿Q的阿Q》，谈中国人在东南亚所受殖民主义者的欺辱。

北伐名将张发奎是郭沫若的老友，曾邀郭去嘉兴南湖休息了几天。这样，“八·一三”上海战事一开，沙汀和舒群、罗烽都想循着这条线索上前方，让郭沫若介绍他们去张发奎部队。可惜没能成功。

这些天他很不安宁。住在法租界虽然安全，但沪东战区的枪炮声，华界贫民争相拥往租界被阻断在铁网外的惨像，使人心惊。黄浦江上空爆发中日空战，8月14日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前，他正好出门路过，亲眼看见血肉模糊的肢体。他的房东一家，妻子像一般小市民那样，拼命储粮、储盐、储备煤球，传布各种只能吓唬自己的马路新闻。她的侄儿陷入沪东战区，九死一生逃出来，又马上报名赴前线，与叔父发生了争执。据这个中学生对沙汀讲，战区的中国老百姓逃亡中遇到日兵，常被勒索交出钞票，如果只有铜板捧出，就被一刺刀捅死！他亲见一个妇女抱了婴孩，拿不出钱，叫日本兵踢下河浜。沙汀听到叔侄两人的争吵，感到自己不能呆坐在家里。不能上前线，也要有所动作。

这几天，每晚的月亮偏偏特别明亮。听着远处钝重的炮响，望着星空，他“在祝福着我们那些浴血抗战的民族英雄，而且对自己的平安感到惶悚”。

他决定去慰问、采访伤兵。与那几位东北作家两次上街为伤兵募捐，到金神父路“学艺社”对面的一座临时收容所去看望他们。沙汀向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申请去红十字会，不得其门。到各个伤兵医院去，经常碰壁。最后通过私人介绍，有了各种担保，才被允许到一家医院去试试。

他这天冒着华氏九十度以上的高温，踏着软化了的柏油路面，兴冲冲跑到这家医院去。

人家告诉他经费困难，编制已经超员，难以安排。

“不过我并不需要报酬。”他截断对方的诉苦，“连伙食都不麻烦你们的。”

医务处表示拒绝。他不甘心，率直地告诉他们自己是谁，干什么的。

“啊！你就是沙汀么？久仰久仰得很……”

“哪里，我希望能够相信我。”他更诚恳了。

“当然，当然，不过恐怕你吃不消吧，很苦呢！”

“我至少可以帮他们写写信，读读报纸，做我能做的……”

他以为这次能有希望。结果仍是礼貌周到地挡驾。理由是写信、读报的人已经有了。后来才弄明白，由于上海的报纸天天在批评伤兵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揭发某些医院的内幕，这些地方最不欢迎记者文人。对他们暴露自己是个舞文弄墨的，就更其糟，只配吃闭门羹。

沙汀有山地人的顽强劲。他没有灰心，相信依靠同乡关系，只要认识一个四川伤兵，就不愁找不到一批。他终于拿着一个“周海泉”的名片，到萨坡赛路一家私人医院，指名道姓访问一个四川士兵叶士先。他没遭到什么盘问，被允许了。

他惊奇地发现叶士先还是个孩子。稚气，眼睛圆圆的，才只有十七岁。

“嗨！”叶士先惊叫着，“想不到这里会碰得见同乡啊！他们说有个同乡会在什么爱多亚路，可是碰他妈的鬼，真难得找！吃烟，吃烟……你说还有

谁是同乡？多啊，靠窗子那个和我同县，脑袋给弹片炸伤了。这一个也是，伤到腿杆子上。……”一连指出八九个。他是潼南人。

他问他是怎样进军队的。

“不要说吧，上了别人的当呀！”他叹息了。他听信了下乡招兵的招募员吹嘘，说进学兵队待遇好，毕业可以当排长。这个想在农村之外讨出路的年轻人满怀希望入伍，结果还是当兵，并且马上凑齐了送上火线。

“不过，现在总比打内战好吧！单看老百姓是怎样感激……”

“自然，自然，”叶士先不好意思地笑了，“叫人想得也过也只有这一点。”

一个小兵能说出这样的话，让沙汀很感动。当他知道叶是为了救护别人挂彩的，故意逗他：“那你后来不是很失悔么？”

“啊哟！你这个人！失悔？！”他笑嚷着，眼睛转动得更灵活。这是沙汀在慰问伤兵中所见年龄最小，也最有趣的一个。

他喜欢上这个“小兄弟”，一个穿军装的小农民了。可是，采访的计划不得不受到战事发展的影响。上海的书报业在战争刚起的半个月中何等活跃，曾几何时，那些以发售战时报导的书刊盛行一时的小书摊，很快萎缩下去。各类的杂志、报纸纷纷停办。《光明》半月刊8月10日出到第三卷第五号，登载了郭沫若的诗歌《黄海舟中》之后，连一个终刊辞也未见，便结束了。文化人的稿费来源被切断，白米、煤球的价格，一周之内涨了一倍以上。

大家开始考虑上海能否久居的问题。沙汀和欧阳山、张天翼等，讨论过各种紧缩开支，甚至过集体生活的办法。最后觉得还是早一点离开上海，分别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开展文化救亡工作，才是上策。大家的想法差不多统一了，上海文化人向大后方转移的趋势日益形成。张天翼准备第一次回他的原籍湖南湘乡。沙汀、黄玉頔，决定带着礼儿动身返川。

他去找周扬，说出自己的打算。周扬在与冯雪峰正式接头后，似乎在党内被撤了职务，这一年来变得比较消沉，双脚都浮肿了。沙汀很同情他，说了些安慰的话。周扬、苏灵扬说，他们不久要离沪去延安。沙汀鉴于二十年代丢掉党的关系的教训，要求为他开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周扬让他去找夏衍。夏说李一氓马上去成都主持工作，这里会给他口头打招呼的。

10月的一天，沙汀全家三口在沪西梵王渡车站，与舒群、罗烽夫妇（白朗是第一次见到）丽尼（郭安仁）夫妇汇合，一起乘沪杭路火车去嘉兴。吴淞口已被日本军舰封锁，沪宁路有一段不通，要去内地只有先到嘉兴，然后沿苏嘉路辗转绕个圈子去南京。沙汀夫妇准备去那里候长江轮船。周扬特意跑来送行。算起来，在上海的五、六年，这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了。等车的三个小时里，突然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大地晃动，尖厉的呼啸声把礼儿惊得哭叫起来，整个西站笼罩在一片恐怖中。这些飞机仿佛飞来提醒逃难的人们，这就是战争，战争会跟着你走的。

南京难民如云。住进旅店，一行人因为最终目的地的不同，就此分手。任白戈很快来看他。白戈从日本回来便结束了独身生活，妻子李柯是在日本搞左翼戏剧时认识的。夫妇俩比沙汀早两天抵宁，他们要去陕北，这是有一条特别的交通线的，吃住自然都有安排。白戈胆大，其时国共新的合作刚刚开始，他在南京旅馆查房填单时便写明身份是“共产党员”。他见着沙汀说：“你有多少钱住旅馆啊，我介绍你到田汉家去住。”

任白戈担任“左联”秘书长时，参加过“剧协”，与田汉他们混熟了。

田汉被捕后，以不能离开南京为条件保释出来，在这里活动。他的位于丹凤街的家，仍然是宾客盈门。“田老大”欠着房租，照样接待朋友。田把自己卧室让出，叫沙汀全家睡在大床上，自己另弄个小床。黄玉颀是第一次到南京，少不了要观光一下，沙汀携着去游了玄武湖，田汉又陪他们去秦淮河转了转。究竟是战争时期，连游玩也提心吊胆。每次躲警报，田汉都来招呼他们。

那时的防空洞还很简陋，便是平地挖个坑，上面铺些板子，盖上浮土。人们相信这就足够保障安全了。

由任白戈、田汉引荐，沙汀还认识了阳翰笙。阳在成都是有名的学生领袖，他是知道的。阳和吕超是同乡，四川高县人，被捕后得到吕超帮助出狱，等于软禁南京。阳长得高大魁伟，眉毛又粗又黑。他替沙汀解决了近期的难题，订了船票，还帮着考虑入川后远期的生活。经他介绍，认识了成都《新民报》的陈明德，陈欢迎沙汀入川后给他们写稿，还预支了一小笔稿费，解他燃眉之急。阳翰笙特意跑去找吕超，让他为沙汀写了封亲笔信，请成都吴景伯见信后看能否在《新民报》或协进中学给他安排个位置。田、阳两人的热心，使沙汀正如他乡遇故知，逃难的紧张也得到一点缓和。

他在南京一共住了三天，还见到滞留在此地的荒煤。临到去下关上船的这天，“田老大”帮着提行李、找黄包车，送他们去码头，尽职尽责地把一个朋友招待到底。

在南京上船乘的是统舱，满船的乡音。途中意外遇到刘披云。此人是杨邨公的女婿，上海大学出身，沙汀在四川第一次入党不久，经周尚明介绍在党内就认识他。谈起来才知道他夫人在上海难产去世，现在是孤身一人回故乡，买的是“黄鱼”票，睡在机舱下面的一个通道里。礼儿这孩子见他常从舱口的圆洞上下进出，便喊：“洞洞伯伯来了！”以后在成都办杂志，刘披云也是一个支柱。

千辛万苦经武汉到了重庆上岸，沙汀身上的路费快光了，只得住下来筹措。全家挤到张家花园后梁上萧崇素的家里。这位德恩里时代的同乡，这时在《新蜀报》写社论。《新蜀报》的主笔漆鲁鱼，在日本学医，后入红军卫生部门工作，长征突围时掉队，找关系找不到，讨口告化，潜回四川。漆与沙汀谈得很投机，还请他在大梁子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报告会，报告上海的抗战形势。那天到会的听众是一批热血青年，有学生，也有各种职业的人。

三四天以后，筹到了路费，沙汀一家终于在这一年的11月，到达成都。

一个如此熟悉的成都。多了满街的抗战标语，与上海相比，与敌机轰炸、民众沸腾的一路景象相比，这里显得太淡漠了，战争似乎离得远了。下一步怎么办？救亡、写作，还要养活家小，得有个起码的生活基础。在路上已经与玉颀商量好，先把母子俩送到安县秀水玉颀大哥黄章甫家里，单等沙汀求职有了着落，再设法在省城安家。

于是，沙汀与妻儿分手，单身到王岚塘族人杨冠斌家借住。他最先见到的熟人是车耀先和张秀熟老师。

车耀先在这年初，创办了《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极得当地的人心，却被政府连续查封三次。这里的政府还害怕“过激”。车是个不屈不挠的人物，背后支持他的是“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总部队”）组织，查封了，改名再出。《大生周刊》，而后《图存周刊》，这次正准备“复辟”，

还出《大声》。他告诉沙汀，上个月此地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有八百多人参加，李嘉仲、熊子骏、李劫人、张秀熟、杜桴生与他自己都被选为执行委员，阵容还不小。但是不久，国民党的“成都市人民团体临时指导委员会”下令解散这个协会，把它“指导”掉了。

他又去见张秀熟。张在中学教书，沙汀私心里希望在他那里能有党的关系。原先对夏衍不肯落笔介绍关系便有些担心，一问，李一氓根本没有来川，心里便一沉。他对张说，能找到“组织”吗，张说可以去问问，不久告诉沙汀“张老”在成都，但又不说名字（解放后才知是张曙时），没了下文。

正在这时，他听说周文在这里，又去寻他，才知道他的关系也没接上。在“左联”，周文后期任组织部长，他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两个口号中与沙汀是疏远的，彼此相识而不相熟。现在自然是舍弃前嫌来合作，团结此地的文艺界人士，以形成进步文化力量。周文认识刘盛亚他们，沙汀把车耀先、张秀熟等介绍给周，两人把省内外新识、旧识的朋友联结起来，通过带有联谊性质的聚餐会、茶会，很快聚拢了李劫人、陈翔鹤，“京派”的朱光潜、卞之琳，加上后来的马宗融、何其芳等人。

这时发生了上海“影人剧团”事件。这个团体由战前的明星、联华、艺华、新华等电影公司的六十多名演员组成，白杨、吴茵、谢添都在其中。11月由重庆载誉来蓉城。沙汀与周文在沪时间长，负责接待。他们在智育电影院上演《芦沟桥之战》和《流民三千万》，盛况空前。沙汀在演出前的招待会上认识了该团的编剧陈白尘。可是刚演了几场，一晚，莫名其妙地遭一撮流氓、兵痞的捣乱，警备司令严啸虎即借口勒令停演，限剧团三日内出境。

这都是在很可笑的“有伤风化”的虚伪烟幕下演出的把戏。沙汀十分气愤，在车耀先的“努力餐”开会，与周文、刘披云、熊子骏讨论对策。曾有人提议出路费让沙汀去武汉找郭沫若第三厅干预，后经车、熊等奔走、斡旋，以剧团改名为“成都剧社”的方式解决，一天的云雾才散。陈白尘后来住在“华西晚报”，彼此有了往来。沙汀在报上读到一篇通讯，揭露上海宝山县汉奸政权的丑态，他受到当时话剧直接面对群众发生作用的影响，想把它发展为一个讽刺多幕剧。编了提纲，分场分幕都有了，没有写起来。当他离开成都时就把这个提纲交给了陈白尘，后来陈写出了《魔窟》。

（抗日剧团“有伤风化”的案件，刺激了你的讽刺的神经。我开始在现实教育面前想，如果这种警备司令还在当政，军阀能领导人民取得抗战的胜利吗？）

这时的成都，除了《大声》全力宣传抗战，其他刊物很少。有个《国难三日刊》，主要转载省外报刊上的文字，原“辛垦”的葛乔在那里支撑。沙汀与大家深感要打破这里的沉寂空气，一个《大声》是万万不够的。于是12月1日，《新民报》的副刊“国防文艺”，12月5日《战旗》旬刊，12月8日《四川日报》的副刊“文艺阵地”，就一个一个披挂出阵。他参与筹备《战旗》，还有葛乔、周文。三人确定办一种综合杂志，文学作为附类。第一期，组了李劫人、胡绳的专稿。还有时事评论《东战场形势鸟瞰》、《民族统一战线与托洛斯基派》，转载了宋庆龄的《两个十月》。沙汀自己赶写了小说《出征》，把上海访问过的叶士先这个小战士演变成一个老兵，显示人民觉悟到此次打仗的意义与前不同。这是个很简单的作品。可是《战旗》送审，得了“奉命暂缓发行”的结果，仅仅出了一期“样本”，便流产了。后

来沙汀应朋友之约，写了几篇杂文交《四川日报·文艺阵地》发表。他的理论性抗战文字并不精采，用的是《申报·自由谈》时期的笔名“尹光”。这些入川后最初的东西写得比较开朗、乐观，也写得匆忙。

为了解决生计，他拿着吕超的信去求见吴景伯。吴与陈静珊、张志和这些下野军阀热衷文化事业，成都的《新民报》和“协进中学”都是他们办的。吴是“协进”的董事长，他对沙汀表示欢迎，但学校需寒假后才能重聘教师，要他稍候。

转年过了1938年的元旦，省政府要在四川大学搞一次学生军训。车耀先、张秀熟与沙汀谈起此事，想派人进去讲政治课程，拟议中的教师有沙汀、周文。但在临军训前，沙汀突然决定回乡过旧历年。他知道，由于自己与玉颀特殊的婚姻经历，她在安县的寄居生活是不会愉快的，回川第一个春节无论如何两人应当在一起过，便匆匆赶往距安县城五十里的秀水。

住在秀水一座古庙里，妻兄黄章甫所在的秀水小学很容易使他想到汶江小学。一个多月的生活，除了去县城看过郑慕周与大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思考。时间消除了许多隔膜，舅父对他的态度已经相当缓和。家乡表面上还是老样子，他最初的感觉只是压抑，但把细一看，居然恢复了辛亥和大革命前曾经有过的两项“热门”。一项是演剧热，主力军永远是乡间的小学教员，演的是抗日内容了。一项是淘金热，主角是那些富有者，配角是褴褛不堪、混身污泥的金案子和沙班、水班的工匠们。开采沙金的理由开始用的是旧措辞：“赈济灾民”，不久便转换成堂而皇之的“开发资源、抗战救国”。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大旗下，中国这个社会肌体上继续生长的众多的脓疮是那样触目，逼使他沉静下来思索。

我认识一个具有专门技能、曾在上海科技界供职的熟人，他回四川，原是为了在成都找点工作，尽其所长为抗战服务的。但是，在一些亲眷的鼓吹下，他却放弃了原先的打算和专业，搬到我们那个偏远小县去开发金矿！因为随着战争的发展，金价不断上涨，那时候县属两三处素以出产沙金闻名的地区，在荒废多年之后，又开始兴旺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这是长篇小说《淘金记》写作的最初动因吗？这是远因。在协进中学，在延安、冀中，都在头脑里酝酿它，具体写作就更晚了。是一个成熟的胎儿。直到我夜宿仁寿的北斗镇，我的人物才有了出场的空间）

他没有立即构思新的小说。在他的思想里，“淘金”是不是应当立即着手写的抗战题材，还没有想好。不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扫除了他不少乐观的想法。大后方的现实深刻影响了他。给他增加了文学创作必需的忧虑和沉思。

旧历年底前夕，协进中学寄来请他教“国文”的“聘书”。报纸上大字登载着重庆遭受日机轰炸的消息。为了区别抗战的前方，当时报上把偏僻的大后方地区戏称为“堪察加”。

“看一看我们这堪察加临难时的情景，也不是无意义的”。他在秀水雇了两辆包车，黄玉颀领着杨礼，一点点可怜的行囊。2月的故乡春雨淅沥，全家抱着新的希望，赶往成都去了。

冷观“堪察加小景”

春节后回成都的当天夜里，他由走马街穿过春熙路南段，想去拜会几个熟人，恰被全市火炬大游行阻在路上。

站在中山先生铜像对面的阶沿，只见火炬队伍前至提督街，尾巴甩在东大街上，歌唱声、口号、火光，使他的脉搏也随之兴奋地跳动。在“米粮同业公会”、“在野军人学会”、“大商社”、“群力社”各种形状的旗帜之后，他发现了“文教会”的朋友们，得了一支竹梢当中嵌有浸透油脂的纸捻的火把，走进游行的行列。

“看了这情形，谁也不相信中国人会甘心沦为法西斯强盗的奴隶的！”行进中的沙汀，看到一条火的长龙，一座火的长城，禁不住想，“在需要 we 流血的时候，同志们，也一样吧！”

但是他究竟与“八·一三”在上海或初到四川时不一样了，狂热的温度降下来归于冷静，他在追记完这场游行后说：许多人基于这次运动而发生一种廉价的乐观，是要不得的；因为我总忘不掉三个月以来的沉闷日子，当天夜里某一部分情形（指沿途群众在旁呆看——笔者）以及那漂亮的整齐的乐队。他把家安在仁厚街一个小四合院的厢房里，同院住着李嘉仲，在一家中学教书。仁厚街位于少城，是个小巷子，离有名的文化区祠堂街很近，逛书店，去车耀先的住所，都很方便。“协进中学”两个班的国文课有固定的钟点，课下要判一百份作文卷，还要帮房东的孩子补习功课，占去的时间很多。他对于教书，和在上海“正风中学”一样，实在只当做谋生的手段，兴趣是没有的，教上了又不会不认真。“协进”有悠久的历史。辛亥年间全省首批办七个中学，它是省一中。“五四”前后这里是学潮发源地，两次遭封闭。阳翰笙便是这个学校的风云人物。现在是1933年后重办，民主人士、地下党员在这里出入活动，学生中去延安的不少，被人暗地里称为成都的“陕北公学”。沙汀一进“协进”，才知道教师中有许多熟人。杨伯凯在做教务长，“辛垦”的另一发起人王义林也在这里，但很难碰到。刘披云因住将军街，离车耀先住处更近，课后常在那里遇上。刘以后在“天府中学”教书时，罗烽介绍吕荧未求职，沙汀找刘，刘曾让出两班的作文卷交吕荧改。学校还有一位老先生李筱亭，是资历很深的革命者，就住在校内，上课下课都到他房里去坐坐、谈谈。其他教师就没有来往了。

四川党组织过去受到严重破坏，去年年底刚刚重建。等到沙汀这次回来，情况大变。车耀先同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关系，这样，沙汀不久也与罗联系上。教书之余，协同周文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周文寒假参加四川大学的学生军训，任队长，由此与当地的文学青年羊角（张宣）、车辐等建立联系。1938年3月6日，经过长久联谊的推动，周文、沙汀等终于发起组织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工作团在学道街济难第一小学召开了筹备会，有五十多人参加，会上通过了《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发起意见书》，推选马宗融、周文、沙汀、任钧、蔡天心、羊角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正当大家东奔西跑，为在两周后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忙碌的时候，国民党市党部突然命令不准这个组织立案。成立会就这样流产了。工作团筹划的意义只余下一点，就是为第二年成立文协成都分会铺平了道路。沙汀又一次感受到抗日救国的“阴暗面”。

文化人聚会的地点，除枕江楼一类比较宽敞的地方外，主要是车耀先

在祠堂街开的有名饭馆“努力餐”。与周文谈话，多半不在他高池街的住所，也在这里。沙汀佩服车的精干、乐观，坦诚到极点，任一点东西也藏不住的性格，愿意为《大声》写稿子，参加他组织的宣传、慰问活动。

每在街头宣传，车耀先总是亲自站在凳子上演说，声音洪亮，说得机巧和热情，加上他从行伍生活中吸取来的丰富语汇，毫无顾忌的手势，真有一股巨大的煽动力量。他当团长的时候，一只脚受过伤，他就高呼：“只要是为了抗战，我愿意把那条腿也打断！”他一上街，连黄包车夫也认得他，互相传告：“车案子今天又要搞啥子怪事了！”人们就高兴地涌着跟他走。

一次，车耀先到仁厚街来，与李嘉仲、沙汀谈起他主持大声周刊社发起的抗战军人家属慰问团的事。车耀先一说话便滔滔不绝。沙汀主动要求也去参加。

在一个星期天，他们结队去慰问五福街余湘藩的家属、西御河沿街赵文全的家属等六家。看到他们住在透风的竹笆房子、阴暗的机房里面，只靠浆洗衣服，做苦力，为上了前方的丈夫或牺牲了的男人，艰窘地养活着孩子，却得不到政府的抚恤。慰问团的到来使她们起初快乐得张皇失措，连话也说不出，继而就伤心哭泣起来，听到找来的保长们，眯着惺忪睡眼，说出那些推诿的话，沙汀感到车耀先和自己的心都在可怕地抖动。

还有一次，他们别出心裁地组织了送军属老母进医院治疗的活动。篾笆做的大幅标帜上横写着：“送抗战军人壮丁的母亲穆老太太进医院”、“他的儿子在前线为我们流血，我们应该怎样救济她？”老人的儿子穆合林，原来是黄包车夫，老太太孤苦零丁，住在民生里的大杂院，穷得没有床铺，就睡在潮湿的泥地上，瘫痪了。大声社社员组成的这支队伍，推着车子将老太太送到平安桥医院就医，一路散发传单，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引来许多人观看。

人群中有着跟着唏嘘感叹的，也有漠然观之甚至讪笑的。沙汀跟在队伍里走着，他想到那句名言：“一面是严肃地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这些感想在车耀先那里可以纵意而谈，所以，每星期他都要去“努力餐”。这个饭馆在成都极有名气，不仅是开办于1929年，历史悠久，1933年迁来祠堂街后，由于车耀先的经营，以物美价廉的“大众菜”为号召，连黄包车夫都可以在这里美美地吃上一餐。又以楼堂雅座招待进步文化人，提供党活动的场所，成了人民大众、革命者和特务都经常光顾的地方。

车耀先依靠早年军队、基督教会的复杂关系，和他的胆识气魄，干什么事情都热气腾腾，毫不畏缩。每年青羊宫“花会”期间，他都在南门城墙上打出自编的快板广告，招徕顾客，其词曰：“花会场，二仙庵；正中路，树林边；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

沙汀非常欣赏车耀先，与他组织的“大声抗敌宣传社”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个社最发达时，社员近千人，成员分布在泸州、绵阳等十几个县。每次在“努力餐”举行的活动他也尽量参加。一去，车就会在馆堂里走来走去，遇到形迹可疑的人进来，他就会机警地给沙汀他们递眼色，让他们谈话时留神。他有一架收音机，靠它传播各种来源于政府以外的消息。沙汀最早读到延安出版的书刊，也是在“努力餐”的内室里。1940年3月14日，车耀先在自己的餐馆里被捕，随后与罗世文一起在中美合作所关押，沙汀其时从重庆疏散回乡正要赶往成都去，他对于车的被捕是很震动的。新朋友中一见如故的是马宗融。过去在上海并不相识，只是彼此知道，但都认识巴金，

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书。马本人是一个正派到不能再正派的书生。他与左翼作家接近，不含芥蒂，不卑不亢，肯交换意见，与沙汀便很投合。

沙汀从故乡回成都不久，3月17日，马的妻子，《生人妻》的作者罗淑（世弥）突因产褥热逝去。罗淑朴实、温厚，她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能使朋友之间消除误解，她的产量不多却结实有力的小说发表时，连周围关系很近的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因而大大惊喜。这样一个不声不响的好女性，遽然离去，沙汀虽接触不多，也心情沉重地赶去吊唁。

陈翔鹤也是抗战后才认识的。大革命前后便读过《沉钟》上陈的小说，他回忆沉钟社的文章也给沙汀好感，懂得了为何这个团体会受到鲁迅的赞赏。

（我和周文分头在成都文艺界联系，第一批结识的人里就有翔鹤。觉得他朴质、熟识得快。他生活不宽裕，父亲开过钱庄，后来破产，才从重庆搬来。这时父亲已经去世。卞之琳、何其芳陆续来成都，我通过他才结识北平作家。

我们虽然谈得来，但起初感到他旧文人习气较重，住房窄小，却极喜养花。所以1938年春夏之交，一天，我到周文家参加党的会议，发现陈也在屋，有点惊奇。他是周文介绍的。我认为一个“好人”入党是好事，后来关系更密切。我去延安前，征得“协进”的同意，把我的课给他教了。——沙汀1986年12月5日讲）沙汀与“京派”作家交往，使人不感到他有“左翼”气。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当院长，这个极瘦极小的中年人是个诚笃的学者。他为了“教育自由”，曾在川大反对国民党二陈派撤换张颐校长，得到沙汀、周文的支持。周扬曾通过沙汀写信给他，欢迎他去延安参观，朱也立即回信表示愿去，但后来被欧美派的朋友阻止了。他夫人是南充人，大家叫他“南充女婿”。

朱光潜的学生卞之琳在川大当讲师。何其芳先在故乡万县教了一阵书，然后也到了成都，在石室中学任教。他们办起了《工作》。何其芳发表了《论工作》和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沙汀读了，改变了对这个带副眼镜，有一个油黑的胖脸的书生的看法，觉得他对抗战成都享乐、懒惰、陈腐、讲究美食的风气的厌恶，和自己是那么一致，对京派作家更有了好感。

我原来不认识沙汀，但知道他。因我参与《文季》、《水星》两刊的工作，郑振铎气魄很大，把上海、北平两地作家拉在一起，使我接触到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艾芜的，沙汀的。

这时周文、沙汀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他们与党的关系。他们常来川大找朱光潜，方敬、罗念生、谢文炳。谢是川大外文系主任。这时，我和何其芳编了《工作》，轮流出钱，用土纸印，觉得成都气氛沉闷，想到前方去看看，这样，才使我与沙汀建立了全新的关系。

有一个道地四川作家和沙汀这个时候才建立起友谊的，是李劫人。他在成都读书时期就听别人说，李劫人是个有骨气的人。当时的督军杨森自命为“文化军人”，招揽留法学生给他当“参议”、“秘书”。李劫人断然拒绝别人的劝诱，当了《川报》主笔。杨森手下一个红人黎纯一无聊地登了“为男友征求女友”的启事，李邨人一天在自己报上也登了一则“为女友征求男友”的启事，其条件有“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这种壮阳药丸是统治阶层中不少人常服的。于是老百姓拍手称快。黎挑拨杨森封闭报馆，抓了李邨人。这在当日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后来李因为与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共进退，愤而辞职，在指挥街租佃的住宅内，开了名为“小雅”的菜馆，夫妻俩又当厨师，又当堂倌。沙汀上海时期回川，还特意去吃了教授夫妇做的葱烧鱼、红烧牛肉。那是一间铺面的小馆子，真是“雅俗共赏，小大由之”。

现在，沙汀看到的李邨人便是这样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作家。李已经写出了《死水微澜》等小说，材料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军阀连长指使几个散兵游勇绑了他儿子的票，经过袍哥大爷出面花钱赎回，使他了解到成都近郊场镇上的人情世态。直接出面斡旋的袍哥叫邨瞎子，就是《死水微澜》里罗歪嘴的原型。李邨人同时任嘉乐纸厂的董事长，致力于抗日文化与实业救国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个纸厂在成都的办事处，后来成了“努力餐”之外又一个进步文学界经常聚会议事的地方。

（你的文学圈子扩大了。过去，你的生活视野很大，却只有一个较小的左翼文学领域。

是抗日战争造成我的“扩大”，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我到解放区去，同行的是两个新识的非左翼作家）

整个教书、联络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当他的目光从周围这些具有美好人格的“精英”身上移开，移到广大的后方，大半年的观察所引起的深广的忧思，时常触动他考虑：一个文学家的责任在哪里？廉价的热情家的隐瞒、粉饰，究竟有无价值？他本来想寻找故乡抗战的如火如荼的场面，神圣的新的东西，但“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比如随着日机轰炸带来的全省防空机构的林立，救国公债的发行掀起的呼声，在成都都曾怎样引起他的兴奋呀。

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新喜剧。这种新的喜剧，包含着新旧双重的痼疾。他的家乡的封建性权力结构所带来的人的愚昧，已经在他已有的作品里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污浊一面，现在又以新的可笑方式再度出现。春节时节在安县听说一个故事：一个叫陈雨村的，专科学校毕业学生，父亲陈福田，袍哥，很有势力，和一个姓刘的小老板拼力争夺县防空协会主任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位置。北川有人挖出过炸弹的事他也听说过。炸弹是国民党追赶红军时扔下的，与抗日无关。老百姓想把火药弄出来，化了炸弹壳好打锄头、弯刀，结果炸伤了人。只要安排一个喜爱恶作剧的人物，把这个炸弹拿去让陈雨村拆卸，就能出尽防空主任的洋相，就能被小老板利用。这个人他想到了安县的视学戴中孚，一个能产生各种无穷无尽恶毒“智谋”的家伙。陈雨村成了谐音的愚生，一部喜剧就构成了。这时，茅盾主编《文艺阵地》，从广州来信催稿，促成了这个构思迅速“成型”。他早就计划着要写一系列暴露“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的作品，总题叫做《堪察加小景》。这是新的故乡小说。刚完成的这个描写小防空主任愚生的作品便叫《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接下去，他在《堪察加小景》系列里还想写的题目有：《气包大爷的救亡运动》、《到西北去》、《联保主任的消遣》、《从军记》，等等。联保主任和救国公债的故事他拖延着，但半年多后，终于写出了。其他的均落了空。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既然张天翼《华威先生》会引起持续几年的要不要暴露

抗战的争议，沙汀自己对这个计划也发生了犹疑：写成《防空》以后，我却逐渐动摇起来，怀疑起来了，我问我自己：这样做下去，在抗战期中，真是一桩必要的工作么？我怀疑我是在泄气，而泄气却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仅仅写了这样一篇东西。虽然教书生活给我的妨碍也不少，但这却并不是主要原因。

（你这是对自已艺术表现的无把握，是一种动摇：或许你是对的，但我认为，不要忘掉中国文人以社会为己任的传统，我们这一代很难只专注艺术。没有写进“堪察加小景”的东西，我没有抛弃，最后都摄入《淘金记》中）

这年7月，周立波发表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传布很广。沙汀读到后心里很不平静，最亲密朋友的成功当然使他高兴，但也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什么我不能写出内容全新的作品呢？是不是应当改变自己旧的基地，另辟新路呢？“八·一三”后强烈想上前线去的冲动又一次掌握住他。他的山民性格使得他对任何一种欲望，如不经过亲身试验是不愿放弃的。到前线去，到敌后生活一段时间，写出能鼓舞士气的前线作品这个目标，使他憧憬。

在这几个月里，后方年轻人奔赴延安的多起来。原安县县长夏正寅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三个中学生，就曾先后来找他，是他经过组织开了介绍信送他们去住“陕北公学”的。张秀熟闻风还介绍了一位和尚与他们同行。后来听夏正寅说，那两三个青年学生半途折回了，只有那个和尚到达了延安。

沙汀对教书已经很不耐烦，一年只写一个短篇的生活无法忍受下去。暑假将近，他小心地与玉颀商量，看能不能让他一人去延安。

玉颀说：“你去，我也要去！”

这样一个娇妻，能受得了西北黄土高原的风沙？起先还想说服，冒冒失失提出了一个时限：“去半年就回，到敌后跑一趟，写一本像立波那样的报导，你何必跟着去吃苦呢！”可是娇妻更厉害：“我不拦你。把孩子放在我母亲那儿，我们一起去，半年就转来。”

事情就这样定了。难得玉颀有这样的决心，分离本来是痛苦的，现在事业、爱情一样都不必舍弃，沙汀便紧张地准备起来。

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陈翔鹤将这件事透露给了何其芳和卞之琳，两人早就想去前线，已经在骑自行车、爬山，练脚力。结果，一天晚上，仁厚街沙汀的家里就来了这两个客人。

这是他（指何其芳——笔者）第一次到我家里，同他一道的还有卞之琳。其芳这次给我的印象跟以往不同，开展多了，爽直热情，没有丝毫客套、拘泥的痕迹。他们共同提出来的要求是，希望能同我一道到延安去，到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去！那时候，到延安去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因为到了广元以后，沿途都会遭到盘查、留难，甚至有被抓、失踪的危险。

我答应立刻向组织反映，而不久我们就一道出发了。出发前的日子变得很短促。要把礼儿留给在外面教书的姥姥。夹忙中又替从兰州来成都的萧军在桂花巷六十四号李劫人的院子里分租了两间厢房。矮矮壮壮的萧军穿着黄夹克衫，带了新妇和不满周岁的孩子，要在此地办杂志。两人在上海因口号之争生疏，但他还是尽了地主之谊。

去延安的介绍信是邹风平办的。在介绍林海坡，一个文化水平挺高的旧军人入党时，沙汀与邹见过几次面。只知道他与罗世文都在做党的工作，

实际上邹是省委未恢复前的省工委书记。沙汀细心地想到川军四十七军李家钰部正在山西南部作战，安县故旧中也有去投靠这个二战区的长官，谋个一官半职的，便求郑慕周托人由李家钰在成都的留守司令部填发一张护照，说明一行四人去是晋南的部队工作。这种掩护手段沙汀从小见惯，做起来相当自然。一切为了减少路上的危险。妻子之外，对于两位书生一样的朋友，似乎他也有更大的责任使此行成功。

向往前线，向往热烈的生活，他是去追寻创作之源去的。他朦胧觉得，跨过秦岭便有新东西在前。

你去解放区是为开辟新的写作领地。到头来，延安冀中以及贺龙都被囊括进你的乡土世界。

这是我自身的扩展。没有完全否定“昨我”，而是采取延伸式，写作的自由度并不小。

后来再写不出那样一个阔大不羁的贺龙了！

延安行

一张发黄的旧照片。背景是起伏的山地，白色的带有角檐的房子。黄玉颀居中，身着短袖旗袍，短发，纤弱而白皙，腼腆地垂下双眼。她是那样的娇小。一侧是沙汀，显得清瘦，穿白色的夏布长衫，头发习惯地从中间分开，有一绺总是不太服帖地扎撒着，神情严肃得过份。另一侧露出微笑的是诗人何其芳，黑黑胖胖的圆脸，架着眼镜，也穿夏布长衫，左袖捋起，手臂上潇洒地搭件衣服，像个大学生。这张照片是在川陕边境的宁羌（宁强）摄的，当时诗人卞之琳身边带着一只小照相机，他举手拍照的影子清晰地投在何其芳白色的身子上，奇妙地完成了一幅川陕道上的四人同行图。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张照片居然完好地保存在卞之琳的家中。四人从成都出发北上的日子是1938年8月14日。已经是夏末初秋的天气，仁厚街沙汀家里凌晨四点多钟点燃了灯。岳母黄敬之特意从教书的仁寿文公场赶来。她来回忙着，为远行者收拾行装，弄饭吃。空气是压抑的，玉颀、沙汀不知干什么好，小声说几句不相干的话，又怕惊醒了床上的阿礼。

可是临到动身的时刻，还是叫醒了孩子，黄敬之领着送到了门口。外面的空气凉飕飕的，略显秋意。直到夫妇俩坐上洋车，阿礼还以为妈妈会带他走的。等车子启动，孩子顿然悟到自己已被丢下，便放声大哭起来。车子拉过一条街转了个弯，还能听见那伤心的哭声。

玉颀拼命压下随时会爆发的感情，她的耳边从此总留下儿子从远远的巷子深处传来的声音。

在她延安的日记里，几次记下了这个离别的早晨。玉颀的多感牵掣了沙汀日后在根据地的生活。

在成都北门汽车站与何其芳、卞之琳会合，乘车经新都、广汉、德阳、罗江、绵阳，当天黄昏时分抵达梓潼。沙汀少年时代最感兴奋的大型流动集市梓潼会的发源地，现在是个荒凉的县城。他们下榻在城内旅店里，隔壁就

是汽车站。入夜后，这条唯一的城关大街看不见行人，只有这家旅店和它对面饭馆高高挂起的两盏发着刺目白光的煤汽灯，照着旧城。何其芳把它形容成“像两只闪耀的钻石戒指套在枯瘦的黄蜡色的手指间。”因为下雨，汽车不通，他们多看了这汽灯两天，沙汀有机会加深认识了这两位他今后的文学伴侣。

之琳是特别的内秀。他在四川大学还保留着教职，一心想到前方写东西。其芳诚朴，说起话来一口气不歇。他批评过去是为了结束过去，连父亲都批评在内，说：“我父亲抗战爆发后，花几百大洋买个寨子，在山坡顶上，修起厚厚的城墙，枪炮也打不进，准备固守呢！”

其芳每到一个地方便给他妹妹频伽写信，然后便满天找邮局投寄。在梓潼，他穿了之琳的雨衣去找邮局，回来说，原来邮局设在一个店铺里，没有挂牌，也没有邮箱。他像是发现了一个神话世界，笑得很天真。

比起沙汀，其芳对社会的黑暗知道得太少了。在梓潼听到十七万人口的县城，竟有八千烟民，旅店里随时可买烟膏，他瞪大了眼睛。夜晚听陪烟女子为了多要两角钱苦苦地哀求。

客人和妓女讲着价钱：“六角钱？”“不行。”“七角钱？”“不行。”“八角钱？”“不行。”男子逗着玩似的，女子可怜地低声说：“给我两块钱吧。”其芳第二天说起来，脸被扭歪一样。沙汀只好安慰他似地苦笑一下。

雨住了，17日乘了一辆满载汽油桶的客车上路。四个人被挤在车门的一角，互相开着玩笑，说“要负起保卫汽油的责任。”

车过剑阁，到了嘉陵江的支流白龙江的郭家渡。这里的汽车一律要上木船由纤夫拉过岸去。为了对岸载满故宫博物院古物的几部汽车过河，这天刚刚淹死了一个拉纤的。他们的车子退回到宝轮院过夜。沙汀发现附近一户农家在请神给小孩治病，喊了大家去观看。这类似北方的“跳大神”，只是降神的巫师浑身颤抖抱着一个木制的“琢琢神”，神的手脚是可以活动的。

次日过河，改乘了货车，经广元，穿行大巴山脉，进入陕西境。21日到宁羌。在宁羌车站，他们遭了宪兵检查。其芳手提箱里一本哲学书《观念论》，因为上面印了一行小红字“苏联大百科全书版”，便被“客气”地没收了。之琳在广元买的一本一折八扣的《西游记》倒安然无恙。晚上，另外两个盘查所的宪兵又来查店，翻看了所有的箱子，特别问带没带什么书。一个“丘八”突然问：“你们是不是去延安住‘抗大’啊？”沙汀掏出李家钰的护照正要回答，不料何其芳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语调，摸一摸自己的下巴说：“都长胡子了，还去读书？！”护照是真实的，其芳的“戏”也演得成功，事后大家畅快地笑了一番。

宁羌是个山城，他们在城外滞留了两宿。进城去看，一条正街被其芳形容“像一件穿在贫穷人身上的破旧然而清洁的蓝布衫”。就是在城内西南角的山上，有一所带角檐的房子，挂着“宁羌中正图书馆”的牌匾。阅览室里居然有《大公报》、《西京日报》、《新新新闻》。他们已经有八天不知道战争的消息了，便“狼吞虎咽”地读了一通。之琳便在这个图书馆的外面，拍下了那张珍贵的照片。

23日，又继续乘货车到南郑。这里的栈房臭虫多得吓人，晚上咬得只好睡到桌子上去。次日过凤县，翻越秦岭，到达宝鸡。由于陇海路伸到了这里，从陆路逃难进四川的人汇聚于此，宝鸡这个小小的县城在抗战中奇异地繁荣起来。商业街上有漂亮的饭馆、百货铺、理发店和电影院，新建了许

多房子，匆匆忙忙凑起了一条条热闹的街市。25日，他们从这里乘火车当天抵达西安。

西安有宽大的街道，留给人们步行，却没有叮叮当当的电车。商业街道是老式的，有帝王旧都的宽大气派。最触目的是澡堂林立，外来的百货奇贵。四人住进一家旅馆，沙汀暗中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交上组织介绍信。其余等待的时间里，便公开地逛街、下馆子。赴延安的前夜，他们得到通知，搬进了七贤庄。在办事处，沙汀把在上海认得的李初梨介绍给其芳、之琳。

8月28日下午，他们搭上办事处租来的敞篷商车，向北进发。办事处的职员交待了路上全车人的集体护照，最后点了点车上的人数，说：“除开那个小孩和小鬼，一共三十二个！”这引得那个小鬼直咕噜：“为什么不算我”。大家逗他，“你是小鬼，不是人”，车在笑声中开出。人们挤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面，连车头都坐上了人。划过城门时，他们会机灵地伏下身子，显然都是“老资格”了。车子跑上了扬起黄色尘土的公路，前面的几个人便扬声唱起来：前进，中国的青年，抗战，中国的青年……沙汀感到心里发热。这多么像是上海救亡时的歌声啊，自回到“堪察加”将近一年，不闻此声已经久矣。不是没人唱歌，而是唱出来没有这么开朗、激越。自己这次历经辛苦、带着妻子出来，还不是为了摆脱那个沉闷的环境，想要呼吸一下延安的空气，开辟新的写作领地么？这个延安的空气在车上就迎面扑来了。

首先是互相喊起了“同志”。武装人员里，七个是八路军，今年2月从山西前线调回读“抗大”，不久又被送到湖南湘潭学开“二分机关炮”。一个是新四军，要入“抗大”。从湖北、江苏、河南、陕西各省来进“抗大”的有九人，倒有六个是女性。一个坐在汽车司机旁边手抱孩子的妇女，原来是徐海东的夫人。一个农民模样、晕车很厉害的中年人是徐海东的哥哥。这引起沙汀极大的兴趣。被立波的《冀察晋边区印象记》激起创作欲望来的沙汀，在读那篇报告的时候，已经记住了那位英勇而富人情味的徐海东将军的名字。现在他的夫人穿了军服，像一个大兵一样坐在这个车子上，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两个“民先队”队员是活跃分子，组织啦啦队拉歌，特别的有劲。其芳很快坐不住了，在车上窜来窜去，休息时爬上爬下，找这些“同志”聊天，热心地搜集材料。沙汀注意到汽车司机是车上唯一一个露出冷漠、倨傲神气的人，大家叫他汽车工人，不称“同志”，这是抗战期间滋生的一个发着不大不小财的阶层，以后更在滇缅路上显出神通来的。好在大家只是一味敷衍他，只望路上不抛锚就行了。余下的时间还是快快活活地唱歌：全国动刀兵，一齐来出征。

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批人马哪里来？

西北陕甘宁。

杀退鬼子兵，

一齐下关东。

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

朱德毛泽东。

这个歌是配着陕北粗犷的民间歌调唱的。对这两个人的“英雄崇拜”，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是沙汀觉得并不难接受的延安空气的一部分。

车子开过咸阳、泾阳，在三原住了一宿，又休息一上午，然后开往耀县、同官。30日经宜君到洛川。越是接近目的地，能见到的徒步去延安的

青年学生就越多。他们的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沾满黄土，背着背包、书包，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公路上不绝如缕。沙汀感到他们更像是一队队的“朝圣者”，比自己勇敢得多。他真想去叩问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探听他们的身世、经历和满脑子的理想。在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的车子滚了满身的尘土，经过郿县、七里铺、少陵川，远远地看见宝塔山了。

十八天，行程三千余里，从成都到了延安。

四个人一起住进城里的西北旅社，这是边区政府招待所，专门招待外面新来的人。一个临街的小院，平房，土炕，纸糊的有方木格的窗子。第一顿吃上黄澄澄的小米饭，中看不中吃，挂在喉咙上，很难下咽。当时还不大觉得，只感到新奇、兴奋。延安这时还未遭受轰炸，窄窄的城内街道，两边商店的招牌都是蓝底白字，铺板也是浅蓝的，虽不漂亮，却显得洁净。

刚到不久，周扬、苏灵扬就赶来看沙汀夫妇，并结识其芳、之琳。周扬显然已摆脱了上海后期的阴郁心理，脸色红润。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主持边区教育厅，也是4月刚成立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人之一。诗人柯仲平主持“文协”工作，腰间插根旱烟袋，人称柯胡子，也跑来慰问三位作家。延安文艺界为他们搞了个简短的欢迎式，沙汀代表三人讲话答谢。

才几天，就觉得穿长衫别扭了。何其芳尤其来得积极，见了周扬就要求换装。他把自己的、沙汀的夏布长衫、西服，都拿到南门市场上卖掉，换成卤羊肉、枣糕、蕃茄吃。或者几个人拥到北门饭铺去享用延安的特别菜：“蜜汁咕噜”、“三不粘”。刚从国统区来的人，嘴巴原是吃惯了的，稀奇的是蔬菜很缺的黄土高原上竟会有那么多的蕃茄、黄花菜。

呼吸着延安的空气，沙汀感到了这里的穷苦和自由。踏着麻草鞋的知识分子很少有愁眉苦脸的，起码看上去一个个都很快活。女同志用布条打成的草鞋，还有各种花头。到处都有歌声。一个刚来的电机工程师甚至抱怨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可是等到沙汀四人穿上周扬送来的灰布军装，像个延安人似地走在街上，他们的口里也要哼出歌子来了。

周扬满足了他们的另一个请求，9月初的一天，安排好他们去见毛主席。毛泽东住在城西凤凰山下，“光华书店”的上面，一排三间石砌的窑洞式的屋子。他从一张没有上漆的白条木桌边站起来迎接客人，高高大大，穿一套蓝布制服，比较整洁。这时他比以后要瘦些，眼睛有神，看上去精力充沛。沙汀坐在他对面，觉得他平易中气度不凡。等到开口说话，谈吐幽默、生动，牢牢地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寒暄过后，沙汀他们说，这里给他们很深的印象，很想写延安。“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毛泽东微笑着，一边习惯地举起右手来，说一座便弯下一根手指。“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

等以后沙汀在枣园听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观察在柯仲平的诗歌朗诵会上，毛泽东耐心地坐到底听完；看各种场合，包括露天观苏联电影时毛的露面，慢慢地熟悉了他的身姿，说话的语式，知道这句“也有一点点可写”的话，是有相当份量的。

沙汀他们又说，想经过延安到前线去，到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去生活一段时间，写抗战需要的通讯报告。毛泽东表示赞许。他点着头，从容地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我支持你们！”

接着，毛仔细地与他们攀谈：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这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他举着自己的例子。大革

命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好坐了，只好让两只脚自己走，很快也就学会走路了。

大家听得都笑起来。（你是否感到毛泽东的讲话是他身上最有魅力的地方？据说由于毛能运用古语、俗语、笑话，弄出满堂笑声，延安人说话逗趣、诙谐的风气很盛。许多机关、工厂贴有一条别致的标语：“工作时间不得开玩笑”。我初到延安便感到毛泽东的威望无处不在。延安当年演讲成风，王明善辩，周恩来精细、有条理，他们都可以连讲几天。周扬也变得善讲了。不过毛说话大而化之，亦庄亦谐的风格是独特的。）这次会见结束后，周扬便找沙汀谈工作安排。“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间不久，文学系因缺少教师，招生比音乐系、戏剧系已经晚了一期。周扬主要工作在教育厅，又兼着“鲁艺”文学系的系主任，希望沙汀留下来顶他这个职务。这样，沙汀想很快上前线的愿望便只好搁置了。不过，他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只同意把文学系的事情“代”一个时期。他没料到何其芳痛痛快快也答应周扬留在“鲁艺”教书，这使沙汀对做这个代主任有了信心。玉颀也有了安排，她停顿的学业有了重理的机会，“抗大”成立了女生队，她虽不愿离开丈夫，好在延安不大，还是同意到“抗大”去读书。卞之琳是利用四川大学暑期和四个月的军训时间跑出来的，他没有立即参加工作，就住在城内柯仲平的文化协会。不久，他参加“文协”组织的前方文化工作团访问晋东南太行山区，随着陈赓下面的七七二团辗转了半年。

四个人有了派定，便从西北旅社搬出来。沙汀、其芳立刻到北门外西山山麓的“鲁艺”窑洞报到。

到“鲁艺”的那天，已是傍晚，教职学员们都蹲在席棚底下的饭场上吃晚饭。教务处干部说，那就也吃饭吧。可是他们没有碗筷。接待同志便喊：“从大后方来的作家吃饭没有碗筷，快点吧，谁吃完借碗筷使使，人家还饿着肚皮哩！”几只搪瓷大碗送过来，也等不及竹筷、铝勺，折一枝柳条，搓巴搓巴，交给作家。他们笑了，也学着样子捧着碗面对面地蹲了下来。当然还是黄澄澄的小米饭。每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大米白面。

我是“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那时，“鲁艺”院长是毛泽东，副院长是沙可夫。沙汀他们还没到学校来，沙可夫已向我们宣布音乐系要请冼星海，文学系要请沙汀、何其芳、张天翼、陈荒煤来教书。张天翼因病后来没能来。沙汀他们来后，我们曾在文学系窑洞前的小坪上开过欢迎会。沙汀讲话老练、冷静，何其芳讲话热情澎湃。

沙汀给我们讲两门课：世界名著选读和写作实习。我记得他讲过《死魂灵》，他说他读过八遍，记得很熟。讲乞乞科夫，说他做梦都梦见他。我在班里被称为“儿童作家”，意思是年龄最小。沙汀指导我们写作，教我们如何观察，如何记素材笔记，说这些笔记到写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看，但印象保持深刻的往往是最好的材料。他还讲过鲁迅，茅盾，说茅盾写作如何编制提纲。后来我们写作都是学了他说的一套。北门外“鲁艺”的窑洞开在一个半圆的山上，中间是块坟地。窑洞门上挂了一块块的帘子。后来有了“等级”，“首长”是棉门帘，学生是单门帘。这里夜不闭户，只怕狼，不怕贼，曾经发生“鲁艺”教师的婴儿被狼咬死的惨剧。学生窑洞，大的可住十人，火炕通铺。作图书馆的窑洞藏有三四千册书，文艺类占三分之二，沙汀的三本小说集这里都有，学生们大部分读过。上课的大洞可装五六十人，但经常不用，在露天讲课。下雨天从窑洞走下来，路滑，常常一个接一个地跌倒。

文学系第一期的学生有五十多个。学制大约一年，入学读三个月书，然后去敌后实习三个月，回来后再学三个月，就毕业了。学生听讲都是自带一个马扎子（折叠小凳），在膝盖上放一块木板记笔记。老师讲课没有黑板可写字，就站在那里，有太阳的天便戴顶草帽。主要还是自己读书、讨论、写东西。

沙汀还教过爱伦堡的《西班牙通信》、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和其他论述报告文学的著作，都是选读，教材不固定。他并不特别能讲课，只是老练，能把读书心得、生活经验、写作体会融于一炉，讲给学生听。有时还发出趣语，是一种浑厚的幽默。

秋天，“鲁艺”领导采纳了沙汀、何其芳的建议，趁中央号召干部帮助群众生产的机会，以文学系一期学生为主，组织下去劳动，每人同时完成写作任务。

沙汀老师领我们到延安附近二十里铺的农村去参加秋收，事先领我们分了组，耐心地告诉我们观察人物、搜集细节的方法。我当时的水平低，对他讲的还不能全懂，他费了不少心血。

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收谷子。每晚，他和何其芳分头到各家来检查，指导如何写农民。我后来写了一个老太婆，写她落后的一面。葛洛也写了一个。十天左右写好后交给他。

我过去写过一篇表现小市民、小官僚的东西，他劝我改好送大后方发表，提了两三次意见，反复说体验生活的重要。我当时没把创作当回事，没有全部理解他。

康濯的习作也是沙汀指导，写一个农民因丧妻而忧郁，自认是真实事件，不服沙汀的批评。这些作品后来编成一本书叫《秋收一周间》，至今没人知道是否出版。

沙汀是个极端认真、拘谨而性急的教师。比较起来，学生更喜欢何其芳，开朗、随便，讲起古典和翻译作品都能引人入胜。为了学生几行的短诗，他会写出上千字的批语。他还是那么天真，露天看苏联原版的电影片子，见旁边有男女在黑暗里接吻，也会大惊小怪地去告诉沙汀。其芳精神愉快流露在外，走起路来足板翻，诉起苦来：“老杨呀，你看咋个做呀？”叫人感到他之诉苦是因为太愉快了。不久，他把这种愉快化成了创作。11月，便写出了《我歌唱延安》这篇轰动一时的散文。

（意味深长。你这个党内作家反而没有先来讴歌延安。这不是政治，这是创作个性。你不妨在这一章里始终拿其芳与我比较，就可以更了解我了）

后来，其芳还写了一系列这种歌颂延安自由、宽大、民主的明朗之作。他的心地便是如此明朗。沙汀是不会这样快地发表这种感想的，尽管他也有感想。他一直没有动笔，他还要看，还要想。两人的友谊很好，课后常去“文协”看卞之琳，探听艺术界的消息，或到教育厅找周扬，谈组织创作力量反映解放区、办好文学系的事，也提醒他注意有机会别忘了让他们上前线。11月17日，由沙汀和王宗一的介绍，“鲁艺”党组织吸收了何其芳入党。

沙汀不是不想写，他是扎扎实实做他的写作准备。除了去“抗大”看黄玉颀，看在那里做政治教员的老朋友任白戈，与新认识的女作家、在巴黎生活过十年的陈学昭谈天，与后到“鲁艺”的在戏剧系教书的荒煤交往，他特别想了解适合自己写作的材料，这是他在“左联”后期形成的创作个性。延安是个陌生的天地，他是有意要来的。但是他不想简单地歌颂这个“陌生”

地。他晚年日记里还记载当年他找陈昌浩搜集四方面军长征经过川北的事。

一次在“陕公”吃饭，陈在座，曾请他们一有时间谈川北苏区事，并半开玩笑，也可说放肆地讲过这样的话：“反动派造谣说你每天要喝三碗人血！”他淡淡地笑道：“人血我倒不喝，爱喝点酒……请吧！”于是举杯喝将起来。

在延安，他还想写与北川、安县有关的小说呢。不熟悉的环境使他产生一种失落感，调整的方法便是写他能理解、能接近的。他是个能迷醉在人的性格里的作家，所以，他正寻觅着他能表现的人物。就在那次陕北公学席间，谈起去前线的事，“陕公”校长成仿吾便对沙汀说：“你到前线去，就写贺龙嘛！贺龙就值得写！”

不久，“鲁艺”举行名人讲演，贺龙将军来了。这是9月的一天，下午两点钟，有些闷热，讲演起初在一座简陋的棚架底下举行，沙汀坐在后排。可是没有讲到一半，人们被一场暴雨赶进了新落成的四壁生满青草的大教室，沙汀就变成了前排听众。他可以清楚地端详到讲演人的风貌：很威严，高矮适中，厚笃笃的。肉很多，又不显肥胖。宽大的脸上有两道浓眉，似乎细小的眼睛一笑，眼角便布满皱纹。唇上蓄着黑色的短须。这就是贺胡子。

贺胡子一开口讲话，全身充满诙谐，好象脱下那身军装，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农民。他的玩笑纯粹是农民式的，粗鲁的，与毛泽东的不同。他说一二师的战士在山西作战，同蒲路的火车开得奇慢：“我们跳下去解小手，还可以追得上火车。”他操的是湘西口音，与四川话很接近（以后知道，他在四川打过仗，做过镇守使），说话的用词、语气、打手势的方式，在沙汀看来熟识极了。质朴，不做作，述说自己想说的任何事情，浑身洋溢着身经百战磨练出的自信与乐观，又散发出普通农民没有的光彩。

讲到战利品，不是枯燥地报告数字，而是说，去年过河，每支枪只有五排子弹，每人只有三个手榴弹，到太原只打了几仗，就向敌人“领”了十几万。过去师部才有望远镜，现在营以上就有，甚至还有照相机。他用平平常常的语气说，“希望慢慢地在前线把装备换好”。沙汀从这随便的语词里听出了力量。他完全被这种有力量的性格迷住了。

后来，贺龙又在“抗大”女生队做过讲演，讲起他早期的经历，他的大姐贺英。当时毛泽东在场，听得很兴奋，老是在下面叫“好呀”、“妙呀”。黄玉颀曾把这个情形连同自己的感奋都告诉了沙汀，更增加了他的兴趣。

贺龙、关向应，是来延安开六中全会的。在军委机关合作社，沙汀他们与李伯钊一道吃饭，曾碰见过关向应。李做介绍道：“你不是要写政委吗，这就是一个！”关表示欢迎沙汀到一二师去。

11月14日的早上，按照两天前的约定，沙汀一行去正式访问四十四岁的贺龙。是延安“文协”即将创刊的《文艺战线》出的题目，希望沙汀写一篇访问记。这正中下怀，于是邀了周扬、其芳、荒煤一起去。贺龙住在城里一个招待所，是一连三间窑洞式平房。屋子很大，除了两张木板床，临窗的土炕上还高高支着两张木床，这便是主人和关向应他们的卧室。旁边窑里住着杨尚昆、邓小平。虽然幽暗，简陋，贺龙一讲起话，什么环境都会变得生龙活虎起来。

按照沙汀拟好的提问单子，谈话先是集中在他的革命历史上面。他谈起湖南桑植老家，父亲，六兄妹。从二十二岁起，他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叶子烟。这天他手里转着一只精巧的柚木烟斗，不过时常忘记抽它，刚刚划燃一

支火柴，又忙着打手势，熄了火，接着就有滋有味地讲下去了。谈起长征路过的草地，他说斯诺没把草地好的一面写出来。“草地并不坏”。

他做了个否定的手势，“什么出产都有，金银矿产，一望几千里的肥沃平原，麦子人多高，那个草啊……”他半闭着眼，叹息了。他说汉官的杀戮造成民族仇恨。赵尔丰赵屠户一杀就是好几千。所以有句俗语：“蛮姑娘好找，汉官的差难当”。他谈起长征的军事经验，冀中执行了统一战线的成绩，等等。

这种严肃的话题使他激昂，一转入日常生活范围，他又随便起来。他兴致勃勃谈起长征中钓鱼，指着关向应说：“他随便拿根竿子伸在河边洞里就会钓上来，因为看都看得见啦。

要是它不吃钓食么，”他巧妙地又比了一个手势，“用竹竿对准它戳一下，它就吃了。”

他讲起劳动经验，八路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真是津津乐道。沙汀突然发问：

“你喜欢和农民亲近么？”

话说出口，便失悔自己问得太笨。贺龙马上大声回答：“我本人就是农民！”

他半闭眼睛，满脸堆笑地站起来。“我本人就是农民。到今天我的生活还没有和农民脱离。”是的，他每日六点钟准时起床。一有空闲便干起各种体力劳动。路上见到一个赶驴子的老乡也会聊起天来没完没了。

沙汀悟到这是把握贺龙的一条线索。整个访问过程中，其芳、荒煤帮沙汀记录，沙汀自己只择要记录贺龙的神态动作，和有特色的语言。两个多小时很快过去。在场的人临了走到屋外台阶上透透空气。贺龙挨着一根柱子站着，谈起多少次挫败又卷土重来的武装斗争，沉缅在一种回忆里面。两道浓眉紧蹙，他又像换了个人似的。

“中国的夏伯阳！”“一个从农民群众中站起来的领袖！”“又平凡又传奇的性格！”带着这种兴奋，沙汀以少有的写作速度，一天一夜便把这篇印象记草成了。

荒煤是它的第一个读者，看过后还开玩笑说：“可以，可以打八十五分、九十分！”就在这时，他的心中不知不觉升起了记写这个人的传记的念头。他把贺龙归入他的乡土世界里的一个新人了！

事情急转直下。贺龙要回晋西北根据地了，他欢迎文化人到他的部队去。他缺少干部，向“鲁艺”要人。“鲁艺”新的一期学员正好读满了三个月书，按规定也应分配去前线实习。周扬积极赞成就由沙汀、何其芳带领一批“鲁艺”各系的学员，以文学系第一期学员为主，跟随贺龙到前方去。

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沙汀实在不能放过。他去“抗大”与玉颀商量，为了搜集八路军奇迹般创立抗日根据地的史迹，同时也为了给贺龙立传，他需要跟着他去转一圈。玉颀不习惯陕北的水土，也不习惯此地紧张的集体生活。她怎么能阻拦丈夫呢，她知道他一向很看重的心事业心，甚至有时禁不住埋怨他把写作看得比她还重要。她日夜想念阿礼，叫他不要忘记半年就该回家的保证。碰到这种矛盾，他就像个大哥哥似的，用好言好语来安慰她，或者也可以说是“哄骗”她。他反复说：“学校实习是有期限的，我住上三个月就回转。跟着司令都走也一定不会有危险，你放心好了。”玉颀伤心地不响了。沙汀把妻子托付给苏灵扬，请她照顾。以后的事实说明，苏灵扬和

周扬对玉颀是很尽心的。

他自己也不是不想念故乡。记得在二十里铺参加秋收劳动时，一位广东籍的学员居然在村庄地边发现了一大丛冬寒菜。这种菜，当地的老百姓完全不看重，一向只是拿来喂牛喂猪。沙汀不知道在南国亚热带气候里，冬寒菜能长成什么样子，反正在四川，这是一种普通的，到处长得蓬蓬勃勃的植物。说是野菜，它确实很易生长，很“贱”。在故乡，它是家菜，一丛丛的，发出暗绿的发皱的叶子。

二十里铺的南方人高兴地发现它，大家联合挖菜，在陕北老乡惊奇的目下，大张旗鼓地煮起吃。那种特有的滑滑溜溜的味觉，停留在舌面之上，使他想起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一家湖南餐馆吃到它时感到的温情脉脉。他以后在上海小菜场曾四处找它。这便是身处异乡才能分外体验到的故乡感觉呀，就像一下子听到贺龙打出的那个相近的乡音，看到他的农民的大手所引起的感动一样。

唉，我的冬寒菜！

追随一个光彩的性格

他曾经这样解剖自己，虽然有时“拘谨的，顽固的和保守的成分也并不少”，“但在本质上，我却是易感的和浮动的。并且对于一种新的念头总又非常执拗，一定要纠缠下去，弄出一个结果才甘心”。现在，他就实现了一个从上海时期就起意的“多少带点浪漫成分的心愿”——到抗战的最前线去。

出发的这天，延安在大雪覆盖下一片银白。沙汀、其芳率了“鲁艺”几个系的二十一个学员，随着贺龙一道，动身去晋西北。时间是1938年11月19日。

文学系随军学员九人中有两名女的，黄海、王文秋。王后来是柯蓝的夫人。男学员里面有以后的名作家孔厥，康濯，还有非垢、约瑟、浪淘、艾堤、尤琪。浪淘后来留苏，成为工业家。艾堤从前线返西南联大读书，是冯友兰的高足。其他戏剧系、美术系、音乐系的同学中，出了个名电影导演成荫。戏剧系的女同学莫耶最后成为文学家，是队伍里的第三个女性。其芳还是个新党员，沙汀是这支“鲁艺”队伍的总负责人。

因为机器出了毛病，他乘的一辆汽车迟迟才开出，到达七十里以外的青化砭已是下午三时，这是他们第一个宿营地。贺龙和他的司令部已经到达许久。贺站在村路当中，正与一个青年农民研讨编织羊毛板带的技术问题，甚至自己也试着织了一阵，引起围观人群的欢笑。

“鲁艺”的人找好住处后，贺又过来闲谈。谈轰炸，谈莜麦，特别热心地解答几个女同学对行军作战的种种天真发问。他透露消息说，汽车开到中国古代美人貂蝉的出生地米脂以后，便要换乘马了。部队已经分派几十匹马在那里等候。然后他就大谈起生平最喜爱的这种生物，夸奖了他经手的一些良马，又嘲笑了市面上的一些劣马。他比划着那些劣马的样子：

“头这样一搭搭起，腿子里这样的，屁股溜尖，你要不打它两下子呀，它就连动都不晓得动。给你们讲，要我是一个文学家么，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写它一两千字！”

他的精彩刻画，让这些搞艺术的听了都心服。沙汀尤其感到他的一切都很动人。这次跟随他行军，有了从极近处观察这位将军的可能。

青化砭的第一夜，与其芳和随军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联络参谋陈宏模一起，在贺龙屋子里吃了面条烧饼回来，他们铺开了本子开始写随军日记。同时，他又设了一个更厚的本子，来记载贺龙。乘着印象鲜明，记下他今日谈马的一切细微末节、动作和每一句情绪饱满的语言。记下他刚刚一再请房主人老太婆吃面，最后让警卫员把两张饼子送过去的场面。他觉得对他又有了新的认识：“不同人接触，在他显然是不可能的”，“什么疑难经他一点醒，人便无须把它搁在心坎上了。”对于老百姓的生活，他与贺龙都有浓厚的兴趣，真是如鱼得水了。

到了米脂，果然把汽车放弃改乘骡马。大家各分到一匹。沙汀从小跟舅父“跑滩”，他是惯会骑的，只要“温习”一下就可以了。其芳和许多学员一时不惯，走着走着会从马上溜下来。其芳的深度近视也妨碍他，便慢慢骑着与学生一起东扯南山，西扯北山的谈得热闹，以分散自己的紧张。沙汀看起来严肃，半夜在老百姓家醒来，会神经质地告诉其芳，好像果戈理的人物入了他的梦。然后，到白天，他又专注地把贺龙谈他的被猴子偷走的大青马，与一位叫做“耗子”的卫生学校女毕业生讨论她的婚姻问题，记在心里。他发现这个粗放的将军与女性接触时有他特殊的亲切。贺龙一定要称“耗子”是“干女儿”。他骑着身下的一匹大青马奔驰而过，会转身嘻笑地对她嚷道：“赶紧跟上来保护老子呀！——有一把小刀子就成了！”“阔大不羁”，沙汀想道。他很得意自己想出这样一个词汇。对于贺的性格，它再适合不过。

第四天上午十时，他们渡过混浊的黄河后，进入山西境内。在克虎寨留宿的晚上，贺龙会见完国民党将领杨爱源回到兵站，大家仍然挤满了他的屋子，听他讲述旧军阀、旧官僚的趣闻。他经历过的太多，讲了湖南的一个浑名叫周铁鞭的“司令”，会“捉龙”看风水，居然吩咐爱妾活葬到那个他看准的“龙脉”上去。贺龙看出沙汀也是富有社会阅历的，便请他也讲个怪人怪事。刚讲了一则，贺便接口道，这是四川内江的赵班若啊。原来他俩相识，贺龙又补充赵的生活细节，说他会把夜壶放在床头半夜当茶壶提起。贺还和一个七十岁的湖南翰林傅英一起搅了三个月的军队，傅更是个昏聩到无以复加的怪物。

这一晚，其芳大开眼界，日后把它郑重地记入了回忆贺龙的文章。对于沙汀，这使他想起幼时在安县周围耳闻目睹的各种人物，觉得是那么稔熟。从旧的制度中走出了贺龙，也走出了自己。他对中国革命家的出身背景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仿佛找到了他的小说据以存在的那块连接新土壤的旧土壤。他想起某些人对现实主义的狭小理解，所谓现实主义必须跨过旧的现实一步。其实，这不仅应当指直接描写肯定的世界，也应包括“否定的一面”。“不然，这个现实主义将是一般的现实主义，而非立足于中国目前现实情况上的一种适当的创作方针”。他心里好像为自己的讽刺作品寻找到了创作依据。

第五天，他们从临县出发，下午抵达了目的地：一二 师师部驻守的晋西北小城岚县。

岚县比延安荒凉得多，街头空空的。这年冬天好像特别冷，一滴水落地就会马上结冰，这对南方出生的沙汀还是个全新的经验。“鲁艺”的同学分配了工作，都到部队与地方的基层去了。副官处划给沙汀、其芳住的房子是一座相当讲究的地主宅第，炕壁上还用油彩绘着封神榜的故事。

他按照原来的计划，天天忙着访问当地的军政干部，了解这块根据地的过去和现在，想在晋西北深入下去。按照自己的习惯，不是浮光掠影地搜集一点材料便写，而是想在知道一般情况后，再蹲到一个营、连这样的小单位去，认识一切精微的细节。如果不熟悉细节，他真不知道怎么能够虚构小说。同时，为了写传记也想多多接近贺龙。

贺龙在刚到达岚县三四天后的一个深夜，曾不带卫士，一个人跑来看他们。沙汀、其芳正对坐在黑漆方桌前，就着烛光整理材料。贺龙推门进来，斜坐在炕边，谈起敌人最近的进攻，友军赵承绶部丢失宁武后的仓皇失措及他给赵的建议。他忘掉两个书生是不懂军事的。

书生不懂战略战术，却听懂了有他这样一个指挥员不用再惧怕什么。

谈了一会，他又一个人走了。我们站在门外送他。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走了几步他就消失在夜街的黑暗里。

又经过一个小巷子。他走了之后，我和沙汀都有一刹那完成坠入沉默中去了。这是一种对于我们敬爱的人才有的细心的耽虑。后来贺龙还曾召他们去谈过一次家乡，谈到桑植一带民风的强悍、好胜、讲骨气，以及械斗的野蛮残酷。他谈起边地人民时又自豪又忧郁的语调，让沙汀想到他的川北乡亲们。他们还讨论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动。但是，这样深入的谈话随着贺龙主持全师干部会议的繁忙，在以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难以为继了。

上上下下的干部都在学习、讨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反而比平时更为紧张，访问计划往往落空。沙汀记事本上的几万字差不多都是刚开始的半个月记下来的。

访问的停顿使旧习复活。柯仲平派人到岚县找沙汀他们约稿，就在岚县这样一个离敌占区仅一百多里的前方环境里，沙汀把《堪察加小景》一系列未遂计划中的一个写了出来。这是一个场景描写，先在《文艺突击》发表，后据此写成《联保主任的消遣》。

（你不觉得奇怪吗？一门心里去前方，到了前方却写后方。我不敢这么快便拿敌后题材写小说的，不了解一件事、一个人过去和现在的全过程，我不会动笔。醉心的仍是描写农村人物，这个联保主任便是我心中的一个。从这里可以探索我的创作中心所在，我怎样用前方的感受，来加深对后方的认识，我的心思永远“不可救药”地留给我的故乡）

前方使他对抗战弊政由《防空》中直露的愤怒转向冷静。所以，他写出这个玩弄救国公债的小角色，区区的联保主任，是在悠闲地品尝毛牛肉中，和“四合工尺四合”的胡琴节奏中，不动声色地干着坑骗勾当的。一切“习以为常”，构成此篇内在的惊心动魄。

岚县也在“防空”了。先是附近的普明镇遭到空袭，沙汀的房东主人还曾发出奇语：“如果发明一种可以捉拿飞机的东西就好了。”接着，12月19日，日本飞机终于光顾这里。城内挪威人传教的福音堂被炸，南街的房屋与北门的城门洞被炸，死伤了好几个老乡，给平静的岚县城增添了战争的空气。

躲了几次防空洞，出来看到血肉模糊的尸体，沙汀彻夜未眠。他的神经又习惯地紧张了，兴奋了。同时，他也在去留之间徘徊不定。因为中央命令一二师的主力赴华北敌后，帮助吕正操急速发展起来的平原队伍进行整顿与提高，以对付敌人的“扫荡”。贺龙已经决定带领七一六团前往。

明天出发，今天才通知下来，要跟司令部开拔，行军一个多月。这种军队式的迅速和保密，让“鲁艺”的师生们陷入了两难境地。一部分学生，包括孔厥、康濯，在地方上干得不错，可能要被留下。其芳一身无牵挂，决定随队走。沙汀的心思就复杂了，如果离开晋西北，深入描写这块土地的计划便会告吹，答应玉颀几个月内回延安的诺言也就作不得数，而他已经十分想念她了。这几天睡不好觉，便常连着喝几台酒（五分钱的酒就算一台），掏出妻子照片看走了神。还有一点，贺龙的军旅劳碌，没有更多的时间谈他的经历，只怕到了冀中仍然如此。但不去呢，更感可惜。在炕上这样辗转反侧，他的优柔寡断弄得他烦躁不安，半夜唤醒了其芳商量，其芳倒很爽快：“那就先留下来嘛！”

很累地想了一夜，第二天午饭后他去司令部找贺龙。他觉得自己留下的决心已经坚定了。贺站在满满贴了二十万分之一的华北地图的墙壁前，被他的下属包围着，对各种请示做出决断。在回答战地服务团和一个技术干部的问题当中，他还有时间讲他最近送给毛泽东的一匹马。沙汀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插上了话。虽然在接触到贺的蓬勃的性格后，他的决心已经动摇起来，他还是把准备留下继续搜集晋西北素材的打算说了出来。他刚提了个话头，贺龙先是微微惊奇，随后便放声大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同志，你不要慌嘛！到了铁路那面，还少了你的材料呀？”沙汀开口不得。贺龙忍住笑着说：“让我告诉你吧，到了那边，就要继续搞晋西北的材料，也并不困难呀。老甘（指甘泗淇——笔者），我，都成。等将来住定了，我们一定有很多时间谈话，至少一星期谈两三次不成问题。同志，准备住十月八月吧！”

就这么几句话，沙汀的决心全面崩溃。

读者是看见过磁石的吧？我是仿佛铁末一样，被他的豪迈和热情吸引住了。纵是一个怎样持重的人，假使他真要劝诱你到天涯海角去，我当你也是不会有半点迟疑的。我不能拒绝他，于是我改变了我的全部计划。是贺龙的性格力量造成沙汀“背叛”了黄玉颀。世界由此多了一部描写人的性格的发光的书：《随军散记》。给玉颀发了信，去安慰一下。走吧，12月22日，又是大雪纷飞的一天，留下五位“鲁艺”学员，其余的都跟着沙汀、何其芳出发去冀中。两名教师与司令部同行，配了马匹。学员与政治部在一起，三人一匹马。在静乐宿营后，发现山上松树多起来，衬托出北方的荒寒，石头似乎都冻透了。夜行军奔跑着通过同蒲铁路，离据点有五里远，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一个，但大家劳累得连走路都能睡着，像梦游病患者一样。

经过盂县境内的瑶子坪，到牛郎院渡过了滹沱河，进入河北。黑枣、花椒、核桃这些树多起来，山水秀美得让人想起四川的景色。这里是晋察冀边区，老百姓开朗、整洁，有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的组织。行军途中过了1939年的新年，经平山县境，部队在灵寿县的七祖院停留了七天。起先以为在这里住定了，后来才知道是做通过平汉铁路的准备工作。

其芳发现了邮政代办所就要寄信，沙汀在这里发现了一片漂亮的白杨树林。他邀了其芳在白杨林子里走了很久，看到大明川的落日。其芳感到诗

意，说他想念北京夏日的槐花与蝉声，沙汀联想到四川的山和树。

这几天，贺龙主动约他们谈了几次。谈了边区，谈了聂荣臻、彭真、朱德、毛泽东和张学良。沙汀、其芳向贺龙叙述了自己的烦恼，行军中只是杂乱无章地跟着吃、睡、走路，不了解敌我情况，不能访问，不能工作，变成了部队的负担。私下里沙汀开玩笑说：“我们是一二师喂养的两匹牲口！”贺龙好言劝慰他们：“行军当中只好这样，你看我还不是和大家一样！”

随后，部队进入行唐县境，1月15日夜通过敌人重兵封锁的平汉铁路。队伍过了一大半，突然一列日军的巡路车驶来。沙汀正艰难地走在铁路的路基上，觉得碎石叫人恼火，一道强光射来，人们有些慌乱地往远处高坎上跑。沙汀只想躲开那束光芒，好像这样就能躲开幻想中机车射出的子弹。他和其芳掉了队。其芳的牲口连鞍子都落了，沙汀的行李丢失了三次。

沙汀的胆子成年以后比童年小。第二天，日本飞机不断追逐这支队伍，平原上只有找坟堆、土堆躲藏，他感到旷地的可怕：“战争的恐怖把自己简单化了，对于生命和死亡特别敏感”。这时，他再打量贺龙和他的战士们，有了一种与平时异样的感觉。

1月25日到达冀中军区司令部附近的河间惠伯口。他们遇上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局面：周围的雄县、霸县、安国、深泽、河间、肃宁相继失守，日军用两个师团的兵力来围攻这个平原根据地。1月27日，贺龙让副官处通知沙汀、其芳，文艺工作团的雷加、宣传厅的干事张兆麟，一起到十里外的李村集中。沙汀紧张地赶去，才知道原来是参加一二师和冀中军区（第三纵队）的联欢大会。

沙汀进入会场，见贺龙正在人丛中站着，挂着六轮子，军帽掀高一点，神气恰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老兵。他将他们一一介绍给身材瘦长的吕正操。这个使敌人闻风胆寒的原东北军将领，穿着整洁，举止利落。会餐的菜，全部装在搪瓷洗脸盆里，吃得够豪放的。晚会主要是看一二师战斗剧社的演出。在这个文化水准较高的冀中，话剧这个道地的新文艺形式居然能受到群众普遍的欢迎，使沙汀很感意外。（我们忙中偷闲说一句，冀中战争环境下老乡对话剧给予的理解。是否更坚定了你一向坚持的民族化并非单纯拾取旧传统的认识？）

演戏前，贺龙讲演。他被大行军的胜利所兴奋，讲话热情、坚决。只轻描淡写地说道敌人离此只有三十里。散戏时，沙汀听到有人来向吕正操报告，二十里外，发现日军汽车二十多辆。贺龙的神色安详，依然微笑着，全不理睬旁人略带焦急的短促的商议，仿佛这个紧急消息完全与他无干。他向头顶掀了一下帽子，关照沙汀他们骑马回去睡觉，说话时眼角浮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暗笑。

半夜一点钟，沙汀被喊醒开始转移。自此，马不停蹄，开始日夜行军，与敌人周旋。其芳在联欢当晚归途中从马上跌下，右臂脱臼。后来他们去看望也不幸跌伤的贺龙，听他抱怨三天没有跨出门槛之苦。很快，传来一二师在大曹村战斗得胜的消息。情势没有减缓，敌人扬言要把贺龙的“老八路”赶出平原，一二师的七一五团也奉命冲过平汉路到达冀中。

在这样紧张的战斗间隙，贺龙照旧找沙汀去从容谈话。但究竟不能如岚县答应的那么多。沙汀考虑到新的情况，意识到写贺龙的传记困难太大，随即改变方针，决定主要记录他的日常生活，以及足以表现他的性格、风格的各个侧面，采用谈话、观察的方法，当场摘录一些要点，回来后立即根据

提要如实记录下自己热腾腾的印象，以备将来写长篇报告文学所用。

过平汉路那个夜里，沙汀损失巨大，他丢失了一本笔记。当时一个同志前后奔跑，嚷着要白纸头做路标。看看谁都没有，他挤出行列，把一册写了小半本的日记簿递过去，叮嘱他到了目的地一定要归还，但就此没了下落。司令部里刚从苏联回来的周同，帮他四处寻访过，终无结果。为了这本饱含他心血的笔记，他心疼了许久。后来贺龙听说了，苦笑道：“同志，那些武棒棒他们哪管你材料不材料呀！”之后，他仍用这种方法，建立了新的笔记，记贺龙的，记其他将领的，记自己的，共记了六册二十万多字。沧海桑田，五十年过去，现在仅余下一本日记，即1983年出版的《敌后七十五天》。就按这本断残的日记查对，李村联欢之后，戎马倥偬中，从1月31日到3月6日，贺龙与沙汀的谈话便有十次之多。

贺龙谈了自己的家庭和过去当旧军官时的婚姻关系，是那样坦白。他的弟弟和两个老婆为了他被关在上海。弟弟死了。女人放出后，去年他给她们写信，让她们自己去找人，“找年轻的、漂亮的、革命的”。他大姐贺英的儿子、么妹贺满姑的儿子现都在他的队伍里打仗。他谈起一个姓罗的干部队长，说起贺炳炎这个断臂团长，充满了赞美和自豪。沙汀的观察笔记不断地记下贺龙的新细节。他喜欢孩子，描住一个小女孩彩云让她叫爸爸，并露出慈父一样的柔和眼光。因为看到白求恩大夫动手术的地方堆满截下来的战士肢体，少有的忧郁使贺龙一整夜没合眼，自己叹息道：“人一过四十岁心就慈起来了！”他对于马的喜爱，甚至充满孩子气。一个抗联主任夸口他那匹小红马是冀中第一好马，贺龙用一种绝对行家的口气问道：“跑的是野鸡柳子吗，蝉头？”把这个主任问得莫名其妙。于是他用手势和声响区别着马的种种步法，有声有色地讲起来。

沙汀感到他渐渐接近了这个有着光彩性格的人的心灵，感受到他的坦荡的襟怀，他对人的爱，对战友、亲人、孩童，对一切与人和谐共存的生物的爱。

沙汀的笔记里还记录了贺龙周围优秀的一群。2月，政委关向应从路西赶来冀中，与沙汀有机会单独谈过许多次。话题从贺龙、萧克、彭德怀、朱德一直到街头诗，他很少谈自己。

那个萧克，有健康的身子和轮廓显著的倔强的嘴唇，今年才三十岁。在行军路上，他与沙汀谈过他的家庭，中国革命中各阶层的剧烈变动（知识分子比大革命时期坚定得多了），以至苏联小说《铁流》。萧克理智、精细，知识广博，是个军中的秀才，准备用小说来写贺龙与王震的会师，拟想中的长篇的名字叫《罗霄军的激流》。还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与他说过老百姓对一二师制造的种种“神话”。笔记里记下最能说明甘泗淇与贺龙两人性格的一件事：在静乐，因为大家的住处久久不能安排受帖，贺龙发了火。偏巧屋里一只倒霉的黑色小狗挥之不去。贺龙默默取下墙上的一根马鞭，甘从炕上坐起，装出不以然的神气说：“你这个人太残忍了。”贺嘴上说着，“怎么样，你心痛吗”，怒气却一下子消失了，随即宣布明天他自己去打电话，与地方上交涉宿营的事。

参谋长周士弟，平时少言寡语，是个结实的海南岛人。他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就一副一目了然的坦白沉毅的面孔。最著名的青年将领是被贺龙誉为“越打越硬”的贺炳炎。这个小铁匠投奔红军的时候仅只十四、五岁。他的勇敢行为有时近于孩子气。他带着一批“抗大”学生在沙汀部队的后面也

过同蒲路，为了让学生听听闻所未闻的炮声，亲自领了警卫员去向碉堡扔手榴弹，消耗了敌人的不少弹药。这件事记入了沙汀1939年2月28日的日记，写散文《通过封锁线》时，又详详细细地作了描述。

像贺炳炎这样的勇士，对贺龙谈起刚到冀中前线的怪老头白求恩来，也语露钦佩之意，说，“开起刀来可蛮呢”。沙汀被他们鼓动着，几次到卫生处所在的东湾里村探望白求恩大夫，亲眼看见他工作起来不知休息，伤员从担架直接抬上他的手术台，锯下的腿、臂堆了一地。诗人见不得血迹，何其芳就始终不敢去看他动手术的情景。

一次，董越千陪沙汀去白求恩的住处拜访。一进院子，见他身穿八路军的灰制服，外面套一件污旧的黄呢睡衣，足踏草鞋，驼起宽大的脊背，正在用一支有柄的小锅煎菜。他见到客人，扬一扬手中的铁锅铲，笑了，说：“你看，我不只是个医生，还是个厨师！”

谈起来，白求恩说他也有写贺龙的计划，但没有多少时间交谈。即使能谈，也是支离破碎的，只好放弃了。这是沙汀第一次听说白求恩也是个作家。贺龙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创立着功绩，并且强烈地吸引了一切有可能靠近他们的人：沙汀和白求恩大夫。

可是“鲁艺”的人在这个军人的世界里并不总感到很好。他们常有某种苦闷，随着军事行动的加剧，他们日益增强了“局外人”的意识。日日夜夜兜着圈子打仗，使文化人感到自己的软弱和无用。部队里营以上的干部才有马骑，而为了这群知识分子就需专门配备一支马队。当马案的战士，往往与他们的关系很僵，认为他们是特殊阶级。

其芳苦闷时，回忆他早期的诗作。沙汀寂寞时便喝上一台酒，吼几句京戏，或者干脆读其芳的手抄诗稿。2月初，何其芳为摆脱没有具体工作的难堪处境，与沙汀商量后，两人分开，其芳搬到政治部与“鲁艺”学员一块协助宣传部门编印《战斗报》和战士教材去了。

文学系的同学终于联合提出回延安的请求。有的特别激烈，认为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已无法从事写作，但是部队将这些一律看成是害怕艰苦的表现。

（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矛盾，原来在这样短暂的军旅生活中，你就碰到了！怕不怕艰苦是最表面的纠纷，我们“鲁艺”师生内部之间，“鲁艺”与部队之间，关于作品应在前方写，写成宣传型的，还是应当在取得体验后回后方写，写成艺术型的，这个争论才是针锋相对，弄得难解难分的）

沙汀站在夹缝当中。做为一个带队的人，他要和一二师的党组织站在一道。实际上他陷入更深的矛盾中。他不仅渴望创作的条件，还有与黄玉颀的感情牵制。玉颀几次托人带信催他回去，信里的词儿喷发热力，大胆、任性。她住在延安心里很苦，想念老母、儿子，现在又加上想念远行的丈夫。过去她生起气来，沙汀让着她，或轻声轻语安慰她，现在只有对着沙汀离开岚县时照的一张八人合照，在日记里发狠写上：

“青与其说是爱我，还不如说是更爱他的事业。”沙汀1月份刚到冀中时，给玉颀写过信，还说要尽快回去。2月初，听说延安遭了严重的轰炸，贺炳炎讲，炸死的女学生都是结过婚的，沙汀虽然怀疑这位“断臂团长”是有意开自己玩笑，却仍然心烦意乱。玉颀早已从“抗大”转到“鲁艺”读音乐系，这能不让人挂心吗？他马上拟了电文请贺龙代为拍发，之后，还是禁不住胡思乱想。他表面上拼命说服学生，在学生眼里，他的态度比其芳“严

厉”，几个党员学生甚至与他吵起来，但是他凭的只是理性，并没有感情的支持。

有一种纠缠不清的麻烦，他也处理不了。就是“鲁艺”的女学员在部队里受军事干部的公开包围。比如一位负责同志就想把一个女学生介绍给周士弟，遭到拒绝。这引起部队的不满，说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男学员出于气愤大发牢骚。

这却激化了矛盾，使得双方的关系变得复杂了。

关向应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愿意留在前方的，像戏剧系的一些同学，就留下。大部分文学系的同学不愿留下，那就送回延安。贺龙他们本希望沙汀能留下，还替他设想，看能不能把玉颀接到冀中根据地安全的地方来。但是曾经那样努力地劝说过学员的他，还是委婉辞谢了。辞谢的话使他心里好不安静，一旦说出口，便觉得轻松许多。他是以不相信妻子会来为理由的。一直到离开冀中，他还不肯正视自己，不敢把留恋故乡的人物，乡土中存在着他的创作生命，做为一个正当的理由提出来。这在当时几乎完全不可能。妻子长期被他，也被别人当作一个理由，来掩盖了潜在的真正的原因。

冀中归来

1939年4月在他们动身回延安的头天晚上，贺龙肩头挂着电筒来看他。贺从身上取下一支日本自来水钢笔，说是滑石片战斗得来的战利品，送他当作纪念。谈话少有的不起劲。后来贺龙懒懒地仿佛自语一样说：“没等到白洋淀螃蟹上市就走了。”刚说了一句，又落在沉默里面。只有谈起将来的局势，才使气氛稍显活跃。

这时贺龙说：“最好把家里的事情弄清楚。”（女人与革命的矛盾，贺龙也是这么想）“你一定来，我们还要捅到关外去呢！”

第二日黄昏，响了一整天的大团丁村争夺战的大炮声和机关枪声刚刚沉寂，沙汀他们得到通知，可以出发了。他赶到司令部去辞行。贺龙手执一段红蓝铅笔，绕过擎着蜡烛、展着地图的参谋们，走到房门边与他握手作别，随即又匆匆退回去察看地图。

“路上当心些呀，老沙！”五个月来紧紧吸引了他的一个人，从地图上抬起身，大声加上这么一句。

附近的几个村子燃着大火，火光冲天，景色是分外庄严。沙汀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离开了他。

这支回延安的队伍，比起来时要小得多。沙汀，其芳，与“鲁艺”七八个学员，冀中军区政治部一些去延安受训的同志，总共四、五十人，由一连武装人员护送。队伍的总领队姓李，当过教师，是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的负责人，是个很有经验的知识型干部。还有一位以骁勇出名的曹大队长，一位姓姚的行伍出身的参谋。沙汀以客人身份参加队部会议。加上其芳，这些人的性格、面影，后来都进入一部叫《闯关》的中篇小说，又名《奇异的旅程》。

这个回程也确实奇异。4月出发，足足走了两个多月。单是过平汉路，在铁路附近的三十里以内的地区，就转了一个礼拜。有三次已经离铁路只有七、八里远了，仍要退下来。

因为情势与来时大变。沿线的碉堡增加了，敌人分区扫荡，日军头目寺内恰在附近阅兵。过去的一条交通要道，在友军往路西溃退时暴露，被机关枪日夜封住了。现在全靠“护路村”的村长、乡亲们“护”着这支小队伍，巧妙躲开出击的敌军，寻找飘忽不定的可以依仗的我军和游击队。“强制通过”，怕损失了人。化装成老百姓通过吧，沙汀同意，领队的却坚持要用部队护送，并负百分之百的安全责任。军人的自尊与文化人的灵活，显出了不同。（读你的笔记，觉得你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出身的军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是抱“平等”态度，认为是可以“互补”的。写《闯关》的时候，我还有这个意思，但自省自责已经增加。

这条抛物线过了顶点，再几十年一直往下落，直落到认为自己满身是“罪”）

部队终于想出了办法。他们在拂晓前潜伏在离铁路一里半的土岗上，两个钟头里没有声息。男人也不避队伍中的女同志，就蹲在地上撒尿。太阳初升，得到一夜未眠的鬼子已经去睡觉的情报（有比敌人睁得更大更大的眼睛），他们就迅速穿过一条村街直扑铁路。村民们拥塞在村道两旁，照样出来看过兵。一个高身材的老头，张开缺了门牙的嘴，对沙汀笑嚷道：“他们不敢出来的，同志，沉着气走好了！”急促的行走使他咳嗽，钻过铁路桥后，一种紧张后的愉快攫住了他：“鬼子到底是聪明还是傻瓜？他们一个通夜不睡觉为的是什么？”他突然获得了幽默。

然后是重过同蒲路，正碰上敌人扫荡曲阳、孟县及汶水、交城一带。周围成了沦陷区，游击队引导他们在山沟里“混钻”，一夜走一百五十里路。

沙汀看着领路的老乡，思索中国农民的性格、德行和他们在战争舞台上的表现。特别是华北的老乡，像白杨树一样直率、真挚，他们与阎锡山防区的农民，与川北故乡的农民，同样质朴，但又显出经过战争锻炼后的进步。军队找一间屋子住，哪怕是一般的地主家，也不会让你吃闭门羹的。拂尘，敬茶，甚至还有枣子酒、柿子酒吃，像招待新女婿一样。在一定的政治训练下懂得动员起来出担架、募集慰问品、破坏敌人道路，做八路军的耳目。

他还是经常看到此地农民与四川农民一样，有保守、自私、狡猾、贪图实利种种弱点。

一个衰竭得也许明天就要死掉的老太婆，还能用一双锐利的眼睛监视他选买桃仁；老百姓不相信台上表演的战士会是女人；房东女主人明明有碗，却支使他们去向她的兄弟借；五十几岁的人，很“明白世事”地问他，四川是不是还由吴佩孚当督军？一个村民，分明房屋后摆着大筐枣子，但抵死说他没有，……他在行军日记里详细记下了所见北方三省的农民，愚昧与诚实同在。由此联想到封闭环境下人的落后品格，如果没有历史带来转机是很难改变、重塑的。而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陕北、晋西北、冀中，已经出现这样一支农民，一批贺龙式的农民领袖；在川西北，却仍然活动着联保主任一样的人物。

队伍从山西兴县的黑峪口过黄河，经府谷、神木，兜着圈子，于7月1日抵延安。黄玉颀记下了这一天：要到来的幸福终于到来了！——青同何已于1日上午十时归来——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怀疑我在作梦，我和

青走在一块也好，说话也好，总疑心是在梦中。

啊！幸福终于没有拒绝我，终于到来了！现在是放了大半条心，所挂念的就只有孩子和母亲。沙汀在玉颀的爱恋中感到微醺。不过，一涉及创作，他就变得很固执，坚持一定要在延安乘着印象鲜明，把贺龙的书写完。只有写完了，才能考虑回川的问题。

延安城内已被炸平。一个个单位挂个牌子在那里，组成象征性的街市，实际已经迁出了。“鲁艺”还在北门外。沙可夫、吕骥7月5日带着一批学员去晋东南太行山区建立分院，在乱坟堆边的空场上开欢送会，同时欢迎沙汀等返校。上前方的人拿起一本书喊：“我超重了，谁要给谁！”书是珍贵的东西，马上便有人伸手接过去。

沙汀想起记忆犹新的前方日子，他还沉浸在兴奋中。在没盖好的礼堂，由他报告赴前线经过，大讲了一番贺龙、白求恩。

8月初，“鲁艺”搬到桥儿沟去，何其芳有了长期留下来的打算。他和沙汀的工作对调，由他在萧三之后担任文学系系主任。沙汀一面教“名著研究”课，一面全力写贺龙。

桥儿沟在东门外。过延河，走飞机场，便进沟了。原本是党校校址，后来被工人学校、短训班使用，现在与“鲁艺”对调。废弃的天主教堂早做了礼堂。“鲁艺”周末跳舞，“鲁艺”歪戴帽，这两件在延安都颇享盛名。这里包含搞艺术的人讲究美，也搞自由主义的意思。

东山是“鲁艺”自己开的，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的教员都住在这里。一共三排窑洞，沙汀夫妇、何其芳、苏灵扬（周扬住在教育厅所在的安塞）、严文并、蔡若虹夫妇、冼星海夫妇都住在第二排，相依为邻。冼星海表面木讷，不善谈，一指挥唱歌就完全换了个人，热情奔放，能变出各种花样。他把“鲁艺”师生鼓动起来，在运动场上教《青年进行曲》。等沙汀回到延安，他的《黄河大合唱》已经完成，“鲁艺”组成了跨系的大合唱团，来表演这部作品！冼星海曾一连三次邀沙汀去听。

广东人和四川人都出名的讲究吃，陕北人不吃“下水”，冼星海便买来大嚼，沙汀吃过他好几次猪肚儿炖肉。冼夫人钱韵玲还在窑洞前收拾块空地养鸡。据说除了吃，还为听雄鸡啼唱。冼星海操着广东官话常说：“要吃好点才有精神工作啊。”他工作起来几乎是拼命，除了上课，整日伏案作曲。一部大作品，一写七八天不歇气。这时在写《民族交响乐》，告沙汀说到延安以后，已写坏几支派克笔。钱韵玲生他们唯一的女孩妮娜时，东山上的“太太”们，玉颀、灵扬都赶去帮忙。冼星海也在场。钱痛得最厉害的时候，钳子一样抓着丈夫的手臂，冼直喊“吃不消，吃不消”，产妇挂着眼泪都逗笑了。

沙汀觉得冼星海也是他所认识的一个“天真”的朋友。他从他忘我的工作热情中得到激发，日夜赶写《贺龙将军在前线》。

这部作品的工作方法，对于他也是新鲜的。过去写四川故事，他是凭回忆搜寻、提炼细节。现在有了一本厚厚的贺龙文学卷宗，这里的贺是“活”的，他再编不出比贺龙自我表现来得更好的语言、动作。那些随军记录已经过他的一次选择，现在，他只是按照报告文学表现人物的需要，再加一次精选：对贺龙的言行进行整理和加工，删除不少重复的材料，把他的性格、气质、风度的各个方面，按照一条练子加以组织编排。这条“练”，便是他自己随贺龙去晋西北、冀中两地，从出发到离别的认知过程。这种有作者自己

参与的表达方式，对于他来说，是少有的。但在这里很适用：不断地认识一个人就不断地展示一个人，不断地展示一个人便加深认识一个人。这样，“我”便无处躲藏。

我应该极力避免自己以及别人置身其间，但却又得使它不致呆板单调。

他虽然尽量节制，《贺龙将军在前线》的前三章在《文艺战线》以《到华北前线去》的题目发表，从一开始便逃不掉那个“我”——全书的总视角和叙述者。整个作品也由此洋溢起热情，“我”的热情和贺龙的热情，成为在沙汀作品中少有的感情外溢的作品。

（你说得对，早期的小说与后来的散文，你都不是客观冷静的风格。这时的“我”是比较放开的。五十年代我按照文学要反映“本质”的观念，实际是“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删去许多无顾虑的语言，使贺龙变得“干净”。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成了为贺龙“树碑立传”）

到10月25日，这部用小说家雕镂人物的深沉笔力写成的长篇散文，终于完工。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它有许多名字。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时，题目变成《H将军在前线》。1940年出单行本时名为《随军散记》，有个长长的副题：《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他在前线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故事》。1958年修改后，易名为《记贺龙》。

这本小书的写作还未结束，玉颀就“病”了。主要是妊娠反应强烈，思乡、思母、思子。苏灵扬也怀了孕，两人都想吃奇里古怪的东西。可是延安没有，便在窑洞前放个小板凳唠，玉颀想吃的是四川榨菜，她变得更娇了，沙汀一不在窑洞，她便四处找、喊。戏剧系的学员很调皮，他们学她找沙汀的样子，表演得维妙维肖，引起大家善意的哄笑。玉颀不断提出回川的要求，沙汀陷入长久的思想斗争：离开延安似乎是一种思想退却，但玉颀的样子实在令他心疼。像她这样非职业妇女跟着丈夫来延安的，当时并不多见。一年的时间已经很难为她了。自己的创作念头多半萦绕在故乡，这很难明说，即使是多年的好友如周扬，也不能全部理解他，这在内心是很苦的。

在文艺思想上，他也觉得与延安的某些主流理论不合。回来不久，中宣部召集一部分去过前线的文艺家谈收获。有人大谈“旧瓶装新酒”，用卖梨膏糖的小调演唱，群众如何如何欢迎。沙汀很不以为然。轮到他发言，他有点故意煞风景地说：“一二师经常打胜仗，我到前线去只打‘败仗’。为前线写作并不容易。”

“鲁艺”文学系在陈伯达来讲演不久，专门讨论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张庚、萧三强调几千年的文化遗产的精华和民间创作的重要，沙汀、何其芳起而反驳，认为仅仅强调大众艺术，会“降低艺术水准”。结果被扣上“将艺术脱离抗战，脱离政治”，“新的艺术至上主义”的帽子。沙汀的四川脾气上来了，吵得不亦乐乎。

以后，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扩大会和“文协”座谈会上，这个争论一直持续不断。

何其芳坚持认为“民族形式要以采取进步的欧洲文学形式为主”。沙汀事后整理了历次的发言，以《民族形式问题》为题，在《文艺战线》发表文章。他反复阐发的见解是：不同意把旧形式利用在文艺上的价值抬得过高。……（鲁迅的“写实手腕”）大半是从世界文学来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文艺传统上都非常薄弱，写实的技巧更是简陋的。……

（发展现实主义要学习外国）目前民众的现实生活，已经和旧形式当

中所表现的有着相当的距离了。

他对传统的评价，正是对有人认为他的小说“欧化”的一种明确答复。用现代的形式来表现乡土，是他的文学理想。为了这，他显得很固执，以至连周扬也批评他那种激烈的情绪和激烈的情绪表达方式。

贺龙的书一写完，他感觉宽松。这部作品就充分地运用了现代的人物刻画手段，追求人物、环境在客观上的真实性质，叙述简洁明快，坚决摒弃一切飘浮不实的花饰。创作使他得到相当的满足。

不久，他终于正式提出返回四川的请求。周扬和洛甫（张闻天）先后找他谈话，想尽量挽留。洛甫还建议他把小孩交《新华日报》的人带来延安，岳母也可一块来。他时时动摇，推说回去与妻子商量，商量的结果自然还是不成。

随后周扬便同意了，并取得组织批准，安排了他回川的两项任务：第一，让《文艺战线》（他们在冀中时在延安创刊，周扬主编，他也是编委）改在重庆出版发行。第二，帮助延揽文化人去延安，主要是为“鲁艺”和一个剧团增加专业人员。

这个决定使玉颀一扫愁云，却没有解除沙汀的不安。意识到的不能走的道理和自己内心要求返回故土的呼声，是那样不谐调。个人以后被历史证明并无错误的回乡举动，在当时是以一种卑微不足道的形式，畏畏缩缩表达的。他们开始准备行装。临出发前，国统区的北路慰劳团11月抵达陕北，他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和宴会。慰劳团团团长张继讲话，他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元老，讨好地讲到毛泽东流泪谈延安轰炸中人民受苦之事。会上陈伯达递条子给沙汀，请他发言提出取消国统区书报检查制度。沙汀在条子背后写，他马上要回大后方，不便讲。陈伯达于是自己讲起来。慰劳团的副团长老舍中间把话打断，建议好生地保护文化古迹清凉山、宝塔山，故意把尖锐的话题在这个礼仪性场合插开。

宴会上他与老舍、斯诺同席。毛泽东走来敬酒。老舍小声地对他说，你的小说中学生都在读。谈到团结，老舍说得有趣：都像我们这样，合作就没问题了。这是沙汀第一次与老舍见面，感觉不错。过去他认为老舍是个脱离政治的非严肃作家，从此扭转了印象。后来在重庆接触多了，对这位正直诚恳的人平添了尊敬。

老舍对他创作所说的片言只语，还是叫人振作的。一年的解放区之行，加深了他对中国可能达到怎样的光明的认识，反激起他表现中国的黑暗，表现中国朽坏的农村社会的自信。

他成熟、透彻多了。他好像是跟随妻子回头走去。他意识到他将迎来自一生中绝大的创作黄金时代了吗？

对于你，重要的是需终止创作观念上的摇晃。一旦思想“照亮”你的乡土积蓄，接下来便是不可抑止的喷发。

在是不是全力采纳“乡土讽刺叙事”方面，我滞留得太久了。所幸的是我尚能觉悟。

坡路高高下下

他沿着去上清寺的坡路，慢慢上行。这是都市的山路，人恍惚回到家乡，而且，不能像爬“鲁艺”的窑洞那样随意，要时刻留心两旁茶馆和小店铺里一双双可疑的眼睛。因为他要去的地方是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从解放区的圣城延安和冀中平原抗战的最前线，一步跨回到当时的陪都重庆，沙汀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1939年的11月中旬，和玉頌乘一辆敞篷货车离开延安，他就坐在车上自己的行李和从一二师带回的笔记本上面。又一次看到路上步行的青年男女，手持雨具，背着各种包包，露出兴奋的神色。不过一年前他与他们是同行，现在是逆行，使他不无感慨。

汽车颠簸中，他无意中听同行者谈话，突然听到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因手术中毒逝世的噩耗，他简直不敢相信。几个月前他在东湾里村的一个小院，还访问过这个不知疲倦的外国老头，两人说了一阵贺龙。难道他那把解救过千百个生命的手术刀救不了自己？悼亡的情绪使他不知道车子何时已经到达当夜宿营地三原兵站。

吃饭的时候，认识了南汉宸夫妇。这个前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长，西安事变中的著名人物，坐的是驾驶室。他去西安是为延安的文化机构募捐，包括为“鲁艺”募一架钢琴。南告诉沙汀，如果不走，本来已经要选沙汀做新成立的宪政促进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的理事的。

第二天上路，沿途见到不少“马家胡子兵”（马步芳部队），知道形势究竟与前不同。

南汉宸为人诚恳、周到，抵西安后，当夜曾邀沙汀去浴池洗澡。南是公开的身分，上街带着勤务兵。

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是旧地重来，不过，去延安时只临上车前才住进的，这次是三天全都住在这里。沙汀被引导着去见德高望重的林伯渠。林老看了介绍信，知道是去后方，特别嘱咐下面的工作人员要多给一些路费，准备好行装。关于沙汀的笔记本、稿件，林老指示可以留下由军车直送重庆，免得路上生事。第二天躲过一次警报。防空洞在外面，挨着城墙。

沙汀看见林老跑得气喘吁吁，却仍询问身边的同志，需要撤离的人是不是都撤离了。那种对人的关切，使他想起解放区来。

（你刚离开一个地方，就怀念一个地方吗？主要就是留恋这种同志间的新型关系。这在当时国内的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七贤庄等于是西安的“解放区”啊）

在这个“解放区”，他还遇到“鲁艺”戏剧系一个相熟的剧团团长王震之，带了一个演剧队刚从晋东南慰问回来。此人多才多艺，话剧、京戏，场面上的活，胡琴、小鼓，样样来得。在办事处的院子里，他为大家组织了一次文娱晚会，使沙汀想起在冀中与“鲁艺”同学多次登台唱歌的情景。

一位精明的车副官，帮沙汀办好了由第二战区返川的护照。找裁缝把一件军用革皮大衣改成中式皮袍。这种老羊皮大衣都是新疆盛世才送的。这个军阀需要装出进步，延安需要一条由陆路指向苏联的通道，两边的关系一度维持在“友好”阶段。茅盾、赵丹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去迪化（乌鲁木齐）的。

第三天夜里，沙汀夫妇坐火车到了旅客拥塞的宝鸡。凭了一张车副官给“工合”宝鸡办事处的介绍信，奇迹般在次日凌晨便搭上一辆货车。到成

都后，急急把黄玉颀送到几十里外的仁寿文公场文华中学，使她与其老母、幼子团聚。之后，单身一人又转回成都，等候《新华日报》运报的便车，准备前往重庆报到。

一种负疚的心情迫他赶快去重庆工作。其实，他在路上已经执行起为延安招揽人才的任务。从文公场回来，特意在罗江停留一夜，住在国立第六中学李广田那里。陈翔鹤经李介绍也在这里执教。依靠翔鹤以及其芳与这位斯斯文文的散文家在北平时代的友谊，动员他去“鲁艺”教书。与李广田在宿舍里聊了大半夜，李同意去陕北，但后来据说是因路上的困难太大，到西南联大去教书了。

在成都，车耀先一直在替他联系车子。《新华日报》驻蓉的办事机构，车的“努力餐”，沙汀下榻的旅馆三位一体，恰都在祠堂街上，联络很是方便。利用等待的时间，车耀先找来张秀熟等七八位熟人，听沙汀介绍大家关心的敌后生活。座谈完毕，在“努力餐”吃了车跃先的名菜“素什锦”。秀熟老师还偷偷约沙汀到半节巷自己的寓所谈了许久，详细了解延安的军事力量。沙汀尽其所知，向老师陈述了一二 师近期的战绩，特别是敌后军民、军政、上下关系的新气象。从国统区党内同志的殷殷关切，他懂得解放区存在的价值。他终于搭车来到山城重庆。《新华日报》的车子运去的是新报纸，运回来的是嘉乐纸厂的货物。

同车的旅伴有在郭沫若的文工会工作的罗髻渔一家。经过路上罗的介绍，对山城文化界的一般情况已有所了解。两天后下车，按罗的指点找到“左联”时期的熟人，安排了住处，随即去红岩嘴南方局接转组织关系。

这里离城较远，过了李子坝、化龙桥，离开大路爬上山坡便进入大有农场地面。他想起昨天见到在上海认识的章汉夫，又名石通，入过监狱，出来时关系丢了，是周扬给他接上。

现在他在《新华日报》，曾嘱沙汀如遇盯梢如何在半路拐进农场主饶国华的住所。他意识到回到重庆，就等于处在半地下的状态了。为了慎重，他果真去打扰了一次饶宅。

那天在南方局由博古（秦邦宪）接见。他在延安听过他的讲话。回答了博古详尽的询问，秘书取来由军邮带到的笔记本和记写贺龙的书稿。博古指示他到市内曾家岩找徐冰联系一切。

现在他便是去见徐冰。被称为“周公馆”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是座三层小楼，叫人起疑的是二楼居然驻有一个水利委员会的办公机构。通向三楼有专门的扶梯，从晒台可以了望嘉陵江的江面。

谨慎的沙汀，一路警惕地进了门。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周恩来的助手徐冰，一副文化人的潇洒模样，干练，终日乐呵呵的神情。沙汀想，这才是每日帮助周恩来应付无穷无尽事务的人呢。徐冰告诉他，他的工作就是联系本地原“左联”的成员，了解情况，同时，完成延安交办的两项任务。他要定期到这里来汇报，周恩来同志有时也要参加听的。这就与“左联”时期协助周扬所做的差不多。

等后来与徐冰稍稍熟识，两人发现彼此有个共同点：嗜好杜康。碰上汇报时周恩来不在五十号，徐冰会让勤务员去买几块炸排骨，随手从写字台底下取出一瓶泸州老窖，一边吃酒，一边谈话。董必武很严肃，如果叫他看到，会半开玩笑、半批评地冲着徐喊道：“你一天就吃酒！”大家都忍不住哈哈一笑。

同“左联”作家联络并不难，他的住地华裕农场里便住着一群。到达重庆当天，他就到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去。一进门，迎头撞见的便是胖胖的宋之的，人称豪放爽快的“宋大爷”。在上海，沙汀编《光明》的时候，读过宋的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后来看他们演出《武则天》，戏散后还相约在四马路的高长兴绍酒馆喝过花雕。这个话剧家待人的热情真是少见。他自己12月12日和作家战地访问团的同人刚从前方回渝，一听说沙汀还没有住处，便邀他到长江对岸铜元局的华裕农场住。

华裕农场是胡子昂办的。从菜园坝摆渡过去，沿半人高栽满铁篱笆刺的鹅卵石墙走上一段路，进入农场大门，便见一条上坡（又是上坡）的煤渣路，直通场部的四合院。场部门前有一个水池，四周围满葡萄架。整个农场西面是桃子林、李子林，中部是苹果林、柑桔林，其他还有菜地、奶牛厂。种粮很少，以水果为主，环境很是优美。在这个安静的四合院里，住着一些与农场经营毫无关系的作家：宋之的、王莘夫妇，罗烽、白朗夫妇，章泯、萧昆夫妇，加上葛一虹，最后来了沙汀，组成一个文化集体。

这些作家都是通过我哥哥胡甫章才去住的，我那时在上学，放假回家就能看见他们。我叔父胡子昂本来学农，抗战回川后，向重庆的资本家筹款办了农场。但是他很少来，把事情交给我哥哥和一个技师，我们全家也搬去住。

我哥哥学画，并不懂农业，他只是管事。农业全靠陈技师，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他不是科班，对剪枝有经验，懂得园艺。农场从当时看，算是科学种田，讲究水果、牲畜的品种。

周围的农民看农场用纸来包洋葡萄（马奶子葡萄），在池子里养又白又大的北京鸭，都觉得稀奇。我们常年有水果吃。

作家们住在这里写小说、搞翻译。罗烽写《满洲的囚徒》，我抄过稿子。沙汀写作用毛笔，纸是一刀一刀的连史纸，他折成三叠来用，下面放一张带格的稿纸，修透过来。他在整理解放区的印象，《H将军在前线》，我替他抄过。他原稿的字很小，很秀丽。休息的时候，他跟宋之的夫妇打麻将。他们自己开伙。有时躲警报，大家都挤在农场东面的一个防空洞里。

我母亲对他们很热心。她懂中医，只相信自己的中医派别，用药温和。连有名的中医开的方子，她也敢把热药换掉。作家们谁有病，她就开药、熬药，看着吃下去，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

四合院里宋之的、沙汀住左厢房。罗烽与我们家住正房。哥哥和技师办公室在右手的南房。后来还住进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带着姨太太，为的是起掩护作用。记得哥哥在上海订了一套《鲁迅全集》，运到桂林搁下了，就是靠这个将军介绍军车送到重庆的。这时沙汀是不是离开了农场，我就记不得了。我二姐在铜元局小学教书，这样我们才搬到华裕农场住。

之的的脾气，他住到哪里，文艺界的朋友也到哪里。他们特别能聊。沙汀会摆龙门阵，幽默，指手划脚。讲过延安的事，但不随便讲。我大着肚子（怀女儿宋时），端个凳子听。有时能聊一天，我就为他们服务，做饭。之的的朋友特别能吃。沙汀在我们这里搭伙。所以，沙汀总是不忘王莘的黄豆红烧牛尾，称她为烹调家。沙汀与宋之的则是大吃家、酒徒。

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逐渐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每周进城去爬那上上下下的路，参加周公馆讨论文化工作的例会，进行作家间的联络。

几天以后便回农场乡下写作。自从1939年“五四”大轰炸后，大部分的文化人都住在南温泉和北碚两处。南温泉较近，过江在海棠溪乘公共汽车可直达。走完南温泉的正街，顺坡进入后面的桃子沟，在河沟北岸搭起一列租金低廉的茅舍，杨骚、白薇、欧阳山、草明都住在这里，简直就是“左联”小说散文组的原班人马。后来“文协”很有先见之明的在这里预备下几间房子，等4月下旬第二次轰炸来的时候，正好派上用场。

北碚很远。从重庆去，有水陆两路。黄桷树有复旦大学、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文化人。胡风住在那里，曾写信给宋之的为《七月》向沙汀约稿。话说得很艺术，说如果“刊载了他（指沙汀——笔者）的稿子，将来在革命法庭受审，判罪会轻一点”，仿佛对将来有预感似的。依他们过去的关系，这种间接托人求文的做法，说明两个口号的往事仍然横亘在两人中间，虽然双方都想把它忘却。所以沙汀决定要给胡风写稿。

北碚附近草街子的古圣寺，有陶行知办的育才中学，在实践着陶从生活出发、劳动与教育合一、全面发展儿童个性的教育思想。学校注意发展学生艺术才能，像大学一样设文学系、音乐系、戏剧系（当然是初学课程）。主要的师资都是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贺绿汀、艾青、章泯等等。为“鲁艺”招揽人才，这是个理想的地方。

在市内张家花园范长江的青年记协附近，沙汀拜访过郭沫若、阳翰笙、老舍。老舍住在张家花园上坝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那里，不辞辛苦地主持着“文协”的会务。沙汀还到《新蜀报》看望了漆鲁鱼和姚蓬子。他对姚的印象不算好，因为姚办的作家书屋克扣作家们的稿费。老舍为人风趣，为了姚蓬子抽烟乱扔烟灰，准备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烟缸，说是“严阵以待”。

这样初步联络过了一巡，沙汀出席了周恩来亲自掌握的汇报会，就在曾家岩五十号一楼周的卧室里。沙汀在延安见过周，听过他的讲演，不看稿子，条分缕析，思路清晰、开阔。

周恩来亲切的睿智风格，是他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这次开会之前，大家欣赏了田汉从桂林捎来送毛泽东、周恩来各位负责同志的条幅。诗文都是这位戏剧家的亲作。田汉不愧风流倜傥。

对于这次汇报，沙汀至今记得：我对白薇大姐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谈得较多，还讲过一个故事：她在红十字会医院割盲肠，开刀之后，医生这才发觉，她的盲肠已经自行萎缩消失了！恩来同志听罢，朗然大笑。随即十分关切地问起她当日重庆的生活和健康状况。

这种可以讲故事的会，有政治家周恩来的人情味和小说家沙汀对人的兴趣在内。会上谈起以群，沙汀说在上海与他只有一面之缘，就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逃难到租界，以群来找刚刚靠近“左联”的艾芜。那时他叫华蒂。周恩来截住话头，指示说：以群在监狱里有些问题，但已清楚，只要他自己革命，可以当非党干部使用。周恩来对以群处理自己关押期间妻子梁文若与吴奚如关系的冷静态度，也表满意。

就是这几句话，造成以后沙汀与以群的长期关系。

起初，以群等于是沙汀的助手，并不参加徐冰主持、周恩来有时也在场的文化工作讨论（曾家岩例会还有胡绳、蒋南翔、冯乃超等人出席）。由沙汀把“精神”传达给他，他便去做。以群重新工作，干得很出色。这个人瘦削，外表并不活跃，从事社交总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两人关系很好，后来通信也多，以群用的都是“叶灿”的名字。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

沙汀可以做证早已被补偿了的过失，还是把他压迫致死！

1939年冬天，我同作家战地访问团回到重庆，与宋之的、沙汀等住在华裕农场。我当时觉得沙汀和以群与党的关系密切，别的身份不清楚。沙汀身着灰布长衫，他的穿戴总是比较土的。以群擅长联络工作，有些我们的稿子审查老爷通不过，都靠他去打交道。

我这时在编《中苏文化》，文艺方面的稿子归我管。

沙汀写过敌后见闻，交我发表。章泯是个老夫子，导演最负盛名。他的夫人是萧三的妹妹萧昆，一度分离，江青曾同章泯恋爱过。“七七”事变后，章、萧两人和好，在农场住，后来搬去北碚草街子。罗烽满“帅”的，在上海已稍有文名，他和白朗同我一起上前线访问。这些住在华裕农场的文化人都无职业，专事写作。农场的这段日子过得很惬意。沙汀跟着宋之的夫妇当回教徒，嚼牛尾，食永果，神聊天，搓麻将。然后各回各的屋关门伏案工作。从延安带来与其芳一块编好的一期《文艺战线》的稿子，送给胡绳交生活书店出版了。

《贺龙将军在前线》这本书，艾思奇在延安就托周扬转告他，一定要交重庆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书。但经出版社的黄洛峰看过后，告诉他，这本书是不可能被审查通过的。沙汀又一次尝到图书审查制度的滋味。他抄了一部分章节（可能就是胡甫臣帮助他），寄给香港的杨潮在《星岛日报》上发表。最后，还是生活书店有办法，他们把全部书稿拿去转移到在沦陷的上海开设的一家小书店去印，改名为《随军散记》出版。这本让沙汀怀着特别感情的书问世以后，作者自己居然一直到1950年初，才从南下的部队同志手中看到它的模样。

在农场一沉静下来，怀念的情绪便来包围他。罗烽在办《文学月报》，需要对解放区的回顾性文章。如果他不赶快写出来，他怕这些究竟只是临时闯入的印象（不像乡土的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会淡漠下去。按照习惯，坐在场部四合院的屋子里进入冥想，根据地各种人物都跑来与他对话。他的感受也在人的身上，河北的老乡对民族战争的态度，部队里的小鬼和高级首长的友情，北平的大学生在做着民选的游击县长，和日本军队在相距几里地的圈子打仗全靠人民做耳目，敌后战斗间隙演出的洋话剧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都一一涌上心头。

他时时拿这种新型的人们，与家乡的人们做比较，不敢讲对新的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却因为有了一个参照，对自己乡土在整个民族战争中显出的守旧陈腐，加剧了认识。他写八路军的小鬼，面前不断晃动着家乡的顶一头秃疮、只学会打牌掷骰子的亲侄儿的身影。

最早写的《敌后琐记》里有一篇《过去》，从冀中老百姓中挑出一些代表旧时代阴影的人来描述：一个大财主的独养儿子，一个在北平做过珠宝生意现在卖柴的老人。共同的特征是沦为神经病患者！沙汀说，“往后我却仍然不时会念及这个可怜的存在。虽然我明知道他之所以特别触目，只因为他是点缀在一个辉煌壮美的背景上的缘故”。这一组主要是写“辉煌壮美”的报告性作品，本来拟了大约有十八个到二十个题目。都有亲自观察后写下的笔记做基础，稍做概括，提供朴素的事实，就能用来表现“一些已经有着新的观念和新的感情的人民”。所以，写得比任何时候都轻松。差不多每篇三五天就写成，以至宋之的笑着对他说：“在上海都说你是难产作家，哎呀，我看你写文章还是满快的嘛！”

（你基本上是个爱修改的作家。后一句刚写完，就想改前一句了。哪部作品都愿放在心里酝酿来酝酿去，所以你不可能写得快。已经成熟的东西我就快，这批散文，还有像为以群写的《一个秋天晚上》，都是急就章。后面这篇小说好像还不坏。我从来不会摘生瓜）

前四、五篇《敌后琐记》写得正顺手，这年3月初，玉颀从仁寿接连来信说她小产了，催促他回去一次。这样，经徐冰请示同意，他便与刘披云约好订票一起去成都。可就在出发前一天，刘披云突然跑到华裕农场来告他，成都局势紧张，罗世文、车耀先突然被捕。刘一向在那里是抛头露面工作的，不能前去了。这就是以后才知道的3月18日由戴笠一手导演的成都抢米事件（自买自卖，嫁祸于共产党）。罗、车二人从此被关入贵州息烽和重庆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直到1946年殉难。

沙汀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回家。他乘长途汽车到成都后，一分钟也不停留，高价雇了一架黄包车直奔仁寿。下午四、五点钟上路，车夫和沙汀觉得入夜以前赶四十多里路到苏码头落脚没有问题。苏码头是夏正寅的故乡。夏自离开安县县长、绵阳地区公路局督办的任上后，始终与沙汀有交往。他的女儿夏森入“抗大”学习，在延安还见过。这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与党有很深关系的朋友。到他的宅里住一宿，吃他家一顿远近闻名的焖鳝鱼，岂不又美又安全吗？

岂料在苏码头一条横街上敲开他家考究的大门，夏夫人睁着通红的病眼告诉他，她丈夫前天外出，连她也不知去向了。沙汀感到不妙，连忙退出，央求那个黄包车继续赶路。

天完全擦黑前，又赶了十几里来到煎茶溪。再也没法往前走了，便住在这个小乡场上唯一的一家客店里。同住一房的还有个青年，闲聊起来能看出是那种有地有房而无势的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被称为“老坎”（肥猪）的。派差派款，这种人家也要受豪绅、官府的宰割。谈起当时国统区的“壮丁”问题来，这个青年忘掉自己假报的身份，谈吐愤激，讲了许多本乡的黑幕。这一晚上的谈话，事后成了引起沙汀写出一系列兵役小说的动因之一。

文公场离仁寿县城三十里，名气挺大。因为它“风水”好：潘文华、董长安这两个四川“二流”军阀，都是此地人。沙汀做安县教育局长就是通过董长安的任命。董是夏正寅的同母异父兄弟。潘文华办了个文华中学，师资、设备比县城中学还好。黄玉颀和她母亲现在都受聘在这里教书。本来母女住校，沙汀临去前，已经通过校长聂生明、校董冯子虚，去冯家祠堂的厢房里安了个新家。冯是潘文华的总角之交，现在替他掌管家乡的产业，对沙汀一家显然客气周到。

文公场到处可以感到潘、董两家的威风。潘文华巨大的住宅里关着两个失宠的“如夫人”。董长安为父母修的祠堂是在一片低洼地里垒起的宏敞殿堂，沙汀曾去参观过。与安昌镇的政治结构一样，这里是“枪”支持一切，人们也尊崇实力，谈起当日董家祠堂落成的盛况，仍然津津有味。

文公场的生活跟安昌镇一样单调，赶场天巡街，看班子唱川戏，便算是最高的享受。沙汀一次看过冯子虚从成都请来的红得发紫的旦角琼莲芳，唱《北茆山》。开场时，有当地的“玩友”下海串戏。虽然人们爱听戏，但是如果有人当戏子或准戏子，还是会被认为是卑贱的。一个唱胡子生的青年，未经家庭允许上场，就被当联保主任的父亲用竹竿从前台捅到后台，引起人

们的哄笑，使沙汀仿佛回到童年灵官庙听戏的热闹中去。

4月，日机又开始轰炸重庆。文公场相当安静。他在这里写了回川以后的第一篇小说《磁力》。这还是对延安的回顾，却已经站在乡土的立场上了。在别人去延安的故事中藏进自己的体验，包括对乡场闷气的体验。主人公小袁突然对少有能说得来的小学国文教员张琪沉缅于私情、挣脱不开旧环境的生活，第一次觉得无聊，是不是在加强着自己几次离开玉顺去重庆工作的意志呢？有趣的是，小说写出了小学教员们在休息室里大谈集股挖学校庙后山坡金子的情节，说明《淘金记》的构思仍在沙汀脑子里盘旋，有时不由自主会外泄出来。（这你倒看得仔细，我不想置词。确实，《淘金记》的人物、故事，已经在我脑子里“蠢蠢欲动”很久了）

意这个镇名与《淘金记》的关系）。第二日赶到位于内江北面、沱江之畔的大场镇球溪河。这里是成渝公路的一个站口。看到公路上的情景，才使沙汀了解到不久前重庆“五四大轰炸”的严重。好像陪都达官贵人的小轿车全都开了出来，里面塞满了老爷、夫人、公子小姐。卡车上则是皮箱、包袱。开回重庆的车几乎都是空的，而公路局开出重庆的客车就挤满了一般公务人员和他们的家眷。车站售票员听说他还要去重庆，把眼睛都瞪大了，连呼：“哎呀，人家都在逃出来，你还要去？！”

他自然还要去。一路上的惊惶不必说，车一进市内两路口车站停下，扑入眼帘的四面都是烧毁的房屋，像是经过了一次大地震。全市的水电系统遭到破坏，茫茫夜色显得更加深沉。但是他下车刚走了几步，就发现城市没有死，在这遍体残伤的街道两旁，到处亮起了满堂红的蜡烛光和黄黄的亮油壶的灯光，这一片一片微弱的不屈的光亮，让沙汀感到人民的存在。他也镇定多了。

熟人都做了疏散。华裕农场宋之的、罗烽全家去了江北的寸滩。“文协”迁往南泉。当夜沙汀在曾家岩五十号报到，住了一宿。次日好不容易雇划子渡江。汽车站的情形，已经十分可怕。反正自己还有些脚力，便与许多旅客结伴，从海棠溪步行到南温泉去。

桃子沟聚集的文人更多了。欧阳山、杨骚住所的河对岸，就是“文协”具有先见之明租下的房子。梅林、臧云远、陈学昭住在这里，很宽敞。沙汀也分到了一间客房。对面隔河住着章回小说家张恨水。如要上街，需得过一小桥，绕过张的院落，才能到川东银行、福音堂、川东医院、陪都工商学院、冠生园那条街去办事。

南泉的生活是上午每人自管写作、读书。吃饭在文协搭伙。午后天热，如无警报，时常会有人在河坎上吆喝一声，各位朋友便慢慢踱出来相约去茶馆喝茶。谁如果得到一笔稿费，也会在河沟边喊人去饭铺大嚼一顿。好像过着一种战时共产主义生活。

在城里徐冰就告诉沙汀，凯丰在南泉街上的一家私人疗养院养病。住定后，沙汀就去探望他。很明显，凯丰也是五十号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交谈时，凯丰提到在南泉文化人中可以发展哪些人为党员，他当即提出欧阳山、草明。后来就由沙汀找他们谈话。不出所料，他们早就有了这个愿望。凯丰与他们分别谈话后，结束疗养，回到城里办公，沙汀、吴奚如便正式介绍了这对作家一块入党。

白薇大姐是他素来尊敬的，为了能使她与杨骚结为夫妇，沙汀好心地想利用战乱的机会撮合他们。一次，冒冒失失当面向她建议，结果弄得白薇

大光其火，虽然不久也就原谅了他。办事处的张晓梅来南泉接凯丰，白薇还把沙汀经济上拮据的情况对张“告发”了，张晓梅马上代表组织硬让沙汀收下一笔生活费用。这是他做文艺界联络工作以来，接受组织的唯一经济资助。

在南泉，大约住了两三个月光景。时常能看见张恨水一个人，抱一把大大的陶茶壶，从容不迫地跑警报。他感到奇怪，他家里的人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对于张恨水，沙汀是在他的《八十一梦》发表后，才全面评价他的。沙汀还跟着杨骚去看昔日上海工部局一位高等法官如何做买卖。他叫应时，在陈果夫主持的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却不识相，非要揭陈氏兄弟的老底，结果被排挤出来。此人很有意思，竟在南泉的街面上，与年轻漂亮的姨太太自当店员，毫不羞涩，自得其乐地开了一片小杂货店。沙汀凭着对喜剧人物的喜好，特意跑去观看了这个人物。

6月到8月，日机的轰炸进入高潮。山城一条繁华的新丰街8月19日这天遭到大破坏，现代化的银行建筑物炸成了断垣残壁。沙汀经过这里，亲眼看到一堆堆废墟在散发热气。进入雾季后，轰炸停止了，大家纷纷进城。经过葛一虹、宋之的的奔走，“文协”从炸毁的临江门旧址搬到了张家花园六十五号，租了“青年记协”留下的一层楼四间屋子。从此，这栋三层楼房和它的院子成了抗战时期进步文学界的一块宝地。

沙汀沿着观音岩的下坎爬上去。家乡的山路和陕北、晋西的高原峡谷练出他的脚板，他走路脚下生风，不习惯慢慢踱步。前面已是“文协”临街的楼房。两扇黑漆门板里面，是一个天井，一边是廖梦醒住的小楼，往左便拐入这个三层楼的底层。右手两间，外面是会议室，里面是“文协”秘书梅林夫妇住的；左手两间，外面一间算是客房，里面靠着楼梯的一间住着以群。二、三楼这时主要住了一些搞电影戏剧的朋友，二楼的宋之的、史东山、葛一虹，三楼的陈鲤庭、舒绣文、盛家伦，后来又有郑君里、徐迟、陆诒等等。至于临时在这里投宿的文化人，就更多了。沙汀从南温泉回城，挤进了以群房里。虽不如农场宽敞，可联系朋友方便，无形中也节省不少的时间。他还是一边写《敌后琐记》的其他各篇，一边搞工作。曾家岩的事情多与以群商量，两人朝夕相处，配合得很默契。

9月下旬，周恩来鉴于半年来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国答应日本切断滇缅路三个月的无理要求，苏日有签定一项和约的趋向，局势复杂，人心浮动，一些知识分子思想陷于混乱，决定去北碚和大家座谈一次。他派沙汀、以群先一步去安排。

北碚有林语堂回国后购买的一所院落，一圈平房围着一幢西式洋房。从战时角度看，就满不错了。8月份林去美国，把房屋连同家具都借给“文协”使用。“文协”在北碚的会员比南泉的还要多，这所房子成了正式的分会会址。沙汀他们提前来后就落脚此处，见到住在这儿的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艾青。艾青诗人气质，说话幽默，能挖苦人，有股傲劲。沙汀与他谈了此行的目的，并探问他愿不愿意去延安。艾表示可以考虑，要求同周恩来谈一谈。胡风住在附近东阳镇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房子里。东阳镇、黄桷镇都在河对岸，沙汀去与他商量约哪些复旦大学的教师来参加会。第二天上午，又到北碚与北温泉之间的一个山沟里，去拜会了陶行知。

周恩来副主席到北碚来了。决定由陶行知出名邀请一些客人，记得我也附了一个名的。

由我请复旦诸人到北碚聚餐一次，到了有二、三十人，都是在北碚的

文化人和复旦的教授们。陶行知主持，并请周副主席讲话。

周恩来徐冰一行，9月24日夜到达北碚。原定下午到的，在城里耽搁了，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这时候街上好一点的饭馆都已关门，沙汀、以群就领他们随便找了家小馆子用餐。饭后，周恩来执意乘车去拜望陶行知，然后才去北温泉歇宿。

第二天清晨，沙汀约艾青一块去见周恩来。艾青一听说周昨晚就到了，而沙汀却没有按原约马上关照他，便发了脾气，几乎就要因此不赴会了。诗人发脾气，小说家只好劝解，好说歹说，总算把他劝去见了周恩来。可是，等艾青从周的房间出来，脸上的表情大变，异常的兴奋，动着感情对沙汀连声赞扬周恩来的言谈风度。看来，你赴延安的问题不大了。沙汀长出了一口气。

来温泉开会的人真不少，吃饭时坐满了五张大圆桌。座谈会上，沙汀第一次见到青年时代便读过他谈东方文化、哲学的书的梁漱溟，相当矮小，又黑又瘦，有点印度甘地的味道。

另一个使他感兴趣的是神情开朗的郭任远。在上海，他读过这位在美国学成的行为心理学家的著作，是用那个学派的观点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之不科学的。但是今天，他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坐在一起，热心地发问，讨论时局，表达自己对民族、国家命运的隐忧。

最后是周恩来讲，他用清楚、亲切的话语，分析国际形势及与国内抗日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对抗战前途的信心鼓舞起在座的知识分子。

当晚，沙汀、以群、胡风陪着周恩来在温泉住下。26日上午，周恩来一行乘车，沙汀他们坐划子，到三十里外的草街子育才学校参观。古圣寺阔大的庙门石坊，高大的黄桷树，在周围的田野的映衬下，似乎焕发了青春。陶行知亲自率领学生夹道列队，一群群充满朝气的少年用别致的方式来欢迎贵宾。他们高唱着：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这是一首刚刚流行的苏联歌子《祖国进行曲》。在国统区，可能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育才”这样高声唱它。在夏天日机已经光顾过北碚、黄桷镇的今日，学生把他们对未来理想的寄托，全部灌入到这个歌唱之中，令沙汀不禁眼眶湿润。周恩来进入庙堂改装的小礼堂，登台对师生演讲。沙汀、徐冰用这个时间由章泯领着到他家里去谈话。这是执行为“鲁艺”物色教员的使命。了解育才戏剧系沙蒙、舒强，连同章泯各位的情况，他们一一回答了询问。吃着章泯妻子用过浆粉子做的元宵。徐冰表示欢迎他们到延安去，谈话是很融洽的。起初，沙汀担心章泯与蓝苹（江青）的特殊关系，怕章去不合适，但徐冰大概是经过周恩来的批准，答应章泯时非常痛快。

周恩来回重庆后，沙汀、以群又在这个“小解放区”滞留了四五天，与文学系的同学座谈，继续寻找愿去“鲁艺”教书的对象。音乐系主任贺绿汀后来去了新四军。搞雕塑的王朝闻却立即谈妥了。沙汀在育才还赶写了一篇报导一二·九师文艺工作状况的“敌后琐记”。他还去贺绿汀时常散步、产生过作典灵感的一片树林子里捡过菌子。这片林木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普希金林。

恋恋不舍地离开草街子，他和以群、艾青、韦菱四人沿嘉陵江而下。两岸的青山匆匆过去，迎面而来的仍是重重青山。这些地方除了比家乡清秀

一点，山峦的重叠是一样美丽。重庆在小汽轮的前方隐隐出现。半年多来，在这个山城上上下下奔波，延安交给的工作已大体完成。从曾家岩到张家花园，到郭沫若的天官府，进步文化界的团结得到加强。自己的创作成绩如何呢？在抗战大环境下，他的政治认识没有把他对乡土的了解弄得简单化，他积累了创作的冲动，只待寻找一个山口喷发。驶来的山城，显露出它峻峭、挺拔的姿容。

引向巅峰：《在其香居茶馆里》

住在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文协，虽然比乡下来得忙乱，创作欲望却更盛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冲动被耳闻目睹的大后方一件件社会弊政所强化，暂时没有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把它化为文字，短篇的题材便来叩门。这时，正遇上茅盾10月离开延安，11月到达重庆，在曾家岩休息了两天，搬到学田湾生活书店的楼上暂住。沙汀听到消息，便和以群一起去看望茅盾夫妇。

从“八·一三”离开上海，他们就没见过面。1938年沙汀在成都协进中学教书，彼此通过信，应远在广州的茅盾之邀写了自己第一篇抗战讽刺小说《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登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上，还得到他的赞赏。沙汀反映抗战弊政的小说全部是从《防空》这一篇出发，组成一个系统的。

在学田湾的小楼上见到自己文学事业最早的这位支持者，感到他侃侃而谈的话语、手势、眼神，还和过去一流畅。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延安。后来，以群被周恩来安排做茅盾的助手，恢复《文艺阵地》，在香港又共同经历了由华南游击队负责护送的几千文化人大转移的曲折艰险。

现在，茅盾直问沙汀：“你怎么会离开延安的？”

沙汀没有拉扯玉珮，直接谈起了文学上的原因：“我对陕北、冀中的社会和人物，总不如对四川那么熟悉嘛！在那里，搜集或写一点子散文报导是可以的，真正写小说就难了，我就没了把握。”

说得动了情，他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你看在我的家乡，哪怕不出门，有人打一个喷嚏，我都能猜到它是啥子意思哩！”（这话太熟了。我听你讲过，说你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走，弄不清北京和外地人在想些什么。安县有人打个喷嚏，你都能猜到他的意思，十之不离八九。嗨，尽管是夸口，却实在是我的一句经验谈）

他接着就对茅盾谈起当前四川社会的怪现象。这正是他最注目的事情。茅盾听得津津有味，鼓励他多摆。

我记得，我曾向他摆谈过这样一个故事：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一位略有存款的财主，眼疾手快，赶紧把它拿去买了一箱洋钉囤积起来。很快，洋钉一再涨价，他就把这箱洋钉拿到一家银行作压，借了一笔较大的款项，买了两箱洋钉。一转眼，洋钉价钱又上涨了。于是他又拿自己囤积的洋钉去抵押借款，抢购到更多洋钉！而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两三年来，他大发“国难财”，变成暴发户了。茅公听罢哈哈大笑，随即摸来了小本子，把它记上。

这个蛋变鸡，鸡再生蛋的“神话”，沙汀、茅盾以后都没有把它具体运用到一篇小说里去，但是作为对抗战现实的一种思考，它显然影响了两位小说家，特别是沙汀，帮助他加深了头脑中那个争夺金矿，发国难财的《淘金记》的主题。

重庆生活对于他的另一个刺激是政府对思想、言论行动的钳制，就像明末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横行。每一次去徐冰那里，都有机会造成和温习一遍这种遭压抑的心理。这一年的中秋节，他在曾家岩五十号楼下会议室度过。叶剑英主持这个全体工作人员的聚会，大餐桌上摆满瓜果月饼，负责军事工作的王梓木讲了“杀家鞑子”的民间故事，谈到元朝“家鞑子”的监视作用，他意味深长地指指楼上水利委员会的办公室，把人们引笑了。

这种情况沙汀感受得多了。一位文学界的朋友谈过自己的经历。一次经成渝路乘长途车来重庆，有个人同他一道上车，路上谈这谈那，歇店也硬要一道，他觉得这个人是在钉他的梢，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最后，他利用车到璧山停下吃饭的机会，索性溜开，步行走回了山城。沙汀还知道一位著名的诗人住在市郊山洞一带地方，神经紧张地感到有“特务”在他家门口成天东游西游。有天下午，“特务”的活动似乎格外严重，当夜逼得诗人越墙逃回市区。

这些精神恐怖的故事包围了他，他早就想写篇东西来发泄一下。茅盾、以群忙着《文艺阵地》的复刊，新建立的编委会里也有他一个，所以，当茅盾请他写小说时，自然推托不得。他想起南温泉时期遇到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名记者陆诒，他们“七七”事变在上海就认得。陆诒与他谈起他们的共同熟人傅宇琛。傅是省一师比他低几个班的同学，后来与另一同学的妹妹结婚，翻译过日本山川均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在成都当过记者。国共磨擦增加，国统区的白色恐怖加强后，他突然甩掉了新闻工作，隐藏起来。“老沙，你知道小傅现在在干什么？”陆诒神情忧郁地说，“他变得胆小如鼠，又不能不养家糊口，跑到这里的长江轮渡上在卖票呢！有时见到我，还希望听到一点消息，只要四下无人，便拉到一旁打听。可更多的时间是在防备有特务搞他，成天疑神疑鬼的。”

这个傅宇琛，沙汀已经有三四年未谋面了，听陆诒一讲，那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模样突然全盘在脑子里活起来。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个人物，觉得给茅盾的这篇小说已经有了“形体”。这就是《老烟的故事——记L君的一段谈话》。

小说的人物既然是陆诒谈出来的，便采用了在他的小说中绝无仅有的方式，由一个叙述者L君给“你”讲故事。他塑造了一个被迫害狂的形象，把其他朋友逃车、跳墙的经历全揉进里面。他想起果戈理的《鼻子》、《外套》，那种神经紧张的小公务员，写下了一句妙语：“他的耳朵，就像果戈理的七品文官的鼻子一样，仍旧在全城逛着，张开在所有的熟人面前”。

他把写好的小说交给茅盾过目，茅盾对它的尖锐性有点吃惊，说：“现在还是打苍蝇吧，不要摸老虎屁股。当然，摸老虎屁股的文章也可以写，写了留起来，等以后时局变了再拿去发表好了。”

听了这个意见，沙汀决定耍些手脚来瞒过图书审查老爷。他在作品里暗示这是云南地方势力干的事情，落款故意标明“写于昆明”。等到《文艺阵地》复刊号审查通过，他在生活书店胡绳那里看校样时，又对小说进行修

改，加上只有重庆才经常用得着的“过江”之类的话，删去落款，恢复了结尾叙述者的感想：“不过，就这样带住吧！而且请你原谅，我要收回我先前的同意了，因为无论你怎么讲，倒霉的神经又有多少错呢？”

胡风每星期都进城来工作，包括办“文协”的事。他与沙汀的关系还是很微妙。上次与艾青几人从草街子育才学校返回，原本答应经北碚时再去探他，正巧两条船衔接十分紧凑，没能顾得上。结果惹起胡风的不快，给葛一虹写信说了一些责难的话。沙汀对比他神经还精细的人，向例的态度是息事宁人。他心里有数，他为《七月》写了题为《游击战》的报告散文，还帮这位老兄审过几篇延安孔厥等投《七月》的稿子，他是对得住他的。

“文协”工作他也支持。老舍敬重周恩来，把老好、善良的国民党艺术家华林团结得不坏。他敷衍王平陵，顶住张道藩。老舍的民族进步立场和全力支持“文协”的工作精神，得到沙汀的尊敬。

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沙汀应邀去枇杷山苏联大使馆参加招待会。沿山的坡路上，宾客们排成长阵，他正好与胡风走在一道。两人像没发生任何不快事件一样地大谈了一通创作理论。

过一天，又在张家花园和这位“文协”研究部主任商量趁着雾季举办一些文学艺术座谈会活跃一下。两人的意见一致，向老舍提出后，又得到赞同，于是便积极筹备起来。第一次决定由沙汀、罗烽、欧阳山先组织一个小说会，请欧阳山做三年来抗战小说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沙汀曾与欧阳山到天官府见郭沫若，向“文工会”方面谈过。因为郭沫若时常要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需要了解情况，总是沙汀去爬颤颤巍巍的木板楼梯，登上那个旧三层楼的屋子的。这年6月以来，他参加过几个重要的会。6月9日，《新华日报》的副刊“文艺之页”出面，在一心花园开过一个民族形式座谈会，他的发言与延安那次的一脉相承，也有所发展。他说民族形式不是单纯指作品“章法”，主要是指“创作方法”，即“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有点古怪，但有他的深意。他慷慨陈词了：

“一般人反对欧化，其实同‘五四’前后的二十年比较起来，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前十年用旧形式的很多，后十年在狭义的形式上讲才欧化一点，在反映中国现实的问题上，后十年比前十年进步。”

他大胆地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鲁迅，“用文言文写的《怀旧》，所以那么深刻，就是因为他还是利用于欧洲文艺的创作方法。”一个是冀中的话剧，“战地里，有的地方喜欢旧剧，有的地方就不然，喜欢话剧，各地发展的情形是不平衡的”。他那根植于为自己的创作辩护的理论发言，倒的确是具有一种开放的民族观念，没有一丝国粹气味。10月8日，《新蜀报》的副刊《蜀报》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他的发言《从三年来的文艺作品看抗战胜利的前途》，为伸张“暴露和讽刺对于抗战不但无害，反而有利”的观点，特别谈到抗战的前途是中国的改革！这引起他对自己三年来创作活动的思考：关于“堪察加小景”这组计划中的暴露和讽刺作品，描写的是自己熟悉的世界，只写了一篇便陷入动摇。想开辟新的写作领域，跑到前方，虽然写出了报告散文，但因为仍然陌生，他不敢用这些材料写小说。“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的方法”，是已经被他抛弃的“创作观念”。他现在已经克服了“不安和动摇”，建立起描写自己的乡土，要采用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暴露和讽刺的现实主义来进行创作的“自信”。

经过这番总结，他的新的乡土讽刺的有力作品，在创作思想上已无障

碍，快孕育成功了。

重庆中山一路上的中苏文化协会会议室，今夜灯火通明。这是11月17日，第一次“文协”的小说晚会在这里举行。这种晚会以后还开过。12月8日有第二次，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他发了言，茅盾也参加并发言。还有诗歌、戏剧晚会。这个第一次小说会的消息传出去，到会的人十分踊跃，连一向与文学关系不大的社会名人陈铭枢，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九如也跑来出席，还有文学青年，一共七十多人，气氛相当热烈。

晚会由沙汀主持。简短几句开场白之后，是欧阳山做《抗战三年以来的小说》的长篇报告。这是鸟瞰式的总结，却颇有文学色彩，它按照小说塑造的各类人物，标示不同的写作倾向，所讲的每一段落前面，冠以“战斗的人”，“昏睡的人”的标题，显得很别致。

讲演引起了在座听众的兴趣，老舍、胡风即席发言，下面纷纷写纸条传到主席台上，提出各种发问。主席沙汀打开这些条子读给大家听，当场解释。有一张条子措辞尖锐，一下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大意是：乡下拉壮丁，闹得乌烟瘴气，作家们为什么不揭露？

他觉得全身被这张条子击中！是啊，壮丁的问题他早就留意了，这是国统区内随处可见的弊政。表面上有人人平等的兵役制度，但大街上军队在强拉壮丁。据说有的假称“送电报”把门赚开，或者假借招考学生骗取壮丁。在煎茶溪客店里遇到的那个“老坎”青年，显然也是为逃避不公正的抽丁跑出来的。记得这个青年说，仁寿一带乡村按户抽签不过装装样子，有钱有势的子弟照旧不服兵役，而“壮丁费”反摊派在无钱无势的人家头上。

他沉入到回忆当中。直到晚会开始了余兴节目，老舍操一口标准京腔，比划着手势，朗诵起《骆驼祥子》里的片断，才使他的心思回到会场上来。

晚上躺在“文协”的房间里，听以群在身旁发出轻微的鼻息，他失眠了。他在想如何表现这个兵役的主题。猛然，华裕农场那个陈农艺师的模样浮现出来。这是农场唯一的农业技术人员，合川人，高高胖胖，三十几岁，不像知识分子，脸黑得完全是个农民。一次，姓陈的忽然几天不知去向。后来“跑警报”，蹲在一起，问他哪里去了，他说：“家乡的侄儿被拉了壮丁，我回去一趟把他弄出来。”“怎么能弄得出来？”沙汀感觉到了兴趣。

“那还不容易。”技师笑笑道，“晚上集合起来排队，报数时叫那娃故意把数目报错，收壮丁的那家伙就说：‘这么瓜（粗笨的意思——笔者），还配打国仗？把衣服垮（扒）下来，捶二十军棍，滚！’这不就放出来啦！”

他当时不好仔细盘问买通这个收丁官员的细节，但是放丁的办法之简单易行，而又绝对巧妙，实在不能不让他吃惊。

现在，在听众条子的激发下，这个事件跑出来，像“魔杖”一样，点醒了故乡各种头面人物永远涨红了眼睛你争我夺的场面。他兴奋地从床上坐起。这篇小说有了！

这就产生了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平时你写作，往往是故事、环境都有了，独缺人物，等待着人物。这篇东西好像倒过来，一旦独特的故事形式跳出来，那么吵吵、方治国、陈新老爷就唱出了一台新戏。无论等待什么，小城镇的烂熟于心，它的生活方式、规律和气氛的准确无误的把握，是我成功的必备因素）

几天的时间，故乡的各种“土劣”按照一个有权势人家的壮丁被抓了，又被放掉的格局，一齐涌上脑际来表演。听来的故事就那么一点点，被摆在

小说的最后，用来点题。虚构的是几个人物争吵的过程，一次不可开交的吃讲茶场面。这一定是在一个乡镇的茶馆里进行！想象中那是安县的西南乡，桑枣、秀水一带的样子，叫它回龙镇。茶馆定名“其香居”，却是综合所见各种乡镇茶馆的情形的。每人有每人的与身份相称的茶座。尊贵的客人一进来，人人抢着喊“看茶”。闭起眼睛也想得起来那种氛围。

人物呢，安县林白清的侄子叫么吵吵。林做过团正，这个侄子的名被借用，性格并无一点相同处。陈新老爷本是界牌人，也是借用真实姓名，并且与软硬人联保主任搅在一起。俞视学好好先生想说和，说不好；陈新老爷来调解，也调解不拢；终于由吵到动手。正打得难解难分，消息传来，那么吵吵家的老二已经被新县长放了。他想到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一个隐形的真正市长躲在幕后，他笔下口口声声要整顿“役政”的新县长，也处理成始终没有出面，却又无处不在。故事波澜起伏，几张几弛，最后突然宣布一个结果，人们陡地“钦差大臣”式地僵成化石。不过他叙述的是中国的故事，表现基层权力社会的一次小波折：一个行之有效的“官官相护”的“规矩”突然被破坏，有钱人的“面子”突然互相撕碎，进入一个非常的时空。一场恶吵过去，才返回到原先的“规矩”所维持的“面子”中去。伟大的喜剧就此确立。《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得无论多快多成功，它不过是《淘金记》的预演。中国丑恶政治缩影的一次巨大的描写，千奇百怪的内斗，明的暗的，暴力的和文明的厮杀，就在他心里闹腾着要出台。写“争吵”后来成了沙汀的“绝活”，这个短篇就好像是大争斗中的一场小戏。记得去延安前，家乡一批土绅买了一架抽水机钻到城北山沟里，把一个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引诱进去。当时他就感叹抗战把某些人的私欲“*旺”。从前线回来后，发现这种初期的现象在广大的地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这才刺激他想把长期酝酿的这部作品一定要写出来。

可是，张家花园集体公寓式的热闹生活只适宜写急就章。他开始考虑把玉颀、孩子从文公场接出来，设法在重庆安一个家，创造一个写长篇的环境。玉颀自然同意。他向曾家岩汇报了这个想法，也得到支持。组织上为他在国际新闻社租了两间空房，从《新华日报》化龙桥分销处借来一些家具，窠窠便算筑成。

从《新华日报》把家具搬运过嘉陵江并不繁难。化龙桥对岸便是鹅项颈，一江之隔。范长江的国际新闻社和青年记者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一栋西式的两层楼门口。除楼上住了沙汀简单的一家人外，空余的房间里，还经常有待命去延安的人暂住，等候车辆。沙汀在育才学校谈妥的沙蒙、舒强，还有在上海便认识的一位女性王季愚，都曾成为他临时的好邻居。

国新社大部分是青年人。他们在他们的伙食团搭伙，参加他们的成立纪念会，认识了马耳（叶君健）、爱泼思坦。范长江与沈钧儒的女儿在学田湾结婚的消息，他是在生活书店校改送审通过的《老烟的故事》时，听胡绳讲起的，便赶去贺喜。但是，他与记者们的交往还是不多的，他把时间都给了《淘金记》。

这部长篇在脑子里已经有了雏型。他草拟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其中包括简要记录每一章的人物、事件，细节的安排。第一章他还从茶馆写起。他借用了仁寿附近的北斗镇，让林么长子林狗嘴踱进了涌泉居喝早茶，引出镇上各式各样的人物，引出新发现的金矿箕箕背，引出全书的三角矛盾……小说顺利地开了头。从其香居到涌泉居，一切顺理成章。刚过了1941年的

元旦，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开始还不知道。几天以后，周恩来的题词“千古沉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周亲自上街散发这一日报纸的消息，也在山城传开。《淘金记》写到第三章戛然而止。

原来每周只需周六进城去一次曾家岩，现在骤然增多。徐冰让沙汀召集可靠的熟人到曾家岩，听王梓木给大家讲述皖南事变双方的军事布署及发生战斗的情况，以便向各界朋友广泛宣传，打退政府的歪曲性报道。

这是一些令人揪心的日子。项英牺牲，叶挺被俘的消息传来，中央决定迎接更大的分裂。南方局贯彻“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周恩来、徐冰召集沙汀等讨论组织重庆大批进步文化人疏散。疏散的地点主要是延安、香港。欧阳山、草明早已决定去陕北。茅盾、以群将去香港。沙汀建议让杨骚去南洋，可以做那里侨胞的工作，得到组织的肯定。正巧，杨骚在神仙洞街任钧家作客，他便去找他谈话，一说便通。由此，杨骚只身赴新加坡。等到他们再次见面，已是在五十年代的北京了。

这一段时间不过半个多月，几乎天天进城开会。礼儿赶热闹，患了中耳炎。他每每领着儿子进城就诊，完毕，送回家，还要过江再去曾家岩。一次，就诊后时间已晚，只好带了孩子开会，把他安排在会议室的长椅子上。周恩来最先发现小杨礼已经睡去，吩咐警卫员去取毛毯给孩子盖上。散会后又派车让父子俩随冯乃超到文工会过夜。周恩来细心到无微不至，是别的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这样每日讨论别人的疏散计划，沙汀不能不考虑起自己来了。周扬经常托人给他带信问好，同时不放弃劝他重返延安的可能。重庆组织上似乎也有这个暗示。他冷静地剖析自己，审视自己的全部写作“库存”和发展前景，与玉颀交谈，也与心中跃跃欲出的人物交谈，觉得只有回乡才能加强、焕发自己的文学生命。到了1月底，疏散的问题大体就绪，一天向徐冰汇报后，徐问起他的打算，他便决然地说出想回安县的意思。

徐冰没有提出异议。反倒详细地问起他在故乡的社会关系，隐蔽下来从事写作的安全程度。当知道他舅父郑慕周的地位和开明态度后，就同意了他的计划。只是反对沙汀与地方党发生关系，主张把组织关系保留在南方局。徐冰说：“决定了就赶快动身吧！为了你们老不动身，恩来同志这一向觉都睡不好呵！”

临走前，徐冰突然阻拦道：“不跟恩来同志见见面就走啦？”

这当然是沙汀的心愿。不一会儿，周恩来迈着潇洒的快步走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听徐冰说了你的情况，我同意你的决定。回去以后要多加小心！”

沙汀看着一年来他的这个上级，英武的两条剑眉，事变以后由于日夜操劳显得消瘦的脸庞。临事好激动的他嗫嚅着，说出预先没有想到会说的话：“安家以来，我很少进城跑工作了……”

周恩来爽快地打断了他：“你住在乡下写东西，当然就少有时间进城了嘛！东西写得怎样了啊？”

他的手还被周恩来握在手里摇着，觉得越来越热了。

表现抗战条件下的乡土，他三年多积蓄下的一切绝不该付诸东流。他撤离重庆前，把冀中所写的日记、笔记，特别是一册记录几个军事将领谈话与印象的本子，留在了朋友手里。

后来不幸丢失了。这是否意味着沙汀已经懂得，纪实性地反映根据地和前方的报导散文，他已经写完（后写的《闯关》是小说）。所以，他留下原来视如生命的笔记本，以少有的勇敢采取了回乡的方式，去迎接一生只有一次的创作高潮。

这样一个瘦瘦小小的人，有勇气钻回故乡的山沟，一钻就是十年，而且相信这样荒僻贫瘠的土地有无穷的文学矿藏，连历史都感觉惊讶。他的抉择需要以后的时间来证明，他显示出一种成熟，一种远见。你能说他是碰巧成熟的吗？你描写地狱，却走入地狱。在中国最黑暗、最贫困的地方，你几乎被“活埋”，却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

这块乡土有我童年、青年时代如许的回忆，有我的父老兄弟，重要的是我能获得新的艺术创造力。

独创的丑世界：睢水刘家酱园的《淘金记》

他没有重返解放区，而是走向自己出生的土地。他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和得到代价。

离开重庆还是有些依依不舍。为了行动的安全，与许多朋友正式告别的愿望只好压抑住。他几次跑到两路口长途汽车站去打听成渝路车辆的“行情”。一天在那里猛然撞见随贺龙一路同行的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模。虽然终于摆脱了他，自己的神经却因此紧张起来。走常规的陆路已经没有安全感，他觉得带着妻儿上路是来不得半点冒险的。苦思苦索，想出一个兜圈子的计划（是不是从敌后游击战学来？）：沿长江上溯至叙府（宜宾）、嘉州（乐山），由嘉州经成都回安县。从小看惯了人们运用各种计谋，他对自己选定的路线很满意，只要上船时不被盯梢，路上就不会有意外。

他托付同住国际新闻社的舒强，帮买船票。1941年2月，冬天枯水季节，小汽轮只能通到泸州。临行的这日，舒强又送玉頔和孩子先行登船。沙汀找了这个机会绕到张家花园看朋友，故意捱到最后一刻。长期共事的以群不在。同梅林聊了一会儿，梅林拿出一张请帖给他，说张治中请吃饭。他漫声答应着，没露要走的声色。出来又到白象街《新蜀报》报社看望老舍。勒以、姚蓬子正在老舍屋里，大家谈起了沙汀发表不久的《老烟的故事》、《在其香居茶馆里》，认为是他最好的小说。他好容易忍住了想与朋友正式告别的冲动，默默地离开了。

在朝天门码头的汽轮上搜了半天，才在下仓的一个角落里找到玉頔和孩子。船上拥挤不堪。要防备被谁认出来，开船前绷紧了神经。水上警察检查他们一大堆行李的时候，其中一个家伙的脾胃实在好得没法说，他突然猛喊一声：“喝！还带武器？！”把沙汀惊住。随后自己先呵呵地开怀笑了，戳着礼儿手上的玩具手枪，逗弄得十分开心。

一家人到达出产曲酒的泸州，只在旅馆住了一夜，便搭上一艘装货的木船。坐在木船舱面上，继续航行至盛产糟蛋的叙府（宜宾），再转木船入岷江。这里水浅滩多，遇到险峻的河段，上行船的搭客要下来步行。临时的

船工便来兜揽拉船生意。我看眼前三五个瘦小的满身筋包的纤夫，把身子曲到头几乎点着沙滩的程度，向前一步步挣扎，沙汀想起了俄国画家列宾那幅著名的伏尔加纤夫的油画。

江边出现莽莽苍苍的乐山大佛，对岸的嘉州城仿佛尽收大佛的眼底。但是当时哪里有心思观赏风景呢，在旅馆里花了小费才让茶房买到第二日到成都的汽车票。在省城为了减少麻烦，干脆雇了两辆黄包车去安昌镇。一个多星期的水程，三四天的旱路，等远远看得到杨家碾母亲一手经营的房舍院落，沙汀夫妇被蜀道的艰难折磨得骨架都要散了。杨家碾的房子三面环水，与城关南门、西门隔岸相望，安谧、宽敞，处处可见母亲在世时留下的劳碌痕迹。

本来指望这里是静心静气完成《淘金记》的环境，但才住两天，已经被大哥一家困扰。杨印如（朝绶）的家现在是更其糟糕，他本人又一次当了鳏夫，靠典当家具，每日供他躺在烟床上吞云吐雾。不成器的子侄把家里任何一点东西都偷偷拿去变卖。这个家破败得像一床烂棉絮，连空气都是阴沉、死灭，无法忍受的。所以，几天后，他们就毅然搬出，玉颀领着孩子住进城内汶江小学，沙汀住在舅父家里。

仿佛时光倒转，又恢复了1928年与玉颀恋爱时两人“一墙之隔”的样子。当然，现在他可以大着胆子进出玉颀的房间。学校刚开学不久，她被聘为音乐教员，夹着教鞭、歌谱，已经在给小学生上课。沙汀闲着，天天出入学校的教员预备室，有机会便代上几节课，或者叫上几个朋友去街上坐茶馆。汶江小学是他帮着舅父筹办的，第一代的教师大都是他从省一师聘来。“元老”地位的马之祥仍是校董，这时的校长周光复，正是马在秀水教过的学生。不久继任的校长刘逊如从本校教员中提拔，他是汶小第一期毕业生。这些人无一不与沙汀熟悉。

比起1937年他在家乡短期逗留看到的小学教员的状况，现在是更坏了。物价飞涨，小小公务员的这点可怜的薪水维持不了一个家庭。就是这么一个职位也是朝不保夕。抗战在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教员们看不见胜利前景，也不敢运用他们的思想。因为就是这样一个小城镇，“气压”也很低很低，精神统治造成的苦闷，整个把这群县里的“文化人”染成灰色。

这里的一个特殊人物是马之祥。他的耿直、幽默，一如既往，甚至比青年时代更鲜明。

沙汀听人说，抗战前不久，因为县长刘垣培错召他去谈话，告辞时摆县官架子，他回校后即修书一封，责备县长唐突无礼，索要误课钟点费大洋两角。信中还有“阁下真古怪哉”之语。县长见信大怒，罗织罪名，将其拘押在看守所。公安局长出面逼他认错，他以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为依据反驳道：“县长无礼义廉耻，错误实多，我有何错？”

县长传话只要写一悔过书便放他，他拒不应。最后还是郑慕周出面，才使县长下了台阶。两个月后，刘县长在成都病死，马之祥撰了一幅挽联，在安县传布久远。其辞曰：“阁下真古怪哉！既错请周通，不思补过，反管押公治，故意示威，似君糊涂蛮横，人世应难长久住；衙中没太爷了！要忙煞宋江，趁势抓钱，看急死刘二，无题恋栈，尽你穷凶极恶，天公自有巧安排。”

（汶江小学一群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触动你写《困兽记》的最初动因吧？如果推得远一些，从第一次与他们在一起演剧，就开始酝酿了。

我的家乡挚友马之祥，便是牛祚的原型，一个善的风趣人物)

除了与小学教员交往，这一段的城关生活，使他结识了何薨仁，一个法国留学生，早年信仰安那其主义，是巴金的老友。何因为揭发国统区的时弊，开罪了人，辞职后避居到夫人的家乡来专心写一本农业著作，此时寄居在郑慕周家里。郑很敬重他，腾出上好的房子供他一家使用。他显然知道了沙汀的经历，见面就抨击当局，放言高论，两人很谈得拢。还有萧崇素，离开重庆《新蜀报》回乡，正在筹划办实业，准备开一个纸厂。萧和他的妹夫彭丰根医生住在一起，时常到汶小找沙汀闲谈。有时也去坐十字口的茶馆。说起时事，还像在报纸写社论一样，侃侃而谈。

这些从外面的世界跑回来的人，自成一个系统，根本不把县里掌权的新派人物放在眼里，很快就卷入当地新旧两派的斗争漩涡。魏道三自“四·一二”政变上台，坐稳了十几年安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交椅，升不上去也退不下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党棍，一向暗地里反对全县旧派的领袖郑慕周。郑没有很深的国民党背景，代表在野的士绅和袍哥的利益，与政府的关系就看县长是哪一位，总之是不即不离的。魏道三勾结县三青团负责人王宏泽(萧然)和新近从成都经过训练回县的本地人氏苟朝荣。苟小名牛娃，家住南街，沙汀看他长大，从小就又黑又壮，瞪起一双鼓鼓的大眼珠子。苟牛娃一来，在县党部门口添了一块新牌牌：“中央军校毕业生通讯联络处”。实际上是军统组织的公开称呼。魏、苟在暗地里散布流言，说沙汀是八路军派回来的。这种话由这两个人制造出来，算是党棍加特务的官方意见，自然十分险恶。只是碍于郑的力量，还不敢有所动作罢了。

魏道三庸碌无能，他老家桑枣乡的舵把子当面训斥他：“唱小旦也是人干的嘛，你咋一定要当这个大家都讨厌的差事呵？！”

他羞得满脸通红，结结巴巴连说“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时候”，露出一副低能相。除了“魏洋人”，他的另一个外号就叫“时候先生”。

沙汀回来后，一次县里欢送一批壮丁入伍，汶江小学师生在新音乐教员玉颀的排练下，居然在县公园召开的大会上，演出了全套冼星海的作品《生产大合唱》。萧崇素的夫人王映川(岚山因，兰英)还担任独唱，大获成功。妙在魏道三就在现场，他根本不懂这些歌的来历，也跟着沙汀他们鼓掌。这是一次大胆的举动，被轻松地蒙骗过去。不过，魏道三虽不精明，配合上面取缔“异党”，还是很卖力气。这样，沙汀住在舅父家不久，便碰上了周树前事件。

周树前入过共产党，到过延安，后因病返家。家里是秀水乡的大户，也是县镇知识界头面人物。他被魏道三逛进了城，住在十字口的尚友社。魏让他写承认是“异党”的悔过书。

周树前进退两难，晚上到郑慕周家来找沙汀讨主意。两人过去没有发生过横的关系，当时也不了解他已脱党，但彼此的背景是知道的。

沙汀说：“你真是笨嘛！他不要你走，你走你的好了，看哪个敢抓起你来？”

随后便把情况告诉了舅父。第二天清晨，郑踱到十字口陈记铺子里坐下，指鸡骂狗地大吼一通。这个十字口等于是安县的广播电台，更何况是郑这样有地位的人在高声叫骂，四周茶馆的茶客和路人都在谛听。郑骂道：“真会害人！周树前是个痨病框框，还把人家搞起来。要把人搞死啊！”

这一招真正有效。周的咯血，路人皆知。他当即雇起滑竿回了秀水，

魏没敢派人阻挡。

唱《生产大合唱》，放周树前，苟牛娃还都未及到任。这个小子比魏道三更坏得淌脓。

马之祥对魏的评语是“愚而好自用”，苟却是“脸厚、心黑、手段辣”。他人未到安县，便密告成都行辕，把原安昌镇镇长杨献之，在省城处决。告发内容是杨私贩武器。他显然想操镇长这个权柄。郑慕周看穿了他的诡计，与沙汀商量后，向县里提出汶小校长周光复当镇长的人选。周是国民党员，魏无话可说，于是当选。苟牛娃以后与郑慕周长期斗法，郑毕竟老辣，他治苟的手段是很巧妙的。

（苟朝荣苟牛娃，是个职业特务。苟盯我盯得很紧。后来他依靠魏道三当上县参议会的秘书。当时郑慕周、马之祥和汶江小学的几个人都警觉到，他承修参议会会场，一定会贪污。就找做生意的人说，他若果报假帐就让他报。他买材料，买一千报一千五，一千六。留下单据，把这些证据搞到手，然后通过县法团告他。尽管魏道三的党部为他说话，郑把证据一摊，就把他搞垮。他不仅做假帐，连建筑材料也搞鬼。用篾条编墙，抹上灰，画成砖的样子，报上一大笔砖款。结果砖瓦厂说没有卖砖给他，当众把墙一撞，假的。苟就被捕了。这个会场解放后改成大安游艺场。——沙汀1985年6月8日讲）

整倒苟牛娃，大约在睢水中心小学成立的时候，沙汀曾听到过郑慕周等人的谋划。这种新、老两派的斗争，执政的新派不能稳操胜券，因缺乏实力。老派假若联合县长，就如虎添翼。苟倒霉的时候，安县县长为任翱（振翱），此人留学日本，广有家产，为官比较清正，与旧派关系好。卸任时当地放鞭炮送他。接着来的是潘瑶青，无恶不作，杀人放火都讲钱，搜括一年坐鸡公车溜了。苟遇上潘上任，自然无罪释放。

周光复所以能当成长，因为县长是严树勋。据说严属政学系，过去与郑慕周的一个部下，现县农会会长、法团代表刘俊逸相友善，是个好好先生，外号严老婆子。他与郑应酬的时候，请沙汀有时间过去谈谈。这正是魏、苟流言四起的当儿。郑慕周、马之祥力劝沙汀去拜会严县长一次，以利抵制。总共在那间客厅里坐了十分钟，沙汀对谣言发了一通牢骚。严插话只问他在上海住了多久，何时离开，不着边际，也不了了之，真是老官僚应付世事的出色看家本领。

沙汀一直没把魏道三之流放在眼里，他的计划是在城关长住下去，没有料到更大的政治迫害会尾随而来。四五月间，安县来了一个神秘的军官杨穗。他的衣饰打扮在这个小城特别扎眼，沙汀作品里称为“真一身好披挂”：因为穿着马靴，小学教师们就干脆叫他“穿皮套裤”的，削去了一切的官衔以及名号，其实真也不必那么费事，反正一样：马靴、佩刀，县衙门里只有这样一个特殊人物，他的权力远在县长之上。据说佩刀是蒋介石送的，这增加了他的神秘。他来安县是成立特委会。表面上县长严老婆子是主任，他是副职，实际他是在成都行辕直接指挥下行事。

就是这个杨穗，按惯例也先来拜访郑慕周。谈话间，突然故做漫不经心状，顺便提起似的，说：“你外甥由重庆动身，是我们派人和他同车，一路把他送到绵阳的！”

送走了杨穗，郑慕周赶忙找来沙汀。也不听沙汀的解释说乘的是木船，根本也没到绵阳，杨穗的话纯粹是讹诈，便让他马上离城躲藏。并一再埋怨

说：“你不该回来，应该去延安的。现在千万到何家沟避避煞吧！”

拗不过舅父的脾气，他就一人躲到离城十里的乡下，何家沟谢象仪家来了。这里是山陵纵横的浅丘地带，当年跟着舅父跑滩来过。那时，郑慕周、谢象仪两人还都未做团、旅长，不像现在这般阔气。谢把这个侄辈安排在家里一列半西式的房子里，包括一个长两间的客厅，一间客房。客房的书橱放了一部二十四史，只摆摆样子，主人是无心读它的。

谢两鬓已有白发，精力还好。每天照常进城去坐“益园”。如果听围鼓，就深夜归家，谁也看不出他家里藏有什么不轨分子。如果回来得早，便会过来聊聊天。沙汀发现，这个叔辈的思想比前有了相当的变化。红军过四川的时候，他是惊弓之鸟，平生没有流过泪，可那一次逃亡到成都去以前，他哭了，哭他半辈子攒下的家业，要被共产党毁掉。可现在他经常讥笑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得温和，甚至还看《新华日报》。抗日战争把两个政党都向四川人拉近，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

不过，谢家子弟的情况还很复杂。与沙汀几次一同外出过的大儿子谢荣华，在上海搞过左翼戏剧运动。回县后居然加入了国民党，跟着一些人胡混。他在解放前夕参与了叛乱。谢荣华的二弟译名“聋子”的，是个糊涂虫。等到沙汀离开他家去睢水后，这个“聋子”在外面向人夸口说，别人找不到杨二哥，如果他领去准有办法。他父亲痛骂了他一顿，指着他鼻子说：“你要是敢碰一下你杨二哥，我就像卡饿虱子样把你整死！”

可是，舒适的“软禁”终究是软禁，他一点写作的欲念也提不起来。白天，谢象仪一走，他就长久地坐在客房纱窗下眺望远处的水田、溪沟、竹林，和来往于路上可疑或不可疑的活动。所幸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最小的孩子谢荣茂，一个初中毕业生，有钓鱼的天才。他领着沙汀很远地走到一个名叫石棺材的地方，在一个碾房的拦河堰上，把一种筷子粗细，两三尺长，钓丝仅有几寸光景的奇特钓具，从一个个装满石头的笼箅的眼里插进去。几分钟后，露在石缝外的钓竿就晃动了，一提，便是一条黄腊丁，或火烧鞭一类的无鳞鱼。这中学生管这微型工具叫“竿竿钓”，这是沙汀生平第一次所见。虽然他从小用渊毫、溜筒在河里捕鱼的经验并不缺乏，面对这个灵巧的发明，还是十分欣赏。他爱吃家乡的无鳞小鱼，照管“竿竿钓”之后（他最多能照看三竿），往往是他亲自下厨，把猎物做成下酒的佳肴。这能使他把烦恼暂且排开，忘掉自己是在避难。十六年后当他构思《摸鱼》的时候，这经验帮助他描绘河里的劳作，把青年农民扎堰摸鱼的技艺，摹写得真是活灵活现。

杨穗来安县，似乎就是为他的小说增添一个人物。他挎着佩刀，不久回成都去了。沙汀立时返回县城，以为这是他政治避难的结束。岂料临近暑假，汶小学生正要考试，一天午饭前，刘俊逸偷偷跑来报告，说成都行辕密令县府逮捕沙汀、萧崇素、王映川、周光复、周树前（述前）等人归案！很久以后，人们都弄不清成都的密令究竟是怎样泄露的。刘俊逸在郑慕周手下当过团长，魏、苟不会不防。杨穗的出场确实与沙汀有关。杨身在安县，采用的是敲山震虎之法，试探郑的保护伞究竟张开得有多大。一旦离县，捕人的命令立即下达。但他忽略了严老婆子，这个县长兼特委会主任，是完全可能把消息泄露给刘俊逸的。

事实上，在以后的一年里，省县的公文交驰往还，逮捕沙汀的命令一再传下，这时的县长已经是任翱（振翱），可沙汀就是抓不到。成都方面开始怀疑历届的县长是泄密者。有一件报告，是四川省政府视察室特派宁琦视

察员“前往安县调查该县县长任振翮将成都行辕电令逮捕奸伪分子沙汀、萧崇素、周光复等三人之秘密告诸地方士绅”，其中记述道：查缉捕杨只青一案，去年10月，严前县长亦曾奉电令，惟搁置未办。本年3月，任县长又奉“黄靖蜀”省审密寅文电严饬缉拿该杨只青一名解省，任县长亦置未遽办。迄5月初奉军委会委员长蒋支电，再行严令迅捕奸伪重要分子，除杨只青外，又加捕周述前、文尚甫（即尚青）、萧崇素、王兰英、周光复等，共为六名，同月10日，任县始饬第二区指导员唐开运查报该杨只青、周述前、文尚甫等三人行动；一面以私函呈张主席略称：“杨只青早离汶江小校他往，密捕未获；萧崇素及其妻王兰英与周光复平素并无不法行为，且系殷实富庶之家。考厥原因，实由地方派系争执，互相倾陷”等语。任翮后来正式呈复成都行辕，讲清了其中的利害：“该杨只青等六名，查无奸伪证据，且安县民性强悍，若遽逮捕，势必引起地方重大纠纷。”可笑的是，整个调查中，找不到县长们泄密的实据，只有推论：电令密码仅县党部持有，三人参与详看，而“魏书记长及苟委员对于此项秘密，无论从任何方面言，均绝无透漏于人，自招反感之理”，只剩下了县长可疑。这样，泄露自管泄露，没有证据自管没有证据，沙汀也就隐遁了。（用蒋介石名义发出的捕令，到了你家乡这样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也能用拖延、谎报等等办法消解掉。这就是你生长的这块现代割据之地的厉害啊！我是比较懂得这点才敢潜回的）

尽管如此，刘俊逸第一次传来捕令消息，郑慕周的反应还是比杨穗拜会那次要来得强烈。他当天不由分说，硬要沙汀动身远避。雇好黄包车，又派了家里当差的苏朝贵伴送。沙汀匆匆忙忙到汶江小学与玉颀见一面。临在小学校门外上车，当着送行的马之祥的面，还半开玩笑地望斜对面的县党部啐了一口。然后从西门出城，直奔睢水关而去。

睢水距安县城关六十里，中间经过他从小跟舅父生活过的桑枣、秀水两镇。偏偏这个更远些的睢水他不熟。这里是安县西部的边缘，与绵竹、茂县交界。它是大山区的门户，烟客出没的要冲，依山傍水，形势险要。

黄包车过了睢水河进场，在正街拐脚处一家大院门口停下。这是当地最大的袍哥、士绅袁寿山的住宅。袁寿山不久前从郑慕周那里知道了沙汀的处境，在城里当面拍胸脯打过保票，让到他家里避祸。郑紧急时想起了这个关系，才让沙汀去袁家的。沙汀还记得十几年前在一场本地两大派系的火并中，先是孙昌明杀了在郑慕周手下当过营长的唐盛安和唐的小弟混名唐五驼子的全家人，连同妇女、孩子。然后是郑慕周凭借自己的威望，呼吁西南乡一带的袍哥武装，齐心协力剿灭了孙。唐家的亲友、故旧纷纷逃亡到县里向郑求救时，沙汀还帮着接待过。这是过去轰动安县的大事件。孙昌明的覆灭，给别人制造了发达的机会，有一个人发了“家”难财，这便是唐五驼子的妻兄袁寿山。

袁寿山取代孙昌明重建了睢水的“秩序”。他掌握了乡场的一切权柄，后来又让外甥萧文虎当了乡长，自己则成为太上乡长。孙昌明的大院沦为他的私宅。沙汀此时来到的袁家，正是这所目睹本乡荣衰兴亡的房子。

袁寿山听说沙汀成了成都行辕通缉的对象，不免吃了一惊，但他还是殷勤招待，把客人让到最后一进院落。这样，把他安顿在一个三层的楼上。

沙汀整天关在这个房间里，绝对地不出街一步。这个三楼是全场的制高点，活像一个碉堡。从这里望出去，可以从袁家后门外的大河，直看到对岸的草滩和草滩上星星点点的石灰窑，以及更远的山峰。俯视睢水上游，不

远处有一座单孔的大拱桥，正式名称为太平桥，清嘉庆四年修造的，远近闻名。后来听人说，当地风俗，每年清明节，附近几十里内的乡民便纷纷携带年幼的孩子前来“踩桥”。八米宽的桥面，尽可以让人逗留、徘徊，随着心意，为孩子挑选干爸、干妈，认干亲。现在已是6月，桥上少见人影，只看到一条白晃晃的官路通过它向茂县方向延伸而去。

风景再好也禁不住天天看，加上天气渐渐炎热，木结构的楼房，没有抹灰棚，三楼到中午被太阳一晒，碉堡成了蒸笼。由于湿热，他全身生满疥疮，痛痒难熬，饭都吃不下。于是从十五里外的拱星乡请了一位姓王的郎中，偷偷到这个楼上为他治病。大约数次以后见了效力。这个擅贴药膏的乡村大夫就是1949年写的《医生》主人公的原型。身上的病治好了，但是寂寞难治。玉颀经常捎些东西来，却不能探他。袁寿山忙着收获他的“利益”。自从接纳了沙汀，他进城的次数大增，在郑慕周面前也比过去活跃。睢水一年的税收稳稳地归他一手承办，这该有多少脑筋需要动。这个胖子胳膊窝下夹两根竹筒（预防生痄子），在家门内外进进出出，与沙汀两人实在也没有多少话好说。真巧，这个家除了袁的大老婆、小老婆，一个又奸又诈的哑巴儿子以外，也和何家沟谢象仪家一样有个中学生，叫袁琳。绵阳高中毕业，接触过一点新思想，讨厌父亲的行为，与沙汀还谈得来。袁琳喜欢文学，熟识以后常从二楼跑上来与他谈看过的小说。这个袁寿山的长子后来成为家庭唯一的“叛逆”。

不久，沙汀与外界联系上了，叶以群写信来要稿子。沙汀在停笔半年之后，终于决定要用笔把这个禁锢他的世界，戳个窟窿，使自己能够稍稍透出一口气来。他没有马上续写《淘金记》，而是取了安县的见闻，接连写了《艺术干事》、《小城风波》两个短篇。

（我认为《艺术干事》是你最值得注意的小说之一。黑暗需要光明来衬托，有了这一对不谙世事的青年夫妇的“放浪形迹”，才显现出你家乡的全部封建文明。要注意的是一个外部世界对一个内部世界的震动力量。如果没有到过上海、延安，这个青年下级军官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冲突，就不会使我觉得如此尖锐）

这个宣传干事就在国民党安县驻军中供职，事件本身是前几年回秀水过年时听来，与小说很相似。人物是重新设计的。在一个落后保守的小县城里，在挟着饭钵两人打一份饭食吃的物质生活当中，这个心地单纯的青年人与他的妓女出身的妻子，用他们炽热的爱情，大胆的行为，向整个乡土社会的风俗挑战：挽着胳膊逛街、转田坝，黄昏时到公园山坡“卧游”，白天睡几小时的午觉，在河滩边打水仗，很响地接吻。沙汀对安县整个舆论的描写，市民的挤眉弄眼，洗衣服老妈子的大惊小怪，反衬出年轻夫妇的孤立无援和我行我素。他少有地写下这样的风景文字：黄昏来临了。一切都笼罩在莽苍苍的暮霭当中，但却透明而沉静。在落日的返照中，河坝显得白璞璞的，浅滩看来更加晶莹。布谷鸟尖锐的啼着，忽而又消失了。

所有的物象都似乎是多情而柔和的，便是那些木然不动的岩石也像有了感觉一样。河流的歌唱使人陷入忘我的境地。干事夫妇是简直被身外的和自我的幻景所融化了。他们偎依着，互相倾倒着他们对于生命的希冀，乃至忘掉了时间。

这肯定是这位以冷静刻画著称的小说家的一次生命直白。是什么使他对这两个不相干的青年掀动起如此饱满的感情？是对生命活力的由衷礼赞，

还是对自己出生的县城的死水一潭，缺乏现代生命力的深沉叹息？还是说，正因为自己回到故乡，一再地失去人身自由，现在又被“软禁”在这个蒸笼兼碉堡的楼上，所以，个人的遭际更激起他十倍百倍地向往那种毫无顾忌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形态，并在写作中忘情地渲泄了出来？

接着，基以同样的心态，他决定同剥夺他自由的人了一笔帐。《小城风波》以私立小学一群教师的视点为视点，写进了周树前事件（作品中改头换面的“小顾”）。关于皮套裤杨穗、魏洋人、苟朝荣（小说里的苟琳），统统以丑角进入作品，无一漏网。8月份正是“蒸笼”最热的时候，他受到中学生的善意照顾，从三楼搬到二楼住。写完这篇东西，寄给了卞之琳，他感到吐了一口恶气。让《淘金记》快点出世的创作冲动降临了。他开始考虑第四章以后的写作内容，设法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暑假过去，局面较平养。沙汀试着从后门走到河滩边去散步。冷场天街上人少，偶尔也到茶馆去坐坐，看看当地人的生活。

袁寿山出于各种打算，提议他把家安到睢水。逮捕令并未撤消，这个乡场他还要继续呆下去，安家未始不是一个办法，他同意了。第一步，让岳母黄敬之从仁寿文华学校卸职，到这里教书；第二步将玉颀从汶江小学接来与母亲共事。这样，安一个新家就名正言顺，不会引起什么人的怀疑。唐五驼子原来的私宅很宽大，但在那杨惨祸中被烧毁。两栋小洋楼焚为废墟，只余下高大的门楼和部分院墙。当地人还很难忘怀它昔日的荣华，又觉得他们全家人死于此，不吉利，一直废弃着。沙汀没有忌讳，他看中了这所院子的位置，它与袁寿山的住所（即孙昌明私宅）成一列，不同的是袁的前门开向场街，后门临河。唐五驼子的房子正相反，临街仅有一条窄巷相通，大门却面朝睢水河。河边一棵核桃树，高台阶，长门厅，显出当年比孙家更大的气派。整个院子的破落残败，是它最好的保护色，发生紧急的情况，也较易脱离。所以，由袁琳帮助设计，黄敬之出面雇请工匠，仅仅将门厅隔成五小间，沙汀夫妇住西边最里一间，一家人宽宽敞敞就此安顿下来。玉颀从县里带来一位陈嫂，她守寡后，因与婆家不和，便出来帮工。这个女佣在沙汀家里一连做了十几年，买菜、带孩子，直到解放以后。

现在等于有两个女人教书挣钱，三个女人操持家务，养活一个作家“政治避难”，并进行“地下”写作。大约从这时候开始，沙汀与外面的通信一律采用岳母的名目。睢水虽属安县，却与绵竹的邮路邻近，以群、艾芜、何其芳、巴金等人来信的名址都写成“绵竹睢水小学黄敬之收”。沙汀的复信有时也用“敬之”落款。长期的蛰居已成定局。

可是安家不久，正以为能够丢心落意写长篇了，突然有人向郑慕周密告说，县里一支武装将赶往睢水拘捕沙汀。郑赶忙派人报警，紧急中全家人都跟着撤离“新居”。虽然事后证明这支常备队是去秀水抓土匪的，只是一场虚惊，但由此，沙汀想到与家人住在一起的不妥。便与袁寿山、袁琳筹措，很快，他一个人搬到场上刘家酱园的后院住下，决心与狐鬼作伴，埋头写《淘金记》。

从“新居”跨过一堆废墟，经小巷，进睢水正街，走过袁寿山的前门，几分钟便可拐到刘家酱园。这个酱园是袁的亲戚刘煦之开的。房子很深，沿坡爬到山脚下的那间闹鬼的房子，也要好一会儿。沙汀不怕鬼，他要描写的整个就是鬼世界。休息的时候可以听居停主人唠叨，还可以在房下天井里坐在一块卧牛石上看花台，或从后门走上通向茂县的小路散步。

月下人稀，愿意回家走一趟也极方便。他对这个环境很满意，整日关在房子里，与白酱丹、林么长子这些小说人物打交道。长篇异常顺当地按照提纲在他面前展开。

我是动用了全部生活存储：从童年直到构思期间的见闻，来经营《淘金记》的。最初引起他写作的人物彭丰根是极富传奇性的。他在上海行医，沙汀领周扬去看过病。为杨礼治过痢疾。张爱萍在苏区受枪伤，也是他治好的。他们都是达县人。他掩护、接济过许多地下党员。他生性开朗，沙汀他们去看病，不但不交费，还可以开他抽屉：“嗨！有钱没有？有钱拿出来炖牛肉，进馆子！”这样一个人疏散到安县，也会动起脑筋去挖金子，是沙汀完全没有料到的。他挖金失败后，常抱着小女儿九九在街上闲荡，变成个“浪漫派”。沙汀的哥哥按照自己对日本浪人的理解，给起了个绰号叫“彭浪人”，居然叫开。但是具体到安排人物、结构故事，沙汀把他舍弃了。关于金厂工人的生活，原计划多处插写，后来也舍弃了。

他把故事集中到没落乡绅、失势恶棍争夺富孀祖茔笏箕背金矿的殊死角斗上面，暗示这是中国抗战后方最黑暗的缩影。他熟悉乡镇茶馆、赌场、烟馆、戒烟所、保甲、地主内宅等各种知识和黑幕，调集起从小就熟悉的安县人物来选“丑”，赶他们到一个舞台上表演，在表演中添加油彩，进行再塑造。

他的人物差不多都有原型。他知道得太多太熟，他不需要特别的想象，主要凭借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从生活中的“选择”。精妙的选择力，是他创作成功的秘密，他的才华一部分表现于此。

彭胖这个二排人物，与原型的外貌、气质、习性，基本差不多。原型是秀水的富商杨森亭。他当然没有与人联合采金的经历，但他每天凌晨必去肉市，搜买猪牙巴骨，拿来炖汤；事情难办，就把责任往作不得任何主的兄弟身上一推；喜欢刮脸，而一刮脸就打瞌睡，他的瞌睡之方便就象揣在荷包里一样：这些细节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

龙哥这个联保主任在北斗镇执着生杀大权。这种人他看得多了，一般是由仆从的地位直线升迁上来的。他的原型是桑枣的龙佐卿，他的粗鲁性格，只需选出几个动作，比如不择好坏地喜欢吃喝；有了绅士地位，却仍然敞开外衣的领扣，只在拜见县长时才扣起，一出衙门就哎哟一声，又如释重负地把领扣打开了。在安县，不愿扣齐钮扣的绅士好象特别多。

龙哥过去的靠山叶二爸的原型，是沙汀跟随舅父跑滩时就认识的秀水大舵把子兼团正曹和斋。一写到他，就想起当地流传很广的一件趣闻，曹扶乩时，仙家为了讨好他，让沙盘上划出这样的字：“众弟子跪下，曹二爸请起”。这个细节，沙汀把它还原给叶二爸。类似的人物很多，季熨斗、芥菜公爷、戴矮子、丘娃子、丁酒罐罐、烂钟魁，像一个故乡人物大展览。

更重要的主角都是在原型基础上改造、搭配，抓住他们的性格核心虚构而成的。白酱丹和林么长子的原型都是沙汀家族里的没落人物。他把他们演变成小说里的主角，主要就取了那个绰号，以及这个绰号里包含的性格内蕴。这是人民语言中的丰厚积淀，表明他小说的民间文化冲积层次。么长子——一个奸钻刁滑、耍赖泼皮的代号。白酱丹——一个到处使坏，下烂药，施行层出不穷的诡计的象征。

白酱丹原型是沙汀二爷的四儿子，他称四叔。此人是一个风水先生。他抓住了那个性格之环，建构了白酱丹的整部性格史：他完全破落，家里经

常等米下锅，但自视极高。那副行头：猫皮土耳其帽，花缎背心钮扣上吊着的银质牙签，红铜衬底，白铜镂花的响水烟袋，是永远不作兴垮下的。他家产早就荡尽，只余下唯一的资产——他的永不衰竭的脑筋，计谋。

为了争夺金矿，他绝不象林么长子咬住一句何人种似是而非的话，就硬撞硬干。他利用这个少爷人性上的弱点钓其上钩，利用彭胖的贪利，及龙哥与林么长子、何寡母的利害矛盾，把镇上的当权派组织起来为我所用。利用丘娃子的家族关系来鼓捣生事，压迫何家。他甚至还会借战时的政策，法律之名，推销他的奸计。

有一个插叙，道穿了中国的白酱丹式政治的实质：七七事变那年，根据通令，在这国难期间，任何年节都该停止一切娱乐。当时大家的热情还高。城里国民党党部的委员们还各场分头宣传，希望大家不要铺张。但龙哥照旧固执己见，非要玩玩狮子、龙灯不可。使事情获得合理解决的是白酱丹。他提议龙灯可以不玩，倘若把狮子改成麒麟，笑头玩一个象征太阳的元宝，这就没问题了。这是一个旧瓶子装新酒的办法。因为“麒麟张口吞太阳”这句话谁都知道，而这么一来，就不再是娱乐，而是宣传抗战的好东西了。龙哥、彭胖们怎么能离得开白酱丹们呢？这个沙汀全部作品中最有份量的人物，是中国现代专制社会里权力和智谋脱节的产儿。当暴力决定一切的时候，最高的统治权力落在—群凶残、愚昧的屠夫手里。因为只有他们是虎豹，不仅能施虐于羔羊，而且会驾驭得住豺狼。那么，策士、狗头军师、“箍桶匠”，就绝对的需要了。白酱丹便是这种社会所依赖的邪恶的“智囊”！

何寡母是个地道的旧式富孀。如果没有对从小在母亲身边组成的安县遗孀群的熟悉程度，他是无论如何把握不住这样复杂的人物性格、心理的。塑造她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综合，调和了多种颜料：有在城关居住的陈三太太，诨名“朱瞎子”的寡妇；桑枣姓何的能干女人，曾从距城五十里擂鼓坪搬到沙汀家里避匪的房客张太太等各种人的成分，但又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原型。

刘家酱园后院没有任何干扰，长篇进展迅速。沙汀的思维偏于迂缓深沉。习惯于把一部东西长时间搁在心里，但是如果酝酿得成熟了，他对它动了感情，厚积而薄发，也可以下笔千言。关于写《淘金记》的情形，他写信告诉过以群：我每一下笔，总要两三千字才肯罢手，有时我一天写过六七千字。这在旁人也许值不得说，但在我，要是你在面前，我可要强迫你打点老酒来庆祝我了。得意之色不免溢于言表。

即便这样，他的写作习惯也阻碍他很快完成他的第一部长篇。他想起矛盾几次和他谈过的结构大容量作品的经验。掌握人物虽是第一位，还要能控制得住故事的起承转合，使人物出场有序，丝丝入扣，波澜迭起。他爱好修改。几次毛毛糙糙地把作品交出去使他十分反悔，所以，现在每一章写完都要修改，几章联成一个段落，他又要拉通看一遍。

改东西成了癖，和他思索的质地、习惯有关。他总觉得脑中浮现的第一次语言，不一定是他的最佳成品。而第二思考、第三思考，才会使妙语连珠。比较起来，《淘金记》反复修改的次数还不算多，但文字的精当和精采，可以想象他在推敲上为了寻求那个“最佳”，如何绞尽脑汁，一个人在供神的堂屋里度过多少个日日夜夜了。

（《淘金记》是你的高峰，你的创作观念，文体的成就，都可以由此作一总结。也包括我的局限。我的笔太实，虚笔太少，严谨不免单调。你说呢？

读多了或许觉得你定型了，但深厚、结结实实。读你的作品要细细咀嚼，它经得起读）

改完了《淘金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字，是1942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他放下稿子，像卸下一副重担，迈出后门爬上了玉洞山。睢水关静静躺卧在脚下，展开它的肢体，在一山与水之间。能看到自家的高门楼院落升起的清烟。玉頔和孩子们是不是起来了呢？街上的茶馆该坐上喝早茶的市民了吧。这里也有它的涌泉居和畅和轩，茶馆内外充满机趣的方言俚语，带着自足、自信的铿锵高音，雕刻刀一般犀利和能使被表现的事物骤然凸起。但是这个他最亲近的社会是如何恶浊啊！

他走入山上的小树林，好像更珍惜这里的新鲜空气，深深地吸了几口，返身再望着下面的乡场。这也是一个小社会，和北斗镇一样的社会。这里每日每时发生的采金，贩烟，转运乌药、碱巴，买卖壮丁，乱派公债，囤积居奇的内幕，他都知晓，都写进了书里。《淘金记》集中暴露国统区到处存在的黑暗。它最后引出吴监和政府的法令，穿插孔祥熙老婆周身扎金条走私的笑话，政治的抨击性不能说不强。但是，它又是沙汀乡土小说的最高成果。

作为一本乡土小说，《淘金记》出色地描述了中国的内地文化。经由一种“根”的文化探索途径，与千年的传统社会对接，挖掘出中国的封闭、专制、愚昧、惰力。就像可以从残存的原始部落研究人类的“过去”一样，从川西北乡土这个更多属于“过去”、又纠缠于“今天”的文化区域，能窥探到中国老是背负着“历史”的重载，被拖向落后的触目惊心的现实。中国人的智慧，不是用在使利益更加扩大上面，而是大部分消耗在争夺那一点点可怜利益的殊死内斗上面。《淘金记》唇枪舌战的对话是他倾注心力写出的，但这多么可悲。他想，人们“把他们互相间的仇恨悄悄地暗藏在那些原来无关大体的话语中间，就如猎夫们的设置刀弩一样”。这是智慧的浪费，智慧的虚假的过剩。“中华民国的事情，哪一件过得硬啊”。开发后方，抗战建国，开矿，戒烟，一切好办法最后只能使弱者遭灾，在强者手里演变为阴谋。这就是利用权势占据私欲的社会，只能走向没落、腐朽的道理。不根本改变人与人之间这种依赖实力的联结，任何现代化的先进的东西进入中国，“白酱丹”这味药一弹，你的事就算烂了！

沙汀想到自己精心刻画的人物，和他的绰号所包藏的意味，深沉地笑了。安县十三个半场，每日每时还在产生丑恶，他从小见惯不惊。这场丑戏的主角都在他身边，很多是他的亲友，有的现在还在“保护”他的生命安全，虽然他们“保护”他的动机大半还是为了私欲。这是一个矛盾。他能怎样对待他们呢？他用不着感情冲动地呵斥他们。他看见过根据地人和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他当时真诚相信，这是最美好的前景。心的空间被拓展，有了余裕。他也想起上海初期潜心读过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以及赫尔岑对这本名著说过的出色的话，意思是：反对农奴制度，可以像屠氏那样不过甚其辞，也不必驱遣着力过猛的语句，只需优美的文体，平心静气的叙述。这也是沙汀不懈的美学追求。此时，他面对山下的睢水场，站在玉洞山上，觉得充实。远眺苍青肃穆的巨大山岭，他的心颤抖起来，真切感到家乡的山将同他的生命合成一体。

返照自身：苦竹庵——刘家沟的《困兽记》

写完了《淘金记》，他公开在睢水露面，过了一段通常镇民的生活。农村从来有朴素的重师的风气，这个家里居然有两位，而且都是女性。为了相区别，黄敬之被称为“老老师”。“老老师”能写善画，学生的母亲和街上的妇女不断来求她画帐帘、枕套、鞋面。做为回报，凡有外乡人经过睢水，她们都急忙向这个家庭通声气，让他们有个防备。沙汀现在经常到大拱桥、河对岸的荒原去散步、钓鱼，也去坐茶馆，与各种小贩、商人、烟帮和袍哥交往。这是保证安全所必需的。大家清楚他是郑慕周的外甥，袁寿山的显客，来“抹豪避相”的，除了官府，与当地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所以，无论是清水、浑水的袍哥，或者有头有脸的士绅，都对他以礼相待。他也到旅店、烟馆这些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去应酬，亲眼看这些人的嫖赌嚼摇。有时还要躺在烟榻上靠靠盘子，或凑热闹似地去看新来的“货儿子”（妓女）。他后来有一篇出名的小说写流娼，部分得之于这时期的经验。他从睢水街上走过，两边厢会向他投来五花八门的称呼，叫杨先生、杨老师的，叫杨哥、杨二哥的，甚至有叫杨大爷的。他都一律漫应之。后来传到重庆文艺界，有人说他操了袍哥了。

但仅仅逛市街，而不深入认识袁寿山，还不能算懂得睢水社会。

袁寿山是这里的一霸。他搜刮每一分能到手的钱，然后攒起来买田、做生意。平时家里的吃食花费，全靠别人无偿供应。吃肉，只消喊人去招呼一声，要多少，就割多少。打酱油、醋就到刘家酱园，只说声记帐。刘煦之对沙汀诉苦说：“算了，可惜我的纸了，懒得记！”袁规定场上卖菜的要一律摆在他公馆门口，他好抽头。各样的菜尽挑好的拿，一家人吃的全有了。最有趣的是他连媳妇的油都要揩。过端午节有人送了白糖，他却要吃媳妇坐月子的黄糖。媳妇不肯，他在堂屋，媳妇在厢房，他就喊：“我向你借一点，二天买来还你，好不好？”可是谁相信他会拿钱买糖？他坐滑竿不掏钱，办法很“损”，从不把滑竿停在家门口，一进场看哪个茶馆的茶客面前放一墩铜元，下来抓一把就把轿夫打发了。这叫“搬墩子”。

他把沙汀的岳母、妻子都请来教书，马上张罗扩建中心校，以公事的名义，上山随便捞木料，然后就叫一个脖子上长包的“刘包包”去转卖。盖校舍的经费筹集得不少，工匠的工钱一文不付。来要钱的人把他包围紧了，就带着上赌场，看他摇“红宝”。赢了，每人还一点。输了，当场就骂：“狗日的，你们没有看见？老子输个精光，还有个钱！”（像袁寿山这种流氓式地积累财富的方式，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有什么奇怪？他背后是无法无天的权势。依我看，只要叫封建专制性的掠夺，都是这个样子，袁不过做得格外粗鲁、狰狞些罢了！）这样一个混世魔王统治的家庭内部，充满了冷酷无情。大老婆烧烟，从袁那里要不到钱，就家里屋外地偷。沙汀刚安家没几天，大老婆提了一对水桶，从她家后门拎过来，对沙汀说：“你们刚来，我卖挑桶给你。”后来知道这是从家里偷出来的。袁寿山末了拿脚镣把她整日锁在屋里，情景很惨。

袁唯一的女儿也染上鸦片烟瘾。嫁到沸水乡，婆家管得严，她就溜到烟馆陪人抽。后来跟一个人跑了。袁寿山闻讯，认为败坏了他的家风，派人

到广兴场弄回来，半路上活活打死。事后袁竟得意地对沙汀说：“我干掉她，是先跟祖宗请了香的！”

沙汀听得毛骨悚然。

袁寿山的丑事做得太多，心里不能不发虚。《淘金记》发表以后，袁听说沙汀把桑枣的龙佐卿写成龙哥，担心自己有一天也被写进书里，曾把这个意思经女婿向他透露过。他当然是笑着否认的。他要靠袁掩护他，当时正在写《淘金记》系列的短篇《模范县长》、《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三斗小麦》。袁的所作所为帮助他认识社会，这就足够了。《模范县长》写粮政。国民党政府禁止私人随意贩运粮食出境，原为了对付粮食囤积。却演变为县长公开买卖运粮证渔利。这是《淘金记》主题的延长。邻县有这么一个县长陈金声，安县花菱乡出身，就是这样干的。《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写文化投机，一个《淘金记》的变体。沙汀青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刘巨川，其伯父在郑慕周手下当过团长。刘在成都读完华西大学协和中学，抗战回家做生意，操袍哥。刘巨川完全变了，借口捐给国家做武器，把附近庙宇的钟磬统统收走，偷卖给造币厂。还有本县的钟表匠梁温如搞实业，真的弄来过一部破电影机在黄土乡放映，结果不成功。小说把两个人、两件事合起来，构成畸型可笑的发国难财的故事。

这些小说中表演的都是袁寿山的同类，实际上袁的形象已经间接地进入他的小说王国。

解放后，他多次产生替他直接画像的欲望，连题目都拟好了，叫《流氓皇帝》，但终未写成。经过一个很长的曲折过程，才让他在《红石滩》粉墨登场。袁寿山注定逃不掉被沙汀讽刺的命运。

沙汀的世界分成了几重。袁寿山世界的外面包围着贺龙、白求恩的世界，最深的是自身的内心世界。也奇怪，匆匆见过几面的白求恩老头会让他如此怀念。国际主义者的稀有性格，化成了新世界的耀目光芒。1942年的夏日，他常到袁寿山一纸厂附近的草场上散步。这使他禁不住想起广阔的河北平原，以及在平原上策马驰骋的岁月。慢慢的，一个描写敌后的题材在心中升起，那是关于根据地的人和外面去的人的故事，较多地融进自己的心境（不能描写自己，也是他的一个局限）。故事呢，就采用两次过平汉路的那一段经历。

正待动笔，中秋节前，郑慕周派人送来消息，任翹突然拘捕了萧崇素，让他马上往山里转移。萧的被拘，是任翹对上面一再加压故作的一个姿态。当夜萧崇素的妹夫彭丰根医生就施展法力，说动了拘留室的看守，与萧逃往萧的老家永安乡。警丁保护犯人一同逃跑之后并未引起什么纠纷，因为彭的作法先已得了任翹、警察局长的默许，他们三人原是邻水县的老乡。但是当时不知底里，沙汀得到“情报”，用籐包装了几本小学生用的土纸作文簿，一个瓦墨盘，几支毛笔和漱口用具，一个人提了躲到苦竹庵去。

苦竹庵位于睢水关以南五里，并不远，却更为荒僻。从睢水小学后面的场口走上一段叫做牛市河坝的高坎，拐入小路，沿着丘陵的边沿绕进去，便到了本地地主兼保长的萧业贵的四合院。这座院子在牯牛背山脚下，后面是一片柏树林莽，很易躲藏。萧业贵是睢水乡长萧文虎的堂兄，有四五十亩地，雇一名叫邱驼子的长工，自种一小部分，还有几户佃农。

比起睢水那一对统治者来，萧业贵是个老实的主儿，为人较厚道。他对外面人说“杨先生”是他请来教儿子萧鸿发书的。沙汀为了谢主人的照拂，

也真的抽些时间，教这个八九岁的孩子认字，背九九表。这个家只一妻、一子、一母，还有个未结婚的兄弟和母亲同住同吃。主人殷勤地要他住进宽大的堂屋，使用吃饭的方桌，都被他婉辞了。他要的是安静，选择了正屋边上存放粮食农具的横屋，在拌桶上搭块木板做书桌，坐在矮凳上，几天就沉入创作境界，写起了《过关》。仿佛是找了一个写作的“别墅”。

杨先生选择我家一间能从窗子探看龙门，又通后门的屋子。屋里只一架木床，一张简易书桌，每晚在油灯下看书、写作，很少说话。他穿深灰色长衫，戴棕黄色毡窝子帽，圆口布鞋，便是当时教书先生模样。开始买了砂锅用柴熬稀饭吃，以后为节省时间，便在我家搭伙。他饭后在院里边抽烟边散步，十多分钟后再回屋读书、写作，很少到院子外面去。有时晚饭后戴顶破旧草帽，到院边田坝与农民摆谈。尤其爱跟逃难的人摆，问人家从哪儿来，为什么逃难。对他的究根问底，感到奇怪。消息紧张，便从后门跑到牯牛背山脚树林里。平静时傍晚摸回睢水街自己家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头戴草帽，拄根竹棍又赶回。

9月和10月，连续写《过关》，一支迂回通过封锁线的队伍的故事。左嘉这个人物显示他对战争中知识者的认识，也是少有的对自身的思考：敏感，清醒，在生死考验前矜持和自卑混合的心理。为了维护自尊往往不计利害。这是按照何其芳和自己的面目综合塑造的。

左嘉戴着其芳的钢丝框架的眼镜，有写诗的经历，圆脸也是黑胖胖的，但骑的却是沙汀那匹青马，有六岁的男孩子。左嘉怕“强迫通过”，主张脱下军服化装成老百姓零散过铁路线，不单在作品中受到队长余明的嘲笑，在实际生活里，这正是沙汀提出过的设想，当即受到其芳的嘲笑的。左嘉更多的是沙汀对自身的解剖，是个思想形象。令人吃惊地是他确实不善于刻画自我的性格。他把知识分子也能具有的品格，“克己”地移到工农干部余明名下。在描写两者的冲突时，以个人的体验接受了解放区流行的向工农群众学习的模式。但他是真诚地写出这些的。（为了这部小说中工农干部的原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这个工农干部的手膀子断了，很容易使人想到党内有名的三位独臂将军：彭绍辉、贺炳炎——我在《记贺龙》里多欢写过他——余秋里。他们认为我写的是余秋里，因为人物也姓余。这三位我全认识。去岚县时，余秋里是领队。在冀中遇见贺炳炎。从冀中回延安路上认识彭绍辉。余认识最早，对写这个干部形象的影响最大。总的说，还是综合写成的，包含许多一二师骁将们的品格和思想风貌。——沙汀1986年11月25日讲）

到了10月上旬，他完成了这个中篇。然后把爬满蝇头小楷的几本作文簿捎回睢水，让玉颀帮着抄写一遍。15日他写下题记，在最后一段写上：作者谨将此书献呈白求恩医生（Dr·Norman Bethune）之灵，为了他那伟大的怀抱，和他的工作热忱所曾贻给我的永远难忘的感动。

稿子寄给以群，它的发表比《淘金记》坎坷。开始送审顺利，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创刊号准备全文一次发表。他已经希望用这笔稿费来过1943年的春节了。不料以群来信说，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刊物发排后又调《过关》复审，结果被扣，理由是“为异党张目”！这个批件1944年在重庆群益出版社，屈楚拿给他看过。陈翔鹤在成都听说此事，透露给一个美国记者。据说这个记者大为不平，准备将《过关》译成英文到国外出版。玉颀于是又辛辛苦苦按原稿抄了另一份寄陈翔鹤。但此后连陈也不知译稿在美国的下

落。还是以群想方设法把扣留的原稿索回了，先改名《疑虑》等发表了几个断片，1944年改名为《奇异的旅程》出单行本。1945年才定名《闯关》。是他的书名改得最多的一部多灾多难的作品。

他的艺术注意力一时转向了自身。恰巧寄出《过关》不久，1942年秋冬之交，发生了妻兄黄章甫的风流事件。对他正在酝酿的知识分子长篇发生强烈的冲击。

黄章甫一直在秀水任小学教员。抗战后因演话剧，与本地阔少吕松禄的姨太太结识，相好，两人打得火热，终于被发觉了。黄已有三子一女，于是抛下不顾，与这个女人离家出奔，从此杳无音讯。这件事在当地闹得满城风雨。沙汀一家作为这件男女韵事的承受者，也不得安宁。

黄章甫妻子过后又扔下一男一女，跟人出走。这个男孩叫黄国权。女孩小名么胖。此地风俗，嫁女时送亲要吃胖头鱼，常用这个“胖”字来称呼女娃。加上原在黄家帮带孩子的王妈，一股脑都搬到了孀孀这里，使沙汀家迅速膨胀到九口人。亏得两个孤苦的劳动妇女陈嫂和王妈，在困难中把孩子们一个一个地领大。不仅不要工钱，还设法将唐五驼子遗下的废院开出来种菜、喂猪。她们对生活的坚韧态度，后来都被沙汀写入小说。

真是因祸可以得福。如果没有黄章甫的婚变，他的第二个长篇绝对不是现在的样子。黄章甫的事件格外给了他拷问知识分子和自身灵魂的机会。在一种灵感的启发下，一下子获得了《困兽记》的整个概念！

大约从前线回来，他就想写一部故乡小学教师的作品。因为他吃惊地发现，他们大部分已消褪了抗战初期蓬勃活跃的精神，在长期抗战、物价高涨的生活重压下，变得消沉了。比起一年前，他与他们共同拥有的那段演剧生活来，简直不能相信曾有过那样生命炽热的岁月。

记得1938年，马之祥们组织起安县小学教师抗日宣传工作团，自费排练过《张家口》、《罗店》、《前夜》、《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剧，到县内各场镇巡回演出。业余演员带着道具跋山涉水，吃大锅饭，睡学生课桌，工作得热情洋溢。沙汀回乡，更是热心这种演剧活动。他客串演过老头子等各种配角。有一次缺个女配角，他说“我来”，男扮女妆上台。他提议把宣传工作团改名为“安县国防剧社”。自己说，“我闹演剧，闹得最凶”。在秀水演一出《慈父》，训子抗战，饰父亲的马之祥一时动了感情，真的动手打了饰儿子的周光复的耳光，后来大家谈起来还止不住地笑。

这个剧团里，便有沙汀的舅子黄章甫，和那位吕松禄太太。特别是扮演女主角，在这个偏僻的县份，极不易得。吕太太在公爷丈夫玩闹心情的支持下，居然能够抛头露面，在县内是一桩轰动的新闻，给演剧也招来不少看客。

五年过去了。沙汀再回到故乡，看到的是这些“戏剧家”们的厌倦、困顿。也有人提议再来“热闹”一次，情况却分明大变。演员凑不成局，县党部一要求备案，便告流产。促成他写了一篇《没有演出的戏》。

这是一个简单的排练受挫的题材。重要的是《困兽记》的人物在这里已基本完备：导演章桐，就是徐雁。田涛，这里叫兜腮胡，外形、脾气与黄章甫接近，但还没有名字，显出他的地位尚低。唯有吴楣，这个采自吕太太的人物，在两部小说里同名。她的丈夫耍公爷在长篇升为重要配角，绰号豆渣公爷。牛祚，便是黄裳，还没有宣布自己的生活哲学，但稳健和冷峻幽默，已酷似马之祥。这篇《没有演出的戏》刚刚写定，其中两个人物的戏在实生

活中突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沙汀的想象被大大搅动。一个新的婚变结构楔入原先的演剧故事，人物重心发生位移，田涛、吴楣，加上三角关系必须有的田涛妻子孟瑜，占据了小说的中心位置，《困兽记》的雏型很快凸起。他久久地考虑这个新的长篇构思，把黄章甫事件与演剧事件交叉对接，使原先的故事不可逆转地得到改造、变形。

（这是个大变动。单写演剧失败，主要归于政治环境的压迫；现在有了婚变悲剧，笔力自然转向知识分子自身。我写这个长篇，起源于知识者的苦闷，现在一切又还原为苦闷）

黄章甫妻子本姓张，是沙汀的表侄女。在汶江小学读书时与黄恋爱。张家竭力反对这门亲事，终未能阻止住。根据她写成的孟瑜，就保留了这段反抗家庭的爱情史。但孟瑜不可能在发现田涛、吴楣的私情后，扔下家庭去追求自我幸福。沙汀给她追加了自我牺牲之后又不断自怨自怜的性格特征。在主要是来自内部的道德重压下，完成她逃不出灰色生活的结局。

吴楣和公爷田畴的关系，与实际生活更不同了。这个公爷在安县极其有名。出身大家，三房守他一根独苗。他嫖光赌光了自己一房的产业后，继嗣了另一房的，又照样嫖赌精光。

然后再继嗣一房，再折腾，接了无数个小老婆，败光了整整三份家产。到土改评成份时成了中农！与黄章甫演剧私奔的这个老婆，绰号叫“沈二总统”，成都名妓。妓女选“花”，她姐姐是“总统”，她是“二总统”。被公爷花了许多钱买来。“二总统”性的要求强烈，淘虚身子的中年丈夫满足不了她，便与黄发生了暧昧关系。《困兽记》把演剧和两性纠葛都处理成知识分子的苦闷现象，原来普普通通的一件男女风流案进入这个结构，就演变成了宣传抗战受阻后，因不能控制感情而使三个主人公统统发生精神危机，自毁又毁人的重大情节。无爱的婚姻是个陷阱，有爱的家庭和恋爱（吴楣、田涛没有发生肉体关系）也会成为牢笼。吴楣成了柔弱的令人同情的女性。为了她，沙汀引进了独立的心理描写的文字。

酝酿《困兽记》是在睢水家里。他从苦竹庵回来，把自己住屋的西墙开了个洞，用一张孙中山像挡住，预备不测。透过洞上方的一扇牛肋巴窗，就着亮光，他在纸上勾画着长篇的提纲。

修了几年的睢水中心小学新校舍落成，郑慕周领了县里许多人来祝贺。周光复、刘逊如也同行。沙汀暗地告诉舅舅袁寿山盖学校的黑幕，劝他不要为了他们在睢水替袁张扬。一天下午，岳母来告，河清乡的区长唐某来致贺，叫他倒锁房门不要露面。隔了一会儿，袁寿山在外叫门，来借凳椅，放在沙汀家门外河坝边上，陪区长喝茶。唐某问起沙汀，袁推说人不在，妻子、丈母在这教书、坐家，算是骗过了。

这时，山外的政局突然紧张。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三届全国参议会通过反共决议，董必武参议员当场退席。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报纸上充斥着要求解散共产党的各式通电。波浪冲击到安县，郑慕周主张他转移到茂县，袁寿山提议躲到他的一名“斗伴”刘荣山的家里去。1943年2月，离除夕还有一个星期，刘荣山领沙汀前去刘家沟。拂晓前，鸡还没叫头遍，两人出了睢水上场口的栅门，过大拱桥，走上通往松、茂的山路。两面的山庞大、荒凉，中间夹着一条湍急的河道。摸黑走了七八里地，到了接近茂县地界的坝子坎过河，逐渐进入茂、安两县接壤的幽邃山壑，天才渐渐大亮。

刘家沟约有三、四里长，分做上沟、中沟、下沟三段，一共只有五六十户人家。

沙汀抬头瞭望这将要相依为命的新避难所：所有的住房就缀在山峡两面的腹部，山脚边是耕地，顶上一层，大半用来铲草，以作肥料。当时正是利用农闲，准备铲草烧灰的时候，锄面触着岩石的铿铿的声音，听了不觉感到寂寞，逢到下雨，这种单调刺耳的声音，是没有了，但是野兽的叫却更难以忍受。特别是黄麂子，常常在雨镑镑的荒山上跑来跑去号叫：那么执彻，凄厉！使人想起传说中沉冤莫白的冤鬼。主人刘荣山，三十上下年纪，是本地保队副袍哥。他住的也是茅草房，位于山腰名叫柿子院的场上。刘每日上街鬼混，庄稼留给了老婆做。刘的父母是老实巴脚的农民，仍然参加劳动。每日早上，种田的人带着弯刀、锄头、玉米粑，破雾上山，一直要干到傍晚才落套归家。白天家里没有人，堂屋里一冬都不熄的火塘里，燃着的树疙瘩，冒出清烟，抵御山上逼人的寒气。

他们临时给他空出的屋子，塞满酸菜罐子，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破烂家具偏没有一张桌子，最要命的是没有窗户，也就是没有白天写作所必需的阳光。沙汀仔细巡视了自己的房间，终于注意到有一面墙的上段是用破晒席夹成的。这一发现非同小可，他连忙去征得主人的同意，用剪刀在晒席上开了一个两尺长、尺把宽的“窗”，让宝贵的亮光漏入，恰恰落在一只三条腿的米柜子上。这便是他写《困兽记》的“书桌”了。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伏在木柜上写作，一写便是三四个小时。下午一个人出门爬一两里山路。即便下雨，也要披起蓑衣上山。是散心，也是锻炼，兼看看农民的劳作。

他过去只了解乡镇，像这样大山区的刀耕火种的生存方式，他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这里熟地稀少，农民需每年开出“火地”。每座山岭都有主人。第一年开荒不交租，第二年便要议租谷，所以他们总是不断地去争取那个“第一年”。先是烧荒，然后在灰烬上捣个鸦鹊嘴一样的小坑，丢进玉米种籽，但求雨水充足，上苍保佑丰收，再也不管它了。仅靠田地，他们连半饥饱的生活也混不上。所以，常要进深山打柴，狩猎，冬天烧炭（烧桐炭本钱大，多是用荆条、细竹枝烧桴炭，供小烘炉用），春天打笋子来维持生计。

每次爬山他都要到半山的一个泉水边，回程顺便捎一罐清澈的泉水，放在火塘上烧茶喝。山民起初见到他感到惊奇，知道他是“躲事”来的，很快就露出纯朴的笑脸。中午觉得饿了，便自己做饭。等饭的功夫，往往空着肚子喝寡酒。曲酒太贵，他喝的是后劲很大的大麦烧锅酒，燥辣伤人。饿肚喝寡酒伤害了他的胃，当时还不觉得，却为1948年胃肠的总崩溃种下了祸根。

《困兽记》一章一章地写下去。多年相熟的小学教员各位朋友，仿佛和他厮混在刘家沟的破屋子里。牛祚不必说，吕康、米子远，都是用他熟悉的人物改装成的。他把他们全部挪到秀水的背景去活动。汶江小学有个教员叫范聋子，喜欢吃酒，吃醉了别人骂他搞囤积，他马上听得见，总是辩解说：“不是我要干的，是我老婆！”此人便是范老老师原型的孙子，书中的国文教员米聋子。

写这些知识分子，自然禁不住观照自己。章桐自前线返回故乡的观感，包含他的亲身体验。田涛的家庭描写，也渗进了自己的一部分生活。当他与玉颀每每为这么多孩子的抚育表示心焦的时候，遇到的正是这样的场面：“你

让我领好了！”王妈突然插进来说，“上课的时候，让我来领好了！”……“你们就算得多了么？不多！不多！我们妈连我养了十一个呢。……”王大娘这些朴实的话语是曾经那样感动过他，让他在避居写作的孤独寂寞中，忍受住监牢一样的日子。他让田涛也“深深为王妈的真切简洁的言谈感动了”。

田涛、孟瑜、吴楣的悲剧，来于自身的脆弱，尽管他们的个性并不相同。他们不能冲破各种有形、无形的锁链，采取章桐走上前线的勇敢方式。也不能坚韧地如王妈一样过活。沙汀自己既经历过前方火热的战斗，现在又“土拨鼠”似地隐居故乡写作，他此时此刻的心理，使他对老友马之祥的生活态度充满感情。书中的牛祚，在演剧之始，忧虑在先，向大家的热情泼冷水；等到发生阻力，军心动摇，他却坚持出席每一次的商讨，尽力不使事情溃散。他的“老牛筋”，他的“绵劲”，他用幽默、含蓄的方式表示的对世道险恶的充足精神准备，是沙汀认可的一种理想，一种哲学。他已经想好，要在小说的结尾处，写一段牛祚和全军覆没的田涛的对话，要让牛祚这样来发挥他的“土拨鼠”思想：土拨鼠的视觉是环境毁掉的，并不是它自己甘愿的。它的手足锋利，能够遁土、打洞，不停地挖泥巴，并不是单单为了藏身，储存食物，倒更多的是为了透一点阳光哩！

这无疑也是在自己分析自己。

《困兽记》写到十五章，田涛在家里为新生儿摆满月酒，章桐谈进城被县里审问演剧事情的经过，睢水传来女儿又一次患病的消息。

礼儿的妹妹刚齐（颀）也是新生不久。为了她出麻疹，他已经下山过一次。玉颀周身疼痛，卧床不起，自己都需要别人伺候。他不得不停止写作，在睢水照料了她们近一个月。通过处理积压的邮件，他接通了与外界的联系，碰上《闯关》遭扣，短篇集不能出版等不愉快的事，危及到他的生活。他心情烦躁地返回到刘家沟，有一段时间索性把《困兽记》搁置，开始更多地与山峡的农民接触。

农民看出这位“杨先生”是个有学问的本份人，很愿和他摆谈。此地的赤贫，造成大批的光棍。他认识一个叫刘荣成的老乡，瘦长精干。问起他的婚姻，他说自己的老婆是路上捡来的。四十来岁他还是独身，赶场天碰上—一个告化婆子，相识后喊到河边洗涤一番，置了两件衣服，便算成亲了。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好缘份的，很多男子汉终其—生就是讨不上老婆。沙汀同情他们，与这些粗豪的农民，相处得很不错。1944年旧历春节，他是在刘家沟度过的。许多人赶来找他写春联、神榜。没有毛笔，冬天他穿了从延安带回、在西安改过的那件老羊皮袄，便把羊毛扯—丛下来，用—支筷子头扎起，蘸墨在红纸上而挥动。围观的老乡好奇地发出赞赏的笑声。还有两家农民请他去吃春酒，虽然比起仁寿文公场冯子虚备的春酌差得—天上地下，但是主人的诚意、情谊，令他感动。刘荣成为跑茂县、松潘的烟帮做挑夫，赚了一笔钱，“告化婆子”又快要生孩子了，刘高兴异常，发宏愿要把这钱花光，特意请了沙汀去写对联，招待吃喝。对于这样的酒饭，他就不坚辞了。

过完年，本来想在刘家沟写完、改完《困兽记》的。3月的一天，—次偶然的散步机会，他登临到泉水上面的山地，突然发现—片从未见过的鸦片烟苗。他猜到可能是袁寿山指使刘荣山私下种植的。这很容易成为魏道三抓捕自己的新借口，神经照例紧张起来。所以，女儿再次得病的消息—来，他便决定立即下山。—个深夜时分，还是这小刘荣山领他离开了刘家沟。随身带着完成三分之二的《困兽记》原稿。家里的病人—好转，他就去苦竹庵，

把自己禁闭起来，专心写完长篇余下的三分之一章节。这年5月10日，他改毕《困兽记》的最后一个字。这以前，何其芳从延安调重庆工作，后来知道是参加国统区文化界的整风学习，几次来信催他前往。为了筹措这笔路费，他一再拖延动身的日期。何其芳止不住信中用玩笑的口吻，叫他“不妨浪漫谛克一点”，离开妻子一次。所幸以群收到《困兽记》后，照搬处理《淘金记》的办法，先拆零“卖”给几个刊物，预支了稿费来救他的急。三个月后，《困兽记》部分章节化成了柴、米、油、盐，化成了一点路费，他才能奔向离别三年多的城市。

他已经意识到，刘家沟将给他带来一部新的长篇。

对于生活的信赖

他刚从大山里钻出来，朋友们几乎认不得他了。到重庆三天后，搬到了张家花园“文协”以群的房里住。曹靖华跑进来找以群，正巧屋里只有沙汀一人在，曹匆匆瞥了一眼转身便走，在走廊撞上以群，偷偷问道：“你屋里坐着的这位好像是个保长！”

他的装束也确实奇特。长袍，一顶剪去帽檐就像毡窝子一样的黑呢礼帽，还戴了金戒指，活活一个土保长或土绅士模样，一个他书中的人物。他融进自己的描写对象中去，扮演得相当成功。

这是为路上的安全做成的伪装。1944年的深秋季节，他从睢水直奔绵竹，在当地有名的袍哥大爷古华庭开的奎鸿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坐黄包车赴成都。

在成都停留了两天。

第一件事是到东大街崇德里嘉乐纸厂成都办事处会见李劫人。这个办事处小院有一正一厢两幢平房。正房有李劫人的办公室，“文协”分会兼用，外屋可供开会。李的助手谢扬青是办事处与“文协”的双重秘书。他又去看陈翔鹤。陈在一家私人开的“和成银号”当文牒，以“民盟”盟员的身份在文艺界活动。他介绍沙汀结识了黎澍、叶鼎彝（丁易），还谈起杨伯凯在“民盟”内部的作用。杨伯凯受刘文辉暗中支持，在筹办一张《民众日报》。沙汀与他见面时，杨详述了刘文辉的反蒋倾向和办报过程，让沙汀请求组织从《新华日报》抽一名政治可靠的排字工友给他。沙汀见他劲头十足，毫无戒心，有点为他担忧。此事在他从重庆返回时果然失败，因刘文辉被张群一诈，把出钱办报的真情暴露了。

本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桂林失守，时局混乱，进步文化人时有“失踪”的消息传出。陈翔鹤对沙汀独自乘公路局车去重庆很不放心，便与丁易、丁聪商量，让他与郁风同行。这位郁达夫的侄女、画家，三十年代在上海白薇主持的妇女联谊会上，与他有一面之缘。还替他画过一幅速写，他很喜欢，可惜逃难中丢失了。但在长途汽车站，面对这个保长型的沙汀，她完全认不出他来了。

路上不幸车子抛锚，没等修好天又降大雨。眼看已经黄昏，大家恐慌

起来，不知道怎么办好。沙汀见乘客中有几个兵士，挺身而出说：“我们几个兄弟去走一趟怎样？”便领了军人到附近的村庄找真正的保长设法。最后把全体乘客带到一座庙里，铺上稻草住了一晚。

次日，车到永川，离重庆近了，郁风同他在一个田坎散步。她对这昨晚的“群众领袖”发生兴趣，也起了疑心，爽气地问他究竟姓什么，他这才说出了笔名。郁风恍然醒悟，对着小说家连呼：“啊哟！真看不出来了！”她这次是去与黄苗子结婚的，身上确乎洋溢着喜气。

当晚，沙汀把行李往“文协”总会一送，便去曾家岩报到。正碰上五十号在举行招待文艺界的会。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都在场。桂林、贵阳转来的文化人不少，相识的作家更多。座谈会刚刚结束，开始了聚餐。他没用晚饭，何其芳便招呼他入席。

坐下不久，同桌的葛一虹轻声告他：“前些日子听说你在隆昌被捕，我们曾派人去了解和营救过，才弄清是一个和你同名的人，年龄、相貌都不对。”宋之的乘兴在一旁说：“好啊，大难不死，我和你干几杯！”

两人都善豪饮。况且，他从三年的寂寞山间，突然走进这么亲切的、充满情谊的环境，被鼓荡得有些忘情，连连与华裕农场时期的这个老朋友对饮起来。惹得周恩来在邻席笑着照应他：“沙汀啦，少喝两杯啊！”

聚餐散时，夜已很深，其芳安排他住在五十号会议室隔壁的小屋。两人尚无倦意。他看其芳的圆脸虽然比分手时略瘦，但神态、举止已沉稳老练得多，只是眼镜片后面闪烁的目光，仍是那么坦率，无遮拦。其芳这次与刘白羽调重庆，是帮助周恩来加强文艺界的工作。

他郑重地对沙汀说：“让你来是为了参加整风学习，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取出中央的一套整风文件叫他阅读。因为其中有几份文件是不能带出去的，沙汀就在五十号多住了两天。

整风文件给他送来延安的气息，熟悉而陌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他想得很多。自己的创作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似乎不成问题。“有意识地进入生活，向它毫无止境地掘取创作的源泉”，他一向就是这样做的。他从来认为观察、研究社会和人，比天赋、想象力还重要。在冀中和睢水，他不都沉在生活中吗？但是，谈到描写工农兵，他似乎只注意“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有些对不上号。这几天常听人赞扬《淘金记》的成功，使他不免兴奋，如果按照整风文件衡量，似乎不是主要的写作方向。他没有想通这个问题。

他在以群房间加了一张竹绷子床铺，像几年前一样住下来。“周公馆”确定了在渝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分散学习”的办法，他与何其芳、夏衍、乔冠华、刘白羽、胡绳在一个小组，在五十号开会，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检查。乔冠华长期在香港做新闻工作，这时在《新华日报》负责写国际评论，是个很有才气的笔杆子。他做了长长的发言，检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他的影响。沙汀不准备提早发言，他还要思考。

他坐着听发言，想起王若飞前几天开的那句玩笑。他们在延安认识，王若飞敦厚开朗，在五十号当面碰见，第一句话便是：“怎么走了就不转去啦？”他说的“去”，是指去边区。其芳这次交给他一封周扬的信，信中说，听周副主席讲，他在重庆做了不少联络工作，这几年写作也有成绩，但比较起来，还是反映新的抗日根据地的现实意义更重大。你是不是考虑再到延安

来呀？周扬的话充满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他应当怎样答复呢？

他想乘机整理一下自己。李长之发表文章认为《淘金记》是“乡土文学中之最上乘收获”。他提到了果戈理。但对《奇异的旅程》（《闯关》）表示冷淡，认为“黯淡和平凡”。其芳认为《闯关》真实，私下里对他说过：“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有普遍性，你离开以后这种情况更多了。”整风文件提出的道路是与工农兵结合，他只了解《困兽记》里的知识分子和自己，更难把握新形势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题材。他在重庆为书店编了一个《兽道》的集子，请住在文协三楼的宋之的夫人王莘抄《兽道》、《在祠堂里》两篇旧作。

王莘告诉他，在抄的时候，她认真地被小说描写的旧世界震动。那么，他只能写刘家沟。他起了一个愿，在下一部新长篇《还乡记》里，要真正写一个大后方的农民。

他为离开延安而羞惭，又坚持一个作家的立场。他要考虑川北以外他理解不深的生活能不能写。于是他起草了给周扬的回信，讲到家里的拖累，无法脱离家乡的理由。他写道，反映落后的生活，讽刺、暴露，是不如歌颂党和党所领导的斗争来得重要，但自己只能“退而求其次”。

（你这次的“思想斗争”并不严重，而且你的创作观念已经稍稍偏离周扬的轨道，“为我所用”地在理解“工农兵方向”。可能是这样吧，因为我接下去写的东西虽然受了这次学习的影响，大关节没有改变）

以群在编《青年文艺》杂志，向他约稿，他一连写了两篇。一篇是论文《向生活学习》，借着为以群的新地出版社看稿子发表感想，检讨了自己只以“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毛病，但主要表明，他对生活的态度是符合整风精神的。另一篇是小说《堪察加小景》。这也是他对这段学习的形象性总结——他还要发挥对旧生活熟知的优长，着重暴露，但他是热爱压迫在生活底层的还无福当家做主的“工农兵”的。他的讽刺本来便是对新生活期望的一种反衬，现在他更要增加对黑暗中劳动人民的信赖，挖掘他们遭侮辱、被损害的心灵的光明！

他几乎是日以继夜地在以群的房里写这篇小说。在睢水关，他很了解这些被称为“货儿子”、“烂货”、“玩物”的流娼。附近一个乡的大爷婆娘赶流娼的故事，他有耳闻。他们用两根大木头挖洞，把人的手脚伸进，两边扣起，动都不得动，比普通的脚镣还要残酷，叫做脚柞，萧文虎的乡公所里，就有这种刑罚。写出这个妓女筱桂芬的可怜，是很容易的。但是那个想乘机揩油奸污她的班长，在一种特殊的场合下，听女人谈起她哥哥两次出钱还当了壮丁及自己被骗出来的经过，他也是躲了壮丁来当团丁的，他的同情心一时抬了头，邪念终止了，这个写法在他笔下并不多见。沙汀觉得他对人的认识深了一些，对这个出身小粮户，只懂赌博的班长的心理变化可以掌握准，控制得住。班长大部分的机会还是被所丁老娃的迂笨所搅散，但他也是受欺侮的一个，他心里不是一团漆黑。解放后他根据对此篇气氛的理解，改名为《一个秋天晚上》，“秋天”就暗示了这一点。

他写得很有兴致，有时顾不得吃饭，就找出以群的饼干、牛骨髓之类的东西大嚼。以群这时独身，吃食需自己照顾自己，他还是满讲究营养的。沙汀连续六七天关在房间里，到11月24日，写完了《堪察加小景》，以群的食品储备也被他一扫而光。这是他自己最喜爱的一篇小说。

整风学习小组只开了一两次会，便停下了。后来也没恢复。黔桂战事

造成大批的文化人流亡，到了重庆的要接待，滞留途中的急需救援，大家分头去做具体工作。

艾芜一家六口，包括新生的婴儿，流离失所三个月，困在贵阳。李亚群奉周恩来之命携款前往救助，才于11月下旬来到山城。初时找不到房子，临时住在“文协”一楼的会议室，就在以群、沙汀房间的隔壁。会议室大而无当，蕾嘉路上病了，婴儿嗷嗷待哺，房间里挂满尿布，情景十分凄惨。沙汀、艾芜一直音讯未断，分手却已整整七年。在这样一个狼狈的环境里相遇，两人的感慨太多。沙汀没有像第一天住进以群房里那样，滔滔不绝地大谈故乡见闻。他看着疲惫不堪的艾芜，简直说不出话来。他也感到难以理解老朋友，怎么有那么大的忍耐力？一个月后，艾芜全家搬到了南温泉的一所茅屋定居。

同样撤退来渝的作家还有田汉。沙汀想起抗战初期自上海返川，住到他南京家里受到的款待。他跑到上清寺求精中学附近去探望这位好客的戏剧家。一家人挤在一个二楼的房间，虽然局促，“田老大”的乐观豪爽仍不减当年。见面大谈川剧“场面”上打击乐器锣鼓铙钹的特点，俨然是个行家里手。

巴金新婚燕尔，刚从贵阳到这里与萧珊会合。巴金和吴朗西在艰难蹶蹶中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几度迁址，为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事业出力良多。这个出版社与沙汀的关系最密切，上海时的《土饼》、《航线》、《苦难》三个集子和最近的长篇《淘金记》，都是经过巴金在那里出书的。他与巴金的交往逐渐加深。艾芜未搬去南温泉前，他们约好一块去看老巴。

三人同年，今年都是四十岁，巴金又是四十岁当新郎，见面后同乡们打着乡语开玩笑，沙汀尤其说得凶。巴金的稿费多被“勒索”，这次又请客吃山城的“毛肚火锅”，麻、辣、烫，名不虚传。沙汀口馋，放怀吃得大汗淋漓，以致于冷热一激，当晚回张家花园便感冒发烧，服了多帖中药才好。

在民国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还见到从北碚进城的靳以。他是巴金的老搭档，与沙汀也是老朋友了。谈起王映霞抗战中与郁达夫的离异，萧红的婚姻和寂寞，叶紫逝后妻儿的艰窘，都不胜感叹。正是靳以，1940年约沙汀写了《悼念叶紫先生》一文。靳那时在《国民公报》的副刊“文群”上编了个纪念特辑，经沙汀等同意，将全部的稿费用来抚恤叶紫的遗孤。巴金、靳以的为人之好，是很吸引沙汀的。

新认识的朋友里，吴组缃与他一见如故。吴组缃在中央大学教书，已是有名的作家。第一次在张家花园见到沙汀，瞥见他床上那顶疤上重疤的圆蚊帐，便坦然笑道：“哎呀，老兄这床帐子真是洋洋大观哪！”他很关心人，后来常听他讲起大学知识分子的苦况。比如，一位同事，妻子在城里工作，礼拜天才能回乡下，五个孩子统由丈夫照管。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学教师白天上课，晚上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给他们纳鞋底。吴组缃讲得生动，好像是一篇小说的材料，见沙汀单薄虚弱，问起来才知道是神经衰弱、失眠，便劝他用当时苏联进口的鹿茸精针剂，很直率地说出自己用后的效果。吴书读得多，小说写得少、写得精，谈起自己作品，说《一千八百担》还可以，长篇《鸭嘴涝》是个次品，要求得很严格。这个人对人对自己就是这般耿直。

我在抗战中认识沙汀。余冠英办《国文月刊》，让我介绍当前的小说，我介绍了四篇，沙汀占两篇，《在其香居茶馆里》、《磁力》。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但欣赏他。见面后觉得亲热。沙汀诚笃，川味浓。我去张家花园看他们，

姚雪垠招待我，一连打了七八个鸡蛋，都是坏的。沙汀一句话没说，去煮了两个鸡蛋端来给我吃。以群笑着告诉我，姚去北碚两个月，鸡蛋当然搁坏了。

抗战时沙汀从延安回国统区，有人批评他逃了。我认为他是要写作，我理解他。

他为人好，平时不大说话，对熟人能哇啦哇啦，也幽默。四川习惯浓，麻婆豆腐。

文艺界有些人互相不看小说，或是看沙汀小说的。鲁迅之后，他深厚，我比对天翼还看重他。吴组缃与杨晦在一个学校教书，住在宿舍区。沙汀去时往往都能见到。杨晦是“五四”作家，是火烧赵家楼翻墙入室的一个。沙汀未写作前，便读过他的翻译《当代英雄》和历史剧《楚灵王》，十分佩服。杨在川东城口县一个外地搬去的师范学校教书，与一学生谈恋爱，两人跑到重庆。所以，沙汀第一次见他，他在做新郎官。杨晦个子奇小，穿着极坏，他的皮鞋补了又补，可以想象一个大学教授穷困到什么程度。一次沙汀去拜访，在他的宿舍里住，臭虫多得吓人，一夜未睡安稳。次日回城，杨晦夫妇还没起床，他打个招呼，洒洒脱脱离开。

（杨晦似乎是偶尔涉足评价了你的小说，称你为“四川社会的叙事诗作者”，说你有“农民的性格”，“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生活惯了”，“带点拘谨”、“慢工出细活”制出“专精的产品”。还是很有见地的。

他注意到了乡土给我的滋养和束缚的两个方面）

姚雪垠在“文协”同住时认识。姚抗战中写《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出名，又写《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一时成为畅销书，很引人注目，也引起一些议论。沙汀他们认为他只是不够成熟，曾与茅盾找他谈过长篇创作问题。茅盾推崇托尔斯泰，说要有托翁“抓得起来，甩得脱”的笔力。因为姚的小说流行，陈纪滢把他拉得很紧，在一起筹办刊物《微波》。为了这件事，沙汀与他谈过多次，提醒他注意政治倾向性。

几个月的重庆生活过得很有意义，新老朋友的交往鼓起他更强的创作信心，对局势的了解也加深不少。夏衍和他在一个小组整风，从左联中、后期编《光明》与夏合作，他就佩服他思想敏锐，办事细密的作风。当时，党对国统区文艺界，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有两个联系系统。一个是郭沫若、阳翰笙的“文工会”，管创作方面。一个是南方局的文化组，徐冰管统战，夏衍管新闻，后者到得较晚。过去的沙汀，与现在的何其芳，都是后面这个组的。

夏衍1942年化装逃出沦陷的香港，经桂林到重庆后，就在《新华日报》，同时参与雾重庆的戏剧活动。沙汀到捍卫路的居处去看过他，是一所平房，离张家花园不远。当天乔冠华也在座。

11月5日，南方局为抵制潘公展、张道藩企图成立“中国著作人协会”来取代“文协”的阴谋，决定由夏衍领导，在参加他们成立会的时候，相机斗争。“中国著作人协会”的成立大会在上清寺求精中学对面的广播大厦召开。沙汀进入会场一看，与会的文化人好似分出了清、浊两流，王平陵等一伙，夏衍周围的一批。会议进行到选举理事一项，无党无派、有胆识的洪深起来发言，要求讨论一下图书审查制度，场子里顿时热闹。夏衍站起来沉稳地走出会场。这是个信号，沙汀和其他朋友们，都一个接一个退席，根本不理会招待人员惊慌的劝阻：“怎么就走啦？还准备得有饭！”这个没有大批进步作家参加的“著作人协会”，便偷偷偃旗息鼓了。没过几天，周恩来

的座机冲破秦岭上空骤起的暴风雪，从延安安全返渝。沙汀当天闻讯后，真有点后怕。其芳、以群和他准备组织一个欢迎晚会，并请周副主席讲讲日益吃紧的西南战局和大好的欧洲形势。11月13日，已经下午两三点钟，晚上七时的会还缺少一个有声望的主持者。郭沫若其时在赖家桥乡下，路太远，几个人又没有去过，找他已来不及了。1942年底同夏衍先后从香港、桂林撤来重庆的茅盾，住在长江北岸的唐家沱天津路一号，沙汀拜访过，路熟。这样，便自报奋勇，单独去请他。

这条路，如果从观音岩下到嘉陵江边走水路，大约一小时够了。谁料江边雇不到划子，只好步行到码头乘小汽船过江，再走一条丘陵的石板路去茅盾住地。这条路一边是连绵的小山，一边是青青的冬水田，过了几个月的繁荣城市生活，突然走入图画一样的好景致里，他恍惚间觉得是身处故乡的山径了。

他忆起最近多次见到茅盾的情景。茅盾进城如果当天回不去，就常到张家花园，临时搭铺挤在以群、沙汀的房间里，三人往往谈到深夜。茅盾是极健谈的。有一次大家终于谈倦躺下了，沙汀照例不能很快入睡，他觉出晚秋季节夜半的凉意，抬头见茅盾的被子没有盖好，便起床蹑手蹑脚走过去打算替他掖被角，不料茅盾一下惊坐起来，把沙汀吓了一跳。原来，两人都是惯于失眠的。

还有上一次去唐家沱，是与何其芳同行。谈完工作，茅盾向两人诉起了生活上的苦恼。

几个日常令人烦躁不安的邻居，还有夫人孔德沚，因为长期的恶劣政治环境，把她弄得经常怀疑周围的人都是特务，都在跟踪他俩。这天夫人不在家，茅盾提出让其芳设法为德沚找个职业，由他自己出薪水都可以，只怕她在家精神再也承受不住。他絮絮地谈了好久，沙汀第一次听他在自己面前谈这种琐事。茅盾感觉的细密和神经过敏都流露在他面前，使他一下子亲切感受到这个文学前辈的创作气质。

黄昏前走近唐家沱场口码头。他计算好应把回程的划子雇妥，但打听一下就大失望了，本地的船夫怕空船夜归，再不愿去重庆。见到茅盾，说明来意和交通的困难，茅盾爽快地答应去主持会，并说，滑竿都不要坐，就走石板路去大码头乘划子过江。两人一路谈天说笑，不知不觉就进到城里。座谈会是在文工会大楼的会议室开的。参加的人很多，茅盾让周恩来讲。周讲到黔桂战争最坏的发展可能，指着下面的巴金、沙汀说：

“你们都是四川人，敌人如果真的敢来入川，这个地方正好可以打游击嘛……”

周恩来的乐观情绪传染了在场的人。

不久独山失守，形势的陡然严重，使得疏散外籍文化人的工作又一次提上日程。为了应付突然事变，沙汀建议设一个外地人的紧急避难地。《光明》的同事沈起予，这时在自己兄弟开的味腴餐厅做事。这家餐厅兼旅店开在民生路“米亭子”附近，三层楼房，相当兴隆。

沈的兄弟在闹市一带显然与社会有广泛交往，沙汀想起利用这个餐厅，便跑去找沈谈。

沈面有难色，有些吞吞吐吐。这件事也就放下。

后来，南方局提出向四川乡镇进行疏散的计划，关键是建立几条可靠的交通线。于是，沙汀接受了疏通合川——遂宁——绵阳交通的任务，准备

离渝执行。徐冰甚至问他：“是不是先带一笔钱去，看在哪个点上开个店铺做生意？”

他决定乘邮车去成都。托人买到抢手的车票后，他到天官府郭沫若家辞行。前些日子，他曾与茅盾一起到这里，与郭沫若商量推荐给苏联同行翻译的中国文学书目。今天是与其芳同行，在郭寓碰上夏衍、冯乃超，不知怎么一来，话题扯到沙汀今年四十生日，大家起意要给他庆寿、饯行。文人的情绪来得快，说“庆”就“庆”，纷纷站起来就走。郭沫若也要下楼，被人们劝阻了。可是，等到在沈起予兄弟的饭馆坐下点完菜，郭沫若还是披着一件士兵穿的灰布大衣，一个人摸来。郭沫若放达的豪兴，这次表现在最近处。喝酒划拳，冲着沙汀高声呼喊：

“四十大庆啦！”

“一帆风顺啦！”

为了在太平门邮政总局上车不致误点，临行的一夜，姚雪垠介绍他到王亚平家里借宿。

靠一个作家的笔杆子养不活家小，王亚平的妻子靠缝织、出售童衣维持家计。这一晚沙汀几乎无眠，他在灯下赶校《困兽记》的清样，好交还以群。

第三天，坐任邮包上颠簸到成都暑袜街邮局，住小福建营一个姓萧的同乡家。他顺便参加了表弟婚礼，贺郑慕周、谢象仪结为儿女亲家。他们在成都临时租下了房子。沙汀与舅父谈好，由郑的旧交遂宁萧经武，绵阳寇雪年来照料将来疏散的文化人。加上合川的赵其文，这条交通线算是有了眉目。他又拜访了张澜、杨伯凯，取得各方面的支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与影人剧团的应云卫见面，做了随时撤退的叮咛。

杨伯凯办报需人支持，经沙汀报告南方局，派出的是黄药眠。后来报纸没有办成，黄留下给《华西日报》写文章。他能翻译、写诗、写小说，也能搞理论，被戏称为“黄大师”。

沙汀陪“大师”逛街，一路上耍了两回吃食，惹得“大师”连称“你的胃口太好了”。沙汀还去陕西街探望前辈叶圣陶，两人一道在少城公园的“绿天”喝茶。叶问起了延安的情况和自己一个儿子去那里的事情，邀沙汀为《中学生》写稿。后来沙汀从家乡还托别人捎了一篓绵竹的曲酒双沙醒色赠给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

他向陈翔鹤问起了在成都乡间养病的张天翼，后来便由巴波引导他们到郫县土桥去探望过一次。两人在鲁迅丧事上相识，抗战分手，已经许久未见。在张家花园，以群告诉他，天翼患的是空洞型肺病，医生已对这位讽刺作家判了死刑。现在看到他躺在一个当地青年地主为自己结婚而准备的新房里，面色憔悴。见到沙汀，脸上泛起红潮，挣扎着坐起，用嘶哑的嗓音问起延安和敌后的情形。他原来也是要去“鲁艺”教书的，所以，对沙汀的每一叙述都贪婪地吸取，报以孩子般虚弱的笑。

沙汀默念心中的祷语，希望天翼有一天还能拿起笔续写他的《华威先生》。在暴露的眼光上，他们俩是如此相近。他当时不敢奢望会有奇迹出现，离去的时候就像是永别。回到成都后，住在华西坝新识的林如稷疏散房子里，他突然患病，是一场疟疾的发作。如果他能知道天翼真的可以起死回生，这场传染病对他的加害肯定也会缩小多了。

其芳在重庆曾建议他完成任务后留在成都教书，以便在文化界继续工

作。这听来像是组织上的意思。所以，他便托了翔鹤，去问四川大学中文系。没想到系主任罗念生一听推荐的是沙汀，害怕他的“色彩”，一口回绝了。沙汀对教书原本就缺乏兴趣，他没感到丢失什么，立即准备回睢水，并到李劫人办公处去辞行。李劫人一听，惊怪道：“怎么就要走啦？我还说要请你来吃便饭呐！”

知道不能留了，就跑到自己房间去拿出一封红纸包塞过来，一面嘴里说着：

“一点小意思！相濡以沫嘛，一点小意思！”

好像不好意思的不是沙汀，倒是他。李向来对朋友慷慨，前几天见沙汀在成都12月还穿着薄薄的单衣，曾让夫人找出自己的夹衣夹裤一两件相送。现在临别又送路费。后来，沙汀托人从山里带了一副熊掌回赠。送的人撂下东西就走，未留一纸一字，弄得李劫人好长时间弄不清是哪位朋友表示的情义。

相濡以沫！在还乡的路上，沙汀吟味着这句熟语，感到人间相通、相爱的温暖一面。

苦竹庵——秀水谭家锅厂的《还乡记》

不知不觉，路途上横跨了“两年”。他1945年1月回到了睢水。

经常住的地方还是苦竹庵。在那搁了木板的拌桶上，开始入魔地构思第三个长篇。旧历年前回家，两位大娘饲养的猪已经够了份量，全家笼罩在一种兴奋的气氛中。陈翔鹤来信便称他们这次杀年猪为“壮举”。王大娘的儿子王大生从前线开小差，在河清乡无法立足，避到沙汀家来帮着砍柴、送信、打杂，已有些日子了，这次自然帮助杀猪。刘家沟的房东保队副刘荣山，被人叫做“懒狗”，仗着有本地保长做靠山，到处搞钱，搞女人。沙汀曾经从旁长期观察过他的行径。如果就从这个小角色入手写，轻车熟路，太容易了。现在他从王大生的还乡，联想到让一个逃兵与保队副组成一对矛盾，可以第一次从一个种田的“农民”的角度来反映一切。从重庆之行得来的这个念头支撑着他。

这是一次调整。他跟过去特定的表现对象，那些脱离土地的小镇人物混得太久，建立的联系似乎定了型。他还能不能在新的人物身上，爆发出自己特有的智慧呢？

长篇的酝酿无形中延长。王大生成了冯大生，刘荣山成了徐懒狗，他把他们搁在心里，先来考虑叶圣陶等人的约稿。写了短篇《两兄弟》，还有《春期》、《替身》，都是些针对国民党弊政的尖锐作品。题材很有趣，旨意却大体雷同。短篇小说形式驾驭得纯熟，发掘生活的思想能力却好像有所停滞。

独山失陷后，日军的进攻停下来。而报纸上天天传出欧战场的大好消息。所以，《替身》这年5月份发表时另有一个题目叫《胜利在望年即景》。沙汀周围感受不到这种“胜利”，或者说胜利越近，各种酷政反越发厉害。

睢水近来因为抓丁，连场镇也冷落不少。一次沙汀回来小住，傍晚到门外河边提水，突然见到一个“山河客”蹲在坎下洗刷箩筐里的腌大头菜。沙汀忍不住搭话道：“喝！这一向还敢出门，不怕抓你的壮丁啊？”“咋没抓哇！”这个“跑山河客”愤然地扬起远不年轻的脸，“你看嘛，胡子都给我剃光了！”

原来他是个被强制刮脸，最后仍未验上的老丁。沙汀没有多问此人抽丁的原委，这就足够他写出《替身》了。不知怎的，他对这种社会题材的兴趣始终不衰，一直到内战之火点燃，他还在孜孜地搜集这方面的材料，显然比了解《还乡记》所需要的农民种田的生活更其热心。改变自己，谈何容易呢。

（乡土文化培养了你的“偏执”，同样一件事可以重复地做下去。我的感觉这不是“一件事”，只能说我是用同一种角度来观察无数种事件）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叶圣陶当时亲写的一个信封内，可以找到用毛笔写下的一张张纸块。

它们大小不一，有的是一方长长的宣纸纸边，更多的是一些信封的背面，显然是随手抓来的。这十几个小说提纲里，居多的还是关于壮丁内容的：某县禁政颇严。当抽丁紧急时，“壮丁”难找，价钱又高，于是公事中人忽然想出一个妙法，叫人化装开一售店。而逢到有人跑去抽烟，体格又勉强验得上，于是就派人前去查禁，将该瘾者沦为壮丁。（其一）婚事

1．来！把头剃了，明天到你老丈母家里去，转来好找人看期！

2．等她爹回来看吧！我倒巴不得呵，只是听说要抓丁了。

3．等候当中准备。但突然来了回话——等太平了再说！

4．两亲家口角、扭打。（其二）

绵竹南门处某巷，有个台基，经常川流不息，扰攘终夕。居民极为不满，请保长加以驱逐。保长从来也很不满，立刻就承诺了。但后来并未实行，因那龟婆说动了保长，答应每次征丁时帮助本保一名壮丁。这不是她拿出钱买，但和保长约定，在抽丁的时候她叫妓女们去故意勾引两个老实人来，再由保长带人来捉。这办法直到胜利时才停止。（其三）

第三则大约写在这年秋天之后。这不奇怪，到1947年的《李虾扒》，1949年的《酒后》，池还在写壮丁事件。他只要有几个性格突出的人物做为载体，就可以把无数内容相仿的有趣题材一一写出。除了《还乡记》提供他创造一个真正的农民故事以外，他的突破口已经很难寻觅，地域性的小说不免露出它的危机。

1945年的夏日格外炎热。前妻所生的两个孩子一下子长大了，刚俊十八岁，刚锐十五，先后踏入了青年期。对于他们在外婆家寄人篱下（尽管外婆、么舅是照顾他们的）的童年生活，他一想起便感到内疚。这种感情包含对李增峨的复杂心理在内。特别是对刚俊，这个头生女和礼儿一样，都是难产生下的，但相比之下，礼儿所受的他的爱抚，就多得多了。

礼儿未生之前，他就亲自为他挑选了卧具，找了几种育婴常识的书籍看。从上海的医院一回到家中，就让他躺在床边的摇篮里摇他。断乳后为他煨牛奶。稍大，又给他调治奶膏。刚俊得到过这些吗？一个不是因为爱情而降生的孩子有什么责任呢？

这年春天，听说刚俊在绵阳一所师范学校闹学潮被开除。接着又放弃花菱乡小学的教职，躲在县城自学，不久脖子生了疮（淋巴腺炎）肿得老大，他就捎信儿让她到睢水家里住，从沸水请来远近闻名的专治瘰疬的土中医为

她看病。这个医生平时务农，有病家相请，可以出诊。他认为刚俊的病情还不算严重，留下几剂家传秘方配制的药膏就回去了。

父亲最困难的时候，我到睢水与他住了一阵。我也教过小学，一个小学教师有多少工资我是知道的。父亲家里除了靠黄玉颀、黄敬之教书，郑慕周给点，稍有些稿费，这么多人口，也是勉强维持。我在那里治病，自己读书，与黄玉颀的大侄子抬水，洗全家的衣服。

治脖子敷的药叫“千锤膏”。用许多草药合在一起，需放在药臼里舂一千锤才能用。我年轻，当然觉得舂得差不多就行了，父亲的性格顶真极了，他一定要我锤够了数目，盘问我到没到一千下。千锤百炼的中药膏有灵，刚俊的病像很快消退了。在与大女儿共处的这段时间内，父亲意外发现这个姑娘确实已经长大，而且参与了政治活动。谈起来才知道，她已经接近了党，在花菱教书和之后的隐蔽，都是在组织的安排下进行的。沙汀的这一惊喜可不小，看着女儿在读《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一类书，他明白了她是他的骨肉和同志。在她临离开的时候，他向女儿表示，希望她能从事文化工作，并让她把弟弟刚锐叫到睢水来。

他的父爱的外露，在这之前真是太少见了。刚锐读书大不如他的姐姐，小学毕业后几次未考上初中。为了他的出路，沙汀给陈翔鹤写信，托他与李劫人谈谈，能否把刚锐安排到乐山的嘉乐纸厂当徒工，待遇不计。亏得李劫人慷慨相助，本来厂子里不需要新的学工，但格外破例吸收了，来信让孩子马上到成都去。为了刚锐的动身，整治行装，他也大费了心思。

盘缠是拿不出来的，便托一位去成都贩卖鸡蛋的果园技工陈天佑，一路带去。孩子没有一件冬衣，现在又是夏秋之际蚊子咬人最凶的季节，没有帐子是不行的。领他走的陈技工在沙汀家里看了一眼比烂鱼网还要寒酸的蚊帐，爽气他答应垫钱为孩子准备一顶，事情才算解决。

刚锐从此与造纸工业结缘，从乐山纸厂的化验室小工，现在成为灌县一家纸厂的厂长。四十年过去，沙汀还忘不掉他临上路前，眼巴巴说的一句话：

“妈妈，给我炒点油炒饭吃吧……”

（这是你人到中年以后，才会有的想法和做法。家庭贫困到如此程度，在爱恋少妻及她身生的子女的同时，还要兼顾一点前妻生的孩子，你的难处和你的善良，还是能够体会到的。我同意，年轻的时候我做不到）

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抗战的胜利就像从天而降。1945年8月，再闭塞的睢水也很快得到了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街上人们的表现是松了一口气，老百姓脸上泛出的欢乐是有限的。只有知识分子才有不可克制的狂喜举动。他特意买了鞭炮，领着儿子杨礼跑到大门外的河滩上去放。过年似的放得劈劈啦啦，父子俩像两个孩子。

胜利给他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心理的松弛，起码最先的一个月是如此。正值郑慕周的女儿出嫁，他多少年来第一次公开地进城贺喜。这位表妹的夫家是江油第一等的绅士，公公蹇幼樵远近闻名，实力比郑慕周还大，也一样开明。后来才知道，蹇与地下党有着长期的联系。那一次，沙汀大大方方坐了滑竿到江油去，路经绵阳是绕开的，怕打麻烦。他老实做了一回“送亲客”。

可是，这种稍微宽松的时间简直短得可怜。和平谈判，国共决裂，新的内战一触即发。

他从毛泽东赴重庆的智勇举动中，懂得了党避免战祸的姿态。周围的民情他是深知的，再不开化的山民都盼望尽快卸下战争加在他们肩上的沉重负担。为了猜测战火能否再起，人们在茶馆里打着赌，邮政代办所天天有人在等看总是迟到的报纸。就是毛泽东飞抵重庆的消息传出后，睢水场传说已经和平不打仗了，成都放了一天一夜火炮！人们自动聚集起来也学成都放起了爆竹，虚闹了一天。这件事后来刺激沙汀想起了一个人来。

这是秀水一个开碗铺的掌柜，安县上下都认识他。出名的年老而“趋新”。他喜欢读各色的新书，吸取新的知识。国音字母来了，他硬是很快学会（他的孙子当小学国文教员），然后到处宣传它的好处。过年写对子，他想出了新花样，都用国音字母书写。他的儿孙，即便是哑巴、残废的，他都一一让他们学会一样手艺。他有个儿子当了裁缝，还有一个替人代写书信。他信奉这种生活哲学：有一样本事就饿不死人，在人面前就挺得起身。沙汀早就想通过这个老人来写出人们对生命的追求，但创作情绪总不够强烈。现在老人已经逝世，在睢水百姓白白表达了一顿他们对和平的热望后，沙汀突然觉得非写他不可了。

于是，便让老人在追求停止内战的新环境下起死回生，刻画出范老老师的形象。这篇《范老老师》11月写好，越年1月，以《新华日报》大半版的地位连载了两日，发生大的政治影响，这在他的所有小说中还是少有的。这提起了他写应急式作品的热情，但大部分显得粗糙。

当然，写壮丁回乡故事的《还乡记》，他是用细工琢磨的。贫苦农民冯大生一不是探亲，二没有军装、符号，像告化一样，突然回到林擒沟，发现自己的女人金大姐成了保队副徐懒狗的老婆……。这个基本构造他已经想了一年。林擒沟的历史、面貌，就是照刘家沟写的。金大姐这类女人，在睢水、刘家沟比较多见。她们追求幸福的热情，健康柔韧的身坯，都被生活本身糟蹋。长期守空房的孤独，使她们禁不住周围浮浪光棍的引诱，陷入泥潭后又深自悔恨。她们与恶势力结伴，却保持了善良的心地。她们绝决的反抗，几乎只有拼死一法，但终显软弱。许多女人便这样终生喝下自己酿成的苦酒。沙汀不是个擅长描写女性的作家，但他能体味这一类型农妇所遭遇的感情挫折，他同情她们，在金大姐的命运中写出她们复杂的婚姻处境和心理。就如正面写冯永生怎样在忍辱、拚命、告状、狂啸山林和集团斗争之间选择出路的农民一样，都是他面临的新的写作课题。他理解的被平原地区称为“山猴子”的山里农民，他们的驯顺和顽强是同时存在的。

长篇写到第七章，冯大生提了斧头默默地闯进徐懒狗的院坝，要和霸妻的仇人殊死相拼。这时，何其芳一连写来了两三封信，催他去重庆工作。看来事情很急，只得停下《还乡记》的写作，奉命出发。这一次的打断，造成这部长篇文气的前后差别，以至疏密不一。

5月5日，他又一次乘车驶进山城。他在路上的心情是晦暗的。在成都借住在陈翔鹤家。陈的弟弟刚刚遭人暗杀，他临时的床铺放置的堂屋，死者的牌位还未撤去。在这样的房间里联想这场谋杀案的内幕，一夜如何入眠？他还想起艾芜从今年始给睢水的来信，谈到胡风他们办的《希望》、《泥土》两个杂志，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自己近年的小说是“客观主义”，感觉十分恼火。在穷乡僻壤读不到这些刊物，他至今不了解具体的批评内容，只是认为三十年代中期产生的隔阂，今天用“文学理论批评”的面目重新出现了，而且是“缺席裁判”！那种不能“还手”的地位，增加了他的恼怒，所以，一

到重庆中山一路四川省委的驻地，见到何其芳、冯乃超后，便完全忍耐不住了，要其芳提供资料，声明要写反批评文章予以回击。

何、冯两人立即好言劝慰。冯乃超说：“昨晚五时周副主席离开重庆去南京，在谈到文艺界的问题时，还特别嘱咐要讲团结，不要抵销力量了。”

正是出于对周恩来的尊敬，他才把火气压了下去。后来通过住在张家花园的画家卢鸿基，他还见过一次阿垅（S·M）。阿垅穿了一身军装，非常神气，和他的土头土脑恰成对比。沙汀已经读过路翎（冰菱）谈《淘金记》的文章，觉得胡风这批人，用所握的理论条条来硬套自己，主观武断得惊人。作者的主观热情与对社会、人生的拥抱，应当各有各的方式。他这时已能把持得住，也就不会去向阿垅发火了。（关于这场公案要让后人去评说。

“客观主义”这个命题落到你的讽刺作品上，将不动声色的风格曲解了，但他们要求文学树立反映生活本质真实的目标，倒与你并无“本质”区别。除去感情的因素，现在不觉得有些批评击中了你的要害吗？比如说你作品思想力不够，“缺乏着更深的、热情的探求”之类，你看呢？总体评价错误，不等于个别观点全不可取。他们也承认我善于“观察”社会，如果说对“人”开掘不深，左翼文学长期都把“社会”推向前景，塑造人物性格是从社会角度关注的，人的其他侧面不免忽略）

在重庆的当晚，其芳简略地说明让他来的目的。“文协”胜利后依然存在。总会迁上海。请他出山为的是建立重庆分会。第二天晚上，在张家花园坝下孤儿院艾芜的新住地，其芳与他讲得更具体：双十协定实现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如果开“国大”，这里的文艺界由你出面竞选“国大代表”。这是组织的决定。解放后沙汀才知道，这时的其芳已经是四川省委的候补委员。

他又一次住进张家花园。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大部分外籍的文化人都复员离渝。总会秘书梅林已经结婚有了小孩，全家即将去上海。见了沙汀，交了他一笔二、三百元的“复员费”。

沙汀说：“我是四川人，没有复员问题。”

梅林笑道：“不复员，理事会决定也要给你一笔。贫病作家嘛，不病，至少算贫吧。”

他还告诉沙汀，胡风、艾芜他们都领了。钱是从美国援华会拨给“文协”的。为了这笔“美援”，沙汀日后在“文革”中做为美国特务的嫌疑，吃尽了苦头。

克制着熟识的朋友一一离去带来的惆怅，他开始以“文协”总会理事的主人身份，筹组起分会事宜。手下有个姓蒋的青年当助手，经他同意，萧崇素从泸县的一个中学赶来帮助他工作。在他与其芳之间，有王觉做联系人。

1944年沙汀来重庆，以群介绍我在“文协”认识他。

南方局当时的方针，读书、生活、新知等书店出书受压制，就办若干小出版社，取各种名目。以群办了新地、新鲜、自强，都是三联的人管印刷发行。我在新地，出了沙汀的《困兽记》。我写过书评，笔名渥丹。1946年，他再次来渝，我当何其芳助手编《联合特刊》，后改《萌芽》。编辑部最初在三联，四平方米一间屋子。其芳的书信往还，外人找其芳，都经过我，再经《新华日报》的送报人转。沙汀每次找其芳都性急。夏天，一次，他穿灰绸长袍，里面是中式绸汗衣，手拿拷克帽，有点化装的意思，来找我与其芳联系，还问我看他的样子行不行，谨慎而有风趣。

在艾芜家里，其芳已经与他们商定了分会的理事人选。确定了这一向

与文艺界联系不多的沈起予、金满城也加入进来。因为他们既是本地人，社会联系又广。沈是沙汀亲自去请的，还有诗人王亚平等人。第一次筹备会开得顺利，大家选定沈起予任分会总务。分会的房子、家具都是总会留下的，实际上驻分会的理事只有沙汀、艾芜。关于经费，决定邀请京剧、川剧界的熟人开个募捐性质的晚会，用门票节余做分会的基金，主要够支付张家花园的房租就可以了。义演假七星岗宁波会馆举行，请来了金素秋（关肃霜的师傅）的戏班。金唱的是《春秋配》。还有本地的川剧、杂耍节目助兴，倒也挺红火的。

分会牌子打出去以后，这年端午诗人节，在王亚平倡议下，沙汀主持了纪念屈原的集会。《新民晚报》报导这次诗歌朗诵会的新闻，在副题上开了他一个玩笑，叫做“呆头又呆脑，如何写小说”。描述他在主席台上一身土气的穿戴和举止，大体符合实际。说他“土”，是不会像说他“客观主义”那样惹他动气的。

他刚到重庆曾去看望郭沫若。天官府小楼上，书籍都捆扎起来，于立群忙忙碌碌收拾衣物，他们很快要赴沪了。原来“文工会”的领导人物，只留下阳翰笙。到了6月，分会想搞一个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的会，由于政府已明令禁止集会，沙汀与阳翰笙商量后，决定用聚餐名义在中苏友协的旧址召开这个会，由阳来主持。

开会那天，来的人特别的多。北碚没有离渝的文化人来了不少，南温泉向辉学院来了一群，《新华日报》社社长傅钟也到场。会中王亚平几个人朗诵了《海燕之歌》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句子，在这样一个环境读出来，格外有激发感情的力量。会快结束，有几个宪兵突然闯进来察看，一时弄得沙汀很紧张，也增加了一种气氛。

除了代表分会去参加民盟、民建召开的各种会议，接待复员路过重庆的文化人冯至等人，这次集会的成功要算沙汀最得意的事了。

他没有料到，在重庆的工作很快被恶劣的政治形势扼杀。8月，美国马歇尔和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不久，五年前在安县郑慕周家里结识的何薨仁，突然打电话邀他去谈话。抗战胜利，何接受卢作孚聘请，在重庆民生公司任总务处长。

临离安县，他们还见过面。沙汀曾写信把何介绍给“周公馆”的许涤新，何做为统战对象，与党保持良好的关系。沙汀得到电话的当晚，便到民生公司何的办公室去。何薨仁告诉他，当日上午，他代表卢作孚去开了国民党市委、市府、警备司令部联合召集的全市各大企业、公司的秘密会议。主持人警告工厂主、经理们，共产党即将在山城暴动，破坏全市的工业设备和市政设施，要大家提早防备。何薨仁觉得这是政府镇压前的一个信号，所以马上通知他。沙汀明白这件事应即报告省委。南方局迁走后，四川省委是吴玉章、王维舟二人负责，其芳在其中工作。告别何出来后，他连夜到七星岗《新华日报》一个记者站，找到值班记者邵子南（让沙汀看过他写的解放区的中篇），请他通知其芳，明晨务必到张家花园一见。

一夜心里有事，又是无眠。直到其芳早晨赶来，听后，神色严重地匆匆离去，他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重新关上房门睡觉。

问题果然严重。几天后，吴玉章等在宁波会馆宴请各社团、民主党派与工商界人士，沙汀代表文协分会出席。这个会显然是对那个会的“反击”。重庆发生朝天门大火、江北大火两案，捕了許多人。内战已不可避免。8月

底，其芳通知他“撤退”，回故乡隐蔽。同时告诉他，行前要去见吴老一次，听取指示。

远在读省一师的年代就敬仰的这位四川教育界元老，从辛亥到如今始终追求进步、革命的前辈，平日总是那样温文尔雅的。今天，在对他谈了形势、前途后，用坚定的语气，让他经成都找王干青、张秀熟等人，对地方实力派做工作，齐心反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征粮、征兵。最好在成都即要召开的省参议会上捅出去，搞一个决议。吴老挥动着手，激昂地说：

“要它的后方搞个稀巴烂，看它这个内战怎么个打法！”

吴与他谈话中，省委的人员在周围照常忙碌，其芳进出了好几回。最后，吴老的助手大块头的张友渔过来，安排沙汀把一份机密的党内外人士名单捎给刚从雅安迁成都开展工作的漆鲁渔。漆与他认识时间不短了。名单原是用药水暗写在一本书的字行之间的，经他提出自己在旅途从不带任何书籍，张友渔同意改写在空白信笺上。他做这类事，总是自己先万分吃紧，直到几天后想出办法，把其芳次日送来的信纸，一张张包装了郑慕周要他从“补一大药房”买的药水、药丸，心里才稍稍安定些。

这次在重庆，接触最多的还是其芳、艾芜。其芳俨然成为他没有架子的“上司”，一切的省委布置都经他传达给沙汀。他知道其芳用笔名傅履冰同吕荧在《萌芽》上讨论现实主义、客观主义。吕荧自然是胡风的观点。沙汀对理论问题兴趣不大，只是旁观了他们的笔战。他觉得老朋友领会毛泽东和党的文艺思想很深，自己已经写了一部分的《还乡记》，在政治上还弱。冯大生的反抗是自发性的，能不能安插一个长征负伤留下来的红军战士，做为一场打笋子斗争的“后台”呢。他笑着对其芳说，这次回乡要对《还乡记》重新思考一下，关起门来“整风”！

（亏得你以后没有这样写。自发反抗就不深刻？那是因为你没有深入到自发反抗的历史和人物心里去。添加一个政治的背景无济于事。不能坚持自己的创作思想，始终是你的弱点）

艾芜一家住在邵荃麟复员后空出的几间草房里。地点在分会坎下的孤儿院院内。这房子是“文协”总会用西南联大学生捐助湘桂逃难作家的款项购置的。草房样式很讲究，门前带有装了栏杆的回廊，可以摆上桌椅喝茶。但终究年久失修，每逢下大雨，艾芜一家就要在房里撑伞。分会很少开全体理事会，一般都是其芳、艾芜与他商量了便干。临撤离分会的那一天晚上，他到艾芜家来告别。坐在廊子上，天上没有星光，无边的夜把他们笼罩住，周围静寂无声。沙汀看着对面的艾芜。前几个月，他与另一个省一师同学刚聚餐贺过艾的生日。现在又要各奔东西了。他惋惜地想到，如果几年前艾全家去了延安，内战就不会威胁这个老朋友了。那次艾芜一同意去解放区，便经徐冰取得批准。可最后，艾因为以群的一句无心的话，“到了延安，你就不必为生活发愁了”，触动了自尊心，改变了主意。仅仅是为了以群的话吗？他一直没想明白。

艾芜虽是新繁人，家乡是没有他立足之地的。现在他为艾继续留在重庆而担心，首先打破了沉默，絮絮地告诉他省委命自己撤回安县的经过。艾芜似乎在听他讲，也似乎没有听。

他忍不住在说了一大篇后，问他：“你究竟怎么打算嘛？”

艾芜突然低哑地说了一句：“我准备被他们抓起来坐几年牢……”

于是又不声不响，而且直到沙汀把替他安排好的几条退路交待完，紧

急时一找安县郑慕周，二找民生公司何薨仁，他还是一声都不吭。

沙汀在何薨仁陪同下，到北碚何的家里住了几天。目的是甩掉一切跟踪。重庆文艺界知道他又要转移的，只有艾芜一人。艾芜留下，其政治与生活处境的艰难，可以想象得到。1950年他们再见面时，听蕾嘉说，临解放那些日子，艾芜就像关羽秉烛读书待旦一样，坐着不动守家。如果没有进步学生送米，一家人就要饿死了。

在北碚的几天，沙汀遇到熟人林辰，搞电影的徐涛等，都只点个头，并不搭话。用张友渔的信笺包舅父的补药，是何薨仁的主意。他还用组织上发给的路费买了个帆布提包，将药瓶子统统装入。在城里两路口长途汽车站，何薨仁让一个公司伙计先去托运行李，占了座位。他们两人在对面小豆浆铺吃早点，等一摇铃，沙汀迅速登车。

到成都他急着完成省委交托的任务。为了自身安全与任务的“安全”，他没去见李劫人、陈翔鹤，借住在红石柱刘开渠的家里。这是刘为了搞无名英雄像租的房子，间数很多。

雕塑家他早就认识，介绍王朝闻去延安便是由刘从中联络的。周恩来很尊敬刘开渠，曾特意去拜访过。刘专心搞雕像，不大见客。这个住所显得清静。

他很快找到了漆鲁渔，交上了全部已经打皱的信纸，当场验收。漆问了他的近况，提议他到雅安去隐蔽，可以找一个文职工作。但是被他辞谢了。接下来，他在城里孤老院会见了二十年代便认识的王干青。王还是那样精干。他在张澜先生办的著名的慈惠堂作火柴厂厂长。孤老院也是慈惠堂的一部分，院长史鸿仪早就认识。那天王干青的读金陵大学农科的长子王泽丰也在。王马上让儿子去“瓮头春”打头曲，中午父子陪他吃瓮头酒。他谈起反双征的事，王干青立刻表示赞成。王一边吃饭一边谈张澜（表方）。沙汀想起上次由重庆返乡，为了疏散外籍文化人，在这里曾特意拜访过这位保路同志会的元老、民盟的领袖。老人头戴旧式瓜皮帽，说话简短，思想跟得上潮流。谈起疏散，立即朗朗表态：“这是我们应尽的地主之谊嘛！”一句话便结束了问题。不久前，沙汀看到成都纪念李公朴、闻一多的追悼会报导，知道他主持会场，特务扔墨水瓶，击伤他额头，医生从他头上取下玻璃碴，他从容不迫地耻笑“鼠辈太可怜了”。现在，听王干青讲起张先生的极度简朴的生活，一碗米汤，一根油条的早餐，在内心里更钦佩他的人格、风度。

吃完饭，王干青领他到羊市街一家旅馆探望张秀熟。这也是听王的介绍，才知道老师是平武县选出来的省参议员，正来开会。进了张的房间，只见他光着上身抹汗擦背，光景是刚赶路回来，健壮得令人羡慕。沙汀知道老师的脾气，听完吴玉章的意见后不会像王干青样一口承诺的，总要刨根问底地打听清楚，但答应实行的态度却是毫不含糊的。张还举出一些进步参议员的名字，建议王干青与他们联系，共同提出提案。这里包括中江县参议员林海波，沙汀介绍入党的一名退伍军官。后来他去一个会馆探问过他。沙汀轻松地离开旅馆，走在街上，王干青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你看张秀熟那一脸膘呵！”

他有点不好与别人谈论老师，故意叉开道：“你要注意一下子，不要太暴露了！”

王满不在乎，接口说：“怕啥子？我现在是给别人看火柴摊摊嘛！”

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脱党后没有恢复党籍，身份上不怕敌人加害。他

生性不知躲避，和沙汀性格不同。解放前夕，终于牺牲在成都十二桥头！

当他听说省参议会果然通过了不继续征粮、征丁的建议，已是回到睢水好久了。内战的揭幕，不能不波及到安县的政治生活。他一回来，县政府追查他踪迹的公文就下到睢水乡。

为了把《还乡记》续写下去，他向舅父和袁寿山提出，这次不往离县城更远的大山里钻了，反而要住到较近的秀水镇，住到街上。

秀水是他少年时代跟舅父“跑滩”最熟悉的地方，属于郑慕周的发祥之地。有名的曹二爸曹朴斋，年事已高，他的弟弟曹泽珊仍然统制这一带的哥老，又是一乡之长。有了曹家的事先引荐，老友马之祥在一天的黄昏，领着他从向履丰家吃完饭出来，到锅厂街谭海洲的家里“避相”。

谭海洲是我的隔房兄弟。他开的谭家锅厂，每年上（春）下（秋）两季造锅，每季最多一百天。沙汀冬天到这里住，正是厂闲的时候。这里现在是安县最大的农机厂，当年厂区没有这么大，可谭家的住屋更小，在厂子边边上，背街的地方。原来的大门对着一口龙王井，这井还在。一座木楼在最里面。谭海洲的母亲谭家婶娘在楼上供观音，摆了佛堂，楼下是沙汀住过的屋子。谭海洲的岁数已经不小，讨了两三个老婆。每天跑到后面院子来，让年幼的孩子用镊子把自己胡子一根一根拔掉，借以取乐。他又是袍哥大爷，又是青红帮，在本乡本土自信没有什么地方是他的意志达不到的。由于郑慕周、曹氏兄弟的关系，对沙汀自然十分客气。原来说定回避一切客人，让沙汀单独食宿，但有一天未经打招呼，突然把一个成都来的陌生人带进这个楼下，堂皇地介绍，弄得一块儿吃饭时沙汀忐忑不安。后来知道此人是进松茂山区做鸦片生意的，不免埋怨主人几句。可谭某说：“这些人都是我们兄弟伙的，我能在家招待的客人，绝没人会出卖你！”

此后，谭确实再没为他招引过生客。9月到11月，沙汀足不出户，加快了《还乡记》的写作。冯大生提了斧头进了徐懒狗的院子，两方面的矛盾急速展开，沙汀最后放弃了让一个红军伤员引导冯大生的设想。他曾经认为这是政治鲜明的一笔，在实际处理时，一方面他写不了不熟悉的长征战士，一方面越来越觉得安县农民更多的是忍受，有组织的自觉反抗是太玄虚了。打下笋子归所谓合作社，只要答应给他们留下十斤，农民们就马上妥协，这是真相，他只能按真相去写。

他对安插冯么爸的形象，兴趣大增。这个宁愿逃到山里野生野长，也不愿为乡公所无偿搬木料的老汉，已经是本地农民反抗的极致了。让他在冯大生每次斗争的关口，跳荡到侄孙的面前，是沙汀故意的插笔。徐懒狗的后台保长罗懒王，有袁寿山外甥萧文虎的影子。罗的父亲罗敦五是按睢水的一个怪人雍志禹虚构的。雍志禹当过老巡防军，当过乡长，笃信耶稣。他是睢水的在野派，与袁寿山有矛盾，对当地许多事情看不惯。他弄果园、养奶牛，种当地少有的蕃茄，对烟、赌反感。他甚至能够接生，接难产，还教别人接生。但他是地主，改良了种子，租佃出去的地，产量高了，他就仔细察看庄稼，加租。解放后做为恶霸被枪决。执刑时，别人哭哭啼啼，他不哭。做为一个人，他的性格还是很有特点的。在《还乡记》里，沙汀取了他的狡猾、动软刀子对付农民的一面，写出一个罗敦五。后来在一篇叫《怀旧》的短篇里，取了他的奇崛、与当权者闹别扭的一面，写成一个钟敖（所以小说又名《钟敖》）。

小说又进入三四天写成一章的速度。谭海洲让他的小儿子谭洪光每日

送饭给他单吃。写作困乏了，他就溜到后面的厂区散步。过了倒锅季节的厂房，空旷无人，像个蛰伏的怪兽。

从《还乡记》激烈的纷争中摆脱不开的作者，对着这个怪物，总觉得它会突然跳起扑过来。

他想念起山区，想念起刘家沟、苦竹庵来。困在谭家锅厂昏暗小屋的他，像个真正的囚犯。在山里至少可以上山入林地呼吸一点空气。到了这年11月底，他完成长篇的全部初稿，便急不可耐地告诉玉颀，他要回家。

一个初冬的日落时分，王大娘的儿子王大生来接他回去。天擦黑动身，不走大路挑山道。王大生在前面，扁担上挂着他的用物，一荡一荡的。王大生是个中等身材，骨骼宽大的男子。如果在白天看，他面部黧黑，浓眉深眼，赤足套一双草鞋，很腼腆，也很英武。

现在沙汀听着几步之远传来嚓嚓的步履声，感到一个健壮的青年农民、青年兵士用力踩地传出的震音，短促，有劲。这就是他的冯大生，他右臂夹着的包袱鼓鼓装着的长篇稿子里的一个活生生的主人公啊。他虽然还不能探究到冯大生、王大生心底的全部奥秘，《还乡记》在指向社会时趋向简单，在转到刻画冯大生、金大姐的矛盾心理和农民式的表现时，还是具有了深意。他觉得前面疾行的这个农民与自己的亲切联系，就连他的走路方式也是亲切的。他生平喜欢走快路，直直地摆动双臂，像离弦的箭，冲破茫茫无垠的夜色，多么惬意！

生与死，“第六病室”的终结

三年，一个长长的梦魇。在梦里总有人在背后追赶。四川省政府1947年对他下通缉令：“缉拿归案，就地正法，以烟匪报闻”。四川省保安司令部1947年发出的通令：说他“飘忽于康定、川西北一带，假借亲戚之掩护，准备在安县睢水一带建立根据地”。

同是这个保安司令部，1948年编发的《一周匪情综合通报》云：“奸匪杨子青，即沙汀”，“近在睢水活动”。他跑到哪里，哪里都有一对凶恶的眼睛。

住在苦竹庵，1947年收到大哥来信，说绵阳专署的专员冯均逸，近日让新店子的吴季宣转告舅舅，大意是你外甥本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困兽记》写糟了，宣传了“反动思想”。只要去绵阳一次，把事情说说清楚就成了。大哥信中要他“注意”，并问如何回答吴季宣。他让玉颀写了一信，说子青走了，不知去向。

萧业贵的苦竹庵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从睢水家出门溜上河坎，或者经红石滩、邓家碾房绕个大圈子，进入山窝，到萧家避些日子。

1948年他大病一场，险些丧命。身子还没有恢复，追赶的“鞭子”又到了苦竹庵。

一天，萧业贵转达袁寿山的话，约他去睢水萧文虎乡长家商谈事情，

中间千万不要拐回自己的家。他觉得蹊跷，当晚夜黑风高，他提了一个火筲子，深一脚浅一脚地摸上了街。

进了萧家门，只见袁、萧、乡队副简毅、中心校校长刘学超都在。年轻的校长还有心思说趣话：“咋个脸上灰白白的？”

“你还不知道？恐怕霉得起冬瓜灰喽！”

他貌似解嘲地苦笑。袁寿山清清喉咙，说乡公所得了县府指令，既然累次声称杨子青不在睢水，乡里就得担保“具结”，将来查获不实，愿受处罚。他不得已只好“具结”。

这群人虽力言此事只是为了加倍小心，沙汀已听出话外之音，有将他推送出乡的意思，便当场表示愿意“转移”。随即第二天便由简毅领他步行到距县城一百里，地处安县、绵竹、罗江三县交界的永兴熊仁卿家去。后来又接连转过两处地方。

听不到千里之外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内战的炮火声，他却在故乡土地上这样转来转去。

拖着满身的病痛，带着没有写完的小说的种种构想和对亲人的思念。

他知道契诃夫有一部小说叫《第六病室》，年轻的列宁读完它，竟感到自己也被关在这间病室里。整个沙皇俄罗斯当时便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

沙汀抗战以来辗转在故乡各个山沟，每每想起这本书的名字。

一年年，孤独侵蚀他的心，比恐怖更可怕。有时，他觉得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他曾经起意想写一本书，专记这几年读书、写作、生活的思考片断，就取名为《第六病室札记》。

如果这本书能写出，将是他最困难时期的心境的一次大披露。但是他没有写。痛苦以至无言。

有几封保存下来的信，能透出其中的几丝心曲。1946年3月27日致巴金：“局势日非，家庭负担日重，我也许永远要做乡下人了”。

1947年7月7日致巴金：“我近一两月的情形，颇为不佳，穷病，以及其他，逼得人情绪很坏”，“本年生活特别艰窘”。“我的病，依旧是胃神经痉挛，似乎较前尤甚。为保护老本钱，暂时决定休息数月，再事写作”。

1947年8月3日还是致巴金：“心绪却很沉闷，有时且几乎近于麻痹！”“内人又将分娩”。

沉重的家庭负担加重了他的精神困境。他不断地给巴金、以群、艾芜去信。在茅盾所编的一套长篇丛书停编后，将《还乡记》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催促尽快出书，查询版税，成了这些信件的“主旋律”。如果再不弄点稿费，怎样养活那即将出生的第六个孩子呢？

写作成了“抒愤懑”和“谋稻粱”的两面夹攻。本来《还乡记》完成后，他身心疲惫到极点，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结果仍是不得安宁，接着又写了《李虾扒》、《生日》。在睢水，全国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成了中心小学教师在预备室里的热门话题。正巧，玉颀告诉他，自己一个在重庆读大学的学生，为了躲避逮捕，经过这里去故乡茂县，顺路来看老师，这天讲了许多城市见闻：金融紊乱，贫民抢米事件频繁发生，宪兵特务按黑名单搜捕进步人士……。

沙汀听了觉得很刺激。一般说，他对于社会新闻有特别的敏感。靳以前几天来信为上海《大公报》副刊约稿，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可写的东西。只是间接听来，意犹未尽，便求玉颀把学生找到家来谈话。他事先提出发问的

提纲，让玉颀自自然然地与青年人随意交谈，自己躲到板壁那面的屋子谛听。结果这次有意的调查分外成功，他听到更多省内学界和市面的动态，取得实感。

当他赶回苦竹庵去构思新作，如有神助，两年前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刘青年男女在成都“少城公园”遭抢劫的消息，和他当时已把它“改造”成在公园进行革命联系的故事残片，突然一齐涌上心头。他把人物活动舞台从重庆挪到成都祠堂街一带，想象男女学生李涛、王南借来当路费的钱因为都是百元小票，才把手提包撑得鼓胀。当公园里的抢劫者陡然跑散，他俩在极度惊吓中刚刚明白是遇到了“强盗”，不是“特务”，反而嘻开嘴欢呼时，喜剧的意味产生。他知道，一篇新作快成了。他急忙把散发着热气的构想搬到纸面上去，笔下来得很快。只剩下最紧要的结尾处理了，家里让上街的萧业贵捎来口信：玉颀生产就在这一两天了，赶快回睢水来！

哪一次生孩子也没有这次透出紧张，而且当丈夫的必须到场。物价飞涨，即便在偏僻的乡场，请一个“稳婆”来接产，也需老老实实付一老斗米。这笔费用对于沙汀家已经算得上是“糜费”。他与本乡雍志禹交往当中，听他详细讲述过接生的知识，包括难产处置的手段，他自信已经有把握。征求玉颀的意见，她红着脸也同意了，只是希望王大娘帮着“掩护”一下。这样，他们早就商量好，这次要省掉一切开销，由他亲自替妻子接生。

产房里有点闷气。还是原来那间卧室，却显得与平时有些异样。整个山村静悄悄的，夜已很深。王大娘准备好了热水、洗盆、包婴儿的布和小被褥。玉颀开始呻吟。呻吟声使他内愧。一个负责的男人，在这个时刻总会感到内愧：一件两个人做的事现在只由一个人来受苦承当。

产妇临盆。引着婴孩脱离母体的一刹那，他的恐慌情绪一下子平复了。他觉得他的手稳当多了。看着这个通红发皱的裸体，一个漂亮的男婴，经他的手引导出来的新生命，一种生的庄严感全然控制了他。是的，生是自然的，不可抗拒的，虽然如此艰难，如此曲折，不可捉摸，但新的更加美丽的生命还是要降临人间。

把小儿子（刚宜）交给王大娘，看玉颀疲倦地睡去，他被这次顺顺当当的引产激得十分兴奋，竟丝毫没有睡意。他走到另外一间屋子里，找出《意外》的未完成稿，坐到桌边，只觉得脑子灵醒，文思豁通，便提笔疾书起来。这时候，已是1947年11月13日的凌晨。他一鼓作气写完了《意外》最后一千多字，给它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不觉中，天已大亮。推开面前煞尾的稿子，他舒畅地靠到椅背上，仿佛见到门外河边一片散漫的早上的雾气。在初出的太阳的照耀下，远处的一片草地闪闪泛光，像被烧着了似的。他听到市上碗盏的叮咛，茶客的寒暄，睡眼惺忪的少年赶了牛劈里啪拉走过。场镇上空升腾起生的旋律。

（生命的第一要义是自由，你在半囚禁生活的窒息下，也会有跃动的生命之感？生命的本质之一是创造。在睢水我不能体验到完整的生命，正因为如此，“片面”的体验才更强烈，写作的生命燃烧得更旺。四十年后我与巴金讨论过，他说“活着就是要工作”。可能这是我们这些人坚持的老派观念）

没有料到，不到一年，他又体验到死。

他过去住在苦竹庵，早晚总要爬山逛田坝。可是转到1948年，他的胃病日见严重，经常发作，出一次大门都不容易，写作差不多已经停顿。

家里的贫困状况，从这年中秋节前玉颀替丈夫复巴金的一封信里清晰可见：蒂甘先生：8月12日手示奉到，前次收到那七百万时，曾复一函，想来已收到了。这次的乙千万元，也于本日由渝汇来。二小儿正待筹措入学的用度，这笔钱给我们的助力真是不小。你说，若有急需，万一9月10号前帐算不出，你还可以设法再汇点来。其实最近三四月来，我们几乎无时不在闹穷，只因我们知道目前出版界的困难情形，不好一开口就说钱。最近承你关心，未经要求，便一再设法帮忙，心里的激动真是难以形容！因为今年以来太穷，又时常感觉孤单无助。总之，我十分感谢你的关怀，若果书店不过份为难，当然希望秋节前能再有一笔钱来。币制改革后，三天中物价打了个滚，七百多万才能买一老斗米了！愈来生活愈紧，这日子怎么过？短篇集赠书，请全部寄成都华西大学广益宿舍袁稚林收。匆此敬复，即叩文安！

黄玉颀拜复

（1948年）8月26日可是这一年他们注定不能团团圆圆过节。中秋前夕，他的病终于来了一次总爆发。

他还是一个人住苦竹庵萧家。睡在萧业贵弟弟屋里，借萧母厨房的大方桌写字，与萧业贵夫妇搭伙吃饭。他最喜欢吃萧妻用包谷（玉米）做的“扑水蒸蒸”。类似北方玉米饼子，但不是在锅沿贴成，而是将包谷面均匀撒入滚开的水中，用竹棍调成粥状，然后加盖，适时撤火，就会有焦黄的锅巴，吃起来很香的。

这天晚饭，他正有滋有味地细嚼扑水蒸蒸，突然觉得胸中一阵搅动，比任何一次胃疼都厉害。他喊一声“心里痛”，跑回房间躺下，便大吐不止，并不知吐的是什么东西。“完啦”，这个念头一闪，天旋地转，人已昏迷不醒。

萧一家围在他床边。还是萧母有经验，见他吐出的是三坨硬血，连忙让儿媳把血块捡起放在瓦片上，用微火烤脆，研成粉末，灌他吃下。这是民间的土方，认为可以生血止血。当晚萧业贵去睢水报信儿，大家闹了一宿，不管如何，他确实没再吐血了。

第二天早晨，萧业贵兄弟俩用滑竿把沙汀抬到睢水，找萧文虎的父亲萧懋森按脉。萧老先生是个不挂牌的“业余”郎中，医道精良。吃了他开的药方，病情似得到控制。郑慕周派人来说，要送他去成都动胃溃疡手术，已经让老友陈序宾医师代为安排一切。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终于未成行。郑又送来二两西洋参，让他就地诊治调养。

半个月后，玉颀到苦竹庵探他，送来一罐嫩藕猪肺汤。他斜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端着汤罐用勺子吃了几口，揩揩汗冲妻子笑了笑。他的舌头能觉出这比萧家给他炖的花生稀粥有味，只是身子还很虚脱。这一天他无法忘记。自1941年他有睢水周围的乡镇隐蔽，七年来，这是与玉颀第一次在避难所相聚。她有上海地下活动的经验，生怕随便走动会暴露他的行止。王大娘和她的儿子王大生，在胜利后已经回河清乡重整家园了。岳母的年事渐高，不像以往那样能张罗。玉颀一身挑家务、教务双重的担子，够沉重的了。

这次，娇弱的妻子相信藕肺止血的功用，扔下奶娃，亲自送来。如果不是病为媒，还很难想象她会来呢。人生就是这样，祸福好坏往往倒错。

面对死亡，他有过惊慌，他不是那种淡泊到底的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死神是可以随时降临的。

死是对“第六病室”的解脱，同时也是对写作、书籍、故乡、亲人的永远告别。此时此地，玉颀从他微微涨红的瘦削脸庞上所能“读”到的，便

是对生与爱的留恋。最具特色的生命之药，是家乡的一剂“回龙汤”，即童便。他过去听说童尿内含有石灰质，产妇吃它可以打下积淤的血水，修补破裂的血管，没有想到它的止血功用如此广大。好在这付方子不需要任何“破费”，居停主人萧业贵家里便有一个现成的六岁男孩，足可“就近取材”，每天喝它两大碗。第一次喝下这名声赫赫的东西，一股腥咸的气味冲得他差一点呕出来。可是一天天喝下去，也就习惯了。他一直坚持服用了近两个月，居然意外地脱离了险境。

（在毫无医疗保健的条件下，你面对死亡，表现了生之顽强。老年的你，给人的印象是对生非常小心翼翼，可看不出多少“英勇”气质。我从来也没有英勇过，我对死的理解，便是要争取生。每个人都是按照他对生的理解，在选择自己认为最适合的死的方式，如果他能选择）

这段时间，玉颀和他不断发信向外界呼救。艾芜回信最快、最多，他拖了一大家口人自顾不暇，但还是寄来了一百元。法币废除，金元券刚使用便同坐飞机一样贬值，艾芜在信中叹息，姑且用来买几个鸡蛋吃吧。

凤子寄了五十元。王西彦穷得劫劫响，也救济不了朋友，便写了封长长的信来打气，称赞沙汀这几年的创作丰收。可惜“丰收”换不来谷米。蒋牧良令人感动，他俩只在鲁迅丧礼上见过一面，他自己分文皆无，却动员了一位电影戏剧界完全不相识的编导寄赠了一笔钱。

后来，以群的“新地”汇来一点版税。上海的“文协”总会闻讯后，曾汇款救济。特别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巴金的催促下，把《还乡记》等预支的一大笔版税寄到睢水，这才有了药费、营养费，偿还了一部分债务。四面八方涌来的友情使他对生充满了信念。

等到稍有好转，能下地走走路了，便遇上“水涨”。就是前面说过的睢水乡公所向县府“具结”，以担保沙汀不在本地。他第二天，在简毅的陪同下，抱病长途跋涉到永兴避祸。

这时是1948年11月。

他认识简毅已有四五年。这是一个趣人。早年入过共青团，但很快退了。红军经过川北后，他被当作“乱党”逮捕，终止了在成都的学业。回到安县县城，整天以拉京戏胡琴自娱。他有一台旧留声机和一些上海百代公司的京剧唱片，就凭着这个，自拉自唱，倒也渐渐有了相当的水平。

睢水的乡长萧文虎正热心此道，便拉了简毅来睢水安家落户，挂上乡队副的职衔，并在中心小学代课。这个乡队副实在滑稽，他还是一天到晚教人唱戏打锣，并不懂得如何搜刮百姓。与沙汀讲起时势，头脑不糊涂。对本乡袁、萧的寡头政治，粮役上的弊端，时常加以透露。沙汀对睢水社会内幕的了解，一部分得之于他，这是与未来的《红石滩》有关的。

他跟在简毅身后，脚步已经空虚不稳。他的打扮好怪：头上戴顶用“博子帽”改造成的“毡窝”，加一根山民用的青布帕子绕头，遮住半个眼睛，脖子上一条毛线围巾把下颏挡住，拄一根竹棍。因为睢水场的轿夫张驼子被人召去抬新娘，大病初愈的他只好步行经拱星、河清，往永兴熊仁卿家去。

苦竹庵到河清五十里。挣扎着走进简毅堂姐家，一头坐下就不能动弹了。所幸简毅在将散的场口碰上熊仁卿，雇到两副滑竿，吃罢午饭，便与简分手，黄昏时到达永兴。

河清是他老家，二十年代当县教育局长期间去察看过几次。永兴却是第一次来，认识的人只有熊仁卿。熊入过他的家塾，算是同学。多年前，永

兴的掌权人物看中了熊的“笔杆子”，青年时代被招纳，现在成为一乡之长。熊身材魁伟，强壮，一看就是那种文的武的粗的细的都来得的人。他的家在永兴场一里地外的梓潼宫，院坝宽敞，住房、门堂、围墙都不讲究，主人的心思显然没有全部放在上面。

熊每天不落屋，回来与老同学谈起战争，时常故意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不然，就磨研他弄来的一块据说是真正的“虎骨”，吃着各种可疑的“补”药。

他的老婆是邻县一家财主的闺女。被他用骗婚、抢亲的手段搞到，现在却扔在一边，让她陪着烟灯和盲眼的儿子，在悲悲戚戚的回忆与哀怨中讨生活。她的价值只是婚前可以预见的陪嫁和昔日的青春美貌。听她一再讲自己的身世，到第二次、第二次，沙汀就忍受不住屋子里这种阴凄凄的坟墓气味了。他避到梓潼宫，找主持和尚谈天气和佛学，引得这个只会念“观音经”的人的尊重，后来甚至介绍了一位盲人来谈佛理。

在苦竹庵的病床上，他读过一点能到手的《六祖坛经》、《难经》的书。可能是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徘徊，觉得玄妙的经学很引人入胜。单是那文词之美就够他欣赏的。他能观察与描写社会的争斗，但是骨子里，他对平和静谧的农村生活的向往，很容易与寺院的气氛合拍。

永兴梓潼宫这个“病室”只住了半个多月，熊仁卿告诉他，省保安司令部严密缉拿他的命令下来了。商量后将他转移到熊手下一个保队长的家，离永兴五里地更其偏僻的邹家抱房。这个姓邹的袍哥是五排，三十上下，短小精干。此人父亲在民国年间是大袍哥、大土匪，译名“金毛辫”，杀人如麻。后来被地方军捕杀了。

邹家的院子比熊仁卿的大三四倍，四面靠墙均是平房，中间的晒场足有网球场那么大。

这是刚抱出的小鸭儿的饲养、活动场地。这个院落最奇特之处，是到处安设门户。大门，后门，左右两面围墙上各开有两三道门。当初是为“水涨”的时候，“金毛辫”的人马从哪儿都可以跑得出去。放鸭子的伙计进出也方便。

沙汀住进这样大而无当的房子，听邹母念叨他家往日的“光荣”，感叹今日的式微。他在这里住了四个月，听老太太诉说了四个月的邹家抱房兴衰史。因为只有极有权势的人，才敢开抱房。孵出的鸭子放给赶浮鸭的人，没有哪个码头敢欺负。成百上千只半斤重的鸭儿，一根竹竿赶着过乡踏县，不花饲料，随处赶进刚收割过或还没割过的稻田，拣谷子吃。等它们丫丫地磨蹭到成都，已经够了份量，大了，肥了，成为市面上的水盆鸭子、烧腊鸭子。一路放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邹家大爷的面子。不然，鸭子会被人捉得净光，连根鸭毛你都剩不下。沙汀想，这放鸭儿真是一篇绝好的社会小说材料。

不过这里也不宜长久养病。一个保队长的家，来往杂人很多。姓邹的成天在街上“打滚龙”，游荡吃喝搞女人，就和《困兽记》里的徐懒狗一模一样。能与沙汀说得上话的，也是一个中学生，保队长的弟弟。同谢象仪的小儿子谢荣茂、袁寿山的儿子袁琳差不多。四十年代的中学生在两次战争中长大，他们对上一代人的生活明显表示不满，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所以，他们在解放后很快跨入新生活。保队长弟弟经他介绍，后来成为地质工作者，而袁寿山与这位保队长，却并不能因“保护”过他而立地成佛。

1949的春节，他在邹家抱房度过。即便看不到任何报纸，只从周围老百

姓每次赶场带回的“议论”，也能了解解放战争的过程了。

“嗨，听说蒋委员长都自己下台啦！”

“！银元券也跟一向的金元券样，只有拿来揩屁股喽！”

“今天场上米来了好多？一斗涨到多少了呵？”

现存社会露出了所有的败象。他感到在这样的时候，这样闭塞的地方，实在呆不下去，便捎信儿给玉颀，问能不能住到离睢水近一些的地方。4月开春，玉颀让睢水小学的校工杨志远去接他。他像个被大人允许上街玩耍的孩子，急不可耐地走出邹家“病院”。

在睢水，大家都称他杨老师。他在永兴，化名叫“王先生”……那次我去接他，中午到邹述才家，午饭后两人上路，专挑小路走。到红牌楼已经行了四十五里，距睢水还有一半。

我建议留宿，他不同意，硬要走夜路。到旁边农家要了一个火把探路，沿着大河边高一步低一步，又走了三个多小时，深更半夜摸到家里，才说吃饭的事，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仗着玉颀和睢水小学所有的旧报纸，他消除了半年来对外界的隔膜。形势发展比预料得还快，北方的几场大战役都打完了，半个中国已经光明，黑暗正在退缩。翻阅一通《新新新闻》，他被一则私人启事吸引住。启事的大意是：鄙人年老力衰，已经多年未当公事，更从不过问政治，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民主同盟。现任县参议员一职，近日已呈请免去，以另举贤能云云。

他读后大笑，似乎许久没有这样开怀笑过。他觉得一下子捉摸到这些小头面人物眼前的政治困境，以及他们拙劣的“应变”本领。他久久思考这一新的社会动态和社会心理，《炮手》的故事霍然而生。吐血以来，他许久没有动笔了。这个短篇引出整整一组“蒋管区生活实录”的小说，都是以后在板栗园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的。这是临解放前一次按捺不住的写作高潮。

吴瑞卿家是舅父把他硬逼去的。他有点恋家。从永兴回来，岳母大大施展她的烹调技艺，为他调补亏损的身子。看着玉颀和身边的三个孩子（杨礼已去县城读初中），他真不想离开。可郑慕周一听说他返回睢水，马上催他下乡。凭郑的经验，深知越认为是最安全的时候，很可能正是最不安全的时候。

正是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看到那张报纸，他说了一句“总算等到了”。帽子落在柴灶的灰窑里烧着，也没知觉。几天后吴瑞卿乘赶场的机会，亲来把他接走。

十年避难所遇的各色居停主人里，吴瑞卿是唯一的非权势者。这是一个贫苦的小学教员，四十岁左右，做过刻字匠，性格质朴，与沙汀一家都熟。他住的地方与绵竹拱星连界。

一个小院子，正面是三间瓦房，另砌一间草屋，是厨房兼饭堂，白纸糊的大窗户可以推开，显得明亮，这是吴自己设计的。最惹眼的是沿院篱笆空地一侧长了十几株峭拔茂盛的老栗子树，向天上挺着生气盎然的枝娅。远近的人给吴家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板栗园。到了深秋，一斗板栗可以换五六斗米，甚至还换过一石米呢。

1949年5月11日晚上，我丈夫领来一位带行李的客人，让我叫他“杨老师”，对外不要多说。当晚杨住在紧连南房的一间破旧柴屋里。柴屋没有窗子，用木板当门，柴草扒在一边安床。一面是靠南房的土墙，三面

用竹片夹起。冬天在这里过夜是冷的，但好处是能在紧要的时候，撞开竹篱墙跑进不远的山里。

他生活简单，一般不外出，只饭后在院里散步活动。我有时数了数，至少要走十六个圈。然后进柴屋写字。晚上，不是与我丈夫摆谈，就是在菜油灯下读书写字，半夜熄灯。

杨老师刚来我家，面黄肌瘦，说话无力。听说他吐血不久。我每逢场都去绵竹巩兴买些鸡蛋，每次都是他付钱，很客气的。买到蛋后，清早给他煮两个白水蛋。晚上吃玉米糊糊，有时煮蛋面。吴一家善良、古朴。除了妻子，五岁的女儿，还有寡嫂和么哥住在一起。这个么哥是个鳏夫，五十岁了，身子结实，罗圈腿，脑袋后面留着一节细毛辫子。他好象很憨，说话没来由似的。可有一天，他顶着烈日出门锄地，突然停下来用一个手掌遮住额头，仰头笑呵呵地喊一句：“呵哟！这么大的太阳，要是往肚皮上一爬，那不汗水直淌了！”

寡嫂、吴妻和正在散步的沙汀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

他们家里把头伸出世外桃源的只有吴瑞卿一人。吴每天出门教书，都带点新消息回来。

有时去睢水中心校，还会把玉颀给的报纸带来。这对于沙汀的健康极为有益，使他能与急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天天接触，免去不少似乎被社会抛弃的困扰。

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已经迅速向西南各省推进。经常有人来求吴代写书信，听到农民各种对战争的反应。吴有段时间帮袁寿山他们写票据，睢水统治层倒卖粮谷、做鸦片生意，以及崩溃前忙于遮掩的内幕，他都对沙汀讲过。11月以后，沙汀写作情绪高涨，躺在柴门前的躺椅上思索，然后在一条长板凳上写起“实录”小说，进展奇快。

《炮手》是在睢水便开始想的。《医生》是听说的一个传闻：一个医生把金圆券剪来摊了膏药。凭他接触过的乡村草医设计人物，在袁寿山炮楼上给自己治过疮的拱星姓王的医生浮现出来。起初他想这个人应是善良、节俭的，但节俭与剪金圆券似不统一，才注意突出他的耿直。在四川的地方性格中最多这一类人。赶场农民见面就问今天涨了好多，米价好多，银元好多，没有人再认纸币了。他决计把这些感受写进这个奇特的医生故事中。

礼儿的中学放寒假，吴瑞卿暗地引他来见父亲。两爷子用被子围住面对面坐在床上，像朋友一样谈话。十三四岁的少年知道不少社会新闻，“二五减租”本来就是欺骗，山区的地主还要玩各种花样。这促成他写《退佃》、《减租》。写好读给吴瑞卿听，征求他的看法。

这些短篇都较粗糙，是在十分振奋的心情下急就的。他的政治理想，如今很快将变为现实，快得令人眩目，缺乏思想准备。在两个政党殊死较量的重大历史时刻，想到自己不能和朋友们站在一起，却处于中心漩涡之外，成了局外人，这使他内疚。杨礼那次来住一晚，讲起刚俊曾潜来睢水，说组织上考虑安排他去香港转华北解放区，可惜没有联系上。那么，除了用这支笔，他还能做什么呢？

几乎在一种赎罪补过的心理驱策下，他一反多年应报刊相约才写稿的习惯，根本不考虑能不能发表，来不及推敲词语，也不顾题旨有多么重复，写了一篇又一篇。只有写作能安抚他起伏的心潮。

作为冷眼旁观者，他有机会考察泰山压顶下蝼蚁四下逃散的特别景象。

尤其注意大小统治者欺骗人民，掩盖自己丑行的“奇观”。类似一年前写的《选灾》的故事，在安县久演不衰。带起武装，在枪口下让你投票，被人们戏称为“炮选”。他记下好几则这样把“民主”赐给老百姓的材料：大选来了。乡公所每天传锣，召集选民投票。虽然大多数毫不发生兴趣，可是这个并无阻碍，保长们乐得清清静静填票，写上极占势力的候选人。但某一保，因为保长懦弱无能，又有人在为第一候选者活动，他不敢随便填票，怕人检举，而他能做的，只有经常找人传锣，但依旧很少人去。最后日期满了，他也只好在两派监视下每人填一半票。（一则）

随处都是揽载选民的汽车，但多少都怕坐。于是骂了：“又不是送你上杀场啦！”接着更四处拉人，而一个青年人被抓上车了。那母亲也恰在一道，于是哭闹起来，因为她以为是拉兵。（二则）

《酒后》，是从苦竹庵得来的印象。萧业贵的父亲对战事发展很不安。此地的保长四十岁、五十岁做生，农民都要送礼，送对子。满堂张挂，以为荣耀。有的挂上几年，积满灰尘也不收走。那些天沙汀见萧父在归拢这些东西，便问他。老头说周围许多人都在收箱啦。这些人像鸵鸟一样，以为把脑袋埋在沙子里面别人就看不见了。

再发展下去就更稀奇了。山里的粮户纷纷经过睢水向平原逃难。街上的溃兵越来越多，见到能吃的东西，烧饼、凉粉、豆腐、豆渣，抓到什么就往嘴里塞。他们已经凶不起来，简直可怜了。只要农民肯给他们一套粗布便装，他们便会把军服、军毯、步枪，甚至美式手提机关枪都换给你。

简毅从玉颀那里知道了他在板栗园的住所，跑来告诉消息：一个叫宋达的地下党员（后来知道是脱党分子），组成北支队，自任政委，在安县北部永安一带活动。让他转告沙汀离开西南乡到他们那边去，宋可派武装接送。可仔细一问，这支队伍混杂得不象样子。队长刘丕承，国大代表、军统分子，是郑慕周的对头刘世荣的侄子。刘世荣是郑杀掉的陈红蓉的搭档。安县新贵刘桢品，中统特务小头目。与宋达打得火热。听到这几个人，他马上一口回绝了。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各种人物都会出来登场。他决定静观待变，迎接自己的人。1949年年底，先是12月21日绵阳解放。25日傍晚，安县旧县长李淑尧贴出布告，听候接收，自行停职。这张布告贴在旧衙门照壁上，天色已黑，竟无一人理会。半夜，公园钟声震响，锣鼓齐鸣，市民们从梦中惊醒，跑到体育场一看，矮胖胖的宋达与刘桢品手中展开一面大红旗，中央缀着五颗金星，在台上哇啦哇啦，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群众又见北支队举火炬游行，县里土豪劣绅，二教九流，无不“欢迎解放”，只好睁圆惊疑的眼睛。直到过了1950年元旦，1月3日，城内的地下党组织迎来了绵阳派遣的县长赵鸿图，公安局长解满和等人，安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群众才看到解放军模样的新干部。这一天是赶场日，农民一批一批涌进县衙去观看大堂、二堂、花厅、签押房，昔日阴沉的厅堂里充满笑声欢语，成为老百姓体会“解放”的第一件开心事。沙汀在板栗园，听一群群的溃军潮水般过去，经绵竹、睢水，往松潘、阿坝窜逃，骚扰得不行。他最担心稿子失落，在院子里挖了个坑，用纸包起埋了。散兵们像几滴水落入广袤的土地，迅即消失得无影无踪。静了五六天，静得好像要发生什么事。郑慕周从秀水派人来通知，县委要他立刻进城！他来不及与妻儿见面，戴顶旧草帽，由吴瑞卿陪着就到秀水见舅父。这是舅甥俩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见面。郑告诉他，县里收到绵阳地委电话，王维舟命寻访他的下落，让他马上去成都工作。这是

新县长赵鸿图亲自找郑慕周转达布置的。与舅父进入县城，正碰上接收人员与北支队发生冲突。宋达派人通知新县府，召开一个新、旧县长出席的“送旧迎新”茶会，遭到拒绝。于是宋扬言要撤出县城。这就意味着把十一名接收人员全部暴露给四围活动猖獗的武装匪类。这是第一个到郑府来拜望沙汀的刘桢品亲口告诉他的。宋达已经介绍刘入了“党”。沙汀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当天分别会见了赵鸿图和宋达，平息了这个茶会风波，这才启程赶赴绵阳。

他从纷乱的事变中预感到家乡鱼龙混杂的局面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澄清。后来整编北支队，安排旧公务人员，恢复工商百业，镇压兵变和匪乱，安县的斗争委实激烈。最不幸的是，吴瑞卿有不久的征粮反霸工作中当上评议员，揭发袁寿山、萧文虎的行为，引起仇恨。

萧叫他一个瞟眼子的侄儿于光天化日下，当着两个木匠的面，枪杀了正在厨房干活的小学教员。在沙汀的“保护人”之间形成的这种对峙，是严酷的现实。袁寿山——萧文虎——吴瑞卿构成了三十年后他的中篇《红石滩》的基本线索。

这都是后事。现在是郑慕周一直陪他到了绵阳。在地委，他先后会见了刘文珍、彭华几个干部，次日坐上地委为他安排的邮车，前往成都。郑慕周看他钻进邮车的驾驶室，才把一颗心放下。他回看舅父，车下这个高大的老人就是他从小熟悉的“保护人”。这些年为了他的安全，操的心也尽够了。现在舅父独特的政治身份会给他带来何种前途呢？这是两人都在想，却又最怕明言的事。在绵阳的两天，组织上让他介绍安县上上下下知名人士的情况，及对新政权的态度，他谈得详尽、细致，一篇一篇的，唯独拒谈郑慕周，而要求地委自行了解自己舅父的政治倾向。他只能这样做。虽然他很清楚，自1927年“大革命”以来，郑不断求进步的立场，相信他会与人民有一个新的合作关系，但不便由他来说。车终于扑扑地发动了。他默祷着亲人的安好，决然地挥手告别。

邮车在公路上疾行。晨风吹拂着他，冷峭而刺激。他觉得这部车子带他冲出了“第六病室”。他的半囚禁的亡命生活结束了。迎面的空气是新鲜的，呼吸是舒畅的。不用化装，可以抛头露面，不怕见任何人，想用多大的声音讲话就用多大的声音讲话。这就是“解放”呵！

你把建国后写的短篇集命名为《过渡》，有深意存焉。

只有“过来人”能体味甘苦。对于新的时代，我们这一辈人是“忠实”到情愿改变自己去适应它的。

穿不惯灰布制服

成都等待他的是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一夜之间，他从旧政权的阶下囚一变成为新政府的主人。从此，一个写农村小说的作家将定居城市，成为一名半文艺官员。他来不及想自己的地位有多么特别：解放区的文化人看他是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国统区的朋友视他为根据地出身的党内干部。

他先是借居在童子街十三号林如稷家里。那天，穿了一件下水多次的长衫，戴顶风雪帽，到商业街原励志社，现省委驻地，向王维舟报到。王维舟正要去出席起义将领邓锡侯的宴会，匆匆忙忙告诉他，川西党委已安排他去做文化接管工作。两人一同下楼，王用车子捎了他一段路。在车上，王维舟盯住他瘦削少血色的脸，突然说：“共产党员可不能操袍哥啊！”

大概王维舟听信了关于他的一些传闻。而眼前沙汀的样子，除了没像一般场镇上的瘾君子拖一双鱼尾巴鞋，其他也大致不差。难怪次日夏正寅来林寓探他不遇，留下的便条会问他每日何时过瘾，以便适时来访。这真叫他哭笑不得。他向王维舟简述从青年时代起舅父便不许他加入袍哥的家规。王微笑着点头：“为了隐蔽，在哥老当中混混是可以的，现在要注意影响啦！”

军管会文艺处设在学道街益都公寓。是前后两座三层的洋楼，中间夹了个天井。军管会的负责人杜心源、张非垢欢迎他的到来。张非垢是熟人，鲁艺文学系第一期赴冀中的学生，曾有师生之谊。他们已经为他安排好二楼二层的房间。又让他换上崭新的四个兜灰布制服，好使他像个政府的干部。不过，他穿制服总是不舒坦，不如从睢水赶来的玉颀。玉颀换上列宁装，辫子盘顶，戴上八角帽，是那么秀秀气气的。他尤其用不惯皮带，硬是要妻子用手针改造了制服裤，装上一根松紧带。

他在文艺处的工作并无名义，就是协助处长常苏民在成都文艺界联络。依靠原来的文抗成都分会的关系，找了李劫人、陈翔鹤、陈炜谟、林如稷、邓均吾等老朋友，拜访了谢无量等大学教授，召集会议，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文艺政策，大致就做这些事。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起码在解放初期那种环境下，“洗脑筋”是在一种特定气氛下人人争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对他不陌生。集体主义、纪律性，他却需要有个适应过程。1950年下半年与他一道工作过的李劫人大女儿这样回忆：益都公寓挂着军管会文艺处的牌子，又办公，又是宿舍。我住在前一座楼的第一层，能看见沙汀夫妇住的后楼上面的窗户。他不修边幅，头发从来没有理好过，穿衣服不能把扣子全扣上，不穿皮鞋，也穿不惯制服。不大管事，就想写作，还鼓励我写作。给我看他的长篇“三记”，叫我帮他划出哪些字太“土”。他对供给制不习惯，晚上常与玉颀到外面吃东西，或者搞个泥炭炉子（烧桴炭），自己做了吃。这种农民式的散漫自由，是思想改造的对象。而思想改造，已经是他经常遇到的课题了。小说里土语土词用得太多，妨碍其他省的读者阅读，这是别人给他提出的意见。他不能不检查，但骨子里何尝认错！一直到写八十年代几部作品，满篇土话，依然故我。

大约在进城不久，成都各界欢迎贺龙和周士弟的会上，刘盛亚邀沙汀一起到前面去敬酒。因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他迟疑了。刘盛亚可能把他的在场告诉了贺龙，不一会儿，就听传来贺老总特有的高朗声音：“唉，沙汀啦！我们同打过几天游击，都不来见见面啦？”

会场上顿时活跃。弄得他面红耳赤，只好起身走过去。

到了春节，杜心源约他去省委探望贺龙。正碰上贺在接待起义将领董长安。客人一走，会客室只剩下了他们，贺龙告诉沙汀，自己将去重庆，组织上也派他去。这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虽然真的执行是在半年之后，他当时的表情一定已经在告诉贺龙，他还是那个离开冀中，一心想奔回川西北的作家，一个对行政工作无兴趣的文化人。贺龙当然也看出来，但没有当场点破。

待到吃午饭，贺龙夫人薛明也在座。大家谈起敌后生活，贺龙终于风趣地冒出一句十年前就可以说的话：“嗨，别人都是老婆跟着老公走，你呀，怎么老公跟起老婆走呵！”

在食堂几桌吃饭人的哄笑声中，贺龙一语定音，把他离开延安的原因，公开挪到一个家庭的位置上。这也是贺龙一贯的看法。他不能理直气壮地讲出回故乡创作的动机，那很容易误解为不愿写解放区。也不能给自己安上“临阵脱逃”的罪名，那未免太严重。就这样，沙汀在解放后遇上的第一个需要解释的“思想问题”，由贺龙这样解了围。

一二师的战斗剧社大部分已经是新同志，但他们几乎都知道沙汀，读过他描写贺龙的那本书。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小青年兴冲冲取来一本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随军散记》。

这样署名的版本，连作者都是第一次见到，就像重见失散多年的一个孩子。林如稷当场把这本小书抢借去，筹划资金，亲写序言，由他父亲题签，恢复了《我所见之贺龙将军》的题目，很快自费翻印出来。林如稷满有信心地以为这本书会畅销，他忘掉了新社会的书籍事业已经由国家统一管理。川西的宣传部门对解放之初用一本书来宣传贺龙是否适宜，根本做不得主，提出要请示上级。书被扣住不得发行。林如稷的热情被浇上了一盆冷水，弄得狼狈不堪。

紧接着，沙汀请示川西党委想利用一二师和晋绥军区干部都在成都地区工作之机，组织两三次回忆关向应的座谈会，结果也受挫。他是想到丢失的笔记本，有意重新搜集这位贺龙战友的材料，来写一部书。这个申请未说明任何理由，便被否决了。很长时间他想不通，朦胧地感到有一种巨力在约束着、规定着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谓党的纪律，他已经生疏。他提醒自己，这是长期在农村散漫生活中淡忘的，灰布干部服还要穿习惯才好。

新社会更多的时候给他带来的是荣耀和责任。他与贺龙的关系令人羡慕。不久，他的党员身份，又由日夜操劳国事的周恩来亲自批示徐冰加以证明。文管会得到川西组织部门转来的北京材料，支部的几个人跑到他的二楼房间来，带点狂喜地交给他看。在刚解放的人们眼目中，一个同周恩来、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人，地位是很高的。徐冰在材料末尾写道，因该同志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应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别人就不大会注意此点了，只认为他是一个老党员、老革命作家。

对于家乡的人来说，他等于出山作官了，纷纷来寻他谋事。萧崇素、何成渝先后进入文艺处和川西文联。解放前“保护”过他的睢水乡长萧文虎、永兴乡长熊仁卿，也跑到成都来找他，却被他劝说回去。后来多数的“保护人”被镇压了。特别是秀水的谭海洲，据说枪决前游街，还念着他的名字骂。

（你听到这种消息，作何感想？这些人大部分成为革命对象，本在意料之中。不过，初听到他们的结局，心里的感受还是挺复杂的。后来你对他们的后代一个个都很关心，帮谭的幼子上大学，介绍邹家抱房主人的弟弟从事地质工作，是不是存了一个了清宿债的念头呢？）

家乡找来的人多了，引起他的烦恼。接收周光复就冒了风险。此人一直进步，1949年受到压迫跑到成都，被安县的党棍扭住不放，做为权宜之计，参加了一期“游干班”。他并没有隐瞒这一次“失足”，老老实实交待了。陈翔鹤也信任周光复，两人做主把他接纳进文管会。

不过，当周光复又要介绍原汶江小学校长刘逊如来时，沙汀实在火了，吼过一句：“这里又不是安县同乡会哩！”到了肃反的时候，周光复被捕，后保释出狱病死。虽未查出参加“游干班”之外的其他问题，对他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经历，只问自己对人的了解的“天真”想法，无论如何是个不小的警告。

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还不大适应新社会，虽然他是个老党员。

成都附近的石板滩发生暴乱，损失了一个工作队。人心不稳，有人劝他搬出文管会，也有人脱下刚穿不久的军装。他却想随剿匪的部队去采访，被劝阻。后来又提出一个集体创作剧本的方案，得到支持。这样，文艺处讨论了调查提纲，派周光复和一个农民业余作者一起赴石板滩访问了十天，回来后由周执笔，他一场一场修改、加工、定稿，一个月的功夫写成了。可惜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一册油印本只供传观，没有排演，也没有发表，就流产了。这唯一的一次剧本创作，使他摸到了解放之初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动态，为他以后刻画合作化的干部提供了早期材料。

接下来筹备川西文联。他怕长期脱离写作，先讲好了条件，文联成立后让常苏民、陈翔鹤主持常务，他即退出。当时川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杜心源去访问苏联，由身材魁伟的郝德青秘书长负责领导。郝对人诚恳谦和，与某些南下干部的骄傲粗暴不同。文联机构是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各方面人士都要安排的，为了一个川剧著名艺人的问题，沙汀与市统战部长争论得面红耳赤，分毫不让。郝很有耐心地在在一旁听着。

沙汀对统战工作一向看得比较远、比较宽。1950年1月，他和我都都在文艺处，同时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兼课，他教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林如稷对征粮措施不理解，当着我俩的面说过怪话。我说，你怎么这样讲？你要当伯夷、叔齐吗？沙汀劝我说，都是老朋友，他是一时冲动冒出一句话来，不一定是他的本意嘛。

8、9月，他安排川西文联人事，提名川戏男小旦周慕莲。别人反对，说是周名声不好。他说：玩弄、欺辱旧艺人是旧制度的产物，我们只能谴责军阀官僚，不能不同情艺人。

如果周慕莲川西文联委员当不成，要提名他当西南文联委员！沙汀这个人就是这股子脾气。

郝德青欣赏沙汀，最后总是支持他的提议。沙汀负责起草川西文联大会的主报告，为了四川“戏改”究竟是以京戏为主，还是以川戏为主，他与文管处的白紫池展开激烈争论。白认为京戏已成为全国性剧种，成都正在上演老区带来的新编《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红娘子》，大获成功，说明它能容纳内容进步的新脚本。沙汀从个人感情出发，鼓吹只有川剧才是四川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在只有《小放牛》好演，就因为外省同志听高腔不习惯，我们抓得也不好。他说得激动时，竟站到椅子上去。他的地方性爱好的热情，把白紫池都感动了。后来沙汀在成立大会上宣读报告，戏改部分的反应最好。

上级答应他从川西文联脱身，原是要他去筹建一个更大的西南文联，贺龙去重庆前向他透露过。西南局这时下了调令，区党委通知他动身，却被他十分干脆地拒绝。理由是熟悉川西社会，想留下来搞创作。第二次调令下来，他不理，又来了第三次调令。他预感到如果走上西南文联的领导岗位，行政组织工作和他的创作的矛盾将会永远附在身上。对着好脾气的郝德青，

他仿佛挣扎一样，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在川西坚持创作的愿望。郝不动声色，只讲了一句：“同志，这是西南局第三次调你到重庆啊！”他心一虚，垮了下来。

这件事不知怎的传到了北京。两年后他被派与马烽一起赴东德访问，马烽开他的玩笑：“你连重庆都不愿去，大家还以为你不肯出国呢！”

10月，邵子南到成都专程来接他，他只好将全家迁移。玉颀也不愿到重庆定居，大约就从这个时候起，她的身体逐渐坏下去，胸口疼痛潜伏下致命的病症。在山城，从西南局宣传部长张子意以下，大家都亲切接待他，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谁也不曾批评他的无组织行为。西南局组织部长张际春知道他有胃溃疡病，在一次会前，还劝他多吃软食。因为事先确定了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是一套办事机构，西南文联在组建中也受市委的领导。所以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兼了文联主任，沙汀是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正是再合适不过的搭档，而且艾芜已经在市文联里。同这两个朋友合作是令人愉快的。

1951年我从川西文联调西南文联，又与沙老在一起。机关在新民街离“解放碑”不远的一座院子里，原是军阀的洋房，石头铺地，正中一幢三层楼房，旁边一个相连的院子还有座小三层楼。沙汀一家便住在这小三层的二楼，一大一小两间屋。沙汀夫妇住小屋，他岳母领三个孩子住大间，只杨礼不在身边，刚宜四岁，有个吴嫂管家。

沙汀一直瘦削，嗓门很大，容易激动，吵架没心，人是正直的，毫不虚伪。四川人爱发急，爱摆龙门阵，幽默，他都具备。他对解放后的新鲜东西不能一下子接受，自己开伙，不吃食堂，对机关生活也不适应，总提出要去农村访问。

黄玉颀这个时期参加工作，我们俩都在《西南文艺》编辑部，她做编务。她心情不好，“抗大”、“鲁艺”出身的，都成了干部，她却连党员都不是。人是很倔强、很自尊的，也会与人吵。但沙、黄两人的关系极好，夫妻吵架，最后总是他让她的。说起来这年玉颀还没到四十岁，她的微突的额头和笔直的鼻子还是显得那么高贵，不像是个钻了十几年山沟的女人。头发梳理得顺贴，发着光亮。说话的嗓音十分细小。对于许多沙汀的朋友，她是个娇美的女主人。但是渐渐地，她总在他耳边说，她对邵子南的倨傲很反感，有意见。

这位与沙汀共事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兼文联党组书记，他们1946年便相识了。邵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也写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是他的大众通俗作品，解放后一时在全国产生影响。邵子南直率，为人粗疏，在当时那种尊重“开国功臣”的环境里，他处处流露出以解放区有成就作家自居的态度，慢慢引起沙汀、艾芜的不满。

艾芜这时已从张家花园孤儿院的茅草房里搬出，按理邵子南应当对他有个好的安排。可沙汀第一次分别拜访艾和邵的住处后，他的腹诽便开始了：艾芜住的楼房，房间昏暗而窄小，从写作环境上讲，比草房都不如。而邵子南的洋楼却是亮堂堂的。

这究竟还是小节。邵与沙汀、艾芜最大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国统区的作家。邵主张首先加强思想改造，然后才能写作。沙汀强调让大家写，写出来如果不好，批评它就是“改造”。

这里当然包含自己的一份心理：解放区作家由歌颂解放区到歌颂新中

国，是顺理成章的，而自己从暴露旧社会急剧过渡到歌颂新社会，将放弃掉熟悉的生活、语言和思考方式，谈何容易呢。

终于，在一次文联党组会上，沙汀婉转提出希望邵重视党外一些资深文化人，他还举了几种例证。不料邵大不以为然，两臂一抱，笑道：“这点责任我还撑得起！”

这给沙汀的印象很坏，矛盾有了公开化的趋势。西南局宣传部发觉后，召集了一次党内会议，尚未解决党籍的艾芜也应邀列席。大家对邵子南自命不凡和主观主义当面进行批评。

艾芜说他因为苦闷，曾经气愤得想自杀。沙汀谈着谈着，落下了泪。

那时候，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这个“生活会”开得比较及时。邵子南犯的是普遍存在的以“解放者”自居的毛病，并不一定是他一人专有。他在创办通俗刊物《说古唱今》等一系列工作上，倒还是支持了沙汀的。邵子南在批评会后调离文联，去市委办公室出任新职。1955年末邵去世，他还写过悼念文章。

他开始解放后最初的创作。《到朝鲜前线去》、《控诉》、《母亲》都是反映现实的，视点换成了城市，他不十分习惯。成渝铁路的修建是一件轰动全川、全国的大事，重庆市文工团石玺在创作一部多幕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他参与了修改、定稿。文化部很重视这部作品，曾调到北京的戏剧研究所由洪深老夫子指导加工。为了剧本没有正面反映部队对修筑成渝路的贡献，贺龙激烈地发过脾气。这个剧的命运比那个写石板滩平叛的剧本稍好一些，1952年9月正式上演了，但随后也就收了摊子。沙汀当时还不能思考其中的缘故，或者就是思考了，也会认为现实斗争是伟大的，主要是作家的思想还跟不上。

他比较能体会的是身处领导岗位，创作欲望不得伸展的苦恼。当时，著名作家都被安排公务，是一种信任。艾芜被任命为重庆市文化局局长，后兼市文联主任。李劫人当上了成都市副市长兼川西文联副主任。组织上还准备安排他作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艾芜的局长、主任纯属挂名，一天也没有真正做过。但重庆郊区搞土改试点，艾芜却马上参加了。1952年去北京进行文艺界整风学习后，因为全国工业建设铺开，艾芜主动要求去鞍钢体验生活。沙汀对老朋友软件“抵制”的一套办法实在佩服，但他做不到。他接了工作只会认真去做，虽然他的写作欲望与艾芜是旗鼓相当的。他心里对艾芜还有些不解：怎么能那么痛快地离开四川呢！

1951年3月中旬，他争取到了一个参加土改的机会，到重庆附近巴县界石乡生活了三个星期。他住在界石的海棠溪，也到茶店、腊梅、同兴一些村子去访问，参与说理斗争、评产、分配土地的活动，听过几次全乡性的汇报会。一个依农村为命的作家，迫切想看看这场暴风雨般的斗争会给家乡土地带来什么变化，特别是人的变化。

他看到熟知的乡土社会结构已经大变：过去乡村有权势的人，大多萎靡不振，正如从前农民见到他们时的情境一样。而农民或是已掌权力，或是背后凭靠着权力，表现出一种充满自信的乐观态度，而且喜欢讲开心话。他敏感地注意到：“一般老年壮年农民似乎特别喜欢哄笑”。在海棠村分配土地的那一天，早年远近著名的歌手、种田的好把式、半盲的老人朱远清也摸来了。他一进小学校的教室，满屋的人都开他的玩笑，问他从前见了地主那

么胆小，现在分地怕不怕？

“怕啊！”沙汀听见老头子故作“发愁”的神情说，“怕他的地分不到我手里，叫你们分光喽！”

五十岁的钟老太太扭秧歌舞成了狂热分子。照规矩，此地的山歌是插秧季节唱的，但在没收地主浮财的那一天，漫山遍野响起了山歌声。这歌声传出的情绪被他捕捉到了。1952年7、8月间，他又争取到去成都石板滩参加了一期土改。上级只同意他到川西地区，没有批准他回安县的要求。起初他很感不快，知道这是因为安县的亲戚故旧中多有地主，不宜派他去。他有写一部土改长篇的计划，想到石板滩是华阳、金新、简阳三县交界地带，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区，解放后爆发过叛乱，自己已经有所了解，这次工作团团团长又是郝德青，省里李井泉亲自蹲点部署，深入下去一定可以有所收获。这样一想才释然了。

石板滩果然复杂。这里要先打政治战，纯洁农会组织，帮助参加过叛乱的农民“洗脸擦黑”，一边肃清反革命，一边搞罚赔、查田、没收、划阶级成分，还要抗美援朝，增加农业收成。

他兴致勃勃地访问、开会、看材料。他的笔记里有各种标题，“仁和八村7月9号事件”，“西河乡贫雇农大会诉苦”，“参军运动在新都土改区”，“龙王乡红豆村农会问题”等等。他现在保留有在石板滩的日记，记载得十分精细：这里男女关系很严……雇工林大兴，十多年前拐走一名妇女，早已经合法化，但现在还有人以此作借口反对他当代表。虽然觉悟程度不坏（7月21日日记）。

（蓝麻箍）他的怪吝是可惊的，一顶开花瓜皮，有一回在茶铺喝茶，太热了，揭下来搁在桌子上面。而在他走的时候忘记了，茶堂馆看见那么样烂，于是顺手扔在毛坑边上。但是这个举动未免奢华，蓝麻箍隔了一夜，跑了十几里路，从毛坑边上捡来他的帽子，抖抖灰又戴上。一个工人形容他说道：“他就有这么狠，买豆腐他要打边上的，还要估倒搭两根葱子！……”（8月13日日记）。

这个老家伙就有这么顽皮，当一佃户指责他退佃时，他竟然公然辩驳，“你不给上够租子啦！该没有冤枉你哇？”另一个说他田一买到手就加租加押，而他也有他的理由，说：“价钱你知道的，我买得贵呵！”……最后，把他罚跪在一边，让他反省。但一转眼，却又弄花头了：四足长伸好使膝盖离开地面。而这么一来，他就再跪多久也不怕了。当那些外乡佃客离开的时候，他更出乎意料，笑嘻嘻的望其中一个说道，“你们说完了哇？”后来他又四处寻觅他的帽子，寻到后又慢慢用袖子揩去灰尘。最后散会了，他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向一个农人走去，要回自己的水烟袋，揣在怀里（7月31日—8月4日日记）。

（你有没有发现？你记下的地主要比农民生动得多！对于粮绅，你能注意到他们的细节；对于农民，你多半想抓住他们身上新的东西，但并没有抓到多少。在艺术感觉上，我承认我还是对旧的敏感）

他有意多观察新环境下的农民。和海棠溪农民一样，他们脸上的表情变了。几次参军会上，报名的青年“在掌声中站起来后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只带着幸福的和害羞的微笑”（7月22日日记）。上台戴红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显出一种尊贵欢欣而略含矜持的表情”（7月27日日记）。

但是他比在海棠溪看得深了。他看到一般农民参加土改的动机是多面

的。他参加乡农代会小组讨论，听许多人踊跃发言，提了各种挤出地主隐藏财物的办法，“我自觉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勇敢而又精明，其动力正是他们本有的自私心在那里起作用”（7月28日日记）。

他想起前几天胡愈之来谈川北土改的情况，那里有些“积极分子”分到田和浮财后便不管村政权的事了，只愿埋头种庄稼。晚上回到住地与郝德青谈起这个感想，沙汀说：“这个县里有许多路工，我和他们接触过，认识比一般农民高。他们长期集体生活，见过外面的世面，养成一些工人的品质。将来的政权能不能寄希望于他们呢？”郝德青一向注意听别人讲话，他这时坐在沙汀的铺位上，深沉地摇摇头说：“一回家就变了！同志，教育农民是一件长期的工作。”

这次讨论给他以启发。接下来两天下雨，他坐在屋子里看报告，做摘要，思考怎样来表现农民。他觉得他已经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了：农民在运动中的作为，并不怎么出乎意外和不可想象，我们很可以根据他们本身的特性，在一般政策、形势之下，作出种种合理的推论。这是顶重要的，因为它使我获得了自信，可以大胆使用已有的知识和表现能力（7月29日——30日日记）。

他初步考虑通过几个家庭来写这场农村变革。这不能是单线条的，要包括一个乡指挥部的工作，两三个村子的动态、偏差，而描写农民的勇敢行为要注意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他自己在冀中部队和睢水乡下的不同关口，亲自体验过勇与怯的心理可以交替出现。

他懂得“勇敢”总是相对的，他不想单面地来写农民。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的困难。他在日记里写道：

首先是人物问题。我该怎样来表现所谓新的性格呢？

在偶一想到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茫然！这大约是因为我也同样把新字啃得死，而没有这么理解：新的是旧的发展来的。

他熟悉的是旧的，想起《困兽记》里的冯大生：如果把冯大生那样性格，那样遭遇的人，搁在目前的条件下来，难道我不会写出一个解放后的新的农民来吗！这显然是可能的。

他在给自己鼓气，想找到一个熟悉旧世界的作家如何表现新世界的立脚点。如果冯大生参加土改，带着一种对霸占自己妻子的保队副的私人憎恨，这种强调性的描写是可以的吗？

一定程度的强调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动力。因此，与这个相联的，那种实行了报复的私人的快感，也应该表现。

他还为自己的小说形式规定了与新人相一致的特征：这些新的人应该也多半是行动的人，真诚的充满信心的人，因而应该以动作、场面为主（以上均为8月7日日记）。

但是这部设想得如此具体入微的土改长篇，终于没有动笔。回到重庆，“三反”、“五反”运动尚未结束。受他尊敬的谢无量先生在成都挨斗，令他惊异。李劫人常对他讲起谢先生的厚道、书生气，不知理财的特点。以谢在旧中国的声望与交游之广，家里有几件古物，是很寻常的事，结果叫“双毛辫”（李劫人称刚工作的女青年）扭住不放。后来是陈毅出面保护，才把谢调入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他不理解谢无量受冤，但领导文联机关“打老虎”，还是不遗余力。平时的“浪费”，受了“运动”气氛的感染会演变为“贪污”，他所搞的“贪污”案也就不能不扩大化。他还要在内部检查官僚

主义。从去年5月全国讨论《武训传》，年末展开文艺界整风学习以来，“检查”不断，他的创作自信已经不牢固，或者说需要重建。在石板滩已感到的对写新农民没有把握的心思，越发加重。不能把农民写得比工人完美，也不能“泄气”，这太难了。他想起去年10月纪念鲁迅诞生七十周年时写过的文章，用检讨的姿态谈过去的创作“暴露过多、光明太少”的毛病。可面对刚刚“解放”的农民，发现自己的思想调整远没有完成。他不知道光明的颜料应如何调制，如何涂抹。他的笔提起来，却在一个绝好的题目面前凝住了。

他还不习惯表现新时代。

外面的世界总归是外面的世界

火车在西伯利亚冻土荒原上急驶。车厢结合部传来有节奏的撞击声。窗外闪过冰雪覆盖的无垠的土地，和一座座用带树皮的木料砌搭成的俄罗斯低矮农舍，引起这个第一次离开国境的南方乡下人的遐想。他一向神往的旧俄艺术大师笔下人物活动的场景，仿佛在眼前活了：《复活》里马丝洛娃随着政治流放犯长途跋涉，她的头越来越昂起，而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跟在后面艰难地颠簸……长长的车头鸣叫声把他拉回现实。沙汀看看对面半斜身靠在软座上的马烽（一位身材适中、壮实得像个矿工模样的解放区作家）和一名德文翻译，想到他们正在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的途中。封闭的车厢里温暖如春，可是眼耳口鼻还留着哈尔滨月台上寒风刺痛的酸涩味。

他是1952年9月应召到北京作出国准备的。解放两年多了，连艾芜都两度进京开会学习，他从离开延安算起，已经有十几年没迈出夔门一步。现在是不迈则已，一迈便到了欧洲。

这段时间他在思考他过去作品的全部价值。为了《淘金记》的重版，他与中宣部文艺处的严文井交换过意见，这位“鲁艺”的同事请示过胡乔木，做了肯定的答复。是从过去走向未来，还是一切另起炉灶，他很想利用这次机会在京小住，找些老朋友谈谈。西南局宣传部的廖井丹也鼓励他出去开开眼界，还表示，回国后可以同意他解除行政工作专事创作的请求。

在北京他住在东总布胡同“文协”院里。他去看望全国“文联”的周扬、“文协”的丁玲两个负责人。周扬很忙，照旧了解他的脾气，短时间交谈中，劝他不必紧张，因为访问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友好关系而已，不会有复杂的情况。何其芳从颐和园附近的高级党校跑到东单来看他，语言的洪流，淌出来，容不得别人插嘴。他大讲在河北平山的见闻，描述他未来的土改长篇小说。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热情也不能化为文字。等沙汀去党校回访，问起其芳两次出使东欧的经验，其芳给了他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发言稿，原是他自己准备的，在国外没讲成，他就不要分文地“卖”给了老朋友。沙汀在柏林果然派上了用场。

他到中宣部去与严文井叙旧，却意外碰到了赵树理。赵树理的小二黑、李有才这时走遍全国。赵住在文艺处，正集中阅读苏联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

文学作品。沙汀好奇地瞄着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穿一件短袄，下面也不像是制服裤，没有一丝解放区干部气。赵的左手臂不知怎么出了毛病，用根绷带吊起。他很自然地问起伤情，不料，赵树理立即口念锣鼓，边唱边舞，当着第一次见面的客人演起山西上党梆子来了。这真让他吃惊。他不熟悉梆子，北音的苍凉比起川戏的高腔自然更古朴、深厚。他的注意力被眼前这位“民间艺人”的表演吸引住了。几句唱过，他报了一折戏文的名字，好像叫《三卖武》，然后便说自己受伤就如这出戏中的一个角色一样。

这个农民作家接近人的不拘形式，和对家乡戏曲的狂热劲头，可能是他生平遇到的最典型的例子。后来在东总布胡同隔街相住，见他下棋，就更有趣。赵下象棋、围棋都不算高明，但极喜下。有一阵每晚扭住前院的严文井搏战，下到深夜也不肯放，弄得文井爱人伸手将棋盘弄乱才散。他毫不以为意，第二天照样登门。后来文井提出少下、不下，赵生了气，将棋子拿到文井门口，一个个捶烂，口中念念有词：“你死我就死，只要你说话！”搞得文井狼狈不堪。其芳的“天真”是知识分子型的，像赵树理这种农民式认死理的“天真”，更是天下无双。

文井思维缜密，文学修养高，与他交谈总是有收获的。坐在国际列车上，他还在玩味着文井与10月2日在北京站送他上车的胡乔木对他创作的评价：“你是一个很有艺术才能的作家，很有表现生活的能力”。“你是现实主义的，你的简练的文字，足以准确地再现生活”。

他们都读过了《淘金记》，觉得是出色的对“地狱”的描写，是地方风俗史。但一谈到讽刺，他们的话便有了分寸：“你的人物很多是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但你对反动人物的鞭挞不够明快，吝啬夸张，如果要普通读者懂得你那太含蓄的用意，他们会很吃力。做你的读者要有很高的条件，不少人可能因此而退却了”。“你书里出现的劳动人民给人的印象是不鲜明的，而且和那些反面人物容易混同起来”。“你的讽刺还缺少一种刻毒的力量，不能激起读者足够的愤怒”。

反复思量着这些话，他感到兴奋和惶惑。对丑的调侃不应只是一种色调，社会讽刺为什么不能有表面不太“刻毒”的呢？他想不太明白。但知道，他的讽刺的笔法在今天已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保持对生活精细观照的能力，来写新的农村，可能是他应走的路吧。横贯欧亚大陆的漫长旅途给了他思索的时间。

（这一段的思索是重要的。你的讽刺艺术从此便弱下去了。赵树理对农村还能保持一点锋芒，我在一部分创作思想上比他萎缩）

他们到了莫斯科，然后转赴东柏林。这个作家代表团太小了，小得不引起注意。驻苏、驻德的使馆之间联络不畅，他们两次呆站在外国首都的车站大厅里，等不到接待的人。东德大使当时是纪鹏飞。

新中国的文化使者在1952年11月那个年代，到社会主义的东欧来主要是认同，而非求异，沙汀地域性的自足心境不容许被打破。在莫斯科大旅舍下榻，住一百卢布一夜的房间，吃十卢布一盘的凉拌卷心菜，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他告诉使馆的人员，返程再经过这里，但求住普通的房子，喝红菜汤就可以了。到了柏林，发现为出国特备的驼绒大衣太暖，只好买呢大衣。他带头挑半毛料质地的，认为纯毛料的太贵。

这有什么办法，只有节俭才愉快，他改变不了自己。访问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声援中国革命的剧本《怒吼吧，中国》的老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

夫，使人感到亲切。屋子里陈列着金山寄赠的他的剧本在中国演出的剧照。老人特别喜欢在战争环境下成长的马烽。在诗人库巴的家里同东德作协主席安娜·西格斯会面，沙汀读过她的名作《第七个十字架》。他觉得修养高深的女作家不如工人出身的库巴好接近。他们还特意访问了脱产刚三年的矿工作家泰渥·哈利希，听他详细介绍自己的经历。他们访问过各种工厂，造船厂、化工厂、冶炼厂，在工人住宅区与群众接触，参加过清除战争废墟的义务劳动，甚至得到一份劳动证书。

在他们的再三要求下，好不容易参观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但没能与任何社员接触。按照他的理解，东德的和平土改使农民普遍存在“变天”思想，要比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来得差。

不过他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古典文明是灿烂的。去凭吊过魏玛的歌德故居、墓地和席勒故居。在绿蒂的坟茔旁，他对德国人讲述中国五四时期的“维特热”。在德累斯顿谈鲁迅介绍柯勒惠支的版画，在莱比锡法院听当年季米特洛夫讲演的录音。他仿佛是拿东欧的社会主义来加深认识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并肩负着将一个真正的中国介绍给对方的使命。

在参观士林根省的玩具博物馆时，他就纠正了外国朋友的一个“错误”。他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发现了一件中国的黄杨雕刻，雕了一个拖辫子的男子与一个小足妇人面对面躺在烟榻上吸鸦片。这个旧中国丑恶的小摆设，引起他生理上的不快，他控制着感情，向那位引导参观的馆长解释，这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儿童玩具，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玩具！但是先前在北海造船厂访问，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发作，他没能控制得住自己。对方是一位接待人员，三十年代加入海军，驻防过上海，似是个“中国通”。这个昔日的德国水兵并无恶意地询问沙汀：

“上海现在还有‘燕子窝’吗？”

沙汀告诉他，早经查禁绝迹了。可他不信。再三地说明，仍摇头说：

“听别人讲，鸦片烟一旦上瘾是戒不掉的呀！”

倒好像是沙汀在强辩。终于惹得他的脾气上来，脱口说道：

“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戒不掉：面包！”他说这句话实在急躁，以至在用“面包”这个词以前，先就溜出一个“饭”字。

马烽在旁边，禁不住笑着接过话来打趣他：“哪里听说有什么‘饭包’啊！”

这样总算缓和了一下空气，没有造成更尴尬的场面。其实他知道，德国朋友的固执己见，是因为交流太少。他的反应是习惯性的。他无法允许别人随意地破坏他所“经验”的一切。

（你跑到万里之遥的外国，吸收到的知识很有限。你不是在用外面来充实内面，更谈不上冲击内面。我注定是一个“土”人，经验型的人，出国仅仅是用外部的世界来证明一次内面的世界而已）

年底结束访问，原路回国。在北京逗留期间，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严文井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协”将成立的创作委员会工作。他回四川写作的梦做不成了，推托的话刚出口，林默涵便一本正经地说：“已经决定了。你不干，我们发调令调你，看你干不干？”他只好答应做一两年看看。陌生的工作来得很急切。1953年4月，创委会成立，中宣部副秘书长邵荃麟当了这个机构的主任，沙汀为副主任，实际主持日常工作。4月5日，他还在重庆的西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10日闭幕，他刚刚被

选为西南文联的主席，便赶往首都去接任新职。起初没带家眷，过一段时间才将玉颀和小儿子刚直接来。四川的岳母及其他孩子，好像是他故意留下供撤退用的后方。

全国文协所在的北京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今五十三号），是个堂皇的宅院，沿第二进院两侧游廊拾级而上，进入第三进，迎面是一幢带飞檐的二楼楼，说明它原来的主人中西合璧的趣味。这座楼底层东面的外屋为会议室，有讲究的地板，依靠中部的活动拉门可调节室内的空间。里屋便是沙汀领导的创委会。楼上分别住了邵荃麟、艾青、丁玲几位。

第二院的东北角开有小门，连着一个侧院。院内的一座楼更加小巧，楼上便住着沙汀、张天翼两家。二十二号斜对面的四十六号大院（今六十号）是“文协”宿舍，也是三进的深门大院。住的人就更多了，严文井、刘白羽、罗烽、白朗、赵树理等作家都聚在那里。

解放初期的机关，气氛较为活跃。创委会十几个人，秘书、干事大都很年轻。“文协”的领导都是他三、四十年代相熟的作家，这一点使他满意。最早的党组书记是周扬，党组成员，除邵、沙之外还有丁玲、冯雪峰、萧三。邵荃麟、葛琴夫妇是1944年从桂林疏散到重庆时认识的。起初他们住在沈起予兄弟开的旅馆里。邵很瘦弱，当时便常常有病，但一谈起话来便劲头十足到不可收拾。邵荃麟懂得文艺，有理论水平，带病指导创委会工作，出席会议讲话，声音细小如秋虫、如游丝，到了最后，如沙汀说的，简直是演“无声电影”。邵充满书生气，完全不会照顾自己。他抽烟，常忘带火柴。向别人借来，用毕便装进自己口袋。刚吸了一支，急急地走了，会把烟整包地掉在别人家。这个人对人是很好的。

认识艾青是在北碚，把他介绍给周恩来，促成他赴延安。艾青是诗人气质，沙汀曾对曹禺笑着抱怨过，说艾青见面握手，不止握得紧、重，还要拿起别人的手来摩挲，不知算哪国的礼节。

至于张天翼，自抗战胜利前在郫县专程访病以后，这还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又是相邻而住。天翼这时尚未再婚，身体恢复得不错，谈吐聪明，常来邀沙汀喝啤酒、散步，然后谈苏联小说，谈《红楼梦》，研究别人的创作经验。也谈过周扬与冯雪峰的那笔旧帐。天翼对冯有好感，对周扬的评价不如沙汀高，但也很尊重。这一段，两人的关系大大增进。二十年后天翼脑血栓半瘫失语，沙汀每次去崇文门新居看他，一两个小时，沙汀讲，天翼动作，可以谈得津津有味，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友谊基础。

创委会的工作是指导全国的文学创作，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沙汀一到北京，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便遇上组织四十多个作家、批评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创委会出面做的第一件大事。邵荃麟身体欠佳，委托冯雪峰主持，沙汀只是当助手，并负责编辑《作家通讯》。这个内部刊物从这年6月创刊，到第十一期，都是他领导束佩德等人编写的，一开始就是编发这次学习的情况。

系统地接触马列文论在他也是难得的。阅读二十二种必读文件，还包括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的有关报告，十四次讨论会分别讨论了现实主义发展历史、典型、党性与人民性、创作现状等四个问题。在大的场合沙汀很少发言，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他当然做为正确理论无怀疑地接受。

后来是筹备召开二次文代会。会后，“文协”改为“作协”。创委会内

外结合，成立了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电影、通俗文学、儿童文学等创作组，组织讨论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诗歌形式，苏联波列伏依、安东诺夫的作品，陈白尘的《宋景诗》，王亚平的《张羽煮海》。沙汀这时显得热心、活跃，小说散文组讨论《三千里江山》时，沙汀到北京大学请了吴组缃来做主要发言。吴对小说的粗糙处批评得较多，引起了一些解放区作家的议论。有人来问沙汀：“为什么要完全否定？”

他很惊奇，说：“现在不是打起灯笼火把在找它的优点吗？”

可是别人还不满意，说：“为什么要打起灯笼火把找哇？就是写得好嘛！”

吴组缃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他觉得自己的评价已经不低，用不着一味赞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沙汀的位置分外地受到压力，后来没有全力支持吴，是至今仍引以为歉的。但是在心里，他对这位十几年的畏友的耿直品格与很高的文学修养，十分钦佩。纪念吴敬梓，《中国文学（英文版）》需要向外国介绍的文章，是他去特邀吴写的。星期六全家去颐和园游玩，有时便在北大的吴寓下榻，第二天才返回城里。一度还请吴组缃到作协书记处任过职。

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作家，长期保持了友情，凭的是双方的真诚。

要说留恋创委会时期，大概就是这些琐碎的人和事。1954年，指导全国的工业题材创作和工人参加创作，艾芜从鞍山带回《百炼成钢》的毛坯，住在沙汀的小院里修改。起初是个中篇，只十来万字。创委会组织内部讨论，因为第一稿的粗糙，艾芜几乎失掉信心。沙汀找他谈后，决定重返鞍钢“补充生活”，重新写起。

陈翔鹤一直郁郁寡欢，他是知道的。“三反”时陈在川西文教厅被错当作“老虎”打过。在川西文联为了印发倒霉的《柳荫记》原本，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个没完。现在经陈白尘介绍，调到全国作协帮助郑振铎负责古典文学部，与沙汀都在东总布二十二号一个屋檐之下，经常能见面。等沙汀决定离京返川，陈翔鹤很伤感地对他说：“你回去搞创作好，千万不要在‘文联’住起，那里住不得！”

批评路翎时，沙汀是党组成员之一。在我记忆里，他发言很少，更没有什么重要发言，办事认真到有些拘谨的程度。

他基本上是个作家，组织领导，不是他擅长的事。

他读材料，用红蓝铅笔划各种道道，还要用毛笔添上许多眉批。对我送他审查的文章总是详加推敲。

黄玉颀在作协做秘书工作，有朋友到家里去，他们总是热情招待。这时他就变得健谈起来。平常他是很随便的。记得陈森去鞍钢，创委会为了送别，组织大家去西郊游园。在颐和园买门票时，他悠闲地坐在大门旁抽烟，还抽空抄起一本杂志来看。我曾为他偷拍了这张照片，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他自己穿戴极平常，灰布干部服，不那么熨帖，夏天是一件发黄的绸衬衫，冬天喜欢围一条短围巾，落下来就一甩。

1954年末，黄玉颀先带孩子回南方，沙汀成了独身。

我也没结婚。星期六傍晚他总是从后面院子踱出来，到大门口西厢我住的屋门前大喊一声“束沛德”，用的是浓重的四川口音。我是凭感觉知道喊的是我，便出来一起到外面饭馆吃饭。吃饭的地方有东安市场的“五芳斋”，西四的“恩承居”，新开胡同的“马凯”。那时“马凯”没在鼓楼。总是他掏钱的时候居多。1955年他走后我结了婚，他来北京开会还特意补送我们

一块绸子台布，做为礼物。

还是围巾不离身的季节，他已经时常流露出要离开北京到下面去创作的情绪。他去着周扬、邵荃麟、严文井，不断地提出这个要求。北京的世界仍是外面的世界，不能整个投入他的生命。在东总布二十二号，他能感受到全国的大形势，但总觉得失落了什么。1954年秋天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与巴金住在同一个房间，他是个四川代表，这使他欣慰，也更想念故乡。他的思维不能由大及小，似乎只适应由小及大，离开了他的土地便失去了创作冲动。他也做不到像艾芜那样，能跑到东北去重新体验北方工业城市的生活。艾芜说为了避开行政工作的纠缠，必须离川，“大树子底下好遮荫”。沙汀何尝不想找一棵这样的树子，但他的大树是只能植根于故乡的。读了《百炼成钢》的原稿，他更坚信这一点。私下认为老朋友的“危机”在于语言，他就无法用四不像的语言来创造形象和气氛。

这时候，玉颀又在整天地唠叨离京。作协院里任何一个人人都看得出来，他爱护妻子很深沉。一旦玉颀生了气，家里的小保姆也吭不得声，他会分外耐心。妻子是又关心他、照料他，又习惯于数落他。她的恋乡病发作得更其厉害。时光倒转，好像又回到当年离开延安的光景。

1954年开展《红楼梦》研究批判，转过年来到了1955年1月，一场大规模批判胡风的风暴，眼看就要来临。思想战线上频繁来临的每一场斗争，总是先叫他大吃一惊，然后便调整脚步企图跟上。可批判胡风，他是特别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的。他后来写了好几篇文章。

（你是不是带进一点感情了呢？这几年你对我一再提起巴金纪念胡风的文章，总是说有句话说得好：“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这样赞同巴金的“忏悔”，是隐含了你的心情的，但是胡风的追悼仪式我已无力参加，只是给梅志打了电话致哀）

在心灵上，他变得更加谨慎与内向。创委会的理论批评任务的加重，让他越发不能适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批判后，他回川创作的请求得到批准，刘白羽、李季来接替领导创委会。他脱身了。

他带着厚厚的几本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学习笔记离京，赶回成都与家人团聚过春节。小楼的邻居张天翼与他依依惜别，为他祝福，也担心他能不能改换讽刺笔墨写出新东西。他有多方面的打算，急于先一步了解合作化的先进农民，如果写不成功，他还可以转去写川北解放前后。这个题材能用上过去的生活积累，搭了新旧两头。

到1986年11月，他做为作协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的记性不错，握住沙汀的手立时认出他来，说了句：“我们几十年没有谈过话了！”在当天的日记里，他记下了：我一直清晰地记起五十年代我解脱作协创委会工作时去团中央看望他的情景。这是关一铨提起的，因为我准备回去写四川的解放。

他当时主持团中央的工作。解放初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因而我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他的指示。他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要记住：当时我们肩头上的份量都重呵！”临到我离开时，他还讲过两句鼓励的话：“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可是，直到1985年，我才写出中篇《红石滩》，且以暴露讽刺土劣为主，想起来相当惭愧。这篇小说，一直萦绕在他心间三十年。它经受的波折，从调查搜集材料，到一再修改写作计划，写写停停，可以代表他整个这时期的创作路途。但无论如何，现在他被某种命运驱策着，又一次上

路回故乡了。

归去来兮！

你还是走出了困境。不是说你有意表现新的对象有多么成功，而是你面对它们产生了激情，而且觉察到矛盾。

我有各种困境。最深的痛苦是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不能写“自己”最想写的。唯有下乡充实我的生命。

重建生活基地之后

回到四川才两个月，连他都难以置信，就拿出了真正意义上属于他的新农村小说《堰沟边》。同年发表了得到普遍赞誉的《卢家秀》。

成都的住房还没有解决，一家人暂住在金牛坝招待所里，他就急不可耐地准备下乡。他是回来创作的。全国作协党组为了保证他不受四川行政事务的牵制，决定由北京每月发给他创作津贴，以代替工资。他是“自由”的。

记得解放初他第一次下去，曾兴奋地告诉巴金：这一来我可以下乡了，我总觉得这才是我最适当的去所，因为只有乡里工作一段时期后，我才有重新创作的信心与勇气。

现在，他又向巴金报告了同样的心情，并得到呼应：知道你终于回到了四川。你可以准备你的创作了，很高兴。……有什么新作品，不要忘记寄给我一本，我喜欢你写的东西。

巴金已经在等着读他的新作。他也真不辜负朋友，接到复信，已经从乡下转了一星期回来。

他先是旁听省委统战部组织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观省内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会。

在会上翻看简报，发现绵阳不错，便立即赶去。正是办合作社的高潮，那里轰轰烈烈在开三级干部会。县委书记吴儒珍是相识的地委书记彭华的爱人，经她介绍，与会上几位合作化积极分子谈话，其中就有三台县尊胜社社长王达安。

王达安这年三十岁出头，开朗的前额过早爬满皱纹，有一双沉静的眼睛，是所谓筋骨人。他穿一套做工拙劣、洗褪了色的工农牌蓝布制服，两个口袋塞满笔记簿和文件，总是鼓鼓囊囊的。

（这是你在新社会最早贴近观察到的农村基层干部了吧？是的，和我过去熟悉的乡长、保长比，乡长、保长即便出身农民，也已变得“油”气和“流”气，他们脱离了土地；而眼前边一位是彻头彻尾泥土一样的纯朴。当时我无法意识到，这个人将是我未来三十五年中始终不渝的一个朋友）

他听说王达安是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人，而这样的老社目前正面临耕牛折价、土地加工、处理社员私人副业等亟待解决的各种难题。这个农民社长揭露问题的态度很爽直。沙汀决定到王达安的社和其他两个地方看一看。

三台尊胜乡和安县一样，是川北丘陵苦寒地带。过胡家嘴摆渡，渡工

机敏善谈，这是以后写《过渡》运用了场景、人物。开春天气，太阳从木鱼山峰顶放射出光芒，映红了连绵的山岭和山脚下一小片狭长的平原。王达安陪同他在尊胜各处转了一圈。他更有兴趣的是尊胜的主人们。他乘机了解王达安的身世。十二岁放牛，十七岁当长工，干过伐木、淘金各种营生。在王家大院他能组织起年轻人与本地的保长斗法。但是经过土改，在担当合作社领导人以后，他的家庭生活却降低到一般水平线之下。沙汀看到王达安的妻子黄黄的病脸，几个娃儿天天顿顿吃着红苕，但王仍拒绝社里的救济金，他很有触动。《堰沟边》的雏型形成了，他按照王达安的模样塑造了陶青山。

回成都，他的家搬进了布后街省文联的大院。这是熊克武过去的公馆，现在做了机关。

进大门，左手有几间厢房，一家人挤在那里。他很不习惯院子里终日的嘈杂。他下乡的兴致正浓。10月，又去三台、德阳。回来不久，写了《卢家秀》，在《人民日报》上一次载完。此篇确立了他也能描写新式农民的名声。山东迅速出了单行本。中学生给他写信，问卢家秀姐姐住在哪里。实际上这个热爱合作社的女孩子，他只匆匆见过一面。就是访问尊胜乡的那一次，他去瓦子乡，偶然间听乡政府的两名干部说起这个穷困户姑娘，说她为了争取入社，一天到晚跟在支部书记后面转。她的变化真大，因为不久前她还是任何集会都不参加的十六岁“小主妇”呢。“人的变化”，这个题目吸引了他。他找到这个女孩，同她和她的父亲谈过话。这篇东西给他开辟了写类似采访记的小说的途径。后来的《过渡》、《你追我赶》，都带有特写的气息，便与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关。

1955年年底，郑慕周患脑溢血猝然逝世。建国后，舅父作为民主人士受到礼遇，一直任安县副县长，尽心尽意为桑梓父老服务。接到噩耗，他从成都连夜赶去料理丧事。在绵阳，他乘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安县。车子开到中途，便赶上了从绵阳医院将郑慕周尸体运回故乡的队伍。躺在滑竿上的舅父，面色安详，临终似没有受到什么痛苦。

到安县后，他为他选定墓地，装敛。送葬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他仿佛看见一副阴沉木的棺材渐渐沉入墓穴，泥土拍拍地打落，他想起舅父一生与他的人生轨迹的多处重合：少年的“跑滩”，保荐入省一师，睢水避难充当自己的总保护人。近年来，舅甥之间又多了一层同志式的关系。他觉得失去的是自己的“父亲”。

他没有长久沉浸在哀痛里面。回川后，由于他已经是省文联主席，他的“自由”重新失去了。开会——下乡——写作，成了他的生活三部曲。各种政治运动，全国和省的人代会，全国和省的文联、作协会，还有省里的党政会议，每年平均在各种各样富丽堂皇的宾馆、饭店的礼堂，会议厅和客房里消磨去四五个月以上，然后从飞机客舱和火车软卧上走下来，转乘长途汽车，最后步行到乡村，偏僻的平坝、山沟，住在老乡家里，吃着搅团（有时被房主人偷偷打进一个鸡蛋），摆龙门阵。这成了他的常态。

1955年两次下乡之间，去北京开人代会。1956年2、3月在京开作协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回到长寿狮子滩电站工地体验生活，写了工业特写《柳永慧》、《瞎炮问题》（后改名《炮工班长冯少青》），并不成功。秋天，重返农村，到绵阳、三台、安县，前后活动了半年。为了反映新农村，他不能固守故乡，而要寻找在风土人情上与故乡相近，而在发展上比较“先进”的根据地。后来，三台县的尊胜社，成都附近新都县新繁的新民社，川

东武胜县烈面的西关社就成为他主要的生活基地。他已经不是生活在哪里就写哪里，而是为了写作有意地下去生活。

他这次去安县想有目的地搜集解放初期的材料，他没有忘怀与胡耀邦谈过的写作计划。

8月14日，第一次乘宝成铁路去绵阳。刚俊和她的母亲已在这里安家。第二天，刚俊陪他去安昌镇。故乡依旧，他努力寻觅新的印记。

南门河坝是那样清冷，我不到一个脚夫。可是茶馆里有不少人打纸牌，街道看起来多狭小呵！

也有不少新屋，还在继续修建，但都是公家的。房屋都有些破旧，看了叫人感觉难受。

晚上，独自出街逛了一转：相当热闹。十字口围了不少人，男男女女都有。各行业的人挤在铺堂里学习。南街上有几处正在修建新屋。木料上坐了妇女们乘凉闲谈。……

安中校正正在开青代会。一个突出的现象：青年们学习着普通话。走来走去，客客气气地在学发音。他住在县委，在北门外文庙旁边。这里在他幼时是一块桑园。江山已经大改，安昌镇现镇长为糖工出身，副镇长过去是使女。城里老少皆知的“朱凉粉”告诉他，苦人翻身了，富人只要子女个个参加工作，处境也未见得有多坏。

他到睢水、板栗园、苦竹庵各处去重温旧梦。同时了解赵鸿图带人组织第一届县人民政府，征粮、剿匪、巩固政权，国民党三二师起义又叛乱的经过，农民怎样由观望到行动，以及当时社会风貌的种种细节。调查的对象从干部、农民、军人、地下党员、教师、商人、家庭妇女，到昔日的告化、袍哥大爷，直到自己的哥哥杨印如。这是他一生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他的札记本写满了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小字。你几乎不能相信，这小小的一册竟记载有几十万字。

他注意搜集各式人物“应变”的史实。最初触动他写《红石滩》的，就是这批活材料。

听别人告诉他，河清的恶霸万卓生于解放不久就回去了，仍然做乡长，做征粮队长，仍旧坐了滑竿进城开会，后面跟了一批斗伴。春季学校开学，他也仍然对教员讲话。只是表面上穿着、吃喝全变样了，到了即将开始“减退”，这个人被捕前，更加会装穷，背地藏匿起一切值钱的东西，偷偷享受。

土财主对于解放军来临的想法，完全凭红军北上长征经过此地的老经验。卖谷子，筹现款，预备跑滩，或者藏到哪里。1934年的经验对他们还有影响，总以为跑一趟又没有事了。他们对这一场人类史上数得上的大战争，所知实在可怜。县镇上的商人，“应变”的办法显得乖巧。开初几天，不少商店早早关门。不然就把铺子里的东西逐渐减少。再过一段时间，把铺子关了，在街边摆摊子，卖个香烟什么的。到了最后，就连摊头也收拾了。因为商人最敏感，对新制度放心不下，慢慢把货物藏起来，或者转移到外地去。当人心安定，居委会催他们开业，开头都说：“开啥子业呵，本钱都吃光喽！”

要写一部川北解放的长篇小说，安县第一任新县长赵鸿图和他的同志们是主角。旧人物的“应变”只是一个背景材料。他当时对赵鸿图的为人性格、平叛的过程都做了记录。令人深思的是他始终没能从正面手写出来。到了不限制一个材料是由正面写、还是由反面写的八十年代，他才找到表现

这一切的“自己”的角度——原来还是《淘金记》的角度。（你说《淘金记》的视角，仅仅是一个反面的角度？好象还应复杂一点。这是旧的乡镇世界本身的角度，不是由一个外来的世界看乡镇。至于合作化、公社化以后，旧的乡镇世界瓦解，新的乡镇世界我又不知道。所以我写了新的农民，乡镇却消失了）

他在故乡也观察新生活。大批转业军人成为农村骨干，是很显眼的现象。他曾做过访问，知道他们立下的业绩，也发现许多军人成为女性争夺的对象。有的还利用自己的地位欺辱妇女。他跑到乡公所、社办公室去听登记结婚和要求离婚、退婚的人的申诉。他虽然很少采用婚姻、性爱的主题，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写下感想：结婚和离婚都为了那同一原因：生活。从这些案子，我们不难看出，一部分农民的生计仍然是不富裕的。想起一个人竟至为了一份口粮、两件衣服而结婚、离婚，这该多难受呵！

他敏锐地从光明的农村看到各种阴影。他乘车进入安县，在界牌乡停车喝茶，与老乡刚搭上话，便听到他们对上级硬性规定种植粳稻的不满。在县里他终于搞清楚了原因：那一年稻种运到，快下种了，地委突然指示，一定要拌上什么药才能种！季节过了十几天，赶快来电话，不拌药也可以了，已经耽搁。

还有一个社，秧母田都做好了，上面才把粳稻种分配下去，还说，这么远运来的，一定要种！

到了这一年下来，许多社减了产。一个社干部对沙汀说，主要原因是种双季稻和粳稻，要减产近一半。无论是多种一季或改变品种，都不合川西北高寒地区的实际情况。可是五十几户的小社，你种三十多亩粳稻都不行，一定要完成二百亩，保守的帽子才允许摘去。社干部跑一趟乡上，挨一次批评；受一次批评就回来开一次群众会。最后一次会开了三个晚上，每次都熬到鸡叫，群众吃不消了，说：“好吧，就照你们的意思订计划种好了！”

“通没通呵？”干部还叮住问。

“不通没办法啦！——通了！”

这简直就像一出喜剧小品。可悲的是这种瞎指挥，从干部一边讲，用心却是极好的。当时的社干部要求上级能允许先试验一季，领导说，这是已经试验过的，哪里还用得上再试验呵！又说，这些种籽是打了不少麻烦从天津运来的，领导上未必还会害你们？你们举件事实来看看，政府哪件事情是害你们的？

用政府的威信做抵押，办错事，恐怕就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等沙汀彻底看清楚，则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创作《木鱼山》的时候。这些故乡土地上发生的事实具有尖锐的政治性质，他无法写入小说。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能作品反映的人民内部矛盾方面。

这一“转移”，给他带来最有深度的几篇作品。

从安县赴三台尊胜，为了访问农户的方便，索性在王达安家的堂屋搭起床板住下。他很快发现这个乡的农业社情况比去年复杂了。他与几个要求退社的社员谈过话，了解社员对生产、借款、普选的各种意见，发现合作社有影响农民传统利益的一面。比如收花生，本地历来的说法叫做“挖一季花生长一身肉”。尊胜社安排妇女扯花生，起初大家十分踊跃，带起孩子上工。后来社里规定吃一颗花生扣一个工分，谁都不愿干了。统购统销后，农民闹粮的纠纷也相当普遍。有的统购会上发生扭打干部的事件。但是在各种矛盾

中，乡村干部的任劳任怨是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的。

沙汀一次在睢水参加干部会，会场设在睢水河对面的小庙。有个姓伍的干部久等不到，大家说为了粮食问题有些人在与他扯皮，他老婆受不住骂，常和他吵闹，今晚也许不会来了。可到了深夜，他终于露面。一进场，有人忍不住逗他：“听说人家喊起你的小名在骂呀？”

“骂就骂好啦！这一带哪个不晓得我叫伍奶娃？”他满脸不在乎的神气。

这个对答的场面深深触动了她。

在尊胜，他了解到合作化高潮抽了许多能力强的乡干部回家办社。邬述成就是其中一个。结果，八元一月在外的的工作津贴取消，医疗证也收回，老婆在家天天抱怨。邬所在的社初成立时，把社员吃肉、推磨、治病，甚至剃头都包了，以为是体现合作化的优越性。勤俭办社后，社员闹着借支，开条子，但邬述成不管女人怎么闹，一个钱也没挪用过。

沙汀是最熟悉旧时代农村基层头面人物的，现在，他被这些终年戴一顶皱巴巴帽子的农民组织者感动，想从农村尖锐矛盾中写写这些人。安县姓伍的和尊胜姓邬的，合起来，形成了《老邬》。小说的主人公邬大全对于别人喊起他的小名骂，是这样回答的：

“他骂好啦！板板桥这一带，哪个不知道我叫邬奶娃呀！”

在尊胜看到的另一个矛盾是大规模工业建设向农村争青年劳力。他了解到农村青年在这个专区里，因为招工被卡，自杀、忧郁成病的最近就有四十儿人。工程部门在乡下私招的很多。德阳兴建重型机器厂，吸引了许多青年努力学技术、学文化去应聘，而拒绝出席晚间没完没了的会议。王达安告诉他，上一季度他们社的几个会计都想外出，没被批准。其中有的故意不计工分，不请假，便进城看戏。背后说，我就要犯点错误，让社里开除我哩。

站在合作社的立场上，对这些自然十分忧虑。但沙汀接触到的这些一心想离乡的青年又都很可爱。1957年5月，三台传来成都紧急通知，让他回省准备赴北京开会。他在公路上临时搭上一辆卡车，在车上就认识了一个小石工。这个青年很乖，先是要同他换座，后又提出可以把他的提包放在自己身上，都被沙汀谢绝了。小伙子结实红润，高鼻梁，头发干干净净的。身上穿了两件衬衫，外面的一件黑洋缎，白纽扣。谈起来知道他家里有八口人，他去年结了婚，女方比他大两岁，二十。

“你出门她挡没有？”沙汀笑着问他。

“这都挡得着么？”他也笑。

“走的时候一定哭过。”

“那才没有呢，只是有点忧忡忡的，——我们天没亮就动身了。提起包袱送了我一截路。”小伙子把脸调向车外张望了一阵，然后又转过脸来。“她会以为我还在等车呢……”

第一次出门太叫人兴奋了。所以不一会儿，小伙子恢复常态，不住地间：“到绵阳还有多远？”“汽车真是跑得快呢，两边的山只往后蹦！”

青年人的家今春进社。他在山上打片石，会放炮。他说他从来没有放过瞎炮。七角钱一立方，九扣。“为什么要九扣？”“你堆的方有夹缝呀！”前几天，铁路上招聘，恰好他包的工完了，又有打石头的本领，队上放了他，今天他才能跟着招工干部离家。出来的人有十六个。想来的很多，但不少人不是不会技术，就是没有三十斤粮票，被卡掉了。“要三十斤粮票？”“对啊，出来第一个月是学习，吃自己的。”听说沙汀在成都住，很天真地问：“要是

我早前认识你，你能为我找个个工作吗？”

“他们说，到铁路就好了，常有技术交流会，就不兴把技术秘密起——是这样的吗？”

这个十八岁青年促成他写了《摸鱼》。虽然小说主人公没有能出门，也不是石工，而是个摸鱼能手，作品似乎又是站在让人安心从事农业的立场上，但人物是可爱的，有活力的，不是被“批判”对象。沙汀反映了农村的一个矛盾，同时被这些对生活充满憧憬的青年吸引，他的感情在作品里显出复杂的内涵。

可是，在他以后陆续产生的短篇里，这类矛盾消失了。双季稻成为增产的主要措施。要求多留粮食必定是富裕农民挑起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你追我赶》，这是一篇在结构技巧上相当圆熟，受到茅盾称赞的作品，那种揭露真实生活的精神已被淹没了。因为中间横亘着一个“反右”风暴！他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1957年春日，在安县秀水的汉昌乡参加过一次农村鸣放会，对统购统销引起的农民波动，他有多重的感受。不像他“反右”之后重新扭曲认识写出的《风浪》那么简单。

可是运动来势很猛。在四川他所领导的文联系统里，流沙河的诗歌出了问题。省里安排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同他一起到菱窠拜访李劫人，想请他出来讲话。不料，李很不理解，当面拒绝了。

告辞出来，李劫人悄悄把沙汀拉到一边，说：“老沙，现在水浑得很，你不要随便插足啊！”

到了开座谈会那天，李劫人还是赶来参加，并发了言。但他是用“诗无达诂”的老话为《草木篇》辩护，并替文联负责人沙汀他们解围，甚至天真地说：“你们不要打‘红娘’，应该打‘老夫人’嘛！”

这年6月，两人一起乘车、船出三峡，经京汉路北上开会。沙汀一直为老朋友担心。路途上有足够的时间谈话，他把省报记者调查流沙河家乡、身世的一份材料（现在看来是失实的），交给他看。李劫人才算转了弯子。

北京等待他们的是三个月的批判丁玲、陈企霞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以“反右”为主题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连续不断的“地震”，使他丧失政治上独立思考的能力。除了积极投入“斗争”，不断地检讨或准备检讨，还能做什么呢？

他在批丁陈的会上与张天翼、艾芜联名发言。在人代会上，与李劫人联合发言，题为《文汇报利用草木篇作者的批评点了一把火》。这后一个发言是他起草，由李劫人宣读的。后来知道，毛泽东听到这样一个联名方式，当场不以为然地说：“这两个人怎么联得到一起呵！”

这是非同小可的指示。所以回州后，省里内部批评沙汀对待党外人士的迁就态度。他一边检讨，一边去动员狷介的老朋友改变姿态，终于使李劫人过了关。

他这时已经在成都西郊的营门口住家。是几间瓦房围成的一个独院，抗战时期的疏散房子。离机关比较远，但比布后街住得宽敞、安静。他喜欢它的乡村风味。

岳母黄敬之一年后便是在这里逝世的。其时他在地开会，紧急中一时找不到医生，附近的刑警大队养有一批警犬，配有医务设备，是一位兽医先来诊治老太太的病。为了这件令人沮丧的事，玉颀很伤心，他也十分内疚，时时忆起睢水十年他与外界联络用岳母的名字，和岳母为他们所担的许多惊

怕。

整个1958年，他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远比往年少。他有一种不愿在城市久居的情绪，有空便想下乡。年初到新繁、广汉、德阳、三台兜了一圈。6月，赴成都郊区访问。7月，三台双龙乡短期完成旱地浇灌，在全省叫响，他立时赶往那里，后来又去王达安的尊胜社，费时两个月。

双龙此行，导致二十年后创作《青桐坡》。

他是7月9日由三台乘长途汽车赴双龙的。在三元下车，走四十里旱路，进入深丘地区。沿着梓江，灰褐色的山岭蜿蜒起伏，翻过骡子岩、青桐坡、大桠口、篾匠坡，来到目的地双龙的高峰社。

他住在水文站附近赵映让老汉家里。全村大部分人都姓赵。六十多岁的赵映让和他的隔房兄弟七十多岁的赵映平告诉他，这里十一代人都到山底的河里背水喝，现在才喝上了井水。

二十多天，沙汀足迹走遍双龙，观看了水塘、渠道、水库，参加过车水、改土的劳动，差不多每一晚都要夜战，不知道与多少人谈过话，开过会。高峰社社主任赵复祥同他父亲围绕“超支”引起的冲突，团支部女书记文素芳两次离婚的纠葛，和这个社的无数人物，后来都写进了小说。

与上海、睢水时期的写作不同了。那是依靠故乡生活的长久积淀来虚构的。现在他是个“内行”的采访者。内行到在干活中可以指出水车架设地点的对或不对，以及改修沟道如何节省劳力。但是采访影响了他的想象。如果对比《青桐坡》与他的双龙乡札记，你会惊异于他大量采用实际记录来构造小说的创作方式。

他记录了全部见闻。这是大跃进时期一个“先进”高级社，干部带领群众苦苦奋战的缩影。苦战的成果，群众得到、看到了一些。谁也没有去想，洒下的汗水之多与所得的利益之微，根本不成比例。沙汀参与设计、试验土抽水机，运土，做燕儿窝，失败了重来。当看到梓江的水终于翻上了山坡的时候，他与农民干部都狂喜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看到的绝对是事实，他的受感动也是事实。

下个月，他带着从双龙获得的情绪到三台尊胜，看到那里的水利工程，他感到：天很空旷，浩大，上上下下都可以望得很远。心情非常开朗，舒畅。感觉到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的奔驰。在双龙、尊胜，他也并不是完全看不到无休止的改土、并社、夜战带来的弊病。水利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宽，劳力紧张，把大春耽误。有些活路不讲科学性，只凭体力硬干。但是经过“反右”，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从脑际掠过，他也会用学来的“主流”论、“本质”论，一一加以澄清。群众积极性挫伤产生的不满，用“阶级斗争”学说一套，也便释然。因为故乡的建设不够“典型”，他另辟生活基地，每年不辞辛苦地下去。结果是先验地在寻找与“政策”对应的例证。他没有想到“先进”的试点是按照特殊的条件形成的，可能是最真实的虚假。他远远看不到“全部”。“生命力的奔驰”驶入错误的航道，酿成的是悲剧。

（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说的“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意思？不是。农民的劳动是真诚的。也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虚假。但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你、我，都沉醉在一天早晨醒来便摆脱掉民族贫困的浪漫理想中，是历史的虚假。像你的《假日》，那里的食堂不久都垮了，你写的是在历史面前黯然褪去光色的“事实”）

所幸他写得很少。四年里，写新农民、新矛盾，似乎略有所获。写到

“反右”以后，就不那么有信心了。

十三陵水库是中国“大跃进”的一个象征。文学跟随政治，忘乎所以地奏起了“畅想曲”。他在北京开会，作协总会副秘书长一连找他谈了两三次，动员他去劳动一段时间，可以担任水库工地宣传部副部长，同时进行创作。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答应，推荐了艾芜。

艾芜就像赴鞍钢那样欣然同意，去了，搞成了几十万字长篇的半成品，却从此搁浅。想到让老朋友做“替身演员”，他很感歉意。后来是他通过刘白羽，由作协党组出面好不容易劝动艾芜，才将小说放弃的。

这是不是由他的自知之明产生的农民式的“狡猾”呢？

岁月不平静

谁料到大跃进紧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作为一个社会风习的研究家，他在笔记本和各种纸片上随处记录下见闻。

1960年，双目失明的大哥摸到成都来诉苦，说高征购给家乡带来的困难，加上天灾，顺义坝那样的好田土都荒芜了。老百姓病倒或纷纷逃荒流亡。他完全不相信兄长说的情况，答应每月给他增加生活费用，批评了他的情绪。

但到了1961年，农村的灾情蔓延到城市，蔓延到他身边，不由他不信了。

他亲眼看到锦江剧场的巷口墙脚边，有人在啃从附近饭铺拣来的骨头。商业场门前路灯下，摆篮子卖凉拌“无缝钢管”（蕹菜），居然有穿呢制服的人蹲下去买一盘吃。小学中午和下午放学，一路吵吵嚷嚷算粮食帐，算自己这个月还剩多少。父母子女每天要声明一顿吃几两米，弄得不好便会发生争吵。招待所里每顿也离不开“无缝钢管”。厚皮菜比“无缝钢管”还要难咽，能把你肚里的油水全刮光。1962年开始恢复，市面上有点东西卖了，但价格贵得吓人。他和玉颀在重庆南泉住，买一块不到一斤的红苕，一元多钱。家里主要吃瓜菜煮面片，只给他一人吃鸡蛋，一元一只。三年里花光所有存款，《祖父的故事》就是为还清出版社的支款而编起来的。

没有“当前的现实”好写了。1960年还有情绪写大跃进。《你追我赶》在《人民文学》发排后，为了某几个字句，他还会给千里之外的编辑部发航信、发电报，要求修改。现在写什么呢？

参与《红岩》的修改、加工，似乎释放了他一部分无处散发的写作热量。早在1958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到成都西门外沙汀家拜访。坐在房前的凉台上，沙汀拿出重庆文联刚寄到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计划，指着其中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预备合写“中美合作所”的长篇一条，说：“这可是个大题材哟！”

这个选题原是以一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做底子的。出版社跟沙汀一样有眼力，当即决定去重庆约稿。到1960年初，小说初稿铅印了一

百本征求意见，暂名《禁锢的世界》。听说有人持否定态度，他拿来一气读完，发现它虽然粗糙，显然是一块璞玉，是有厚实的加工基础的。5月，他把原订去武胜的路线改变了，先到重庆，征得市文联负责人王觉和市委文艺处的支持，由林彦、向晓和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陪同，一块到市委机关的狮子滩长寿湖农场去找另一作者罗广斌，商谈进一步修改的计划。

他看到的罗广斌，是个放达、热情，说话诙谐的汉子。杨益言则稳重、深沉。罗、杨和因1957年鸣放的“错误”中途退出写作的刘德彬，都是渣滓洞囚犯中的幸存者，现为团市委干部。他们在解放后做过几百场报告，对狱中的情况相当熟悉，写作情绪饱满。

沙汀与他们当夜在农场招待所长谈。次日临行前又谈了一次。体提议加强许云蜂、江姐、成岗等人的描写，不要坐在渣滓洞写渣滓洞。要从真人真事中跳出来，从单纯的“禁锢”中跳出来，联系全国的形势。《红岩》的修改能打开局面，与他的这个思想有关。

从长寿湖再返重庆，他让王觉、林彦向任白戈、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部长）转达他的建议，给罗、杨充足的写作时间，让他们专门去北京参观革命历史文物，开阔眼界。然后，他才放心地前去武胜进行他的访问。

罗广斌、杨益言1961年8月带着在北京新改的本子返川。沙汀一拿到稿子，连读两遍，发现改动很大，长寿湖夜谈提出的意见被消化得不坏。他于是主动表示愿意再详细提供看法。这样，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罗、杨每天或隔一两天，就来到他这时居住的新巷子十九号谈长篇。总共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省文联宿舍新巷子十九号的前门，就对着布后街文联、作协机关的后门。两处都是旧宅院，比较宽大。沙汀从西门外搬进十九号第二进正房，房前有一个小天井。已是酷暑天气，三人围坐在天井一张木方桌旁，挥动扇子，一谈就是一下午。第一次谈，他就说：

“稿子写得不错了。开头铺得很开，我原先怕你们后面收不拢，狱内狱外的交织写法驾驭不住，现在看这个估计错了。”他掩饰不住对改稿的满意，决定逐章与作者进行讨论。这天，对于第一章工人斗争的侧笔究竟应如何写合理，谈了很久。小说人物于新江，是回头看到兵工厂的那场火好呢，还是看到岩石上映出的红色好。在把握艺术的含蓄、深刻的分寸上，两代作者交换着意见。还有一些工厂的描写总感不真切，他建议压缩。后来作者把它们大部分删掉了。

以后的讨论，围绕江姐、许云峰的时间花费最长。江姐看到丈夫彭松涛被杀的告示，沙汀认为写得过于冷静，应当允许妻子泄露感情。江姐用手挠头的习惯动作，他提出应挖掘不同的含义。他认为小说中有些破绽，是因为对当时的经济生活、粮政兵役、社会风尚研究不够造成的。谈到有人认为双枪老太婆的传奇色彩太重，和全书不太协调，他明确表示：

“生活里本来就有传奇的东西，作品里为什么不可以有一点？何况读者的兴趣是广泛的，有这么一点，读者面可能会更广泛些。”

由于他的主张，双枪老太婆的情节在定稿时没有再更动。

他与《红岩》和它的作者的关系，绵延很久。他曾给重庆市委写信，促成它早日出版。

在玉頌病重的情况下，读完《红岩》的电影剧本。1965年，他主持省市两级文艺部门总结创作《红岩》的经验。这部小说的发表后来成为全

国性的大事件，但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为此付出的心血。

他的精力还放在培养其他业余作者身上。这也是风尚如此。那次从长寿湖农场回渝去武胜，大约住了两个月。选择这个生活基地，起因是这里的农民文化生活开展得好，是省里一个典型。由重庆沿嘉陵江北上，过了合川，便是武胜。他到烈面、桥亭、礼安几个公社去参观，辅导农民作者，帮助武胜建起全省第一个县文联。他不大住在县城里，住的时间较长的是烈面镇。

烈面位于武胜西北部离南充不远的江边上。1960年春天，这里的“大跃进”余波未尽，烈面区委的驻地人来人往不断，大家还有精力闹“文化”。沙汀在区的“劳武大学”做过双百方针的报告。他喜欢烈面一出街便是生产队。这一次虽然不像以后再次来时，对他的创作发生那么深的影响，但他结识了一批有性格的农村干部，与他们建立了友谊。包括烈面的大队社书记、陈家大院的二麻哥、妇女干部陈秀碧、幼儿园老师曹惠芳等。这些人迟早要走进他的作品。

从武胜回来便去北京开第三次文代会。全国的困难局面逐渐明显，国际形势也是紧张的。1961年3月，他接到通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开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

为了第二次出国，他穿上并不十分熨帖的西装。

代表团团长是巴金。这个老朋友的早期著作在1959年前后受到一次粗暴的批判，但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安。他的真诚待人的品格一如既往。其他七人是刘白羽、冰心、叶君健、李季、韩北屏、杨朔、林林。代表团负有严峻使命，团结亚非作家朋友，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纪律严明：不能单独出门，不能在室内谈重要问题，不记日记和不写家信。来回路经香港都住在鹰天岭，从半山上可以俯瞰林立的摩天楼。在一次文化界茶会上，见到三十年代认识的叶灵凤。叶告诉他，在港的作家每天至少要写五千字，才能维持一家生计。此地生活标准与吃“无缝钢管”自然不能相比，反差之大，使他心里不太好受。

东京会是在3月27日开的。住过两处地方，后一处“福田家”是有名的和式旅馆，颇有风味。讨论时，他同苏联的西蒙诺夫分在一个政治问题小组里。叶君健和这位留有小胡子的《日日夜夜》的作者熟，戏称他为“西公”。许多外国作家都来询问中国的灾情。

与巴金合作总是愉快的。他们共同拟定了代表团团长在羽田机场群众欢迎会上的讲话稿。会议后半段，团里把他抽出来专门起草了两项发言。会后，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实际由我方负担费用），进行访问。在东京访青野季吉、土岐善磨，在镰仓访藤森成吉，参加东京大学座谈会、宫本百合子纪念会，在内滩访问反对美军基地的农民，他都与巴金在一起。日本友人热爱巴金，认为他有学者风度、长者风度。后来回国在广东从化作总结，他和巴金的观点一致，认为不要把我们的作用夸大了。这两个人都不喜欢唱赞歌。

解放以来，他和巴金的关系加深，起媒介作用的是每年都要开的人民代表会。从1954年第一届开始，两人都是四川选出的代表。大会组织者总是把他俩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住，十年中毫无例外。难怪1964年报载巴金改为上海选出的代表，巴金马上来信说：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那么下次开会，我就不能同你住在一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已经习惯了。

（第一次开人代会，巴金和我住在前门饭店的一个房间。《人民日报》的同志请他给副刊写散文，我见过他写东西。他的床靠窗，我靠里面，睡得比他早，失眠。半夜里看他还在写，改来改去。他写过一篇《数字的诗》，花了好多功夫琢磨，不是才子气一挥而就的。1956年开人代会。李劫人也是代表，见了巴金便开玩笑：“老巴，把你的标点符号拿出来请客！”意思是巴金写得多。一次谈起川剧著名演员廖静秋，廖得了癌症，找巴金在上海请专家看过病。李劫人提议，我们三人联名给夏衍写封信，让她拍一部《杜十娘》的舞台电影好不好。李劫人从来痛快，说我来执笔，大家凑一封信。拟信中，巴金说，写上这一句，现代的科学不能保留她的生命，但现代的科学还能够保留她的艺术！李劫人马上说，讲得好！把这句话写进了信里。——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三人的呼吁见了效果。《杜十娘》在京开拍的消息传出，巴金写信来相告。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拍完电影后即逝世了。巴金在《廖静秋同志》一文中继续发挥沙汀记得异常清楚的这句话：“现代科学不仅保留了她的艺术，而且还保留了她那颗热爱艺术、热爱人民的心。”

沙汀深感这位女性和“老巴”都比自己“硬朗”。近几年他逐渐进入老境，看到自己的创作力有所消退，失眠、哮喘、肠胃失调等各种病症加重，他这个情绪型的人经常烦躁不安。凡应做而未做的事，凡叮咛后做得不尽意的事，他都牵挂在心。有时会火冒三丈，刚冒完火又立即失悔，想要找到补救的办法。他活得好累！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需要在个人外表脆弱的生命形式中注入强韧。她从巴金的身上，便吸收了这种强韧的人格力量。

他为巴金主编的《收获》创刊号写了《开会》，是一个区级干部误解和压服基层干部的故事。1957年3月发表不久，编辑部将一封读者来信转给他，信中说他歪曲了干部形象，弄得他紧张起来。人代会期间与巴金谈了，巴金说：“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上级领导？编辑部根本就不该把信转给你！”他心里踏实了。

困难时期巴金两次去成都，都住在学道街张秀熟的院子里。那里有几座小洋房，周围有点绿地。他一再交待巴金，外出可以要车子，巴金却总是步行，或坐黄包车。他常常带两个最小的孩子刚虹、刚宜去看巴金，巴金很喜欢孩子。1961年，

他还和玉颀陪巴金一同去自贡参观井盐，住在一个公园的招待所里。采盐的人，劳作苦而生活豪放，自贡在困难中似乎也比别的地方吃得讲究。

巴金对人的态度常使他敬服。朋友不论亲疏贵贱，都待之以诚。来京开人代会，他跟巴金去探望受到冷落的沈从文。沈从文也跑到饭店来招呼他俩：“三姐派我来请你们去吃炸酱面呢！”

三姐就是沈夫人张兆和。一次深夜十点钟到沈家去，把已经睡下的夫人、孩子都吵起来。沈从文的家虽狭小，气氛亲切，可以无拘无束地谈天。说起他的创作，巴金认为沙汀可写长篇，沈从文却认为最好写短篇、中篇。都觉得写电影剧本不如写小说、诗歌能锻炼文字。沈从文已经不写小说，但还关心地问，四川有些什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大家没有隔膜，也暂时忘却了政治，忘却了困难时期物质的艰窘。（你这个先前的“左翼”作家，能与非党人士保持这样平等的关系，甚至乐于吸收他们的美好人格，可是难得。在正直诚实的生活态度面前，我认为不分什么“左”和“右”）

从1961年写完《夏夜》，他就搁笔，在考虑一个新长篇。主人公不

是农民，而是抗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写他们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困难时期好像适宜这种题材的生长，他同巴金、严文井都交换过意见。艾芜这年8、9月从北京接连来信也支持他：“解放前有许多生活可以写，而且你也知道得很多，再加以有计划地研究，我想是可以写出非常好的作品”。艾芜听说他身体、精神均欠佳，便动员他按作协总会的安排，与自己一起下去走走。

10月初，两人在成都会合，踏上云南之行。四川的灾情已经显露，他称这两个月的远游为“文化逃荒”。这是他第一次由川入黔，由黔入滇。作协总会派了刘真、林斤澜两位青年作家相陪，兼有以老带新的意思。从昆明向西，乘长途汽车到保山，慢慢像是沿着艾芜二十年代南行的路线走下去。经芒市到中缅边界的畹町、瑞丽。路上有时一日能遇到春、夏、冬三个季节的气候。艾芜这时改变以休息为主的初衷，去陇川、章凤采访，搜集写《南行记》续篇的材料，两人于是分手。

他折回昆明，考虑心中的长篇，同时也惦记家中的玉颀和孩子。

他在芒市给玉颀的信中嘱咐她：“公家照顾我的罐头，千万把它吃掉，不要为我保存起来”，“既然并不限制干部到自由市场购买副食品，纵贵一点，也该适当买些来吃”。在贵阳，还关心女儿刚颀离家学习的情绪，说：“连小娃住托儿所，不是也将近一个月后才习惯么？”这个“小娃”不是泛指一般的小孩，而是特指他的孙儿，杨礼的儿子的。

他的家庭生活在这个困难时期也不平静。不仅是金钱上入不敷出，玉颀提出想恢复上班，主要是子女们进入成年，问题纷至沓来。

杨礼早参加了教育工作，结了婚，玉颀要尽祖母义务，照管孙儿。两个小女儿刚颀、刚虹的求学成了他的一块心病。1962年8月，他与任白戈、李亚群、戈壁舟一起去并研。

路过乐山，看望了刚锐一家。嘉乐纸厂已经老旧不堪。乐山去年每人每月只有三钱菜油，今年算增至一两。他第一次见到的大儿媳的父亲便是去年死的，他听了觉得黯然，也想起了今年2月大哥去世消息传来时自己的复杂心情。回到成都，正撞上一个女儿高考第一批发榜没有着落，他的情绪坏透了，称这是“解放以来最不愉快的一天”。

他烦乱已极，靠编《祖父的故事》集子，大量读书，读普希金小说，读《水浒》、《紫罗兰姑娘》、《歌德对话录》、《聪明误》来压制心火。对子女，他是很动感情的。他这些日子会半夜从女儿落选的噩梦中惊醒。他感到自己软弱得无用。接到另一个女儿从重庆的来信，他哭了。看曹禺的《胆剑篇》又哭了。第二天去读《安娜·卡列尼娜》，他总是随便翻出一节从当中读起，偏偏翻到了安娜从意大利回莫斯科，与久别的幼子见面的那一章。他读着读着，不断流下泪水。他其实并不老，离六十岁还差两年，但他感到这是不必去擦拭的老人的泪。

孩子的事其实没那么严重。两个女儿后来一个学医，一个学外语，都受到很好的高等教育，只是他的情绪变得不安静。整个民族在思索受挫的教训，1962年也是他一段小小的反思时间。文艺界这年春天，有周恩来、陈毅的广州会议讲话，大家的思想才比较活跃。写知识分子长篇，帮助修改《红岩》，都寄托他写解放前题材的热望。他校读重版的《淘金记》，读得笑起来，自己问自己：十二年来写得又少既差，怎么就把一副讽刺的好笔墨丢掉了呢？

他想起抗战中在重庆听来的一个真实故事：独山失守后，在一次聚餐

会上，一些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等酒醒后又都把名字涂了。这是一个短篇讽刺素材，名字可叫《独山失守后》。他把故事轮廓和人物，习惯地写在一张随手拿到的废纸上面。

过了几天，在省里听报告。一个专区调三十个干部去加强商业，其中只有一个党员，还是个“前任党员”。他对这个绰号发生兴趣，想到一个讽刺当代干部的构思，题目就叫《前任党员》。但是他对重新捡起讽刺小说来写，还是有顾虑。思前想后，还是搁下了。

思想较前开放，障碍又没有全部消除，这就造成想写而没写的作品，日益增多。长久动摇于写解放前与写当前之间，想写小说，也想写散文、创作谈、回忆录。这一年他调整生活、调整创作计划的设想特别来得多。李劫人建议他全部改写“三记”，认为他的长篇本来内容太密。他想起杨晦多少年前提过写《淘金记》下卷的意见。前几年，他考虑过将《还乡记》作为基础再写它一两部。现在，他把知识分子长篇与《困兽记》的改写结合起来，得到一个新概念：可以写一个三卷本的新《困兽记》。有一天，他甚至把一至三卷的要点已经写在纸面上了。

（解放后，你一直在三种创作计划之间翻筋斗。写当前，写解放前和扩写、重写旧作，政治形势放松的时候，三种计划都来纠缠你，又突然发现，哪一种计划的执行你都没有准备好。我的真切感觉是：三种计划在心里仿佛打了个难分难解的结）

他的思想呈现为稍稍反省之后的芜杂。而他的身体、生活、工作，时时来打搅。为了哮喘的加剧，他想把伴了大半生的烟酒戒掉，却并不容易。为了省文联的某项具体人事把他无谓地卷入，他恼火地在心里喊道：“这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可是，我已经没有多少生命能用来浪费了！”他感觉世界如果给他一丁点的安静，他便不至于垮下。这点宁静似乎就维系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他在日记里写道：“再不给我调整一间房子，让我有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小天地，真有点活不下去了！”浮躁不定的心绪持续地控制住他。靠摆谈，靠听川戏，听洋琴，靠逛街、逛花会时不声不响地观察人们的装束、表情，想象其人的身世、脾味、性格，靠大量服用安眠药强迫休息，靠去成都东山地区的省机关疗养地五福村独住，都能得到一些心理平衡，又不能完全平衡。比较有效的方法还是重读名著，就像他酷爱一再修改作品一样，托尔斯泰、契诃夫他可以一读再读。这能为他从自身寻找力量创造条件。他天生不擅快速变更和移动。他是乡镇之子，习惯于滞留一处，静静地吮舔自己的伤痛。

肯定要出点事情了！年末，传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他的写作计划来不及调整成功，便告失效。1962年，他没有写成任何一篇新作品。他交了白卷！

死与生，两面的煎迫

四川省委传达十中全会精神是在1962年11月19日。单是文件，

一天都没能读完，又加了半天。礼堂里充满了同这些文件一样的沉重空气。

12月，他就和省里的工作组到新繁的新民公社调查。座谈、串门，与社长罗世发和其他干部谈话，按十中全会的观点去找“阶级斗争”在农村的新动向。罗世发是省劳动模范，彼此也是很熟的。

有一天，他意外看到罗世发他们利用公社代表大会的机会，见缝插针地把几个大队的书记或队长，一个个调到会场外边谈话。旁听中发现，同样是商量生产队的调整和干部人选问题，因谈话对象不同，谈的内容、方式、风格竟有很大的差别。他似乎获得一篇小说的背景和线索了，正在做合理的推想，突然接到李劫人病危的消息。

他中断下乡，赶回成都。21日与林如稷夫妇，23日与张秀熟，两次去医院探视劫公。病房里满眼是管子、玻璃瓶，此外便是一张眼眶深陷的面孔。当他们眼光相遇时，他感觉他已经认出了自己，劫人瘪下去的嘴好像裂出一丝笑容，但随即消失了。这就是那个相识了二十年的，一贯生气勃勃，擅于放言高论的师友吗？他不愿再看，赶快走出去，两腮已经有湿热的东西急淌下来。

李劫人生性怕热，豪饮。夏天吃东西赤膊上阵，冬天只穿薄薄的棉衣，从来不着皮袄。

这天省文联开会，他恰好坐在风口。上面的人尽讲尽讲，他穿得单薄，便受了冬天的穿堂风。过了午饭时间，一、二点钟才回刻“菱窠”。一进门便高喊：“给我下面！红重！”红重，就是海椒放得重的意思。他空肚喝了一杯大曲，又吃很辣的面条，当晚便发起高烧。第二天送进医院。他原来就有胰腺炎。

第二次去看劫人，他紧闭双眼，没了反应。沙汀记得今年2月在“菱窠”吃饭，饭后听他朗诵《大波》第三卷的片断，余音犹在耳边。3月，两人又一次同赴北京开人代会，车上还兴致勃勃地讨论《林海雪原》。劫公说这是公案小说的传统。谈起留学生涯，他对法国人的男女关系还乘着酒兴发表宏论。四个多月以前，在沙汀主持的《清江壮歌》座谈会上，发现有人要抓他的辫子，因为老头子对这部作品的质量大不敬，居然讽刺地说：“这本书若果要传之久远，最好改写。”是沙汀替朋友遮掩过去，才没有掀起轩然大波。可是现在他多么希望他能说话，不管这话是对或者错，只要能说！拖到24日晚8时，传来噩耗。他参与办劫人的丧事，想写一篇悼文，只得了几行字，竟写不下去。公祭后在磨盘山下葬，看着骨灰坛置入一个人字形的小廓，然后封存。鞠躬如仪，相随下山，李师母就在他旁边，只见她望望平野、树丛、远山，叹息着说了一句话：“地势是好！”李劫人的家属有意将“菱窠”故居交公，好辟为文物，这是很适宜的，但他做不了主。整理遗著，保存劫公多年收藏的万册书籍、千幅字画，都可以办到；唯独这进一步的纪念方式，因为李劫人的身份和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是很难的。就连悼念文章，省里起初还授意不发。过了年同意了，却特别通知他不要写。原来还是1957年他与劫人联名发言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影子在起作用。他只有抑制悲痛，尽心地修改张秀熟纪念李劫人的文章，来寄托哀思。过几天，为林如稷、洪钟、罗湘浦等组成的遗著整理小组阅读《大波》第四卷未完稿，想起在李劫人书桌上看过的写满各种蔬菜价格的纸片，毛笔字比自己的还小，佩服这位师友深湛的社会调查功夫。可现在，将永远失去这位终生替川西立传的人了！他真想躲出去平静一下自己。艾芜去年11月就从北京来信约他一

起去川东搜集解放前的史迹材料。1963年1月下旬，他动身去重庆与他们会合。同行的还有《红岩》的两位作者。艾芜一年写了八个短篇，见了面还直说把时间浪费得太多，开玩笑说得了“写作病”，一天不写百来十个字浑身不舒服。与朋友比，他全年只改一些旧作，不等于荒废吗？

他心里还存着将来写解放前夕长篇的念头。在山城出了一大堆拍摄电影《红岩》的主意后，就与大家沿嘉陵江上溯至北碚而南充。一路上遍访当年的地下党员和游击战士。3月，艾芜他们赴岳池、广安，去华蓥山地区采访，他决定与孔繁祚和一个省报记者，到生活基地武胜烈面看看那里的变化。说好过几日再合拢一同回重庆。

烈面区委很冷清，再没有两年前电话铃声不断的热闹场面。这里显出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后的一派沉静。过去熟悉的一些干部，二麻哥这个孤老头，大队杜书记，经过了1961年冬天以来的风风雨雨，于今更历练了。说起1962年小春刚有收成，群众饿怕了，收麦子带平小口袋偷偷搓，胡豆地里尽是空壳壳，怎么处罚也制止不住“拿摸”。“我叫大家搓胡豆吃。”二麻哥坐在阶沿边对他讲述。“有人说，嗨，平常尝点新他就骂，今年叫我们吃？！你想，咋不叫他们吃嘛，走路都在打偏偏了。吃了几天，大家走路颠颠的，都飞得起啦。一共吃了三百多斤青胡豆。我说，这下不要偷？他们说哪个还想拿啥！”

两名妇女干部曹惠芳、陈秀碧，与他长谈了杜书记的为人、婚姻和做群众工作的情况。

他记下一份完整的资料。

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结交的农民干部身上。西关公社四名下放支书的座谈，特别是其中的黄勤明的谈吐，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四人中他穿得最差，一件旧棉背心，一顶棉帽，脚下踏着草鞋。但脑筋灵活，说话容易激动，露出调皮神色。他挨过批判，领导的是远近闻名的落后队，经手半年，社员对他从辱骂变为尊敬。

区委毛书记陪他乘航标站的划子到西关去看黄勤明。他们先见到西关公社的张书记，谈起过去公开告状的一个姓陈的农民，后来当了张的面如何赞扬黄勤明。那个对话很有趣：“张书记，你给我们选了个好当家人！”姓陈的说。“你不是说，他是来给你们挖坑坑的吗？”张书记故意逗弄他，揭他的短。

“我从来没讲过这个话！”

“怎么没说啦？我记得很清楚，你跑了两根田垌把我叫住说的呢！”

“哎呀，那时都在那么讲嘛！”

沙汀发现这个张书记的谈话很生动，很有水平。农村的动作总没有城市快。十中全会的风刚吹到这里，所以，这次对他今后二十年的创作发生重大影响的西关农村调查，虽然已经有了所谓“抵制单干风”的内容，但主要还是了解农民干部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所作所为。

张书记谈起了黄勤明为什么会遭群众骂。他们队贷了六百斤米准备换红苕藤，这时已是5月底，社员分的小春快吃完，便闹着要分米。黄勤明把米用柜子装起，任凭别人骂他偷吃也不吭声。后来仅用三分之二的米便换齐了苕藤子，过了端阳，担水栽下，才把二百斤余米放出来分给了社员。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些救命的米从他家原秤进，原秤出，不但颗粒未少，还多了二两。群众对他的态度于是大变。黄勤明对沙汀讲过张书记是如何领

着大伙渡荒的。1961年打从3月起，这个公社旱了一百三十多天，不少队下了四回种：秧子、红苕、胡萝卜、秋芥，都死光了。西关的田地大多是观音土，秧子秆死了，锄头挖不动，要用钢钎戳，撬棍撬，硬是第五次种上了白萝卜，收了！初夏，张还动员三队群众种南瓜，大家哪里有积极性？推说没得种子。张拿来四十斤，一户种三窝。后来全靠这些萝卜、南瓜过了荒年，群众感激得不得了。

顶住群众的“消极”，还要能顶得住上级的“积极”，才行。沙汀这些天，听到黄、张两人许多抵制工作组瞎指挥的实例。这是未来《木鱼山》的基本素材。

黄勤明队里抵制硬性条播小麦的办法是这样。上面一检查，群众就装傻：“挖不来沟呀！”工作组找来黄示范挖，“就这样挖吧！”转身还是照老规矩干。后来社员见工作组来了，对黄说：“你赶快去犁田，让我们来对付他！”

张当农业书记时，尊重社员，不彻底贯彻技术规格，检查团一来就挨批评。到了秋季，他的公社庄稼长得好，他又被提为第一书记。

可是这样干，是充满危险的。黄勤明向上级反映减产实际情况，“我分的口粮，一天只能吃几两”。就为了这句话，反右倾挨斗，大队支书降为支委。他娶的是地主女儿，这时又被加上包庇地主、贪污换苕种用的大米等恶名，驻社干部利用张书记在县里开会的机会，组织斗争会，让黄跪条凳、跪炭渣，把腿杆、膝头跪得浸出血来。张书记在县里、万年、烈面、西关四个地方都挨过斗。为了他反对公社第一书记五天收完红苕的不切实际的部署，他这个副书记在电话里与顶头上司顶撞，县里责令他检查。

非常的时刻，一个基层干部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是需要一点中国农民的坚忍性的。沙汀很了解川西的乡民，同样能体会到川东百姓的优良品性。他忘不掉黄勤明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呀，有的时候就是磨眼也要钻呢！”

他体会着这个处在磨石与磨盘之间的滋味，曾想写一篇小说，叫《钻磨眼的人》。后来还是把这句话“送”给《木鱼山》的主人公汪达非了。

（你解放后也一直在当干部，这里的推崇似乎包含你的心境在内？我不如他们。我经常心与愿违，或者言不由衷。所以我说过基层是“强者的岗位”）

本年10月下旬，他还去过三台，又一次与王达安朝夕相处了近二十天。参加乡、社各级会议，从旁观察王达安怎样处理日常事务。两人一起同饲养员、邮递员、拖拉机修配员谈话，甚至乘兴喝几杯水酒，使他增进了对这位出色的人的理解。王家每顿都是“搅搅”，社、县为了照顾他，三次送来猪肉，都使他心绪不安。靠了阅读带在身边的契诃夫小说《幸福》、《学生》，才压下烦躁。

王达安的工作水平常让他吃惊。看王的笔记，字写得比一般大学生都强。王不同意乡里的安排，主张全力把小春种下去，话说得很生动：“雁，已经过了。牛嘴里冒烟烟了。赤脚踩在泥土上已经觉到有点冷，不能再推迟了！”十中全会已经使尊胜有了富农“夺印”，霍家营“阶级斗争”的“经验”。沙汀思想上的弦也绷得紧。但是，王达安讲过的他从1959年到1961年的苦闷心情，还是很能打动他。与西关公社的干部反对浮夸后的遭遇大致一样，王也受过批评，后来在大小会上默无一语，不愿说任何做不到的大话，也不反驳别人。他也是钻在磨眼里了！像西关那种上级突击检查堆肥，就在靠近马路的田野弄些石块垒起，外面用泥糊上的做法，他们也被迫干过，心

里是很难受的。

王达安使他不断联想到张书记和黄勤明。就在尊胜的一天夜里，他感到了创作冲动。用黄勤明的一个故事构成的《煎饼》（又名《隔阂》），已考虑了几个月，终于找到了前后通气的关键：只要把小说里的支书刘家柏留在老太太家吃煎饼的打算，写成是临时的、意外的，一切就妥帖了。心理的曲折度使小说结构摆脱了呆板，一下子定型。

《煎饼》是他“文革”前最后一篇颇见功力的小说。它定稿在1964年春，搞了将近一年。越来越强的表现“阶级斗争”的意图，对原来的生活进行“典型化”的改造。故事原型在他的札记本里是这样的：黄勤明队上有个生活富裕的养蚕妇女，霸占了工具，不肯把一部分蚕工交劳弱户做。黄几次晓以大义，都置之不理。一天乘她赶场的机会，说服她丈夫把养蚕家具搬了。后来她破口大骂，声称“我以后看到他的影子都要骂一个够”！黄勤明听说了，一个下午，女人正在煎油饼子，他一直走入厨房，笑笑说：“让我帮你烧火，你就尽气力骂。不过，挨骂饿了，油饼子我可要吃的！”硬坐到灶门口去。结果不但没再挨骂，还吃了两三个饼子，连粮票对方都不收。

这是一个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例子。基本轮廓保留下来，连西关楼房馆的名称、风貌都保留了。这个吵吵闹闹的向大娘却由富裕农民降为贫农，在她的背后安插一个挑拨离间的富裕户谢胡子。小说的价值从现在看反而大大降低。年初下乡获得的东西，到年底下乡重新思考时被扭曲了。

两次下乡真正积累的生活，从此潜伏下来。这一年，下乡前后都是开会。1963年3月在武胜与艾芜他们会合，回蓉便去北京开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讨论“写十三年”的问题，这对他的两个长篇计划都极不利。巴金从上海来参加文联会议，两人碰头了。朋友们得悉他的身体不好，创作常被打断，惋惜他的处境。天翼、文井、其芳都建议他借用作协总会的力量，请一两年创作假，摆脱省里的工作。文井夫人说他太善良，应该减少顾虑，争取时间写作。巴金终于说服他彻底检查病情。4月末，他与巴金、孔罗荪同车，来到阔别二十五年的上海，住在东湖路招待所。他去参观了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大陆新邨的故居，知道离他住过的四达里、德恩里很近，但未能便去凭吊，倒拿出时间帮助在沪演出的川剧团解决吃米的问题。

5月，利用等待中山医学院床位的空隙，陪巴金夫妇、刘白羽赴杭州做短期休养。碰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也在这里。他觉得有些紧张，就像小孩子背着家长做了一件什么事。巴金自告奋勇去说明他的病情，这才恢复了他的游兴。

夜晚，从临湖的杭州饭店出来，同巴金在苏堤漫步。想起青年时代两次与玉颀避居此地，写出他的第一批作品，恍然若梦。

延安时期认识的陈学昭来看大家。见面第一句话，“你看我犯了大错误”，眼泪汪汪的。他不知道这个文静的留法女性如何会成为“右派”，安慰的话脱口而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好像犯错的不是陈，倒是自己。

本地主人九姑（方令孺）赏饭，席间有一怪菜，名“三杯鸡”。很久以后，他想起了这道菜，好事地写信给李济生转问巴公，是否记得九姑介绍的做法。据说，巴金一口气说出来：一杯香油、一杯老酒、一杯酱油，不加水，将鸡砍烂放入干蒸即成。从此，他总忘不了这个菜，忘不了巴金的记性。

返回上海，他住进中山医学院的十二号病房。十七天的时间里，检查了鼻子（出气时常受阻。大夫十分健谈，就是没谈气紧算什么病）心脏（几

天前刚与巴金、萧芜登上杭州六合塔第四层。一大群人只上去四个，看来这个部位还成）神经（会诊：严格意义上你没有患神经官能症。失眠只要加强调节）肠胃（为何时常泻肚、疼？“胃溃疡十年不犯，不会有问题”。林院长是专家，其话可信，虽然他也有行政、业务矛盾的满腔苦衷）。

医院宣布他是个没有重大病症的病人！这使他一阵轻松。巴金临时被派往越南访问，于是两人再次同行赴京。在邵荃麟的干预之下，四川批准他的要求，先行休养半年，然后搞创作。他精神愉快地回去。这些天他长了三斤分量。从体重计走下来穿鞋，他幽默了一下：“只长了一双鞋重！”

没料到，他如同重获生命力一样，很快下乡到三台王达安处同吃同住，1月7日被召回，正准备当年第三次进京开会，玉颀却病了！

玉颀肚痛由来已久。谁也不把她看成是比沙汀病重的人。可是最近有些蹊跷，健胃止疼的药吃下去顶不住，人虚弱得不行。

1月9日，他决定陪她诊病。与中医学院联系后，知道相识的医生在省政协开会，便冒雨去那里按脉。过了两天，她稍好了些，两人还去春熙路散过步。所以，13日6时半起来，虽然玉颀不能送他，他并没有十分担心。在床前反复叮咛她要按时去医学院门诊部检查，便驱车前往郊区机场。

飞机一直到9时5分才起飞。因为这天凌晨，成都上空大雾弥漫，久久不散。近处机场的指挥塔都时隐时现。从停机坪侵入候机厅玻璃窗内的湿气，带着一股新鲜的腥味。他觉得两小时等待某种吉凶未卜的前景，犹如等待了一世纪！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如此辉煌隆重！毛泽东、刘少奇到会，周恩来、陈毅、贺龙、邓小平做报告。赵树理在人民代表如潮涌出会场的当口，只说了一句他的《一场风波》“比《夺印》自然”，便被冲散。后来在作协相聚，大谈了一阵双方都视为生命的农村。

回到成都，听说玉颀患的是肠胃癌的一刹那感觉，金易迸射天外，大陆急沉海底，他失去知觉地站立着。这是一个人无法上诉的终审判决？！

记不起1964年的元旦是如何熬过的。

只记得盼救星一样，盼望巴金寄来药物。有人告诉他，日本有一种新药“四列（丝裂）霉素”，很有效用。他便写信到上海、广州询问能否在国内购到。巴金见信后立即行动，遍拢日本友人相助。正在上海办工业展览的日本代表团秘书长押川，和沙汀访日时为他们做过秘书的年轻日本朋友宫石，都十分友好，紧急打电报回国买好药，空运上海。药是1月8日自东京寄出的，本说一星期到达四川却未到达。这时，上海、成都两地信电交驰，可以想象当事人的心情。1964年1月14日巴金致沙汀：“药到上海，当马上托航空公司寄成都，我已和罗荪谈好，请勿念，其他事你不用管。请你保重身体，不要多往坏处想，也不要过分焦急。目前只望药能早到，而且效力很大。”

1964年1月15日沙汀致巴金：“丝裂霉素即承宫石由日本寄出，可能还得一些日子方能寄到。……医院一个星期多前，即已开始注射一种美国特效药，反应不大，效果还好，尚可应付一段时间。”

1964年1月24日巴金致沙汀：“信、电收到，知道医院有别的药可用，我们比较放了心。你叫我们不要着急，事实上我们都很着急。……不知道向谁打听，也不知从日本寄药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只有等待。但又担心会误你的事，因此不能不着急。同时也怕你着急，急坏了身体。”1964

年1月31日沙汀致巴金电报：“药已收到至感至感”。

哪里找得到这样的朋友，对你的片言只字，连一封见不到手迹的电文，都保存完好。这张沙汀八个字的电报，便一直收藏在武康路一一三号巴寓书房里。沙汀接到药，是知道它所包含的份量的。

但妻子的病实在太深沉了。世上已没有能对她起死回生的药。到了在“川医”动手术的那天，大家怕他受不住，只让杨礼守在母亲身边。他上午仍是开会。此时只有工作能转移那种生与死的焦虑。10点多钟，文联一位去城外打靶的同志捎回杨礼的话：手术做完，没有发生差错，母亲从手术室回到病房。礼儿是把它当作“喜讯”传来的。他一听，立刻靠在沙发上，几乎连知觉都失去了！他预感到一个大手术这么快做完，是更大的凶讯。

下午，他的预感被证实。他觉得心被挖空。杨礼震惊得失声哭出来！

最末的印象是病床上热水袋围满玉颀小小的身形。她变得越来越小。满屋的玻璃管、玻璃瓶子都在挤压她。尤其怕这一切消失干净，像一年前第三次走入劫人病房所看到的景况。

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劫人逝世那天，玉颀曾经怎样的歔 叹息。现在，3月8日以后，终于，一个湿热的身子化为一个冰冷的方盒，置于他们（？）卧室的案头。

无法用文字来告诉重庆读书的两个女儿，他为何没能把她们的母亲留住。他专程去了一次重庆。刚颀乍听到消息，悲痛得将头在墙壁上直撞。刚虹则躲到一个角落，暗自饮泣。任白戈闻讯跑到住地来探望他们，对孩子讲述自己少年失母，父亲在外谋生，只靠祖母照料活下来的经历。好言的慰劝使孩子稍稍平静。平日稚气的两个女儿一天之内长大，变得懂事。

他对亡妻满怀怜爱。五十岁早逝，太叫他痛惜。玉颀在世时，两人尽管有家庭日常的争执，一旦她撒手而去，便觉出对于他晚年的感情生活——这一份他青年时代争取来的爱情，是无法替代的。

到了年末，李增峨突然来信，声称与他并未真正离婚。现在年岁也都老了，她准备从安县来成都看他。他觉得十分尴尬。他能理解前妻的好意，但心里无法容纳。大女儿刚俊又一次出面为父亲解围。刚俊来信的语言很直率，拒绝了父亲出生活费养活生母的提议。她说，因城市“四清”她不得不把地主成分的母亲送回故乡。但她认为，母亲在娘家、夫家都处从属地位，是旧社会的牺牲品。长达六页信纸的刚俊批评，使他高兴。他很满意这个原则性很强的长女。他也同情李增峨，但历史已无法重新写过。

这个危机虽然度过，没有主妇的家庭毕竟是倾斜的。同年12月在北京开会，周立波、严文井力劝他“重建生活”，他都婉拒了。巴金是最早写信慰问他的人，劝他换换环境，排除郁结。也劝他等小儿子高中毕业，“总得有个人照顾才行”。到1966年4月2日的信里，巴金表示理解他的心思，“这种事情应当由自己考虑”。尊重他不续弦的抉择，不再规劝了。

（你认为再婚会亵渎你和玉颀的感情？会对不起她吗？我还不至于这样封建。我是认为必须找个能了解自己的人才行。我赞成曹禺与京剧演员李玉茹的结合，那是多年知音的结合。自己如果有这种对象，也可考虑。但如果没有，不如洁身自守）

玉颀逝世周年快到了。前一个星期，他便发了个愿，要买一只好花瓶，插上花，摆在她面前。每天吃罢晚饭，就到附近的寄卖行转。有时一直走到盐市口人民商场，去看瓷器铺里的瓶瓶罐罐。他很挑剔，总想买个能让玉颀

称心的才行。3月3日，他终于在春熙路一家旧货店里买了个青花瓶子回来，洗净，灌水，插上一枝海棠，摆在骨灰盒前。他相信她能知道他的心情，他怀念她。

3月14日是旧历花朝，这是玉颀的生日。他又一个人跑到花店看花。回来一个人喝酒。对玉颀最喜欢吃的苕菜，不敢下筷去尝。下午又去买花，觉得茶花像是弄虚作假，最后买了一束洋兰草回来插上了。

又过了一年。

玉颀逝世两周年了。这真正叫人有一些不相信！

昨晚上跑几处花店买花，可都没有好的，人民商场一家，说是今天会有一批水仙发卖。

我问了问开门的时间，今天11点钟，我就赶紧去了。

从盐市口回来，已经12点过了。刘大娘在摆饭了，但我没有忙着吃饭，不慌不忙的，一直到把水仙在花瓶插好了，又左看右看，近看远看，感觉一切都很恰当，才去吃饭。当然，这也许是可笑的，……（玉颀会欣赏你买的不俗气的花瓶和花的。她和我们都不会笑你，只会敬重你。敬重你这个有情有义的君子）

去的已经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还要创造，爱，奋斗，包括当前规定要搞的“阶级斗争”。

文化界局势日趋严重。陈翔鹤的《广陵散》是他当面称赞过的小说。先前的《陶渊明写挽歌》，使他忆起翔鹤抗战中常说的陶潜的话：“人生实难，死之如何”。他们讨论过陶的《自祭文》，对于那种苍凉、从容的将生死归之于自然的观念，他理解得不如老友深切。翔鹤第三篇本要写五代的唐庄宗，与他交谈过，他感到历史小说的当代性很易遭受误解，曾与张天翼一起劝其停笔。现在这两篇小说都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影射现实的，他心目中自认的“正规历史小说”的概念受到了冲击。

他想起1963年与翔鹤在北京的东四用午饭。路上翔鹤告诉他，玉颀、刚虹大称赞《广陵散》一篇，使其非常感动。他初听有些吃惊，玉颀和刚虹算是什么评论权威，居然会使他如此兴奋。但他顿然领悟了，这些小说渗透了老友多年寂寞的心境，而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呀！

接下来，1964年文艺界的整风，夏衍、荒煤成为被批判对象，他被震动。荒煤1965年被逐出文化部，下放到重庆。亏得荒煤是个放达之人，两人相见，反是三十年相识以来谈得最为畅快的一次。他觉得人一旦不居官位，才更见本色。

就在文艺界不断震荡之中，艾芜下决心全家迁来成都。他是一向主张艾芜回川的。1960年，为了艾芜临时变卦不回来，曾闹得不痛快。1985年1月，他帮艾芜找房子，安置在新南门外十七号大院里面。他要省文联总务科特意为他配了一把艾芜大院的钥匙，以便随时去他那里不必高声叫门。

自玉颀逝世，他空前的孤寂。艾芜的回归使他感情上特别贴近。艾芜以郫县安德乡为点参加“四清”，写作的劲头总是那么旺盛，对世上其他事看得十分淡薄。居然吃素，连鸡蛋都不入口。沙汀经常是人间苦恼集于一身，极愿与老朋友多谈谈的。春节，艾芜从新繁老家回来，两人没有谈拢。艾芜执意马上回郫县，他怅然地送他到老西门。下公共汽车被挤散，四处找艾芜，想说告别的话，蓦然回首，艾芜已经提了网袋挤上一辆待发的长途车。在一片

嘈杂声中，只看见对方的嘴唇在动弹，车就开动了。他满怀着惜别之情。

之后，他到郫县去过，送艾芜回来治过腿疾。艾芜也来成都，为了办一个农村文化室，抱走了他的旧书、旧报、旧杂志。

6月，艾芜又一次回城。由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在来势凶猛的批判运动中不断受到责难，两个朋友突然找到了话题。谈共同熟悉的作家，谈共同喜欢的作品，谈如何对待个人委屈和受委屈的老朋友，谈自己的温情主义，一直谈到家庭、子女。谈话的闸门打开就收不住。艾芜在他家有时一呆便是一天。晚饭后两人还会步行走到人民公园（少城公园），这是四十年前他们在盐道街省一师读书时常来之地。他们回忆着，一路指指点点。疲乏了，坐一部三轮车回新巷子（比乘小轿车有味）。洗了把脸，又谈起孙犁的《铁木前传》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直到深夜。

他有点舍不得离开艾芜了，又用车陪他回郫县。艾芜留他在公社吃饭，到快要上车的时候，还在耳边叨咕：“饭馆里有青椒肉丝呢！”这十几天的相处，使两个朋友都很激动。比起前几年的川东、云贵之行，1965年的融洽程度，让沙汀感到当年两人在上海住亭子间的生活又回来了！

也许是一种共同的回顾与前瞻，把两人吸引住的。大风暴来临之前，他们都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计划。艾芜想写一部关于“四清”的长篇。沙汀在酝酿一个《在困难面前》的总题目，想把在西关和尊胜看到的农村基层干部，写进一组短篇里。

拟好的篇目有：1．抗旱；2．四十包玉米；3．籽种（黄勤明保好籽种的斗争）；4．贷粮（杜书记被迫借口粮）；5．结婚；6．抢收；7．改造（杜书记派一个译名“小偷”的孤儿看守红苕）。

但是，被接连传来的什么什么是修正主义作品，三十年代文艺要重新估价，五六十个作家要受批判等消息所惊动，变得不知所措。他终于什么也写不出来。人黄瘦得不行，牙疼，失眠，哮喘，白血球骤减。查出肝病本应减酒或戒酒，偏偏越发嗜酒如命。

革命现代戏的风行，给他这个“川戏迷”找到了一个位置。他想，用半年到一年时间，索性停止创作为川剧现代戏做点奠基工作吧。成都市市长李宗林也是个热心川戏的人，劫人生前与他都在市长支持下参加过传统剧目和勾践戏的新编。这时，市里又把《许云峰》这个戏交他主持修改。

廖静秋拍《杜十娘》我是编剧。川戏界对巴公、李劫老、沙老的提案很为感动。廖临去京前专门拜访了沙汀。他向她详细分析了杜十娘的性格，请她尊重北影厂的意见。廖静秋每天靠自己注射吗啡针顶住癌症疼痛，坚持拍戏。拍“投江”时，从两三尺高的假船上一遍一遍地跳下来。沙老不断来信慰问廖静秋病情，问拍摄进度，很赞赏她。

川戏有三小：小旦，小生，小丑。廖静秋以外，另一个著名女旦竞华，还有男旦阳友鹤，男丑李笑非，他们对他们和他们的戏《王昭君》、《思凡》、《别宫出征》、《望江亭》都是很熟悉的。

1957年成都川剧团去京演出。李劫老说如在北京“打吭”（打响），回来请吃海参席。后来果然在春熙路川剧院摆了十桌。沙老自然去了，说：“嗨，你们才吃了他一点标点符号啊！”

建国十周年，川戏要献礼，搞了个《拉郎配》。这是解放后从旧本《鸳鸯缘》改的，由悲剧改为喜剧。到我改成定本，沙老是参与的。记得当时一场一场送到西门外的寓所让他审改。他注意场次的准确性，人物的准确性。

有些唱词他熬夜看。二天便把我叫去谈，然后赶排。

这个戏演出时，轰动全国，但很少有人知道沙老付出的劳动。

西南话剧汇演，我和李宗森市长合作搞川戏《军事代表智灭匪巢》，沙汀搞重头的《许云峰》。他爱激动，有时与编剧意见不一致就发脾气。吃烟，一天一盒。吃酒起码二两。修改剧本动脑筋，烟酒就更厉害。散步的时候披件上衣，转街走路快，像有什么急事在催他似的。

为了《许云峰》，他经常坐在成都剧场看排练，随时提出建议。他与编剧争吵多次，有时自己也怀疑：这样阻力重重，耗费宝贵的精力，有必要吗！

1965年8月这个戏公演，剧场效果不错。当晚，他兴奋得睡不着，一连起床三次记下还可修改的地方。第二天，热心地跑到剧院去提意见，却发现大家对他很冷淡。原来西南局宣传部长已经表扬、肯定了《许云峰》，人们一个个认为大功告成，没有人在这个当儿，愿意听他说哪段唱词还要改，哪个对白还不行。他天真得出了格。

他感到艺术家的悲哀。

不多久，省文联机关的“社教”运动展开，在他面前猛地打开了别人对他认识的另一世界。像这样鼓励人们不管动机，说出对领导人的看法、想法，他的心理准备还是很不充分。

“脾气坏”，“独断”，“不虚心”，他一下子变得这么不受人欢迎了？他的“下楼”的检查也没做好。特别是群众的意见里有关于玉颀的，使他分外接受不下。他把抄有两万字的意见簿藏起来，不让暑期回家的女儿看见。

夏天里，小儿子刚宜被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也没给全家带来多少欢乐的气氛。这个家变得好怪，芝麻大一点点的事情都会引得彼此生气。刚宜临乘车赴京前，为了他的书桌的摆法意见不一，父亲说了几句，儿子气哭了。刚颀搭车离家前也闹了一阵别扭。谁也没有挑明，但问题很明显，他不放心孩子，舍不得孩子一个个离去；孩子们也不放心他，舍不得他，并且知道，家里将只剩下他一个人过日子了！

家庭会议决定把杨礼的孩子希娃留在他身边。可是第一天，刚吃罢晚饭，他就发现孙子没有了！到安旗、戈壁舟家找，没有。到前院机关找了三遍，没有。愈找不到愈着急，愈着急愈找不到。最后却发现他就在邻居老黄家里玩。也许孩子觉察到爷爷颜色的难看，连忙打扫掉自己脸上调皮的笑容，沉默地任爷爷牵起走。

他拉着孙儿准备去散步，忽然停住，伏下身问孩子，愿不愿意上街。孩子果然愿在家里，一个人跑到后面假山边的草地上坐下，不声不响，一副落落寡欢的神气。

他从孙儿可怜的目光中看到自己的可怜，两眼立刻湿润了。

这一年来，他甚至出现少有的厌倦心理。4月他赴重庆观川戏《江姐》的预演。两个女儿来探望他。他分出比以往更多的时间与她们逛城，玩。一天，送刚颀回她所在的大坪医院，乘车到肖家湾，穿过街道和一段田间小路，直到医院大门分手，然后返身回车站。他两次回头都见女儿伫立在大门口不动。他忽发奇想，是不是买舟东下，到那里隐姓埋名地住些日子，避避这可怕的精神熬煎！

他想一个人到乡下去住。他向省文联党组提出下去搞两年创作的愿望。艾芜总说“文从笔下起”，鼓励他紧张地写作，来医治任何种类的不快。他最近已较少与人争执，别人反映他的脾气变好了。对于从前可能一触即跳的

事情，他能沉住气想一想了。

写解放前夕的长篇的计划，到1966年2月又一次被放弃。虽然他跟艾芜去郫县的那一次，还在请县里的同志协助搜集该县匪敌暴乱的资料。转过年1月还与张秀熟谈解放初期四川社会的风貌。他毕竟还是搁下了。他捡起手边一份中篇残稿，这是从1959年三台双龙的原始材料发展起来的一部作品。原计划写十七章，已成的六章半，前两章还是玉颀生前抄就的。看着亡妻一个个娟秀的字体，他多么想把它续成。

好像他还不甘心，要在能不能写的问题上作一次挣扎。

4月份去北京开工作会议，文化界最大规模的批判斗争之势已经形成。思想压力加重。

过去肯定的、赞扬的、采取的，今天却要否定、批判、放弃。除了强迫性地自我反省，检查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黑线流毒”，还能做什么？

5月18日，在不祥的夜晚9时，被召集起来听动员报告，才知道省委已派出工作组进驻省文联领导“文化大革命”。他靠边了。前几天省委宣传部找他谈话，让他写批判文章，他还在扮演批判别人的角色呢。急骤的思考使他两夜不能入睡，就像进入创作高潮，满脑子只有文字在跳动！这文字便是批判、批判、批判……

你又成了阶下囚。不过不是四十年代的自我封闭，而是真正的关押。像是一出闹剧，拘留你的恰是你在位的政权。

是场悲剧。整个民族沉入灾难之底，才开始思索。我的囚禁地的名称，似包含了哲理、天理。

“文革”囚徒

从门到后窗是三步，从东墙到西墙也是三步，这是他的正方形囚室。

放风就在门廊阶沿下的天井里。向南走到艾芜的房间，十步；横着由省委书记赵苍璧房前，走到另一位省委书记杨万选房前，十二步。这是他们的活动空间。

他比艾芜关进得早，是1968年4、5月间。罪名不轻，三十年代的黑干将，全省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三家店”成员，当然应该关在这个做为成都警备司令部临时监狱的昭觉寺。

昭觉寺位于市北郊青龙场，是川西最大的佛寺。古老的楠树掩映着红墙绿瓦，真是一个幽静美丽的去处。

从大山门进得庙来，经天王殿、圆觉殿、大殿（后被拆毁）到后面的藏经楼。楼西侧观音阁之后，有一座小巧石桥，连着三个相通的小院，旧名报恩堂。可能是得了观音好处的人在这里做佛事，或者是在这里等待观音的赐福。这让人想起“三言二拍”的故事。现在这里是他们的受难所。除李井泉、廖子高以外，几乎所有省一级的“走资派”都关在这里。也关过群众组织“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头头。五十军一个汽车团的营长，俨然

是这里的主宰。他对士兵训话时不无得意地说过：“不要看轻了，关这二、三十个人，就是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他在第二个院子。第一个院子关了西南局书记程子华等八个重犯。其中有省妇联主任、廖子高的夫人郑瑛，一个顽强得像铁一样的女性。还有李井泉的夫人萧理，她在“九大”以后感到完全绝望，便偷偷积攒了半瓶“利血平”药，吞服自尽了。

沙汀这个院子四围有十几间屋。起初，他和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关在正北一个屋子里，后来米建书升级迁到前院，他就一个人关进西北角的囚室。室内一架床横放，规定睡觉要面向窗户。一桌一椅，为的是让他们每天写交待材料。他隔壁的难友是省委书记杨超、成都市副市长郭付仁。宣传口的熟人几乎都在这里，刘文珍是西南局宣传部长，杜心源是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还有马识途等。

进了这里，姓名消失了，只有囚号。解手、喝水、抽烟，都要先大声喊“××号报告”。郑瑛一号，郭付仁十八号，沙汀十七号。每个人的皮带都被搜走，只发一根几寸长的鸡肠带扣裤子。这是全世界通行的道地的狱规。他后来对狱友说，要写一部小说叫《没有裤带的人》。

十七号没有一丝一毫自杀“不忠”的念头，满心地认为自己犯了“罪”。（“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没有怀疑的，总感到自己有错误，应当检查。当时毛主席威信很高，加上我们长期的思考习惯和工作习惯，尽管红卫兵的做法过激，还是一心拥护这场政治运动。大约1966年6、7月份吧，我就失去了自由。新巷子住所的书房打上了封条，大门口画着一个大骷髅像。每天不是被机关造反派拉去批斗，就是写检查。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我的家实在成了我的第一个拘留所。

我被抄了两次家。“壘铁骑”抄走了我所有重要的笔记、手稿。一天深夜，听说红卫兵要来抄家，马铁铮同志引我到东风路文联宿舍躲藏。街上行人很少，幽暗的灯光照着各单位门口大字报栏的墙脚。我只顾埋头疾走，生怕被人发现。忽然想起同样一个这么寂静的夜晚，穿过睢水场街奔向刘家沟的情景。那是四十年代的事。我难过极了，尽力压制才没有哭出声来。——沙汀1986年8月讲）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得不“英勇”。一天夜里，刚服用了安眠药，机关造反派把他从床上抓去批斗。同其他好几位领导干部一起押到单位礼堂的讲坛上。有人命令他们跪下来请罪，他的同事们不愿服从，迟迟疑疑，他可立刻就跪下去了！因为，这时候安眠药正发生效用，他只觉得周身乏力，睡意朦胧。等到别人一一被强迫跪下，他已经进入半睡眠状态，得到一次“斗争”前的宝贵休息了。

他很抱歉。他的轻易下跪，显然给本来不想跪的同志增加了压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这年8月份开的。这时他已被登报点名批判，和其他省里的干部一起集中在锦江宾馆办班。名为“学习”，有人守卫，不能自由出入。他被囚在这个漂亮宾馆的北楼。和别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他已经没有家属好让他挂心，没有思念老婆之苦，没有幼小的儿女需他照顾。全家最需要照顾的人，就是他本人。他可以一心干“革命”。

最令他胆战心惊的是红卫兵的冲击，抓人。每当这个时候，“学习班”的管理人员就率领他们在大楼里跑上跑下，四处闪避，好像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不久，四川医学院党委孙书记从六楼上跳下去，还有一位什么人又从九楼跃身而下，人人感到大难临头般的震动。

（那时候嘴上大家讲自杀是自绝人民，我的心里总佩服这些人的“勇气”。

1966年底，省委以保护我们为名，把锦江宾馆的一部分人送到名山县。名山离成都一百多公里，属雅安，是采茶的山区小县，“文革”的风刮得还不紧。戈壁舟、安旗、李累，省文联党组的成员都在这里。对外说是“备战小组”。初时比较自由，我还可以看批判自己的报纸。有些批判内容就像神话，把家乡豪绅的血债，四十年代避居地的房主祖辈、父辈的罪恶，一股脑堆在我头上，叫人哭笑不得。后来红卫兵找来了，看管严厉，半夜会突然拉你起来背最高最新指示，背错了就挨训遭打。那里的农民太好了，一遇到红卫兵动手动脚，他们就围拢来制止，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一次，一个青年农民还挨近我身旁，悄悄问我：“你就是那个写《记贺龙》的沙汀？”他说他读过这本书，很不错的。这个农民当时给我的温暖真是不小，我永远记得他。

1967年从名山步行押回成都。一路之上，每到一个城镇，都要批斗一番。造反派叫它做“放一把火”，借以鼓舞本地的“革命”。批斗前，照例要戴高帽子游街。高帽子的尺寸要看“罪行”大小。有的脸上涂满墨疤，身上还要贴大字报，边走边自我介绍，比如“我是走资派×××”，“我是文艺黑干将××”，像戏台上的自报家门，又像走江湖耍把戏一样。一次游街后，我小声对同伴说：“正式批斗，应当卖门票入场才好。”

批斗台上，一般都跪着两排“牛鬼蛇神”。第一排是主斗的，即我们这些省里的，第二排陪斗的，是本地的。记得一次，我因长久的批斗、打、跪，实在劳累，同时，斗得久了也就习以为常，根本不去听他们喊些什么，一走神，在台上打起瞌睡来，脑袋不由自主地朝前一啄，竟将头上的“纸糊的王冠”掉到台下去了。“还不赶快滚下去捡来戴起！”身边的红卫兵一吆喝，我就迷迷糊糊把跪得发麻的双腿挺直，蹒跚走下台去。我并不情愿地走到那顶高帽子跟前。奇怪，经过一阵子活动，腿脚的酸痛感消失了。这简直是无意中的一大发现。

它给我带来的愉快，甚至暂时驱散了当众受辱的恶劣心情。后来就经常故意弄掉高帽子，然后去捡来戴上，争取一次难得的舒筋活血的良机。——沙汀1986年8月讲）（你后来的《批斗场上小景》，写的就是这个亲身经历吧？从讽刺来看，你有“堪察加小景”，又有了这个新景。从你的生活哲学来看，你有牛祚的“土拨鼠”原理，现在是“曲线”救自己）

昭觉寺有士兵把守，不会随便被人拖去打一顿，但要挨训挨罚。放风时，“囚犯”在小院坝走动，是不准交谈的。利用清除杂草的机会，几个人擦身过去，可以迅速交换两句话。

如果被发现了，要罚站。大家很珍惜这小小的活动时间，小院的清洁工作做得也真是不错。

此外就只准在屋子里写交待，检查。像和尚坐禅一样面壁思考自己的问题，也许什么都不思考。同院的省委统战部长程子健，放风的时候提醒他，无论如何要稳住，情绪要安定。

这是很切中他要害的劝慰语，他听进去了。他在囚室破旧的墙壁上想象出沙俄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革命者，有的在苦役生活中精神失常，或者堕落，有的挺直了身子。他勾勒他们的样子，警惕自己不要垮掉。他常常想起罗素的一句名言：“有些人希望我早死，我不能不把我的死期推迟。”

他觉得这句庄重的幽默的话，用乡音读出来，能从内面激发出深沉的力。

他在九平米的小屋里练气功。气功要求摒除杂念，沉意丹田，气运全身。他一节一节回忆过去学过的气功，练得神安气定，仿佛身处物外了。说也怪，过去他睡觉要求绝对的安静，不能有灯光，不能不服安眠药，现在无药可吃，顶着囚室里一夜到亮的明晃晃的灯，也能安然入眠了。

最使他恼火的是专案组提审和应付外调。如果仅仅是文艺路线上的错误，他愿意承认。

他没写出什么英雄人物，思想右倾，从三十年代就跟随周扬的文艺思想，划不清界线。可是他不明白，一个人有错怎么会什么都是错？怎么可以无中生有地诱供？他无法回答关于贺龙在延安、冀中就“反党”的任何提问。他们逼他交待周扬在上海“叛变”的经过，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事。新巷子隔离反省期间，就有北京来人用小汽车接他到宾馆谈。他说不知道周扬有这种行为。对方叫他写个证明，他说不知道怎么写？那人发了火，叫人用自行车把他搭回来。到了新巷子，带他回来的家伙还惋惜地说：“你要是写个证明，我们照样地坐小汽车该多好！”他真想学鲁迅说一句：“阿义可怜！”

对待各种调查、审讯制造的心理压力，他想了一个办法。手边没有经典作品好读，便吟诵记得的一些诗文，不准确也不要紧。他把在家乡私塾念过的陶渊明《读山海经》回忆起来，反复念着“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他也喜爱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全文已经不能记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那一段，在昭觉寺的特殊环境下默诵，体味前贤先哲们的精神和智慧，还是大有教益的。

他学会了对付外调人员的艺术。有人来问：“三十年代你在上海认识戏剧界一些什么人？”“只认识洪深。他是《光明》的发行人兼主编，我是编委。”他这么说。心里想，不能谈章泯，一谈章泯便牵扯蓝苹（江青），麻烦了。

对方显然对洪老夫子不感兴趣，又问：“你知道戏剧界哪些人的情况？听谁说过些什么？”“我一向不注意戏剧界情况，连话剧都很少看，只看外国电影。”他这样搪塞。事实上他与左翼剧联的负责人都相识，也爱看话剧，看过蓝苹演《钦差大臣》里木匠之妻的泼辣角色。

调查人员终于露了底：“有位中央首长，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过左翼戏剧运动，未必你都不知道吗？”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候，怎么能随便知道一个‘负责人’的情况和姓名？”他答得更有趣。

来人见什么油水也捞不到，只好悻悻地走了。

可是材料不能不写。他回忆起几十年的生涯，决定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坐牢四年多时间，他伏案写下了一份份书面材料，把自己的家庭，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过程，三十年代在上海，抗战时期在延安、重庆，四十年代在安县隐居的生活，一条条记录在案。他写了与茅盾、周扬、艾芜、何其芳、李劫人、陈翔鹤等人的交往。受当时认识的限制不可能不“上纲上线”，但一件件一桩桩都是事实。这些材料总共有十几万字。

沙汀比我关进昭觉寺要早半年。这里的正式名称叫第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吃三顿饭以前也要汇报，一共是五次。起床后

必须坐窗旁读“毛选”，不许东张西望。沙汀反应不灵活，卫兵经常在我窗外偷偷过去，发现他在张望，便罚他九十度。沙汀挨罚挨得多。还有一个赵苍璧，是陕北人，念早请示后面那句“坚决执行，句句照办”，发音不清楚，营指导员硬说他念的是“拒绝照办”，就在沙汀窗前挨惩罚。

沙汀和刘文珍学我们的办法，传递过一次东西，出了岔。沙汀把感冒药放在地上，然后，“十七号报告”，说刘文珍把东西丢下了。卫兵训斥一顿刘，刘把药取走。本来干得还行，不知怎么的被识破了。沙汀罚站，各屋翻查私藏物品，来了个底朝上。我偷偷问过沙汀：“你搞过地下工作，未必连个卫兵都对付不了？”他说：“我耳朵聋。”原来是第二天放风，刘文珍挨近他小声表示感谢，他没听见。再提高声音致谢，卫兵倒听见了。于是彻底暴露。

全监狱除了杨超，就数沙汀老实。他一点越轨行为都没有。让他出来，让他九十度，他就照办。他写了许多材料，记不起就说记不起，从来不乱说，也不告饶。他有胃病，吃得少，在昭觉寺戒了烟。从来不去求卫兵做什么事。可是五十军破坏寺庙大殿，拆下贵重的木料打家具、建营房，他气得脸青青的，说这是毁灭文化。沙汀对喊报告，早就不耐烦了。

郑瑛非常硬气，她喊一声“报告”，要求抽烟。得到准许后，就一支一支抽下去。监管人员来干涉，她理直气壮，说抽烟没有中断啊，你们早就准许的啊，弄得卫兵答不上腔。沙汀把这件事情看在眼里，想出相反的软性斗争方式。

为了防止自杀，夏天他们囚室里是不准挂蚊帐的。到了晚上就得消灭蚊子。最有效的办法是先把室内电灯闭掉，然后走出房门，等一会儿蚊子都扑在窗上，再进屋打。他事先故意多放蚊子进来，然后，出门，进门，出门，进门，按规定一遍一遍大喊“报告”。弄得卫兵不耐烦了，告诉他喊一次可以连续出入房间，他的“计谋”成功了。那年春节，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不炼金丹不参禅，
马恩列斯有遗篇。
斗私批修诚盛事，
报告声中又一年。

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外面发生的事情是要凭据狱内的点滴变化来判断的。1969年有一天听邓华大哭，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才知道是被释放去参加“九大”，当中央候补委员了。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已发生一个多月，他还不知道。只是发觉“早请示，晚汇报”停了，也不喊“永远健康”了，感到奇怪。郭付仁的家属探监时偷偷告诉了郭。杜心源臀部生疮，卫兵不愿替他擦药，喊郭来干。于是，林彪爆炸的消息才传开。

寺内的空气明显松弛下来。这里，省统战部过去办过一个政治学校，有一个图书馆，现在允许借马列的书来读。他借机重读了一些书。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工人生活之细致，分析之透辟，让他叹服。想到自己对农民的了解，实在太肤浅。

现在，关押人员之间也可以互相交流读书心得，可以摆龙门阵，与狱外的亲人也可以通信，定期会面了。只是不准谈“文革”，不准谈自己的“案情”。

可是林彪事件的第一影响就是让人们“对文革”发生怀疑。起初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压在身上的负罪感减轻了。他固有的思想习惯在渐渐瓦解：

这样损失巨大地搞一场“革命”是必要的吗？既然把接班人选错了，还不是其他事情也可以搞错？一连串的问号从心头升起。

（从林彪事件发生才开始怀疑“文革”，不算早呢！我是后知后觉。中国的政治生活已经规范了我们的思维模式：林彪叛党叛国，一切罪过当然都出于此，其他事情也都得到解释。很长一个时间，国家大事不过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有一件老百姓的事使他长久不安。大约1970年以后吧，四川的灾情严重，一些农村姑娘被迫流到外省去，为了活命随便地嫁人。有的被人贩子骗走，失身沦落。昭觉寺难友们经常谈起这个话题。一次，有一个外籍的同志对这些女性加以责难，认为她们不看看自己，语带嘲讽。沙汀同另外几个人立时纷纷嚷叫起来：“我们当干部的应该知道惭愧！”

他同情这些背井离乡乃至被骗的姑娘，不禁联想起解放前从河南流落到四川来耍把戏的外地女子。没料到解放这么多年，还出这样的丑事。

他的一个女儿写信告诉他，她要结婚了。信中说男方很可信赖，让他放心。这是学医的刚颀，大学毕业后原本分在一家军医院。父亲成了“黑帮”，她被赶到一个工厂医务室做了厂医。读了她的信，他百感交集：孩子长大能自立了，现在又要办终身大事，可她母亲逝世已经五年，自己身陷囹圄又不能参加她的婚礼……远在灌县工作的刚锐带着孙儿几次来看他，使他特别欣慰。他还被狱中的友情包围。这都是一些高级干部，平时有的人难免养尊处优。共同的监禁生活把他们连在一起，不分上级下级，人人平等，有了一种真正的同志感、亲切感。人也一个个变得年轻，好像获得了一片童心。

沙汀不露锋芒，但好心情激动。狱规放松以后，大家可以一起烤火、下棋、打拳了。他不会玩，打拳是乱划一气，我就冲他喊：“沙汀充壳子！”充壳子就是装像。

我这是故意学四川话，说着好玩。其实我不大懂，倒是讨教过他。他爱四川农村，熟悉群众口语。我在监狱里闲来无事，问他，为什么你们管乱搞两性关系的“破鞋”叫“梭叶子”？他解释说，像秋天树叶落下以后往阴处吹，是很有文化的一个词。我还好奇地问他，四川人骂“入你先人板板”，什么意思？他笑了，说这是最超级的骂语，把祠堂里祖先牌位都“照顾”到了，诅咒了几代人。我们听了都直乐。

大家在一块闹着，也正经谈往昔。程子健谈他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艾芜谈南行记见闻，沙汀就摆四川的农村市镇。他怀念一件事，要写一部解放初期清匪反霸的小说，积累了许多材料。他出狱后还要我为他约一些老同志座谈，充实他的写作内容。

沙汀为人诚恳，有修养。狱中人都同他很要好的。

觉寺里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希望。那时他们全体搬进观音堂住，用席子隔开一间一间的，每一间都传出哭声。哭陈老总，也哭自己。果然，没几天就有人站在天井中央，撂开上衣，让别人看到自己系上的皮带，以表示与同志们告别。

人，一个一个地走了。到杜心源也离开，整个昭觉寺临时监牢只剩下沙汀一个。

沙汀的案子是过去一个省委书记姓岳的秘书在办。

这个秘书神气活现，时常乘一辆伏尔加来提审沙汀、艾芜。

只听到拍桌子声，一搞就是一上午。我认识这个秘书，便骂他：“你过

去见到我们就立正，你现在能当第一书记吗？”他有些怕我。

临到放我，我找专案组做结论。他们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要恢复我的党籍，我反问是什么时候开除的。我去找那个秘书，为什么不放沙汀？我说沙汀是文化人，写文章难免不出错，你们写专案材料，错得更多！姓岳的说沙汀有个历史尾巴，他不签字不好放。我说你有证据吗？拿不出证据就得放人。你们不放，我去昭觉寺硬接他出来！

大家都担心狱中只余沙汀一人，他会不会承受不住。有时候人是这样的，大风大浪闯过去了，最后一个小小的颠簸却把船掀翻。他心里有数，自己有什么“托派”问题？还不是周扬的案子没了结，他算是个同党。天理昭昭，他相信大不了多关押几天。他每日里用个煤炉做饭吃，饭后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度过时光。

狱中还有一个伙伴。是个姓左的年轻人，“贫下中农战斗军”的武攻队队长。此人学生出身，家庭很苦，父亲早逝，靠母亲纳鞋底把他养大。参加了武斗，因为人命案一直关在昭觉寺。其实他没有打死过人。

一老一少相处得很好。小左狱外没有任何亲友接济他，有时沙汀给他零用钱。小左的姑妈就是万千流落他乡的四川妇女中的一个。听讲因为在家乡活不下去，在丈夫的哀告下，她带起儿女嫁到陕西去。中间还回来过，给丈夫偷偷带粮食。等困难时期一过，又回四川复了婚。小左说得他心都酸痛了，就像说的是自己姐妹女儿一样。多少年后，他在北京家里看到一则报导四川什邡地区农民由贫转富的电视新闻，直看得老泪纵横。小儿子刚宜十分惊怪，不知父亲悲从何来。他便对他讲了小左姑妈的故事。

1972年11月13日，他终于出狱。此时他已六十八岁。这情况有点像“保释”。

他和周扬的关系还要继续受审，新巷子的住房也不退还，他只能单身住在走马街招待所。他被告知，只许在成都市内活动，外出必须向省文联的“革委会”请假。过了一年，算是恢复了组织生活，编入《四川文艺》的支部，仍未担任工作。

在成都的孩子们虽然可以不时来探他，他的心里还是沉闷，不晴朗。许多朋友不敢接近他，他也不便去接近别人。有时在街上邂逅相遇也不打招呼，大家都懂得保持距离的必要。

（不过，有的朋友不怕惹祸。刘尔钰是我省一师的同学，在城里有几间房子。我没住处，他就叫我去住，是不怕与我亲近的一个。还有冯诗云，原是北京《工人日报》主编，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我和他本来不算熟，只是抗战时期在车耀先的《大声周刊》社见过几面而已。

解放后他在西南总工会工作，办过《西南工人报》，我在西南文联，有过接触，那几年他也被弄到成都来了，常来看我。别人劝他小心一点，他不在乎，我刚放出来，他邀我去新都玩一天，我说要请假的，冯说“管他的”！冬天，取暖的桐炭供应紧张，文联分炭不给我，他叫人给我送些来。我还没有看文件的权利，他认为不合理，就把有的文件塞给我读。

就是在冯诗云家里，我见到《人民日报》的负责同志。我最后的“解放”与他的帮助有关。开人代会，他找机会对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沙汀未查出问题，也没有问题，应该起用。他怕省委书记不认识我，还专门写了个材料，这样，我才得以恢复工作。这已经是1977年了。——沙汀1986年8月讲）

人们说“有钱难买靠边站”。从昭觉寺出来，一身少有的轻闲，是“文革”前根本享受不到的。他从一堆破烂的家具中找出一册未被抄走的三台双龙乡札记。这本笔记逐日记下他在双龙一个月接触到的各种农民、干部，与他们的谈话，发生的感想。他的详尽的记法，特别是注意记录“原生”状态的对话，很使他想起那本丢失的关于贺龙的手记。他过去起草了一点双龙的小说，现在读了又读，让过去年代的人物复活，心里跃跃欲试。《青桐坡》初期的秘密写作就这样开始。

他对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感情寄托很深。四川姑娘大量外流的现实刺激了他，他觉得五十年代双龙农民的精神是可贵的。“文革”引起他怀疑的只是“当前”。和那些历次运动受打击的人和具有尖锐政治辨别力的人相比，他对“大跃进”以后中国事情的认识，还很不深。起草《青桐坡》时，他的反思短浅。他是个有丰富情感体验的“描摹”社会的能手，不是个思想家。

1974年和1975年，是“文革”后期光明与黑暗交战最奇特的年代。他这个遭“废黜”的人也看明白，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是如何费尽心力地整顿全国濒于崩溃的经济，而意识形态领域则三天两头闹“地震”。今天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明天评法评儒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好像非把这个老大的穷国折腾净光方能罢休。

描摹社会的小说家，观察着中国的人间。他后来追记过这几年成都和全国发生的事件，想透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反映“文革”的动荡。

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对这个充满智慧、献身精神和工作活力的人异常敬佩。他想不通“整”周恩来的人为什么会受到毛泽东的信赖？而任何疑虑落到毛泽东的身上便无形消解了。这个崇高的精神支柱如果不复存在，那么，中国一代的共产党人是无法想像该怎样思考、怎样行动的。沙汀也不例外。

（周总理1975年9月住进医院的消息传出以后，我一连几夜没有睡好。我实际仍在“软禁”当中，同我过从的人不多。几个有限的熟人每一见面，不是忧心忡忡地说：“怎么今天报上还没有总理的新闻？”

或者喜形于色：“总理昨天还在医院接见伊文斯呢！”到了年底，消息可越来越稀少。

我已经搬回新巷子旧居，前院就是《四川文艺》编辑部。偶尔有个别同志悄悄向我走漏一点小道传闻，都未可全信。有人不止一次建议我给总理写信，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合我的心意，但一想到他在重病中我还要打扰他，就动摇了。矛盾的心情支配我相当长的时间。

1976年1月9日清晨，照例，起床后我就瘫在卧室门口的马扎上面。长夜失眠，头昏沉沉的。《四川文艺》资料室的一位女同志走近门边来。我知道，但凡凌晨从收音机听到什么重要消息，她总会热心肠跑到附近的《四川日报》社去取报给大家看。而且一视同仁，对我从不歧视。这时，只见她摇晃着报纸，神色紧张地走来。我撑起身伸手接报，只听她说出一句：“总理逝世了！”

我手指间的报纸拍地跌落在马扎上。我惊呆了几秒钟，躺身下去，双手掩面，爆发出哭声！

我的嚎啕痛哭惊动了前院编辑部。那个长期与我共事的负责人走到我这里来。

“……”他一面说，一面在一张籐椅上坐下。我没听清他说的话，照旧哭，像个小孩子样。

“……”他絮絮地说了又说，但他自己也流泪了。“亚群同志今天够受的……”我哽咽着，突兀地说了一句话。我忽然想起早已依靠输氧过活的李亚群。前不久，我们曾像解放前地下工作接头一样作过短促交谈，从时局扯到总理健康。四十年代他也在总理身边工作过。

午后我稍稍平静，准备上街散步。编辑部静悄悄，毫无表示。私下问起，才知“上面”下达了各种禁令。到了街上，情形可不同了。普通老百姓在家门口挂起半旗，不知道旗子从哪里来的。一大队中学生抬了花圈正朝东风路缓缓走去。我停下来，摘掉帽子，目送着花圈。我担心无法控制自己，赶紧转进一条窄小巷道。这里更是家家户户挂了半旗。一位工人装束的中年人，正在向邻里讲述今晨他们工厂发生的风波：几名工人爬上厂门屋顶挂半旗，厂长大惊，因为不符“上面”的规定，吩咐把国旗收下来。工人抗议了：“哪个今天就上去试一试吧——谨防老子们把他捶扁！”厂长只好让步。旁听了这样一个令人补旺的故事，我的悲痛心情似乎减轻不少。走出巷道，不远一家三间铺面的布店，挤满了家庭妇女，在排队买黑纱、黑布。我也为自己扯了一幅黑纱戴起。走到家门口，见几位编辑正爬上屋顶悬挂半旗。显然，广大群众最普遍、最深刻地流露出的民意，鼓舞了一切相信真理定能战胜邪恶的人们。——沙汀1986年12月讲）

周恩来的辞世使两种势力的较量速度，骤然加快。中国大地上刮起一阵震惊世界的历史旋风，——丙辰清明悼念总理的花山花海，天安门广场事件，朱德离世，唐山地震，毛泽东逝世，逮捕“四人帮”！千千万万的人从“文革”噩梦中一夜间甦醒！

你恢复了可贵的艺术自信和勇气，在新的层次上找回了自己。不过，反思是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的。

我首先属于我的时代。做为中国宗法制农业社会最后的描绘者，我也希望能留给未来。

木鱼山下

写作已经像是老年不屈的生命。

新时期十年度过三千多个日夜，有时一天只涂写一、二百字。可能一搁置就是半年一年。断断续续，他不肯放下手中的笔，居然出版了三本中篇小说和一部回忆录。他像座活火山，还在随时进涌。《淘金记》的高峰已不可超越，八十高龄，还是奉献出属于他的小说精品。

《木鱼山》十二万字写了五年，一个字一个字攀过去。可怕的是思想的老化、僵化，艰难的是思想的调整与开放。但他还是部分地克服了。1978年10月，他草拟提纲写它的时候，刚从四川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他带来契机。

1977年初，他写了两篇回忆贺老总的文字。这是他“解冻”后的

最早回声，但在省内竟不能发表。不是贺龙不能悼念，是他的身份成为问题。6月，其中的一篇寄到安徽去刊载。再过两个月，形势大变，《四川文艺》邀请省市作家座谈党的“十一大”，成为四川文艺界的一次盛会。老的、残的、病的，凡能行动的劫后余生的朋友，汇集一堂，时时催人泪下。沙汀做了发言。他真的复出了！

一个作家，他理解的“复出”，是拿出作品。开会前，他以极快的速度，在过去已有的零星草稿断片的基础上，两个月写出了《青桐坡》。

这是一部依据1958年三台县双龙乡农民兴修水利的事实，加工而成的中篇小说。它写得匆忙，是个不足月的产儿。主要的意义是显示了沙汀的存在，沙汀的笔没有死掉。《青桐坡》来不及从一个新的高度认识中国的“大跃进”，而没有新思想照射的旧现实，成了一堆苍白的材料。

该年9月，他带着这部文稿到北京寻求出版。严文井、屠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热情支持了他。韦君宜、卞之琳，以后还有上海的师陀，都提过很中肯的意见，他一一接受改正，但已不能根本扭转这部作品的缺陷。

（对《青桐坡》的评价过低，不会使你难受吧？我也不满意。我纪实地写出中国农民苦熬苦战的优良品格，但这种优良品格和光荣传统，没有使我们早一天摆脱贫困。你想过吗，世界已不是愚公的神话时代了，如果我们随便“浪费”掉农民的“优良”与“光荣”，英雄的光环最终要被荒诞色调所代替）

阔别十载的首都盛满情谊。前一个多月，他差不多每日往来奔波访旧，想见到所有的朋友。交往次数多的是文井、立波、之琳、光年、起应（周扬）家宝（曹禺），还有夏公、叶圣老、茅公、郭老、冰心大姐、冯诗云，多达七八十位。

趁巴金来京逗留两天的机会，他们在西苑饭店的临时会客室，直谈到上车前的半个小时，几乎忘却了时间。拜望贺龙夫人薛明时，他谈起出版社拟议中《记贺龙》的再版。有一阵他是想写贺龙的传记或小说的，还想搞一个一二·九师进军冀中的长篇，可惜都没能如愿。

为了改《记贺龙》，他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搬到西直门国务院二招，住到了年底。

如果事先知道只差这么几天，他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挚友，他无论如何也要从四川早一点动身来呵。现在他简直不敢走近何其芳的家。但他怎么能不去呢？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拐进了西裱背胡同。决鸣和孩子都不在，一位街坊把他接进屋小坐。这是文学所的装订工人，对所长的逝世不胜痛惜。谈起其芳在“五七”干校养猪的认真劲，也很感慨：“这样好的人到哪儿去找！”他在医院，亲眼看到其芳手术后醒转，还在询问“校样”。在八宝山，那个中国唯一的女将军，本是来向另一死者告别的，当她知道这个灵堂里是何其芳，照直走进去。有人提醒她错了，她说：“没有啊，我来吊唁何其芳同志。这不是明白写的‘何其芳同志追悼会’吗？”

听这位老工人讲述这一切，他凭借想象，编织老朋友最后那些日子的故事。其芳最小一个孩子终于回来了，把他领进家门。他一眼看见墙上放大的遗像，弯下身鞠躬，泪水已滴入地面。

同哭周恩来一样，他无顾忌地嚎啕痛哭。

几个月后，1978年3月，他被调来接任老友的工作，做了文学研究所的新所长。

他比较痛快地答应来京。他在四川虽然儿孙成群，却没有这么多可以随意交流思想的人。一个老年丧妻的人驱赶不走寂寞是多么可怕！其时，他正在思索“四人帮”“左”的一套的成因，自然想起六十年代烈面西关农民巧妙地顶住上面瞎指挥的实例。他心中萌动一个大胆的作品，北京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想界，对他是必要的。

从北纬路饭店搬进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与卞之琳同楼，他有四层与小儿子刚宜夫妇安置了一个家。社会上“真理标准”的讨论启发人的心智，他决计写一部名为《抵制》的小说。

他要全力塑造一个敢于同浮夸、不实的上级巧妙周旋，戴了“右倾”、“保守”的帽子仍不怕钻磨眼的基层干部角色。这是他多年的一个愿望。尊胜王达安的形象占据他的心思，他设计了汪达非这个主人公。在写作中，烈面的张书记不断闯入，他总是把他与汪达非合并。汪自己在县里挨批，一出场便为大队长贺永年所受的不公正的批斗难过，这个贺永年的原型是烈面的黄勤明。另外两个性格一阴一阳的队干部霍干人、赖体臣，也是尊胜的熟人。

霍干人原是何干人，赖体臣用了谐音。他更熟悉尊胜人的性格，但抵制的鲜明态度，来自烈面的农民干部们。

他们的对立面是工作组。一个坏的工作组，在农村有“太上皇”一样的地位和发号施令的工作方式，他最了解不过。他自己下乡就经常有这种身份。工作组的负责人“眼镜”代表“左”的思想，沙汀在表现党的领导上显出一种慎重，煞费苦心安排了新任工作组组长、省委王部长这个重要人物。这是他解放后仅有的一次写高级干部。他是不是想到彭德怀了呢？写作之初，彭德怀的问题还没有全盘透亮，可人人明白他是冤枉的。

1979年7月，沙汀在笔记本上已经起草了近五万字的小说突然搁浅。年末，他列出另一部小说的庞大计划，摆出放弃《抵制》的姿态。1980年春回川度假，中间试图把《抵制》捡起来。半年过去，改到原来停写的第八章，还是续不下去，又一次搁置！

是什么妨碍了他？

由小说的第七章或许能透出一点奥秘。这一章写王部长在省传达庐山会议之前，病发住院。他爱人做为传达会的工作人员，向他不断报告会上戏剧性事件。发表出来的定本是这样记述的：

这次对中央政治局庐山会的传达方式，相当别致：先要大家议一议那位“大将军”写给中央的长信，然后才传达毛主席对这封信的批评、大会的基本精神和决议。而当他听到那封长信的内容时，正同一般干部那样，他是多么赞赏呵！因为那时候不少事实已经叫他感到困惑。现在他清醒了，认定我们的农村工作确乎很有问题。

然而，没有几天，那些对“大将军”的长信叫好，表示赞赏的代表，在听了毛主席截然同他们相反的评语、大会的有关决议以后，几乎莫不吃惊、丧气，纷纷开始检讨。……

这段写的是当年四川省的实况。这个“引蛇出洞”的传达方法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创造”。当时的省委还封锁过毛泽东1959年写的《党内通信》，强调四川有特殊省情，不向县团级以下传达。可是，如实写出这些后，他的心里止不住地打开了鼓。他写不下去了。

他在笔记里写道：“是信心不足？勇气不够？反映‘大跃进’，这总会涉及党中央、毛主席，而且直接涉及广大南下干部！尽管我在设计上考虑得

相当周到，把一个县委书记、一个省委的副部长都写得忧心忡忡，多少还有点阳奉阴违，但对当日的省委，则没有留什么情面。也许这是没有写下去的原因之一：怕引起不满！”如果遮遮盖盖地写，像《青桐坡》那样天真地写，就会从基础上动摇《抵制》，是他所不愿的。可是“社会效果”他又不能不管。

他宁肯放一放。

文艺界在“四人帮”垮台后显示的团结，很快就被复杂的内部分歧冲破。政治上的平反到何种限度？过去的旧帐，比如对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的看法相差如此之大，怎么统一？对当前创作的认识，打破禁区、“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众说纷纭。他这次回川，在新巷子与艾芜同住一院，谈起当代的作品，两人观点也不尽相同。艾芜是不会与他争论的，默不作声，便是意见相左了。

他又失了一位能开诚讨论文学的朋友。周立波1979年秋终于不治，癌症这个魔鬼夺走了他多少至爱亲朋。三十年代坐牢养鸟的立波，总鼓励他对四川农村要了解到骨髓的立波，遽然离世了！

他想起1977年他们刚联系上，立波的孩子小仪写了一首《送沙汀伯伯》给他。原诗是四句：“两鬓斑斑集霜雪，壮怀枫叶吐深红，英雄健笔春常在，正飞峨眉不老峰。”立波兴致勃勃地抄了来，并说“红”、“峰”按广韵不协，代为改成两首。孩子说这不能代表他的感情，只能算是爸爸的诗。这两首立波给他的诗，是不经意产生的，倍觉亲切，他至今记得：西蜀文章老益雄，清秋霜叶吐深红。

纵横健笔恣情舞，
瑰丽峨眉映碧空。
燕地嘉陵隔万山，
何时重会俱欢颜？
登高遥望峨眉秀，
别绪离情漫两间。

现在他也定居在“燕地”了，与立波的“别绪离情”不幸已成为永远。

后来他读到立波大儿子周健民的长篇《湖边》，惊喜地发现儿子对湖南农村人物、语言的熟悉程度不亚于父亲。他少有地写了一篇评论，比写悼念立波的文章还用心。

新一代作家破土而出，常能给他的马拉松式的写作带来刺激。他最关心的还是四川的“新军”。1980年2月初从《红岩》杂志上读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他是认真激动的。他看出这个作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创作才华，不禁想起过去辅导过的高缨、克非。周扬很有兴致地给他寄来谈这部作品的长信，他想到应当鼓励也应当严格要求这个年轻人，觉得克芹小说的解说性叙述太多，情节过于巧合，还要进一步学会让人物本身按照性格、生活来行动，便一口气回了周扬五张信纸。这就是发表在《文艺报》上的通信。到这时，他还没见过作者。四个月后，他才在成都结识质朴的周克芹。

沙老对我的培养是说不尽的。他注意任何一个艺术细节。记得初次见面，他就说我《井台上》写的井，人能下去，但井底有没有水不知道，是个不应有的漏洞。

我的《果园的主人》，沙老也有好几千字的一篇评论，发表在《青年文

学》上。他当面对我说这一篇的结尾太匆忙了。当时编辑部确实等着拿稿子，我没有在修改上下大功夫。有时一个短篇不好意思寄他，他自己找来读了，也会不客气地提供批评。我每走一步，他都是付出心血的。

虽然优秀的农村小说都会引起他的注目，为了古华的《芙蓉镇》，他也找他谈过话，但周克芹的成长毕竟最牵动他。他见过一些青年作家如何膨胀，被声名腐蚀，为一点处理不当的私事掩埋。他也了解中国社会吹捧一个名人和扼杀一个名人是同样起劲的。文艺界是名利场，人言可畏。所以他在周克芹1982年得了茅盾文学奖，自己不慎让周围引起纷争后，努力替他摆脱。对周克芹由简阳迁进成都担任职务不以为然。他实在太怕他也迈上自己的老路。

他从年轻一代身上汲取艺术创新的力量。近八十岁的老人，《睢水十年》、《应变》、《抵制》三部作品同时铺开写。有举棋不定的成分，更是一种气魄。

1980年12月，他起草了《抵制》第十章到第二十二章（后并为二十章）的新提纲。这之前，在一张纸条上随手记下一个断句：

“没有自信、勇气，不可能有艺术！”

他按照这个提纲写下去。1981年4月发生批判白桦《苦恋》事件，8月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他这年夏天照例回川，思考文艺界复杂多变的形势。《抵制》再一次搁浅，而且搁的时间更长，大约一年半。

（你的自信和勇气还是不够。人人都能认识的生活，何需文学家来饶舌？可以说解放十七年来形成的习惯思想束缚了我，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会动摇创作的根基。但是我还是有了一点进步，我不想随波逐流了，宁肯沉默）

沉默中间，他的思考没有停顿。他找出过去拟就的《在困难面前》（或称《钻磨眼的人们》）的提纲，研究它和《抵制》的渊源关系。

一个是烈面张书记为模特的提纲：1．讨口还家，房子火化了。

2．在娘肚里讨口，分娩，净街，谢神。

3．从放牛娃到小长工，被卖壮丁。

4．壮丁，逃跑，长工，流浪（“俘虏兵”是他被攻击、歧视的主因）。

5．土改，互助合作高潮。

6．粮食问题，公社化，食堂。

7．从冲天干劲到右倾保守。

8．苦恼，为制止拿摸同妻子的斗争。

9．由制止拿摸到让拿摸半合法化——过秤、记帐。

10．从靠边站到暗作主张——转机，八字方针。……这个提纲的标题之下，写有“也可题为《抵制》”的字样。之后，有分章的详细提要。还有一段重要的主人公性格史的分析文字：

由于吃苦过多，经历广泛，因而变成一种深通世故，软的，硬的，都能无所谓“皮糖性格”，冷也那样，热也那样，且能以玩世态度对待某些不公正，但又莫可如何的事件和人物。但他热爱党，深切同情人民，特别农民的痛苦。这也正是他敢于在那个做“兵运”的同志指示下，组织一些士兵在太行山于新四军事件发生后拖住八路军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他反对瞎指挥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传记体。其主人公就是《抵制》里的汪达非，而且第九、十两节写对待群众饥饿中的“拿摸”问题，与《抵制》的构思重合。对汪达非性格核心的设计，可看出他对人性中那一部分特殊欣赏的态度。

他还有另一个《在困难面前》的提纲。其中活跃的人物语言，是他考虑任何一部小说，首先钻出来的东西。1．轮番被斗后回家，这时他已下放二大队，实则靠边站了。着重叙述其人外形、脾气，对这两年的感慨。回家途中，沿途所见。

2．一大队的赖大汉：闲谈被批斗的情况——暗中打气。社员陆续围拢来的病痛。一个老头子：我造不来反？！对工作组新贵们的批评。

3．到社的工作组报道：这回该受到教育啦？而刚到时组员不多，通在睡。对话，是他在床边同睡在床上的组长谈的：这个黄呀，谨防他又耍死猪！

4．到住地时，正在推磨的老太婆偷地溜了，她不愿老主任看见她们磨树根吃。问讯：彼此都故意把情况说得好好。黄收工来了，一来就流泪。

5．问起来不张声，老婆子慢慢地代答，述说经过。张的回忆，难受。随即前去公社质问，替身的检查：“我不清楚那些人的成分呀！”承认在小组检查。

6．黄不愿去接受检查：“话讲对了，牛肉都做得刀头。”张谈了赖的嘻皮笑脸：“还会有这种事啊！”“到时候再说吧！”谈起一个生病的老头子的危险征兆。

7．这是秋收后的事。事件呢，整社，订生产计划：大春的。追述订计划的经过：黄被迫承担了高指标；张随和；但都明知道不能兑现，决心继续抵制：“我安心当社员！”“我不是为了当干部才入党的。”社员们又高兴，又为之担心。

8．小春收获了：一早就出现拿摸风，更盛了。征购的问题：工作组主张少留；张、黄反对，抵制。瞒产私分：“自由主义在这时有什么不好？”对统治过严的反驳。搜查，没有一粒麦子、胡豆！“还要搜社员？不行！”争执以工作组让步告终。

9．大春，抵制得更巧妙了。黄或张的亲戚前来依靠：述说苦况，死人，丢荒，外流。

这是老人：“难道我怕死嘛？我就要看看：这个戏咋个结局！”收留下来开荒。工作组的干预：“不能开荒！”“好嘛，”“又不开嘛！”偷偷搞：“这才真正是贼娃子活路呢！”

10．“作伪”被发觉了，斗争：“我拿这个钱，手决不会发抖！”张或黄大有一拼之势。工作组除驻社干部，全调走了。放手干：“他撤我的职好啦！”电话会议：八字方针的精神。张或黄：“像在磨盘上睡醒啦！”再不做贼娃活路了。随即弄清底里：党内通信。……这个提纲与《抵制》已十分相像。不仅有“拿摸”的合情处理，还有做“贼娃子活路”的描写。人物却还只有生活中原型的姓氏，黄勤明与张书记都没有区别开。它证明《在困难面前》同日后的《抵制》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一切《在困难面前》的构思，都没有“王部长”这个人物。《抵制》的第三次停写，在沙汀面前设下一个大的难题：如果他改弦更张，重新把《在困难面前》这两个提纲中的任何一个复活，由于材料实际上源于一处，只能利用一次，写出了没有王部长的《在困难面前》，便等于在世界上消灭了有王部长的《木鱼山》！

《木鱼山》是卞之琳提议他改的名字。（青桐坡）——《木鱼山》，不要说“对”得有多工，其简洁明了，就让他喜欢！原来拟过的《抵制》、《木

鱼山公社史断片》、《汪达非同他的伙伴》的名称都为之失色。

在他解放后的写作历史里，能度过政治的低气压，不为所动，坚持一个作家的独立思考，是并不容易的。不采用“张、黄体”（两个基层干部的抵制）而继续写“汪、王体”（基层与高级干部联合抵制）的小说，是在1982年10月以后。这次他一气写下去了。

8月，他搬进木樨地二十四楼北京新居。他退休了。他为文学研究所的科研规划操过心，现在，他把工作交给比自己擅长管理行政的荒煤，将关系转到中国作家协会总会，专心伏在高层建筑的十三层，构筑他的中篇。

王部长这个人物越来越获他的心。他不是热切地剖析过能软能硬、能冷能热的“皮糖性格”吗？汪达非、王部长身上，都具有这种内在气质。他赋予“软性反抗”于巨大的美感。

这是他对中国民族性格的主观体验，也是他身上牢固存在的农民性的一次“外化”。他见过的农民，大都善于“弯曲”生长。他四十年代在故乡避难，“文化大革命”坐牢，都是这样挺过来的。王部长身上有省里某领导干部的影子，同时，按一个省级文艺干部的心态去揣摩，把自己的情感渗透进去，把“我”的人生哲学渗透进去：王部长也是他沙汀。《木鱼山》的结尾写了近半年，从1983年2月写起，三易其稿。他对于小说结构向来讲究。汪达非听完七千人大会的传达归来，如果写成凯旋式的，失了悬念，就太露了。为了考察七千人大会当年在农村传达的实况，他们专门写信向克非询问。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高度重视小说结局的历史真实性，以及它对揭示全书主旨的功用。收到克非的回信，他把原写的“地委”传达，改成“县委”非正式的打招呼。而汪达非赶回社里，恰遇上生产队长刘大旺的死，给可能到来的“胜利”笼上一层赴难的悲壮气氛，避免了轻飘飘的革命大团圆。

最后两段的要点，开初是写在一个协和医院的药房纸袋上的。5月的一天早上，他醒来躺在床上，这两段的文字汨汨地流上心头，一时来不及找笔记，便随手拿起枕边的药袋。

近来，他的梦很多。是老人的杂乱无章的梦。他白天晚上设想《木鱼山》的结尾，为了设想汪达非闯进刘大旺房里，在死者面前痛哭，会怎样说出“你也多等我个半天一天”的话，一次午睡时，他在梦里哭醒！

他几次梦写刘尔钰。1980年，这位诚笃的省一师同学不幸确诊为脊椎癌。问讯后，他立即让孩子代表他将一笔赠款送去，以制止刘变卖藏书，筹措生活费用的举动。刘让人转来三本字画，这无疑是做为朋友永诀的纪念。他睹物神伤。在同辈中，如尔钰这样才华、修养绝不在他之下的人，是不少的。仅仅因为他们不如他有开辟更高生活道路的勇气，结果统统被埋没了。

1981年3月，茅盾辞世。小儿媳告他这个消息，他一时六神无主。巴金到京吊唁，打来电话，他手握耳机哽咽，连对方的住地、电话号码都忘了。这些年，他每年都要去交道口南三条的寓所探望茅公一两次。上个月，为了鲁迅诞辰百年纪念会的准备工作，他还专程去与他商讨。沙汀从踏上文坛之日起便受茅公的指教，是一向尊他为前辈的。解放后，茅盾多次在各种场合赞扬沙汀的作品“无懈可击”，“才是货真价实的短篇”。可以说，把托尔斯泰型的小说模式与中国民族生活结合，他所走的小说道路正是以茅盾为旗帜的！6月13日晚，他梦见最后一次到茅公家的情景。他扶着他从会客室回房休息，茅公气喘吁吁的。

他也大咳，咳醒了。

他把《木鱼山》修改稿交卞之琳、陈荒煤，请老朋友提意见。他不相信这个中篇会有失错，又怕有失错，等待“判决”的心情照例紧张。

朋友们加以肯定、鼓励。修改，再修改。到1983年7月，才亲自把定稿交给吴强，转上海的《收获》。9月13日作品发表前夕，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坐在绿草茵茵的河岸边，用极小极小的竿子，钓上一条鳞光闪闪的大鱼！

这算是什么征兆呢？是想念故乡的火烧鞭、黄腊丁这些鱼，因而也就想念故乡了？还是说他渴望亲近水？他的口腔常年疼痛，养成了抿嘴巴的习惯动作。哮喘、肺气肿、呕吐，令他的喉头时时干燥，不舒服。他干瘦干瘦的，许多早就认识他的人说，他还是那个样子，就是萎缩了一点，这对于老年人倒是好事。说话的声音也干干巴巴，但说得高兴，会在你面前屈起右手的食指、中指的两个关节，把桌面敲得卡卡响。稀奇的是一头蓬发仍是黑的！依旧不驯地向四外扎撒开，无法梳拢。他是不是缺乏足够的水分？

《木鱼山》含着一个老作家难得的反思，这年10月问世了。可能任何圆梦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应当简捷地了解它的第一义，不必绕什么弯子，钓到大鱼就是钓到大鱼！

魂归红石滩

他生命的每一关键时刻，都扎扎实实落到他的乡土上。《木鱼山》的故事最初发生停顿，与安县山水草木相连的小说便呼之欲出了。

这差不多是他半生孕育之作。五十年代参加石板滩土改以来，他一直梦想描写川西北解放初期的社会风貌。他有睢水十年的生活做基础，做过不少故乡和四川各地的调查，同张秀熟、李劫人、艾芜不知谈过多少次，连提纲都拟了几个。箭在弦上，而箭就是不能够离弦。

题材上的政治压力一旦放松，由睢水袁寿山串连起来的这段生活就全盘变活。可能压抑太久了，一下子放得很开很开。1979年12月，他制订了一个三部曲的写作计划，表现出一种史诗般的气魄：这本书应比《淘金记》发掘更深。

结构。三种力量：袁一伙，杨、萧、唐一伙，市井商贩。这三种力量也是三条主要线索，穿插于这三条线索之间的，则是附属于、动摇于三者之间的帮闲、帮忙。总题：《流氓皇帝》或《胖大爷》。可设想为三部：1．抗战胜利前夕；2．在解放战争中；3．解放前夕。

第一部：起于独山失守，乘机大拉关系。因为一些有政治野心和有爱国思想的大人物，都认为该地是避难和打游击的好地方，结果敌未入川，而胖子则由此壮大了声势，更为所欲为了：修建学校，沽名获利。

第二部：抗战胜利了，卖不成壮丁，大烟生意也可能成问题，特别盗卖了那么多公粮，怎么办？人心惶惶。

可是内战起了，高兴：转危为安，特别继续要征粮和壮丁，更合口味。在此期间，胖子派头、手面更不同了，也更醉心名利。

第三部：四川解放前夕。国民党着着失败，慌了。伪装开明，笼络青年知识分子、劳动人民，但一面却准备应变，同时又以应变为口实，向一些土粮户吓诈钱财，并继续盗卖粮谷，兑换硬洋、金条。

这三部，每一部都可独自成书，主要人物不动。书名也不标明上、中、下。各自有一题目，等到出齐了，或者最后一部写成了，在序上加说明。

他还列了整个三部曲的人物表，用的是生活中原型的姓名。每一部均匀地安排了二十六个章节。七十八个章节一一写了述要。如果这个计划实现，将是他最宏大的一部分。可是1980年8月他在成都休假，开始动笔写的只是第三部，名叫《应变》。

他收缩了。本来想倒着写，由第三部上溯写到第一部。后来集中精力写的就是一部。开头非常顺手，他安排了一个环境，以便引出小说的时代，引出人物，叙述一个强权社会在崩坏之前，如何最后一次运用权力来苦苦挣扎。这个环境选定在四川每一个稍大的县镇都会有的街市中心：十字口。

睢水的场镇太小，它没有标准的十字口，需要从安昌镇移植。十字口的夜市，烧房门口聚集着喝“碗碗酒”的挑夫、车夫、小商贩、吝啬的小粮绅、普通的市民。长柜台下边与之“配套”的烧腊摊子，担担面和汤圆担子，正生意兴隆。挎竹篮卖花生、香烟的小贩，兜揽生意的那一股子劲够瞧的：“你尝两颗看脆不脆嘛！”“你吸一支，吸不通不要钱！”

描述这样的场面，描述在这样的场面下人们以各自的身份议论逼近的战争，对于他，真是闭上眼睛立时便在面前。这年年末，《应变》写好了前九章。袁寿山、萧文虎舅甥俩和吴瑞卿老师之间，明明暗暗的斗争已经展开，小说却忽然在原地踏起步来。他迟疑不决，《木鱼山》和《应变》都遇到了麻烦。

《应变》的难题是，究竟应以哪种人物为重点？胖爷，还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他过去还考虑加上一个征粮队的角度。他不满意原来那种什么都沾一点的布局，管它叫“猫抓糍粑”。在1981年所有不写《木鱼山》的空隙时间里，他都在调整《应变》的结构，发现自己变得不忍割爱材料，总是拼凑故事。这说明他老了，犯了老年人的琐碎病。等到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艺术个性不适于大张大合，关键还在于收缩，《木鱼山》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能够一气接写下去了。1983年《木鱼山》发表，《睢水十年》进入写作高峰，家里却发生一桩不幸的事件。

刚虹的儿子劫劫患了脑病。每年回川，在新巷子住所，劫劫是他身边最可爱的孙子。两爷子往往可以在一起说上半天并不需要谁懂的话。这年在京，听说孩子得了奇怪的病，他十分惦念，常盼他的母亲来信，好知道治疗的情况。7月，收到一封刚虹的信，竟然没有提到孩子，他很生气，曾让女儿拍电报来讲清楚劫劫的病情。实际上，孩子患的是脑癌，已经夭折。全家上上下下只瞒了爷爷一个人。

8月的一天，他做完早课，就是从十三层楼下到七层，再扶住楼梯爬上来。任白戈的夫人华逸来访，这是他们家的熟人，谈话比较随便。当话题从白戈的健康谈到四川住房的时候，沙汀冒出一句：“无论如何，我不想在新巷子十九号住了！”

华逸误以为这是由小孙孙的天亡引起的，随便接口安慰说：“刚虹很懂事的，也很坚强，她没有被丧子的悲痛压垮。”一语泄露天机，道出了事情真相。

他当时惊呆在座位上，知道自己这几天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但经人证实后，他仍然不敢相信。下午华逸来他房里告别，一脸捅了漏子的自责神气，他已无心听她讲话。

连着几天，他闷闷地默不出声。眼光躲着屋里那张放大的劫劫照片，又像有一根线把他牵向那张照片。人生如此残酷，一个还没有开始生活的小生命便这样悄然消失，好像从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劫劫引起他对玉颀的思念。他细细温习起妻子手术前后的一切，把这一老一少连成一片，记入了日记。

后来，他为四川出版的《沙汀选集》选照片，在第五卷的扉页用了一张与劫劫的合照，算是只有家人才知道的纪念。

他的思路这些天还缠绕在新巷子十九号。种种与这所房子相关的不幸遭际，纷纷爬上记忆。他叫回忆压得喘不过气来，想做一个了结，与京、蓉两地的孩子商量处理一直供奉在那里的玉颀的骨灰盒。他提出三个方案：将骨灰倾撒在睢水关大拱桥的水潭里，或者寄放在成都文殊院，或者埋葬在睢水的山梁上面。起初还怕伤了儿女的心，不料大家比他开通、爽快，都赞成他的处理办法。是杨礼后来代表全家把他母亲的骨灰盒安置在睢水中心校背后的高高山岗上的。

刚虹那里他去了一信，绝口不提劫劫一句，只说自己将尽力克服所有的缺点，相信病体会日益健康。并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冯诗云，虽然双目失明了，可是照旧关心时局，关心别人，健谈、乐观。他听刚宜设过，这个暑假他姐姐每天都去游泳，可以看出这个一向开朗的女儿，为磨平心灵创伤所做的努力。这封信处处都是在暗示她、鼓励她，也是鼓励自己。

熟识的同辈故去者一天天增多，参加追悼会或与遗体告别回来，往往要病一场。但是，老而弥坚的人并不止诗云一位。巴金去年为现代文学馆整理自己藏书，摔断了左腿，最近听说又要第二次入院。巴金写字手已发抖，字越写越小，一个半天写不到一张稿纸，要分外努力才能叫百分之七、八十的字纳入方格内，但每日坚持写一、二百字的“随想录”。艾芜比自己大半岁，天天写作长篇，早上必走三五里路买菜，晚上小跑一阵，离开读书写字就不能生活。而周扬不久因谈人性和异化的一篇纪念文章受到批评，落了个脑晕的毛病，也仍在照常工作。

去看冯诗云，成了他了解社会的一个渠道。他一年之中虽然一半住在首都，但交游不广，与冯相比，实在是北京社会的“槛外人”了。诗云却赞许他的生活方式，专心一意地写作，尽力避免社交活动。写完这最后几部书，赶快办移交吧，他想起鲁迅晚年说的“要赶快做”的话。

工作能减轻悼亡的情怀。《睢水十年》除了查证历史事实费时，写起来是顺畅的。1983年为了这本书，他也像巴金一样，一天几百字地向前挺进。他又做过一回钓鱼的梦。一天午休，只见自己一下从河里捞起一条足足有尺多长的大鱼。好像站在岸边，有另一个沙汀在笑那个捧住鱼的沙汀。1984年患病，也没有很大地影响写作。这年初，他的呕吐病加剧。2月的一天夜里发病，来势凶猛，被送进医院抢救。这是他四十年代胃溃疡的卷土重来。不料十天后又一次发作，胃出血。首都医院（协和）原不想动手术，怕年事高的人吃不消，这时也只好冒险实行“胃空肠吻合术”，将他的胃切除了五分之二。表面瘦弱不堪的他，内部的生命力并不弱，八十岁上手术台，他挺过来了。

胸腹刀口拆线之后，因为修建病房把他转到北海公园附近的三五医

院，休养了两个多月。到4月23日出院回家。医生认为愈合情况良好，不需灌肠处理了，他高兴得忍不住对面前的外科大夫讲起《好兵帅克》里如何整治逃兵的故事。他庆幸自己这个老兵还算不错，称了称体重：八十四斤。出院一个多月里，他加紧写作《睢水十年》。

这些日子他每天六餐。饭后闷食半小时，让食物在胃里多停留一会儿，以激发残留的器官增强功能，担当起过去全部的工作。

他在超负荷运转：写回忆录，订正别人写的年谱，校改《木鱼山》单行本，关心巴金的成都故居。他还是那股子脾气，《木鱼山》的校样改完已经打包，马上要寄上海，临时又拆开来改了多处。他近来时常“倒觉”，醒来以为天亮，实际才是半夜。有时凌晨三时醒转，睁眼想今日要写的内容。就这样，6月20日，他在笔记本上写完《睢水十年》的最后一个字。

安县常有人来木樨地寓所探望他。搞县史、县党史的同志前来调查材料，带来故乡最新的消息。他鼓励学有专长的儿女回乡考察，为故乡效力。一个孩子为研究开发安县的矿泉水，去安昌镇调查，来信述说县城新建的街道和现代化楼房，使他十分神往。玉颀的墓碑已经刻好、立好。县政府多次邀请他回去看看，他已经动了心，特别是《应变》的写作提上了日程，他很想回睢水一次，去溯源、寻根，重新找回那个时代的气氛。只是一想到还要在新巷子住，就畏缩了。对于凝结着他这么多痛苦的这所房子，他实在怕再看见它。1985年的春天，一个声音时时在心头作响：坚强些，你的日子不多了，最后回故乡一次吧！

这是由于许多事件促成的。周扬的身体显著恶化，脑血管供血不足，造成全身神经麻痹。上次看他，步履尽管不稳，尚能送客到门口，这时生活已不能自理，握住他的手，反应已相当迟钝。看到同自己有半个世纪友谊的朋友，端坐不动，由别人一口一口地喂食，沙汀感到揪心。

解放以来，周扬和他在历次运动中都犯有“左”的过错。周的领导岗位高，责任也更大些。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睿智而识大体的人，他的失误是在追求真理中的失误。“文革”后，周扬不谈十年中自己所吃的苦，却在许多场合真诚地向受害的同志、向历史表示忏悔，而且在新时期率先在党内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你在理论上往往信服周扬）

苏灵扬提醒过他，见到周扬不要谈外面的事。可是他还是说顺了嘴，讲起一位上海作家要来探周的病，说如果不会客，便是远远看看也行。周听到此，突然有了反应，双眼挂泪。

为了宽周扬的心，他讲起延安的一段往事：周曾赞扬过一位美国记者。那个美国人初到中国，对人们喜欢挂在口头上的词语“没关系”、“不要紧”，大不以为然，认为很消极。可是后来他改变了看法，从中悟出中华民族豁达大度的坚韧品质。周扬仿佛明白了沙汀摆龙门阵的用意，脸上泛出笑容。可惜两人无法按今天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热，再来谈中国民族性的正反两题了。

他后来多次去北京医院探望周扬。看到他似乎没有转机，几次忍住泪逃出病室。最后不是他来慰问苏灵扬，倒变成灵扬追上来，说：“你这个人不要太动感情了！”（你的感情的力度影响了你的深度）

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只参加了少部分会议。会上新一代作家对周扬的感情表达，使他欣慰。这个会引起的一些矛盾，长久在文艺界徘徊。

（你在老一代革命作家中站在思想活跃一边）

3月，巴金为了现代文学馆的开馆，专程来京。事先打来长途电话，说可能此生是最后一次来京了。在万寿寺的文学馆开馆典礼上，巴金坐着轮椅进场，一坐定，便传言找他。

“你的气色很不错嘛！”沙汀握住巴金的手。

“虚有其表啊！”巴金笑答。

沙汀心里埋怨朋友，因为读他的《随想录》，总觉得准备后事的味道太浓，这是他唯一无法忍受的一点。后来听巴金女儿李小林谈起他们去看周扬的情景，很动人。一个长久执行过“左”的路线，一个长久受过“左”的路线之害，两人都流下泪。周扬病中连儿孙都认不大清，这次神智意外清楚，倒来安慰巴金，说他很快会健康起来的。

（在文艺观念上你接近周扬。在人格道德上你受到巴金越来越大的吸引）

4月，他胸口闷胀，咳浓痰，去医院检查，被留住了一个月。连着几天的输液，就像动胃切除手术前后的许多天一样。他不断做梦，在梦里吃东西。醒来对护士讲饿，护士指着吊起的输液瓶：“你这就是进餐啦！”

每次验血，他总想让护士手下留情，不要抽得太多，同时担心不要把床号弄混了。

（你真是个小小心翼翼的人）

5月，张天翼逝世。他表现出平静的悲伤。四十年代去郫县探望天翼，这位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身患肺病，没有人能料到会多活了四十年。评论家说他们是“左联”讽刺双璧，现在余下他形影相吊。

（你在想自己最后的日子。不仅是巴金一人在想）他决定回故乡一次了。这几个月北京生活的精神重负，像是要压碎他连续写作成功带来的生命充实和完整。难道他的晚年便这样度过？生性趋向简洁、明朗的沙汀，不愿长时间陷在悲伤的泥淖里。5月22日，正准备行装，四川来信，告刚虹平安产一男婴，重七斤多。如同阴云密布的缝隙间挂下阳光，他虽不相信转世之说，但想象那个劫劫仿佛在冥冥中保护自己的弟弟降生！他很激动，四天后踏上返川的路程。（好啊，你散发出老年之光）

故乡之行成了重写《应变》的重大转机。

他是6月7日驱车前往安县的。9日，便来到比县城更觉亲切的睢水。这里变化不大，简朴的乡场，通向迷茫大山的石板古道依旧。与周克芹坐在他的当年老宅大门石阶前，看干涸的睢水，河坝上的老核桃树，他恍惚回到了《应变》的环境，情不自禁地向同行者讲起过去这里的统治者的故事。

“这座房子是唐五驼子的；刚才看到的乡政府那个地方，早年伪乡长袁寿山就住在那里。袁寿山这个家伙，是个人物！”……他随口给我们讲了袁寿山这个人的几个生活故事，一个光棍出身的、狡诈、凶横而又有几分愚昧的地头蛇形象，就栩栩如生地站立在我们眼前了。我问沙老：“为什么没有写呢？”沙汀告诉在场的人：“我一直想写的。题目在心里存了多少年，叫《流氓皇帝》。但是后来受到‘左’的影响，总觉得首先应写新的现实，就搁下了。我另外搞了个《应变》，写袁寿山和他的外甥萧文虎怎样耍把戏，应付解放。没有写完。我给四川的《夜市》，就是其中的第一章呵。”

《夜市》当做独立的短篇在《现代作家》上发表，让人们看到他刻写昔日四川偏僻乡镇的娴熟技巧，极富风俗人情韵味的语言功力。《淘金记》的笔法又回来了！沙汀在睢水之畔大谈袁寿山，有意无意中透露出他收缩原

来计划，彻底用袁胖子为中心来结构全书的想法。

由此，写作僵局打破，闪开了《应变》导向《红石滩》的通路。

（收缩，在这里便是艺术的集中和提炼。总的来说，《木鱼山》代表你思想解放的程度，《红石滩》则是你小说艺术的回归、升华）回到成都，他着手写《应变》的修改提纲。

在旧稿中，所谓新政权的人物本来就不强，重要的是简化菜农一家受冤屈的故事，把吴瑞卿与菜农改成翁婿关系，相应减弱对吴的叙述。这样，才能突出袁寿山的主线。这种考虑过去也曾产生过，只是性格和年龄的关系没有定下来。近来，他为了一点小小的细故反复琢磨的脾气，越来越盛，推翻复树起，浪费的精力实在太多。他要求自己拿出创造的勇气。

已经有朋友好心劝他封笔，他不甘心。无论如何，要把调整后的《应变》写出来，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部大型的小说了。

金秋季节返回北京，全力投入小说的写作。10月9日的日记里，出现“《应变》或者说《红石滩》”的字样。有了《青桐坡》、《木鱼山》，这个漂亮的书名顺理成章。他以川西北典型的山水风物，三个位于双龙、尊胜、睢水的真实地名，标记了自己终结性的作品。

他每天生活在红石滩的氛围中。按照新的设想，拟了人物表，修改前十二章。胖爷袁寿山第一次被称为“方慎之”。在他的家乡社会，一个流氓型的权势人物偏有一个文诌诌的雅号，是不足怪的。外甥萧文虎的名字焦继聪也是这样，有暗示，有反衬。吴瑞卿最初取名吴郁森，后改为伍茂卿。小说脱离生活中的真实姓名，标志着成熟的虚构成分正逐渐在作品里扩大，加深，加浓。

他对十二章以后的部分，逐章草拟写作要点。拟一章，写一章。修改前还拟修改要点。

笔记本上爬满密密麻麻的句子，留下他艺术思维的印迹。

（十二章乡长去学校途中，入校后所闻所见，已写的全删去！简化：很快就见到来客，而着重描写来客。群众大会，不直接写讲话内容，由站在外围的人互相传递，邓大汉就向菜农传达评语。这里倒可以写群众的测度，如：“胖爷咋不出场？”——沙汀1985年10月19日写）（看来吴、菜农的故事还得削弱。主要只能写吴从那位去延安的学生受到教育，引起乡长的猜疑，杨母则已去世，……不要忘记，中心人物是胖子，写乡长及其他重要人物，也不能离开胖子。十六章得写胖爷听到会议结束，叫乡长到龙湾子。其时恰好乡长将进城。——沙汀1985年10月31日写）

（胖爷夫妇有个儿子好，在外县邮政局作局长，把母亲接去了，只偶尔来一次。因为其母受虐待，有怨气。胖爷有过这种想法：“×！实在不对，就梭到那娃家里去。”而且还想：“老子一定要在红石滩混日子啦！”——沙汀1985年11月2日写）

（乡长的心理势态：过去一直对自己鱼肉乡民毫不在意，但求做得巧妙。近一来，却逐渐明确意识是犯罪行为，因而才有“应变”拖上山的阴谋。本乡解放后，平安无事，放心了，但却仍然无法消除恐惧：谁能担保，他们站稳脚后怎么样呢？因为他们的诺言照旧有些活摇活甩！于是就赌咒也不会放心了！——沙汀1985年11月15日写）（烧仓库那个人叫“麻鱼子”，这一章点出来，前面还得作必要增补：打假辩，关了两三个月，释放后让其收猪厘金，原为富裕农民，作过保长，后来一再同吴捣乱，最后又在乡长唆

使下暗杀了吴瑞卿。——沙汀1986年2月1日写)

(十八章得重新设计,已写的七、八行,划去!主要是把重点转到胖爷身上,转到伍茂卿身上,转到红石滩在乡长离开后的变化,并使这个变化成为促成乡长采取行动的动力之一。……从何处下手呢?唐尚清趁乡长不在,把那个逼着结婚妇女送走了。而小旦的丈夫闻讯赶来,这行吗?或者,让那个被迫前去延安的学生、老钟的侄女来接走老钟,她已经在成都搞川西妇联了。这似乎又扯得过远,且有生硬之感。那么,写工作组的活动?总之,对乡长说,要出现危机,而胖爷必须出场,还有老二,他可说是串连各方面的中心人物。

一个难题:粮仓如何焚烧的?一两瓶煤油行啦?堆放些草引起的,这些柴草,又是补漏洞的:鼠灾,偷盗。“年头年尾的,一夜要巡回两三次!”住家也在库房一个院子里。他是以嫌疑被拘的,因为证据不全,本人不承认,释放——打假辩。而他之当保长因为粗通文字,又懂公事,而其他有资格当保长的,都嫌麻烦,特别怕这样捐那样款的,又受怨,又填钱,因而都巴不得扔给他干。而他满有办法,加之同乡长熟。……

也可这样设想:不是烧仓库,是将管理本乡公粮的经理暗害了:谎称是自杀的,因为听说清库,清存粮,而他盗卖粮食过多,于是烧毁册据,本人上吊,实际是死后弄去吊起的;帐据,也是死后烧的。当夜,骆渊、麻鱼子陪他饮酒至深夜。这个经理员,城里人,一向搞财粮工作,中年,大多时间住城里,麻为其看守库房。他办公室也在库房一间屋子里。——沙汀1986年2月7日写)

这年的春节,沙汀为了这个焚毁谷仓如何能写得合情合理,可苦够了。他一度想改成害死外籍管理人员。因为麻鱼子用煤油烧仓,事后的掩饰,要不露马脚很难。整整三天过去,他猛然悟到,他们为什么不敢明目张胆地把煤油拎进去呢?“应变”之前,他们有什么顾忌?没有顾忌这才符合胖爷的习性啊!他不再去想周全的焚仓方案了,用煤油烧就用煤油烧。他于舅甥俩仔细商定杀伍茂卿的计划后,为胖爷添加了一笔妙文:“‘他妈的!’他苦笑道,‘过去收拾个把人哪有这么麻烦呵!’”

要说《淘金记》是写封建强权社会的“得势”,及它借抗战时势之名百般疯狂的“变形”。《红石滩》写的是这个社会的“失势”及它临终前为顽固保存自己而做的“变形”。

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后描写袁寿山世界的作家之一。

3月初,他写到了“尾声”。如果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被卞之琳誉为杰出的“风俗画”,与《清明上河图》一样“在美的欣赏上将流传下去”的《红石滩》,在尽了笑着唱完挽歌的使命后,还能说些什么呢?现在,他对中国封建主义的余威,在名山批斗场和昭觉寺囚室内外,在自己的盲从与伟人的错误里,在八分钱(邮资)可以决定四川姑娘一生命运的日子,看得分外清楚。他再不想廉价地向读者许愿:袁寿山的王国已彻底崩溃,了无踪迹,或者说那句用滥了的“一去不复返”。《红石滩》越出了《淘金记》时代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水平,在“尾声”里,胖爷还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像个幽灵般游荡——它在红石滩社会已成为“通用词汇”:如果有人沾吃霸欺,人们会说,“家伙咋个跟胖爷一样呵!”

(你表露的思想,虽然远未发掘到尽致,但依年龄,你已经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重新起步和重新思考!)

一年前，他在安县，在睢水，就曾经无数次陷入这种历史沉思之中。

写出一本《红石滩》，也像是一次故地重游。每一处故地就是一个会说话的化石。大西街的故宅，杨家碾房的屋院，刘家酱园的经堂，断头卧牛石，通往茂汶大山的后门，在向他诉说过去——当今——未来，自然——宇宙——英雄——智者——芸芸众生，人民——群体——自身！

1985年6月8日的清晨，他从安县招待所后院的一间客房醒来，意识到昨晚他是睡在“历史”上面。这里原是汶江小学的旧址。出招待所左拐，便是大西街。上午别人引他跨进这二十二号。他老眼迷离，这就是他的老屋，“祖父”的房子？

“变了，变了，”他不住地低声念叨。

他站在一个小院，询问一位老者：“这恐怕是原先的第一个天井坝吧？”

“不，这是原来第二个天井坝。第一个已经新盖了房子，看不出了。”老者回答。

“这后面还有一个院坝、一片菜地和几棵皂角树吗？”“没有了，都没有了，盖上房子了。”

“对，对，房子也应当推陈出新嘛。”

嘴上是这样说，看见扩建的安县公园，繁闹的十字口，东门大街上鳞次栉比的四、五层新楼，他也是这么讲，但是心里不免惆怅。历史不可重复，哪里能寻得到他青少年时代的故乡呢？

在南门外现在大大加高的河堤上，远眺对岸杨家碾母亲兴建的旧宅，他不准备再去打破梦影。听郑县长在旁边介绍，那里已做了县敬老院，他连说“用得恰当、用得恰当”。

不经意，回忆已钻破尘封的往昔。同行的年轻人在给他记录，周克芹的问话好像在帮他扯不断的丝线连缀。城关的风貌习俗，圣灯山的庙宇，杨家的家世，母亲、舅父、谢象仪、陈红苕、魏道三……这里是他的“根”，他的出生地，读书识字之所，看戏赶场的平坝，他是从这里读完人生的最初一课，走向成都，走向外面的世界的。他一生的道路走得怎样？是喜是悲？对多错多？有没有辜负了什么？他后来访问安县劳模刘定国，参观他的种猪、饲料地和“养猪技术服务中心”，听说他过去是劳改释放犯，很感动地握住他的手，希望他“好好总结自己”。是啊，他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回自己，总结自己！

9日是星期天。他们的车队停在公路上，他身着灰色中山服，脚登一双轻便旅游鞋，拄一根无柄的手杖，轻步走过平桥，来到睢水场口。

这天正逢场期，他们的到来使熙熙攘攘的街市掀起一股热浪。不时有年长的农民兴奋耳语：“杨二哥来了！”

“这是杨沙汀回来了！”

他甩开引路的乡长和一大群同行者，急促地向场口左手走去。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他自己找到了原睢水小学的校门。“没有变！没有变！”他念叨着，原路走回，向左拐向正街，去找刘家酱园。走进一个铺面观望，上了两截石梯，他止步了，否定道：“不对！”

这不是刘煦之的公馆，朝里走是平地，没有梯子。”然后退出来，才找到邻近的酱园后院。

睢水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只是有的地方衰朽了一些，有的地方修整得过于新鲜。他面对刘家酱园后山坡的颓垣残壁，凝望了许久。这是他最寄予感情的地方，《淘金记》是他焕发文学生命之所在。睢水周围的山水，是他乡土文学的主源。通过闭塞乡村的人物、社会，他参与了挖掘中国封建老根的事业。这里老乡的普通市井口语，幽默而简练的表现格调，直接影响了他的小说风格。讽刺的传奇性、讽刺的激情以及讽刺本身包孕的痛苦内涵，都得益于这块貌似贫瘠的土地。他坐在睢水河边，全身陷进藤椅，任凭周围的喧嚣，沉入对自己文学的思考。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在提醒他这是他的一次“衣锦还乡”。看着那些前来观瞻，挤着闹着不忘开玩笑的老乡，他的心情很复杂。他想对他们说，我的文学就像你们一样，追求的是质朴、开朗、幽默、含蓄，这是你们身上美的风格。但是，为什么这样把我当一个“热闹”来看？如果没有这些汽车，没有这些县里大小人物护卫着，你们会对我这样的老人有兴趣吗？你们能认可我是个睢水人吗？

他的情绪突然减弱，觉得干枯的河床，根子已经枯朽大半的核桃树，土砖封门的故宅，都很难看。刚宜满有兴致地去看自己出生的房子，他却坐在门前良久、良久。有个小辈的亲属来探望他，他无故地发了几句脾气。

只能吃到鲤鱼，而吃不到沙勾鱼。故乡的小鱼更牵动他。他不应当这样对待好心来看他的人。他不是备了礼物，要送给当年保护过他的那些家庭吗？到过睢水中心校就可以了，那是玉颀常年工作过的地方，操场上有她的足迹，预备室有她的身影，不要去山上读她的碑文了。她知道我已经来了，来看过她就行了。让苦竹庵萧业贵的儿子萧鸿发带走这包礼品。不要忘掉到刘家沟，见到房东邱廷珍大娘替我问好。板栗园的吴瑞卿的老伴还在，他们的女儿该是四十岁的人了。他躺在睢水纸厂的一个小房间里休息，内心不能平静。

刚宜代表他去板栗园探望吴瑞卿的妻子李芳琼。李已重病不起。刚宜本来与他们说好，不必来睢水了，还是在家侍候病吧，等吉普车返回纸厂，李的女儿吴国琼坐在儿子的自行车后，提着一篮新鲜又新鲜的鸡蛋也赶到了。他从休息室出来，握住吴国琼的手，第一句便问：“你母亲好吗？”

刚宜他们很着急，怕沙汀知道李芳琼生病，会不好受。谁知吴国琼含着热泪答道：“好！很好！谢谢杨伯伯的关心。”“娃娃长成人了！”他指着一旁的小伙子。

“是呵！1956年你来看妈妈，我才九岁。记得你送我一支钢笔，还要我好好学习。”

母子俩一直把他送上车。吴国琼始终没有透露母亲病重的消息，只是止不住用手绢擦脸。轿车启动了，儿子抓住车门，把头伸进车子，还在喊：“杨爷爷保重！”

“杨爷爷多多保重！”

这就是故里乡亲的朴素情谊。人民，是他文学的母亲。

他坐在车上，疲乏而兴奋。他算是个好的作家吗？他的作品能面对人民无愧吗？他将永远告别红石滩，也永远留在红石滩了。

返回成都的路上，他访问安县养猪、制面粉的专业户，参观绵阳的“乡村冠生园”，会见“古凉粉”其人，赴德阳观光天元乡段家坝农民新村。中国目前的改革，是从农村广袤的土地上首先兴起的，他密切注视着它的每一

变动。在北京，他剪过一些报导农村的报纸，特别是四川的。这次绵阳市安排王达安一家从三台赶到这里来见他。他把老朋友留了整整一天。招待他吃饭，上下午谈个不停。除了“文革”动乱，更主要的是谈今日的尊胜，谈改革形势下农民与土地的新型关系。

他是在搜集写作材料吗？前两年，他有写农村改革的动机，还为自己不能到尊胜、烈面了解新时期的农村而感缺憾。

现在他承认，这已经不是他这一代作家能做的事了。他今天到了尊胜的门口，仅仅因为有一段公路路面破损，只好让王达安跑来看他。他确实衰老了，勇气也不够。攀上睢水玉洞山去看玉颀的勇气就不够。身在绵阳，刚俊陪他往返安县，明明知道李增峨就在这个城市里，近在咫尺，也没有勇气去看她。她一定也垂垂老矣。像朋友一样对待与自己终止了婚姻关系的女人，这也只有下一代的青年才能做到。对他来说，太难了。

他的使命是写红石滩土地的昨天。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做为作家，他没有太多的个人天才，他是时代的天才。风云际会，他有幸成为一个最早的忠诚的左翼文人，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把中国宗法农村的没落、农业文明的终结，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学模式完好结合的作家。他的艺术生命在故乡，源于川西北，终止于川西北。他是个有强烈乡土意识、社会意识和造型意识的四川地方志的形象叙述者。

做为一个人，他浑身浸透川味。诚实，容易急躁，感情丰富，含秀于内，过于琐细、凝重。他解剖过自己，多少还有些世故，因为社会阅历过早、过深。

他的一个孙子，有一天把他和巴金做横向比较，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巴爷爷从来就是青年，而爷爷从来就是一个老人！

那是说他刻板、冷峻、不洒脱，太刻事求全。他多么愿意把他内在的热力献给这个孙儿，但是他知道，他注定不是奔腾喷溅的瀑布，他只是家乡一块生长红苕的坡地，一块默默的与大山相连的土地！

对待那个人人都要来临的归宿，他在日记里抄录了一段罗素的话：

作为一个老人，已经懂得了什么是人生的快乐和痛苦，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再担心死亡，太可笑了。

……最好的方法，是逐渐使你的利益变得广泛，使之超出自我的范围，直到束缚自我的障碍一点一点消失，这样就会与宇宙共存了。他不是超人、哲人。想超越又无法全部超越，是每个凡人都具有的矛盾性。但他觉得罗素的思想能纯净自己，升华自己，是崇高的。

他究竟来自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和它的土地。写完《红石滩》，他还有辛勤笔耕，撰写另外的回忆录，整理笔记。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他九十岁又捧出一本新写的书。他不会忘记有一次与巴金见面，谈起几个熟悉的名人太讲究营养、太讲究保健，打个喷嚏也要住进医院，巴金听了一笑说：“如果什么事也不作，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感受到一种天外的呼唤，心在应和：就做一块年年生长庄稼的川西北的红土地吧！做红土地吧！

后记

午夜12时与明日的一时之交，是个奇妙的时间。它可以被称为零时，好像是于天地之间，无所依属，又似乎同一切都有关联：过去、未来。1989年新年的钟声刚过不久，就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写完了这本传记的最后一个字。

我没感到有什么轻松。断断续续的一年时间，加上搜集材料，连在一起有了三年光阴，涂了这样一本语不惊人的东西，实在也抖不起来。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沙汀，我只能回答，因为我爱读沙汀。如果有人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一个健在的、并非超一流的作家写传，回答也不复杂，就因为他健在，他并非超一流。

传记面对逝去的一切人、事。应当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但是逝者如斯夫，尽管是已经流逝的史迹，它仍然处于永久的“变动”之中。传记并非绝然建筑在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的。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不习惯诉说一个鲜活的人，表面是要待盖棺论定（即凝固），或许正想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当然，现在多半又鉴于传主及传主的同辈人俱在，怕受多方的掣肘，“为尊者讳”，而不易发表创见。即便别人不干预，自己都会疑心生暗鬼，习惯成自然地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中国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下，发表纪实性文字，说不定半空里会落下什么责难、挑剔，要说写一本见血见肉的传记，谈何容易！

但正因如此，就更应该多写今人，多写后人，除了写伟人，也多写非伟人，写一切有价值的人，让历史摆脱僵直，摆脱“钦定”、“官办”、“经院”的樊篱，走向多元，走向人间。

那么，面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和一秒钟前的人物行为方式、感情心态，一个传记作者的态度只能是开放的、科学的和现代的。我追求今人对永不停止的历史运动的充分理解。我期望能与历史“对讲”。

这包括让沙汀和他的同时代人“原原本本”地表现，也允许我“平等”地解释他们。我是不是做到了此点，有白纸黑字在，我听候裁决。

我要感谢沙老。他不顾年老多病之身，与我谈过数十个小时的话，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特别是允我读他劫后残余的笔记、日记，有的是未经发表的。但是，他坚决地表示，不读我传记原稿的任何一个字！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是要解放我，放我到一個宽阔的去处，不受更多的阻碍。为此甚或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某些细节未能得到权威性的纠正。不过，为了更好地保证历史“对讲”的确立，权衡得失，可能还是值得的。

从全书“对讲”的结构出发，除了引文，我采用了不少沙汀本人及其师友亲朋的口头材料。我要向他们表示谢忱。这些材料，大部分是我面对面访问得来，少部分是别人搜集形成笔录，由沙汀转交我的。本来可以将这些材料一一请本人审核，形成被认可的文字。但我从沙汀的不读原稿得到启示，认为可以不把这副“枷锁”套在别人头上。所以，我要说明：这里所有的讲述文字均未经原口述者审阅。这是讲述者的话，经过我的头脑和记录反映出来的，似包含了主、客双方。它们都没有发表过。

我本质上是个文学研究者。这本传记仍是按学术性传记的目标来写的，不是文学创作，几乎没有什么虚构的成分。只是想要尽量靠近研究对象和我自己，设置了贯穿到底的传主和笔者的对话，来沟通这两者。这传主的对答

才是我唯一的虚拟文字。至于沙汀以外的同时代人，他们是按照与沙汀的人生重合的那一部分，进入传记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全面的表现和全面的评价。如果与沙汀的交往，正好显出他们的优长处，或偏偏把他们的缺欠处露得过大，它们都是同等地属于局部，属于偶然。我都要深深地致歉。只有我，应当对全部的传记文字负责。

我感谢向我提供宝贵传记资料的各位前辈与同辈。先后接待我的有：复衍、艾芜、吴组湘、卞之琳、苏灵扬、张秀熟、萧崇素、约瑟、胡甫臣、李眉、王苹、葛一虹、郑瑛、常苏民、李累、周克芹、郭付仁、洪钟、徐文耀、束沛德等。四川省作协罗湘浦替我筹划在川访问的事宜。杨刚俊、邓仪中陪同我访问了沙汀故乡，受到安县上下的亲切接待。重庆市文联王觉引我寻访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文协”原址，郭福田不辞辛苦陪我查访南温泉桃子沟、铜元局华裕农场。上海宋永毅等助我寻觅德恩里、天祥里等沙汀在沪的住址。感谢多次对我的调查给予支持的杨刚虹、向时文夫妇，杨礼、曹秀清夫妇，还有秦友甦。感谢在我的传记形成过程中给过我帮助的所有的人。感谢他们的厚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鼓励传记写作，在目前出版业困难的景况下，显出出版家的胸襟气度。文艺室的编辑几年如一日地对我保持信心，我深表敬意。

我的背后永远有北京大学我的导师、学友投来的亲切目光。

说到底，我并不是写沙汀传的最理想的作者。我仅仅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作过一点研究，加上我对蜀地的一份亲情。可我不是川人，不会说川话，对于川西北的乡土民情风俗只一知半解，这对我是个太大的限制，使我对沙汀的认识，总嫌不深。而且论文写惯了，驾驭叙述性文字总不漂亮。我想，到应当淘汰这本传记的时候，它自然就被淘汰，应当毫不可惜。

我期待来日，期待来哲。

作者

1989年2月20日是日元宵，月全蚀

